

目 录

序 李先念(1)

朱理治文稿

东北军工作篇

- 争取东北军，巩固陕甘苏区
(1936.3-5) (1)
- 为张学良托人带话事致周恩来电
(1936.5.7) (12)
- 赴西安工作前给周恩来的信(节录)
(1936.8.20) (14)
- 关于东北军工作及建议给中共中央的5份报告
(1936.9-12) (16)
- 东北军工作近况及新的布置
附：“双十二”事变中东北军党的活动的教训
(1937.3.23) (37)

河南抗战篇

- 河南、安徽党的工作现状及恢复组织
的初步安排
(1937.8.17) (47)
- 关于发展与恢复党组织的几个问题
(1937.11.25) (53)

回乡工作之基本任务 (1937.11.28)	(58)
救亡与党的组织工作近况 (1937.12.17)	(65)
当前河南的政治形势 (1938.1.3)	(68)
中共河南省委保卫河南宣言 (1938.1.25)	(72)
关于西华抗日活动情形给长江局的信 (1938.2.18)	(76)
论保卫河南的武装民众工作 ——武装民众的四项认识、八项工作方针 (1938.3.6)	(78)
党在河南的军事工作情况 (1938.3.11)	(83)
普遍组织全河南的农会 (1938.4.17)	(86)
积极开展友军工作 (1938.4.26)	(91)
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1938.5)	(95)
给苏鲁边特委的指示信 (1938.6.19)	(105)
豫东南要加紧游击战争的准备 (1938.6.20)	(111)
给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的两封电报 (1938.6-7)	(113)

给豫西特委的指示信	(1938.7.10)	(118)
论河南游击战争发展形势及当前任务	(1938.7.21)	(125)
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	(1938.9.7)	(133)
一年来的河南工作	(1938.9)	(134)
论目前华中抗战形势及今后任务	(1938.11.14)	(152)
关于豫鄂边形势、工作情况及建议		
给中共中央的6封电报	(1938.12—1939.4)	(161)
开创皖东局面的建议	(1939.3.21)	(168)
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创立与扩大正规部队	(1939.6.11)	(170)
关于统一豫鄂边武装部队指挥的提议	(1939.9.18)	(171)
竹沟事件经过	(1939.11.20)	(172)
论目前鄂豫边的新形势与新任务	(1939.12)	(173)
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	(1940.4)	(177)

边区金融篇

- 关于边区物价上涨原因及解决办法
的几点意见
(1941.5.13) (192)
- 给毛泽东的复信
(1941.8) (197)
- 边区经济与金融和贸易
(1941.8) (202)
- 社会调查是决定金融政策的基础
(1941.8.21) (222)
- 边区的金融与贸易政策
(1941.10.23) (225)
- 边区金融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如何克服
(1941.10) (228)
- 边区新的金融政策之意义与目的
(1942.2.27) (235)
- 边币的根本问题
(1942.5.29) (239)
- 加强银行的调查研究工作
附:论银行的研究工作
(1942.5) (248)
- 物价波动的原因和银行、贸易局今后
的业务方针
(1942.6.15) (253)
- 战时金融贸易问题基本上是抢购
物资的问题
(1942.7.25) (259)

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	
(1942.10.26)	(261)
法币跌价及其对策	
(1942.12.20)	(266)
发行与推行边币的体会	
(1943.1)	(271)
对晋西北金融问题的几点意见	
(1943)	(281)

东北及朝鲜工作篇

给李富春、黄克诚的信	
(1946.2.29)	(285)
在洮南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	
(1946.3)	(290)
关于北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支援情况 的报告(节录)	
(1947.6.27)	(292)
两年来对朝鲜外交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	
(1948.8.24)	(295)
东北银行的业务方针	
(1949.6)	(299)
关于总会计局结束后各财经部门相互间 经济关系的意见	
(1949.8.23)	(307)
论银行工作的转变	
(1949.12)	(312)

东北经济恢复与建设计划的方针和方法 (1950.7.17)	(321)
东北行政区进行22个月财经准备的 计划纲要(草案) (1951.2)	(328)
东北行政区的计划工作 (1951.3)	(333)
关于经济核算制的发言大纲 (1951.3)	(337)

物资工作篇

在第一次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 资金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951.9.5)	(341)
关于第一次全国物资分配会议情况的报告 (1952.8.5)	(346)
关于物资分配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1953.4.4)	(352)

交通运输篇

交通部门要加强财务管理,推行经济核算制 (1954.6)	(356)
为消灭海损事故,提高运输质量而奋斗 (1956.1.28)	(372)
对全国航运工作人员的讲话 (1956.2.4)	(381)

改进川江工作的几点意见 (1956.7.11)	(386)
改进长航工作,保证完成国家计划 (1956.8.2)	(397)
关于长江航运工作的报告 (1956.9.10)	(404)
积极发展我国的远洋航运事业 (1956.10.31)	(417)
交通部 1956 年直属航运工作总结与 1957 年的工作部署 (1957.3.23)	(426)

计划工作篇

关于工业视察情况给陈云、李富春、 薄一波的报告 (1959.5.1)	(448)
关于改进物资工作和建立物资供应部 的几点意见 (1959.11.6)	(455)
经济建设要注意质量,尊重经济规律 (1960.1)	(459)
河北、山东工业支援农业的情况和需要 注意的问题(1960.8)	(461)
华北区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 几个问题 (1960.10.30)	(473)

关于华北局计委的工作方法 (1964.1)	(482)
如何把华北地区的农业搞上去 (1964.5.25)	(484)
计划工作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1964.6)	(488)
关于包钢建设的几个意见 (1964.7.26)	(490)
华北区 1965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任务 (1964.8)	(492)
计划工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964.10)	(495)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华北地区农业 发展的设想 (1965.6.14)	(498)
关于压缩河北棉田面积的建议 (1965.7.10)	(505)
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华北地区 的几个问题 (1965.9.21)	(507)
关于华北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1965.9)	(513)
解决华北区粮食自给问题的措施 (1965.10.9)	(517)
努力搞好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 (1965.10.15、29)	(519)

朱理治回忆录

往事回忆..... (529)

朱理治纪念文汇

新华社关于朱理治在京逝世的消息..... (591)

朱理治追悼会上的悼词..... (594)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
历史问题的审查情况》的通报..... (596)

深深怀念朱理治同志..... **郭述申** (598)

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工作的业绩
..... **刘培植** (600)

朱理治同志在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
中的业绩..... **刘子久** 任质斌 刘子厚
方正平 栗在山 刘放 (610)

忆朱理治同志领导陕甘宁边区银行
的岁月..... 阎子祥 杨万胜 江围 (618)

朱理治同志为建设东北解放战争隐蔽后方
所作的贡献... 丁雪松 倪振 **齐光** (636)

朱理治同志二三事..... 余建亭 (647)

《朱理治金融论稿》序..... 袁宝华 (650)

《朱理治金融论稿》出版座谈会综述
..... 肖迅 (652)

朱理治的金融思想及其对当前金融改革
的借鉴意义

——读《朱理治金融论稿》..... 张天阔 (655)

朱理治传记、年表

朱理治传	陈 牧 张文杰(661)
朱理治年表	肖 迅(694)
附:朱理治夫人苏菲小传	肖 迅(723)
后记	(737)

争取东北军，巩固陕甘苏区^①

(1936年3月-5月)

(甲) 据神府苏区派人来说：自葭、芦以北 20 里之沙湾、高家坞、桑沟、大坪已恢复。从南至北 100 余里，从东至西 100 里，共 20 余区。我红三团正月后有相当发展，收枪十余支。

(乙) 神木驻晋军骑兵一团，神店并敌^②约两营，葭县敌情不明。

(丙) 我本日占溃店头镇，并击溃由乌龙铺来店头镇换防的两连人。根据以上情形，为开辟米东、葭西、神府苏区，使 28 军有作战后方，我意即进至乌龙铺以北，二日在闫家坪行动，红三团在闫家坪以北行动，如何即告。

(丁) 米脂独立营行动不明。

(1936年3月14日朱理治致周恩来并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西北中央局电)

^①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在到达陕北后组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次年2月至5月，红军东征，在陕甘苏区只留了少量部队。朱理治同其他省委领导一起，积极贯彻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对包围苏区的东北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从而配合了东征，巩固了苏区。本文是他在这一期间起草的给中共中央领导人的11份电报。

^②并敌，指国民党并岳秀部队。

二

(一) 韩城农民上月爆发游击战争，共有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四五十人。一夜之间，收缴民团土豪的枪支八九十支。唯因指挥有弱点，四个大队均被击散，另一大队现在隐藏中。

(二) 陕甘游击支队到了韩城。所达之处，群众分粮抗捐斗争随起，替支队放哨，热烈慰劳抗日支队。当地党的工作在农民、民团、学生中很有基础，正动员游击队与两处民团哗变，并配合支队用油印机翻印我们抗日宣言，随处张贴。

(三) 由于支队未能主动采取游击战术，个别领导同志动摇，因此未能与当地游击队和民团爆动取得连络，在敌人近三团兵力威胁之下，退回到苏区来，只在那边留下新建立的几个游击队与四个抗日的支队。

(四) 现在正组织一个五六十人的游击队，准备继续去韩城。如情况允许时，拟以较大队伍再去。

(1936年4月14日朱理治、肖劲光¹致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

¹肖劲光，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

三

(甲) 敌 107 师 15 日全部开到尖兵前，有百余不带武装之便衣队为向导，见我们游击队及群众亦不逮捕，驻于麻子街甘泉大道之两旁。今日有一团开到劳山，麻子街至劳山均修筑碉楼工事。据说 105 师日内来接防。

(乙) 敌方答复我们与群众责问的口实是：

(一) 进攻苏区非其心愿，因胡宗南师在后监视他们。

(二) 他们是北上东进，联合红军出察哈尔抗日，经苏区乃协同借道。

(三) 修筑楼堡乃应付蒋介石。

(四) 仍望我们和他们合作，卖粮给他们。同时，他们亦召集苏区群众会议，说他们亦抗日，和红军一样保护群众利益。

(丙) 大道两旁大标语及传单都贴了，惟因敌情不清楚，兼之地方武装未能执行命令，因此在郟县所布置之处，袭击敌人均未见发动。严重的是，郟县工委仍存和平共居观念，并影响到群众中间。

(丁) 布置：

(一) 利用现在接近上下层的机会，揭破蒋介石的欺骗。要求他们立即从筑垒与进攻红军转为号召官兵起来反对汉奸命令，驱逐法西斯蒂，打出抗日旗子。

(二) 在敌人前进时，延安独立营及红三团并配合赤卫军，骚扰与打击之。

(三) 加紧在群众中进行动员，反对党内和平共居观念。

(1936 年 4 月 17 日朱理治致张闻天、
周恩来并告彭德怀、毛泽东电)

四

(甲、乙两项从略)

丙、我们正布置打击筑堡垒部队，动员游击队、赤卫军日间去骚扰，夜间去拆毁破坏。同时，正利用外交关系从上至下公开或秘密地进行谈判，进行解释、宣传和争取工作。经过情形续告。

(1936年4月19日朱理治、肖劲光致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

五

甲、(一)昨日，第二支队在甘洛小劳山拆毁碉堡一个。(二)中宜游击队三日前在洛川到郫县大道上袭击民团，得枪6支，俘虏1人。(三)18日，29军在宜川击溃冯部出来筑碉之一团一营，及两个骑兵连，敌死亡65名，俘虏人枪各一，子弹400发，炸弹40颗。(四)郫县羊泉4日召开群众大会，到400人，并有东北军代表演说。群众当场有17人报名当游击队，当场募捐慰问东北军，故东北军代表出面致谢。甘洛今日召集二个区的示威大会。(五)近四日印发13000张传单与大标语，并将斗争报等分送给各长官。东北军对之甚欢迎，对贴的传单，亦不撕毁，唯政训处见之即涂坏。(六)延安四日前有19名白军带3支捷克式轻机枪，一支步枪，逃向安塞子长，声言需到远处交枪，近则怕我们送他们回城。

乙、(一)现在，107师已将甘泉大道两面之三区1个乡，四区2个乡，五区2个乡，六区整个区占领，进行户口调查，将过去2个保长放出，不许群众自由行动，拿群众门板及耕具筑碉架桥。豪绅地主回来向群众强迫收租，强迫群众将所有余粮卖完，群众恐慌日益增高。前小劳山郝军打了四个炸弹，将编保甲团的人赶走。(二)与107师师长及参谋长进行文件及代表来往。对方已允许不再前进，要我们现在动员群众帮助粮草，恢复市集。但我们要对方必须制止政训处编保甲，他们日间筑碉，我们夜拆掉，我们与政训处冲突时，他们采取和解态度。117师3个团与我们均有来往。129师在郫县，未有行动。粮食由彼方及我方各派两人下乡收集，唯彼方要求粮草太多，无法供给。

丙、张谈昨日到郫县，欧阳¹仍在郫县作党与军事部的代

¹欧阳，即欧阳钦。

表；少共书记代表省委，前日在商家嘴；甘，洛县委，肖^①与我昨日回来。明日，一氓^②去肤施^③，根据 21 日来电布置工作。

(1936 年 4 月 21 日朱理治致张闻天、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

①肖，即肖劲光。
②一氓，即李一氓。
③肤施，即延安。

六

我们对关中布置提出以下意见：

甲、宁县、新正地方应归合为一个地区，指挥部之下，暂在合水、太白、大道线以南及宁县、正宁县以北为活动地区，积极向宁县、正宁、盘克活动，以继续领导和扩大该地带斗争及游击运动，并利用庆阳、合水敌人兵力薄弱之机会，有时转入庆阳以南，在西峰镇、庆阳大道间活动，并创造苏区。

乙、集中红一团3个独立营及29军之一团，挺出耀县、同官、官君、大道以西地区，在耀、同、中、大道活动，并寻求有利条件，消灭敌之一部，以迟滞敌之前进。

丙、另以三水、淳耀武装，统一在一个地区，指挥部之下挺入到三水、淳耀敌人深远后方行动，以牵制敌人和继续争取群众，发动斗争。

省委决定劲光今日去甘、洛县布置军事，数日后回来。

(1936年4月21日朱理治、肖劲光致周恩来电)

七

(一) 黑水、中洛与郿县之间的敌人在军事上占有极大优势，我们则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我意可与 106 师第二纵队进行一定条件的谈判，在军事上给以相当让步，即允其在黑水寺太白、大道之间通行。另，我方取得更能接近对方官兵的机会，进行争取工作。

(二) 原因：甲、以我方在中洛郿县现有兵力，只能牵制、骚扰、阻迟其前进。要完全阻止其在黑水与郿县道上筑碉堡线，非现有力量所能胜任。乙、如能做到与敌军相互采取友谊协商关系，则很便利政治的争取工作，利用在 107 师中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一月之内即可能做到全部争取过来，至少亦可在敌军中建立起我们的几个堡垒。丙、如与敌军处在敌对交战状态中，争取工作不能很顺利地进行的。

(三) 始终加紧战争动员工作，在协定未成立前，用战争和坚壁清野等方法给予敌人困难，阻止其前进。他们的各部队更容易与我们订立一定条件的协定，之后，用武力来监视协定的执行，阻止与我友谊协商的部队；同时，掩护政治上的争取工作，来达到保护陕甘苏区的目的。如何，望复。

(1936 年 4 月 29 日朱理治、肖劲光
致张闻天、周恩来电)

八

(一) 敌 105 师昨日有 3 个团已到甘泉，有 1 个团在纸坊沟、老人仓一线正赶筑堡垒。129 师日内将上开。107 师已到延安甘里铺，亦有驻扎传说，尚要往兴隆来。129 师因 105 师来，都表示很大恐慌。

(二) 与 129 师师长谈判结果，规定两方互不侵犯，部队前进，事先相互通知。我方并向他们说明，绝不做军事上进攻及瓦解其部队的事，减少对方对我们紧张的警戒及疑虑，便利我们接近其中下层官兵。其特务队长已经正式恢复党的组织。

(三) 郃县通延安，大道之线封锁甚严。与 129 师接洽通过，须要经过延安以上，通过计需八九日之久。为适应战时状况起见，可否在红、宜或将红、宜、延安成立一中心县委或特委，归陕北管。

(四) 辰之寿因 105 师来甘泉，又因向下行动，决将款项从城内运出。如何处理，请示。

(1936 年 5 月 1 日朱理治致张闻天、周恩来电)

九

(一) 延安城内法西斯积极隔断我们与东北军关系。前十天，每日拂晓均出来屠杀破坏，安塞一区政府活埋我们的抗日同志。

(二) 对延安策略：指出蒋介石如真抗日，当然欢迎，但鹤石唐卖国，反对作战协定，最近并破坏东北军与我们联合抗日协定，对他不能有幻想；指出救国救延安人民，只有东北军与延安城人民与我们互不侵犯，实行联欢，反对卖国贼破坏我们联合。并请设法向东北军提议，依照原则，如敌再出捣乱，定给严重打击。如何，请示。

(三) 目前，敌派人出，当日即可发现。决定将新成立之 29 军第 3 团派去，防其再来筑堡垒。

(1936 年 5 月 3 日朱理治致周恩来、博古电)

十

(一) 在中、鄜: A、实行坚壁清野。B、游击队在黑水与鄜县间日夜骚扰。C、29军主动打击敌人出来骚扰与进攻的部队。D、组织中鄜战区委员会, 随中鄜独立团行动, 进行中鄜地方坚壁清野与扩大武装工作。E、进行与敌方的谈判。

(二) 在甘、洛: A、加紧警戒洛河川与老人仓、桥家庄。B、加紧对129师与105师之宣传, 组织喊话队。对105师的宣传则分别号召他们哗变过来。C、搜集敌人屠杀压迫群众的事实, 动员群众参加战争, 并准备随时在105师进攻时实行坚壁清野。

(三) 在肤施抓紧目前公开活动的有利机会, 运用你们过去的指示及甘泉的经验, 做白军的突击。订出7天计划, 省委组织一大队工作团, 并由罗梓铭同志前去布置。同时, 抓紧游击队的扩大与巩固。红宜情况不明, 一岷由延安去红宜、安塞、高桥、二川, 望转告陕北省委布置警戒。

(1936年5月4日朱理治致张闻天、周恩来电)

为张学良托人带话事致周恩来电

(1936年5月7日)

(一) 周建屏同志从上海来，因上海与张¹有关系，故周经张处进苏区时，[张]托周向恩来同志面谈数事。因恐失时效，故行电告。

(二) 张托建屏转达：第一点，蒋有令，直属4个师军队由黄河西渡，会合杨虎臣向上推进。张要求我们从山西牵制，以防其西渡，言下之意在于恐蒋杨联络对张。第二点，希望我方给中央军以打击，不要回陕北，如回陕北，恐有6个师部队随之西渡，对红军与对张均不利。第三点，蒋命张部由延安进至延川，同时由延安进至瓦窑堡。张以构碉应付，计只要道。我方允许他从延安至延川，再由延川回至延长之线建筑碉堡，如返回，准予通过。谈至此，王以哲来。王谓如为我方着想，在黄河边筑碉对我有不便处，最好只筑工事由延安至瓦窑堡一线。张此次要道，如恩来允许，则谓不久彼为要道与恩来见面一谈。

(三) 周要的子弹，彼决供给一部。给予之办法有：A、在甘泉到延安大道上，彼方运子弹，我方去夺取。谓此法不甚好，因恐双方有损失。B、彼派一师兵进攻瓦窑堡，我方预先避开，留一些废枪，彼取此而留下子弹。彼谓此法较安全。

(四) 以上为张托建屏转告之正式谈话，下则为便谈，其言如下：上海南京大传谣风，说他和共产党在洛川开会，蒋最近又派来大批政训人员，实则监视他。他又说，他不怕蒋监视，因他

¹ 张即张学良。下同。

有部队。彼又谓，蒋决定王^①进至洛川，如不来，刘^②必怀疑他。他希望我们不要逼他太急。他希望在11月骗到蒋介石一些武器补充后，再约公开。他希望红军不要写“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起来”。他将我党口号修改一下，印了许多，现在外方很为怀疑，说东北军的口号为什么和红军一样？

(五) 恩来要求之地图，彼已准备好同样的两份，一份已交周带上，一份他恐失掉，故留下，以后再设法送。

(六) 如与彼谈话，地点及化装，均约定由周面告。

(七) 以上由周面达。朱^③代草此电。

①王，即王以哲。

②刘，即刘多荃。

③朱，即朱理治。

赴西安工作前给周恩来的信(节录)¹

(1936年8月20日)

从延安赶回，拜读了你的几封来信，一切都同意，我决定即随王立人走。现有几个问题，和你商酌如下：

一、诚如你所说的，初去西安，先求站稳住脚。西安地方很小，又非常简单，且刘、宋²又系直接在群众中活动的同志，经常和他们见面，为环境所不许，所以这里要有个副手。我和老叶³商议了，决定把我们从肤施⁴调来的王金璋同志调出和我一起去西安。他有一个爱人在肤施，现在亦已调出，大约明早可和我们一齐去西安。如这个女同志不能来，我和金璋先走。将来尽可能由他们二人先建立一个机关，我如没有别处去，则先和他们住在一起。金璋暂时用我秘书的名义（以后工委建立起来，再行决定）。此事因仓促，未及征求你的意见，谅无不可吧？

二、向中央写报告时，有时需要密码，现在约定如下：
(略)

三、经费每月20元，生活很够用了。不过尚有几事要你决定一下：

a.王霖进苏区时，刘澜波等曾提出来要一些活动费。如工作

¹ 1936年8月，中共中央按照与张学良的协商，委派朱理治为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赴西安领导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组织，同时，帮助东北军的部队政治工作。这封信是他临去西安前写给周恩来的。

² 刘、宋即刘鼎、宋黎。

³ 老叶即叶剑英。

⁴ 肤施即延安。

需要，可帮助他们一些。

b.工作上多少要有一些准备，以备万一之用，请即规定一下。如不用，原数归还。

四、我感觉在白区秘密的保守消息倒还容易，在苏区里真是很难。假使苏区泄出消息之后，很快便可传到白区。所以，我在此地告人是到曲子镇去的；对知道我走的人，说是到上海去的；即请你处亦如此向人说吧。

关于此间情况，概由剑英报告，仓促工作，多谅。

关于东北军工作及建议 给中共中央的 5 份报告¹⁾

(1936 年 9 月-12 月)

9 月 2 日报告

董威老兄并转钟哥²⁾：

关于我在这里经营的事情，自然与目前整个情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这由开兄³⁾回去后向你们说吧。这种整个情况的变动，自然使我在哪里所经营的事情更加重要起来，这是无须说的。现在我只将目前所可能允许我做的事情及我的企图奉告如下：

一、杰⁴⁾已出来，烈兄⁵⁾日内亦可保送出来。我正与丁兄⁶⁾设法妥善的见他们，计划今后公司⁷⁾经营的方针。当然，技术方面要绝对的注意。

(二) 外围的群众组织，目前[在]CP⁸⁾甚薄弱之前，自[然]更

1-1936 年 8 月，朱理治被中共中央派往西安担任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负责领导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从这时起到西安事变爆发前夕，朱理治就中共在东北军中地下党工作、东北军内部政治情况与工作部署，西安城内乃至西北局势，贯彻中央关于逼蒋抗日方针的建议等问题，用密信方式向中共中央写了一系列报告。这是其中的 5 个报告。

2) 董威，即周恩来。钟哥，即中共中央。

3) 开兄，即潘汉年。

4) 杰，即宋黎。

5) 烈兄，即刘澜波。

6) 丁兄，即刘鼎。

7) 公司，指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

8) CP，即中国共产党。

重要。现在同志会^①已经开始，只是这种组织与目前政治上的问题，犯了同一种毛病。DE把它看作比CP还要严密，认为假使有一个人泄露，最高负责人便不得了，便要误大事。我意使这个组织成为我们过去所要求的张学良自己的政治团体，如小胖子觉得不妥，则完全不要他自己露面。先以每师为单位，把抗日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同时，把教导团的学生会依师为单位成立分会，健全其生活，这样便不难把整个抗日分子团结起来，在这些组织中间，建立CP的核心。

(三) 现在，在政治上造成一种“迫蒋抗日”的空气极为重要。已有几个刊物抓住[了]，[要]迅速利用来做。

(四) 学生队^②我正在帮助来做，暂时不准备出面，保持一个好面孔，经过别人在做。但是，政治上完全可以掌握得住。来的学生中，同学定然不少，但恐不能立刻找到。待和杰兄（他有做同志会青年部[长]的希望）商议后，或由他设法。

(五) 关于内外的配合上，现在内部所建立的组织，我在此无法去找，望内部派人加强领导，待此地恢复后，再交了出来。

(六) 关于我的住处问题，我想目前只有住在原处。这地方开兄知道。当然，这地方是不好的，但刘兄过去并没有和我说明，便把我带了进来。现在人已认识了，要再掉[换]地方，住在学生队，一定认识的更多。将来的住处，只有看今后发展的情况再定。完。

致以敬礼

玉台^③

^①同志会，全称抗日同学会，东北军中的抗日秘密组织，由张学良亲任会长。

^②学生队，即学兵队，是张学良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建立的一支主要由东北流亡学生组成的武装。

^③玉台，即玉苔，朱理治化名。

10月11日报告(节录)

董威并转钟兄：

目前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地发展着。日本帝国主义表面上的中日经济提携与亲善，终于不能掩盖它夺取华北，进攻绥宁的真面目，而终于在全国民众不断打击之后，摆出了它的狰狞的“强硬政策”的面孔。它一面在长江流域增加兵力，准备作战，企图在长江流域建立它的侵略据点；一面威胁南京，迫使它更进一步镇压群众运动，继续进攻红军，出卖华北五省以至华南的海南岛。但是，目前抗日运动的发展，已经使得国民党无法控制。群众的愤怒情绪，已如易燃气体到处充塞，并且在全国各地，不断地爆发火花，随时可成燎原之势。民众救亡运动，现在正急剧向前发展，并且已经日益浸透在国民党军队之中（例如，傅作义之抗战，阎锡山的决心，陈诚对张¹抗日之同情，张之部下如黄显声等向张要求出兵绥远，胡宗南表示红军如出兵绥远便无法追打，关麟征对“围剿”表示厌倦，认为打红军是打牛皮仗，永远也打不完）。加之抗日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汇合，这一切因素，在我党中央的“逼蒋抗日”的总的策略之运用上，已经成为极大的力量，使得国民党更进一步动摇与分化，使得抗日运动更加向前推进，走上更高的阶段。

这种情势，在北方与西北尤为明显。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今天主要的还是要夺取华北与西北，由于红军的北上汇合与我党统一战线在华北与西北更加深入，由于东北军在北方的白军中已开始起推动的作用，更增加了抗日统一战线在西北与华北首先建立起来的可能，更增加了华北与西北各实力派首先联合起来实行抗

¹张即张学良。

日的可能。用西北的统一战线，来推动全国性的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之建立；用西北与华北的局部抗战，来推动全国性的总抗战，已成为我们今天的任务。关于阎、傅最近态度之改变，关于杨虎臣^①的消息，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情势的变动，使东北军内部各种派别与势力，又在新的形态下，重新结合起来。东北军中约有三个主要派别，最大的要算国社党，虽是首脑机关在武汉时宣布解散，并把名单交出，但是下面的组织依然存在；其次是国民党；再次是我们与左派。前二派，特别是国社党这一派，曾经十分猖獗，军训团里的国社党竟然使得左派，甚至使得王以哲这样的人都站不住脚，张对总部的人员几乎完全把握不住。

不过，这种情势现在确已大大的改变了。由于张学良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把自己的立场，站在促蒋抗日之上，同时把自己的政治面目相当地公开出来，张的地位是巩固起来了。他在政治上无论是对蒋与对部下，完全占在优势的一面，现在可以转向到顺利的进攻的形势。国社党的下层领袖，对于张的抗日主张深表同情，现在也倾向到张。假使张能够乘这个有利时机，采取更广泛统一战线的策略，在逼蒋抗日策略的运用上，不只是有可能把国社党与其他各派争取过来，而且，由于他今日所处的优越地位，可以把东北军内部的国民党以至于法西斯蒂争取过来。

东北民众救亡会是前礼拜天刚成立筹备会。这是我们经过同志会的青年部所领导与发起的。筹备会到会的共17人，其中包括了三个派别（秘书厅的洪派^②、左派与我们），无疑的这是比较同志会更带群众性的。我们正和东北军的其他派别谈判，吸收更多的派别下的群众来参加，同时，决定把这个组织完全公开，

^①阎指阎锡山；傅指傅作义；杨虎臣即杨虎城。

^②洪派，即洪筋派，洪筋为东北军总部办公厅主任。

准备到国民党政府登记去。今天开成立会，我们布置有 200 人左右参加。我们原来的计划是把这个组织成为青年救国会性质的组织，但在成立筹备会上没有通过，因为洪派的人说，青年二字太左，怕不能登记。我们现在决定，仍使这个组织偏重在青年方面，同时在目前同志会极端关门的情况下，把它变成东北民众总的群众性质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前途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已取得这个组织的领导权。

在今天，东北军已有的最大的群众组织要算讲武堂同学会。这组织约有 2000 多会员，并且有相当的生活，在各师里都有联络员。总会的领导权，现在可说也在我们手里。在“九一八”纪念日向副司令^①请愿抗日的时候，讲武堂同学会便动员了 200 多会员，有一部分带了武器，准备如法西斯出来压迫群众时，即开枪对打。对于这个组织，我们正在健全它的各师的单位，准备把各师联络员的制度充实起来，变为各师分会的性质。

在同学会内，要把各部工作健全起来，利用这些部加强对会员的领导与教育。同时，在同学会内成立抗日小组，发起建立救亡会，并造成条件，准备在适当时把整个同学会加入救亡会或同志会。

各地的党组织还在筹备妇女问题研究会，准备把东北军的军官太太们也组织起来，日内便可成立。

这里组织的特点是组织虽小，但活动范围很大，同志一般都积极干练。因此，党在多种群众组织中以及最近各方面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同志的情绪很高，个个活动能力都不坏。但在统一战线的运用上，虽有了一些成绩，尚谈不到活泼，在群众大会上，每每表示死守机械的原则，因而使自己的同志太突出。例如，群众提出不要用“救国”二字，因为此二字不能登

^①副司令，指张学良。

记，要改为“救亡”，而我们的同志不同意，和群众起了争执，并提出这样的理论：“名词要和内容统一起来。”这些弱点，相信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将会很快得到纠正。

补充一：关于绥远问题。张在半月前曾派了一个人去绥远，见傅作义，此人适为同学，他在绥远傅之部下熟人甚多，且有一些群众，此人已回。关于日本对绥远进攻情势，报纸已披露。傅电南京，力呈绥远在国防上之重要，内谓，绥远不失，我国国防线只有 500 里；绥远一失，国防线将有 5000 里。故求政府加以帮助。南京在半月前，寄去百万元，嘱他加紧布防，构筑工事，并应允开五个师去援助。但此五个师，现已开入陕西。南京电嘱傅无论如何要将绥远保守到十月，过了十月，中央另有办法。傅现在对日抗战，颇有决心。前月，满蒙军进攻时，傅稍加抵抗，便获得全国人民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很大援助与同情，亦为促其决心抗日之重要动力。现在，傅一方面积极布防，准备敌来即打，一方面阻止日军在包头设飞机场。阎对日亦有决心抵抗，声明日本如在山西境外，他可不管，如日军入境，则要开战。日在山西特务机关，阎概拒绝接见。绥远各将领，如王靖国、包悦卿对抗战亦有决心。傅对张之关心绥远，虽表面上表示感谢，但暗中则心存戒惧。一方面恐张是主张“反蒋联红”；一方面则又恐张夺取其地盘，故一直询问张如出兵，将由何路。傅对红军的估计是，十月内不至于出绥远，因三方面红军汇合后，要休息整顿，同时有国军堵住，一时不能出绥远，但过了十月，黄河一解冻，红军一定要来了。傅说，如红军出绥远，是联红抗日呢？还是进攻红军呢？如联红抗日，则我只有三省，不能担当；如打红军，则只有投降日本。傅并对代表说，绥远、宁夏一失，中苏关系便要立刻失掉，不知张在国际上与国内有无联络。傅有六个团，所有干部与我们的代表都相熟，其中有一人，和我们有很久的关系，现在至少可以掌握两个团。此人极有魄力，很想做第二个马占山，

如发动抗日，将请我们派人去。但表示现在派人去，则不易安插。对于绥远问题，我的意见：（一）经过这个代表即 M¹ 同学推动张与傅，压迫蒋实行出五个师来援绥的诺言；（二）推动张与傅、阎、韩、宋² 订立作战协定；（三）经过张介绍我们苏维埃的代表前去与傅直接谈判，此事望中央即与张接洽；（四）加强对傅下层的工作，设法派人去，此人亦请中央设法。现在张派去之代表是此地决定做党的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故最好仍留在此地，只保持与绥远一个关系，由他设法介绍人到下面去活动。

补充二，关于东北民众救亡会。成立大会已开了，到了百五十人。第二天，西安各报纸均用大字将其经过及章程登载出来。到会的有张部的党政科长、秘书长、一直到工人、学生，我们的基本群众即有 90 余人。这是抗日运动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表示东北民众由散漫而走到团结一致抗日。它在我党正确领导之下，无疑会变成全东北民众的抗日的总的领导组织。它的成立同时给予了西北抗日运动以很大的推动。它已争取到在西安公开存在的地位。这表示此地幼年的党，已能够在中央新的策略之下，开始担负起建立东北军内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但是，（一）在这次成立会中依然有不少的弱点，最主要的是，统一战线不够广泛。这次大会，因为迁就同志会的书记等的意见，没有能够把国社党与国民党的基本群众吸收来参加，使得这两派在开会之后便要另外成立一个抗日会，以与我们对抗。在大会上，也没有能够设法吸收东北名人参加，或担当一定的名义。现在我们决定与这两派谈判，吸收他们进来，叫他们不成立第二个抗日会，以免力量分散。如成立，我们亦派人进去。同时，请张

¹ M，即苗勃然。

² 韩，即韩复榘；宋，即宋哲元。

和马占山、李杜等参加，并担负一定责任。准备在工作大大开展的条件下，即各地建立了分会，各种群众都参加了之后，开数千人的第二次大会。（二）现在主要的是要加强救亡会的工作内容。派工作团到各地成立分会；活动各地的与西安的各种群众的组织，来一致参加救亡会；出版刊物，募捐援助义勇军等。同时，设法推动十七路军亦成立抗日组织；在各校亦成立抗日组织。汇合起来，成为西北的救亡总组织。闻全国救国会将在西安开会，所以，这里救亡会的工作更要加紧。（三）在这次开展救亡运动中，没有和巩固党与发展党联系起来，此地所有的党组织，几乎一概参加了救亡会的重要工作，这是极端有害的。同时，党在运动中也没有发展。这都是要用很大力量去纠正的。

补充三，（略）

补充四，一兄^①来此，传达中央最近的政治分析与策略运用。我完全同意，并要把这些指示，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实行起来。在恩来与中央新的指示到来之后，此间的工作，虽看到不少变化，特别是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时间短促，与此地组织经破坏后一时环境上之某种困难，所以工作弱点还很多。中央指示“统一战线越宽广越好，党的组织越严密越好”，用这种要求作为尺度来考察此地的党，还是相差很远。统一战线还只是一种开始，最成问题的是组织上的缩小与不严密。所以，还得用很大的力量来帮助此地党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东北军中的情形极其复杂，现在我对它的了解还只能是一般的。所以，我得再用一些力量来研究它。因为住在S家中，认识的人至少有20到30人，使得我对环境的应付上有不少的困难。不过，我要用

^①一兄，即叶剑英。

各种方法去应付，至少，想再在此地做一个月的工作，得这里党的工作正式走上轨道，然后再看情形决定。

敬礼

王允⁽¹⁾

⁽¹⁾王允，朱理治化名。

11月4日报告(节录)

周并转张毛^①：

一、关于党所得各种情报，除前已电告者外，详情由一兄面达，不赘。根据蒋^②至此之后表示出兵援绥，虽有相当可能，但目前时局若无其他变化与重大压力加于蒋氏，则出兵援绥，很大的可能成为一种姿势与手段，表面上领导抗日，而实质上是拆散西北统一战线，进攻红军与解决东北军。在这种形势之前，我们决定此地党的策略是：帮助东北军的巩固，反对它的破坏者；推动西北统一战线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来逼迫南京改变现在的态度。

二、蒋来西安，党决定以下三种工作：

(一) 发动群众的请愿运动。由救亡会发起，招集了24个团体的代表，写了请愿书。蒋未来之前，已有所闻，曾电张询问。请愿之日，蒋飞洛阳，故未发动。

(二) 推动西北联合，组织援绥联军，决定G^③同志推动杨。G即是写《活路》的，被蒋查出后通缉，现始回来，是杨、张之中间人。G以语激杨，杨谓西北局面，张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决定M^④同志活动阎、傅，惟阎、傅到西安后均即离开，未及谈。过去决定组织“联军”是与汤^⑤总队共同组织，依现在情势看来，恐须采取别种形式，决

①周，即周恩来；张，即张闻天；毛，即毛泽东。

②蒋，即蒋介石。

③G，即高崇明。

④M，即苗勃然。

⑤汤，即汤恩伯。

定在张，杨部下与西北煽动这一口号。

(三) 在蒋未来之前，利用我们影响下的报纸做了一些宣传，欢迎蒋来领导抗日；蒋在军训团发表演讲之后，我们影响与领导下的一些报纸，作了一些批判，并写了两个演说稿子，到军训团中找人演说，批驳蒋之演说。蒋在军训团讲话中，除前电数点外，并谓：“谁要对剿匪动摇，谁要提出联俄、联共，我一定要打倒他”。蒋之演说，在军训团中发生了极大的不满。

三、周来信指示关于同志会的性质，其与救亡会之关系及党对它的策略，对于我们很重要，我们完全同意。因此，我想到我们过去决定把同志会立即转变为“广泛的群众性质的组织”，是过早的办法，因此是不正确的。因为，东北军目前急迫地需要有一个本身的领导的组织，这在今天是不能由党来代替，而必须由东北军本身中的优秀与先进的左倾分子组织起来，才能成功。同志会的各种工作，事实上非党的帮助与指导不能开展，但是他们对于我党的同志都有很大的戒备，而他们本身又不能使自己的工作发展起来。现在差不多还是停陷在原有状态。我想，在目前情势之下，加以我们坦白的诚恳的解释与劝导，这是可以克服的。

救亡会的会员已扩大到将近三百，唯与下层的联系还很差。现在 67 军、115 师与 107 师允许救亡会派十余人去活动，救亡会急需打入军队中。

四、……军训团现在每期只有 18 天即毕业，上期除一般的宣传之外，未能得到组织收获。学生队第一期 80 人，因有 28 个党员，经北方局介绍来，已建立支部；第二批已来 130 人，正在建立中。现在从各方抽出同志 8 人，开了一个训练班，毕业后，即将分散到各军师中去。固原、平凉正拟派人去。

五、经过党的帮助，此地的文化协会筹备会已经成立，西安各报馆除《西安日报》，均有社长或记者参加了。西安鲁迅追悼大会便是他们领导的，西安的学联规模亦粗具。这些工作，需要

很快的交出去。不过我在此查问地方党的负责人，现在尚无回音。据“东救”^①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感到地方党的领导异常薄弱。因此，他们领导下的单位，如杨部下的特务营，便对领导机关发生怀疑，怕这个领导机关是假的。最近北方局又交来两个民团关系，一个在蒲城，一个在怀阴，究竟这些关系如何处理，望速示知。

六、关于叶、刘^②，我三人的关系。我希望叶能再来，他在此地上层的活动，和党的工作能够适当配合起来。……我想以后假如叶来，或有其他人来，把三人团建立起来，在不妨害秘密的条件下，进行会议生活，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工作上有一致的配合，同时，使得政治生活健全起来，许多不正确的倾向才更容易纠正过来。

七、关于西北白区各方面工作的配合问题。我因为不了解全盘情况，不能提出具体意见。但我认为党倒需要重新配合一下。首先是西安。在目前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我决定留在此地工作一时期。依照情况看来，只要自己更加小心注意秘密工作，大概还不至于发生问题。对地方党予相当的帮助还是可以的，但直接参加他们的工作，恐为环境所不许。

八、M已写了两封介绍信给彭^③，据M说四方面军有位舒玉章同志，奉天沈阳人，士官20期学生，在徐向前部下做政治部主任。此人与傅之部下都熟识，傅部下有位李大超(?)的，他担负训练民团的职务，绥远的地方武装均在其手。另外，他还确实能把握两个团，如舒同志能去，李定能容纳。M同志曾和他说过要派人帮助他，他已同意了。我想在目前绥东情势紧急的情

①“东救”，东北救亡总会简称。

②叶，即叶剑英；刘，即刘鼎。

③彭，即彭雪枫。

况下，是否可将他调出来去进行下层党的工作。望复。

敬礼

王允

12月3日报告(节录)

恩来并转钟兄：

此间现共4人负责，其中3人均已被派往平、津、绥，只有S^①一人留此，决定他们写的报告都没有写，有一些工作也无法检查。现将此间情况略述如下：

甲、依照前次来信所提示，抓紧了扩大援助绥远的运动，使军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绥远问题，这个工作，这一月来得到了很大的开展：（一）首先，“东教会”发起募捐，并派了代表到绥远慰劳，现在这一运动，已经开展成很大的运动了。（二）在西安我们所领导与影响下的报纸，除《西京日报》之外，都能够抓紧这一运动扩大宣传，也可以说，经过这次绥远运动之后，经过这里文化协会与文委的努力，把过去此间文化界的沉寂空气冲破了。（三）西安学联在我们与“民先”^②的帮助之下，正式成立了。（四）在“东教”的动议与领导之下，全西安进行扩大宣传运动第一次到城外，首先集中注意当地驻军，动员了3000多人，第二次动员到5000多人。（五）全西安的绥战后援会（即各界救国会）已经有20多团体发起，日内即可成立。（六）蒋二次来，此间下正准备大的请愿运动。

这种行动，当然对于现在南京政府的政策是极大不利的。为着安定前方“围匪”军队官兵的情绪，敌人（一）组织“供献一日给国家援助绥远委员会”，他们提议统一募捐，将捐得之款一面送给绥远，一面还要慰劳“围剿”红军的战士。但是这种提议遭群众反对，没有成立。（二）他们极力反对群众提出的“停止一切内

① S. 即宋黎。

② “民先”，抗日民族先锋队的简称。

战”的口号，在群众宣传时，出面干涉，为此，政训处的人和东北民众与广大群众发生了不断的冲突，单是东望小学的宣传队便和政训处冲突了两次，结果周围看的群众，一致把政训处认作汉奸，痛打了一顿。（三）蒋一再命令周子昌，最近省政府并命令宪兵，压迫学生运动，禁止“学联”组织，又决定每校派一政训处人员到校“指导”。

我们对付的策略有几点：（一）利用东北军及十七路和省党部、宪兵团、政训处的矛盾，使法西斯不敢压迫。凡是召集群众会议，都想些办法要十七路和东北军总部有人来参加。（二）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东救”曾派3个代表见邵力子，结果很好。在谈话中，邵表示他同情共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他很希望共党有人来和他谈谈。不过，他不赞成共党把所有过去的错误都推到国民党身上，他认为过去国民党当然是错了，但是共产党也有错的。他说，现在一般宣传，都替共党宣传，这是不公平的。（三）扩大统一战线的阵容，“东教会”现在把王以哲、董英斌、吴家象等人都拉了进来。在地方上并注意培养一部分如王造时、章乃器等上层统一战线的活动者。（四）尽力纠正宣传及行动中“左”的倾向，如《西京民报》等公开反蒋的文章，及西北各界救国会筹备会的狭隘的工作方式。（五）尽力把一切的活动以军队为中心，注意各报纸在军队的发行与反应，派宣传队到城周围宣传，同时派了十余人到前方各部队中活动。

乙、十七路军中最近也有很多事实，表示出他内部抗日统一战线在日益形成与巩固。例如：（一）国社党首领王回波等提议出兵绥远；（二）吴象生、王回波、李天才（西北政训处副处长）造成联合战线；（三）十七路军内部抗日力量增加，现在已有4个师长是×××员，8个团长参加了救亡会。

.....

目前情势逼得张只有走向抗日的道路，特别最近红军给予胡

宗南的打击与阎、傅^①表示抗战的胜利，自然更促进张的积极性，如派苗^②去见阎、傅，要傅向蒋要求东北军援绥，派骑7师去察北活动义勇军，派7师之刘团长由宁夏破坏日本特务机关，推动十七路军做群众工作，暗中保护救国运动等等。

这种情势，推动了同志会领袖的积极化，在我校的推动下，现在同志会小组是编成功了，5个小组长内，有我们4个同学，并且吸收了我们两个同学参加了中央委员，并通过了两个月内扩大120人的计划，这表示出同志会是开始转变了。

救亡会这一时期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扩大了。所有的军长大都担负了会董之职，总部处长、科长参加了不少。这次扩大宣传中，派了些代表到炮兵团、工兵团，得到了很好的影响，这些团部都希望“东救”派人去组织。外地与我们有关系的师团部都要求“东救”派一些学生去组织，近来虽然已去了一些，如67军去了5人，112师去了3人（去后回来2人），105师去了1人等等，但是仍是供不应求。这主要的原因是，这里的群众基础还很薄弱，而且多是有固定职业的，所以较之今在西安以外的各部队还没有大的开展。其他各种名义的组织是否组织起来，也还没有得到报告。现在的办法是：（一）把纲领与章程做好，发到各个部队，要各部队自己去成立；（二）利用此地的地方“民先”等干部，派出去；（三）扩大“东救”的基础，注意讲武堂的失业同学的组织。

黄^③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参加了同志会，随即发表了119师师长的职务，早去石家庄接事了。去时此地派了3个人随去，

①阎，即阎锡山；傅，即傅作义。

②苗，即苗勃然。

③黄，即黄显声。

并作了工作计划。现在刘^①也去了，这一师的工作，定能顺利的开展的。

丙、这里的党组织，已经开始并起小组与支部。训练班办好后，把学生都已分发到各师里去了。工作计划也订了起来。但是，领导机关立刻又发生了些问题。首先，C^②（新提拔参加工委者）被调去天津，M被调去绥远；G^③初者因为董团长的^④事，有牵涉到他的可能，故完全秘密了10天，后来情况缓和之后，出来了，但隔了两天，黄师长又调他去石家庄了。这样又使得他们3个人领导下的工作受到了一些影响。现在工委^⑤所有这4个人，地位都是很容易变动的（最近宋^⑥又接到恐吓信）。为着补救与防备，决定：（一）拟扩大工委到5人，除原有4人外，另外再找一个干部，完全秘密的，不受职业牵制的。3个人做常委，2个执委，此人在现有同志中，没有找出。里面是否可以帮助？条件，要做党工作有经验的。（二）现在西安本地单位缩小，此地同志虽不多，但单位倒有18个，有许多工作对象相同的，则合并起来，在总部只成立一支部，在学生队成立一总支部。

此地领导各军与师的工作，正和北方领导各地特委工作一样的分散与遥远。上月初各地巡视员都已派了去，但现在尚未有消息来，已决定去信调两个巡视员回来。为着给予各地党组织以政治领导，现在已经决定出一党内刊物，名为《铁流》，第一期已编好。……

①刘，即刘澜波。

②C，即孙达生。

③G，即刘澜波。

④工委，指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⑤宋，即宋黎。

《斗争》及里面^①的一切文件，此地一点都没有见到。这里同志6个之内，只见到1本《斗争》，每个同志都要文件看，务必设法送些文件来。

此地工作有许多要北方[局]帮助的，有许多要相联系的，最好建立一个横的联系，并叫他们把每期《火线》都寄此地一份。

此致

并望复

^①里面，指陕甘苏区。

12月11日报告

张、毛、周：

目前情势，表示南京在动摇中，例如，他确曾授意阎、傅及宋哲元，叫阎、傅反攻察北6县，并叫宋行动断日方右路。不管其动机如何，至少都可表示南京仍在挣扎中，在动摇中，他今天还没有完全答复日本的要求，在群众的压力下面，还是可动摇到抗战方面来的。但是，今天蒋的政策中心，还是用较小的出卖，企图缓和日本的进攻，而利用这一时间来进攻红军。所以，前次蒋由洛阳飞济南见韩，曾托韩转宋，要宋与日本相商：①南京愿总集中力量“剿共”，请日方允许他7个月的时间。②冀察愿维持现状。蒋日内又调了5个师进了潼关。显然的，现在情况如继续下去，南京势必依照其企图硬干下去的。

为着要打破这种局面，我想在中央关于民主共和国决议的正确路线下，有几件事是在这时可做的：

(一) 在“剿匪”后方扩大广泛的群众救亡运动。在把绥远局部战争变为收复失地的全国战争的口号下，动员群众要求政府调动陆空军收复察北、京东及热河、东三省。前天这里举行了一个大的请愿示威运动，事先召集了西安各界援绥后援会的筹备会，在会上通过了我们的提议。有以下几项要求：(1) 请政府陆空军实行援绥，收复察北、京东、热河、东三省。(2) 要求政府组织援绥联军。(3) 保护救国运动，释放被捕救国领袖。

请愿示威一共动员了5000多人，学生居多，还有不少民众。东北军及“绥署”¹⁾的士兵表面上是来防备，实际上也部分

¹⁾“绥署”，即绥靖公署，是国民党政府设置的在一个地区负责指挥军事，控制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机构。

的参加，并保护这个请愿。向邵力子请愿时，邵的答复，学生表示不满。结果学生驱走了他，以后又冲出了北门，到临潼向蒋请愿。直走到灃桥，与军队相持不下。后张去，完全接受了学生要求，并表示一星期内，一定给各同学事实答复。到夜九时，学生才回校。是日，请愿学生与民众情绪高涨之至。原定不回校，已派人到校去取帐篷，准备露营，第二天再去临潼。宪兵准备逮捕，但因东北军与“绥署”士兵在旁，不敢引起冲突。在学生行动时，张发命令给“绥署”各机关，对示威行动采取不干涉态度。这星期内，准备：（1）把后援兵正式成立起来。（2）组织绥战义勇队，出发赴绥。（3）广泛宣传，组织游艺宣传大会。待下星期张答复后看情况，准备更大的向蒋之请愿运动。

（二）这种运动对于“剿匪”前方一定能发生阻碍。但是，现在运动还只是在西安，而中心还是在学生。所以，第二个方法，便是设法动员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将官、士兵，请缨、请愿、签名，以至于士兵的行动。最近，蒋招东北军将领谈话，同志会已动员了一批人向蒋请求。我们想在各地发起签名运动，在东北军中与十七路军中进行签名。同时，要动员士兵来参加与保护救国运动，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这种骚动，主要的对象是反对法西斯，反宪兵别动队的。这一方面帮各地做，一方面帮各种事的动员。假使士兵也都起来，一方面无法命令其进攻红军，一方面可以推动上层将领来向蒋要求组织联军。

（三）东北军系统在河北的战区 and 天津有不小的力量。在战区的5个保安大队中有2个大队完全是东北军于学忠部编成的，其他3个大队的军官亦是讲武堂系统的。天津的3个公安大队亦是东北军系统的。现在各地同志中与同志会中的有些人便是过去在那边负责的。据他们说，这部分人只要东北军负责人去号召与组织，是可以动作起来的。再加之那边还有万福麟的一军。这一军的饷，确是经过宋哲元发，但人事的变动上，仍是归于小张指

挥 119 师现在又归于黄显声。假使经过东北军的系统，再配合我们北方党的力量，从各种斗争基础上，有可能使他们汇合起来，在华北发动局部的抗战。这里同志正在计划着向张建议。我想这事可和北方商议。采取如何形式进行，望予指示。

完结

布礼

玉台

东北军工作近况及新的布置¹

(1937年3月23日)

中央书记处：

东北军东移快要完了。我和工委刘、宋²同志，因为环境的不允许，得了副主席³的同意，所以没有随去。现在把东北军工作近况及新的布置报告如下：

东北军正在依照原定计划向豫皖前进输送。东移的开始，一部分参加捉蒋（介石）杀王（以哲）的同志会员以及一部分左的群众和个别同志，曾经计议着反对移防，并似将部队拉到红军中来。但这一消息为我们知道后，随即加以说服与制止，把保证东北军的完全东调，做为党的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已经移防的，57军、59军、67军都顺利的东移。由特务团及抗日先锋队改编的110师昨今两天也正在咸阳登车。从整体看，这次东北军离开甘陕，大概是不会再有什么枝节了。

“双二”⁴的“炸弹”所引起的高级带兵军官与少壮派之间的冲突，现在因为事过境迁，已经日益和缓下来了。吴克仁上次到奉化见张时，张对“双二”事件的态度是：“这些暴徒能够捉住正法

¹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东北军被令移防东调。中共中央根据新的情况，决定朱理治撤回陕甘苏区，不再担任中共驻东北军特派员。这是他在结束工作时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报告。

² 刘，即刘澜波；宋，即宋黎。

³ 副主席，即周恩来。

⁴ “双二”，即“双二”事件，也称“二·二”事件，指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少数少壮派军官枪杀王以哲将军的事件。

顶好，如不能，给他们走远一些。但是，为什么又要把许多青年军人捉了起来？望告刘、缪¹把扣下的团长放出。”现在105师扣的康团长已释放，57军扣的团长也有了相当自由，不久即可释放。

今天看来，促使东北军内部的分化与冲突的主要矛盾，倒是几个高级带头军官相互间权利的抢夺。东北军今天陷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为着争夺权利，各个军长谁都不愿意受谁的领导。所以，于学忠近来态度异常消极，对于东北军的编余人事不表示任何态度，现在只要移防完毕见张以后，把一切交于张，听张处置。至于刘、缪二军长倒是各找各的出路，听说刘、缪二人向中央²提出要把57军、59军交给中央军委政治部直接管理，不愿听于学忠的指挥。另说万福麟正拉缪把57军拉到河北去，刘要把59军归商震指挥。据说，现在东北军军师正在南京纷纷设立办事处。从以上看来，东北军内部的分裂现象确是很严重了。

这种情况，给了蒋介石压迫与分化东北军以很大便利。南京虽早已答应了于学忠作豫皖绥靖主任，管辖驻豫皖的东北军，但是命令始终不发表。现在据南京消息，豫皖“绥署”准备不再设立，所有各军将均由军政部直接指挥。消息传来后，于学忠才去电南京力争。南京复电尚未下来，但以现状看来复电不外以下几种：一、允许设立“绥署”，67军、51军归“绥署”指挥，其他如57军、59军则归中央指挥。二、或即以湖南办法，设立四个边区“绥署”，由东北军四个军长兼任主任。三、或即简直不同意设立“绥署”。以上三种可能处置，无论哪一种都是分割东北军的办法。

在这种情势前面，我们看东北军内部的团结运动也已在酝酿

¹刘，即刘多荃；缪，即缪徵流。

²中央，指国民党中央。

并开始活动。其中的主要分子，在文人派则有米春霖、吴家象、洪舫，在军人方面则有何柱国、董英斌、张恒（110师师长）。他们确也感到内部不团结的危险，已开始向各军师长活动。例如，洪舫等见到105师副师长，把东北军干部团结的需要性说了，要他去劝刘多荃，那位副师长异常同情。这种统一运动的酝酿，有可能成为新的有力的运动，把东北军重新巩固起来，但这必须靠着党的正确的策略指导与坚持的斗争才有可能。

根据以上情势及“双十二”事变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决定把东北军内部的统一运动，作为目前的工作中心，巩固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反对分化与分裂，这在目前即是执行我党巩固和平、准备抗战方针最实际的步骤。

对于东北军目前工作，我们是这样布置的：

（一）关于上层的活动

（1）抓住吴、洪、何、董^①等上层人物，帮助与推动他们进行内部的调和与联合。现在经过我们党的同志提议，他们已决定在“绥署”所在地组织各军联合办事处，作为调整与联络内部的关系网。

（2）重新组织东北军民众救亡会，并准备召集全国各东北救亡团体联合会，用群众的力量来巩固内部的团结。这种团体务要做到使各实力派都能参加，把这个组织做为东北军团结的中心，代替过去只是团结左派的同志会。同志会的组织，决定使其在无形中散掉。其中好的分子能入党则吸收进来，不能，则用过去同志会的关系，和他们发生个别关系。

（3）造就东北军中的中心舆论。现在“绥署”已决定出一些小册子，我们已决定在蚌埠出一报纸或刊物，机器及人材已具备，同时，决定要西安过去的东北文化人一齐向蚌埠找职业。

^①吴、洪、何、董，即吴家象、洪舫、何柱国、董英斌。

(4) 建立上层工作委员会，计划与负责总的上层工作，由苗同志负责，51军由S负责，69军由CM等负责。上层工作人员从党内秘密工作完全解放，态度尽量灰色。

(二) 关于党的组织健全

“双二”事件之后，东北军中的党曾经一时混乱，但很快便整理好了。“双二”事件虽然丧失了一些同志，但很快恢复并有些新的发展，现在党员的数量，据大概的估计，约仍有二百三四十人，党内的生活，比在“双二”之前还好些。同志一般都抱着决心来进行东北军工作。估计东北军移到豫皖之后，南京对左派势力必有更大的压迫。为着适应这种情势，所以组织有以下的布置：

(1) 把党的基础更进一步的建立在部队中去。现在东北军党最有基础的是110师，这是由特务团及抗日先锋队所编的。两个团中一个团长是同志，另一团内一营长是同志。两个团内均有党的支部。这个师因过去色彩太浓，将来是否能站住脚尚不可知，所以决定依营来设立支部，以便将来万一改编时，每营能独立工作，并把党的基础播殖到各师去。

(2) 抽调党内首先是学生队内最好的干部，派进各师的支部中去。现在决定抽出五个干部到67军去，67军四个师及军部特务营内均有党支部。57军及59军的各一个师中，亦均有党支部。骑三师基础较好，有一个团的基础和其他两个团关系亦好，现在已经派了两人去，一做上层工作，一做下层工作。

(3) 最成问题的是二百多人的学生队。他们三分之一是大学生，有五分之一是中学生。他们已经取得了东北军的军籍，分配到各部队中当政治员，因“双二”事变撤了回来，现在编为青年训练班，这中间有半数以上是党员，够做区委以上干部的至少有十多个。东移之后，他们恐怕不能站足，南京已经表示要解散他们，现在我们正和洪舫等计划，把他们分发到各师去当军队与民众的联络员，洪等亦同意，只恐怕各军师长阻挠。所以，能实现

与否尚不能定。现在我们决定把他们用各种办法先打入到各师去，有的干部经过党的关系分到各师支部去，有的直接打入到部队中，其余的一部分到豫皖后，如不能站住，则出来做群众工作。

(4) 改进党的活动方式。党员尽量灰色，一切活动务要注意到不使原有基础的部分显露出来，极端严格的注意秘密工作。

(5) 改进党的领导机关。前几天在西安开了一次会，总结过去的工作，并开展了对过去工作的批评，改组了工委，现在决定由项、敖^①二同志负责。党原来决定上层工委会归党工委会领导，但因干部配备上不可能，故决定暂时平行的受中央的直接指导。

现在东北军正在涣散与分化之中，同时部队内抗日情绪，经过“双二”打击之后，处在暂时的消沉状态，要提高部队的抗日情绪，巩固东北军内部，使东北军成为和平的支柱，[仅靠]对日抗战的推动和军队内部的工作是异常不够的。“双十二”事变之前，西安与东北军内部所以造成轰轰烈烈的状态，主要的我想还是得力于群众运动。而当时的“东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部队内部的纪律及层层关系限制着他的发展，而一般民众则比较能自由活动得多。所以要打破目前东北军的分化与消沉，应该更加注意东北民众的工作。不过，东北军移防之后，在豫皖的东北民众，自然是不多的。东北民众十之七八在平津，最近在东北军内部不能立足的一部分左派，又到了平津；在河北的东北军总共有5万左右（其中有53军指挥的5个师，京东与战区的保安队以及北平的宪兵）。所以，现在应该加强河北的东北民众与军队的工作，用东北民众的统一战线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用北方的工作来推动南方。我们已经决定调一批干部到北方去，我已用副

①项，敖即项乃光，敖白凤（高锦明）。

主席的名义写了两封信给河北，对他们的工作作了一些建议。详见稿，不赘述。如中央去信给北方，望加督促。

关于我的工作，自从得到中央电令之后，我即由云阳到西安，亦想随着东北军去，但经各方面考察，觉到环境有很大困难。这原因是我从陕甘来，在孙铭久及应德田家住过，以及在学生队中做过教官，虽是只认识一二百人，但这些人人都知道我是从里面出来的。假使到安徽去，很容易有问题，现在要我掩护也很困难。所以，经恩来同意没有随去。现在那边的领导，决定暂时经过电报及交通关系，目前党的工委可以独立工作，所以中央一时不去人还不至于有多大问题。

鄂豫皖的任务，[红]十五军团交来3个同志，其中最高级的同志是个骑兵团长，我已把他们交给110师同志，叫110师负责同志把他们带到蒙城（110师驻防地），并向郑位三同志要了几封介绍信。他们到了蒙城之后，决定工委设法把他们送进苏区找28军，要28军及当地党派个了解鄂豫皖工作情况的同志出来到工委，再由工委打电报告诉我们，然后决定或是叫同志来此，或者派人去。对于鄂豫皖过去及现在的情形，××了解得很多，我深恐去后建立不好关系，可否在现在鄂豫皖的同志中挑出一人代我？请求加以考虑。

另附“双二”事变中东北军工作的总结，是我个人对于东北军工作的一些意见，请予指正。

附：“双十二”事变中东北军党的活动的教训

由于党中央运用与坚持的和平方针，使得“双十二”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使得中国情势开始了团结御侮的新阶段。在党的总路线之下，东北军中大多数同志拥护中央的方针，并为中央的方针进行了许多的斗争。东工委动员了它所领导下的刊物（如《西

京民报》等)，政府宣传机关（经过宣传委员会中的党同志）以及分派到各师去的几百人的宣传队（内中大部分是党员），积极的宣传党中央对于“双十二”事变之估计，解释“二·五”释蒋的原因及党的和平方针。在“双十二”事变过程中，党的组织迅速壮大了，党由过去几个月前的十几个同志扩大到二百余人。在每个师中都有党的有活动能力的支部。在东北军各个重要机关内，党的许多同志占领了很重要的地位。例如，在政治处几个科长中，党员便占了3个；特务团、军警督察处中的干部，党员至少占一半以上。在“双十二”事变的过程中，党不断克服内部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狭隘的宗派的关门主义，改变了工委会的成份，保证了党的路线的执行。然而，“双十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虽是推动中国和平团结御侮走上了新的阶级，虽是由于中国民族作了莫大的贡献，但是对于东北军本身的巩固与团结，却因为“双二”事件中的极左派的自动而遭受莫大的损失与牺牲，使抗日先锋的东北军走到了分裂的状态，使东北军抗日的准备，大大的遭受摧残。在党的指导下的几个新的政治员，他们是使东北军转变为整个抗日军队的最坚实的武器，因出“双二”事件从各个师团中被调出来。党的最有基础的几个团，因“双二”事件，倒有3个团的基础被摧残了。东北军目前失去了最可贵的抗日推动机的作用，使得西北抗日三位一体的团结[局面]成为不可能。这种悲痛损失与牺牲，是不是完全不可避免呢？不是的。虽然当时有客观上许多复杂情势及其困难，然而，假使当时党在事变后，在中央总路线下，采取灵活的正确的策略，我认为东北军内部的损失与牺牲是有可能避免的，至少是可以减轻的。

造成“双二”事件及其恶劣[结果]的第一原因，便是东北军内部的统一战线没有及时的建立起来。在七八个月之前，东北军内部在抗日与剿共的问题上，发生了左右派的分化。一部分的先进分子主张违反南京的意志，停止内战，并和红军联合实行抗日。

但另一部分则主张继续执行南京政府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继续“剿共”。所以，在这个时期，组织左派的同志会的策略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以后直到“双十二”前后，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中间分子，以及过去的右派分子，都一致拥护张副司令的抗日主张，这只要一看到“双十二”事变中所有的军长（除何柱国之外）都参加了事变，过去可视为“官僚派”、极右派的何柱国、李天才、王回波、吴家象等等都一致的拥护事变与支持东北团体，便可知道。过去造成东北军内部分化的政治根源，一般的说是不存在了。党在过去单独组织与支持左派的策略，已不适用那时政治上的需要了。党在那时，应当迅速地把左派转变为整个东北军的统一领导机关。假使我们再估计到所谓左派同志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弱点（政治上是反对我党争取南京抗日的策略，组织上完全是独裁的、包办的、关门的、小资产阶级的小团体），那便更需要党采取各种方法使它转变为东北军的统一的团体了。张副司令在“双十二”事变前的一个月，即有意把同志会转变过来，使同志会与李天才、王回波等各派共同造成东北军的统一的团体。当时我主张党立刻的领导这一转变，可惜东工委内个别领导同志不同意这种主张，不积极的领导这一转变。结果，这个统一的组织未能形成。虽是“双十二”之后，党在中央指示之后，曾为统一左派同志会及高级带兵官进行了一些努力，但因为没有一个整个的计划，没有一致的动员，结果仍然不能消灭其内在之矛盾，没有及时的把左派的组织转变为东北军统一的组织。这是这次一切损失的祸根。

第二个教训，便是我们对于左派的错误的观念与行动没有采取公开的批判与斗争。左派领袖中有应德田、孙革新^①辈，反对和平方针，坚决主张内战，站在小团体的个人的利益上，阻碍

^①孙革新，即孙铭九。

东北军内部的统一，在群众面前反对甚至于辱骂我们党的主张。对于他们这种罪恶的行为，虽是代表团同志进行了许多说服与斗争，但是这种批判与斗争仅是限于上层。东北军中的党以及整个西安应当公开的批评他们，争取他们影响下的群众，用群众的力量使他们改正错误，并防止他们的盲动政策。那时，我们党并没有这样做。结果，使得党的政治面目和极左派的政治面目，多少的混淆起来，使得极左派在反革命托洛斯基派的欺骗之下，依然能够影响一部分群众，和党的政策背道而驰，使我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第三个教训，便是党的宣传不能适应当时变化的情势。虽说绝大多数的刊物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影响之下，但是许多报纸的言论每每不能依照党的方针。例如，《西京民报》在它的评论上始终没有把亲日派与南京政府分别开来。我们的宣传没有能够依照时局的变化来及时改新的内容新的口号，特别表现在接受甲案，决定退兵并退出西安之后，党在宣传上根本没有新的解释，只是一再重复原则的解释，这是显然不够的。因为那时一般群众都迫切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作这种重大的让步？同时，时局极端迅速的变化，东北军部队驻防区域又是异常分散，在每一个变化之前，每个群众与党员都迫切需要了解党的主张。但是，我们党并没有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关报纸有他们迅速灵便的发行网，使得党在每一个新的变化之前，把党的主张传达下去。所以，往往使得党员与群众处在新的变化前，莫明奇妙，无所适从。

第四个教训，东北军在组织上的弱点给予了党在事变中领导作用以很大的困难。党的组织，一方面在带兵官中的基础太弱，因此不容易完全的把握事变；另一方面，由于党员干部的成分差，因此表现出许多散慢性与无纪律性。个别的领导同志政治上对党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一方面同意党的路线与指示，另一方面却参加左派违反党的意志的行动。在党内的生活上，不能站在

民族的与党的利益上，却每每有意无意的站在他所接近的某一派、某一小集团的利益上来决定党的策略。结果，必然的要做这种小集团的尾巴。

最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以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配合上也不适当。东工委工作上下层没有严格的划分开来，因此影响到党的组织的秘密，同时也影响上下层工作的动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上下层没有配合，上层许多情形，下层根本不了解，因此影响到东工委对于全盘情况的了解，使工委在决定它的策略上（例如对同志会）及其他宣传纲领上感到许多困难。

总之，东北军中的党，虽是一般的在执行党的路线，反对关门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些收获，但是执行得异常不够，并且表现出许多弱点与错误。这是由于工委个别领导同志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异常不够，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固执宗派的成见，不能广泛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得东北军内部统一战线不能迅速的建立起来；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左派以及其他的小集团的违反统一战线的行为与思想，没有能用足够的努力去纠正与批评，多少带一些温情主义。这是东北军在“双十二”事变活动中的主要教训。

河南、安徽党的工作现状及恢复 组织的初步安排

(1937年8月17日)

关于河南省委领导下的工作，现在分别报告如下：

关于河南工委的工作，他们最近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不是主要负责人写的，所以很简单。他们说不久有详细报告可到，但还没有到。不过，从他们派来的许多学生的谈话中，对于那边的工作，可以作到一些较深的了解。总起来说，河南工作在执行中央所给予的任务即巩固创立党的组织[中]，已有相当成绩。在这一基础上，已可看到他们在建立统一战线上的一些成就。

首先看豫西洛阳一带的统一战线工作。

现在，洛阳的抗敌后援会已经组织起来。领导机关共分4部，我们占一半的领导。后援会把商会、航空学校、军分校、公安局及各学校，都组织在内，同时已开始共同行动，如捉汉奸等。在这个工作中，有以下几个经验：

(一) 我们能够首先把几个基本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成起

①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期间决定重建河南省委（起初称豫皖苏省委），指定朱理治为书记。7月，朱理治在陕西三原云阳镇调集部分河南和安徽党的干部，了解情况，进行培训，然后于8月下旬前往河南，这是他在临行前写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洛阳的工作，主要是依靠××中学在暑假前把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领导起来，暑假中把暑期训练班领导起来，并且把各届毕业的学生都组织起来，成立有生活有内容的学生会。依靠了这3个主要的团体参加了抗敌后[援]会，因此才能得到一半的领导地位。

(二) 注意到行动的统一。我们党领导了200多人的训练班，进行募捐，把所有的捐款送到后援会的筹备处。县长与党部都非常奖励这些学生，并要求这些学生多多参加救国工作。

(三) 能利用法西斯和CC的冲突，扩大民主的范围。老法^①因要破坏我党在××学校的领导，于是制造了伪造的信件与图章。那里同志立即向洛阳所有党政机关备案，结果利用CC和老法的冲突，把制造伪信件的老法逮捕起来了。

这是那里执行中央新策略下所创造的一些经验。除此之外，在偃师一个区里亦组织了一个抗敌后援会的筹备会，包括了4个联保主任和得到一个区长的允许。其他各地最近在抗敌后援会内工作的发展状况尚不知道。目前统一战线的执行上尚有一些关门主义的障碍，例如学校的学生会不允许老法参加等等，我准备从新的一批学生中收集更多的材料，来系统的研究一些教训。

二

目前，河南党的组织在对代表大会的传达上是相当的注意。从苏区回去之赵振声同志由洛阳而豫东而豫北各地都走了一遍，洛阳工委并在暑假中办了10个人的训练班，训练的两个主要教材，一个是洛甫此次会议上的白区策略报告，一个是“十二月”决

^①老法，指国民党中的法西斯组织，即“复兴社”。

议^①，因为只有这两个文件。现在我已将所有文件一并派人送去。我在此地办了两次训练班，第一批7个人，已分回去；第二批是刚来的，约有6人，准备亦训练2星期。这样，至少能使得一般同志对新路线有个初步的了解。

组织方面，洛阳工委从学生的口中反映似乎还健全，其他地方组织尚要加强与整理。

（一）豫北的工作。目前情势下，豫北工作当然特别重要。上次和我一起从延安同行之纪民同志是孟县原县委的，从和他的谈话中，证明从前纪平报告之豫北特委是存在的，所以派了纪民同志回去，一面做孟县的工作，一面设法找特委的关系。现在已将孟同志关系交于工委，工委现有9个豫北同志，大部皆教员，将来如找到豫北特委，把所有组织恢复与考察后，那边工作可以有一个较好的基础。

（二）开封的工作。6月里“民先”受破坏。在暑假中，河南教育厅办了一个暑假讲习会，我们有同志参加，在这中间发现了一些左的中学教员，约有五六人，如果加紧对这些教员领导，再配合暑假的学生工作，在开封开创当地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有好条件的。现在所困难的，是缺少一个比较能做这些中学教员工作的同志，他们很急的向此地要，所以请求中央组织部可能时找一个这样的人材，他们可以介绍他去做中学教员，这是对于开封的工作有很大帮助的。

（三）郑州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所以他们一再的来信要楚明同志回去。楚明同志上次交了一些关系给振声，经过这些关系，我要河南工委去考察楚明这个人。现在河南几次来信要他回去，大概振声同志已证明他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了。河

^①十二月决议，指193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南要他，大概是做郑州工作，因为他从前的报告说在郑州有组织，未知可否令彼提早回河南？

除此之外，河南来信还要“红大”¹之王国权同志。此人状况如何？可否允其回去？

三

安徽工作。那边因敌人的进攻及我们过去策略上的错误，现在只有 12 个同志。这些同志多半不能立足，详情见他们的报告。现在他们来了 6 个干部，和他们主要负责人共同讨论的结果：

（一）如果 28 军能够公开，他们可在其掩护下进行恢复皖西北的工作。

（二）派我上次从党校调出的老李同志回去，找到寿县可靠的 4 个从狱中出来的曾“自首”的同志。此 4 人，老李及安徽来的负责人均保证他们。先给其中 2 个同志以训练，令其在自首分子中进行恢复党的工作。

（三）从各方面调查安徽的关系，以便在各地恢复与创立党。准备在短期训练后，派一个人去巢县，那边还有两个教员群众，依此为基础，来开展教员工作，作为一个支持点，同时来领导一个比较好的“自首”过的农民支部。

（四）除掉留在浙江的已经打入生产之 2 个同志外，其余的干部，一部分送党校，一部送“红校”，余留 2 人在此受短期训练，训练后将即派一人去安徽，一人留河南省委工作。

关于那边的情形，除将报告转上外，并有特委书记湛云露²

¹红大，即红军大学。

²湛云露，即曹云露。

同志到中央受训，故不另赘。那边情形很有些特殊，想不到另外的办法来布置，所以望你们给予指示，并请组织部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抗大”^①中有无可回安徽开辟工作的？有无安徽的关系？如有请交下。

2、上海《生活教育》新有1个名叫孙铭勋的，曾介绍2个巢县小学校长给皖西北特委，其中1个学校是巢县的园山小学。孙铭勋是1个同志介绍的，此同志已被捕，无从调查孙之为人，但知孙曾在“双十二”前后在延安师范一中教书，所以请求你们就近调查孙铭勋的政治态度，以便安徽去找他所介绍的2个学校。

3、前“抗大”13队之秦忠一、刘宠光二人，曾交出巢县园山小学一个同志关系。如此关系找到，当然很有帮助，但不知秦、刘二人政治关系究系如何？如有派别嫌疑，则根本不去找了；如没有，则设法调查与找此关系。

四

东北军工作，自从小项^②上次由延安回到北平之后，直到现在没有消息。现在各军的关系，只有暂时由我直接派人去领导与建立。骑兵军工作有相当开展，在第3师的2个团中各发展了1个连长，在骑兵师中有了上层关系。现6师已去大同，3师亦准备去大同。如此两个师均去大同后，拟将关系交给北方局，并和总政治部发生关系。在江苏、安徽、河南之4个军，亦均已向北移动，目的地尚未明，大概系沿东海布防。现在由我处已派2人先去67军与53军传达中央目前指示与[他们]建立关系。此2

^①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

^②小项，即项乃光。

人，一是从东北青年救国会要来之徐克仁同志；一是由骑兵军调出之金同志，此人原来是骑兵军的东工委特派员。

五

在此末了的任务主要的是东北军[工作]的整理，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扩大的工作，移到河南后不易整理的。其次是河南又送来的几个受训的学生，又是利用暑假时期，至多只能受半个月的短训，所以在此独自替他们办一个训练班，大概还要 10 天就结束。

省委机关原拟设在开封，后因开封“民先”[被]破坏，振声在开封被敌人注意，是否在开封建立尚有问题，已去信[同]振声讨论此事，日内可得回复。豫南与苏、鲁二地尚未有人来，在数日内可以等他们一下，如不来，亦不[再]等，将来将此关系转到河南去。

关于干部考察及秘密工作：洛甫同志来电之提醒与批评甚为重要，以后自当更加警惕。在延安时，因为恢复寿县工作无办法，所以三四次和刘宠光与秦忠一谈话，要他们做了几个报告和计划书，企图要他们回安徽将狱中出来的一批同志恢复起关系，然后经过党的考察，确系清楚无问题时，再恢复他们 2 人的党籍。我的原来计划是如此！但是，在考察此 2 人时，没有多方面去考察，特别是给了他们秘密的文件，没有收回，这是我的很大的错误！

关于发展与恢复党组织的几个问题^①

(1937年11月25日)

自从省委发出《关于发展组织的决定》之后，许多地方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表现在：

(一) 忽视工农的发展。在许多地方，党往往只注意到向知识分子、学生发展，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却忽略了向工农方面的发展，[不]知道我们党的基础应建立在工农成份之上。

(二) 忽视党的发展。往往有一些地方党（如××），建立了很大的群众基础，创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是却完全不注意发展党，这样就不能保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也就不能保障统一战线的巩固、继续与扩大。

(三) 在一些过去保留下来的地方党部（如××、××××）又发生另一种倾向，即对知识分子[采取]敌视与排斥的态度，因而同样妨害很多工作，这也是不正确的。须知，我党的基础虽是建立在工农身上，主要的要向工农发展，但是，对于忠实于民族的与无产阶级事业的知识分子，也应当吸收他们进来。

(四) 有许多支部，没有把CC与老法的反动领袖和他们统

^①1937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建立，并作出了《关于发展组织的决定》。这是朱理治为贯彻这一决定而为省委起草的一个报告。原标题为《关于发展与恢复党组织问题的报告》。

治下、欺骗下、影响下的群众分别开来，没有看到 CC 与老法下层群众革命化的过程。因此，对于这些群众非但不去积极的争取他们到革命的队伍中来，相反的却不去理睬他们，让他们继续受反动领袖们的欺骗。

这些关门主义的倾向，应当迅速的予以克服，使我们党成为群众的强大的党，来担负起目前紧迫的任务。

二

我们一方面要克服关门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要严厉的纠正组织上的自由主义，特别是不负责任的介绍同志，不负责任的恢复组织，不负责任的转移关系，不负责任的提拔干部。

这种腐朽的自由主义在许多地方与工作部门都表现出来，特别严重的表现在××同志领导下的××市的青年部。他提拔了两个干部到青年部工作，并提议吸收他们参加市委，借口秘密工作，不允许市委派人去考察。这两个干部，经我们检察的结果，其中的一个同志根本不是党员，而另一个组织来历亦不清楚。

有一些党部，甚至于省委个别同志，对于转移关系采取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支委不加考察的交给市委，市委不加考察的交给省委，省委不加考察的交给中央，并且在转移关系时，闭着眼睛瞎说什么“忠实同志”，其实他根本就没考察过这种关系。这种腐朽的自由主义，客观上完全是替反革命的托派、汉奸及一切派别大开方便之门，使其混入党内来。

目前，反革命的托派、汉奸及 CC 与老法，正在积极的企图混入到党内来，破坏与腐蚀我们的党。只要有一点空隙可乘，他们便会钻进来，每个党员要提高阶级警觉心，特别要严格的注意到以下几件工作：

(一) 提高责任[心]。任何同志与党部，对于其所介绍的同

志与干部，应当在政治上完全负责，这即是说，他应当经过深刻的考察之后再作负责的介绍。

(二) 有一些关系并未在自己组织系统下做过相当时期工作，或根本只是一种路遇的性质，并没有工作表现。此种同志，当其转移至别处时，一般的不做负责介绍，至多只能通知别处地方党部，告诉有这样一个人，请他们加以考察。

(三) 除掉上级机关负责介绍来的干部与同志之外，任何从别处介绍的干部与同志都必须加以深刻考察，了解其过去历史、来历，然后再[分]配适当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来考察。

(四) 加强各级组织部的工作。认识干部，了解干部，这是组织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一种经常工作，整个组织[都]应当负责。特别是组织部，尤其要负专门责任，对于组织系统下的所有干部，应当深刻了解其政治面目，特别是对于转移关系的同志，尤其要经常的注意与考察。

三

目前，河南 CC 与老法中的下层党员发生了很明显的分化，其中有一部分群众，正在积极的寻找革命的正确出路，向他们发展党的组织，这自然是需要的，但是必须遵守以下的原则：

(一) 对于被迫或被骗加入 CC 与老法的群众（过去并未加入党的），在 CC 与老法中并未负责，且未做过反动工作，和 CC 与老法虽未断绝关系，但对老法与 CC 的反动主张，采取怠工与拒绝[态度]；而且在革命的主张与领导下为党工作，已有具体的表现的，此种分子得收进入党。

(二) 在 CC 与老法曾经担负过一部分工作与领导，但目前已有转变，[且]要求入党的，对于此种分子，一般的要求他们仍在 CC 与老法中做左派工作，党只要和他们发生个别群众关系，

不必要急急介绍[他们]入党。但此种分子，如能无条件的同意并执行党的主张，无条件的将 CC 与老法中的秘密向党报告，并绝对自觉保守秘密，在经长期考察，得到省委与中央正式批准之后，得允许其参加组织，假如不能符合以上条件，不得加入我党。

四

对于 CC 与老法内部工作，一般的是在党外推动其内部的左派团结起来，反对其内部的右派。我们一般的不要使党员进入 CC 与老法内部进行工作。

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即在 CC 与老法把持下的团体与武装之内，假使不加入 CC 与老法，则不能站脚，为着要做这一部分的党的工作，党有必要允许其中已有的同志或派个别同志加入 CC 与老法。但是，所派遣的党员，必须是党的忠实可靠的同志，一般的新加入的未经训练过的同志，不许派遣。凡加入 CC 与老法中去，事先必须要得到党的正式的允许。假使事先不得党的许可，事后又不立即向党报告，此种分子应立即开除出党。

凡是党的群众领袖，在任何的条件之下，绝对不许加入 CC 与老法。

五

对于尚不够当共产党员资格的群众，绝对不允许加入我党。如（一）过去曾被迫自首，虽未有积极反党活动，但已在报上发表自首，污蔑过党的分子；（二）过去自动脱离了党，今天又无积极工作表现的；（三）曾经加入别的派别，又不向党忠实报告的。此种分子，一概不准加入本党。如在起初未曾发现，直至其

加入后始发现时，应须立即开除出党，并正式通知他，清楚告诉他不能入党的理由，勉励他在党外努力工作，将来在工作有充分表现之后，再允[其]加入我党。此种分子绝对不得用党的名义在外活动，党亦不得给他以“特别党员”的名义。

我们必须保证我党组织的纯洁性，提高共产党员称号的严肃性。我们应当经常的吸收民族的与阶级的优秀分子加入我党，随时排除那些动摇的投机的分子混进我党的企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豫皖苏的党，铁一样的团结，在目前紧张的环境之下，保证党的路线顺利的执行。

回乡工作之基本任务¹

(1937年11月28日)

以往四个月抗战的教训，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单凭政府与军队的抗战，决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要战胜日寇，必须把全国民众，首先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动员起来，参加抗战。现在政府有鉴于此，已经决定征训河南的学生回乡服务。学生们亦同时组织了乡村工作服务团等等组织，准备牺牲一切，置身于组织民众的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切实地做下去，把整个河南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那么，我们便至少可以在河南创造出一座铁的长城，阻止日寇的前进，进而收复河北失地。现在时局虽是极端迫促，只要迅速地干，时间还不太迟。

然而，农村工作是一种艰难而复杂的工作。目前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什么？组织农民的困难与阻碍何在？究竟农民怎样组织？如何武装？对于农村中现有的保甲、民团如何运用？对于民间土匪、会党如何处理？这许许多多问题，每个农村工作服务者，都需要有明确的认识，只有正确的方针和灵活的方法，才能使回乡工作的同学收到应有的收获。现将这些问题分作几个题目逐条加以讨论，首先讨论回乡工作的基本任务，其他各问题，容以后再分别写出。

我们回乡应当做些什么呢？这是每个回乡服务的同学们首先

¹这是朱理治为中共河南省委撰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省委机关刊物《风雨》周刊第12期上。

要发问的。的确，这个问题不能获得正确的解答，那么回乡工作便没有方针，没有标准。

有些人说，回乡工作的任务，是唤醒民众，有些人说，是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这种说法自然失之笼统。但有人又开了一大堆的任务，从训练保甲起，一直到兴办水利为止，足足开了二三十项，叫仅仅只受了几天训练的学生出发去实施，自然会使得许多同学感到头绪纷乱，无从下手。这结果，往往是什么都注意到，但是什么都没有做好。

那么，回乡工作，究竟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应该做以下五种工作。这五种工作是互相关联，缺一不可的。

（一）对日作战的宣传鼓动工作。抗战发动已经是四个多月了，但是我敢说全国大多数民众尚蒙在鼓里。究竟为什么要和日本打仗？我们能否操必胜之券？抗战对我们老百姓有何好处？在抗战中老百姓应当做些什么？……这一切问题，大多数的民众是不晓得的，但是却从他[们]的生活上，感到了抗战的苦恼。日本飞机炸毁了他们的房财，成千万的民众被迫逃难，物价一天天的上涨，生路一天天的艰难，为什么受这种苦难？他们并不能正确的获得解答。于是他们或是把这种苦难的原因，归之于政府抗战的不当；或是把这种苦难归之于命运，总希望有真命天子出现之后，他们能过太平日子。民众抱着这种怨恨的颓丧的宿命的情绪与观念，要他们真的起来拥护抗日战争，牺牲一切贡献给前线，那可说是梦想了。民众不能自动拥护抗战，结果只有强迫。但越是强迫，民众的反感便越大，日寇与汉奸自然是很会利用这种情绪，结果每每造成一些叛变的事实。

这种现象，是否是说民众不愿爱国呢？完全不是的！这是说明了我们对于民众没有做必要的宣传、解释、鼓动工作。其实，谁愿做亡国奴？谁不爱自己的国家？只要我们把道理说通，民众是没有不站起来拥护抗战的。而这种道理是很容易说通的。因为我们

抗战是为着民族命运，是为着每个老百姓，是为着正义与和平。只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老百姓，决没有不自动的起来救国的。只有民众自动的自愿的起来救国，我们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才会顺利的进行。

所以，农村工作第一个任务便是做战争的宣传鼓动工作。这个工作做不好，其他一切工作都不会做好。假使同学们下乡之后，依然和过去一样的采用强迫与命令的方法，今天向民众要这个，明天又向民众要那个，农民必然把我们看作[和]城里来的摧款老爷一样，对我们只有抱着畏而远之的态度。

关于宣传鼓动怎样做，我们以后专门辟一章来讨论。现在我们只说在农村的战争动员工作，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个目标：

第一，要使得每个乡村中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我国为何抗战？抗战对老百姓有何好处？民众应如何来帮助抗战？

第二，保证农民抗战意志的统一。要使得每个民众头脑里的一切悲观的、失望的、怨恨的、宿命的情绪，逐渐转变过来，积极的、勇敢的、自动的起来为抗战胜利奋斗到底。

第三，要和汉奸的“理论”造谣做斗争，消灭这些毒[瘤]在民众中的影响。

（二）组织民众团体

下乡工作第二个任务，是组织民众。说到组织民众，有些人说民众早就组织起来了，无论那个地方保甲都组织起来，[这]就是民众组织。但是抗战起来之后，保甲为什么不能[发生]作用呢？要了解其中原因，我们首先要知道，过去保甲是在“安内时期”组织起来的，保甲组织的动机、目的是为着安内。我们只要看一看每个村头张贴的保甲公约，在它只 10 条或 19 条的公约中，究竟那一条是为着攘外的？完全没有的。所以这种组织自然在抗战时期不能适用。这是一。第二，正因为保甲的原来目的是为着安内的，所以，这些组织差不多都为当地的封建势力所把

持。这些封建势力为着顾到他们的财产、田地，非但不会发动民众，反而处处防止民众抗日运动。敌人接近之后，他们往往首先领导逃跑或是投敌。

所以，现在我们下乡组织民众，还是需要从新做起。我们对于这种保甲制度，要加以彻底改造。

我认为农村中的组织，最好依第二战区的方法，按村乡为单位，组织村乡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或是把抗敌后援会的组织深入到农村中去，使每个乡村都组织其分会。乡的战地委员会或抗敌后援会的组成，应当包括当地的保甲长的代表、乡村学校的代表与民众的代表。为着要使得这些组织不再重复成为官僚的脱离民众的机关，这些组织应当有半数的民众代表参加进去。但是单有这些乡村中的上层组织还是不够，民众组织的最基本力量还是依照职业、年龄的民众团体的组织。首先是农民本身的组织，即农民协会的组织。这是最基本的组织。假使回乡同学能够把这一[协会]组织起来；那这一乡村的救亡工作，便有了群众的力量去推动了。其次便是应当将农村中的妇女、儿童、青年统统组织起来，妇女们组织起妇女抗敌慰劳代表会，儿童们组织起儿童抗日团，青年们组织起抗日青年先锋队等等。总之，男女老少都要统统组织起来。

对于原来的保甲组织，应当在民主的选举的原则下加以改造，使它真正成为代表农村全体民众利益的机关。

有了这种组织，那农民的伟大力量便能够发挥出来了。

(三) 组织农民自卫队

乡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如民团、壮丁训练队，和过去的乡村中的保甲一样，不加改造，决不能成为抗战的力量。至于现在的征兵制度在乡村实行中造成的恶劣现象，只要和乡村稍微接近的人都可看到。现在有些地方正在招募土匪与失业军人，准备依靠他们组织游击队，这种办法，决不能造成坚强的游击队伍。而

且，假使我们训练与组织不得其法，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农民武装的形式，主要的应当采用农民自卫队的方法。这种组织，主要的要由农民自愿。事实上，谁不要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只要我们能够在农民中把利害说清，农民没有不自愿组织起来的。这种武装开始组成时，可以给他们做一些后方的工作，或在前线帮助军队作战。经过这些实际训练之后，这些自卫队便可转变为游击队了。同时，对于原有的民团，应当使他们转变为抗日的武装，加紧其抗日教育。所有乡村的民团或人民自卫队，都应当由队员自己选举其队长。对于征兵制度的实行，主要的要采取宣传鼓动的方法，使每个被征农民以抗日军为光荣，而自愿的去参加。

（四）动员民众帮助国军抗战

假使我们将以上三种工作做好，那么，我们便很容易的动员民众帮助军队作战了。过去因为我们没有做以上三种基本工作，农民自然对于前方抗战的国军不能给以任何帮助。回乡工作同学的第四个任务，便是动员农民一切组织与武装做以下这些工作：

第一，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帮助国军运输军火及粮食，并负责转送伤兵。这些担架队、运输队，如不另外组织可即动员人民自卫队来执行；如要组织，可依当时需要，动员农民协会负责组织之。

第二，组织向导谍报队，逮捕敌探，封锁消息。在军事行动地区，可动员农民自卫队、儿童抗日团等之组织，检查行人，逮捕敌探，并由农民协会与动员委员会选派农民作向导与谍报工作。

第三，实行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军事要道。在敌人占领地区，不仅动员一切妇女老少都退出，而且要把所有一切粮食、水桶等应用物件一起藏起，使敌人来后，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找不到一个向导。同时，再动员人民自卫队到敌人后方进行各种破

坏工作。

第四，实行慰劳，鼓动前方战士，帮助国军做工事，做茶饭。

（五）解决农民的困难

连年不断的灾荒加深了农村的破产，现在农村中没饭吃的民众，平均至少有一半以上。抗战发生后，农民负担更加重了。假使对农民的困难苦痛，不能替他们减轻与解决，只知道要农民做这做那，农民自然不能积极起来。而以上所举的四种工作，便也都无法进行。许多农民对下乡工作的同学，每每发出这样的问题：先生，你的一切话都对，但是我们今天没有饭吃如何办呢？要假使我们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一切工作便都不能前进一步。

显然的，我们应当替他们解答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法：

第一，真正的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免除一切摊派，剔除中饱。对于一切物资供应，尽可能加到有钱的[人]身上。贫苦农民，因参加抗战工作，伙食各费应由公家酌给津贴。

第二，优待抗战军人家属。监督政府颁布的优待抗战军人家属的办法是否切实的实行。对于抗战家属应当组织起来，经常的询问他们疾苦，同时，教育他们来推动乡村工作的进行。

第三，对灾难民，请求政府给予救济，或免除其田赋，或减轻其田租。

第四，推动当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设法请政府借种子给贫困难民，必要时应赊售农具、种子给难民，发动贫困难民实行垦荒等等。

以上所列举的五种工作，是回乡工作最基本的任务。假使回乡同学真能做到了，那河南三千万民众力量，将会发挥出无比的威力，河南将会成为我们理想的战场，日寇来了必然要被埋葬在这里。

以上这些工作是否可做到呢？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否会遇到困难呢？困难会有的，而且是很多的。譬如回乡之后，当地封建势力从中阻挠，或是个别的地方当局不能合作，这有时往往使得你无法工作。特别是我们回乡人数表面看来好象很多，实际分发下去，却是异常不够，每保至多只有十几人，但工作却是这样多。在短促时期中，究竟从何处开始工作呢？……

这些困难是我们所预料到的。我们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每个下乡工作同学所要预先了解的，我在下文再和各位详加讨论吧。

救亡与党的组织工作近况

(1937年12月17日)

现将最近情势报告如下：

一、豫西各县

(一) 洛阳抗敌会与学联，是我们与 CC、老法共同的组织，党在里面能够起领导作用，已如前述。豫西工作已开始转到农民方面去。每个区已有“抗救”分会，其中第四区，党完全能把握，并已组织了 30 个村的工作团（即村的总动员委员会性质），现在正准备利用机会，将学联的学生组织成回乡工作团，分发各县工作。(二) 偃师中学学生完全可把握，现由国民党分配做 3 个区的救亡工作，国民党县党部现决定组织农会，已聘定我们 4 个同志[担负]组织农会的任务。现党已组织了 4 个农民支部。(三) 洛宁亦把握住一中学，并将全县抗敌后援会抓住，其他如伊川等地救亡工作亦有发展。现在 15 军正在偃师组织军事训练班，招收 800 个学生，并在后方有 2000 支枪，训练班之上下层均可完全把握。

二、豫东各县

在开封，原有“民先”组织，极端□□□与散漫，□领导人从北平来，高[傲]之至，不接受党领导，开展斗争之后，业已克服。决定将“民先”解散，成立公开合法之农村工作服务团。现在会员约有 500 多人，最近正做寒假回乡工作，已组织了 11 个回

①这是朱理治用化名“岗”（即焯岗、黄岗、王岗）写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标题为编者所加。

乡工作团回到各县工作，并有 3 个剧团。现准备将此组织普遍全省，并深入到每个农村，成为全省真正热心救亡工作的青年团体。周围军队建立了一个党支。铁路上亦已发展了党。杞县的抗援会，党已能把握。郑州妇女救国会有 200 多会员。

三、苏鲁边界

因与临沂专员建立了统一战线，现他将指导员名义给了我们 3 个同志，令组织峰城、枣庄、□□城三县民众。现在党的下层活动，已开始组织联庄会。

豫南人民抗日军已扩大到 500 人，只联庄会即 3000 武装。现征调各地学生办一训练班，将来□□即以此为豫西游击战争的骨干。

党组织数量现在约有 1000 人，计豫西 290 人，豫东 100 人，豫中 20 人，豫南 100 人，苏鲁边 500 人。关于严密巩固与发展党，省委写了一个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已送上），现正在依此执行，请予审查。省委初来此时，曾因组织部没有经验，根据市委负责人的请求，写了一些糊涂的介绍信给中央。其中被介绍的同志及群众多半是平津流亡失去关系的同志，并未在省委工作系统下做过工作，只是经过个别同志的介绍，便来者不拒的写介绍信。并且只要是同志都写了一些“忠实同志”等等。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一面纠正，一面叫组织部将关系加以整理，并通知中央。省委系统下的组织，原系各方面个别关系凑合起来。在这 4 个月工作中，一面加以考查，一面加以洗刷，现在又写出正式文件，将各种组织问题加以详细的规定，以保证组织上绝对纯洁性。

对于中央几项请求。希望中央根据新形势，给予我们工作以支持：（一）原则指示。（二）立即给我们一个电台，我们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安置，如中央有，我处即来人取，如没有，给我们款子到武汉去买。（三）[前]信向中央调安徽之张如莘同志速来

此，以便速将皖西北之工委建立起来。现在人既不来，信又不发，未知何故。（四）此地对于情报完全得不到，故对工作领导颇感不便。望中央设法，如何克服我们这一困难。（五）有王恩九、梁化之二人，均系联络局派来此地做上层工作的，并要和我们建立关系。此二人究竟是否联络局派来的？望告联络局速来信证明。（六）军事教官为何尚未来？现在一个训练班已开办，不久即将结束了，另二个训练班亦已筹备就绪，望急速来5人，另外来至少10个游击干部，供给此地人民抗日军及各地的武装组织。（七）望将12月下半月及1月份的经费交下。（八）如交通断绝，我处领导关系如何与中央建立，均望速告。

当前河南的政治形势^①

(1938年1月3日)

(一) 河南目前处在国防的最前线。在黄河以北，敌人早已将新河以北几县夺去了，现在正准备南渡黄河，来夺取陇海沿线。在河南之东，敌人正积极集结在津浦沿线。在河南南部，敌人取得合肥之后，将要沿着合肥到信阳的大道进攻，以便威胁武汉。河南正处在日寇三面包围与威胁之下。

(二) 保卫河南，在目前全国局势下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如果保有河南，一面可以拱卫武汉，一面可以支持华北的抗战。但是河南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保卫河南的准备，而且也没有这个信心！有人最近向刘峙问过，在目前危局下如何保卫河南？他的答复很坦率：“连蒋委员长都没有办法，还要退到四川去，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的确，他所信赖的是武装军队，但在平汉线上十多万大军，在他统率之下一泻千里的溃退下来。如今河南已没有多少主干部队了，自然更不能依靠。虽然他在失败后回来，为着要把这次失败归究于河南北民众没有组织，也曾经开过座谈会，大谈民众运动的必要，但这只是掩饰其败北的口实而已，实际上他仍是处处统制与阻碍，而且比之国民党其它各省都要厉害。不久之前，河南奉组织动员委员会的命令，党政要人举行会议，刘峙和省政府代理主席李培基都不主张开放民众运动，李培基更表示得坚决，认为谁主张开放民众运动便是“土豪劣绅”！他们最近

^①1938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中央决定归新成立的长江局领导。这是朱理治写给长江局报告的第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公布的总动员委员会纲领，不只是比之山西的总动员委员会纲领要差得多，甚至于比之过去抗敌后援会的纲领也要坏得多。

(三) 在刘峙与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河南内部，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

第一，由于今年严重的灾荒，三分之二以上的灾区民众，大多数都没有饭吃。单就我们所知道的杞县与西华二地，民众90%就没有饭吃。但是国民党非但没有救济，而且田赋捐税还是照常的派，并且因为抗战的关系，国民党需索的自然更多，而豪绅地主又要从中克扣中饱，因而民众的负担自然更重。最近4个月农民所出的捐税比之过去一年还要多，这些捐税至少要有半数以上落到保甲长手里，农民生活无法解决，引起了土匪蜂起。河南一向是多土匪的，但近来更有很大的增加与普遍。加之国民党捉绑壮丁，更引起民众的怨恨，不久[前]甚至于在豫南发生了保甲长领导农民暴动，反对抽壮丁，包围南阳县城的严重事件。

第二，汉奸的活动。日本在河南与苏鲁边收买汉奸已有很久的的工作，他们最主要的方式是组织各种会党与教门。这些会党与教门大多是当地豪绅地主所领导，例如沛县一县，十分之七的地主豪绅都是参加道门的。日本利用这些汉奸道门，做各种欺骗武断宣传，深入到民众中去，如“有前清必有后清”，“日本来了每人可以分一垧七亩田地”。他们并利用国民党统治的弱点，来煽动民众的暴动。如一月前山东费县的暴动，便是在“向县政府要枪武装民众”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近来开封城市汉奸亦很活动，听说开封城内富商已暗中将维持会组织起来了。除了这些汉奸之外，另有张××托派的活动，他们在豫北提出工会管工厂、农会管农民的口号，用“左”的口号来破坏统一战线。

第三，各种溃散军队的自由行动。现在溃散来河南不服从指挥的有檀自新、冯钦哉、沈克等部。29路军大部分已过河南，韩复榘亦有一部分来此。将来从豫北也许还要遣散一部分来。这

些溃败军队没有能统率的中心。现在商震在前方做总指挥，但是连他[对]所指挥各军的驻防地区都不能知道，电报打去亦不复，只是发饷时每军才来。现在已是这样散漫，到将来各军一起渡过黄河南岸，河南的局面将更要混乱。

第四，统治阶级内部的摩擦与倾轧。河南 CC 与老法及商震三派势力，一向是互相冲突着，抗战以来，他们这些冲突除了冲突的方式有些改变之外（过去 CC 与老法之间互相逮捕，老法可以用 CP 的帽子逮捕 CC 党员，反之 CC 亦以 CP 名义逮捕老法，现在这种现象是没有了），非但没有减轻，而且是增加着。为着扩展自己的势力，开始 CC 在开封组织了抗敌后援会，但随后商震联合老法否定了这个组织，另外成立了一个。不久，河南本地的老法成立了一个总动员委员会，但隔了两天，刘峙外来派又成立了一个总动员委员会，否定了前面的总动员委员会。各派都准备建立自己武装势力，CC 与老法，本地派与外来派，现在都在拼命的争夺组织游击队的权力，互不相让的争执着。除了这些派别互相争执之外，还有割据豫南的别廷芳的势力。在他统治下的内乡、镇平等县，可说完全象一个独立国家一样，国民党权力与法令完全不能达到。现在因豫北吃紧，河南各机关都向豫南移动，将来河南统治势力的角逐场中更要复杂。统治阶级内部这些冲突，在我党有活动力量的地方，如洛阳曾使用灵活方式替他调解，并且获得了很大收获。

以上这些严重状态，假使不能给予克服的话，在日本进攻之下，河南南部可能造成一种极端混乱的局面！

（四）河南的统治，在中国各个省中，可以说是最不开明的，这自然给河南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以困难。但是，开展河南的抗敌工作，也存在着非常优越的条件，这不但是因为广大的民众抗敌情绪的高涨，而且是有其他许多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国民党统治内部分化。虽是刘峙等不愿组织民众，但在日寇进攻之

下，河南本地的统治者[为]保卫家乡，却主张组织武装民众。他们要这样做，便要和我们建立联合战线。第二，是CC与老法内部的分化。为扩大CC与老法的势力，他们极力的拉党员。所有的甲长都是被迫加入老法的，中学校的男学生在许多学校每每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加入老法。看起来他们的力量确是很大，但实质上，其内部分化得非常厉害。一大部分下层党员对于老法都不满意，很多人都在找我们的出路，就是他们的上层亦有很多觉悟的，要和我们联合行动。第三，国民党统治表面上很严厉，但是因为它统治本身的散漫与混乱，所以，我们独立自主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它不许我们做，但我们做了它也不管，并且还想借我们力量以自重。第四，国民党死硬派方面感觉到对我们压迫无效，便逐渐采取与我们竞争的方式。它要与我们竞争也就只有采取更开明的办法，这也就利于我们工作的进展。

所以，河南工作表面上看很难开展，实际上很顺利，问题在于要有坚强的党。

中共河南省委保卫河南宣言^①

(1938年1月25日)

河南各界同胞们：

日寇为实行灭亡我国的毒计，现又向河南进攻了。目前日寇正从津浦路两端夹击徐州，由鲁西进攻归德^②，由平汉路进攻豫北，由浦信公路进攻豫南，其目的都在于夺取我河南。河南是武汉的屏障，西北的门户，华北抗战的后方，南北战场的枢纽。为着要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同时为着保护我河南3000万同胞的生命财产，避免敌人的奸淫屠杀，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家乡，保卫我们的河南。

中共河南省委认为，今天来保卫我们的河南，是具备着很多优越条件的。这首先是全国与河南的民众，经过了六个月对日抗战的锻炼，已经大大觉醒了；国民政府与河南政府已经开始成为统一的国防政府（这表现在坚决的领导抗战，开始采用民主方式动员民众，开始注意了改善民众生活，如豁免战区田赋、实行优待抗战军人、发布惩治贪污法令与退还过去摊派的救国公债等）；我们的抗战军队，在过去6个月抗战中，不只是表现了英勇牺牲[精神]，而且还得到了极宝贵极丰富的作战经验；并且，在河南有山地游击战经验的高敬亭与周骏鸣两部红军，业已分别编为国民革命军。而在敌人方面，经过6个月的抵抗，已经受到

^①这是朱理治为中共河南省委起草的一篇文章，发表于省委刊物《风雨》周刊第18期上。

^②归德，即现在的商丘。

了相当打击，其国内各种困难与矛盾已经大大的增加。目前战线延长，寇军不敷分配。最近战略转变后，各个战区都有我军英勇抵抗与积极进攻，敌人后方到处发生了游击战争，敌人如深入到河南，困难更加增多。加之，河南有百万民间武装，民众善于使用武器，在历史上又有很光荣的保卫家乡、抵御外敌的革命传统，只要我们能够运用这些优越条件，充分发掘我河南蕴藏的革命力量，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把河南变成埋葬日寇的坟墓！

但是，我们认为今天河南还存在一种严重危机。这种危机，既不在于日寇的进攻，亦不在于我国军力不足与财政困难，而是在于河南内部的团结还存在着很大的弱点。这种弱点表现在前线个别的军官尚不能完全服从统一的指挥；各个党派之间，尚存在不应有的磨擦甚至冲突；政府与民众之间，尚存在若干隔阂；道门与土匪问题尚未能完善解决；特别是民众尚没有坚强的组织。而日寇、汉奸、托匪、敌探，正是利用我们这些弱点与空隙来进行各种挑拨离间，阴谋组织维持会与组织暴动，以达其破坏我民族团结的阴谋，实现日寇“以华制华”的毒计。

我们认为保卫河南的关键，是在于河南一切抗日力量的大团结，而这种大团结的中心骨干，应当是河南国共两大政党的亲密合作。中共河南省委郑重声明：我们热忱的愿意和国民党共同合作，为保卫河南，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斗争。我们随时都准备派遣正式代表，与国民党商讨保卫河南的共同纲领，组织共同委员会。目前时机已是万分迫切，为要达到胜利地保卫河南的目的，中共河南省委希望河南国共两党共同实现下列工作：

一、巩固抗敌前线，坚强豫北与津浦将士抗战的决心，使其在统一指挥之下，对敌抗战。我们的主力部队，应采用运动战来消灭敌人，阻止敌人的前进。同时竭力地组织与支持敌人后方的游击队，来配合正规军作战。对于不听命令、擅自退却到河南境内、自由行动之将领，则坚决惩处之，并争取其部下继续抗战。

二、全河南民众总武装，在保卫家乡、保卫河南、保卫中国的口号下，发动全河南的民众自愿的武装起来。目前，应立即组织成立 200 万抗日联庄队或抗日自卫队。武装来源首先是应用民间现有枪支；其次是各种民间武器，如大刀长矛；第三是政府有余枪时发给。在这 200 万联庄队或自卫队中，组织 10 万有政治觉悟、技术纯熟、武器整齐的基干联庄队或自卫队，以便敌人来时迅速转变为游击队。对于现有壮丁常备队，联防队以及警察，应加强抗日政治教育及游击战术的学习，以便随时转变为游击队。

三、动员全河南的民众，首先将全省从省抗敌后援会起一直到村的抗敌会止，统统组织起来。应当实现省动员委员会的《使抗敌后援会变为真正的民众机关》的计划，同时应当依照性别、年龄、学生、教职员、工人、农民、商人分别的组织起来。这样，使每个抗日民众都能动员起来，并且都能担负抗敌工作。

四、密切政府与民众的联系，应当马上使政府最近许多有利于抗敌及民众的法令，如严惩贪污法令，豁免战区田赋，退还过去摊派的救国公债，及军委会第六部的二十条、李敬斋先生代表绥靖公署及省政府所发表的谈话实现起来。特别是河南情势的迫切，政府应当迅速地提拔富有民族意识与积极勇敢的爱国志士，来充实政府。各个专员区及县区行政与军事机关，尤其要立即整顿河南的保甲。对于那些鱼肉人民，贪污腐化的区、保、甲长，应当立即调换，其遗缺应允许民众选举之。应当订立累进的派款法则。同时政府应当立即发动一个有效的救灾运动，抽富户捐，抽出富户存粮的一部分救济灾民难民。

五、安定后方，立即发动民众，肃清汉奸、敌探与日寇走狗，托派匪徒。特别要注意肃清在上层机关中隐藏的这些分子。对于土匪、会党与教派，如已经为日寇收买的，则应当积极的加以转变，使之不为日寇所利用，并能够起来消灭日寇。

六、开展一个新兵上前线运动，在省军管区之内，征募兵役委员会应动员所有民众团体来进行征兵运动。应当普遍的召集群众大会，号召爱国志士上前线，讨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办法，成立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发动民众对新兵上前线的盛大欢送庆祝，以造成热烈的扩大国军的空气。对于现已编为国军的高敬亭与周骏鸣二同志所率领的部队，应当同国军同一待遇，使之壮大坚强，使之发挥其山地游击战的特长。

中共河南省委坚决相信，国共两党同志及河南一切抗日分子，一定能完成以上这些工作。我三千万河南同胞，一定能够起来与全国各地同胞肩并肩的在蒋委员长的率领之下，胜利地保卫我们的河南，战胜万恶的日寇！

关于西华抗日活动情形 给长江局的信^①

(1938年2月18日)

一、交通带来的指示信及400元均收到。毛^②的谈话已决定由下期《风雨》转载，并拟召开文化人座谈会，发动党员讨论。关于苏鲁边党情形，现将一月前省委代表报告抄上。省委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乃两月前所作原稿，[你们]所指各点均同意。

二、西华胡晓初活动，完全在党的支持与领导下。前我在武汉时，书面口头均报告过。现他已取得国民兵团团长之职，掩护我们所办之训练班已结束，成绩颇好，故县长及周围各县均到第三区（即胡所在之区）请人去办训练班，县长亦声称第三区为抗日模范区。但在半月前，“绥署”忽得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叶参谋长电，谓胡晓初们借八路军名义。“绥署”正在用各种事情破坏我们，得此电后即令西华县长缉拿。幸县长和我们有关系，未生他故，但各地工作已受严重影响。[胡]过去历史不好，但在今天极有转变，其家产已捐去一半抗日，并完全接受我党的领导，绝无托匪活动嫌疑。其左右多为省委派去工作的。彼辈在西华未用八路军名义活动，只是他们的言论行动接受党的方针，故外面说他们是：“走八路军的路子的”，这自然不能怪他。望立即去电到“绥署”特别是县政府证明，并取消通缉，这对于那边工作开展极为

①这是朱理治用化名李述写给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信。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毛，即毛泽东。

迫切。冯^①之卫队营长魏凤楼亦在西华活动，有大炮4门，枪械子弹甚多，但无干部，故决定胡晓初与之合作。唯魏之下有董、成两个政治人员，检查董有托派嫌疑，现在谋去此阻碍。

三、游击战争干部仍未见来一人，苏鲁边及豫东很快将变成战区，希急速来。

四、经费困窘。(略)

五、这两天开封情势极严重，将来省委拟向南移，许昌、郾城党的基础太薄弱，拟搬到南阳去。河南工作，不久再作仔细报告，望叫交通立即回来。

①冯，即冯玉祥。

论保卫河南的武装民众工作¹

——武装民众的四项认识、八项工作方针

(1938年3月6日)

由于当局的倡导，由于民运工作者的努力，特别是由于民众的积极，现在河南民众已经开始武装起来了。各地竞办训练班，各地在组织自卫队、联防队、联庄会。这自然是异常可喜的现象。然而，从整个看来，河南民众武装工作的开展，仍是不能适应于目前战争情势的需要，仍是不能适应于保卫河南的需要。

为什么民众武装工作还不能有足够的开展呢？我们认为对于民众武装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尚缺少明确的认识，实为其最主要的原因。这些基本问题是：

一、武装民众是保卫河南的最中心最重要的工作。

武装民众的工作，是今天保卫河南的最主要和最中心的工作。离开了武装民众工作，便谈不到保卫河南。为什么？因为，现在敌人已经打到黄河北岸，正准备渡过黄河配合津浦路敌人，造成中原大会战的情势，夺取河南，进攻武汉。在这种紧急情势之前，我们依靠什么来抵抗敌人，保卫河南呢？我们决战胜利的把握在什么地方呢？严格的说，河南的地势，除掉北有黄河，西有伏牛山脉之外，从整个看来，并不更优于山西与山东。那么，要胜利的保卫河南，便必须除依靠我英勇的国军之外，[还要]有其他特殊坚强雄厚的武装力量，才能取得胜利的保

¹这是朱理治为中共河南省委刊物《风雨》周刊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于该刊第21期上。

证。恰巧，我河南民众有百万民间枪支，民众有使用武器的技能，有悠久的武装保卫家乡的光荣传统。特别是经过全国半年抗战之后，河南民众已有了普遍的对日寇仇恨心与对日决战胜利的信心。只要政府能正确的领导与民运工作者[作]更大的努力，在河南组织100万到200万的民众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是轻而易举的。假使我们真的这样做，我们便能在河南战胜敌人，取得中原大会战中的决定胜利。所以，武装民众工作，是今天保卫河南最主要、最中心的工作，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自然，武装的工作决不是保卫河南的唯一工作，因为除掉武装民众之外，尚有其它工作要做，特别是程^①司令长官兼省政府主席的五项要政，更要保证其实行。这些工作，不只是关系于抗战的前途，而且也直接关系于武装民众工作的[成败]。例如，贪污不肃清，苛杂不取消，灾民不救济，民众不组织，那么武装民众的工作，便不会顺利的进行。所以，这些工作，都是要做的。但必须把武装民众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其他一切工作，比之武装民众工作，是次要的，并且要围绕着武装民众工作这一中心来做。

二、汉奸、托匪、野心家的所谓武装民众，实际上不是武装民众，而是破坏民众武装。

全国抗战后，河南的野心家们，曾经假借组织义勇军、游击队的名义，到处收编土匪，企图扩大其个人势力，这样武装民众的结果成了制造土匪，这些“官办”土匪抗日不足，扰民有余。而托匪汉奸分子，便利用武装民众的名义，勾结封建势力与土匪，煽动民众武装暴动，企图推翻国民党几个县的统治，以尽其汉奸活动之能事，这样来破坏后方秩序，牵动国军兵力，以为日寇效犬马之劳。

①程，指程潜。

这些野心家们与汉奸托匪的活动，很明显的，决不是在组织民众武装，而是破坏民众武装。但是，过去当局与河南民众们对于这一点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对于他们的活动，防范不够严密，纠正不够迅速。因此，在河南曾经造成了“土匪峰起，民不聊生”的严重状态。

我们应当严厉的反对野心家们的行为，应当无情的扑灭汉奸托匪的阴谋。但是，对于真正的民众的武装工作，却要更大的开展。决不能因为怕野心家与汉奸托匪的活动，而不敢真正的武装民众。正是相反，只有把民众武装起来，才能彻底的断绝汉奸托匪与野心家们的活动的机会。

三、武装民众，不是破坏征兵；而是帮助征兵。

组织河南民众武装与扩大国军，决不是互相对立的。有些人认为，现在只要正规军，不要组织民众，这固[然]是错误的。因为，正规军的扩大有一定限度，是不能将大多数民众武装起来的，只靠少数正规军决不是取胜敌人。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我们只要民众武装，不必扩大国军，这也同样错误。因为没有强大的正规军，只凭民众武装抵抗敌人，也一定会失败的。只有正规军与民众武力的配合，才能取得对日决战的胜利。

有人提出这样意见，认为把民众武装起来了，便不能动员更多民众上前线了。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吗？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正和这种人的了解相反，倒是越把民众武装起来，越能动员更多民众上前线。因为民众武装成立后，经常在后方服务，在配合正规军作战过程中，他们会自愿的成千成万的加入正规军。过去江西[红]军所以能够在不大的区域中扩大到 90 万的军队，很大的得力于赤卫军的组织；现在西班牙的政府军，很大一部分也是从民众武装创造出来的，便是明显的例子。

四、武装民众要新旧形式同时并用。

现在河南武装民众的工作，有两个主要偏向。一种偏向，认

为组织民众，只是将原有民间旧的组织，如红枪会，遣散了的军人，解散了的民团重新复活起来，或是仍依这些团体的首领与系统来武装民众，这是一种错误。因为，今天武装民众的方法，主要的还是在于真正武装工人、农民与其它民众，成为自卫队，义勇团，联庄会。由于他们是从民众中产生出来，他们没有旧的恶劣传统，能够纯洁的忠诚的为保卫家乡，保卫工厂，保卫河南来斗争，所以应作为我们武装民众的重要方式。至于红枪会、遣散军人与解散的民团，决不能作为我们武装民众的主要方式。因为他们中间，有的脱离生产很久，流氓意识甚重，封建关系很浓，旧的恶劣传统很深，其领袖们野心很大。对于这些武装力量，决不能用来做武装民众的主要形式。

但是，第二种偏向，与此相反，认为今天只要重新武装民众，对于旧有的红枪会，在野军人等，完全置之不理。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武装力量，虽然根基上有上述许多严重弱点，但只要运用得当，亦未偿不可以改造，使他们能够起来抵抗敌人，为国效劳。特别是因为，假使我们不去领导他们，使其走正确的道路，他们有可能受日寇的欺骗，利诱，进行破坏抗日的工作。

不过，我们进行这一部分武装工作的时候，应当特别细心、谨慎。第一，必须要分别清楚这些力量是否已为日寇汉奸所收买。如有汉奸怀疑，应当加以肃清。第二，应当加紧对其首领，特别是有希望的青年首领的教育，使他们能够了解目前全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第三，对于他们的迷信思想，在开始时不必予以直接反对，但是必须在这种迷信中灌输抗日的思想，使其下层群众逐渐地增加民族意识。第四，要引导与保证其行动，不和政府相对立。

以上四项认识，是今天武装河南民众的基本问题，只有清楚认识了它，才能正确开展武装的工作。至于如何武装民众，我们

认为有以下八项方针：

一、要在保卫家乡，保卫工厂企业，保卫河南，保卫中国的口号下，发动民众自动组织工人自卫队，保护工厂铁道队，抗日联庄会，抗敌护乡团等组织，政府应站在推动，帮助与领导的地位。

二、要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矛出矛，将村中所有壮丁与青年统统组织起来，并随时设法增加与改造自己的武装，或自己制造，或设法从日寇手中夺取。

三、民众武装的首领，应由参加武装的分子共同推选，由政府加委。应当给予这些首领特殊的政治军事训练，最好方法是开办民众武装干部的训练班。对于不称职首领，应随时由队员撤换之。

四、民众武装，应以不脱离生产，不增加负担为原则。如因离开本地配合武装作战时，政府应酌量补助其伙食。

五、应将青年与成年分开编制，在总的民众武装中，成立基干的模范队。这些基干队或模范队，应以最坚决勇敢的队员来组织，配备最好的武装，并给以最好的训练，以便变为战区时，转变为游击队的骨干。

六、组织之后，应当经常训练，训练应包括政治的与军事的各方面。

七、组织之后，应当随时使他们行动起来。在后方时，进行剿匪，进行后方勤务。在前方时，帮助抬伤兵，打扫战场，以至于配合作战。

八、所有一切民众武装，都应在司令长官统一指挥之下。在地方应受地方政府的调动。

党在河南的军事工作情况^①

(1938年3月11日)

省委^②现仍在汴未移，逊及赵、魏^③均在汴，集中力量在布置守卫黄河的运动，其言行具见《风雨》20期“坚守黄河，保卫河南”一文。现在保卫黄河，已开始形成一种群众运动。在开封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在慰劳守黄河战士的运动之下，现已召开了六七千人的游艺宣传大会，进行几万份的“一人一份慰劳运动”，并正募集各种守黄河用的麻袋等。在黄河边的农村中，已决定[派]60个宣传队去宣传，去组织农民。在开封黄河边有党领导下的6个连，现在一方面在这一师起战斗的模范作用，一方面也组织了一些宣传队，组织当地农民。现在，省党部命我党同志组织沿河的青年战地服务队。已召集了郑州、豫西负责同志（豫西在黄河边有7个县的党组织），讨论如何将这一保卫黄河运动，成为全黄河沿的运动。省委决定依靠这一运动来推动全省保卫河南的运动，在保卫黄河运动中，造成两党进一步的合作，发动沿河民众运动，造成军民合作，同时准备布置陇海沿线的游击战争。现在，开封在保卫黄河运动中，组织上已经得到的收获是：

一、铁路上组织了一个游击训练班，60多人，一个座谈会，60多人。电话局的工会组织起来了，铁路子弟儿童剧团成

^①这是朱理治写给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一份报告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省委，指中共河南省委。

^③逊，即李逊，朱理治化名。赵，即刘子久。魏，即危拱之。

立了，窑区妇女救国会 60 多人组织起来了，并已打通了民教馆、回教会、青红帮、邮政工会。

二、目前工作的中心：武装民众，准备游击战争。

除豫南外，在苏鲁边情形详见特委报告及省委指示信。最近他们来信[说]又做了一个漂亮工作，即把已经组织好的游击队，和前方军长商议好，配合军队作战，并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以资练习。这一经验非常好，准备各地都学习做。

在豫东，现在也创造[出]一个经验来，即在睢州¹我们派了两个同志开辟工作，他们和 CC 与复兴社新成立了一个“中心干部会”，办了一个训练班，训练之后分配到各乡组织联防队。现在联防队全组成，经过训练，班中我们所发展的同志有把握的已有 500 武装。每一联保的联防队，都抽了 9 个优秀分子加以训练。这一县的武装基础[就]这样打下了。在杞县、太康有 200 至 300 武装，我们完全有把握。现在豫东有一宋姓，在周某推动下，已活动民间武装万余，取得了第一战区给予的豫东民运指导员名义，并由第一战区政训处派了 40 个学生，分作各县民运指导员。这一工作，已和豫东党取得联络与配合。

豫西民运统一战线，原为模范区，党基础亦大，现已发展 1000 多同志。单我们党里有的枪就 500 支。豫西党在武装工作中犯了狭隘的秘密路线的错误，他们只是偏重秘密的将同志武装联络起来，而忽视如何运用统一战线方式，广泛的武装民众，不在这中间创造我们的基干组织。现[经]严加批评与纠正，他们在豫西红枪会、土匪中均有很多关系，并有相当工作。在驻军中有一旅长及一团长是同志。在骑 4 师中，党亦恢复。豫西武装工作极易开展。

在豫中，舞阳青年救国会把握有 500 武装。西华及其他各地

¹睢州，即睢县，今睢州市。

这半月多来无消息。

关于民众武装的方针，已由李迅写了一篇论文，登在《风雨》21期，请予参看并指示。彭¹同志已到，唯据彼言，彼现在尚有长江局的联络局及指挥江苏、山东、陕西、鄂北等处工作，事务很忙，不便兼省军委。我意长江局联络局工作可解放他，使他专心一意的来担负省军委工作，这是非常需要的。

¹彭，即彭雪枫。

普遍组织全河南的农会

(1938年4月17日)

第一期抗战时期的农民救亡运动和目前第二期抗战时期的农民救亡运动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第一阶段时，广大的农民群众，大部分还是处在昏睡的状态。当时，许多地主当局，最头等的如韩复榘之流还处处压制农民运动。所以，当时的农民，对于抗战大多是抱着旁观的、消极的态度。

但是，目前第二期的情形，就起了根本的变化。由于[经]过去9个月政治生活的教育，由于政府与民众团体的领导，广大的农民觉醒起来了。他们不但不消极的被欺骗去当汉奸，反而积极的起来慰劳我军，帮助引路，捉拿汉奸，以至于自动的武装起来，发动游击战争。这种农民态度的转变，虽然各处程度不一致，但是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最近各个战场上的胜利，特别是鲁南的大胜利，一方面固然由于我国军事[上]有了大的转变，但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忽视了广大农民的力量。

然而须看到，直到今天，农民救亡运动尚没有充分的开展，真正自愿的参加救亡运动的农民，尚是一小部分。农民伟大的积极性尚未更大发展，特别是今天农民参加救亡运动，还是极端的涣散，并大多是带着自生自灭的性质。这样，就不能使农民的救亡运动更大的开展和坚持。

我们河南的民众总记得，民国十六年北伐军到河南时，河南

¹这是朱理治为中共河南省委刊物《风雨》周刊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于该刊第24期上。

的农民是多么热烈的拥护北伐军。那时河南的农民组织了24万人的农民协会。依靠这个组织为中心，他们武装起来，成为北伐军的别动队。许多县[城]完全是农民自己暴动起来，替国民革命军打下的。今天全国一致打日本，日本鬼子比之过去北洋军阀，还要可恶十倍，而现在的政府当局不但是不禁止农民运动，而且还竭力提倡与帮助。论理，今天的农民救亡运动，比之过去更应十倍百倍的热烈。但事实上，今天河南的农民的救亡运动，比之民国十六年北伐时代还不如些！

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政府的法令碍了农民积极的抗战吗？不是！现在我们的政府有程司令长官，热烈的盼望全省农民参加抗战。最近国民党临时大会并订立了抗战救国纲领，规定着：“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各种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注意改善人民生活”，“严惩贪污官吏，并没收其财产”。这个纲领，与过去程主席的各项新政方针的精神，正相一致，所以现在农民没有更大发动起来，决不是因为政府法令的阻碍。

农民运动不能长足发展的缘故，是否因为农民不愿起来，或是因为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与帮助者不愿努力的缘故呢？自然也不是的！因为广大农民感到生命财产即将不保，正极愿起来参加抗战，保卫家乡，保卫河南。而一般农民运动的工作人员，更是热心的工作着。

那么，其基本原因何在呢？

我认为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程主席了解得最清楚、最深刻，他前两天在省党政联合纪念周上，已很清楚的指出了：

“河南施政方针，虽经拟定，但它是纸片儿的计划，须要人来切实执行才始有效。若一味敷衍塞责，虚与周旋，无论多好的方针也救不了民众的疾苦，更谈不到建设新河南。以往政治上所以不能上轨道，其原因虽说不一，而一般的贪官污吏，劣绅土豪

不能肃清，从中把持，使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闻，满布敷衍苟且，虚伪不实的笼罩，实为重要原因。”

程主席这段讲演，将农民为什么还不能积极抗战的原因，已经明白道破。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广大农民实行非人的压迫与剥削，因此，使得一般农民对政府发生不满，始终不能吃饱了饭起来抗战。并且他们还压制农民参加救亡运动，不许农民有组织，甚至过去政府所委派的动员民众的政治军事教官与民运工作者，下乡宣传与组织农民时，他们竟敢加以压迫，甚至于加以杀害。设问，这种贪污土劣不加铲除，如何能动员农民呢？所以，我们热忱拥护程主席的命令，“嗣后对政府贪污土劣，必使之铲除净尽，务促其改过迁善，如发现不知悔改者，非党员固绳之以法，党员则尤加倍严惩，决不宽贷”。

但是，不能把农民更广大的发动起来的原因，并不完全在贪污土劣身上。虽然乡村中的土劣是动员农民参战的主要障碍，但是，这些贪污土劣，既然中央与程主席都一再明令严重严惩，为什么他们的障碍还不能破除呢？这里，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农民本身还是没有有力的团结起来。要假使农民本身是已经组织起来了，那么这些贪污土劣的阻碍早就该打破了，更何待于程主席的三令五申？相反的，要假设农民自身不组织起来，只是坐待与依靠程司令替我们铲除贪污土劣，即是贪污土劣都铲除完，农民不见得就会立即抗战。何况单靠程主席自上而下的一个个铲净，也是不可能的呵！

据作者的估计，现在在河南有组织的作农民运动的爱国青年，至少在3万以上。他们深入到农村，和农民打成了一片。他们正艰苦的在农村中宣传农民、组织农民与武装农民，并且已经获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感觉到所有这些农民的组织者，普遍的都没有抓住组织农民的中心环节，这个中心环节就是组织农会。他们一般的都没有能够执行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

的抗战建国纲领所指示的“组织农工商各种职业团体”，这即是没有将农民依职业来组织自己的团体——农会。正因为农民没有其自己职业团体的组织，所以，他们便不能更踊跃的与积极的参加救亡运动。正因为农民没有农会的组织，所以农村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如抗敌后援会等，便不易形成；即是形成了，也没有充分的工作内容。正因为没有农会组织，所以农村中的武装自卫组织无人支持，没有骨干。正因为没有农会，所以农民没有集体的力量来拥护政府中的抗日法令。

许多乡村工作者没有能将政权组织与民众组织分清楚，将全农村的统一组织与农村中的分别的职业组织分清楚，没有将军事组织与民众组织分清楚，没有将基本组织与辅助组织分清楚，这是许多地方忽视组织农会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不知道，保甲制度是乡村中的政权系统，而不是民众组织；农村中的抗敌后援会与工作团是乡村中的所有各阶层的统一战线的组织，而不是乡村中农民的、学生的、工人的职业团体；联庄队、人民自卫队是武装自卫组织，不能代替各种民众组织；至于乡村中的夜校等等，这只是一一种辅助组织，而不是一种基本组织。乡村中的最基本职业团体应当是农会，有了它，一切其他组织便容易推动了。

现在河南的一部分农村工作者与优秀的国民党员，已经感到农村组织的重要，正在各地组织农会。其已有成绩的是，密县已经组织了一万多农会会员，偃师已组织了几十个农会，睢州已将全县所有农会组织起来。最近，潢川的农会亦组织起来了。从整个河南看来，这些是农会的萌芽。我希望全河南的农会都能够组织起来，动员所有农民，参加抗战，保卫河南。

怎样组织农会呢？根据各地经验，我提出以下几个简单意见，以供参考：

第一，是更深入的宣传，使农民自愿的组织农会。其宣传内容，可参考《风雨》第24期的睢州通信《我们怎样把农会组织

起来》。

第二，抓住几个中心乡村先来组织，只要这几个中心乡村的农会真正是能够领导农民抗战，并为农民谋利益的，那么各地农会便会立即的自动的来请求领导组织。

第三，农会的组织务要请求当地党政机关前来领导，现在各县党部动员委员会、第一战区政训处也都正在组织农会。每个农会组织者，最好就作为党部与民运指导专员公署的工作人员，这样下去工作，且能避免许多磨擦。

第四，组织农会决不能妨害乡村的统一的抗敌后援会组织。因为乡村中抗日的不只是农民，而且还有工人、小商人、知识分子与一部分的地主与士绅，他们都是抗日的。对于他们，我们都应当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总的乡村统一战线，而农会应当成为这个乡村统一战线的骨干。

第五，在日寇迫近河南的今天，河南农民运动最中心的任务便是武装起来，保卫河南。农民应当成为乡村武装自卫与准备游击战争的发起者与支持者。

第六，要注意实施政府法令，改善人民生活。但同时，在组织农会时要防止农民提出过高的要求，采取过激的办法。

第七，在农会组织起来之后，便要使这个组织有经常工作，有经常生活，如帮助国军组织运输队，侦探消息，肃清汉奸，加紧春耕，优待抗日军人，组织儿童妇女，开办农民夜校，办农村小报，开会讨论时事问题，训练农民工作干部等等。

河南能否保卫得住，中心是在于河南 2500 万的农民能否武装起来，而组织农会，便是武装千百万农民的有力方法。

事迫矣！赶快把农民组织起来吧！

积极开展友军工作^①

(1938年4月26日)

根据[鲁南工委]的报告，可得出以下的经验教训来：

(一) 上下层相互配合，是各地工作开展[武装斗争]最主要的条件。过去数月，省委历次指示即着重于此。目前苏鲁边所领导下之3个区（鲁南工委，湖西中心县委，苏皖边工委）均能相当做到这一点。唯鲁西南工委因最近才由联络局交给苏鲁边，此层尚未做到，故基础虽较别处为大，但工作则不易展开。已令特委帮助加以转变。

(二) 部队中工作尚未能与地方工作相配合。他们在当地作战军队中，除掉青年军团中有一些工作之外，其他各部尚无工作，我党有基础之东北军51军、57军两部过去和地方均无关系。

关于这部分工作，我提供了三个意见：（一）帮助与配合地方发动游击队战争。在我们领导下的团及影响下的师部、旅部，可以和地方配合起来，抽出一个连或一个排，联合地方民众武力，组织成基干游击队，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配合守淮河的阵地战。同时，在我们领导下与影响下的团营中，应抓紧游击战术的学习，以便将来军部派整个团营留在敌人后方打游击。（二）现在部队工作，均已向下层发展，上层工作没有进展，故嘱他们向

^①这是朱理治用化名李逊写给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的节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团营长发展。(三)为加强对下层领导,在最有基础的1师中,成立一个巡视团,以便加强对4个团内党的领导。这几月为来,苏鲁边在健全组织上与支部工作上有了相当成绩,唯同志发展不快。前次报告说“据苏鲁边特书估计,已发展到2000同志”,但半月前我们统计,那边同志还只有1100多同志。

关于友军工作,我处已经恢复整理,开创至相当大的范围。直接由我处恢复与创造者有32团、166团、35团及15军与青年军团。另外,在陕县、灵宝间有一骑兵师亦已由豫西特委恢复关系。在我处联系中者有51军、57军与石友三部。

(一)32军实际上是河南本地的实力派(过去之刘峙,现在之程潜事实上均无实力),现有步兵3个师,另有补充旅、税警旅、骑兵团、炮兵团,人数约有三万五六千人,此军组织历史远在民国十七年,久经变故。芦案前,曾一度与北方局赵凤田同志有关系,旋即失去,最近才经《风雨》新找到关系。此部现有同志10人(计团长1,营长2,连长4,中校科长,副官各1,团副1),左倾群众约有二三十人。商震处,毛主席曾派去一人,并送去一密码本,唯双方电台未能呼叫通。商近对人表示,他愿和八路军联络以互交情报,为开展此部上层工作,你处最好能派一联络参谋来此。同时,望立即从延安将过去东北军中学生队或其他有友军工作经验的五六人派赴商部,安置方法已商讨好。相信此部经一时期工作后,可有大开展。

(二)青年军团原有苏鲁边、东北同乡,联络局分别派去一些人,未曾有一总的组织。现经我处派苗勃然同志去,原有同志12人,现发展到30个同志;原有“民先”40人,现发展到90几个人。青年军团共分4组,特别政治组1200人,此组只准备再训练半个月,即将分发到潢川的8个县做群众工作。现有同志20人,决定大量发展,以便将来配合创造潢川8县的党。另一组最为重要,即为军事组,将来大概要分发到广西中去的。唯现

在只有4个同志，此组极宜加强。

(三) 166团、35团前几次报告中均提及。骑兵师情形以后再写报告。15军军训班400多人中，我处派去60个同志、30个教官，此部现已移至西安。

(四) 最近石友三部已开到台儿庄左右，张友渔昨日来汴（他已在石部担负代理政治部长）。张去石友三部队工作，当可与地方工作配合得好，因他原即与苏鲁边有关系。张去后，将各团政治员均已放下去。4个团中有3个政训员是同志。他已和石商议好成立一教导团，将来作为基础。此次我向他只提供两个意见：一、加紧对团、营长之争取，二、配合地方组织敌人后方游击队。

综看此间友军工作，有以下几个弱点：第一，即是中央军及广西、四川军中的工作薄弱；第二，尚没有有计划的派人到中央¹所创办之军事训练班及航空学校中去；第三，部队工作，尚未能与黄河沿岸及鲁苏边民众工作相配合；第四，党作友军工作，尚没有独立的部门专负其责，更未能动员全党来注意这一工作。最近豫西特委将特委军委扩大到5人，分作3部：一部为民众武装部；二部为各式迷信的土匪的武装部；三部为友军工作部。现在省军委因干部困难，尚未设友军工作部，所有各军关系均由我直接领导，中央军委最好能派一二友军工作巡视员或干事来帮助与领导此间友军工作。

关于上层统战工作，我们在第一战区政训处中派了许多同志进去，事实上我们在政治上已可领导。托派与复兴社，最近因为受贿恐破露，已大部逃走，只剩了几个人在内。现在，处内除我们外，[还]有第三党的活动。已决定在郑州建立一上层工作委员会，主要推动政训处工作。将来全省上层工作，可即以此为中心

¹这里所说的“中央”指国民党中央政府。

来进行。现在正竭力纠正处[内]工作同志与群众中一种“左”的危险倾向，如空喊要用政训处来统一全省民运，把党的工作与政训处工作相混淆。决定他们工作方针是少发过[内]左言论，多做实际工作。这样，政训处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其工作主要的是做：
（一）经过政训处来推动开创各集团与军队中的工作；（二）扩大民运指导员制度到全省，并设法分派一些同志及群众做县区长；
（三）公布武装民众法令，打击河南党政机关中不守抗战建国法令的行为。

我依照过去东北军工作的经验，决定在各特委设立一上层工作委员会，专门计划与推动上层工作，豫西已建立起来。豫鲁联络局依长江局决定归彭^①同志指导。唯有张友渔已去石部，刘贯一已由彭[处]调至豫南，干部实有加强之必要。

^①彭，即彭雪枫。

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①

(1938年5月)

今年正月下旬，长江局详细地讨论了河南工作，规定了“武装保卫河南”的总的政治任务，同时规定了“在加紧开展党与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来准备与发动河南游击战争”这一总的工作方针。在中央与长江局正确的指导之下，这4个半月，河南的工作已经在苏鲁边与豫东开始了相当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同时在未被敌人占领的区域，亦已经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关于过去情形，已详历次报告。兹将最近情形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 各军分区游击战争发动与准备的情况

一、豫东分区豫东党的基础原来最为薄弱，估计到敌人进攻河南必先从豫东开始，所以，这一个短期间曾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布置。

我们把豫东分为四个游击区域。第一个区域，并且是重要的一个区域，是以西华为中心，包括淮阳、扶沟等县。现在西华已集中的武装有1000人，完全在我党的领导之下。这1000人分为12个支队，武器都有，并有手提机枪，迫击炮。除这1000人之外，在我党能发动与领导之下的，还有1000人，立刻可集中起来。这一县有武装万人，县长是英雄主义，可受我们左右。4个

^①这是朱理治为中共河南省委起草的一份给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标题为编者所加。

区长两个是同志，一个是候补同志，另一个是群众。这一县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共办了6期训练班。过去第3区将全区的儿童队、少先队、看家队（自卫队）、姊妹团、老婆队、老人指导团统统都组织起来。现据政治交通反映，各区都有了这些组织。单这一县就有4个小规模兵工厂，能够造10响的手枪及长枪。淮阳专员刘莪菁先生，很想武装保卫第7专员区。他招了我们好些同志，并开了一个大规模训练班，准备将不称职的区长加以更动。唯因时间仓促，似乎作用尚小。据前5天的消息，淮阳只发动了100人武装，由我们县委书记带领。

第二个游击区准备以商丘为中心，包括永城、虞城、夏邑等县。这一带党基础原来没有，后经民运指导员开展了一些群众基础，同时我们又派了人去建立一个商丘工委。半个月前，那边来了一个短的报告，[说]永城已发动2000人，虞城800人，商丘已准备好的有80人。这个报告自然是很空洞的。不过我们相信，今天那边发动的也许会超过此数。因为，在这一带以石友三过去在河北当省政府主席时代的一个财政厅长为首领（即现今的豫东民运指导专员），同时以尹某（此人现要求加入组织）为灵魂。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联合了49个武装首领，大概有1万多武装。大家宣誓抗日，并订立六大政纲、十大纪律；那时，自然是有些空。但在目前日寇已达豫东，并有民运指导员在这两个月的工作，这一区游击战争是可有开展的。不过，这里的党的基础与武装的成份比之西华一带要差多了。

第三个游击区准备在睢州、杞县、太康三个县。睢州过去利用统一战线办了训练班，后来将训练班学生分发到全县联庄自卫队当分队长等职。那时，在党的同志领导下的武装，保证能发动起来的有200人。后来，县长被那边党与抗日群众告发了，[便]竭力来压制抗日活动，故武装工作无大开展。一个月前，县长被撤，那边工作大有发展。敌人进占前，他们来信说可以发动

1000人。杞县我们派了豫西特委书记吴纯甫做省委的代表，他在那边可以号召1000人。另一部分20多学生的武装已经离开了杞县到了扶沟，此部与吴纯甫所领导的没有关系，太康县因无上层统一战线，只我们几个同志准备了20多人武装，近况不知。

第四个[游击]区是以开展工人为基础，发动陈留、鄢陵一带农民。在敌人迫近开封的时候，我们将开封余留下没有离开的工人与学生编作4个游击支队。首先出发的，是开封余留下的一批学生。先出发16人，后又继续出发8人。因为四郊农民无工作，所以用战地服务团的名义[让他们去]开辟农村基础，结果很好。他们在朱仙镇西南溶合在当地十多个村子里的联庄队中去了。第二批的游击队是电话工人、铁路工人和邮务工人。他们因为军事交通工作[的原因]，所以直到敌人大炮炮弹打到城里去的时候，才由新决定的特书郭同志带领出了城。电话工人队是48个人，铁路工人是12人（此12人是否全出来尚不知道）。邮务工人因为还留恋职业，分了两部退出，一部退到洛阳，一部退到信阳，在信阳一部，我们正在重新组织他们。电话、铁路工人和学生服务队已经联合起来，现在正将这些基干力量（最大部分是同志）分发到陈留、扶沟。发动当地游击战争，除朱仙镇之外，有基础的是鄢陵。那边的中心力量是一个30多人的地方宣传队，现在把握300人武装，我处已派得力同志前去。另一处是陈留，那边民运指导员是我们同志。此次敌人迫近，县长逃跑，由民运指导员同志领导了地方民众，重新将县长区长都选出了，公安局长亦已被我们同志扣留送到郑州去了。此县工作很有希望。

综看整个豫东游击战争，已有相当大的范围，只要领导得法，将来豫东[开展]大规模平原游击战争是有很大前途的。我们布置大概如下：

（一）以西华我们完全可以领导的这1000人为基干，联系、领导与影响全豫东的游击战争，特委中心跟着游击战争走。

(二) 推动淮阳专员与商丘民运专员来公开号召全豫东的游击战争，使豫东变为聊城专员区第二。(三) 严厉的防止军事盲动主义，现在西华就有这种倾向，[即]准备用民众武装采取阵地战来守西华。(四) 商丘应在普遍发展中，求得创立我党领导下的基干部队；在开封一带求得用我们工人骨干，普遍发动游击队伍。(五) 部队灵活组织，使之能适合于平地游击战争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术。(六) 经西华各地组织游击支队向整个豫东各县发展，到处组织游击战争。游击战总的发展方向朝着皖西北，同时靠近平汉路的游击队，如不能站脚，可领导一部基于往确山方向发展。(七) 每个领导同志，都要学习游击战术、游击区域政策和游击队政治工作三门功课。

二、苏鲁边分区过去报告得很多。后来因为砀山我们的电台被炸毁，同时铁路断了，交通尚未接上。现只根据个别同志及群众[了解]非正式报告如下：

在鲁南，中心县委原在抱犊岗组织了400多人的游击队，现已有1000多人。这是根据特委书记在徐州被占前一天向51军负责人的报告。原来长江局决定将此区划归山东，我已通知了他们。但看特委书记郭子化同志由徐州向鲁南退出，似乎他们因时间关系来不及交代，尚没有交给山东省委。

最值得庆幸的是石友三部，我们和张友渔所决定开到敌人后面去游击的计划已经实现了。张可把握石。在石的下层，我们的政训员及教导队亦有很大力量。据我们看来，此部将来将是山东游击战争的骨干。

在湖西工委，据一个群众说，丰、沛、萧、砀每县都有400人的游击队。沛县最好，已发动了1000人，唯和敌人反复打了几次硬仗，现在只剩了400人。原决定鲁西南和湖西合并，不知已否实现。现在，沈鸿烈领了一师人到了鄆城打游击，这里面战地服务团有不少同志。

在苏皖边区发动情形亦不知，只知 57 军已留在那边打游击了。唯 57 军虽[有]相当大的党的基础，但无得力人在领导。原领导人张同志已调走，不知能起作用否？

三、豫西分区以前已经报告。我们派了张大姐和老刘去布置，他们的报告尚没有来，日内也许即到。原来我们派刘希尧和危拱之同志开辟豫中工作，现在已经创立一些基础。现决定将豫中平汉线以西的和豫西合并起来，作为一个游击区域，以嵩山为中心。十多天前郑州已经在组织游击队伍，专员罗震允许发枪支。将来郑州的范围比之开封要大，四郊农民救国会，也已经组织了不少，只是生活不太健全。群众基础最好的是密县，有好几万农会的组织，原在一个左派国民党员领导下，现在下层已发展了一些同志，领导办了几期训练班，民运指导员已派去。其他如荥阳、禹县、襄城都派了民运指导专员下去。同时下层亦开始有了一些同志。这一地带原是 32 军的准备区域，也许 32 军就已退到这一带了。32 军中党的活动范围相当大，同时，我们又推动了罗震专员及第一战区在这一带设立根据地，他们都正在多方面准备，这一地区是很有希望的。

第二地区拟布置在偃师、洛阳、伊川、登封、伊阳¹一带，豫西将近 2000 同志的基础，主要集中于此。另一地区是洛宁、卢氏、陕县一带，这一带地势好，党亦有相当基础。上层统一战线方面，洛阳专员已可和我们合作组织民间武力，登封、伊阳二县长及洛宁等区的区长是群众或同志，现在我们接连派去两个省委[委员]去布置。工作方针，除与豫东相同外，（一）要他们工作向南发展；（二）要在洛阳、鲁山一带准备游击战的总根据地。现在就准备将兵工厂等移到那边去，等等。最近详情待得报告后详告。

¹伊阳，即今汝阳。

四、豫南分区。此次我去竹沟，与彭¹及特委决定把这一区域划作以下四个地区来布置：

第一个是舞阳、方城、叶县。这一地区党的基础不厚，唯青年群众组织力量相当好。

第二个地区以南阳为中心。将来这个地区可能发展为两个游击区，一个是向北几十里，即到南召山地，那边党可能将全县武装掌握大半，唯党与群众工作甚差。向南到浙川、邓县，那边亦是山地，唯党在今天力量薄弱之至，只有看以后的工作决定了。

第三个地区是平汉铁路以东，汝南、正阳一带平地，那边党与群众有些基础，可发动平原游击战争。

第四个区域将以竹沟为中心。在这一地带现有保证可立即发动起来的就有300多人。将来这一个区域主要方向向南发展，即是向过去鄂豫边的桐柏、唐河及襄、枣、宜一带发展，因桐柏山的主峰在这一带。

豫南特委和下层的联系很差，对下层情况隔阂得厉害。此次我去多方询问，也不能深知其情形，故只能做此一般方针的决定。再具体的每一地区的布置，只有留待我们去后再进一步的了解情况才可能。

为着要开展整个河南游击战争，建立基干队伍及准备干部为目前迫切的需要。因此，我们在竹沟决定立即准备再创立1500至2000人的新四军，成立干部教导队500人。人员及学员是不成问题的。经费教导队可采取膳费自备（每人交6元到10元）的办法。周围环境亦无大问题。目前泌阳县政府及武装实力派已无大问题，只有确山县政府还在捣乱。不过确山到竹沟已有68军在中横隔着。同时我们已决定了一些方法，如利用第一战区民运指导员及第五战区的宣传队及当地下层力量来对付他，量他

¹ 彭，即彭雪枫

亦不能怎样来反对我们。此次希望将经费及武装干部[问题]作一决定，以便立即去开创。

五、第五个分区原决定为潢川8县特区。我们已派了两个剧团，并利用青年关系帮助布置。我们原来派去的苗已经回到潢川了。这一带的工作多少的基础已有，如能划归安徽省委，立令省委速去，并加紧布置，是很有前途的。我们最近正召开这地区工作同志在信阳检讨那边工作，以后再将材料奉上。

目前从徐州退及第五战区的干部、剧团及一部分青年武装组织（有百余人）都已经退到信阳、潢川一带，现在已开始联系上。

第二部分 党与群众工作

这方面过去也已报告了。现只将目前发展情形报告如下：

一、青年群众组织 过去因为河南“民先”不能公开活动，当局压迫得很厉害，故决定在河南不建立“民先”。由各地采用公开合法方法，创立各地青年组织。后来各县青年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在党领导下的青年估计至少有两三万人。唯没有一个总的领导机关来推动与计划全省青年组织。同时各地青年团体，因党领导差，领导青年团体的党的系统没有建立起来，故尚不能发挥青年团体的作用。后来决定：（一）每一个地方组织与每一个支部都要有一个和CY¹一样性质的基本的青年团体在党的周围，但它必须是公开合法的并且是统一战线的。（二）每个支部都要有青年干事，并将青年工作同志建立青年小组，区、县、特委都设青年部或青委，带相当的独立性（但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的进行青年工作，建立他们自己自上而下的领导系统。

¹ CY，即共青团。

(三) 成立全省青年总组织，形成其公开领导系统。最近这个计划已着手实施：第一，全省青年总组织利用青救协会的招牌，已经成立全河南省青年救亡协会，并准备本月 10 日在舞阳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将来拟用这个组织来推动与领导全河南的青运。第二，各地基本的青年组织都在建立。例如，在开封和郑州都已组成青年救国会，已起了如过去党领导下的青年团的作用。省青委及各地青委均已相继建立，有自己的工作计划与领导系统。

二、工会组织 在开封成立了工人抗敌分会。电话、邮务、面粉等工会都已争取到我党领导，国民党在开封只能把握住建筑业工会。陇海工会复兴社统治相当严格，开封、郑州、洛阳三段，我们可能领导的还只是少数。郑州对平汉路领导较好。郑州纱厂的工人党能领导，唯这部分失业工人问题很多，党尚不能完全掌握。

三、农民救国会 过去各地只在农村中建立了一些统一战线的农村抗敌会，工作团，农民无单独组织，因此，农村总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每每都[显]空洞，故通告各地特别去建立农民救国会。郑州、潢川、睢州、密县都在组织。在潢川的成绩较好，因为能为农民谋利益，故农民自动要求去组织。在郑州□□□□因为只靠民运指导员去组织，没有把当地青年先组织起来，没有依靠当地青年向上层地主们做统一战线，同时在下发动与教育当地农民，所以，当地“农救”大多是把握在地主手里。

四、妇女组织 原决定在“青救”开代表会之后，召开“妇救”代表大会，现在战争如此发展，恐难实现。妇女领导系统尚未建立起来。

五、党的发展 现无新的精确统计，大概苏鲁[边]及豫西党发展到各将近 2000 人，豫南不足 1000 人，豫中 500 人，郑州中心县委 120 人，豫东南二月前 40 人，合起来大约有 5000 同志到 6000 同志。中央发展党员的决定已经传达下去。

六、新同志教育 已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开封市委专门找了一个教育干事，将每个支部的新同志都轮流训练了一下。

七、宣传工作 目前河南的宣传工作，主要的在于指示群众的出路。目前河南广大群众都感到彷徨无依，省委拟立即发表一个告民众的文件。《风雨》杂志现在多少起了一些党机关杂志的作用，在河南的影响尚好，拟仍继续出版。各特委及中心县委大多有自己的公开的言论机关，在豫东利用《豫东民运》，在豫西利用××报副刊，在叶县、舞阳都有油印刊物，用群众团体名义出版的。

第三部分 河南游击战争前途之估计及目前党的任务

我觉到以下这些条件，可以决定河南游击战争有大规模开展的前途：

(一) 河南民众已有觉醒，并且在过去 10 个月中多少有些准备了。现在许多地方，在敌人未占领之前，已经将游击队准备好，这是过去华北所没有的。

(二) 目前河南统一战线有相当开展。第一战区政训处，洛阳、淮阳、郑州三个专区的专员；以及好些县长，统一战线[关系]已建立好，并有一些同志和群众做县长与区长。对于河南省政府及省党部部分的统一战线亦有了一些。

(三) 河南有伏牛、桐柏及大别三个山脉，地势比之太行山并不太差。同时枪支多，民众都会使用武器，这是其他地方很少的。

(四) 过去党有基础的一些军队大多退到河南，这些军队如汉口失守之后，很少可能南渡的，其前途大都是在河南打游击。

(五) 党与群众基础比之华北转变为游击区时并不少，恐怕还大些。虽然华北党是好多年保存下来的老基础，而河南则是初

创的。

今天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加紧准备与继续发动开展河南的游击战争。在这个总任务下，河南党必须立刻进行以下几项工作：

（一）立刻创立 1500 人到 2000 人的新四军，作为领导全军区的游击队的骨干。

（二）加紧准备豫西山地游击战争，立即准备与建立起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三）支持豫东平地游击战。不过估计到平地游击战的总后方不易建立，故须要与山地密切配合。

（四）加紧对友军工作，争取我们有工作基础的友军留在侧翼打游击。

（五）特别加紧发展青年、农民二[大]群众组织。

（六）大量[发]展党并加强新同志与干部教育。

（七）继续开展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尽量推动专员、县长号召打游击。在广泛统一战线的游击战争中建立我党的领导。

我相信，在中央与长江局正确领导之下，继续努力下去，河南游击战争有胜利开展，一直发展到由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的前途，和冀察晋边区一样变为华中抗战的有力根据地。

给苏鲁边特委的指示信

(1938年6月19日)

省委赞扬你们的艰苦奋斗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你们1933年和组织失掉关系之后，在各种困难条件之下，继续独立的工作，并且自动的去恢复与联系过去徐海蚌属²的一些关系。这种精神，希望你们能继续发扬光大，为中央给予你们的新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关于目前政治情势、任务及白区工作的方针，在毛泽东同志的提纲及洛甫同志的报告中，已经详细的指出，望你们根据这些指示来布置工作。在这里，我们只根据××同志的报告，给予你们以下的一些建议。

一、你们所处的地区，在国防上将是很重要的地区

由于接近海口，由于两大铁路的贯串，由于这里有重要的工业（中兴煤矿等），所以，苏鲁边在中日将来战争中必然成为日本进攻侧翼上的重要目标。现在日本[人]正在那边积极的侦察，组织游击特务活动等，决不是偶然的。放在你们面前的第一任务，便是迅速的把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为了执行这一任务，你们可以做而必须做以下的一些工作：

（一）抓住目前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事件，抓住日寇对当地的各种阴谋与暴行，抓住关外回来的农民在满洲受日本[人]压迫的各种事实，进行广泛的宣传，号召群众的反抗运动，养成日军

¹这是朱理治为中共河南省委起草的。

²徐海蚌属，即徐州，海州，蚌埠及它们所管辖的地区。

一到即誓死抗战的心理。

(二) 当着当局与军警进行各种对国防有利的建设与活动(如航空演习、建筑国防堡垒、破坏日本间谍机关等), 我们应当积极的参加、赞助这种行动。同时, 向当局与群众提出对国防有利的合理的意见, 来推动与组织群众, 进行更彻底的更有效的建设。

应当依据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必须克服那种认为过去叛变的都是知识分子, 因此知识分子不中用、靠不住的观念。要知道, 在过去虽然有一些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叛变革命, 但这只是个别的。整个的知识分子, 整个的小资产阶级在今天抗日运动中已经起着并且还在起着抗日的烽火台与播音机的伟大作用。必须将枣庄与徐属等地的学生、教员等组织起来, 利用你们过去很宝贵的经验, 争取各种合法的公会、商会、合作社、国拳团等领导, 利用旧形式来灌溉新的抗日的內容, 运用华北组织“民先”的经验, 形成青年的救国的统一战线的组织, 使这些组织和工农群众的基本组织汇合起来, 形成抗日的坚固阵线。

(三) 细心的研究与了解统治阶级的政党, 军警内部的情况、矛盾、计谋, 团结其中的左派, 联合中派, 分化右派, 打击亲日分子与极右派, 扩大与巩固苏鲁边的抗日阵线, 转变当地的统治, 使其在抗日派的领导与影响之下。

二、没有工人运动的开展, 便不能保障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

你们过去在矿工中, 已经有相当的成绩。过去你们能够经常注意工人日常的要求和斗争, 这是很对的, 但还要注意到以下的几件事的改进:

(一) 斗争条件的提出, 务要依据当时主客观力量的对比。例如矿山规定每日 8 小时工作(如下午 2 时上工, 10 时散工),

但资方因为上下工的原故，要工人提早 2 小时上工，即是要工人在上午 12 时上工。上下工只有一个半钟头就够了，所以工人单就实际工作时间已是 8 小时半了（除上下井一小时半不算）。当着工人阶级力量尚没有很好组织而资方也没有处在极端困难之时，我们如提出反对提前 2 小时集队，资本家非拼命镇压不可；而参加[斗争]的只能是少数分子，斗争必失败。过去斗争不能成功，这是很大原因。假如我们提出下午 1 时上工，实做 8 小时工，则这个斗争便容易得到胜利，然后在有利的条件下，再提出较高的条件。

（二）斗争中要注意建立工人阶级中的统一战线。例如要“花红”的斗争，我们便要注意到如何注意提出里工的要求，使里工与外工共同行动，至少不至于反对外工；同时亦要注意到如何和矿警等建立统一战线，这样来保障斗争得到胜利。

（三）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特别注意到黄色工会的工作，把我们的同志与赤色工会的会员，一起加入黄色工会，争取选举组长的位置与委员，使黄色工会的领导转变为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赤色工会不必另行成立，只是应当把左的群众团结在我党同志的周围，同时注意利用俱乐部及工人子弟学校来组织工人。

（四）要注意到其他二个矿的工作，形成三个矿的统一战线。

（五）党的支部应发展到各个行[业]里去，特别要发展到内工的重要部门，如电务处、机械处等，支部的小组应当依生产部门来分，不要乱编。

党目前要用最大的力量，利用过去创造矿工支部的经验来开创两大铁路的工作。

三、没有千千万万的农民参加抗日阵线，则反日民族革命战争决不会胜利的

要吸收广大农民参加抗日，就必须为改善他们的政治经济生

活而斗争。为了建立健全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决定放弃过去的没收地主土地与暴动的政策，但在农村中领导农民的日常斗争决不能放弃。

你们过去在农村中采取不断领导农民日常政治经济微小的斗争，这很好。但在新的情势前面，为着建立广泛统一战线，你们领导斗争的策略与形式须要有一些改变。

(一) 斗争的策略，应当更多的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例如农民没有饭吃，我们可以合法的请求政府和地主实行救济，要求减租减税。在这种合法的纲领与方式下，来团聚更多的群众，威迫地主与政府实行救济与减租税。目前合法的范围还是异常窄小，这种合法要求，每每不易实现。如合法斗争不能成功时，我们就要采取非法的分粮吃大户与抗租抗税的斗争方法，用非法的方式达到农民的要求。但是这种非法的斗争，不是为着要推翻政府与地主的统治，而是为着要逼迫政府与地方实行接受合法的救济农民的要求，达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的阶级合作，一致抗日的目的。由合法到非法，由非法到更高度的合法，我们将在这种不断的斗争中，来扩大合法斗争的范围，使得合法斗争的方式成为将来斗争的主要形式。

(二) 为着要建立农民中的统一战线，你们在农村中的组织形式亦应当有所改变。目前，应当利用各种旧的形式来组织农村中的统一战线，其中包括雇农、贫农、中农与一部分的富农。你们过去的穷人会，只是一种贫农团的性质，只有贫雇农，甚至于中农也很少。所以穷人会必须在性质上有彻底的转变。

(三) 农民协会是一种农民的经常组织。斗争起来之后，我们可以根据斗争的共同纲领来组织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农民斗争委员会的组织。例如，要求救灾，反对某项苛杂。我们不但可以吸收贫雇农参加，而且可以吸收个别的小地主来参加斗争的组织。

(四) 在建立农村中统一战线时，务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雇农工会的组织必须抓紧去组织。

(五) 在组织农民时，应当特别抓紧利用旧形式，灌输新内容。例如山东的乡童子校、□□会、壮丁训练班、鸡蛋会、盟兄弟、拜姊妹、武卫团，江苏的民团、大刀会、香火会等等旧的组织，我们[都]应当打进去，进行抗日的宣传，取得其中的领导。

(六) 摆在你们面前的另一大的任务，便是进行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在你们地区及左右有很大数量的军队，这包含山东的李桐萱师，江苏的东北军、胡宗南以及黄杰的一部。你们对于国军工作过去虽然是做了一些，但是异常的不够。今后要把这一工作作为你们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在进行国军的工作中间，你们首先要转变过去瓦解国军的政策。必须告诉我们已有组织的一部分国军群众，你们不是离开这个部队去抗日，而是要在这个部队之中团结更多的抗日分子，转变整个师为抗日的军队，应当坚持巩固这些部队与争取其抗日的方针。

在这种新的方针之下，你们应当更多的采取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利用各种公会与××会，去接近这些部队中的官长，了解其部队情形，提高官长抗日情绪，团结抗日分子，经过这些分子来推动军队中的工作，来改进士兵的教育与待遇。我们同时动员群众进行对士兵的宣传，实行联欢，慰劳，以提高其抗日情绪。把党的公开的刊物与革命的刊物输送给军队，这是军队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经过这些工作，进行部队内部党组织的建立。

四、最后，关于组织问题，只向你们提以下几个意见：

(一) 中央给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即是要你们恢复徐海蚌的党，望你们利用过去恢复沛县工作的经验，去恢复那边的工作。

(二) 目前教育工作是你们那边组织工作的重要一环，应当

立刻抓紧训练班、列宁小组的创办，提高同志的学习精神，将这次党大会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做深入的传达与解释。

（三）过去有些群众领袖入党之后，反而变[得]不能活动，这原因决不是因为加入了党的原故，而是因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混淆的缘故。以后，必须把作公开工作的群众领袖，解脱党的秘密活动，为着便利他的活动，只要个别的负责同志和他发生关系，完全保持他的公开的合法的地位。这样，他们虽是加入了党，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公开活动了。

（四）养成下级党部独立的工作精神，这是必要的。应当纠正过分干涉下级的活动，应当把党的总方针使他们了解，让他们放手去做。但同时，我们的领导决不能走到放任与自流，对下级党工作执行程度要经常的检查，适时给他们正确的指示。对下级组织的领导，采取和负责同志个别谈话[的方法]是可以的，但亦不是绝对的。必要时，应当参加下级会议，找其他同志谈话，只要秘密条件没有妨害的话。

豫东南要加紧游击战争的准备

(1938年6月20日)

省委听了××同志报告以后，认为豫东南党在同志努力之下，已经初步的打下了今后开展工作的基础，虽然因为过去组织不紧密，以至在同志间发生不信任的现象，工作不免或多或少的受到阻碍。目前，豫东南已经成为保卫武汉战略上的重要地区，这一地区有迅速沦为战区的可能。因此，省委号召全体党员一致的在中央路线之下，在豫东南特委领导之下，团结的象一个人一样，加紧自己的准备工作，以便发动和开展豫东南的游击战争，这是目前迫不及待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省委提供以下的意见：

一、目前情势紧迫，党的工作布置必须抓住中心。根据[豫东南]以息县、潢川、商城为中心，将来游击战争的总的中心可以布置在商城、经扶^②。党工作发展方向应当向南，游击战争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夹击浦信公路的敌人。

二、组织游击战争的方法，应该公开合法的去做，首先自上而下的去做。抗日的县长、军长、科长、实习队、区长，来组织训练国民抗敌自卫团，组织自卫军，要在敌人未来之先加以训练和组织。另一方面经过训练班将各团体来加强与巩固其下层力量。

^①这是朱理治为中共河南省委起草的关于豫东南工作的决定。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经扶，今新县。

三、应当加紧对各团体工作，特别注意组织发展[农民]救国会与青年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必须使之建立本身的日常工作，在保持农民切身利益的基础之下，去发动与组织他们，号召他们起来打日本。青年救国会或其他青年团体，必须是公开的，使之真正的能够团结广大的青年群众。这些青年组织应在豫东南成立青协会分会，把全河南青年组织统一与团结起来。估计到将来这一带游击战争必定有友军参加作为基干，因此，友军工作[应]成为发动游击战争的主要工作。

四、“民先”的组织要转变为广泛的青年群众组织，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用很好的方法去说服“民先”队员。应当在“民先”中发展一批同志（半月内发展150名），其余的“民先”使之转变为青年救国会。严格纠正“民先”中第二党的倾向，使“民先”队员成为青教会的中坚分子，使青教会成为真正的青年群众组织。

五、巩固与发展党，大批的正确的发展党员，在一月以内发展400名新党员。同时建立党的支部生活，了解每个党员的政治面目，严密党的组织。

六、立刻形成豫东南的总的领导机关——豫东南工委会，以徐智雨、周新武、濮思登、冯新宇、冯继新五人为委员，苗勃然、刘道安为常委。

给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的两封电报^①

(1938年6-7月)

6月29日电

省委对游击斗争分以下三区在布置：

(甲) 豫东区，以西华为中心，现已集中 3000 武装，其中 1000 完全在党领导下，同志成份[占]五分之一；其余 2000 亦在党领导下。武装有手提钢枪、少年先锋队、自卫队、姐妹团、老婆队、儿童团、老年团差不多全都组织好。下管 4 个区长，3 个是同志，一个是同情者。县长跟我们走。每县在省委代表领导下有 1000 武装。淮阳在县委书记率领下，有 100 武装。永城曾发动 3000 自卫队与正规军配合作战，牺牲很大，现已瓦解。商丘、虞城、夏邑在民运指导委员宋克宾指导下，各有 700 人。党领导作用正在改进中。现在，我们准备派留守处^②一连武装用新四军 4 支队游击队名义，在豫东配合西华游击队向敌区行动；同时，在西华组织 9 个支队，分遣到豫东各县游击。在上层，推动与帮助二区行政专员宋克宾及七区专员刘莪菁，发动全豫东游击。

(乙) 苏鲁边区，以枣庄矿工为骨干之游击队，现已扩大到 1000 人。在抱犊固一带，现正由省委委员郭子化同志领导。

^①这是朱理治起草的以他和彭雪枫名义发出的电报。

^②留守处，指新四军第 4 支队第 8 团队竹沟留守处。

丰、沛、萧、砀^①四县游击队均已发动。丰、萧、砀三县据报告各有400人。沛县我发动1000人，打了一次仗，只余400人。石友三部下的基础很强，由张友渔同志率领，已留在山东打游击。57军党亦有相当基础，现已留在苏皖边。

(丙) 豫西南区，在确山、泌阳、信阳、桐柏交涉地区，原为我们游击区域，现在战局迫紧，统战开展，谋将[这]一区实权收回。现在能号召起来的武装有数百支[枪]，决定向南发展，以便恢复过去襄、枣、宜^②游击区。[再]南只有3000民众武装，颇有相当把握。源县有一区长是同志，能把握住1000武装，决定这一地区向淅州^③荆紫关一带发展。舞长、叶筮、遂平^④一带，群众很好，党亦可把握住一大部份武装。在铁路以东以汝州^⑤正阳为中心，亦有相当武装基础。

(丁) 豫东南区，党尚在开创时[期]，现在各[县]已有相当基础，唯干部太困难。

(戊) 豫西区，党的基础最好，约有2000同志，和第一战区政训处巩洛^⑥警备司令部及郑州、洛阳行政专员均已建立统一战线。有两个县长是左倾群众，3个县长是□□□。那边地势好，枪支亦多，故省委已[派]一部分同志组织代表团前去领导，详情日后报告。

为加强对全省游击队的领导与创立在我党领导下的游击基干

①丰、沛、萧、砀，即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前两个县在今江苏境内，后两个县在今安徽境内。

②襄、枣、宜，即襄樊、枣阳、宜城，均在今湖北境内。

③淅州，即今淅川。

④舞长，即今舞阳；叶筮，即今叶县。

⑤汝州，即今汝南。

⑥巩，即巩县；洛，即洛阳。

部队起见，决定在沟竹^①于7月半前，创立500人的部队。目前最大困难[是]缺少有游击战实际经验[的]干部数百人，深望中央先派一批。省委及理治已移来竹沟一星期。

^①沟竹，即竹沟。

7月15日电

(一) 新四军4支队游击大队已于今日开赴西华一带，由望东¹同志率领，推动与领导豫东游击战争。我们决定在西华、扶沟、杞县一带组织9个游击大队，分别挺进到豫东、皖西北边境敌人占领区域；同时，推动豫东专员刘鏖汉、峻陴克、宾号有向豫东游击，作聊城范筑先第二。

(二) 豫西特委分4个游击区来布置：

第一，以荥阳、禹县、密县1万多农会会员为基础，大多有枪支。

第二，[是]洛阳、偃师、巩县、登封[为中心]。此地区有4个区长[是]同志，已有4个中队义勇常备队，有千余党员。

第三区以洛宁为中心，包括陕县、渑池、新安、卢氏，武装工作已有相当准备。

第四区是临汝²、鲁山、宝丰。正在开始中，但这是中心地区，并有伏牛山脉。东面[以]舞阳为中心，西面以镇平为中心。工作布置前已电告。

现在请求：

(1) 中央派有游击经验的同志来。

(2) 最近党员发展将及6000以上。

(3) 以□□为中心的豫东南，以镇平为中心的豫陕边及以舞阳为中心的豫中，均可于短期内建立特委，缺少有经验的干部，应从党校调出9个能担负特委书记及中心县委书记的前来。现在豫西特委及豫东南、豫陕边军委[书记]尚未找到，恳予派来。

¹望东，即肖望东。

²临汝，即汝州。

（四）请派 10 名无线电报务员及机务员来。

（五）西北干部请直送长江局。豫西方面干部，营连级需要 50 人，请由西安办事处直接送豫西。其余连营团军政干部及师参谋长等干部，请直送确山竹沟。

给豫西特委的指示信^①

(1938年7月10日)

听了陈^②同志的口头报告及看了你们书面报告，[感到]你们党委最近开展的思想斗争是正确的。你们反对了过去个人领导方式，组织上的马虎现象，干部政策的上层知识分子观点，克服了工作上的散漫紊乱现象，并反对了小资产阶级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同时，省委同意你们领导机关所进行的改造，并同意你们的工作计划，认为这一切是豫西党开始走上布尔什维克化的保证。

但必须指出，这种转变还只是开始。今天豫西党的工作，还赶不上日寇进攻豫西形势的发展。为完成保卫豫西的总的政治任务，为要使豫西党走上最后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豫西党须有更大的努力。

首先是统一战线工作。过去统战工作虽有些成绩，但是在统一战线的运用上仍有以下几个缺点。第一，是对统战工作缺少坚持性。对统一战线对象的分析，没有从本质上去把握，而只是看到一些现象。因此今天估计这个人好，明天又估计这个人坏；今天抓紧了他，明天又放弃了他；今天捧他上台，明天又拆他的台，甚至于不耐烦再进行统战工作，要求仍回到过去内战时代兵戎相见。这样动摇不定的态度，自然很难建立与巩固统一战线，很容易中敌人的挑拨离间。第二，统一战线要求我们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人，去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很明显的李××是你们

^①这是朱理治为中共河南省委起草的。

^②陈，即陈少敏。

应当联合的人，而且因为他是地方实力派，更应当用一切方法联合他。但是，我们在策略方面，有些地方非但没有能抓住他到我们方面来，反而推他走向和死硬派相联合。因此，敌人增多，自己陷于孤立。而对当前最大敌人的日寇、托匪，便也无力打击他们。第三，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艺术，要能够了解到对方今天所处的环境及其今天政治觉悟的程度，不要要求他们过高，而同时又要时时在实际工作上给予他们以帮助。这样，自然他们是乐于和我们联合，愈久而愈巩固，愈巩固而相互得益亦愈大。我们好多同志，对于我们联合的人每每要求过高，不顾虑对方困难，责备太苛，而自己对他们并无实际帮助，反增加他们好多困难，因而使已联合的人，中途又离开我们。第四，许多地方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仍相混淆，公开与秘密相混淆，党与统一战线相混淆，结果使得统战工作受到意外打击，上层方面也深深的遭受损失。

统一战线工作是今天豫西党工作开展的生命线，假使党不能正确的建立上层统战工作，要胜利地完成保卫豫西，准备发动全豫西游击战争的任务是不可能的。

因此，省委向豫西党建议，要求全党更大的注意上层统战工作，学习上层统战的艺术，把统战的教育作为党的第一等重要的教育。谁要是破坏统战工作，并坚持自己的错误，必须受到党最严厉的批评，党内开展斗争以至于撤职直到开除党籍。特委及各地的组织部，应当加以健全，派得力同志去工作。

第二，军事工作。今天豫西党的中心任务，是加紧武装群众的工作，准备全豫西的游击战争，其他各种工作均要围绕这一工作的周围。对于这一工作，我们认为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一) 抓紧已经有关系的 4 个常备中队的政治军事教育，把这 4 个常备队把握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抗战部队中的中坚部队，能够经常的单独进行袭击敌人的游击战争。还应注意常备队

有可能调动补充正规军，因此我们武装的中心应该是人民抗敌自卫团及民众自己的武装，尽一切可能加紧抗敌自卫团的动员与领导，它是发动游击队的基本力量。多多动员工人分子参加自卫队，加紧游击队中的无产阶级领导。你们应首先抓紧×几个区的抗敌自卫团的领导与动员，加强×个联保主任的教育与领导，加紧创造自己管理区内的武装力量，作为自己的基本武装，推动豫西的游击战争，抓住×几个中心区，创造各区的游击队。县应抓紧农会的武装，创造一个游击支队。

(二) 为了创造几个中心游击支队与游击区，现在特委应有计划的划分几个中心游击队。我们认为豫西大体可分4个游击区：密县、荥阳、禹县、郑州等县为一区，以密县为中心。洛阳、偃师、孟津、登封、伊川等县为一区，以洛阳5区、登封3区为根据地。临汝、伊阳、宝丰、鲁山、嵩县等县为一区，临汝、嵩县为根据地。宜阳、洛宁、灵宝、陕县南部、卢氏、嵩县等县为一个区，以洛宁、嵩县为根据地。各游击区创造各游击区的游击支队。为了加紧武装工作，军事干部已成为非常迫切问题。除省委想办法调军事干部外，你们应有计划的把各个游击区有军事经验的干部加紧训练，或调集[到]特委专讨论军事布置与动员等工作。

(三) 友军的工作。豫西已是军事政治集中的地方，大批中央军及其他军队在豫西驻扎，无疑的，他们也准备在豫西打游击。你们除了加紧武装、创造民众武装外，还必须加紧友军工作，派有军事常识的干部到友军中担负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加强抗战教育，与广大的游击队及民众武装打成一片，实行军民合作，坚决抗战到底！

(四) 封建团体的武装工作。豫西封建团体非常多，你们应抓紧这一工作，创造民众武装，增强抗战力量，免其受汉奸利用。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都是些封建的武力组织，你们首先抓

紧红枪会豫西办事处及其首领的联络，尽量帮助他们，鼓励他们领导其会众积极抗战。派干部到其会众中加强抗战动员与教育，加强其军事训练，逐渐破除其迷信观念，争取其下层干部分子到我们这方面来，受我们的指挥与领导，加强我们在其会众中的日常工作。创造出健全的民众的抗日力量，利用各种方式联络与创造几个有力的可靠的同盟军。

第三、群众工作。为要开展游击战争，必先加强群众工作。群众是水，游击队是鱼，没有水便无从产鱼。今天豫西党的群众基础是相当的薄弱的，有些县份竟至群众组织还比党要小些。许多地方虽有很多群众的组织，如学联，却听其自生自灭。对于各地的青年农民的群众组织，缺少有计划去领导。这一切，证明着没有学会如何把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们要求特委今后特别注意以下三种群众组织：

（一）加强对各地已有的农会及农民救国会的领导，并使这些组织普遍起来，建立其自己的领导机关。只要上层统战工作能够做得好，这些组织是能够建立的，特别在那些抗敌后援会已在我党的领导之下的地方，更应当深入的去组织农民。假如一时不能建立的话，可用其他各种名义来组织他们，如联庄会等等。同时，短工会、长工会还可尽量地发展。

（二）工人工作。首先应加强铁路工人的工作，加强其政治领导。事实证明，豫西党的工作中最强的，在党的组织中在群众组织中最有力量、工作最切实的，能独立工作的还是“工支”^①。日常工作，日常斗争，仍是工人占第一！沿陇海路的工运，应有计划的推动。特委不仅自己领导工委，而且应经常参加“工支”，帮助他们布置检查工作。同时，工人武装组织应特别加强起来，以“工支”[为]基础扩大工人武装组织，创造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

^①工支，即工人支部。

游击队，在游击战争中起无产阶级骨干作用。应以×站为中心发展全陇海路的工运，从铁路工人同志中提拔专[人]负[责]铁路工作，把工委迅速加强起来。

(三) 青年工作。应按你们的布置迅速有系统的推动豫西青年工作。把各县委青年部加强起来，提拔活动的青年同志担任青年工作，把那些有名无实的青年[部]长撤销之。

(四) 妇女工作。特委要有计划的领导各界妇女联合会的创办与组织。在有党组织的地方，应普遍建立妇女救国会，尤其应组织广大劳苦妇女到妇教会去。加紧训练妇女干部，健全豫西各界妇联的领导。

第四，组织问题。豫西的组织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至今仍缺乏战斗的严密的组织，希望你们马上切实的整顿豫西的组织。

(一) 首先自上而下的推动各县切实整顿组织，各县领导机关正规化，不要多设空头机关，使领导机关庞大而无战斗性。县委干部应深入群众中去，加强支部领导，帮助支部健全支部生活。加强党的基本教育，脱离群众的工作人员应尽量减少，下层干部不脱离生产。

(二) 大胆向工农阶级及劳苦大众开门，大量发展工农党员，尤其[在]铁路工人中，应大批吸收积极分子到党组织中来，调剂豫西党的成分。×县农民积极要求入党，可大量吸收雇农、贫农、中农入党，大批提拔工人干部及农民干部，扩大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在农村中广泛的开展组织农民抗战团体与武装。

(三) 豫西党的组织在铁路沿线占多数，一旦战争到来，首先失掉根据地。今天豫西党应有计划的向南[及]西南发展。伊川、宜阳、洛阳等县应马上派得力同志到南阳、伊阳、临汝、宝丰、嵩县等发展。西南应以洛宁为中心向卢氏、嵩县等县发展，组织××、××县突击队去开辟工作。必要时你们从经费中拨一笔经费作为开辟费，把各县党[组织]中具有关系的同志派到这

些[地方]去开辟工作。

(四) 正确的执行干部政策。过去豫西提拔干部没有按正确的路线走，把来历不明的分子提拔到特委中来，结果不仅未能加强特委，而且使特委不一致，削弱了特委领导。“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没有观念正确、工作积极的干部，一切漂亮的决议都是空谈。你们应马上有计划的从实际工作中提拔一批观念正确、积极、能吃苦耐劳的工农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来。从铁路工人同志中提拔能吃苦耐劳、观念正确的同志任特委职工干部（象小宋这样的干部只管大胆提拔），从各学校中大批提拔学生干部领导学生工作。绝不应把工农同志认为没有知识不会说漂亮话而不提拔工农干部。反对一切带私人成分的干部政策。特委要切实了解干部的真实面目、能力、个性、思想、日常生活情形，有计划的考查干部，教育干部。

(五) 报告制度要切实执行。特委、县委要切实了解全部工作执行程度，组织动员的程度，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群众对党的认识等具体情形，才能够具体布置工作，才能够使计划百分之百完成。各县的组织，组织的优点、弱点成份，党员数量，组织散布在那些地方等，你们都应切实了解，并希望你们也经常向省委做具体报告。最好能把各县的报告拿到省委，方便我们具体了解各地情形。

(六) 建立中心县委并加强中心[县]的领导。我们的意见最好根据游击区的划分建立中心县委。特委应具体分工，各负一方，加强地方领导，尤其应马上有计划的建立特委根据地。

(七) 领导方式。包办一切是豫西党领导工作的特点。这种领导方式是非常有害的，特委虽已改正，但这种领导方式各县仍存在着。官僚主义领导，绅士态度、调和态度等不良现象，在豫西党内仍严重的存在着，特委中也并未彻底肃清这些恶劣现象要建立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风，切实了解实际情形，具体帮助下层

同志布置工作，抓紧中心工作，有计划的布置推动全部工作。

(八)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作上层公开工作的同志，仅特委常委知道即可。在行政系统内，在军队内工作的同志，党内应把他秘密起来，不应使大家都知道他是“自己人”。作上层工作的在行政系统内、军队内的同志，同样不应知道地方党的组织，更不应参加党的秘密会议，不应往党[的]机关跑。绝对避免发生横的关系，严查党的决议传到党外的原因，把党的秘密组织切实的严密起来。

(九) 开展思想斗争。“老佛爷的容量”在某些方面是好的，但在某些方面则非常有害。豫西党的自我批评，实质上是没有自我批评。为整顿豫西党，[使它]成为一个战斗的党，必须切实执行党的纪律，彻底的普遍的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斗争，实行自我批评，自我检讨。把各种不正确观念，给以无情揭发与批评。批评的方式尽管用说服教育方式，但对任何错误绝不能放松，务使在实际工作中彻底纠正。如有个别分子，经过说服教育工作后，仍不坦白接受批评、承认错误时，即应执行组织制裁，并拿到全党中讨论，教育全党同志。

以上几点意见，或许是你门已经注意到的几个问题。为使豫西的全部工作有迅速的开展与转变，我们特别再写此信，向你们着重提出。希望在各县委、区委、支部中开展热烈的讨论，具体实现之。同时，向你们提议把以上几项工作的完成，作为下月检讨豫西工作的尺度的一部分。

特委及全体同志们！日本强盗的进攻，一天比一天猛烈与残酷，豫西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与严重。我们必须要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行动起来，站在中央的正确路线上，为民族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论河南游击战争发展形势及当前任务^①

(1938年7月21日)

一 华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

谁都看到了过去一年来华北游击战争所获到的光辉成就。这些游击队伍，配合了正规军，消灭了好几万敌军，拯救了华北几千万民众的生命财产，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到现在，竟威胁到北平、太原、保定与济南的寇军统治，甚至于发展到“满洲国”，逼使日寇不得不动调关内的驻军赶赴关外，去对付华北派去的游击队伍。

如今，敌人的铁蹄已经深入到华中，江淮河汉之间已有不少的领土被敌军占领，已有几千万民众处在沦陷的区域。并且，目前敌人战略方针是以夺取武汉为中心。为了夺取武汉，寇军必定在江淮河汉之间实行进一步的进攻，以便切断平汉、陇海，迂回武汉，同时，使江淮河汉间这三大地区，作为敌军的后方。

因此，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这一地带的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准备，便成为抗战中的迫切问题了。因为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的开展，对于华中战局与全国抗战有以下重大作用：

第一，江淮河汉间游击战争的发展，是保卫武汉的重要方针之一。我们知道，保卫武汉，单只靠武汉卫戍区从敌人进攻的正面来抵抗敌人是不够的。过去南京、太原陷落的苦痛教训，早已

^①这是朱理治写的一篇文章，原载1938年8月7日《新华日报》。

经告诉了我们，要保卫武汉，必须要在敌人进攻的侧翼后方，发动广大的游击战，破坏与切断铁路及沿江交通，困惫敌人，调动敌人，“将敌人后方变为前线”，这样，“敌人进攻愈深，则我们在敌人后方游击活动的范围就愈大，敌人如退守后方，向游击地区围攻，则我卫戍武汉正面的部队活动范围及出击的机会就愈多。”（见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我们对于保卫武汉及第三期抗战的意见》）只有这样配合起来，才能取得保卫大武汉的胜利。

第二，发动游击战争，是江淮河汉之间一万万以上民众坚持抗战的主要斗争形式。在游击战争普遍发展中，我们可以部分的恢复已失的国土，恢复旧有的政权，创立与扩大自己的武装，坚持和日寇作战。即令万一武汉失守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一地区持久作战。

第三，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的发展，将使傀儡政权在被占领地区无法巩固其汉奸政权，因而也就不能实行有计划的榨取、开发和掠夺这一地区的经济和资源。

第四，这一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展，打破敌人扫荡黄河两岸的计划，支持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同时，牵制了敌人向西北与江南的进攻。

第五，江淮河汉游击战争的发展，将日益转为正规军队，在不断的战斗中壮大自己，将来可以配合全国情势，实行胜利反攻，收复华中失地。

二 华中游击战争特殊有利的条件

在发展华中的游击战争时，有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一、日寇经了一年的打击，已经日益显出精疲力竭的状态。现在战线日益延长，敌人兵力更加分散。目前因河水泛滥，同时

因为江淮之间山势起伏，故华中寇军大量向江南调动，在后方的兵力更加空虚。因此，更加有利于我们游击队的活动。

二、江淮河汉间的民众已经有了一年的准备。这一年的抗战已经大大的教育了这一万万的民众，已经大大提高了其抗战意识。同时，在许多地方，民众游击战争已经有了一些准备的工作。

三、目前华中发动游击战争，虽然没有八路军直接参加，但是却有八路军和其他国军在华北所创造的胜利的例子。冀察晋等区域的光辉的例子，告诉江淮河汉一万万的民众，民众自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不仅是存在，而且有光明的胜利前途。这对于华中游击战争，起着无比的推动作用。

四、在地势方面来说，江淮河汉之间虽然有一大片平原，但是在这大平原的西北，有深厚的伏牛山脉，在南面有大别山脉，在西南有桐柏山脉，在东北有中条山脉，这四个山脉，围绕着中原大平原的四周。若能发动游击战争，将这四个山脉作根据地，向着中央平原去游击，则整个中原大平原将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而且，中原大平原决不是平白如镜，中间还有起伏与湖泽地带，同样便利于游击。

五、江淮河汉间的民众，不只是有过去国内战争时代的游击战争的经验，而且还受过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洗礼，直接参加过大革命的战斗，因此有革命的光荣传统。

六、江淮河汉之间不只是有一万万的广大民众，不只是有丰富的物产，不只是人民善于使用武器，而且还有几百万民间武装，这些都是开展游击战争特殊有利的条件。

七、经过过去一年来李司令与程司令^①的努力，在安徽、河南的政治，多少已经有了一些改进，虽是这些改进还异常不

^①李司令，即李宗仁；程司令，即程潜。

够，但是不管如何，比之过去华北游击战争发动的时候是已经好多了。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最近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将使这一地区政治大步的改进，将使各党派的合作更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

八、在华中不仅有长于游击战争的新四军在各地帮助民众发动游击战争，不只是有其他的国军留在敌人后方继续抗战，而且随着战争情势的发展，必定有强有力的部队，派到敌人后方去帮助与发动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的。

以上八点，是华中游击战争特殊有利的条件。所以，我们说华中游击战争有大规模开展胜利的前途。但是，这并不是说胜利会自然到来。要获得这个胜利，还需要我们政府和民众正确的领导与艰苦的奋斗。

三 江淮河汉间游击战争开展的现状

目前江淮河汉间游击战争虽是才开始发展，但是已可以看到很光辉的成绩。例如，苏鲁边界的游击队伍，一部分曾英勇地参加鲁南的会战，取得台儿庄的胜利。这些队伍，以枣庄的矿工为骨干，在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领导之下，在鲁南山地建立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其另一部在丰、沛、萧、砀等地，曾英勇地进行斗争，掩护鲁南大军的退却。苏北的游击队伍，配合了东北军不只进行了许多英勇战斗，而且收复了许多县城。当敌人进攻豫东时，曾遭受到永城、商丘等地民众武装的抗拒。在杞县、睢州、太康三县，在一个最著名的救亡领袖吴××先生领导之下，已经组织成几千个游击武装，不断打击敌人，以至使得敌人不敢出城。敌人驻在城内，游击队便在城外扩充。最值得模范的，要算西华的工作。那边不只全县都武装起来，而且全县的男女老少都一致的组织起来。依靠这一雄厚的力量，不只是阻住了敌人进攻，而且最近在淮阳专员刘××先生领导之下，由县长楚××先

生及民众武装首领胡××先生收复了太康县城。至于皖北一带，则有红枪会的英勇战斗，民众游击队的发展，特别是新四军4支队在高××、周××领导之下，不断袭击敌人，夺取寇军辎重，取得很多胜利，现已在敌人后方创立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来推动与领导全皖北的游击战争。

但是，必须看到，今天江淮河汉间的游击战争的开展，比之目前情势看来，是异常不够的。首先是游击战争太不广泛与普遍，好多县敌人没有受一点抵抗就占领了，占领之后3个5个人就敢于到村庄中为非做恶，一两连的敌人能够平平安安占领县城几个月，汉奸与维持会竟能顺利活动。这些完全反映我们游击队活动的不够。

其次，好些县长，敌人来时，非但不领导壮丁常备队及民众武装对敌作战，进行游击，反而闻风先逃。有的县长、区长领导了一些武装，实行“武装逃难”，最坏的是一些有野心的地方长官，平时不去耐心的动员群众，而只是采取命令的方法，收缴民枪，强拉壮丁，成立游击队，同时更借打日本之名，大派其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尤其坏的是到处收编土匪，乱委游击队的名义，造成许多官匪，引起民众极大的反感。过去蒋委员长曾经将河南干“这些好事”的首领加以监禁，可是这些无心肝的人们，当寇兵逼境的时候，又是故态复萌了。

再其次，是现存的好多游击队，因为缺乏经验，因为没有象八路军这样一个富有游击战争经验的部队的领导，所以无论在战线上，在部队的组织上，在游击队的政策上，都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如不克服，对于江淮河汉间游击战争的开展上是有很大障碍的。

最后，我认为没有准备，或是说准备太差。游击战争正和别的工作一样是需要准备的。有许多官长，虽是存心动员民众打游击，但是当着了日寇没有来到之前，不肯大刀阔斧的干，及至敌

人来到，手忙脚乱，想临时抱佛脚的来干一下便相当困难了。

四 怎样开展江淮河汉间的游击战争

根据目前情形，以及目前江淮河汉间游击战争的现状，我认为要开展江淮河汉间的游击战争必须抓紧以下几个实际问题：

一、开展敌人后方游击战争。（甲）估计到目前敌人正集中力量向江南增援并向鄂东进攻，在苏北、豫东、皖北，敌人后方极为空虚，我们应当不失去一分钟的时间，积极地开展游击战争。（乙）应当抓住有群众基础的游击根据地，创造出几个支队，到没有发动游击战的县份去活动，帮助那些地方组织民众，组织游击队。（丙）同时，政府应派得力部队组织挺进队，深入到敌人后方去，配合游击队，消灭残留的寇军，和山西一样的收复失去的县份。（丁）政府应当对于留在敌人后方与派到敌人后方的挺进队及当地游击队，给予更多的武器给养的帮助。（戊）同时，我建议在平汉线及各地没有失守的县份，组织一些挺进游击队及战时服务团到敌人后方去帮助游击队。这些武装可以是地方性质，到将来本地危急或失守时，仍回原地打游击。

二、准备敌人未占领区域的游击战争。根据过去的教训，立即抓住今天未被敌人占领区域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应当估计到江淮河汉间的各个县份都有很快的变为战场的可能。假使今天不准备，敌人来时，一样会手忙脚乱。要等到敌人占领之后，在维持会或傀儡统治之下，再来组织游击队伍，就要困难得多。

准备游击战争和武装保卫家乡与配合国军抗战的任务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愈是民众武装得好，愈能配合国军作战，则敌人来后，便愈有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反之，亦是一样，愈是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好，便愈有力配合国军作战。

怎样准备游击战呢？要尽可能做到以下几点：（甲）将壮丁

常备队或游击队，义勇军等等在事先组织好，准备好，那怕是10个人都可以，但至少要有一个人决心打游击，作为基本队伍。（乙）必须普遍的组织民众武装，有了这普遍的武装组织，方能准备出强大的游击队伍。（丙）这些武装，特别是准备变为游击队的武装要有充分的政治的军事的训练。（丁）要将当地民众组织好。（戊）要改造当地的政治，改善民众与政府、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建立各党派间的统一战线。其他如武器、给养等等多少亦要有些准备。能如此，则游击必定能发动，并保障其能发展。

三、确定游击队的任务。过去有好多县份，把刚才组织好的游击队当做正规军看待，要他正面的抵抗敌人，死守城池，结果一打即完。显然的，游击队的任务决不是这些。今天江淮河汉间游击队伍的主要任务，不外：（甲）破坏陇海东段，津浦与淮南铁路，截断长江交通，破坏公路、电线、桥梁。（乙）打击敌人零星部队，劫夺寇军辎重。（丙）肃清汉奸，破坏维持会。（丁）扩大自己，巩固自己，繁殖小游击队。（戊）组织民众的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儿童妇女团体等。（己）帮助地方政府机关，实行抗战法令，创立游击战争根据地。（庚）进行对民众及寇军士兵的宣传工作，揭穿敌军的阴谋诡计，宣扬我国之进步与胜利。

四、组织游击队应注意之点。（甲）游击队的组成，必须是民众自愿的，要切忌强迫加入游击队。（乙）将自卫队与游击队分别起来不要混淆。游击队不要太多，务要精干，但自卫队要广泛，愈多愈好。（丙）估计到今天平原作战的状况，要多组织脚踏车队与骑兵游击队。（丁）要灵活组织，便于化零为整，化整为零。

五、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一问题，需要另有专文讨论，我在此只提出目前已发生的不良现象，即是有些地方采用派款的方

法，或采用专摊富户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不适当的。游击队的给养，应当采取以下几种方法：（甲）如当地政府存在时由当地行政机关继续征收原有捐税。对于原有苛捐杂税则取消。（乙）没收汉奸托匪及日寇的财产。（丙）由民众自愿的捐助。（丁）非至万不得已时，不采取征发的方法。

六、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问题。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三同志认为保卫武汉及第三期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在于“人才问题”。这[从]我江淮河汉间游击战争的成败，愈益显示其正确。那一县有游击战争的军政人才，那一县游击战争[就]发展，那一县没有游击人才，那一县便不能开展。

确实有好多专员、县长等等对抗战异常有决心，但苦于无人材而无法开展。另一方面，亦确有青年虽有发动与领导游击的才干，而报效无门。为要消除这种矛盾，我提议：

一、从速将这一区域内的参政会成立起来，各党派更进一步合作，以便“遇事协商，共同合作，协力奋斗”，消除不必要的误会和磨擦。

二、澄清吏治，使许多在战区及沦陷区域不称职官吏从速更换，另提拔有为青年担负之。

三、政府应大胆的吸收各种人才，勿局限于一党一派。同时我们盼望一切有为的青年，消除任何的成见，帮助政府发动与领导游击战争。

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①

(1938年9月7日)

彭^②已于5日去洛阳。朱^③住××，经洛阳去延安。彭临走前，常委^④开会，对全省军事工作有如下决定：

(一) 军事工作重心移豫东。省委机关暂留竹沟，待延安会议^⑤后再决定。

(二) 战斗员此间只需留120人，武器需留80支，以便应付目前竹沟周围环境。

(三) 地方干部如王国华等，仍留豫南。左、汤如何，请复。

①这是朱理治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以他个人名义起草的。

②彭，即彭雪枫。

③朱，即朱理治。

④常委，指中共河南省委常委。

⑤延安会议，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一年来的河南工作¹

(1938年9月)

一、河南情势的特点

(一) 河南自抗战之后长久的时期处于战区及接近战区的地位。第一期抗战，豫北即早已沦为战区；第二期抗战，苏鲁边、皖北已经成为决战之地；第三期抗战之始，豫东沦陷。现在敌人又进攻到豫东南，豫西一带非常吃紧，河南已有一半土地沦为敌后方。假使武汉失守之后，敌人必然要大举扫荡河南。这个特点使得：(一) 民众觉醒的程度更加迅速普遍；(二) 更容易推动地方当局的进步；(三) 使抗日力量有比较华北更优裕的时间来准备自己，对付敌人的进攻。

(二) 河南过去是复兴社和 CC 的大本营，顽固派尚有相当的力量来阻迟河南的进步。刘峙在河南将近 10 年的统治，创立了相当强大的复兴社，其社员估计当在 10 万以上。所有联保主任、学校中的青年学生，大多被迫的或自愿的加入了复兴社。同时，CC 自称亦有 7 万党员。这些小派别过去统治着河南，使任何救亡工作都要遭到破坏。然而，这些组织总经不起抗战风暴的震动，而且日益走到紊乱溃散的危境。复兴社首领刘峙与肖洒失势了，下层党员大多数无形中脱离了组织，有一部分参加到了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来。国民党老党员李宗黄先生做了河南国民党中央特派员之后，虽是想积极的整顿国民党，但结果失败。河南省

¹ 这是朱理治写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

党部终于执行中央党部的命令，使国民党各级党部变成特务机关的性质，这使得国民党更加失去人心。为着要对付我们，CC与复兴社的顽固分子，一面企图互相联合起来，一面联合托匪、土劣及地方割据的实力派，极力向抗战势力攻击，阻碍政治的革新。托匪则密切勾结复兴社分子，特别打进到中央军和胡宗南、汤恩伯的系统中去，挑拨民众，反对政府，离间国共关系。汉奸维持会则和地方封建势力相依托，特别利用会门，并部分的打进到国民政府的机关中去。

（三）抗日势力的抬头。江河之间的李宗仁、白崇禧、程潜，一般的说来，对于抗日是坚决的。他们都是老国民党员，并且都不是江河之间原有统治者，所以都能相当开明。李、白二人因为自己有军队，所以在徐州会战时，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无所顾忌。徐州失陷之后，因各方牵制，顾虑渐多。程潜本人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表示极大愤恨，对统一战线表示赞成，但因本身没有基本武装，中央牵制得很厉害，故作为较少。最近程潜唯一依靠的武力（张轸的一师人）调到江南，其亲信李世璋又被革去政训处长之职，处境更为困难。其余河南许多专员及县长，对抗日亦多有表示坚决者，国民党及CC、复兴社中亦有部分同情抗日分子。抗日的群众力量亦日益起来，我们党在河南已稳然成为统一战线的推动者与组织者。

（四）政治的不平衡性、复杂性及无组织性。一般的说，接近敌人的区域，国民党要开放些，在后方统治得要严密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省方与地方、政府与党部、CC与复兴社）、政府与民众特别是与会门、民众与土匪、党派之间（如国共、第三党）的矛盾，都相当激烈。这一方面使抗日力量的团结增加困难，但另一方面则存在着许多的空隙，使我们有可能来组织力量对付顽固分子的压迫，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二、统一战线的活动及经验与教训

甲、各地统战活动的情形

豫东——由于那时国民党及省政府极端顽固，同时，党的力量又薄弱，所以统一战线是从下面一个民团首领作起。在西华，我们有一个被通辑的民团首领同志，经过他团结了第三区的绅士，组织了一个“农村工作服务团”，将全区的民众都组织起来，并先后举办了六期训练班。经过这一区的工作，和西华县及其他区长都建立起了统一战线，结果县长将三个区长[的位置]都给了我们，自己也要求加入 CP。经过西华的关系，又将淮阳行政第 7 区专员刘襄普的关系建立了起来。经过这个专员，又把商丘行政第二区专员宋克宾的统战关系建立起来了。在这两个专员区中，我们已经开始成为决定一切力量之一。

豫西——一开始是经过一个学校，和 CC、复兴社的左派建立起统一战线，组织了民主的洛阳抗敌后援会，做了不少群众工作。经过这个关系，和洛阳专员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关系，并取得了两个县长，7 个区长及几十个联保主任的位置。

苏鲁边——我们的特委书记参加了第二战区的总动员委员会，并设法活动了四个群众当了丰、沛、萧、砀的县长，和鲁南专员共同组织鲁南联庄会。

豫南——在过去游击区域，利用了打土匪的方法，和当地政府建立了统战关系，现在又利用共同对付日寇的需要，联络了周围的县长，并有 8 个区长的关系。

豫东南——利用李、白的青年军团实习队及两个东北人的县长，建立了统一战线。

豫中及豫西南——利用青年救国会和舞阳县长及两个地方的联防处建立了统一战线。

程潜——先经过其政训处，现在已和他直接有了关系，省委

派了一个代表，经常的驻在洛阳与程见面。程表示希望我们帮助他，他不干涉我党的活动。

省党部——李特派员表示，我们党员可以不用党的名义参加各种救亡工作。现在他已回来，我们正派了人去和他作进一步的谈判。

乙、统战的经验与教训

(一) 要正确的估计统一战线的对象，这是统一战线开展的先决条件。

A、在河南的国民党政权与军政[人员]中，比较有更多抗日的分子。

B、国民党、CC、复兴社中颇多抗日分子，不应加以歧视。

C、地方的[乡]绅在开展农村统一战线中作用相当大。

D、不要管对方抗日的目的如何，我们可以利用升官主义及英雄主义来和他建立统一战线，使他向抗日的道路前进。

E、要在本质上把握一个人是否抗日，而不是只看他的个别表现。

F、要从动的观点来估计统一战线的对象，特别要注意到自己主动的作用。

(二) 抓住统一战线的主动性、具体性、灵活性及多方面性。

A、要多联合，使我们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我们不去多面联合，统一战线决不能成功。因为国民党内部分歧，自己有时无法联合起来。

B、纲领要注意地方性、时间性、现实性。

C、出面谈判统一战线的应根据当地环境，有时用抗日群众的面目，有时用非正式共产党员的面目，有时则用公开共产党员的面目。

D、统一战线的组织，有时可以是非正式的谈判，有时可以组织秘密的“中心干部会”。用正式的共同委员会，[在]河南省尚不可能。

E、谈判要从感情的联络进到订立有形与无形合作纲领，不要只是停在联络感情的阶段。

(三) 对同盟者的态度

A、要帮助当地地方当局的统一战线者提高威信。

B、帮助他来进行抗日工作，使他感到我们是他的最好的帮助者。

C、要做出模范的成绩出来，这样我们便可以取得优越的工作条件。

D、对政府与群众、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要采取善意的调解态度。

E、要克服左派群众及党员的幼稚行动，防止他们破坏统一战线。

(四) 上下层统一战线配合关系

A、要认识上层统一战线是一个专门的工作。

B、下层统一战线是“本线”的基本。

C、在阶级斗争具备的地方，主要的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建立统一战线。

(五) 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斗争

A、[对]顽固派的统治，有时应用群众力量冲破它。

B、对顽固派的反击与进攻不要无原则的让步，应利用群众力量及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与无组织性的特点，与之斗争。

C、要多多争取，在打击人家之先，需要审慎，以免中了人家的挑拨之计。对于有些顽固分子，估计到一时打不倒，但又不能不打时，可以一面打一面拉。

D、集中火力打击托匪，要善于推动统一战线来打击它，同

时经常的揭发托匪的奸计。

三、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开展

甲、我们对于这一工作的认识

(一) 当着敌人打到豫北边界的时候，我们便决定把准备游击战争作为河南党的中心任务。这是根据以下几个理由来做出发点的：

(1) 战争的变动性，随时有可能使河南变为战区及敌后方。

(2) 游击战争如不能在事先准备好，[而]等到敌人攻陷之后，维持会组织起来了，枪支被没收了，党与群众弄散乱了，然后再来组织，那时就很困难了。

(3) 在战区及准战区的地方，准备打游击是最能团结群众的。

(二) 准备游击战争，包含4个大的工作：第一是统一战线的建立；第二是基干队伍的创造；第三是游击区域的准备（这中间包含着如何组织群众）；第四是发展与巩固党，其中以创立基干队伍为最直接关系到游击战争的前途。

乙、我们创立与准备好了的游击队伍

(一) 豫南边区创立的新四军——原来有一个小游击队，70人，后来利用打土匪的办法，发展到1000人枪，编了新四军8团队，开到皖北，现已扩大到2500人以上。留守处留了两个排，现在又扩大到800人，已开了500多人到豫东去了。

(二) 豫东——

(1) 我们在竹沟派去的71人的游击大队，现已扩大到300人。现在[又]派去300人，当地又拟扩大一部分，合起来可以成立1000人的新四军的另一个团。

(2) 西华胡支队，2000余人枪，成份是当地农民，同志[占]

四分之一，干部大多是党员。除胡支队外，尚有三四千民众自卫队。

(3) 扶沟魏凤楼支队亦有千余人枪，干部大多亦党员。现支队已开赴商丘一带。

(4) 杞县吴支队，亦是杞县、睢州、太康一带地方党所组织的，共有3000多人，完全在党领导下者有1500人。

(5) 兰封、考城一带刘勤初同志所组织起来的600人枪，周围尚有2000多人，共4个统一战线的支队。

(6) 商丘专员宋克宾所领导的4000多人，现将军队交于一个同志在领导。

总计在豫东，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合计大约有6000之数，其它各在统一战线领导之下的约有万人。

(三) 苏鲁边——在未沦陷前已准备好的：

(1) 鲁南抱犊岗一带的[以]矿工为中心的500人，现已扩大到千余人。

(2) 在丰、沛、肖、砀各县都组织起来了队伍，现亦形成千余支武装。此地沦陷后即和北方局发生了关系，故情况不详。

(四) 豫西武装准备分作4个地区：

(1) 偃师中心区，依靠区长及联保主任的政治权力，用国民党抗敌自卫团的名义，组织了1500人左右的游击基干队伍。

(2) 洛宁为中心区，县委用防止土匪的名义，已经组织起来有300人的抗敌自卫团及防匪团，完全在党领导之下。

(3) 洛阳同志自己有200人枪武装，在我们同志做联保主任及区长的全部壮丁武装可以动员起来，另有一个区的红枪会由一个区委作领袖，亦可以领导起来参加游击。

(4) 郑州、荥阳、密县工作委员会，有强大的农会组织，能把握千把武装，唯党基础打下不久，把握程度尚差。

(五) 豫南特委——

(1) 三个直属区能够随时调动 800 支武装。

(2) 汝南能动员 400 支，唐河 300 支，确山 300 支，潭家河 100 支，上蔡 100 支，明港 100 支，遂平 100 支，合计可动员 2300 支。

(六) 豫西南：南召县利用联庄会，能相当的把握住 3.4 万支武装，其它在南阳青苔亦能动员百余支。

(七) 豫中以舞阳及叶县为中心，舞阳县利用其 3000 多会员，能把握全县一部分武装，叶县我们在联庄会内亦能把握住一些武装。

(八) 豫东南比较最差，那边党是新创立的，加以领导机关工作又不切实，所以准备得不很好。现分三个区来准备：第一个区域在潢川以东，信阳到潢川公路以北，以乌龙集为中心。那一带经过实习队、区长、农会，能发动 400 支武装。第二个地区在信潢公路以南，以商城为中心，可动员 300 人。另一区在罗山及经扶二县，亦准备了一些力量。

总结起来，河南已经创立起来的武装，用新四军名义的将近 4000 人，在豫东已经发动起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有 6000 人，统一战线的万[余]人，在敌人未占领区域我党准备之下的约有万人。

丙、准备游击战争的经验与教训

(一) 在战区每个特委、县委、区委以至支部，都必须将决心抗日的分子组织成一个基干队，以便转到敌后方时能依靠它发动游击战争，同时必须注意到一般武装的工作。

(二) 要采取公开合法的名义与方法来准备游击队伍，如利用抗敌自卫团、联庄会、看家队等名义，用秘密方式来组织。在未沦陷前不易集合训练，[以免]起误会。

(三) 特别注意利用训练班来训练干部，使各个指挥人员成为同志或同情者。

(四) 组织农民为主要工作，对于红枪会等应特别注意其首领的思想上的转变。

(五) 最好能使准备着的武装在敌人未到前即受到训练，如打土匪，配合军队作战。

(六) 党的干部要军事化，每个党的干部要了解游击战术。

四、群众运动

甲、青年运动

河南原来有一二百人的“民先”组织，但在去年4月到7月间，两次遭到破坏，并且因为“民先”的破坏，引起了党的破坏。我们到了河南之后，不管“民先”中□同志的反对，把它予以解散，一面使它转化为广泛青年组织，一方面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使他们加入党。这个转变的结果，使党的组织扩大了，同时各地青年运动也发展起来。

到今天，在我们领导之下的青年组织已有74个（游击区除外），有1.7万多会员，其中44个团体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包括有1万多会员。除此之外，在豫东几个县，有广泛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单在西华一县，至少有2万多人。这些青年组织，分散到河南各个县，成为当地救亡运动的推动者。他们一面能够帮助地方建立上层统一战线，一面掩蔽下层工农工作，他们自己每每即成为当地地方长官抗日工作的最忠实的帮助者。

这些不同名义的分散的青年组织，我们在过去用开封战时农村工作服务团的名义来联系他们与领导他们，因为各地这些组织大多是经开封农村工作服务团、回乡工作服务团组织起来的。但是，这种方式有不便利之处，因为第一，群众团体名义各不相同；第二，还有很多不是开封回乡学生组织的。所以，后来我们用全国青年救亡协会的名义，在河南组织了河南省青年救亡协

会，取得了第一战区政治部的帮助与批准，现在参加这个组织的有 40 多个青年团体。国民党将全国青年救亡协会解散之后，接着就要解散河南的组织，现正在交涉中。

乙、工人运动

(一) 矿山——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工会完全是厂方所把持，后利用枣庄抗敌后援会，在矿工中组织 2000 多人的分会。经过这个团体的作用，领导了救济失业工人的斗争及反对停工的斗争，结果，都得了胜利。同时利用了第一战区统战关系，武装了一些工人，成为今天鲁南游击队伍的骨干，党在这个矿山中建立了 5 个支部，有同志 60 多人。

(二) 纱厂——豫丰纱厂有 6000 多工人，女工占 4000 多，男工 1000 多。我们领导了反对关厂的斗争，结果，经司令长官仲裁，发了 18 元的失业津贴。女工中党完全可以领导，成为郑州各种救亡工作的主要群众基础。后来我们又经过政训处的妇女工作团，代募了 3 万多元。许多小手工业工厂在工人中发展了 34 个同志。

(三) 铁路——陇海路以洛阳为中心组织了抗日先锋队，有 7 个分团，成为全路救亡工作的推动者。同时，在洛阳成立了劳动服务团，并组织了军事团学习军事，准备敌人打到，陇海路车断时组织游击战争。曾经发动过两次青工斗争，结果都胜利（详情见陇海路青工工作的总结）。

平汉路有 500 多人铁路破坏大队的组织，并在信阳组织了 9 次游击队训练班。惟此中党的组织（由长江局刚交来的）政治面目不清，内部异己分子及叛徒亦隐藏其中，现在正拟用特别方法来解决之。

(四) 市政——开封的邮务、电话两个工会，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都是利用原有的黄色工会，将其充实争取过来的。经过这两个工会，组织了全开封的工人抗敌总会，开办了游击战

争训练班，训练了一批豫东游击战争的干部，并成为当时开封救亡运动的骨干。

(五) 小手工业工会——在临颖和豫西的登封，组织了300多人的小手工业工会，详情不清楚。

丙、农民运动

(一) 农会——国民党中央党部曾经命令各省县组织农会，我们利用这个法令，利用国民党县党部的组织员，组织了偃师40个农会，利用洛宁抗敌后援会和县党部的关系，在洛宁组织了乡村的700多人的农会。在睢州组织了30多个农会。在潢川利用县党部的左派，组织了10多个农会。宜阳县也有5处农会。帮助了密县的左派国民党，恢复了大革命时代保留下来的[有]1.9万个会员的农会。这些农会组织，大多经过领导一二次改善农民生活的斗争，如洛宁减租斗争，偃师借粮斗争，取得了农民的信仰。

(二) 其它各种形式的农民组织——在西华一带，利用人民抗敌自卫队的名义，将全县的18岁以上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在洛阳，利用工作团和农民夜校（洛阳五区有83处，四区有100余处，二区有50余处，每处农民都有七八十人），组织了将近2万的农民。偃师每个村庄亦大都有这样的夜校，[且]大都把握在党的手里。在豫南，利用联庄会，国民抗敌自卫团，抗日保乡团的名义，组织1.3万多的农民（详情请参考豫西及豫南报告）。

总括起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的农民组织，大概上8万人。不过，这些组织一般的都是青年救亡工作者自外帮助建立起来的，斗争生活尚不健全，农民自己的领袖创造起来的还不多，这是大弱点。

丁、妇女儿童工作

河南妇女儿童在救亡工作中，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

开封的统一战线，首先是从妇女建立起来的。女学生会推动了男学生的工作，女救亡领袖推动了男的统一战线的工作。

郑州的救亡工作，女工成为主要的群众基础。

西华一带将所有老太婆与青年妇女，都组织成老太婆会及姊妹团，帮助抗战军人家属做鞋，并能检查路条。确山的妇女救国会，给新四军留守处很大的帮助。

偃师县的妇女救国会，有分会三处。每处都拥有妇女群众七八百人，都开有妇女识字处及儿童团。有老婆剧团，均系农妇分子，能到外县去演剧。[妇救会]能经常地做募捐慰劳等工作，最近并发起做布鞋运动，已经做成一大批送到前方去。洛阳的工作也是一样，有三个妇女分会，办了13个妇女识字处。

在开封、郑州、洛阳三个地方的妓女，都有我们的同志，帮助国民党办了许多训练班，并组织了三处妓女救国会。

戊. 群众工作及群众斗争的经验与教训

(一) 关于组织方面

(1) 组织民众最好是能取得当局委任的名义，取得它的保护，而且取得行政权力的帮助（例如西华的群众组织的发展）。如不可能，至少在组织起来之后，在工作上表现这个组织是拥护当局进行抗日工作的。这样，当局至少不会来破坏你，有时顽固派向你进攻，它会来掩护你。

(2) 因为政治环境的复杂，在河南任何群众工作都很难用一种名义来组织它。为要使工作顺利，开始可以用各种名义去组织，之后要尽可能使之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

(3) 旧形式灌输新内容，无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是一种有意义的组织路线。利用原有的黄色工会充实它转变它，这在河南的邮政电话系统是成功的。假使这个地方的工会等完全在资方把持下，一时不能转变，我们一面可以压迫其转变，一面则另外组织一种别的形式的组织，例如在陇海铁路，我们组织“抗

先”，劳动服务团等。

(4) 一般的说，开创一个地方的群众工作，在河南是先组织青年团体，经过它来开创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因为，他们可以有地位来创立地方的上层统一战线，同时也有地位来做下层工农工作。在有些地方，农会等不能组织的，可以先从老头子、妇女组织起。

(5) 用巡视的话剧团、演讲团，开创群众工作最为便利。

(二) 关于斗争的经验教训

(1) 任何团体，无论是工、农、青年团体，不替它解决迫切要求，都不能健全起来。

(2) 群众的迫切要求，有些可以经过互助及募捐等形式来解决。

(3) 一切斗争，要将工农的救亡工作和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配合起来，才能取得社会人士的同情，才易于取得斗争的胜利。纱厂、陇海路的青工及洛宁农民的减租斗争，证明了这一点。

(4) 一切斗争都要有下层压力和上层的帮助，才易于取得胜利。特别在战区的各种斗争，大多是要经过政府或军事机关的仲裁，假使上层工作少做了，便要吃亏。纱厂工人少做了一些，吃了7元钱的亏。

(5) 旧工会即使坏，我们也要压迫它来领导斗争，这样斗争更能合法，且可能推动旧工会改造。

(三) 关于准备游击战争根据地

(1) 在抗日战争时代，游击战争根据地事先可以准备好的，如西华、竹沟及豫南、豫西各地都已经这样做了。

(2) 根据地选择的条件：A、当地的统一战线建立的；B、基干武装准备好；C、群众组织好；D、党有基础，每一个县能有一个区或一二个联保[是同志]，如能这样做，便可以保障一定能将游击战争发动起来。

五、党的建设

甲、关于发展与巩固

(一) 目前河南党的数量，根据一个半月前的统计，有 6485 个党员，其中苏鲁边、豫东及 8 团队，均是根据四五个月前的统计（因战事关系，新的统计没有来）。目前党员的总的数目，实际上大概可有 8000 人。计：

豫西	2300 人	(8 月份的统计)
豫南	1057 人	(..)
豫西部	352 人	(..)
豫南部	368 人	(..)
豫中	287 人	(..)
苏鲁边	1232 人	(..)
豫东	515 人	(这是 5 个月前的统计)
8 团队	300 人	(这是 6 个月前的统计)
省委直属组织	174 人	
(合计)	6485 人	

组织的成份，农民占 40%，工人及雇工占 3%，知识分子占 40%，商人、地主及上层分子约占 9%。

组织分布在黄河以南的 64 个县，连苏鲁边合计 88 个县。在黄河以南的河南，只有 5 个县没有党的组织。

组织的发展比之一年前大约增加到 50 倍（原有组织关系的同志大概有 150 人）

在这个月内，组织发展比较迟缓。有两个特委如豫西等地，因发展太快，有些“消化不良”，所以集中力量于巩固工作。同时，如豫东一带特委因战事关系，领导很不健全，今后数月组织可有大的发展。原因：A、豫东一带游击战争大大开展，党随之

有极迅速发展；B、支部工作相当地整顿了一下，在支部健全的基础上可以发展。

过去组织发展的方法：

(1) 抓住几个据点，首先抓住了几个中学校，在学校中发展了一大批同志。

(2) 抓住回乡运动和各种工作团，使工作深入到内地去。

(3) 经过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发展组织。

(4) 抓住各样的训练班，使党深入到每个区乡与各个地主武装组织。

党的发展，仍是落后于客观情势之后。原因：A、有些新同志的组织生活不健全，故不能用恢复生活的方法巩固地向前发展；B、党内有种关门主义，怕发展多了钻人个别的异己分子，自己要负责任，因此不敢发展。过去豫南特书就有这个倾向，影响到豫南几个月内根本没有发展党。

(二) 关于巩固组织方面，我们采取了以下的方法：

(1) 在我们到河南的时候，那时组织大多是新恢复起来的零星关系，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检查过，洗刷了个别的坏分子，保证了“母鸡”的纯洁。

(2) 注意转移关系，那时平津及各地流亡分子，流动非常厉害，这中间很容易混进坏分子。省委组织部稍微马虎了一些，省委[及]时做出了决议，纠正了这种错误。

(3) 对于曾加入复兴社、CC及从监狱里出来的同志特别考察，对其中危险分子，随时洗刷与查看。

(4) 检查各地工作，发现漏洞，[并有]可能时，派人去整顿。

(5) 利用长江局及省委的训练班来考察干部的面目。

(6) 凡经过省委来往的干部都加以干部登记及考察。

目前，省委领导下的8个特委中，7个特委都经过长久考

验，内部相当清楚。豫东南内部因特委书记的马虎，已派了组织部及工作团帮助他考察与整顿。

乙、关于教育

新同志的教育方式主要的采用流动训练的方式，在各县组织部内找一个教育干事，轮流到各个支部办新同志训练班，每次教育三四个项目，主要的是党员基本知识、什么是马列主义及统一战线三门功课。已经这样做的是开封、洛阳、郑州、偃师及豫南几个县，很有效果。

省委在竹沟开办干部训练班，轮流训练县区级的干部，已办二期，豫西、苏鲁边、豫东、豫南亦有干部训练班。

省委办两期“教导队”，训练同志及群众[中]的军事干部，每期300人。现在各县及区委经常利用支书、支部组织干事……联席会来训练支部干部。

省、特、中心县，均能经常召开各种联席会议。

丙、干部状况

新干部已经开始涌现出来了，现在各个县委负责人大多是这一年的新同志。出干部的地方最主要的是豫西，那[里]供给了全省不少的干部，这些干部应付一个县的工作还可能。新干部的好处是对统一战线的策略运用尚活泼，工作切实苦干。

现在最缺乏的是特委这一级的干部，因为我们去河南之后，地方老干部少，又未得到上级机关的干部供给，一时无法能训练出来一批能独当一面的特委一级干部。现在最需要的是3个[担任]特委书记的干部，同时，4个特委尚没有胜任的军委[书记]，这也是立刻要解决的。

关于训练工农干部。过去豫西特委下几个县有这种错误方针，即不信任农民能够独立领导支部，在每个农民支部里要派一个学生去当支书。这已经纠正，现正督促每个特委、县委书记负责物色及培养一二工农干部，以便逐渐转变领导成份。

丁、支部关系

事实证明，河南各地工作的开展，主要的是建立在几个中心支部的基础上。今天在有些地方，党有了发展，统一战线也建立了，最大的弱点，每每是支部的不健全。正因为支部不健全，所以武装群众等工作不能结实的发展充实。在这些地方，只要将支部整顿一下，工作便可大踏步地向前开展了。

事实上，河南只需要有这样 100 个支部，能够[经过]地方的统战将全部联保武装起来，能够领导当地的群众组织，那么，敌人来时，便可有 100 个大堡垒。依靠这些支部来进行与准备游击战争，一定能在河南创立一个局面。可惜今天够这个条件的支部尚不多，特别是农村支部。

现在铁路以西的党，已经把注意力转到支部工作之上，从省委直到区委经常讨论研究支部。布置检查工作，要看支部的反映。此次全省组织会议，每个特委并做了创立模范支部的竞赛。

戊、宣传工作

(一) 省委出了《风雨》，作省委机关报，对全省的救亡工作，起了相当的领导作用。

(二) 各特委及县委多有利用国民党报纸及群众团体的报纸作地方的报纸。

(三) 各地的戏剧团、宣传团，经常性的有 30 多个，省委直接领导的有 3 个，在做地方宣传工作中很起作用。

己、领导方式

(一) 为适应战时工作，现在每个特委之下，设立了中心县，例如豫西 22 个县，设立了 5 个中心县，豫东正在划分为 3 个中心县。

(二) 支部以联保来建立，不依照村子。

(三) 省委的领导，原来是完全分散，9 个省委委员只有两个在省委机关内，大多□日常工作，都是经过支部干事来做。省

委每一月或两月集会一次。现在在竹沟，因工作相当有基础，3个常委经常在家。

(四) 工作过去最大的困难是传达经验太迟，现在因经常开各种联席会议，所以好些。

庚、反倾向斗争

(一) 反对左的关门主义与空谈主义。

首先，与“民先”及平津流亡学生中的关门主义及自高自大倾向做过激烈斗争，结果克服了，“民先”转变过来。

其次，反对党内以豫南特委组织部代表的敌视上层统一战线的倾向，使豫南党能注意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二) 反对上层尾巴主义倾向，反对了以×××代表的上层尾巴主义倾向，他们往往在上层统战工作中失去了自己立场，在党内玩政客手腕。斗争开展之后，党内这种倾向[得到]相当克服。

(三) 反对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对恢复组织上的马虎、自由行动等等，随时纠正。

- 附：一、豫西特委报告
二、豫南特委报告
三、豫西南工委报告
四、陇海路青工报告
五、各特委统计表
六、青年群众工作统计表

论目前华中抗战形势及今后任务¹

(1938年11月14日)

目前抗战情势的特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正确估计的，是处在“敌进我退”的第一阶段向着“敌我相持”的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抗战的任务，是在于“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当前困难，停止敌人进攻，准备反攻力量，以最后战胜日寇”（毛泽东）。这个任务，正严重地放在全国同胞的面前，同时也特别严重地放在华中一万万民众的肩上！

现在我军已自动地退出武汉了，从此长江黄河之间将展开成为一个独立与敌作战的地区。这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将和华南、华北战区分离开。这里有广大的土地，约占中国本部三分之一，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有丰富的物产。这个地区，是处在华北、华南、西北、西南战区的中心，是敌我两方的军事枢纽。毫无疑问的，这个区域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在目前过渡时期中，华中是推动抗战迅速过渡到敌我相持的有利阶段上去的一个主要地区。

目前华中战局已经与过去的时期有很大不同，在南京失守之后，敌人足足花了10个月的时间，把主要的兵力集中在华中，为着打通津浦铁路及夺取武汉。如今我国已自动放弃武汉，在江

¹这是朱理治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于延安《解放》周刊第58期。

河之间的广大领土已经大半处在敌人的后方了。在平汉路以西敌人尚未占领的地区，已经处在敌人的侧翼，在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今天敌人的主要战略企图是在于打通粤汉路及西南公路，占领长沙、南昌、西安、兰州。敌人今天使用的兵力主要是在华南，并可能移到西北。但为着进攻华南及西北以及夺取整个华中，敌人必然要来加紧向华中进攻，打通平汉路，陇海路及宜昌以下的航运，夺取沙市、宜昌、郑州、洛阳、南阳、许昌等城市。

根据这种情势的变化，今天保卫华中的战斗方式很明显的是和过去不相同了。在过去保卫华中的战斗方式是在于主要的用主力军的运动战，配合阵地战，辅以游击战争来保卫徐州、武汉及整个华中。今天，保卫华中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在于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灵活的运动战争来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缩小敌人的占领地，坚持与扩大我们的根据地，拖着敌人的尾巴，配合各战区的正面战争，迫使敌人不得不终止战略进攻，然后在相持阶段中加紧增强自己的力量，配合全国各战区的力量实行战略反攻，驱逐敌人出华中、出中国。这是今天完成保卫华中的战斗方针，也即是我们华中推动目前抗战迅速过渡到相持阶段的战斗方针。

二

在坚持华中抗战，推动抗战过渡到相持阶段中，我们不可否认的有很多困难。过渡时期是抗战中异常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在华中亦不能没有。例如，武汉失去之后，今后全国总后方对华中战区接济就要困难，财政经济、军火的供给主要的要靠华中自己来供给。武汉退出，华北、华中、华南傀儡政府将要合流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汉奸亲日派必然要利用华中大部领土丧失及

目前困难来散布失败情绪，动摇抗战心理。同时，由于华中全民族统一战线尚有很多缺点，这又恰恰给了汉奸、托派、亲日派以很大的挑拨离间的机会。所有这一切，都是目前华中不可否认的困难。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经过 16 个月抗战的华中，已经是大大的进步了，这种进步是我们坚持抗战、克服困难、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华中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表现在华中民众的普遍觉悟与英勇参战。16 个月来的炮火，大大地唤醒了华中的民众，加之民众工作的努力，如河南一省即有近百个救亡戏剧团体，甚至老太婆小孩子都组织了剧团。在安徽各县有青年军团的实习队，他们深入了农村，到处进行唤起民众的工作，更增加了民众觉醒的过程。现在华中民众不知道日寇的凶恶的，是很少的了。广大的壮丁涌到了国民革命军去了，单在河南一省，即有 50 万壮丁补充到国军中去（据河南省政府的谈话）。□或征调方法尚有未尽善之处，但无疑的，这是非常伟大的成绩。在国军作战时，我们不止看到民众如何帮助国军运输、挖壕、担架，而且看到广大民众自动的参加作战。如安徽红枪会在津浦沿线给予日寇很大的杀伤，豫东抗敌自卫团的英勇抗敌，黄河南岸民众帮助国军的坚守黄河。广大民众的觉醒及其英勇抗战，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中抗战取得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

第二，华中的进步特别表现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敌人表面上虽然占领了华中广大领土，但事实上除了津浦、陇海几条交通要道及几个大城市与据点外，大部领土仍是保持在我们的游击队及政府之手。华中游击战争是已经开始广泛发动起来了，现在第五战区各个县份的人民抗日军及河南的国民抗敌自卫军、抗日

游击队，在程、李^①二司令长官的领导之下，已经广泛发展起来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表现在其事先有相当的准备。大多数游击战争，是在敌人未到前即已准备好，并且有一些游击队伍是在敌人未到之先即已组织好，配合国军深入到敌后方去活动。华中游击战争其次的特点，就是它的广泛性。我们确是看到了华中有些县份如豫东的某几个县，把全县的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有一个县份，在敌人未到之先即已经正式组织了5000游击队伍，在县政府指挥下向敌人不断打游击。现在华中游击战争才只是开始，将来一定有大开展的前途。这种游击战争的发展，也就是我们华中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最主要保证。

第三，华中的进步表现在政治上有相当的革新。在程司令长官和李司令长官领导下的第一、第五战区，许多不称职的专员与县长被革职了，而代以一些青年有为的救亡分子去做。我们看到有一些专员及县长，不只是积极的在准备打游击，而且真能够领导了民众在敌后方对敌作战。政府与民众关系是相当改善了，政府对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亦相当的注意。如程司令长官对于郑州豫丰纱厂失业工人及李司令长官对于枣庄矿工的爱护、对于黄河水灾难民的救济、对于各地土劣的打击。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亦有了很大的增进，如第五路军及其它各军都是这样。正由于政治的革新，所以有一些民众运动也初步地开展了。程司令长官在河南的“四项施政方针”及李司令长官在安徽的“约法七章”，在某种限度上说来是已经在实行着，虽是尚有不足的地方。政治上的革新，是华中坚持抗战的有力保证之三。

第四，表现在国共两党的进步及其相互的团结。首先我们看到国民党的进步及其实力的增加。现在国民党在民众中的信仰，较之以前是大大提高了。在河南的国民党，经过中央特派员李余

^①程、李，即程潜、李宗仁。

黄先生的大加改革，比较过去是有了进步。国共两党的关系亦有相当增进，不只是我们的新四军在敌人后方肩并肩的与其它国军共同作战，而且在我后方有些地方国共两党同志亦能同舟共济的——一起动员民众。不管汉奸托派如何的挑拨离间，顽固派的分子如何从中破坏作梗，国共两党内有远见的同志都能从整个国家与民族着想，本着相亲相爱、互助互让的精神坚持两党合作。不可否认的，两党关系还有很多缺陷，但总的方向是向着继续巩固与发展的道路上走的，这是我们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第四个保证。

总结华中 16 个月抗战的经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华中以上这四个进步，这是华中今后继续抗战的优点。自然，这种进步是非常之不够的，在民众的动员上、政治的革新上、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发动上，尤其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尚有很大的缺点与不够。而这种缺点与不够，恰恰是今天华中抗战中严重困难最主要的所在。但是，我们相信只要继续抗战，是可以使华中更大的进步与克服这些缺点的。

我们再反过来看一看敌人方面，经过我们 16 个月的打击之后，已经开始表现出敌人在逐渐减少中。其在华中的兵力有以下四个大的困难：

第一，是它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敌人国小，人少、兵少，又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防英法、国内防老百姓，故其使用于中国的兵力已经接近到顶点”（毛泽东）。目前敌人的主要兵力正在向江南与华南进攻，不久敌人兵力将主要使用于西北，其中不小一部分兵力又要用来对付华北游击战争，故目前能使用于华中的兵力是很小的一部分。这就使我们华中游击战争有非常顺利发展的条件，只要我们能发动更广泛的游击战，配合灵活的运动战，我们定能战胜敌人。

敌人的第二个困难，是它在华中没有社会的依靠，而华中一万万的民众都是它的仇敌。它在华中所犯的滔天罪恶，已经树立

了一万万个人的仇敌。虽然它能利用汉奸组织维持会，但是只要我们政治工作做得好，加以敌后游击战争发展起来，能被它利用的汉奸总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的。

敌人的第三个困难是在于敌人的国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消耗。70万的公债已快用完，兵舰飞机有很大的损失，新的补充又不易取得，但是全国各地的抗战仍是给予它不断的消耗。

敌人的第四个困难是其国内新的矛盾的增加。国际上[是它]对苏、美、法、英矛盾的增长，在国内则是军队的厌战、民众的反战。只要我国能继续抗战下去，这些矛盾会更继续增高的。

自然，我们对于敌人的力量不可以过低估计。在今天，敌人力量虽然是削弱了，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势，还是没有变化的。敌人虽有很多困难，但是仍然还有足够余威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对敌人不可以轻视。不过，我们相信只要不被敌人的进攻所骇倒，在华中坚持抗战，利用敌人的目前已有的及将来还要加深的弱点与困难，我们是把握能够战胜敌人的。

三

根据目前抗战所给予华中的使命，根据华中敌我情势的分析，我们认为华中应当立即完成以下的紧急任务：

第一，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与准备的战区的游击战争。现在敌人的战略进攻尚未停止，故敌人兵力主要的用在进攻的正面，敌人后方空虚，最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现在要在已经发动的地区使之大大发展，在没有发动的地方，使之发动起来。游击战争是要准备的，在战区敌人可能占领的地方，现在就要有充分的准备。在目前华中游击战争的任务是在于：（一）在敌后破坏、扰乱、牵制敌人，以配合正面正规军的作战。（二）打击敌人的汉奸伪政权，瓦解伪军，缩小敌人的占领地。（三）恢复与加强敌

后的政治机构，发动与组织敌后民众，实行抗战建国纲领，使这些地方今天成为我国抗战的根据地，将来成为三民主义共和国的下层基础。（四）创立大量的游击队伍，并使这些游击队伍转化与充实国军。

第二，加强华中的国军及创立新的正规军队。目前在华中敌后方及平汉路东的正面，保留有我国的国军在继续作战，这是华中游击战争的骨干。我们知道单靠游击战争是不能打退敌人的，将来驱逐敌人主要的要靠正规军队。所以，我们一面要发展游击战，一面要加强已有的国军并要创立新的国军。为要达到此种目的：（一）华中战区正面正规军，应当更灵活的运用战略的运动防御，节节打击敌人，但不要为敌人所算；在敌后的正规军队，应当主要采取游击战术，但是不要放弃有利的运动战。（二）华中的民众及游击队，应当帮助国军的扩大，大批地加入国军，帮助国军的给养运输等等。（三）为要坚持华中抗战，必须在华中某些敌人不易到达的地方创设几个兵工厂，制造必要的武器弹药。（四）为要适应目前华中的情势，留在华中的部队应有大大的改进，如健全政治制度、提高自觉纪律、提高官兵团结、改善军民关系等等。

第三，改进华中的政治经济。（一）我们认为澄清吏治任贤选能来充实各级政治机构，是今天华中改进政治的首要之图。我们在前面已说过，华中政治经程、李二司令长官的改造之后，已经吸引了一批抗日有为之士到政府中来，但是各级政治机构中不称职的还很多，没有抗战的官长，什么好的法令都是行不通的。（二）推行民主运动，首先省、县的参政会应迅速的召开，并保证各党各派的优秀分子来参加；区乡的民众政府亦应该推行民主制度。（三）经济政策首先保证敌后区域的自给与国军的给养，必须大量地发展手工业，发展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因此，政府要发出法令减低高利贷、田租，取消一切尚存的

苛杂，这是保证人民提高生产热情的前提。

第四，将华中一万万民众组织起来。今后，华中抗战将要更加依靠广大的民众。没有广大群众热烈的拥护，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只要有群众的拥护，那么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但要使广大群众参加抗战，就必须使他们组织起来。应当实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决定，从速的将广大的工人、农民、商人、妇女、儿童、青年的救国会统统组织起来。现在安徽、河南几省都有总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安徽省的总动委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下层的总动委大部分还没有充实的工作内容，许多的地方还是少数人包办的机关，现在应当将它充实起来，吸收各党派的人士来参加。现在建立与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使它成为青年一代的集中训练之所，是非常必要的。故其组织上必须民主化，政治上应发挥其自动性、积极性。只要做到这样，我们希望华中一切青年群众组织，如河南各界青年救国联合会、安徽青年军团实习队等等，都一齐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使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整个华中统一的青年组织。

最后并且是重要的，是在于发动民众拥护蒋委员长与程、李司令长官及国民政府的坚持抗战，反对汉奸、托派的挑拨离间，密切国共两党的合作。现在日寇汉奸、托派必然利用我军退出武汉来散布失败情绪，反对蒋委员长及程、李司令长官，反对国共合作。敌人所深恨的正是我们所要坚决拥护的民族领袖，我们要坚决拥护他们。对于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应当随时予以调解，以免为托派、汉奸所利用。国共两党关系应有更进一步的合作，我想，过去国共两党的摩擦大多由于误会而来，而这种误会则是由于相互疏远的关系。因此，国共两党同志相互更加亲近是非常必要的。两党同志应有互助互让的精神，真正的帮助友党发展力量，不在友党中建立秘密组织，一致的紧密、亲密合作，共同来担负起目前艰巨的使命。

华中是中国两个最伟大人物的出生地，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岳飞。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及“精忠报国”的伟大精神，至今尤深刻印在全国民众特别是华中民众的脑海中。过去 16 个月的抗战，我华中的领袖与民众在他们的精神之下，已经打下了胜利的基础。我们相信，今后一定[能]更加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来完成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希望：华中文人个个学诸葛亮，中原战士人人像岳飞！

关于豫鄂边形势、工作情况及 建议给中共中央的6封电报^①

(1938年12月-1939年4月)

1938年12月下旬电报

豫鄂边情况及工作意见如下：

1.敌人在信阳1000人，信阳北长台开[出]300人，由信阳到南阳大道上之吴家店与吴城，在信阳东北游击三队有敌人千余。

2.敌人进占豫东南时，县政府多率领常备队退居乡间。现在东南之敌均已退去，国民党统治均已迅速恢复。

3.豫南统战以信阳为最好，信阳有四个区已沦陷，汝南专员张振江对我关系尚好。豫西南13县，地方实力派别迁芳与复兴社联合，对我们防范甚严。第五战区在信阳、桐柏及鄂北之随县、应山、枣阳等7县，组织豫鄂边工作委员会，以随县专员为主任，另聘与我们有关系的4[位]名流为委员。

4.雪枫^②离竹沟时留有一中队，可用枪枝50支，近因配合友军打汉奸、土匪已扩大到300余人，枪200支。周围土匪完全消灭，竹沟较前巩固，唯统战关系仍须细心谨慎。地方区县已组成公开武装，有500名，随时可受竹沟调动。其他各县经统战关

^①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朱理治被任命为中原局委员和新组建的豫鄂边省委书记。这一组电报是他自延安回到竹沟后，以他个人名义和以他同刘少奇名义写给中共中央的。

^②雪枫，即彭雪枫。

系，准备有数千武装。

5.目前发展方向主要拟沿铁路两边向南活动，进一步工作中心放在信阳，已派一连去信阳，联合我们领导的 77 军工作团（约 200 余人枪）及县政府之武装组织。我一挺进游击队在我们干部指挥下，在信阳以南游击。现准备抽 4 个排到信阳及罗山配合地方武装打汉奸武装，做地方群众工作，然后再向应山、枣阳一带活动。省委拟在这区成立一新特委，调王盛荣同志去任特委书记，并给他一批干部。

6.目前，豫鄂边处在敌人第一次进攻已经过去，新的进攻将要开始到来的过渡阶段。党的工作方针，一面是向敌占区积极发展，一面加紧以竹沟为中心的敌未占区的准备工作，以便在豫鄂边区建立一个局面。现部队仍在不断扩大中。现办有党与军队两个训练班，人数有 80 人，并办有一个油印日报，已出版到 81 期。拟将两个训练班予以扩大，并准备铅印机。目前每月经费（党费）据预算至少要 4500 元，在敌人未进攻前另无经费来源，由中原局经费中拨 4000 元给竹沟，因还欠债及作棉衣已经用完。以上如何处理，请即示知。

7.省委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中，余再报告。有何指示，请速告。

（朱理治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转
叶剑英、朱德、彭德怀及南方局电）

1939年1月上旬电报

各方近况继告如下：

1.过去8团队与安徽省委没有配合，影响工作不能发展甚大。经去电，[已]联系起来。51军现留在安徽，党的基础在整个东北[军]中算最强，可把握到三四个团。现我处已派过去在东北军[工]委中能负责者先去领导，方针是争取分散使用各地，掩护地方党发展游击战争。如能适当运用此二大力量，将来安徽工作可能大发展。

2.豫鄂皖位三^①仍在经扶县^②余家湾，没有什么问题。豫东南特委及皖西已和其联系起来，现述申^③已去3日。

3. (略)

4.派赴信阳部队决定于14日出发。现信阳经统战领导下的游击队已近千名，均派李先念同志、王盛荣去领导。

5.省扩大会明天结束。省委另外组织，由我兼书记，陈少敏、李先念、王国华、王盛荣、危拱之、王澜西及郭中之、杨学诚、陶铸9人为委员。省委管辖原豫南特委地区划豫中特委，已派人去鄂中。豫东南已交给鄂豫皖。

5.大局确定后，望你即来竹沟主持整个中原局工作，并领导豫鄂边区。

(朱理治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

①位三，即郑位三。

②经扶县，即今新县。

③述申，即郭述申。

1939年1月17日电

1. 豫鄂边区新四军游击队由竹沟抽两个连组成，已于今早在李先念、王盛荣率领下，出发赴信阳，配合危拱之领导的游击大队。

2. 五战区对豫鄂边区工作委员会态度甚好，我们可起左右作用。可[以]说边区架子已有，今后在于充实内容，并巩固这个架子。

3. 目前豫鄂边区及安徽与豫鄂皖边区需要干部甚急，原答应给中原300名抗大学生，除给雪枫之60名外，请派200名到竹沟分配工作。

4. 豫鄂边省成立了党内军事委员会，11个委员，我与李先念、王国华分任正副主任。

(朱理治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叶剑英、朱德、彭德怀电)

1939年1月30日电

(一) 信阳有一挺进游击队，其中有5[个]中队，一中队是竹沟新四军派去的，另一个中队是我们帮助县政府收编的常备队，另两个中队是77军战时工作团。5[个]中队合组一挺进游击队，由我们派去之王海山同志指挥，危拱之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由信阳县长^①任司令，77军之朱大鹏同志任副司令，故已取得合法名义。

(二) 月初，此间竹沟又派去两个连组织新四军游击大队开赴信阳、应山交界活动，由李先念同志率领，已派人赴五战区以豫鄂工作委员会名义活动。

(三) 信阳东面由徐宽领导之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已有千余人，现郑位三已派去两个排，合组一新四军游击大队开赴信[阳]、礼山^②、罗山一带活动。

为避免磨擦，此两个新四军游击大队活动方针决定[在]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之区域中发展，目标尽量缩小，并多组织过渡形式的武装，目前多求质的巩固，你有何意见，请速电告。

(刘少奇、朱理治致王稼祥并周恩来电)

^①信阳县长，指李德纯。

^②礼山，即今大悟县。

1939年4月5日电

(一) 信阳部队准备于5号向应城[去]，县长不只将挺进队5个连全部交给我，并把常备队一中队及特务队给我们率领，有轻机枪4挺。

(二) 县长已秘密动身来竹沟，向我表示加入我党非常必要，并不断表示愿为革命牺牲到底，每天看我们的理论书。为着环境关系，我们请送他到延安学习。

(三) 鄂中电台不通已有10日，估计学诚等已去应城。8团队电台太小，现与我们通电均经位三转。

(四) 现在鄂中之新四军挺进游击支队人数已有1200人左右，枪枝齐全，机枪将近20挺，估计到鄂中以后定有更大的开展。

老的八路军军事干部不足，鄂豫皖亦要干部，此沟竹如可能，亦要准备一些干部。前延安送来之31个干部，朱彭^①来电谓已送到雪枫处。务请设法从延安调一批干部来。

(朱理治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

^①朱彭，即指朱德、彭德怀。

1939年4月9日电

(一) 中原顽固派对我们打击，最主要的是打击同情者，以孤立我们，进步的专员与县长且个别的被打击，在舆论上未遭受到应有的反抗，敌顽固势力凶焰日增。现拟利用这些被撤进步县长、专员发宣言文告，指责当局政策之错误。

(二) 信阳县长已到，他因在我们帮助下领导游击战争，在舆论上已取得不少批评，同时他在河南政界有相当高的地位，他已同意用他的名义写出文章，历述维持信阳之功绩，指责打击进步势力之不当。作好后到各报馆发表，并附信寄各地几千份。

(三) 去鄂中武装因广水、应山间敌我相持，不宜通过，故已去铁路东××南下。应城县政府已派人送去500元，我处已送去千五百元，作为经费。

(四) 信阳、应山、随县、桐柏四县交界山势最好，原来已创立几个小据点。现在完全在我领导下的有77军工作团一个连，今由竹沟又去一个武装分队并拥有机枪一挺作为基础，那边尚有原来县长领导下的一个营及地方武装，估计可立即建立600人武装力量，[以便]支持巩固与创立这一根据地。

(朱理治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

开创皖东局面的建议¹

(1939年3月21日)

十五日来电收到。对你处工作有以下建议：

(一) 目前日人有扫荡皖东企图，国民党政权假使仍不能及时的有效的进步，将会在这次敌人进攻中遭受到更大的摧残。因此，党与8团队必须抓紧目前时机，一面加紧自己的工作与准备，同时推动友军友党进步，联合一致来粉碎敌人新进攻，创立皖东抗日根据地。

(二) 打开皖东局面的中心环节是在于我们部队的积极活动。我们愈能积极的打击民众所痛恨的汉奸土匪武装，则愈能取得当地民众，知识份子及军政当局的同情与援助，愈能使统战开展，愈能使部队巩固与扩大。

(三) 安徽当局在整个中原仍是最开明的，同时8团队有公开合法名义，故统战工作较其他各地都易建立，必须更加站在主动地位，团结与推动抗日的党政当局如李专员之类，争取那些今天还不真正是汉奸的份子，并推动与联合抗日份子如李专员，来打击与日本有勾结的汉奸当局，并向上级政府控告他们，唯我们与抗日当局接近时，要多采取隐蔽方式，以免他们因接近我们而遭受打击。

(四) 关于开创皖东党的提议：省委机关可设在总后方，经

¹ 1938年3月，由红28军改编成的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队自竹沟开赴皖东。这是朱理治起草的一份致张云逸、刘顺元、周骏鸣、林凯并告郑位三、郭述申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常开办党与群众的训练班，在游击队中发展党员，并调出一批党员训练后派到地方工作。在目前开创局面时应特别注意吸收地方上优秀青年到党内来，经过他们开展地方党工作及争取青年到我们一方面来。

（五）可用政治部名义出版一个小报，宣传自己主张及策略，[进行]革命宣传。

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创立 与扩大正规部队^①

(1939年6月11日)

在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长久的磨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

鄂中顽固派正竭力打击应城，我党力量应[放]在三、四支队。我党工作已无法掩护，望勿再迟延，立即编为新四军，免蹈杨威部队之复辙。

目前，新四军去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

目前，先念部在鄂中尚不合法。据云，军委会^②有电，令驻军驱逐信阳之新四军，鄂中友军亦有可能接到同样命令。你们除加紧扩大巩固部队，并严加警戒外，要向五战区、石专员及其他友军等处，加紧统一战线工作，求得新四军之合法，至少是[使]反对我们的工作减少。

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要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战斗力量。

^①这是朱理治起草的以刘少奇同他名义给李先念、陈少敏、杨学诚的电报。此时：刘少奇在延安，由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

^②军委会，指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

关于统一豫鄂边武装部队 指挥的提议¹

(1939年9月18日)

(一) 关于边区游击战争的新情态及方针已拟一个决定，转上级审查并指示。

(二) 为应付目前顽固派进攻及建立豫鄂边根据地起见，鄂中、鄂东原有的武装有建立统一指挥的必要。

(三) 统一指挥建立之方针，我提议最好将江北指挥部之子息同志派来竹沟，或即去前方组织军政委员会，或由延安另派人去。如不可能，要即从述申、位三及我三人中决定一人。

(四) 如此种方案不行，可暂时指定前方军政同志统一指挥。军事干部自然以李先念为适当……政治委员拟派方正平同志前去，依我[看]来此间的豫南军政干部，政治上较开展的还算他。

(五) 以上提议请予考虑，请电复。

¹这是朱理治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竹沟事件经过^①

(1939年11月20日)

竹沟正式报告：11号，确山县长纠合信阳、确山、泌阳三县常备队约1800人，拂晓冒充68军骗入寨门，占领东炮楼，当即发生战争，直到黄昏将敌人打退，夺回东炮楼。相持至翌日晚8时，将城内所有干部与全部武装退出东关外，被冲散的3中队及印刷厂的武装均已归队，计打死敌人约百余。我方损失：被消灭一班，死分队长一，政指^②一，中队副一，敌人将周团长^③之家抄洗，十余重病号恐不免遭难，老百姓死者甚众。在战斗中，竹沟周围地方武装集合了二百余，现已与国华^④部一起在龙窝一带行动。战士战斗情绪很高，都要求打回竹沟去。

我处明早拟派一个大队，绕黄龙寺东压迫信阳县长，以便将四望山根据地与竹沟打成一片，并送去4000元给国华，在信阳、确山一带收集地方武装，扩大宣传，争取群众，整理该一带地方党。

^①这是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②政指，即政治指导员。

^③周团长，即周骏鸣。

^④国华，即王国华。

论目前鄂豫边的新形势与新任务^①

(1939年12月)

目前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而鄂豫边地区正是敌我相持的地带。自从去年底敌人占领这一地区后，几次企图依靠鄂豫边为前进阵地，向襄樊、宜昌、南阳进攻，但因为正面国军抵抗与敌后游击队首先是新四军的牵制，都遭受到惨败。因此，鄂豫边界形成了拉锯的状态，形成了各不相下的相持局面，毫无疑问的，过去一年来新四军在鄂豫边、武汉外围的积极活动，曾经大小百余次的战斗，杀伤俘虏敌伪军达5000人以上，牵制敌军达两个师团，这不能不是造成鄂豫边相持局面的有力因素。

因为鄂豫边相持局面的到来，所以敌人缓和向国军正面的进攻，而把他的力量主要的用来“扫荡”敌后游击队，首先是新四军。敌人“扫荡”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依靠自己的武装，来进攻敌后军队，摧毁我之政权，强化伪组织，进行经济开发，以达到他确保占领区域、巩固武汉外围、布置前进阵地、准备新的进攻的目的。因此，敌在鄂中正在大修公路网，增加据点，限期成立各县伪县区政府、伪保甲，准备明年元旦正式成立伪湖北省政府，并从前线抽调兵力，实行搜山与“扫荡”。最近，敌人调动飞机大炮，集中兵力向马家冲新四军根据地的五路围攻，便是敌人对鄂豫边“扫荡”的开始。虽是这几天来，因为国军反攻，敌人又

^①1939年11月中旬，朱理治在大别山主持召开中共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决定将这三个地区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统一编制与指挥，建立豫鄂挺进纵队。这是他在那次会议后写的一篇文章。

缓和了对敌后的扫荡，但是只要前线的反攻稍一停止，敌人更大的更残酷的进攻，必然会到来的。

然而，敌人军事的正面进攻还只是敌人进攻的一方面，敌人还有进攻我们的第二个方法，这就是采取以华制华的“法宝”，引诱鄂豫边抗战不坚定的分子，实行反共反新四军，使得鄂豫边抗日游击战争遭受到两面的夹击而归于失败。所以，它提出了“皇军只打新四军，欢迎一切其他军队投诚”。现在竟有些丧尽廉耻的民族败类，响应日寇号召，向日寇屈膝投诚，并替他反共反新四军。

例如，黄陂孝感的刘梅溪、利亚卿、杨希超，原来便是伪军，近在日寇的指挥下，表面上受友军的编，以便更容易来进攻新四军，事实上仍是十足的伪军，在花园、肖家巷日军指挥部建立了办事处，领取敌人的津贴，不断地向新四军进攻。在豫南，有确山县许工超，当新四军在前线作战方酣之时，他竟妄动干戈，进攻新四军在竹沟的留守处，杀伤新四军伤病员及军人家属达 200 余人。我们虽不敢武断证明许工超已是受了日寇的收买，所以替敌人效犬马之劳，但许工超这种行为，客观上确是响应敌人号召，帮助敌“扫荡”抗日军队，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还有一些人在那边胡诌乱说新四军是不合法的，并假借蒋委员长的命令，驱逐我军离开敌人后方。这种人不是受人愚弄，即是受敌指使，因为新四军是正式国军，蒋委员长在今年“七七”告沦陷区域民众书上还号召敌后民众组织游击队抵抗日本，为什么我们敌后民众起来响应了蒋委员长的号召之后，反而又成为不合法呢？所以，驱逐我军出鄂豫边，显然是敌人的阴谋诡计。

因此，我们认识到，目前业已到来的鄂豫边相持阶段，虽然是向抗战胜利道路前进的阶段，但也同时是鄂豫边游击战争最困难的阶段。因为，一方面要抗拒敌人军事直接的“扫荡”，另一方面要遭受敌人后备军即鄂豫边的反动派、顽固派、投降派的破

坏、捣乱、暗算。这种两面夹攻，无疑的将增加我们很大的困难。对于这种困难，我们决不应当轻视，过低估计，因为这样便会松懈我们的工作与我们的精神，在突然事变来的时候，会遭受到意外的打击。

但是，我们亦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鄂豫边游击战争不能坚持了，或是说游击战争不能发展了。这些结论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知道敌人虽然可以从前线抽调兵力回来，但因为正面有国军的对抗，它可能抽调的兵力亦不会很多；现在抽调来鄂中的兵力，多是在各线退下来的败兵残将，战斗力很弱，攻击精神更差。敌人在鄂豫边的伪政权，还没有什么群众基础。同时，反动派虽要响应敌人，进攻鄂豫边游击队，驱逐新四军，但这种丧心病狂的罪恶行为，必然要遭受到全国爱国人士的反对。而另一方面，鄂豫边敌后游击部队已经生长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创造了自己的游击根据地，获得了鄂豫边广大群众的拥护。依靠着广大民众的力量，我们能克服任何困难，坚持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将来配合正面国军的反攻，一定能够把武汉收复回来。

根据目前新形势的到来，我们在这一阶段的总任务，是在于准备自己的力量，粉碎敌人对我们的“扫荡”，坚持鄂豫边的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蓄积力量准备反攻，打到武汉，把敌人赶出中国去。

为要完成以上任务，我们第一，要加紧巩固与扩大敌后抗日武装，积极地灵活地打击敌人，来配合国军在前线反攻。同时，为要使得鄂豫边游击战争得到互相配合与一致行动，必须立即将敌后抗日武装，建立统一的指挥，以便在总的方针之下，一致行动起来。

为要适合目前形势需要，新四军在鄂豫边所有的武装都已合编为一个游击挺进支队，进行整军，并誓死留在鄂豫边坚持游

击，一直到把敌人打出武汉。在整军过程中，新四军还连续不断地与敌人作战，配合了国军正面反攻，给予敌人以很大打击。

第二，要瓦解汉奸政权。根据10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各级组织纲要，将敌后政权切实予以改造。同时，注意民生主义的推行，实行激进经济政策，改善民众生活，广泛地将全鄂豫边的民众组织在各种救国会、十人团、农会、工会、妇女救国会等等的下面。

第三，要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大家应当知道，目前业已到来的相持阶段，我们的困难将比之以前要大大增加，假使鄂豫边的各党各派各军与各级政府不能通力合作，精诚团结，其结果必定要被敌人各个击破。所以，敌人对新四军的“扫荡”，也即是对其他一切友军的“扫荡”；同样，敌人对任何友党友军的进攻，也就是对新四军的进攻。我们需要结成一个敌后铁一般的抗日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敌人的“扫荡”，渡过困难的阶段。因此，我们鄂豫边共产党与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向一切友党友军作再一次大声呼号：大家放弃任何阶级与党派的成见，不中敌寇挑拨离间的奸计，不中反动派、投降派、顽固派制造磨擦分裂团结的阴谋。假使有人丧心蔑理竟至替日寇做清道夫来进攻与驱逐我们敌后抗战武装，大家必须鸣鼓而攻之。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敌人围扫，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配合正面国军反攻，一直打到武汉去。

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¹

(1940年4月)

(一) 中原游击战争发展之特点

目前，华中游击战争是迅速地开展起来了。敌人占领华北，正遇到八路军，被打得不得开交。敌人进攻江南，又遇到新四军，又被打得不得开交。至今进攻中国的寇军，倒有半数以上被我党领导的部队牵制住了。敌人满以为：当他进攻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带时，总可以避开这种不幸的厄运了。然而，它的这种想望并未达到，它现在一样的被中原的游击队所搅乱着，牵制着，苦恼着，也是同样的不得开交。

中原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华北与江南比起来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特点，华北与江南游击战争是有八路军与新四军为基础的，这个基础是经过十年内战所产生与锻炼出来的老红军，依靠这个老底子为骨干，来开展华北与江南游击战争。但在中原并无这个老底子。假使说有的话，只有过去鄂豫皖所遗留下的一个游击队。（略）除此之外，只有一个五六十人的豫南游击队。所以，在华中一般说来并没有老底子。要开创中原游击战争，就必须从新创立自己的武装。

¹1940年3月，朱理治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奉调回延安。这是到他到延安后写的一篇文章，署名“焯岗”。

第二个特点，就是华中游击战争是在敌人与顽固派两面夹攻之下生长起来的。敌人占领了新黄河以东与沿长江及武汉外围地区[后]，一面积极企图向中原继续前进，一面又感到兵力不足。所以它在华中有两种占领方式：一种只作点线占领。敌人占领形式好比“工”字形一样，沿陇海路、津浦路及长江，占领了若干据点，配置了相当兵力，保护运输要道与重要城市。而在“工”字形两旁有很大一片土地，有很多城市，敌人并未占领。另一种方式，是在武汉外围，这是它的主要前进阵地，所以在那边，除掉点线占领之外，敌人还企图作面的占领。在前一种方式下，敌人主要的利用汉奸伪军，同时利用两面派、顽固派武装来进攻抗日游击队。在后一种形式下，敌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兵力来进行扫荡，同时也仍利用两面派、顽固派的武装，来反对新四军。所以，华中武装在它一开始创立起，便受日寇与顽固派的两面夹攻。这和华北与江南有些不同。在华北与江南曾经过一个时期，那时统一战线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开始磨擦少，并可形成如冀察晋边区等进步政权形式来支持游击战争，但在华中则没有这种情形。

第三[个特点]，由于敌人与顽固派两面夹击，再加以原来并无武装基础，有之也是很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创造华中的武装，必须要很快的扩大，很快的巩固。在华北，五倍十倍的发展，已经是极其伟大的成绩，因为那边的武装基础原来就大。但在华中，一年内发展五倍十倍，这并不能算是成绩。因为，原来基础小，就是发展了五倍十倍，仍是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在华北，因为有好底子，所以很易巩固，新创部队可以轮流给予一个整训，但在华中，成天在战斗环境中，部队一成立，就需要很快巩固，否则便会有坍台的危险。

如何使得没有党领导的武装的地方，能够创立起武装出来？如何使得这种新武装能够应付敌人与顽固派的两面夹攻？如何使

得这种新武装，在两面夹攻之下能够大量的扩大与迅速的巩固？中原游击战争在这方面创造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敌人已经占领但是还没有开展游击战争的地方，以及对于那些敌人可能占领的地方，对于这些地方党，是很有帮助的。

(二) 如何准备游击战争

中原游击战争所以能在敌、顽夹攻之中，从没有老底子创造出相当庞大的武装，其原因就在于中原的党，当敌人尚未进占之前，就有了发动游击战争的准备。所以，当敌人一占领以后，游击战争便很快的发动起来了。假使没有这种准备，华中游击战争便不能发动，即使能发动，亦必因“先天不足”而容易受到挫折与摧残。

当着抗战发动之后，尤其是当济南、保定失守之后，河南省委及其所领导的苏鲁边区就看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这一块地区，将来不可免的变为战区，因而也就可能沦陷。所以从那时起，便把准备华中游击战争，作为总的任务。这是因为：(1) 中原将近一万万同胞，当时最迫切的要求是：当着敌人到时，有人能够领导他们打游击。(2) 领导群众，发展游击战争，这是中原党打击敌人、帮助友军最有效力的工作。(3) 在敌人未到前，游击战争的准备越做的完备，敌人到后，就越有办法。所以当时我们就把准备游击战争，作为自己的总任务，一切的工作都是为实现这个总的任务。

然而，准备游击战争，决不是空唤几句口号所能完成的。要使游击战争准备得好，就必须要做好以下三种工作：

一、必须把统一战线做好。有了统一战线，然后和各党、各实力派、各地方当局、各开明绅士共同去准备，就可能公开的、放手地去准备。当着敌人压境的时候，那时不只是群众，就是连

各地方当局，各地实力派甚至于进步的绅士与党派都需要准备游击战争，并且希望共产党八路军派人去帮助他们办训练班，训练部队。经过统一战线活动，在河南与苏鲁边就有 5 个专员、18 个县长、5 个地方实力派、3 个国民党县党部和我们建立了各种各式的统战关系，共同准备游击。自然，今天形势逆转之时，统一战线的范围要小一些，但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客观可能性还是存在着，特别是接近敌人的地区。

二、必须把游击武装事先准备好，以便敌人到来，立即可以发动。在统一战线建立起来的地方，自然可以利用合法名义来准备，把部队事先组织起来，给以训练。就是在顽固派压迫之下，党也可以经过党员与群众，采取有组织或无组织的形式，团结一部决心打游击的人，事先准备调查，埋藏一些枪支，可能时采取看更队、自卫团等方法给以一些必要的军事训练，准备游击战的干部。在敌人还未占领的地区，准备起来的武装送赴敌后作游击战争的基础的，在竹沟有 3000 人分派给皖东、苏皖边及鄂中，在西华有 3000 人给苏皖边，在信阳有 2500 人给鄂中；敌人来时，可能发动、尚未发动的武装，估计有 9000 人。

三、必须创立强大巩固的党与群众工作，这是准备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条件。因为，即使统一战线与游击武装没有准备好，只要那个地方有党，并且有决心有办法准备在敌人到后发动游击，那么游击战争仍然是可以发动起来的，只不过是困难一点而已。

为着易于明了，我举几个关于准备游击战争的实际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有名的确山竹沟。它之所以有名，也就是因为它在准备华中游击战争上起过很光辉的作用。竹沟是豫南、信阳、确山、桐柏、泌阳四县交界的地方，原是一个土匪寨，在国内战争结束时，仍保存有在我党领导下的 60 个人枪的游击队伍，国民党的部队虽是与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仍是企图消灭这个武装。当时曾有人指示要解散这个武装，以便进行统一战线。

中央于1937年6月^①决定我去负责河南省委，并将该关系交我后，即去信决定：该地区的游击队非但不解散，相反的在坚决地进攻与消灭该地区的土匪中来巩固抗日的后方，来和当地地主绅士与国民党军队建立统一战线，并借此来扩大与巩固这一武装，准备作华中游击战争的骨干。

根据这个路线，党在竹沟首先创立了1000人的武装，后改编为新四军第8团，这就是今天皖东游击战争的基干——新四军第5支队。接着又成立一批武装，由萧望东与彭雪枫分两次出发赴豫东，这便是今天豫东新四军第6支队的最初基础。接着又创立了2000人左右的武装，派赴豫鄂边，这就是今天李先念同志率领的新四军鄂豫挺进游击纵队的最初基础。同时，利用竹沟先后开办了6期教导队，训练有1500余干部，还办了报务训练班、译电训练班、医务训练班、敌军工作训练班，供给前方部队。在豫南，土匪是被肃清了（竹沟事变之后，土匪又起来了），与当地的驻军、政府、地主绅士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党也创立起来了。竹沟一时成为中原游击战争领导的中心，虽然后来被汉奸顽固派所摧残，但它已经对于华中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创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二个例子可以举出豫东。当敌人将要进占的时候，那些地方因为历史关系，党力量很小。但即是这样，三个县里的同志都在事先做好了武装准备，并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当时，省委派当地群众首领吴纯甫同志回去领导，结果敌人一到，当地很快地发动起游击战争，与竹沟派去的武装汇合起来，开展了豫皖苏的游击战争。

^①中共中央决定朱理治负责筹建河南省委的时间应是1937年5月，这里说的6月恐为笔误。

第三个例子可举出信阳、明港^①与光山。那边因为顽固派的压迫，所以不能事先组织武装。敌人去年7月间一度进占明港，但不[过]三日就退回去。由于该地党有了充分准备，所以在敌人进占的三天之内，三个支部发动了近600人的一个团。

第四个例子可以举河南西华。抗战爆发后，我们用乡间土霸胡晓初在西华开办训练班，成立武装。胡晓初思想转变，加入组织。因为有了实力，所以和西华县长建立了统一战线，取得了合法名义，成立了两个支队。后来，国民党[将它]收编为第七路，每月津贴2万元，企图排斥我党领导。但津贴了10个月，终没有能够把部队带走。后来，河南省委派了代表团前去领导，将2000余人枪带过黄河，编入雪枫部队。

其他类似的例子还多。总之，华中的经验，证明一切有准备的地方，敌人到后都可发动游击，那些事先不加准备的地区，每每失掉时机，很难发动。这证明游击战争必须充分准备！

以上三个工作，是准备游击战争的三位一体的工作。然而这三个工作，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重要的。例如，当着统一战线向上发展的时候，那时统一战线是准备游击战争最重要的一环。因为，统一战线发展了，武装也就容易准备，党也就容易大量发展。但当统一战线向下发展的时候，顽固派极力破坏我们党、群众、武装与统一战线的时候，准备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就变为如何巩固党的组织。因为，只要党能巩固，敌人到时，我们仍能发动游击战争；敌人不来，我们仍是巩固组织。

在中原准备游击战争的问题上，曾发生许多不正确的偏向，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一种]，有些人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不知道“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因此，在敌人将占领

^①明港，位于确山与信阳之间。

的地区，不知如何准备游击。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工作或是一般统一战线或组织工作方面。这些工作当然是重要的，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把这些工作与准备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因此，当敌人占领了这些地区时，这些工作就失其依据，而游击战争因为没有准备也开展不起来。

第二种，是把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对立起来。有些人忽视上层统一战线，甚至于认为上层统一战线多做了，会妨害到游击战争的准备。他不知道在某些地方，某个时期，上层统一战线打不开，一切其他的工作都难于进行。另一种人则和他相反，他们认为在华中准备与开展游击战争，便会妨害上层统一战线。这些同志不了解，正确的准备与开展了游击战争，在华中许多地方相反可以巩固上层统一战线。

第三种，是把准备游击战争与巩固党对立起来。尤其当着游击战争准备好了而敌人不来，就怀疑到准备游击战争的正确性，认为党决定准备武装都是空谈，因而也就不加准备。及至敌人到来之后，那时才重想到准备，事已迟了。这是不知道准备游击战争与巩固党的辩证关系之故。准备游击战争与巩固党，不是对立的東西，游击战争的准备需要巩固的党，因为党如被汉奸顽固派破坏了，游击战争也就不能发动。所以，巩固党也就是准备了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在巩固党的基础之上来做一些发动武装的准备，这不只是不妨碍巩固党，而且可以使敌人到来时，党不至于因此而坍台与混乱。所以，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在敌人可能占领的近后方与战区，一面[要]巩固党，一面要在巩固党的基础上来准备游击战争。

(三) 如何发动游击

游击战争准备好了，不一定就能发动游击。假使发动时机不

对，游击队名义用得合，开始行动路线不正确，党在发动时领导作用薄弱，那也会使游击战争发动不起来，或在发动后仍失败。因此，现在就来讲一下如何发动游击诸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发动的时机。游击战争什么时候发动最好呢？要正确答复这个问题，自然要看当时的实际情况。但一般的看来，以在敌人已经占领，但尚未巩固或退走之前发动为最好。在敌人未到之前就发动，既可以帮助正规军抗战，又可以早些锻炼自己部队，自然对国家民族更有益些。但是顽固派却不允许你发动，你如过早发动了，它就会收拾你。你是不发动，只要给他看出你将要发动的样子，他们也会来摧残你。所以，在今天，当上层统一战线尚未做好的时候，敌人未到之前发动是不适当的。

但是，等到敌人到达好久之后，那时汉奸维持会已经组织起来，反抗的民众或已逃亡，或被压服，顽固派（他们当敌人到时都逃个精光）看到敌人已经退走，或是已经占领，于是又卷土重来，与维持会平分春色。到了[那]那个时候，去发动游击战争就困难了。所以发动不可太迟，要在敌人巩固统治之前发动起来为最好。

所以，发动游击不可错过时机。敌人已经过去，汉奸统治尚未建立之前是发动游击最好时机。不可过早，也不可错过。这个时期在过去华北比较的长些，但在今天中原比较短促，有的只有半个月，甚至三五天就过去了。

第二个问题是部队名义。部队成立后所用名义对于今后发展前途关系很大。部队名义大概不外三种：一种是直接用新四军的名义，第二种是用友军或其它合法名义，第三种是采用中间名义，既不是新四军，又不是友军，而是老百姓自己称呼的名义，如××地方的抗日游击队等等。

这三种形式，哪一种最好呢？假设当地环境许可，用第一种

名义，即直接用新四军、八路军的名义，自然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可以便于号召老百姓，而且可以免得野心家的覬覦。但这种名义在有些地方因为主观力量不够，反动势力过高，不能应用。

第二种名义，即用友军或机关委任的名义。这样，自然可以便于存在与生长，但一样有毛病。因为所有一切旧式军人，无不见枪眼红。反动派可以借此来把持甚至缴械，使你不能发挥力量抵抗日寇。过去鄂中许多采用这种名义的，大多都被人家吞并。要采用这种形式，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对，即给你合法名义的人，自己并无什么武装，对抗战与进步真正同情，正式同意共产党领导这个部队，并保证不会吃你。

第三种名义，即用老百姓自己的名义。敌人来了，老百姓自己组织部队起来保卫家乡。这个名义，一方面可以更加接近地方民众，一方面也是名正言顺。不过，这种名义只能用一时候。它的前途只有两条，一条是自动的转变成为八路军；另一条是因为自己力量太小，为汉奸或反动派所吞没。

所以，这三种名义各有好坏。我们应当因时因地，趋利避害，并根据客观情势变化，灵活地变换这种名义。总之，以便于打游击为原则。特别要注意不要因为名义不好，被反动派所把持与解散，过去华中有些地方不了解这种规律而吃亏不小。

第三个问题是发动之后的行动方针。发动之后，游击队应当做些什么，并能够做什么呢？因为游击刚一发动的时候，自己部队数量既小，又多系“乌合之众”，所以战斗力很弱，不能打大敌人。此时，应当利用敌人占领后，人民流离失所，人心惶惶，除打游击赶走鬼子外没有出路，利用这个机会来大量的扩大部队，收拾敌我战后所遗失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此时，汉奸必很活跃，伪政权必定抬头，伪军亦要起来。游击队首要的任务，便是要消灭这些汉奸、伪军与伪政权。力量小时，只能打击与消灭零星的敌人，等到力量大时就去消灭大敌人。总之，在游击战争初发动

时，行动要注意。因为这些部队只能在日常不断的小胜利中，才能够使战士们信心增高，力量增大。假使不自量力，企图用新成立的小队伍，立刻拿去与敌人大队相拚，结果必定是土崩瓦解。过去，敌人进攻豫东永城县，当地曾发动到 2000 人的游击队与敌人正面相持，结果不到半日，2000 武装完全瓦解，便是一个教训。

第四个问题便是党的领导作用。游击战争准备得再好，但当着敌人到后，党与群众及武装每每因为没有坚强领导而被冲散。所以，在发动游击战争时，党的领导作用最关重要。党应当派最得力的干部到准备发动游击的地方，加强该地党的领导。没有强有力的干部去领导，游击战争是发动不起来的。在敌人已经占领相当地区之后，该地领导机关就要考虑到将领导机关移到敌后或是分领导机关一部分去敌后。这是因为，敌后工作比之我后更加重要，更加复杂。有些地方党当敌人已将自己领导地区占领到一半了，还留恋在我后，不肯把领导机关移到敌后，不把主要干部用到敌后，结果使得敌后游击不能长足发展，这是一种失算。

正确的选择游击战争发动的时机，正确的选择游击队的名义，执行游击队发动时的正确行动方针，适当的配备领导干部，诚能注意到这四个问题，就能使游击战争顺利的发动起来了。

（四）如何猛烈的扩大与迅速的巩固

游击战争发动之后，日寇、汉奸、伪军、两面派必然的要从各方面进攻，企图使得这个武装尚未长大就被扑灭，党必须使它猛烈的扩大与迅速的巩固才能站得住脚。

部队成立之后，首先集中力量创立基干，这个基干便是当时所创立起来的武装中的主力。有了这个基干在任何战斗中，便能够有把握；有了这个基干，便能在所有部队中起模范作用，使其

它部队也跟着一起健全起来。

为着要创立基干，首先必须配置得力的军政干部，建立部队中的党与其它组织，建立部队中的制度与其它各种制度。过去竹沟派出的武装所以能起很大作用，便是由于他们到各地起了火车头的的作用并形成了主力。

[在]创立基干武装的同时，必须注意扩大。游击战争开始只能在很小的地区发动，但所有敌人占领的地方，都有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因此，必须立即派遣干部与人员到各地方去，推动各地方党都来发动游击战争，委任当地可靠的群众首领招募战士成立新的部队。游击队并可向各地游击，直接去号召与发动各地的游击。当敌人占领一个地区时，除掉我们发动的游击队外，一定还有很多的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的数量有时比我们要大好几十倍，但由于他们没有正确的领导，有时甚至为反动的领袖所利用与把持，往往会走到坍台、瓦解或被日寇收编为伪军的道路。所以，党的任务就要争取这些游击队，使之走到正确的道路。只要我们采取正确方法，那么，这些武装都可变为坚强的抗日武装。无论是彭雪枫支队也好，李先念支队也好，半数左右的武装大多是从这些部队争取过来的。

争取这些武装最主要的方法，首先必须是将自己部队整理好，训练好，多打胜仗，和民众保持密切关系，使他们感到只有跟我们学或归我收编，才能有办法打日本。第二，在这些部队遭受到困难，特别在战场上被日寇围困[时]，能够去援救它，帮助它，指导它。第三，当这些部队要求我们派人去领导他们，或是替他们做工作，我们应当派一些干部进去，埋头苦干，逐渐地改造这个部队，不要操之过激。对他们的首领要尊重他，帮助他进步。第四，经过这些艰苦工作之后，一般的武装都很愿意归我们指挥，甚至于归我改编。在它自愿的要求之后，我们可以收编它。他们如不愿收编时，仍使它做我们的外围军队。除非这些部

队被敌人勾引，一般不采用军事压力来收编这些部队。

当游击战争开始发动之时，政权与党的工作，一般的都很薄弱。此时，扩大部队的方法，主要是依靠以上所讲的一些。诚能这样做，部队就可以几十、几百倍的发展起来。

经过这样大量扩大之后，部队的成份一定很复杂，编制很混乱，指挥不能统一，战斗力也就不能提高。所以，此时必须进行整军运动，建立统一的指挥，进行同一的编制，洗刷不良成份，建立各种组织与制度，加紧军事政治的训练，克服游击习气及其它各种不良倾向，使部队走向正规化的道路。

经过整训之后，部队又可扩大，此时政权、群众工作与党已经具有规模，初期扩大部队的方法，即改编各种已成部队，发委任状扩大等等，已经是不够用，甚至不可能了。此时，必须进行扩军运动，经过党、政府、群众，动员地方武装与积极分子涌上前线。这个方法过去红军时代与现在的华北都有丰富经验，而在中原地区正在开始采用。

以第一次创立基于为巩固的开始，经过中间的扩大，以后又来一次整军；以第一次扩大开始，经过整军再来扩大。华中部队就是沿着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向着扩大巩固的道路前进的。

（五）创立游击队与统一战线

正确的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是顺利创立游击战争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目前磨擦加紧的时期与顽固派占优势的地方。

关于处理统一战线，我不准备讲一般的问题，只讲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合法与非法的问题。在目前倒退与磨擦加剧的时机，要在华中发动游击抵抗日本，虽是有利于国家民族，在真正抗战法律的观点上说是合法的，同时蒋委员长亦曾号召敌后民众

组织游击队，但顽固派今天决不允许你在形式上取得合法的地位，甚至于不惜破坏自己所订立的法律。对江北（所）已经允许合法的队伍，如江北新四军 4、5 支队与竹沟留守处，亦已经加以压迫、围攻。所以，你如果要依这些顽固派一手玩弄的“法律”来执行，任何抗日工作都不能进行，一切真正抗日游击队伍都不能组织起来。所以，在华中发动游击，只有求得实质的合法，而不被那种不合理的形式所限制、所拘束。因为，只要对于国家民族有利的，就是真正合法的；反之，就不是合法的。在敌后发动游击是有利于抗战的，因此，我们就要大胆去做，努力去做，真正把部队扩大与巩固，真正收复失地，真正建立抗战的功勋。自然，我们对一切有利于抗日的法令要绝对遵守，同时还要用我们游击队精忠报国的事实来感化那些顽固派，取得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的同情，以便消灭实质上合法[而]形式上不合法的矛盾。

第二点是关于政权问题。没有政权的帮助，游击战争不只是难于扩大巩固，而且连立足亦很困难，这可以说是一种规律。过去有些地方忽视政权工作，结果遭受到很大困难与限制。然而，在中原与华北不同。在华北曾经过一个统一战线向前发展时期，所以能够联合各党派创立出冀察晋、冀中、冀南等进步的统战政权；他们顺利的由上而下改造了政权。但在中原许多地方，顽固派、两面派（表面上是中国政权，但暗中是帮助日本的）把持了敌后政权，对游击队非但不帮助；而且还要处处压迫。在中原敌后改造政权工作很难进行，而原有的政权非但不能帮助游击队，相反的还处处妨害与摧残游击队。所以，在中原如华北一样从上而下的改造政权是不可能的。中原在开创时，只有采用从下而上为主，从上而下为辅的方式来改造政权。这即是在游击队所收复的地区，假使原有政权已经被敌人破坏了，或是已经确实的汉奸化了，那时就可以只请求委派或召开民众实行改选。这样，先来帮助恢复与改造下层政权机构，同时尽可能争取进步上级的政权

机构并使之充实与健全，再由上级政权机构来帮助下级政权的改造。在上级政权机构被两面派所把持而他们的汉奸面孔尚未揭露出来的时候，为要推动抗战工作，应当成立有威信有权力的过渡机关，如“动委会”^①，或几县联合办事处，来统一各种抗战的工作。

第三点是，游击队所活动之地区，必须要有广泛群众组织来支持它，掩护它。但在中原有些地区，敌人据点很密，反动力量很大，假使一开始如华北一样的组织各种公开的广泛的群众组织，有时非但群众不会起来，即是组织了也很容易被敌人摧残。所以，在开始时，中原有些地方组织了半公开的比较先进的群众组织，[如]在鄂中便组织了抗日十人团。这些组织对敌人是秘密的，所以易于掩护住；但对群众是公开的，所以它有很大力量，帮助了游击战争。等到现在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开展起来之后，再以这个组织为骨干，依照阶级与年龄、性别来成立公开广泛的群众组织。

第四点是，游击队对于友军的态度，应当尽力求得与他们联合一致抵抗日寇，不中日寇与顽固派的挑拨离间。只要能够切实的进行联络、联欢等工作，就能争取中间力量。对于进攻我们的顽固派，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要采取自卫的立场。要善于分别顽固派，有些顽固派，特别是与日寇有勾结的大顽固派，如他们进攻时，对他们应采取严厉态度；有些顽固派，今天还在打日寇，应尽可能使之觉悟，不与我们自相残杀，而结成巩固联合阵线，一致进攻日寇。

^①动委会，动员委员会简称。

(六) 结论

华中创立武装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只要敌人占领，都可以发动并且可以坚持游击战争。条件是：

- 一、地方党在事先要有发动的决心与准备，特别是党的准备工作；
- 二、发动时要有□□□□□□□□，适当时机与正确的政策；
- 三、发动后能够立即采取正确方法，猛烈扩大与迅速巩固；
- 四、正确的处理统一战线与政权工作。

这便是结论。

现在华中游击战争发动已两年多了，很需要把这种经验总结起来。以上所讲的只是初步意见，希望各同志能多加补充与改正。

关于边区物价上涨原因及 解决办法的几点意见¹

(1941年5月13日)

目前边区物价的上涨，以及法币停止使用后边币价格的低落，成为边区人民最关心的事情。边区物价为什么会这样上涨呢？物价难道就这样永远涨上去吗？能否使之稳定呢？边币的前途及边区银行的政策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回旋在边区人民头脑中，迫切的希望能得到答复。

最近边区物价的增高，据我个人的看法，有如下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受法币跌价及友区物价上涨的影响。边区过去是以法币作本位币的，这几个月来虽是停止使用法币，但边区的物价仍是以法币为标准的。法币跌价，友区物价上涨，边区的物价就不能不随之涨价，这是没有疑问的。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顽固派分子在发动“新四军事变”²后，对边区进行罪恶的封锁。他们隔断国外、国内各方面对边区的帮助，阻碍友区与边区的通商。这种封锁虽是顽固派的自杀政策，但在某一个时期内，也可能影响到边区物价一时的特殊高涨。不过，这个困难，只要我们能灵活执行任弼时同志所提出的经济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向各方面开辟贸易路线，是很快可以克服的。

第三个原因，在于边区目前的经济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过

¹ 1941年3月，朱理治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这是他写给供陕甘宁边区银行顾问团、银行研究室和行员参阅的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² 新四军事变，即皖南事变。

渡时期的困难影响到物价的上涨，这种过渡阶段在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1) 由大半的自给阶段向着完全的自给阶段的过渡。陕北在过去是一个完全的“非文化”地区，在军阀统治时代，是靠卖鸦片烟来维持国民生计与财政支出的，那时主要的生产品就是鸦片，其他各种物品，大多不能自给。这几年来，边区民众在毛泽东同志的生产自给的号召下，业已达到大半自给，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由于历史的遗产太少，直到今天还不能完全自给，所以，边区的生产与消费之间还存在着矛盾。生产品不够边区之用，外货又不能进口，供求的这种矛盾不能不引起边区物价的上涨。我认为，这一点是边区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

(2) 人出口正处在由不平衡向完全平衡的过渡阶段。由于边区有好多的物品不能自给，不得不购买外货，但过去数月内，边区产品的输出，抵不过外货的输入，所以形成入超的现象，由于入超，法币的需求量就大，于是形成某些地区边币的部分贬值。这是使得物价上涨及边币跌价的直接的和最重要的原因。

(3) 财政收支上由尚不能完全平衡向能基本平衡过渡。最近四年来，在毛泽东同志的休养生息的贤明政策之下，边区民众很少捐税负担，老百姓的生活是日益改善了。过去财政主要依靠外面的帮助，而现在亦正向着自力更生转化。

所以说，目前边区的经济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过渡阶段。它之所以伟大，就是它是向着自给自足的阶段迈步前进。尤其是在最近，经朱总司令^①、林主席^②、高岗同志直接领导与参加的边区生产和运输工作，使产业的车轮正在飞快的旋转。边区不久即可达到完全的自给自足。但今天，仍是处在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

^①朱总司令，即朱德。

^②林主席，即林伯渠。

困难，影响着最近物价的上涨。

第四个原因：是边区经济的严密的组织性尚不够。边区中央局^①的施政纲领决定，边区的贸易政策是反对垄断统治，实行贸易自由，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应知道，边区新民主主义的贸易自由，与旧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有其不同之点。因为边区的经济，除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之外（这是主要的），尚存有合作经济与边营^②经济，这后两种经济，是能够带有计划性与组织性的。可惜过去我们的边营经济与合作经济的组织性尚不健全，还不能对小商品经济起健全的领导作用，所以边区内经济生活上个别的不健全的现象仍是存在，例如自相竞争，高抬物价，囤积居奇，做黑市买卖等等。这种现象也是影响物价上涨的一个原因。

以上是边区物价高涨的四个原因。前两个是外部的客观原因，后两个则是内部的原因。我认为物价高涨的原因，主要的还是由于边区的内部原因。

这种现象难道就让它发展下去吗？难道我们不能想出办法克服它吗？不！我们决不让它发展下去！我们应当克服它，并且可以很迅速的克服。办法是什么呢？根本的办法是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土产运输工作，使土产能大量的输出，来抵消入超，同时减低商品的成本，使得输出不会亏本。只要能做到这些，边币一定能够与法币同一价值，并且以后可以比法币值钱，必要的外货一定能够源源进口，使物价逐步走向平稳。

第二，主要的还在于加紧生产，使边区迅速由大半自给自足，走到完全自给自足，所谓生产，正如朱总司令所说，是指的工业、农业、运输、畜牧而言。今天我们多生产一石粮，多织一

^①边区中央局，即中共中央西北局。

^②边营经济，即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的公营经济。

匹布，多出一张纸，多运一驮盐，就能使边区财产多增加一份，这就做了平定物价，巩固边币的有益工作。但假使今天做投机买卖，表面上虽是能够赚钱，实际上并没有增加边区财富，相反的倒使物价高涨，边币跌价，这是害人害己的罪恶行为！

第三，财政上的开源节流，保证财政的收支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使大部分的资金投到生产上；只有这样，才能使边区银行不致因财政的拖累而造成通货膨胀。今天，边区财政也正是在朝这个方向在做，我认为这样做是能够做到收支平衡的。

第四，加强边区的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所有公私营商店必须组织起来，在贸易局领导下执行法令，实行调剂物价。必须有组织、有步骤、有检查的执行林主席所提出的 1941 年的生产计划。同时，大大发展边区的合作经济。

只要能做到以上四点，一定能使物价平定，边币巩固，一定能使边区的民众生活更加改善。这些工作是可以不久的时间内做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努力。

说到这里，我来说一说边区银行的基本政策。朱总司令、林主席、高岗同志根据边区经济的现状，很正确的决定了边区银行的基本方针，这就是一方面边区银行应多向工、农、运输业放款，推动与刺激生产的发展，使边区的经济能够很迅速的由大半的自给阶段走到完全的自给阶段；但另一方面，又要尽量发展信用，减少边币的发行，使边币不致于走到通货膨胀的道路。边区银行的政策，便是建立在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所以，一方面要反对那种害怕发行边币，限制与束缚边区生产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反对无限制的过多的发行边币。目前边区银行的政策，便是根据这个基本的方针而来的。

我最近刚受命负责银行工作，对各方面还不够熟悉。以上所述，只是我个人片面的粗浅的了解，敬希各处人士能多多给予指教，以便对于我们边区目前金融概况有个完整的认识，大家齐一

步伐，配合前进。这是作者所盼望的。

给毛泽东的复信^①

(1941年8月)

6日手赐敬悉，谨将垂询各点分呈于下：

(一) 以前报告边区棉布人口，年为3000万元。彼时边币法币差价甚小，延至现时，该项数目，则当视为法币数额。惟法币本身价值较前又减，而边币与法币之间比值又平均为2:1，因此，全年人口棉布总值，以边币计算，较前大为增涨。

按边区现有人口，机关部队约计8万，人民约134.2万（边府本年5月统计）。据中财部^②推算，公家一年制做棉衣单衣各8万套，棉被4万条，共需洋布4.4万疋。又根据边府延甘农村抽查材料推算，人民每人每年需用土布3丈，全年约需5丈土布80万疋。所有二项布疋，除边区一年生产洋布2.62万疋、土布8万疋（本行调查估计）以人口棉花价格计算外，其余所需人口洋布1.78万疋，土布72万疋，依现时价格，共值边币6650万元。

边区全年所需棉花，以制做衣被及公私织布二项合计，约为182.83万斤，依现时价格，约值边币1828.3万元。

合计边区全年消费棉花总值（即需要人口总值）为8478.3万元。兹列计算简表于下：

^①这是朱理治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写的一份有关陕甘宁边区金融情况的报告。时间是按内容推算的。毛泽东在1941年8月19日致陈正人的信中说，这份报告“很有价值”，并建议作为边区中央局“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见《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

^②中财部，即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

公私消费布疋：	洋布	44000 疋	值	22000000 元
	土布	800000 疋		64000000 元
	合计			86000000 元
公私生产布疋：	洋布	26200 疋	值	13100000 元
	土布	80000 疋		6400000 元
	合计			19500000 元
需要进口布疋：	洋布	17800 疋	值	8900000 元
	土布	720000 疋		57600000 元
	合计			66500000 元

公私消费棉花	1247500 斤	值	12475000 元
公私织布用棉	580800 斤		580800 元
需要进口棉花 共计	1828300 斤	值	18283000 元

合计以上棉、布二项，每年需要进口总值共为 8478.3 万元。设若边区所需布疋全由边区内部自行生产，只由友区输入棉花，一年共需输入棉花 430 余万斤（中财部统计数），即进口棉花总值可由 8478 余万元减至 4300 余万元。

依现时市价，边区如能输出食盐 40 万驮，即 80 万担（每担 16 两称 100 斤），约计可值法币 8000 万元（平均每担值法币 100 元）。但由定边运盐至友区，每担在友区需开支盐税 14 元，人畜盘费 30 元（法币），在边区需开支人畜盘费 40 元，共计开支法币 3520 万元，边币 3200 万元（盘费只计去而未计回）。此外，在盐池需付盐价 1000 万元。列表如下：

收 入		付出与获利	
法币 80000000 元	盐 价 10000000 元	折法币 5000000 元	
	境内盘费 32000000 元	折法币 16000000 元	

	友区盐税	11200000 元
	友区盘费	24000000 元
	净 利(买路费未除去)	23800000 元
总计	80000000	80000000 元

由上列计算表可以看出，8000 万法币须留于友区者为 3520 万，边区取回者为 4480 万元。如出口不花买路费，运盐 40 万驮，可得净利 2380 万元，约合边币 4700 万元。若加上盐价 1000 万元，则运盐 40 万驮，共生产边币 5700 万元。

边区货物，除食盐外，可出口而不应出口者有羊毛、老羊皮、牛皮等项，可供出口者有二毛皮、毛毡、毛毯、毛口袋、毛线、甘草、生碱、煤炭、木料、猪鬃等项，准备出口者有行军丹、硫磺、新华墨水、新华肥皂等项。各项出口货物计：

二毛皮	可值边币	350000 元
毛 毡		1000000 元
毛 毯		2000000 元
毛 线		250000 元
毛口袋		600000 元
猪 鬃		100000 元
甘 草		1200000 元
生 碱		200000 元
煤 炭		120000 元
木 料		40000 元
共值边币		5860000 元

以运盐生产之 5700 万元与其他货物出口总值，合计一年输出约值 6286 万元。若以此数与一年应入口之棉布总值相较，尚缺 2192.3 万元。但边区需要入口者尚不只棉、布二项，不能自

给之文具纸张、警备区¹之煤、三边²之食粮及其他用品数额，亦非各区零星土产所能抵偿，故截至今日仍不易达到出入口平衡。

(二) 本年对公营事业放款，部分工厂获利不大，甚至根本不曾获利确属事实。但大部公营事业在本年自给问题上起着巨大作用，亦属不可否认。因是拟议对公营事业放款，以后仍要维持原额。惟需重新配备，设法调剂，如能发展者促其尽量发展，不能发展者则收回放款，转移生效最大之处。

对于私营事业，以后当依据下列原则，酌量放款 100—200 万元。

(1) 在农业方面，注重移民开荒，调剂灾区之急需，并于可能范围内帮助农民扩大生产。

(2) 在工业方面，注重发挥合作工业及家庭手工业，在适宜条件下，亦可帮助私营工业。

(3) 在商业方面，鼓励搜集土产向外输出，其他有利于边区对外贸易之商品，如遇资金不足，亦当予以周转。

(4) 在畜物业方面，主张暂不放款，因为向外购买畜种，需大量法币；买回畜种，一年以内不服水草，死亡特多。

对于私营事业增加放款，固可助其发展，然税收数额，除粮食而外，羊税商税都不易保证千万元之足额。

(三) 统一购货计划，目前实行集体会商，分散购买，自相竞争现象业已大大减少。

(四) 廉价运动³自 6 月 15 日开始至今，百姓所用必需品，

¹警备区，指绥德警备区。

²三边，原是陕北定边、安边、靖边三县的统称，这里指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分区，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等县。

³廉价运动，也称平价运动，即动员人民群众拥护边币，平抑物价的运动。

价格变动甚小，即或稍有增涨，亦系友区物价增涨使然。

(五) 严格管理金融，使流入边区之法币，银行手中掌握绝对多数。同时，收缩边币，减少流通量，使其不呈通货膨胀现象。此为稳定边币，提高边币之首要条件。其次，则须管理出入口，对外贸采取主动，尤其运盐出境，购入棉布，须团结人民与友区商人，驻军，建立良好统一战线。

上述二事如果施行得宜，预料边币可以稳定并稍见提高，同时，物价亦可稍见下跌。但最基本者，第一，必须发展生产，发展民间纺织业，以求尽速解决穿用问题；第二，必须财政有办法保证不再增发边币。如此，则边区经济近于自给，对外需求减低。彼时，边区物价、币值操我手中，自可随意左右。至于何时达到此种要求，目前尚难肯定。

潦草陈词，恐有未妥，鉴阅之时，尚请裁察。

边区经济与金融和贸易^①

(1941年8月)

边区经济的困难及其原因

今年上半年边区金融上的问题，实质上是财政与贸易的问题。而财政与贸易的问题，实际上是生产的问题。假使上半年财政收支与输出入都能够平衡的话，那么，金融上也就决不会发生问题。假使边区生产能够自给的话，那么，边区财政与贸易，也就不会形成这样大的问题。

(一) 边区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我认为，今天边区经济问题的根子在于生产与消费间的矛盾，这也即是说，边区目前的经济尚处在由半自给向完全自给状态过渡时期，生产上尚不能完全自给，因而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就发生矛盾。这个矛盾，以前由于获得外援而相对解决，到了今年，因外援完全隔断而尖锐起来。今年上半年以来，所有财政上的困难，贸易金融的困难，都是由于这个基本矛盾而产生出来。

边区是一个生产最落后的地方，历来陕北的统治者，都是靠鸦片来维持行政开支的。陕北的人口，据今年5月民政厅的报告是134万。脱离生产要公家维持生活的，据粮食局的统计有8.8万人，这中间恐怕有些空额，但8万人总有。除掉这8万人之外，还有抗属^②、机关人员的家属及工厂工人的家属要老百姓来

^①这是朱理治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告，时间是按内容推算的。

^②抗属，抗日军人的家属。

优待，这些合并起来，总不少于3万人。所以，134万人中，就有脱离生产的11万人。就是说，每100个老百姓，要养8个左右公务人员。这个比例，比之今天全国哪一个根据地都要大。据我所知，鄂中每150个人才养1人，苏北恐怕更要少，山东每百人养1个人，冀察晋每百人至多养3个人。同时，这个比例在边区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我记得“双十二”事变之前，边区34万人口，至多养2万人已经非常困难。去年，机关人员只有6万人，但到今年就变成了8万人。所以，边区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非常显著。

首先是粮食和草料。据我不完全的估计，三边要从外面买四五万石粮食，延安要1万石粮食进口。今年公粮只收到9万石，余下的6万石，是买的和借的。今年春季缺雨，加之公家收粮，粮价飞涨三四倍，马草马料亦不充足。边区粮食尚不是根本不够吃，但粮食缺乏，没有余粮，则是事实，一到荒年就不得了。再加之运输不便与调剂工作没有做好，所以不得不向外边买粮。今年全边区消费粮食180万石，向外买四五万石，在表面上看来，好似不多，但依今年粮价计算，就要2000万元边币。假设依建设厅向外买10万石的估计，就要4000万元边币。

其次是棉花和布疋。根据建设厅的统计，边区全年公私机关要用布20万疋，每疋以400元计，要值8000万元。如所有布疋都能自织，需240万斤棉花，计值边币2420万元。这240万斤棉花边区完全不能自给，同时这20万疋布，全边区只能自织5.68万疋，即只能自给28.5%，最大部分要从外面进口。据银行研究室的统计，今年棉、布二项需要进口总值共计为8478.3万元。兹列计算简表如下：

公私消费布疋

洋布：	44000 疋	值	22000000 元
土布：	800000 疋	值	64000000 元

合计		86000000 元
公私生产布疋		
洋布: 26200 疋,	值	13100000 元
土布: 80000 疋,	值	6400000 元
合计		19500000 元
需要进口布疋		
洋布: 178000 疋,	值	8900000 元
土布: 720000 疋,	值	57600000 元
合计		66500000 元
公私消费棉花: 1247500 斤,	值	12475 元
公私织布用棉: 580800 斤,	值	5808000 元
合计:		18283000 元

棉花布疋人口总值: 8478.3 万元

第三是其他, 如纸张、文具及各种日用品。依延安方面的比例, 棉布进口与其他各种日用品的进口之比例为四与一之比, 推算到纸张、文具及各种日用品的进口, 每年约需 2000 万元。

总计, 由于边区生产不足, 需从外面进口棉布、粮食及一切其他用品, 依今天市价计算, 约值 1.3 亿元。

(二) 边区财政收支的矛盾

由于边区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在这个矛盾的基础上, 便不能不发生经济与财政的矛盾, 表现在边区财政的收支上, 就是很大的不符。边区财政一年开支究竟要多少? 我手头上没有财政厅的报告, 同时, 现在的财政预算表上也看不出实际的

开支数目，只能看出财政厅所能担负的数目，所以得不到确实的数目字。根据我个人的推测，大概全边区每年财政开支要到6000万元（依现在的物价来推算）。推算方法如下：

(1) 据边区财政处的计算，依现今物价为准，平均每人每月的实际开支为：

伙食(每人每日3角)	9元
津 贴	2.5元
办公费	6元
临时费	2.5元
印刷书报招待等	10元
冬夏两季衣服	20元
合计	每月 50元
	全年 600元

这个数目字尚没有将粮食及房屋修理费包括在内。

(2) 根据我与延安县委书记谈话，该县的财政开支为：

县一级	人数	120人
	年需	8万元
区一级	人数	130人
	年需	10万元
乡一级	人数	120人
	年需	5万元
合 计	人数	370人
	年需	23万元

平均每人年需620元

从以上两个统计看来，可知现在边区每个公务人员每年平均的公家负担，大概总在600元以上。我所根据的只是下层机关的开支，上层机关的开支，可能还要大些。即使按每人每年600元

计，全边区现有公务人员为 8.6 万，全年行政开支也要 5100 万元。

以上还没有计算马匹费。全边区马匹大概有 6000 匹（计直属队^① 1435 匹，留守兵团^② 1685 匹，三五九旅^③ 800 匹，中央与边区一级合计 2000 匹），需要料 2.16 万石，草 1000 万斤。料以现金市价每石 400 元计，要 864 万元，草依每斤 0.8 元计，要 800 万元，草料合计共需 1664 万元。

全边区财政开支与马匹费合计约需 6700 万元，这里尚没有计算到各种行政开支。

全边区 8.6 万人，年需粮食计 13 万石，但因为浪费等原因，今年要用到 15 万石以上。去年收的救国公粮，只有 9 万石，今年买了不足 2 万石，借了 4.5 万石，合计 15.5 万石。依 500 元一石计，就要 7750 万元。

将粮食与其他各种行政开支合算起来，边区全年行政开支要 1.445 亿元。

下面再将全边区收入计算一下：

	上半年	下半年	全年
税收	140 万	270 万	410 万
盐税	120 万	480 万	600 万
公债		620 万	620 万
边区外债及补助		150 万	270 万
军委 ^④ 从前总 ^⑤ 借 120 万			
上年存款	100 万(中央?)	?	100 万

①直属队，指中共中央军委的直属队。

②留守兵团，即八路军留守兵团。

③三五九旅，八路军 120 师所辖的一个旅，当时驻陕甘宁边区。

④军委，即中共中央军委。

⑤前总，即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

小 计:	480 万	1520 万	2000 万
银行行政借款	225 万		
粮食借款	200 万		
小 计:	425 万		425 万
政府生产投资借款	400 万		
军委盐运借款	300 万		
半财政半生产借款	180 万		
银行直接生产投资	140 万		
小计:	1020 万		1020 万
合计:	1925 万	1520 万	3445 万

依照以上表格计算，上半年政府税收，只有 260 万元，依 6 月底边币价计算值 521 万元。前面估计，财政开支除粮食外，年需 6700 万元，半年需要 3350 万元。政府税收只占到上半年财政开支的 15% 强，财政亏空达 85%。假使把税收与借款合计，共有 480 万元，依 6 月底物价计值 960 万元，计占财政开支 29% 弱，财政亏空达 71% 强，假使把政府的行政借款 225 万元（粮食借款在外）合并起来计算，今年财政收入也只有 705 万元，依 6 月底物价计值 1410 万元，财政亏空仍有 2140 万元，这个数安，与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相当近似的。

这个数字内没有包括粮食。今年买了 1.5 万石粮食，另借了 4.5 万石粮食，合计起来有 6 万石粮食，依 6 月底价格每石 500 元计，就亏 3000 万元，半年亏 1500 万元，不过，上半年买的 1.5 万石粮食是用官价收买的，约花费 300 万元，其中 200 万元是从银行借的，有 100 万元仍将转作借款，改由下半年还粮。其

余 4.5 万石粮，交由下半年秋收后救国公粮中抵还。上半年实际只用了 200 万元。

亏空从什么地方填补呢？只能从生产自给填补。

（三）边区出入口的不平衡

由于生产不能自给，使得边区出入口不得平衡。根据贸易局统计，延安今年上半年输入总额是 6637000 元，输出总额是 2147000 元，入超 4490000 元。入超中大约有 60 万元是榆林转口之货，估计净入超 380 万元多。

今年上半年盐池出盐 9 万驮，自用 1 万驮，运出食盐计 8 万驮。这 8 万驮中，由庆阳出口者有 5 万驮，但这 5 万驮抵消了由庆阳输入 2 万到 3 万石的粮食与一部分的布疋，事实上也没有出超；由延安方面出口 1.5 万驮；另 1.5 万驮从关中出口。

边区入超地区除延安外，绥德是一个大人超地区。全边区合计起来上半年入超大概有 1000 万元，这其中有 200 万元是由关中抵消的。上半年关中是边区主要出超的地方，因为那边有盐出口，还有衣食村的煤炭。

由于边区主要出口货中 90% 以上是盐，因此，又给予了顽固派以操纵的机会。顽固派采取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的办法，将盐税由 3 元加到 18 元，将盐价由 130 元降到 110 元。抗战前，3 斤盐可换到 1 斤棉花，现在则要 5 斤盐才换到 1 斤棉花。

过去边区商业的发展，不是建立在边区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是靠贩卖外货为主的。所以，边区停止法币使用之后，私商因无利可图，资金立刻逃避，延安 10 家就跑走 9 家。

这便是今年上半年边区贸易的情况。

（四）边区金融的紊乱

由于财政的困难及贸易的不平衡，使得边币跌价。

边币的大量发行是因江南“新四军事件”后，外援完全断绝而被迫进行的，所以，各方面均无充分准备。再加之财政的急迫需

要，所以，不得不急促发行。现在边币发行又达到 1600 万元，平均边区每人要担负 13 元。冀察晋是 10 万人发行 50 万元，平均每人发 5 元，比之周围统治的伪钞，已经是跌落了。那个地区虽不巩固，但因有民族矛盾，边币还可向敌占区各方面流动，而此地四周均系顽固派统治区，边币不能向外流通，因此跌落更显著。

上半年，银行被财政拖累得一点气也透不过来，银行 1700 万元放款中倒有 1547.9 万元是属于政府放款与半财政半生产的放款。银行生产放款，表面上虽有 800 多万，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半财政性的。因为，如不放款给他们进行生产，就要给他们更多财政补助费。银行直接向生产的放款，不过 150.9 万元而已。

现在银行的资财共 2080 万元，其分布如下：

财政借款 823 万元；

贸易局与光华盐店^①放款 280 万元；

军委盐业放款 300 万元；

各机关财政周转 117.5 万元（中央的 61.5 万元，内有新华及华北书店 33 万元，军委的 42 万元布款，建设厅搬火柴厂的 14 万元）；

帮助各个机关自给基金 77.9 万元（内中央机关学校 21.9 万元，边区机关 13 万元，一二〇师及三五九旅 23 万元，留守兵团 20 万元）；

直接生产放款 155.9 万元；

分行资金约 158 万元；

总行资金约 200 万元。

由于边币发行没有准备，发得过急，并且发得多了一些，边币对内价格亦要一天天跌落，具体表现在物价的高涨上。上半年

^①光华盐店，光华商店的分支机构，为边区银行所办。

物价指数平均增了两倍，而国民党区域物价指数则不过增加了一倍。在上半年物价增高中，边区土产增高的速度比之外来品要快近一倍，边区土产指数为 343.7，外来品的指数则是 226.4。土产中尤以农产品增加得最为厉害，黑豆增加到 781.8，谷米增加到 615.2，麦子增加到 689.4。

其次，出入口的不能平衡必然要影响到边币对外价格的跌落。由于入超之故，银行又没有足够的外汇基金，逼使边币跌价。在法币已停止使用后，延安边币马上就要向法币贴水到两三毛。其后各地都贴水，到了 6 月底，全边区平均边币跌落到只及法币之一半。

由于边币对内对外价格的跌落；由于物价的上涨边区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同，有的是出超区，有的是入超区，使边币价格、物价亦不相同，并且时高时低，这就给予了公私商人以投机的机会，也给了顽固派以操纵的可能。投机、操纵各地都有，边币的流通范围日益缩小，而发行速度加快，结果使原来只有稍微多了一些的边币，变为多得很厉害了。

在困难中生长出来克服困难的因素

我在上一部分，已经报告了边区上半年经济方面的各种困难，这虽都是事实，但如果只看到黑暗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或者没有足够估计到边区经济在上半年中生长出很多的新的因素，就不会正确了解今天边区的经济，更不能订立出今后克服困难的办法。

我认为，今年上半年，边区经济在毛主席与中央正确路线领导之下，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就是说已经从半自给状态向完全自给状态走了大大的一步。它不只克服了上半年的困难，而且初步打下了今后克服困难的基础。

第一，在生产自给方面

上半年财政困难，依6月份物价计算，每月要亏空300万元。当时决定由银行向公家机关放款，使各机关自给。虽是因此而少向私人生产放了款，但由于向公家机关放款，使之能自给，弥补了将近三分之二的财政亏空。所以，上半年的财政开支，三分之一是从税收和银行借来的，三分之二是从自给得来的。否则，边区决不能克服上半年财政的困难，也不能克服下半年的困难。

边区县区乡一级用费，政府是没有任何补助的。我亲自调查过延安县，他们的财政用度，完全是从生产得来的，其中80%是从农业方面得来的，20%是从商业得来的。他们并没有多大妨害老百姓利益的地方，但生活比之过去只有好，没有坏。

在部队中我亲自调查过718团^①。他们到金盆湾之后，只借到银行4万元，除此之外，并没有得到多少别的上级补助。现在，他们已种了1万亩地，开了木工厂、铁厂、织布厂、理发馆、骡马大店、饭店等，而且大多都生了利。单是木厂，已得净利1.5万元。这几个月，他们完全靠自给，开始虽苦一点，但现在就好多了，和老百姓的关系也相当好。

三五九旅的各个团大多是自给。开始与群众关系不甚好，近日因自给有了基础，所以，在绥德这次平价运动中，王旅长^②不仅直接领导，而且拿出不少东西来平价。

据后勤部叶部长^③告我，军委系统下的生产，四分之一靠工业，四分之一靠农业，四分之一靠卖劳动力（自己挑运东西贩卖，或替公家筑路等等），其余四分之一是从商业得来的。所

①718团，三五九旅的一个团。

②王旅长，即王震。

③叶部长，即叶季壮。

以，军委系统的经费，四分之一是上面供给，四分之三是靠着自给。

现在团级以下及县级以下单位的生活，比之过去不仅不坏，反而好些。至于对工作与训练的妨碍，除学校以外，并不利害。718 团每连只抽出 10 个人从事生产，其余仍是训练。

银行直接的以及经过政府向生产的放款，约有 1200 万元。据最近各处的调查，绝大部分是用在了生产上。军委后勤部的 358 万元借款中，只有 10 余万元移作别用，中央一级也只是一小部分移作别用，合计起来，不足 50 万元。而今天的家当，绝不止 1200 万元，大概总有 2000 万元。

边区今年工业的发展，超过了任何一年。去年边区工厂共 33 个，现在已有 119 个；去年工人只有 858 人，现在有了 2373 人；去年资本只有 64.4 万元，今年资本有了 378.2185 万元。综合计算，生产力要增加 4 倍以上。

边区的织布工业，去年只能自给十分之一。但依建设厅统计，现在的生产力，已可自给 28%。依现有工厂，不再另设新厂，今年公家可自给 74%。加上私人可自给 54%，平均起来可自给 60% 以上。最近绥德的私人工厂亦开始运转起来，据报上公布，单绥德一地，每月即可织 2 万疋布，全年即可织 20 万疋布（这中间有小布在内）。到今冬与明春，布的生产力，可能做到完全自给。

其次是纸，现在已开工的有 5 个厂，假使全部的生产力都发展起来，亦可满足边区自用。

其他各种工业，亦正在发展中。

这些工业中，大部分是获利的。军委系统下的工业获利是相当大的，政府工业局下的工厂，因劳动力的来源不足，主要还是因管理未得其法，没有军委系统强大，所以获利甚小，甚至于个别的还亏本。现在，建设厅已在研究克服这个弱点。

第二，在财政方面

假使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只有靠银行发票子，那么，今年下半年财政上有500万元公债，300万元税收，可以够用了，不必再向银行借款。军委的衣服虽没有钱，但有3.5万驮公盐可以动用，亦可解决了。

由于生产自给在各地已经打下了相当基础，因此，今年下半年的财政开支，主要还要靠各机关的自给。即使到明年上半年，恐怕还要有半数靠自给。这是边区生产条件限制使然。因为，要靠120多万人，靠20多万壮丁，养边区将近10万的公务人员，这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之久暂，要看我们对私人生产帮助与领导的程度。但不管如何，总需要一个时间。

第三，在对外贸易方面

因中央局与政府之努力，大批的盐已经运了出来，下半年可能做到输出入平衡。年底之前，如能运足40万驮盐，就可有6000万法币进口，出入口即可得到平衡。假使运不到40万驮而只运足30万驮，亦勉强可以得到平衡。消极的原因是，今年边区农民布的购买力比去年要小些，但主要还是积极的原因，即边区的布已能自给28%，到今年下半年自给一半以上。假使能自给10万疋（大布）的话，可减少入口3000万元。因为，买织10万疋布的棉花120万斤，只需1300万元，如买布则要4000万元。其他如纸张等等，因能够自造，亦可减少很大输入。

过去，边区除盐之外，出口的货物是很少的，最近因为有了工业品如毛毯、毛线等，出口较多了些。计：

二毛皮	值	350000元
毛毯		1000000元
毛毯		2000000元
毛线		250000元
毛口袋		600000元

甘 草	1200000 元
生 碱	200000 元
煤 炭	120000 元
木 料	40000 元

以上总共可值边币 586 万元，这个数目亦可相当抵消一些入口。

在对外贸易上，过去因无组织，所以被私商垄断。现在贸易公司开始设立了，各个主导的公营商店大都组织了起来。（今天，最成问题的是碛口¹没有组织好）。这些组织再经过一个时期就能起较多作用，有计划地和顽固派作斗争。今天，边区的贸易在本质上已有了改变。过去，商店只是贩卖外来品，现在因边区工业相当发展了，内部市场已可看到不少边区的工业产品。有些商店，如西北商店专门卖边区产品，产品的种类也多了起来。

第四，在金融方面

因为财政上的拖累减少，出入口走向平衡，边币稳定的前提已经存在。只要财政上保证在 11 月底前不再透支，银行可利用这个时期加以整理，到 12 月初，边币即可提到法币的八九毛钱。经银行与贸易局的经营，到年底可抽出 400—500 万元，向农业及私人工业投资。

最近，边币发行速度降低，加之各地进行收集公债与各主要城市均先后进行平价运动，边币的价格在日益提高着。在 6 月底，边币跌价是最严重的时候，关中、陇东、三边，均跌落到法币的三四毛钱，好多地方根本拒用边币。现在，这种现象大部分被纠正了，关中与陇东的边币价格已提高到七毛。

平价运动能起多少作用呢？依靠平价运动本身，物价是不能得到平定的。延安平价运动一个多月，物价是相当稳定了。但后

¹ 碛口，黄河渡口，在山西境内。

来因盐务处一度停止使用边币，沿盐池到庆阳与关中一线的边币都大大低落，比之延安还贱；物价都突然提高，比之延安还贵。延安因许多原因未受直接影响，但间接的却受了影响。因为，庆阳、关中一带边币向延安流动，使延安边币又行下降，物价在7月底，又涨得相当迅速。因此，平价运动可以在边币最不稳定时稳定人心，可以推销与刺激边区产品，可以打击投机，可以调剂各地物价，使之不致无规则的涨落。但要根本稳定物价，最基本的还要靠边区生产的发展，出入口的平衡。在这个基础上，使得边币价格稳定，才能真正稳定物价。

今后的困难及如何克服

以上所说的“在困难中生长的克服困难的因素”虽是存在着，但大多数尚处在萌芽状态。我们对这些新的因素，不可不加认识，但亦不可估计过高。同时，亦不可因此而忽视工作中的弱点，今后的困难尚多得很，还需要比前更加倍的努力，才能克服。

我完全同意毛主席指示^①的总方针，即今后生产发展的方向，应向着私人经济与农业方面发展。过去，因外援突然停止，不得不从8万人自力更生的方向，找救急的办法。但假使继续这样做下去，就要钻到牛角里面去了。在我3月底4月初接受银行工作之后直接放款的140多万元中，只给718、717^②及骑兵团放款10万元从事农业，除此之外，是给各机关几万元从事混合生产，合计不到20万元，这个数字是太少了。同时，对私人的

^①毛主席指示，指毛泽东在1941年8月6日给谢觉哉信中对陕甘宁边区财经建设基本方针所提的意见。

^②717团，三五九旅的一个团。

放款，经过光华商店（未在银行帐上表现）给消费合作社放了20万元，给工业合作社放了10万元，给运盐合作社放了10万元，总共40万元。现在绥德分行亦放了一些。除此之外，放款给裕顺通¹5万元，以帮助延安私商，合计不足50万元。这些数目，显然也是不够的。根据毛主席这些新的指示，今后银行打算采取以下方针和办法来克服边区的经济困难。

（一）在发展生产方面

关于农业问题，毛主席提出的增收救国公粮20万石的计划，今年秋季恐不能做到，要靠加紧今年的冬耕和明年的春耕才能做到。今年秋收，大概只能收16万石粮食，因必须还4.5万石的欠粮（再不还更要失去信用，以后不好借了），故只余11.12万石粮食，尚缺几万石粮食，这是立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边区毫无余粮，只靠天吃饭亦是危险的，所以必须在明年更加发展农业，使边区有余粮存。同时，今年证明边区可自种棉花，为发展工业计，棉花在明年要做到自给。为此，要实现这几个目标：

（1）今年秋收后，发动老百姓广种冬麦，使之成为一个运动，保证明年5、6月间可收到很多麦子，公家据此可收两次救国公粮，以解决明年6月后的粮食困难。

（2）现在各地运盐工作，一般都做得好，但个别地方亦有妨害锄草的。现在老百姓运盐，都可有钱赚，故除6万驮公盐应带强迫劳动性外，其他20多万驮可多利用经济方法，使老百姓自己调剂劳动时间，做到既积极运盐而又不妨农时。

（3）明年强迫种棉花，今年底应做广泛的植棉宣传教育。

（4）由地方党政部门发动深耕与多种运动，银行进行农贷，今年拿100万元，明春3月前拿100万元。

¹裕顺通，当时延安一家较大的股份制商行。

解决布衣问题，要设法做到明年3月前布的自给。为此，要采取以下两个办法：

首先，帮助公家纺织厂，使之发挥生产力，其中主要要靠各工业领导机关加强对现有工厂的管理。后勤部叶部长有句话是：“工业生产第一要靠管理得当，第二才靠有无资本”。这是很对的。

其次，发动私人生产，主要靠绥德，然后是延长。由银行准备100万元，对手工业借款。

(二) 在解决今年与明年财政困难方面

要使得银行能够多向私人企业放款，最主要的条件是要财政上能够不靠发票子来维持开支。财政上小小一个漏洞出来就是几百万元，如要银行来弥补，就无力向生产投资。

毛主席关于收商业税800万元，羊税300万元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但即使以今年6月低的物价计，明年尚须6000万元的预算（除粮食款），商业税800万，盐税800万，羊税300万，合计只有1900万元，半数以上仍要靠机关的生产自给。

机关的自给，原系因财政困难，不得已而为之，难免有与民争利，妨害工作之处。然而，只要加强集中领导，在现有生产自给的基础上，明年3000万元之自给是容易做到的。

不过，应当注意到一个问题，即明年是否有突然事变。假使发生突然事变，生产自给就不易做到。所以财政上必须想一些特别办法，弄出2000万元的准备金。这种办法一定要有，并且一定可想得出来的。

至于毛主席所提的收集公草公料，也一定要执行，因为这样可省1000万元。诚能如此，明年银行即可不受财政拖累，而抽出700-800万元，投到生产上去。

(三) 在执行贸易政策方面

边区明年主要还是靠盐出口，明年可多组织运输合作社，使

老百姓有利可图，自动去运。除掉盐之外，由贸易局鼓励羊毛、毛毯出口，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开始。

在与顽固派的经济斗争中，主要的是棉与盐的斗争。要使棉与盐不等价交换的现象消灭，做到3斤盐换1斤棉，对外贸易必须要有相当的管理，并要逐渐统一公家的对外买卖。现在在富县交道镇的对外卖盐已经统一起来了，并将在其他各个口子上实行，这是争取贸易主动的主要条件。

平定物价主要是平定粮食价格。要使关中的粮向三边运，使三边不到境外买粮，可减少入口2000万元。所以，粮食调剂局（由粮食局兼）是应当马上开始工作的。

（四）在稳定金融方面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只要财政在今年不再透支，盐运出30万驮，到今年11月，即可把边币提到九毛上下，到今冬可抽出200—400万元投到私人企业上去，到明年可再投300—500万元。我们虽无必要把边币提到超过法币，但亦不可以使它跌得过低，因为，这样会影响到社会的生活，同时也会使我党政治影响受到损失。要做到这点，除财政、贸易、生产保证外，银行必须严格管理外汇（法币）。

管理外汇非常重要，但因各方意见不一致，迄今未能实行。现在，边区与友区在对外贸易上是联系着的，但在金融上是隔断的，因为边行不给兑法币。所以，在这两方面之间，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商人要外汇到境外买东西，银行不能供给，迫得他们在黑市中购买。老百姓到境外卖了东西，取得法币之后，决不愿到银行以一元之法币兑值5毛法币之一元边币，也只有把它在黑市上卖掉。我们成天叫“不许做黑市买卖”，实际是句空话。因为在今天外汇政策下，银行的法币只有出，没有进，黑市决不可能避免，除非对外贸易完全断绝，或者由国家完全垄断，而这二者都是做不到的。

由于有了黑市，边区银行不能调剂与操纵市价，顽固派则可利用各地汇价不同从中捣乱，破坏边币，边币价格就要完全操纵在人家手里，使边币价格人为的过分跌落。而任何商人，均得利用边币价格在各地的差价，做边币买卖，以取得差额；或做货物买卖，以取得额外利润。所以今年上半年，边币市场极端混乱。那时，延安边币跌价，而绥德边币与法币价格是一致的，边币便大批向绥德倾流。接着就向着三边流，以后就向着关中流，以后又到绥德。哪个地方边币价格高，其他各地的边币就自然的向那个地方倾流。于是那个地方的物价就突然飞涨，边币狂跌，买卖停顿，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突然动荡不安。等到这个市场破坏之后，顽固派、奸商与一些公商把边币差额赚足了，货币便又流到别的地方，破坏别的市场。这比之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恐慌，虽是性质与范围不同的两码事，但其振动的巨烈，则有过之无不及。

很清楚，这里之主要原因，是由于边区与友区的对外贸易相联系，而金融却隔断着。这个矛盾如不能解决，即使将来边币提高到与法币一致，危害仍是不能解决的。因为，外汇价格受供求原因所左右，银行不能强以调剂，一定会有差额。有了差额，一定要有外汇黑市买卖发生。我认为边区金融的大患，不在于边币的跌价，而在于边币价格不稳和随之而来的物价不稳。解决之法，我们早就提议，由银行来实际管理外汇，即以各国通例，由银行来买卖外汇。银行依市场买得外汇，同时允许人来向银行买外汇。具体方法如下：

(1) 假使全边区平均 200 元买 100 元法币，银行收买 100 元法币时，可兑给 100 元边币，另给他 95 元边币鼓励金。

(2) 假使有人要向银行买法币，需给银行 100 元手续费，即除 100 元边币外，另给 100 元边币，共 200 元买 100 元法币。

(3) 这时黑市可以避免，再加上政府严申法令，不许做黑

市，黑市即可消失。

(4) 银行在边币价格高的地方，如现在之关中，用边币收法币，使之不必高到5毛以上，如跌至5毛，即不再收。

(5) 银行在边币低于5毛的地方卖出法币，使之提高到5毛，过5毛后，即不再卖。

(6) 如全边区边币平均价格高到6毛、7毛、8毛，银行的鼓励金及手续费，亦随之减少，使整个汇价提高。

(7) 为防止顽固派与奸商操纵，凡是购买外汇的，都须取得贸易局之允许证，然后始得到银行买法币。

我认为执行以上这些方法，即可使得边币达到稳定。

这个办法，过去我们早就提出过，但许多人不同意，其理由是：

“这样自认降低边币价格，使边币失去信用。”其实，这种顾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今天边币跌价尽人皆知。而且我只说给予鼓励金与手续费，并未自认公开跌价。任何国家外汇，皆是时高时低，未闻他国外汇，即因此而失信仰。而且我们采取此方法后，可以杜绝黑市，可以稳定币值，这都是在实际上提高边币信用的。

“如果外汇买的人太多，银行不能满足供给，则外汇还会跌价，黑市仍会存在。”这个意见，也不能作为银行不能买卖法币的理由。因为整个出入口不平衡时，边币是一定要跌价的，银行即使不买卖法币也会跌价的。至于银行管理外汇后，局部地方购法币者多时，银行可以从别处调剂，并有贸易局允许制加以限制。这样，边币不致时起时落，否则，即如断线风筝一样，银行完全不能左右了。

“现在边币就会涨价的，银行跌价买卖，可能妨害提高。”我认为，银行公开买卖法币，只能促使边币提高，如果被顽固派、奸商在黑市上将差额赚去，反倒会妨碍边币向上提高。边币提高

到与法币一样，还要几个月。在这几个月内，如不实行外汇管理，市场仍是会动荡的。而且，边币即使提高到同法币一样时，外汇价格仍可时高时低，除非银行无限制兑现，才可能把边币与法币稳定在一个固定水准上。

“不必由银行垄断买卖法币，只须用货物调剂，即在某处外汇提高时，可购大批货物，贩到外汇低的地方去销售，吸收边币，压低物价。”事实上，边区交通不方便，货物比边币与法币难运，货物尚未运到黑市买卖，差额早被他人赚去了。

所以，我认为这些不同意见，都不构成什么大问题。银行需要管理外汇，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外汇，稳定物价，便利出入口商人，制止黑市。当然，单靠管理外汇来达到以上目的是不够的，不过，管理外汇，确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一点，我希望慎重考虑，加以研究与解决。

除了管理外汇之外，银行要发展业务，首先要采用有奖储蓄的办法吸收存款。其次，是建立金融网，发展汇兑、贴现等等事业。

我到边区工作还只4个多月，下面情形了解得很少，加之这几年来，对经济问题没研究，所以对以上意见并没有把握，只充作大家参考。

社会调查是决定金融政策的基础¹

(1941年8月21日)

出刊《经济简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收集与整理一些必要的材料，供给总行²、分行和总局³、分局作为决定策略时的参考。假使有一二可用之处，还可供各级首长参考。现在边区经济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过渡时期，这即是由半自给走向完全自给的过渡时期。国内外的环境均逼迫我们，要在很短促的时间内胜利完成这个过渡。边区银行的任务，就在于执行党与政府的金融政策，加强与巩固金融的力量，帮助、保护、推动与刺激边区生产的发展，使边区迅速完成向自给自足的过渡。同时，在边区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从而在内部财政巩固与对外贸易平衡的基础上，求得边区金融的稳定。

为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对于整个边区内部与外部的环境，有一个彻头彻尾的了解。根据这种了解，才能展现边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规律性；根据这个规律性，才能推动我们的工作向前发展。否则，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了解国际国内尤其是边区周围经济情况及政策，了解其每一变化，然后订立出我们的战略与战术。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致于和现在一样处处被动，时时挨打。我们要了解到整个边区

¹ 这是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经济简报》创刊号写的发刊词，标题为编者所加。

² 总行，指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

³ 总局，指陕甘宁边区贸易总局。当时朱理治兼任该局局长。

人民及公务人员的经济生活状况，了解到他们的困难与需要，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给他们以帮助；同时，还要了解他们有些什么可能来帮助我们，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取得这些帮助。只有这样，银行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基础，而不致陷于孤立；才能真正组织生产，而不致与生产脱节。我们要了解全边区每天的甚至于是每时的金融与贸易的行情，以便掌握行市，而不致做这种行市的尾巴。

应当承认，银行的调查工作，只是最近才开始的事。过去的调查，虽有了个别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弱点。如缺少一个全盘的调查计划与统一的调查大纲，调查尚是片断的、零碎的、没有系统的；调查很不深入，大多是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猜谜式的，缺少严格的科学的性质；调查机构不健全，制度不严密，许多情报不是得不到，就是得到的太迟；调查机关的相互联系不够，大家没有很好的分工合作，要么我们调查过的材料人家没有，要么人家调查过的材料我们没有，大家什么都调查，结果什么都没有调查好。

正是为了纠正这些弱点，我们特创办这个刊物，来组织这种调查工作。总行、分行和总局、分局，首先是其调查部门，在调查中都应注意以下数事：

- (1) 随时搜集与研究边区四周敌友的书报、电报；
- (2) 多找外来的脚户商人谈话，了解外面的情况；
- (3) 广泛进行农村调查与手工业的调查，研究我们如何向私人生产投资；
- (4) 系统的进行信用调查，将每个有关的户头信用情况了解清楚；
- (5) 与税局配合起来，进行出入口的登记；
- (6) 根据总行物价金融调查表，按时进行调查；
- (7) 与各个有关调查机关进行分工与交换材料（如系秘密材

料，要注明不许公开)。

我们并不奢望一下子就把边区经济情况都调查清楚，但我们总要痛下苦功，切实去干，在半年之内，总要调查出一点结果来。

我们应当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的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牢牢记住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的警句：“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之基础。”

边区的金融与贸易政策^①

(1941年10月23日)

边区自从禁用法币后，物价高涨的程度继续增长。今年5月以后，物价更普遍的高涨起来，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在各地与法币也发生了比差，人民生活因之受到某些影响，个别地方甚至十分严重。由于物价的暴涨，金融的紊乱，人民生活的不安，使边区老百姓对政府的责难出乎寻常，所谓政府什么都好，就是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这件事情做得不好。我们认为，边区老百姓生活感到某些痛苦与不安，是受金融紊乱、物价暴涨的影响，不是禁用法币、流通边币的直接结果。相反，发行边币的理由，正如林主席讲的那样，第一是抗议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行动；第二是解除边区老百姓所受到的法币跌价的影响；第三是发展边区经济，走上生产的全部自给。

在法币禁用、边币流通的9个月来，我们所确立的独立的金融政策取得了伟大的成绩。首先，我们已经可以安稳地渡过财政难关。其次，生产自给已经奠定了基础。布匹今年6月已自给28%，到年底可达60%，明年可以全部自给。棉花过去几年断了种，今年可产40至50万斤，明年后年更会增加。纸今年也可自给一部分了。盐的产量也提高了不少。这些都是在这9个月当中做到的。从我们发行边币以后的这些收获来看，完全可以相信政府的政策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当我们处在被四面包围封锁的环境中，特别是断绝了后方来源的条件下，只要我们不愿意饿

^①这是朱理治在陕甘宁边区专员和县长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死，同时又不愿意解散共产党、八路军，而要继续抗战，争取民族的最后胜利，那我们就要拿出办法来解决生存问题，这办法就是发行边币，树立独立的金融基础，以达到全部自给的话，是完全正确的。

虽然毛泽东同志的话和政府的政策已为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目前还存在着一些困难，这些困难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边币对外价值跌落，一般情况下，两元边币换一元法币；二是边币对内价值也跌落，购买力降低，物价高涨；三是边币流通地区缩小，有从边界被排挤而逐渐倾向内地的趋势；四是外汇的波动性很大，各地区的比价不同，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比价也不同。

这些困难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把原因找出来，我们的对策也就有了。

边币对外跌价的主要原因是出入口不平衡。去年上半年到现在，盐出口 15 万驮，大半是从庆阳与延长出口，占输出量的 90%。进口的东西是粮食和布匹（20 万匹，每匹值 500 元），占进口的 8%。由于入口多于出口，使法币的需要量超过了供给，造成边币跌价。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增加盐的输出量。在出口盐的过程中，我们遭受到顽固分子的封锁和破坏。他们把盐税由 3.9 元增加到 73 元，并用与我们订立合同购买去的盐来压低我们输出的盐价，以阻碍我们的输出。经过我们一再斗争，情况虽然较过去好转一点，但要转变 5 斤盐换 1 斤棉花的现状，争取过去 3 斤盐换 1 斤棉花的比价，还需要我们更好地拿起斗争的武器，和顽固派进行贸易战。另外，我们还要限制非必须品的输入，提倡使用土烟、土布等，以减少输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增加进口。明年，老百姓要在建设厅领导下组织运盐合作社，有组织有计划地实现运盐 30 万驮。运盐草料归粮食局负责，售卖统归贸易局负责，作到对外官卖食盐。老百姓的负担，除了缴公

粮外，就是运盐，一切其他动员都免除。只要我们积极地增加输出，消极地限制输入，展望明年的前景一定是乐观的。

边币对内购买力降低的基本原因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正是由于这对矛盾，造成市场上供不应求，财政上亏空，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克服的办法只有发展生产，缩减票币。明年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因为农民的生产力太低，40%的农民没有耕牛，我们要进行农贷，以提高农村生产力。另外，也要吸收一部分存款，以发展工业生产，解决公家需要的5万匹布，8000令纸。这样，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会缓和甚至消灭，边币的对内价值就会提高。

边币流通地区缩小，向内地集中，其原因是：一部分边界地区还没有彻底执行政府法令，没有严禁法币流通和提高边币的法律地位，没有使老百姓了解用边币即是边区的法币，还没有粉碎顽固分子在边界上的破坏和纠正脚户商人的投机。

边币外汇价格不稳定的原因在于，边区对外贸易的出口处太多。现在，出口处约有20个，各出口进出货物又不平衡，有时这个口子多进了一点，有时另一个口子又多出去一点。当进口多时，法币就涨，出口多时，法币就跌。克服的办法只能是严格管理贸易与调剂外汇。首先，各边区银行应当成立一个集团，互通汇，取得外汇的供求平衡。其次，要与邮局订立协定，与各地区通汇。为了防止商人大量向外逃汇起见，要建立外汇允许制以约束之。最后，要通过左右黑市来达到消灭黑市，并积极地调剂外汇需要。延安市已开始由裕顺通进行此项工作，将来，各地对外贸易区都要有这种雏形的交易所来进行掌握黑市的工作。

转变边区金融与贸易的现状，以达到全部自给与稳定的将来，还需要我们从各方面做大量的工作方是可能的。

边区金融问题的症结所在 及如何克服¹

(1941年10月)

自“皖南事变”发生后，顽固派即完全停发边区河防²战士军响，隔断国内外对边区的接济，加紧对边区的经济封锁。那时摆在边区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活活饿死，或是将河防部队解散，让敌人长驱直入，占领边防要地；另一条是动员边区民众与部队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边区全体军民，一致拥护毛主席的领导，走第二条道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建设边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今年1月，边府³关于停止法币、推行边币的政策，不仅是根据国府⁴财政部1939年冬地方金融会议的决议，为着防止敌人套汇而制定的，亦是我们在金融战线上，采取自力更生政策的重要步骤。

现在谁都看到政府这个政策是正确的。由于这一政策的推行，我们得以向工农业、运输业、商业投了将近800万元的资本，使边区经济由半自给状态向着完全自给的状态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过去几乎完全不能自给的布匹、纸张等工业，现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今年的财政困难，亦因得到金融方面的帮助而顺利渡过了难关。因此，河防战士非但没有冻死饿死，相反

¹这是朱理治在陕甘宁边区银行和贸易局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时间是按内容推算的。

²河防，即黄河防线。

³边府，陕甘宁边区政府简称。

⁴国府，国民党政府简称。

的，战斗力日益提高。一切民族与边区的敌人，都对此大失所望。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今天边区金融上存在着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表现在：边币对内价格的跌落，即边币的对内购买能力降低了，也就是说，边区物价日见上涨了；边币对外价格的跌落，即边币和法币的比价下降了（现在边币1元只值法币5毛），也就是说，边币的外汇价格降低了；边币外汇价格的不稳，时起时落，时高时低，影响到边区内部的经济生活，使之发生动荡；在边区各县，如关中、佳县、米脂，尚有拒用边币的现象。我们平时都说边区金融不稳，详细加以分析，不外乎以上这四种现象。这四种现象都是从不同的矛盾中产生出来的，只有分析清楚这些矛盾，即找出边币问题的结症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求其根治之道。

一、边币对内价格为什么跌落？如何加以克服？

边币对内价格的跌落和物价的上涨，原因甚为复杂，但基本原因：是由于生产同消费的矛盾，就是说生产不足而消费太多，拿到市场上去卖的生产品少了，买它的纸币多了。由于敌顽的封锁，由于边区生产力的不足，使边区市场上的商品减少了。依照经济学的定律，假使货币的数量不变，商品一少，货物就要涨价的。另一方面，由于今年财政困难，边币不能不相对的多发一些。依据同样的定律，假使商品的数量不变，货币的数量一增加，则货物亦要涨价的。可见，现在边区内物价所以高涨，不只是因为商品缺，亦不只是因为票子多，而是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要提高边币的对内价格，稳定边区的物价，就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从发展边区生产上着手，这是主要的；另一

方面从紧缩边币上着手，这是补助的，但也是极重要的。

为着要发展生产，减少货币，银行已经做并且还要继续做的事情是，大量向工农业和运输业放款。今年边行^①直接放款是在4月以后，那时我们向着工矿运输业投了不少款。现在冬季已临，为准备明年春耕，我们要准备大量资金与干部，发放农贷，刺激边区生产的发展，使边区生产品增多。同时，我们今后还要帮助出入口商人，进行贴现放款和抵押放款，使必需的区外商品仍能大量进口。这些是边行所能做到的刺激生产、增多边区商品的办法。

另外，我们要积极吸收存款，发起储蓄运动，推行有奖储蓄，健全金库制度。这些是边行所能做到的缩紧通货膨胀的办法。

二、边币对外价格为什么降低？怎样提高？

边币对外价格所以降低，换句话说，汇价所以跌落，其根源虽亦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中来，但直接原因，却是由于出入口的不平衡。进口的东西多了，出口的东西的少了，有了入超，所需外汇与法币就多。供求原则使得法币对边币的比价，必然日益提高起来。

所以，要克服边币对外跌价，直接的根本的方法应当从促进出口（这是主要的）和减少进口（这是辅助的）入手。

为要促进出口，减少进口，我们已开始采取并还要继续采取的方法是：

- （一）发展边区工业，使布匹、药品、纸张的入口减少。
- （二）推销边区土产，如促使盐、毛线等等多出口。

^①边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简称。

(三) 采取寓禁于征的方法，限制非必需品如香烟、迷信品等的进口。

(四) 开展使用边货运动，使人人以使用边货为荣，减少区外货物进口。

以上这些方法的推行，定能使边区出入口由不平衡走到平衡，使边币对法币的比价日益抬高。

三、边币的汇价为什么不稳？怎样使之稳定？

上述出入口不平衡，只能说明边币汇价跌落。但边币汇价不只跌落，而且不稳，时高时低，时涨时跌。这用什么来说明呢？

我们知道，出入口的情况是因时因地常有变动的。有的地方是出超区域，有的地方是入超区域。有时在一地之内，某一季节是入超的，而另一季节则是出超的。我们又知道，汇价的涨落，是服从于供求原则的。出入口情况一变动，外汇供求就变动，外汇价格也就跟着变动起来。这就是过去几个月来，边区各地汇价总是不一致，而每一个地区亦时起时落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奸商常常利用边币的汇价在各个地区之间和各个时间之间的差额，从中做投机生意，故使边币汇价的波动更加剧烈起来。

过去很多人未能找出边币对外跌价及其涨落不定的根本原因，总认为这是黑市作祟，因而主张用政治力量，强制1元边币兑换1元法币，不许边币与法币中间有比价。很显然，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今天顽固派不承认边币；友区不使用边币，边区亦不许使用法币，所以，边币和法币成为两种币制。既是两种币制，这中间就要服从供求原则，而产生一定的比价。这是经济法则使然，不是单纯政治力量所可改变的。

还有人主张根本禁止黑市。今天，边币既然和法币有了差额，银行要以1元边币收买1元法币，出口商自然是不愿赔本出

卖的。银行由于无法收到外汇，所以，亦自然不能供给外汇。在这种情况下，如要禁止出入口商人相互买卖法币与外汇，把这种交换叫做“黑市”而强行加以禁止，显然亦是行不通的。因为，边区与友区的贸易是相互联系的，既然需要相互交易，那么，边币与法币交换便成为自然的现象。没有这种交换，边区与友区的交易也就成为不可能。如强迫消灭这种交换，这正是等于帮助顽固派对边区的封锁。

以上两种方法，都不可行。要使外汇稳定，基本办法，只有依据经济原则来调剂外汇。具体的做法，有以下三种：

（一）由政府发布命令，授权贸易局组织货币交易所。

出入口商人，为了经营出入口买卖，均须到该所买卖法币。买卖价格皆依市价，银行从中加以调剂，使之不会过高过低。假定全边区边币与法币的价格为 2 与 1 之比，在货币交易所中，如边币汇价跌至 2 比 1 之下，则银行可以暗中抛出大量法币，买回边币。如此，则边币汇价必定提高，待达到 2 与 1 之比，即不再出卖法币，使其停在 2 与 1 之比。如边币汇价提高到 5 毛以上，即边法币的对比在 2 比 1 之上，则银行可以暗中收买大批法币，使其稳定于 2 比 1。又如甲地区边币汇价值 8 毛，乙地区只值 3 毛，但全边区汇价仍是 5 毛时，则银行可以将甲地区所买到的法币，向乙地区去卖，使甲乙地区的汇价达到平衡。假如全边区各地汇价平均起来超过 5 毛时，那时银行可将边区各地边币的外汇价格普遍都提高起来。以上方法，可使外汇价格不时起时落，同时亦可便利出入口贸易商人，使他们容易得到外汇与法币。

（二）银行应与各地邮局及边区内的商业银行及兼办汇兑的商号互相商定，要他们以银行所规定的比价，向外汇兑，约定一定时期清算一次。

清算结果，如汇出汇进互相平衡，则相抵销；如汇出多，则差额由他们以边币到银行兑换法币（以原定比例）；如汇出少，

则差额由银行继续批准，商人以原定比价向外汇出。这个办法，各地必须切实办理。因为这样做不只可使边币汇价稳定，而且可以发展边区与全国各地的汇兑业务。

(三) 建立边币集团，即与晋西北、冀察晋实行通汇。

双方依照事实上的币值互相协定一定比价，实行汇兑，亦在一定时期实行清算。这样不只可以促进边际贸易，且可使双方边币汇价均得以稳定。

四、边界为什么拒用边币？如何克服？

边币为什么在边境不能通行？为什么还有老百姓拒用边币的现象？基本原因非他，乃因政府法令未加贯彻之故。

现在边区周围，敌、伪、顽对边币破坏不遗余力，其最毒辣的办法，莫如指示其在边区的公开或秘密机关与奸商，买卖货物均不以边币作价，只要法币不用边币。他们知道，边币之所以能为人使用，乃因其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等等作用。要破坏它，必先消灭其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即使市面上买卖均不以边币作价，随之，就可消灭其作为流通手段的作用，即使市面上买卖均不以边币为媒介。这两种作用一失掉，则储藏手段、支付手段等等作用，便都消失了。因为，边币既失去以上两种作用，拿它买不到东西，则谁还要它作为储藏工具、支付手段？这样一来，边币便成为无用之物了。老百姓既不使用它，于是边币流通范围就要日益缩小，敌、伪、顽便得以大量的用法币到边区市场内抢（应读作盗）购边区物资。

过去许多同志不了解，敌、伪、顽这个奸计，采取自由放任态度，不用边府法令来保证边币的行使，致使边界各地竞相发生拒用边币的现象，边币日益向着边区中心地带倒流。

应当知道，任何国家的纸币都是用政府法令来保证其流通

的。

民国 25 年¹，政府推行法币政策，亦是运用政府权力。现在，边币既经边府规定为目前边区内部使用的唯一货币，各地政府即应用政府权力保证其流通。谁拒用边币，谁就是破坏法令，就是犯法，任何人均得将其扭送当地公安、司法机关，从严惩处。我想，只要各地政府明了这个道理，切实执行政府法令，就能消灭拒用边币的现象，就能将边币向中心区倒流的波浪推转回去。

不过，这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边界上老百姓所以拒用边币，除政治原因外，还有其经济的原因。即在边界上，友方的经济实力大于我们，老百姓依赖于友区的商品，比之依赖于边区土产要多，加上过去边币与法币又不能相互交换，故老百姓相互效仿不用边币。现在，我们既在各地设立了兑换所，允许法币与边币依公平价格自由兑换，老百姓只要得到边币，就能得到法币。因此，老百姓拒用边币的根据已没有了。只要政府法令一公布，各地政府严加注意，这种拒用边币的现象定能很快克服的。

边币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在所发现的就是这些。我们对边区金融所想到的办法，也就是这几点。希望大家加以研究，务使自己彻底了解，并要多多向各方解释，并证询他们的意见。只有使大家有了一致的认识，才能使得大家一致努力，为稳定边区的金融而斗争。

¹民国 25 年，即 1936 年。

边区新的金融政策之意义与目的^①

(1942年2月27日)

民国28年^②3月，为了抵制敌伪套取外汇，国府财政部召开地方金融会议，决议由战区各省银行发行地方钞票。陕甘宁边区地临战区，本当早遵国府法令发行边钞，唯以种种原因，迟迟未果。去年1月，河防军响突遭停发，边区经济又被封锁，为免冻饿之危，更不能不谋自救。边府乃于去年1月30日停止法币行使，推行边币政策。这一方面为的是防止敌人套汇，一方面为着建立自足自给的经济。一年来实施的结果，不只敌寇无从套汇，而且为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财政难关亦得以渡过，全边区抗日军民食用所需均能维持，这是值得全边区与全国同胞感到欣慰的事。

去年12月1日，边府又宣布了新的命令，除了重申过去法令，规定边币为边区内唯一行使货币，其它任何货币均不许在边区内行使外，又授权贸易局组织货币交换所，允许边币与法币在货币交换所内自由讲价交换。边府这一法令的意义与目的究竟何在，亟有加以简要说明的必要。

第一，为着防止敌人抢购边区物资。

几个月来，敌人改变了过去的政策，严禁货物运进边区，并将大量法币运来边区，抢购边区物资。例如，边区洋纱过去大多从敌战区来，现在敌人反用法币购买边区的洋纱。太平洋战争爆

^①这是朱理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②民国28年，即1939年。

发以后，敌人更加抢购边区物资。过去，边币虽已推行到全边区，但临近边境各地，仍有使用法币的情况，给予敌人与奸商以抢购机会。如不急谋补救，则边区物资将被抢购干净，边区可能保存的将只是向外买不到任何东西的一堆纸币。故边府不得不重申禁令，严禁行使其它货币，如有不以边币交换，而以其它货币作价交换者，钱货一概没收。这是防止敌人盗购边区物资的紧急措施。

第二，为着便利出入口贸易。

整个后方和根据地的经济，只有更加亲密联系才能增强抗战力量。无奈国府短见之辈，将国防经济故意加以割裂，对于边币不仅不加以提携，反亟力破坏；对于边区贸易，又复重重封锁。这种害国害民的政策，是对抗战极其不利的。但是，不管如何封锁与破坏，边区与友区间的贸易仍在几百个边界口子密切联系着。为着要发展相互间的贸易，就必须使双方的货币能够相互交换，因为实物交易究竟是极端困难的。这次边府决定由贸易局在各通商口子设立货币交换所，允许出入口商人相互依据公平价格自由交换，就是为的帮助出入口商人，使他们不致因货币不易兑换而妨害交易。

第三，为着稳定对外汇兑。

边区原是以法币为本位币的，去年1月，边区银行发行边币亦以法币为本位，其性质与各战区地方省银行所发行之地钞是相同的。可是，大后方一般金融界对待边币囿于政治成见，故存歧视，非但支持边币，相反的不许边币通行，将边币摒弃于法币系列以外。于是，边币与法币不能平价交换，相互交换时，便发生一种比价。

决定两种纸币比价高低的因素甚多，但基本因素不外是双方在其内部市场上的购买力大小和双方进出口的多寡。就是说，两种纸币的比价，首先决定于其对内的购买力，如果甲种纸币比乙

种纸币对内的购买力大，则甲种纸币与乙种纸币比较时，其价格就要高些；其次决定于两方面外汇的需要量，如果甲地是出超区，乙地是人超区，则甲地对乙地货币需要量就少，乙地对甲地货币需要量就大，甲地的货币就要比之乙地货币值钱些。这两个因素决定着双方货币比价的高下，这是客观的经济法则，决不是任何政治力量可以直接改变的。边币和法币的相互关系，亦不能逃脱于这个规律之外。所以，强使边币与法币平兑，这在今天是行不通的事。今天，边区正在由大半自给状态向完全自给状态的过渡时期，边币对内购买力要低些；同时又是入超区域，对外价值自然也要低些。不久的将来，边区经济完全自给，财政收支相符，出入口平衡之后，边币比价定将会逐渐提高。

过去，边区采取平兑政策，结果只能使黑市横行。既有黑市，外汇价格便随盲目的供求原则，时起时伏。加上敌人与奸商从中推波助澜，使汇价更加不稳。现在，采取兑换所公开自由讲价的政策，使黑市变为明市，使敌人和奸商无由操纵，使政府能够从中调剂，则边币外汇价格自可日趋平稳，对外汇兑定可较前顺畅。

第四，为着推行边币到全边区。

自从边府决定推行边币以来，边区各地均一致用边币为交换媒介，唯边界各地仍有不用边币者。推究其故，是有些人未能明了敌伪奸计。今天，敌伪破坏边币之主要方法，是交换讲价均不用边币，使边币失去交换工具及价格标准的作用。边币的交换工具及价格标准的作用一失，则边币的储蓄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便将同时失掉，外币便可进入边区，用以抢购边区物资。于是，边币流通的范围势必日益缩小，而流通范围愈小，边币愈要跌价。由于过去边界上未能洞察敌伪的这一奸计，以致对边府法令执行不够坚决。

除了上述主观上的原因外，过去边币与法币的交换不方便也

是原因之一。边界与友区通商需用法币，故造成边界上外币流行，边币反遭拒用的现象。现在政府重申前令，并设交换所，过去造成拒用边币的客观原因已没有了，边区人民如要到友区买必需品，只要有边币就可换到法币，就可买到需用品。今后如再拒用边币，这只能被看作是破坏边区金融，帮助敌人抢购军用物资的行为了。只要边界政权机关严于防范，则拒用边币或不以边币讲价、交换的现象定可消灭。如全边区一致用边币，则边币流通范围一定扩大，边币的容纳量也会增大，即可相对提高边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边区政府发布新金融政策的意义与目的。

边币的根本问题^①

(1942年5月29日)

边币的过去，是光华代价券^②。这是“皖南事变”前，在边区内部和法币并行流通着的边币。但这种边币与今天的边币，在本质上说来，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那时发的数量少，票额小，同时，因为国内外对边区的接济很大，所以，边区银行保存有足够的兑换基金，保证随时兑换到法币。

事实上，那时的边币是和法币联系着的，而且只是法币的一种辅币而已，其价格亦步亦趋地跟法币走，和法币完全是平价兑换的。那时，延安的物价比西安亦相差不远，并且有时还要便宜些。假使以1937年物价指数为100，到1941年1月，西安物价指数是1025.7（见陕西省《银行汇刊》），而延安物价指数是926.6（见边区银行《经济简报》）。西安的物价所以比延安要贵些的原因，是因为西安有大资产阶级的操纵垄断，囤积居奇，而边区则无。

但是，边币的这种性质，在“皖南事变”后便完全改变了。“皖南事变”发生后，顽固派停发了八路军军饷，断绝了国内外对边区接济，并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从此，我们便不能不发行边区

^①这是朱理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

^②光华代价卷，由陕甘宁边区银行于1938年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的一种法币的辅币，也称光华票。

的本位币，并要求独立的流通市场，停止了法币在边区市场内部行使。不如此，在敌后艰苦抗战的八路军便要活活饿死。同时，由于外援断绝，边币也没有足够的兑换基金，不可能再兑换法币。于是，边币便成了边区的本位币，而不再是辅币了，并且在事实上脱离了法币。

从“皖南事变”后，边币和法币的对内价格日益不同。兹将西安和延安在1941年1月到12月的物价指数列表如下：

月 份	西 安	延 安
1	1025.7	926.2
2	1170.7	1089.3
3	1285.7	1260.0
4	1359.6	1382.8
5	1359.8	1563.5
6	1507.3	1914.5
7	1717.3	2124.6
8	1901.7	2129.7
9	2114.1	2851.5
10	2315.6	3295.4
11	2577.0	3790.3
12	2804.6	4421.0

从上表看，在1941年，西安物价涨了2.8倍，而延安则涨了4.5倍。换句话说，延安物价上涨的速度，比之西安要快得多。

与此同时，双方货币也形成了比价，边币对法币的比价日益降低。兹将100元法币对边币的比值列表如下：

月 份	比 价
1	100
2	112.5

3	120.0
4	135.0
5	148.7
6	170.5
7	198.8
8	218.8
9	205.0
10	225.0
11	230.0
12	249.2

很明显，在“皖南事变”之后，不管我们主观愿望如何，边币和法币在事实上是脱离了。法币跌价固然对边币有影响，但边币涨落的基本原因，决不是外来的法币影响，而是边区经济内部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边币跌价的原因及边币的前景，主要的还是要从边区经济内部去寻找。

二

边币跌价的基本原因在于边币数量和商品数量的矛盾，就是说，边区内商品数量少了，而货币的数量相对的多了些。这个矛盾是出于目前过渡时期边区的经济生产力与财政消费力的矛盾，即边区的经济生产力落后，而战时的财政消费力相对的增大了。

边区原是一个人口稀少、生产落后的地区，加之国内战争时期反革命的摧残破坏，使生产力更加低落。国内和平实现之后，一方面由于边区分配了土地，使生产力获得了长足发展的条件；一方面也由于党中央“休养生息，培植民力”的贤明政策，使边区的经济得以极迅速的恢复与发展。然而，由于历史的遗产过于菲薄，所以直到“皖南事变”之前，只能达到半自给的状态。那时，

边区所需要的布匹、棉花、纸张及日常各种用品，几乎完全仰于友区。但同时，边区又是个国防重地，并且是新民主主义的根据地，必须驻扎足够的兵力，并创办各种学校机关，财政上的消费力不得不增大。于是，经济的生产力和财政上的消费力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在“皖南事变”之前，由于获得了国内外对边区的充分帮助而得以解决；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内外的援助完全隔断了，遂尖锐化起来。

过去，边区靠外面的接济（单在1940年便有1040万元的外汇及法币）来购买物资补偿生产不足。到了1941年，不仅这部分接济没有了，而且由于友区顽固派对边区的封锁，使边区必要的商品量也减少了。另外，因为外援突然断绝，财政上一时无法补救，不得不多发行边币来弥补财政的亏空。因此，随着外援的断绝，财政与经济的矛盾爆发，边币数量增大了，而商品流通数量却反而减少了。

根据纸币（现在法币和边币事实上都是纸币）发行的规律，市场上商品的流通量假定不变，纸币的流通量增多了，则物价必定随着提高。依据同样的规律，市场货币流通量假定不变，商品的流通量减少了，则物价必定随着提高。而今天边区的市场上，不只是货币量增多了，商品量也减少了。所以，边区物价之所以提高，一方面是由于商品量的减少，一方面是由于货币量的增加。

这便是边区物价上涨和边币跌价的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其他原因都是次要的。所以，要稳定边区的物价及提高边币价值的基本方法，应当从增多边区商品的流通量及减少边币的流量着手。其他的办法都是次要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从发展边区生产及减少财政上不必要的消费着手。边区政府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什么办法，并将继续采取一些什么办法呢？

在“皖南事变”后，边区党政军民一致根据“自力更生”的原

则，从事生产建设。首先是动员了部队、机关从事生产。因为外援突然停止，边区民力一时尚不能接应，故不得不借用部队和机关的人力来救急。但根本的政策，还是执行毛主席有名的指示，即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和私人经济。根据这个政策，边区银行克服种种困难，投了大量的资本。

一年多来，八路军在生产战线上的艰苦奋斗是可歌可泣的，边区民众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惊人的。粮食生产提高了，去年冬得以收足了50万石细粮；棉花在过去可以说是不生产的，但去冬却收20万斤，自给了1/6；布匹生产过去微不足道，但去年底已能自给42%，现据工业局估计已自给60%；过去完全不能自给的纸张，现在也已能自给60%了；其他日常各种用品，也有好几百种增产。所以说，边区已由过去半自给自足状态，走向大半自给自足状态。假使我们今年能完成边府林主席所提的以下各种目标，则秋收之后，基本上可达到初步的自给自足。这几个目标是：（1）增产20万石细粮；（2）增产棉花300万斤；（3）发动东八县的10万家庭纺织妇女从事纺织；（4）运输15万驮盐出口以换取必需品。现在，边府正用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力量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相信是能够做到的。

在减少消费、紧缩边币方面，政府正实行精兵简政，开展节约储蓄运动，以减少财政对银行的拖累。

所以，我认为今年秋收之后，边区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财政与经济的矛盾，是有可能得到初步解决的，商品量及货币量的矛盾也有可能跟着得到初步的解决。

三

促使边币跌价的第二个原因，是边区出入口贸易的不平衡。因为，出入口贸易不平衡，引起边币对外价格的跌落，边币对外

价格的跌落，又转过来促使其对内价格的跌落。

前面讲过，边币跌价的根据是边区生产不能自给。生产不能自给，引起了边区出入口的不平衡。“皖南事变”以前，边区几乎所需要的全部布匹、棉花、文具、烟类、糖类、西药，均需由外输入。而所能输出的，只有食盐为大宗，占整个输出 90%，其他一小部分皮毛、药材等只占总输出的 10%。单就 1941 年延安出入口统计来看，出入口相差就达 967.8666 万元（根据延安贸易局统计，见贸易局《局务导报》第一期）。除延安外，绥德亦是大量的人超区域，其他各口亦多是入超，只是陇东及关中可以有小部分的出超，但并不能抵补延安、绥德等地的人超。

因为有了入超，边区对法币及外汇需求就多，因此，边币对外价格就日益低落。每次区外货物大量涌进之后，边币比值即要随之降落。边币对外价格一降落，物价首先是进口的物价也就跟着上涨，随之其他物价也跟着上涨起来。

然而，我们也不能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认为边币之所以跌价，完全因为出入口不平衡。因为 1941 年物价（边币对内价格）增加到了 4 倍，而边币对法币的比价只不过跌落了 2.5 倍而已。所以，物价高涨的基本原因，还在于货币量与商品量的矛盾。而且，边币对内的购买力原本就比法币在友区的购买力要低得多（请看 1941 年西安与延安物价对比表）。所以，边币对法币比价的跌落，一部分是由于双方对内购买力的不同，一部分是由于出入口的不平衡。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我们要提高边币比值，主要的还是提高边币的对内价格，就是说，要增加生产，使商品量增多，同时要减少消费，使货币量减少。但出入口得到平衡，对于提高边币的价格仍是极为重要的。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而且将要继续做的工作是：

第一，促进对进口物品，如棉花、布匹（根据延安贸易局统

计，以上 2 种物品占边区整个进口货物的 80%)，文具等等的生产，减少外面的输入。

第二，鼓励边区必需品大量运进，如设立物品交易所，货币交易所，实施人口物品抵押放款，团结人口商人等。

第三，限制或禁止非必需品进口，如禁止香烟等进口；迷信品入口加税，以寓禁于征；提高布匹入口税，以保护边区布匹生产等。

第四，促进并管理对外贸易，如动员民众运输食盐，积极筹备食盐统销，组织出入口公司，促进国区产品出口等。

根据以上办法，出入口可以步向平衡的。

四

边币跌价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边币尚没有独占内部流通市场。边币虽在内部中心区域已成为唯一流通手段，但在边界的流通市场上，还是法币多于边币，甚至在米脂、佳县一带，边币尚被拒用，这使得法币代替了不小一部分的边币市场。换句话说，边区内部总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边币流通量，有一部分被法币代替了，结果使边币量与商品量的矛盾更加尖锐化。

这种现象的造成，有政治的与经济的两重原因。政治上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关于严禁法币在边区内行使的法令，尚没有能够贯彻实行。“皖南事变”之后，政府即规定停止法币在边区使用，并一再严申禁令。但由于友区奸商的破坏，及边区民众首先是机关、部队，没有能严格执行这一法令，使法币利用其优越之条件，占领了边币的一部分市场。

现在有人提议，允许边、法币共同行使，认为这样，边币就能提高了。他们没有了解以下这个事实，即假使边区允许行使法币，则法币一定是“长脚”，因为它不但可以在辽阔的友区行使，

而且还可以在边区行使；而边币在友区是不能行使的，所心必然是“短脚”。这样，人们自然爱用法币不要边币，边币必被法币完全挤塌无疑。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在绥德警备区域，正是因为许多大商人主张边、法币共同行使，而我们各方面又没有严格执行行政令，所以使法币占了绝对多数，而边币只占绝对少数。这不是很明显的例子吗？

边币之所以未能独占市场，除政治原因外，还有经济原因。

边区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散的农业经济，边界的经济生活和中心区的联系少，和友区的联系多，所以在这些区域，法币的用途大，边币在流通中不起什么作用。边区过去是人超区域，加之对外贸易一时又不能统制，不能集中对人口法币作有计划的调剂，不能适当的供给人口商人所要求的法币及外汇，因而使人口商人进入黑市并公然要法币。另外，边币对内对外价格尚不稳定，作为价格标准常有许多困难，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要稳定边币，就要扩大边币的流通市场，提高边币的信用。在这方面，我们应作些什么呢？

第一，应当严格的执行政府法令。首先，各个机关、部队应深刻讨论政府金融法令，带头严格执行。对于拒用边币，以法币作价交换的，务须依据政府关于破坏边区金融法令惩办条例，严加处罚。各级军政机关应当利用每个集会随时解释政府法令，并号召人民起来拥护边币。

第二，要迅速的严格管理对外贸易。首先，管住食盐等主要物品，务必使出口外汇能集中到政府手里。同时，组织外汇管理机关，适当合理分配外汇。过去，机关、部队分散经营，使得出入口不能统制，外汇无法集中。现在，因为边区生产发展的结果，财政已经有了统筹收支的条件，必须积极筹备出入口主要物品的统销，以便集中外汇。

第三，各地贸易机关必须把合作社及农村中的流动小贩团结

在自己周围。一方面，通过他们收买内地及边界农村的剩余品，另一方面贩卖给他们以各种日常工业用品，使边界的经济经过这个商业网和中心区联系起来。同时，在边界上多设货币交换所，便利人民对边法币的交换。

第四，加强银行对边币发行，货物流通及外汇供求的调剂，使外汇及物价逐渐走到稳定。

五

根据以上的说明，可知边币过去是和法币联系的，“皖南事变”后才日益脱离了。由于边区外援断绝，生产不能自给，发生边币量与商品量的矛盾和出人口的不平衡，加以边币尚未能完全独占市场，所以，使得边币在“皖南事变”后跌价，不及法币值钱。因为这一年多来的生产自给运动，及各方面的努力工作，边区已由半自给走向自给，故边币的稳定与提高已日益具备了前提条件，边币赶上法币的可能性是逐渐存在了。但这种可能性，还要通过统一的财经计划、统一的步调和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加强银行的调查研究工作¹

(1942年5月)

客观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不断的改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然而，改进工作的根据必须依靠经常的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对客观事实的正确分析。各分行和办事处过去对于这项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但是还赶不上客观发展的需要。这固然有人手上的困难，但我们的同志还未能了解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乃是基本的原因。今后，各分行和办事处应根据反主观主义的精神，改正过去的观点，把这项工作作为经常的工作之一，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并按期向总行报告。总行今后亦要按期向各分行和办事处作出研究工作的总结报告。这里，将各分行和办事处的调查研究办法详列于后，望各分行行长各主任指定专人，切实执行。

1. 分行成立研究室，以分行行长为主任，秘书或富于调查研究能力之其他同志负实际专责，全体工作同志为研究员。办事处成立研究小组，以主任为组长，全体同志为组员。

2. 每两周或三周举行一次专题讨论会，将记录汇寄总行或整理成专文，交当地报馆发表。

3. 若有可能，应联合当地各机关有研究能力之同志，经常进行金融贸易专题座谈会，以便改变多方面对金融贸易不正常的认识。

4. 各分行和办事处应指定一个人专门负责调查工作，并将负

¹ 这是朱理治写给陕甘宁边区银行各分行行长和驻各地办事处主任的信，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人报总行研究室，以便对该同志的工作监督检查。若感到人力不够用时，可协商当地税局、合作社及其他经济机关分工进行。

5.调查结果向总行作报告时，必须详细注明调查的时间、地点及材料的准确性。

附：

论银行的研究工作^①

(1942年5月28日)

一、研究室作什么工作

- 1.帮助行长作计划。
- 2.向行长就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工作意见。
- 3.指导和计划干部的业务教育。
- 4.统一边区各界对于经济建设的认识。目前边区各界对于金融贸易工作的具体方向，各有各的主张，这对于我们的工作不仅没有帮助，反而有害。这个统一思想的建设工作，需要研究室负担起来。

二、研究室怎样去工作

- 1.各处、行长要协助研究室共同进行研究，同时自己也参加研究。
- 2.研究工作不能脱离现实，同时，也不能把现实工作混同于

^①这是朱理治在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扩大的行务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标题为编者所加。

研究工作。研究室除在行政上领导各分行和办事处进行调查研
究，领导业务教育，管理图书资料，编辑刊物，建立统一的贸易
金融思想系统以外，每人还应当研究一个专门问题。

3. 每个月作一次工作进度检查。

三、研究什么问题

1. 边区银行应作的工作，银行的组织和章程。

2. 物价与边币问题及边法币汇兑问题。

3. 农业金融。

4. 工业金融。

5. 财政金融。

6. 对外贸易问题。

7. 会计问题。

四、怎样去收集资料

1. 错误思想是从局部知识或片面材料中产生出来的，因此，
研究室大部分精力应放在收集材料上面。有了实际材料才能作出
具体结论。对下面切实督促有系统的进行调查。

2. 找材料要有钻的精神，要和各方面取得很好的配合。材料
找到之后，应加意保护。

3. 应收集从工作中产生的有系统的材料。如物价问题，应收
集的有：第一，各地物价变动表；第二，边币在各口岸价格表；
第三，边法币汇率升降表；第四，边、法币发行流通表；第五，
大后方¹及西安每月经济动态。其他如此类推。收集材料的目

¹大后方，指当时远离日军占领区的中国西南部地区。

的不应忘却主要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

4. 对材料的运用应有鉴别真伪的能力。

五、研究方法如何

调查研究工作是指导银行业务的根据，所以，业务工作要作得好，必须依靠正确的调查研究，估计主观的力量和客观的环境。我们的研究工作切忌空泛的理论研究，一切要以边区工作为出发点，侧重实际问题的探讨。

1. 经济现象是一种繁复的客观现象，要研究它不能专靠苦思冥想，必须广泛的收集事实材料，作为研究的根据。

2. 将收集的事实加以精密的观察和比较，求得其互相的因果关系。

3. 从总的观察分析中寻求如何调整改进边区金融工作的各项方案。综合时最好不作肯定的结论。

六、刊物问题

1. 每月出版刊物一次，仍定名《经济简报》。稿子由总行各同志及各分行和办事处写。

2. 内容：第一，偏重于各种统计；第二，各地报告选录；第三，友区金融物价动态；第四，论文转载及错误论点的驳斥等。

3. 研究的专题如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可以出专题小册子。

七、对外宣传问题

1. 组织讲演，每月举行一次。

2. 组织座谈会，每月举行一次。

3.向《解放日报》写文章，每月发表两篇。

八、分工

1.银行工作：张定凡、李林。

2.物价与边币：苏子仁¹、华西、高江。

3.农业金融：阎子祥。

4.工业金融：王亦民、肖长浩。

5.财政金融：熊飞、庄敬民。

6.对外贸易：秦炎、黄大明、薛辉。

¹ 苏子仁，即乔培新。

物价波动的原因和银行、 贸易局今后的业务方针^①

(1942年6月15日)

今年3月份以来，延安物价波动得非常厉害。其客观原因，首先是边币发行量的膨胀。银行在去年12月和今年1、2月增发边币1000万元，边币数量一增，自然要影响到物价上涨。其次是外汇无法集中管理。原计划特产及食盐专卖6000万法币，可交到银行直接管理。后财政厅把特产卖给边区部队，使银行无法取得这部分法币。同时，公盐亦改收代金。故集中外汇的计划完全破产，而银行亦失去了调剂外汇的资金。再有，外汇不稳定，影响到边币价格的下跌，加以政令又不能严格执行，使边币流通范围缩小，引起人民对边币的信心减低。另外，4、5月间顽固派反共高潮的到来，使人心恐慌，人民生活不安定，曾一时使外汇价格跌落。这些是造成物价波动的原因。

不可否认，银行在稳定物价上是做了一些工作，起了一些作用，如在市场商品少的时候，银行和贸易局抛出了一些货物收缩边币，卖出法币，打击了黑市，使物价的上涨和边币的低落有了一定的限度。但我们不能说银行、贸易局已尽到了责任。相反，我觉得我们工作还没有做好，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问题上。

^①这是朱理治在陕甘宁边区银行和贸易局全体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一、总行、分行对边币在市面的流通还没做到很好的调剂。今年1、2月份是旧历年关，很多货物从外面进到达区，加之商店结帐，有部分边币退藏起来。此时银根吃紧，人民对边币的需要甚急，银行应补救这个需求，抛出边币。到了3月份，已过了阴历正月半，退藏的边币又重新流到市场，而商人争做红盘^①。这时市场货币数量超过市场商品数量，银行、贸易局应立即抛出市场所急需的商品以收缩通货，稳定物价。然而，在这两点上，贸易局和银行做的都不太灵活。再如今年5月底6月初，三边边币缺少，以致汇价突高，引起商人投机，银行也未做到灵活调剂。

第二、各地分行、贸易局对外汇供求的调剂上不太灵活，不积极设法从各机关收买法币或利用各种方式换取法币。我们的交换所只许买进（外汇）而不卖出，同时，挂牌价格亦是常常不变动的。如我们的挂牌价格是2.5元，而黑市是3元或3.5元，这样死板的脱离实际的挂牌价格，不是主动的打击黑市，而是被动的助长了黑市。

第三、各地商店对物资的供求亦不善调剂。我们的商店忽略了自己的基本任务，执行政策仅仅限于囤积做买卖，而不善于采取这样一些对策：（1）在进口太多或货价大跌时买进；（2）在货价陡涨、市场恐慌时抛出；（3）在进口便宜、货价便宜的地方买进；（4）在进口甚难、货物昂贵的地方抛出。

第四、各地商店还没有注意到如何团结商人、合作社、小贩组成以光华商店为核心的商业网，用以推行边币，收买土产，换取外汇。在这点上，商店还未起到国家商店的作用。

第五、有的商店还存在只知为利的观点，只愿买进，不愿卖出，以致积压资金太多。同时，商店的工作技术亦不讲究，表面

^①红盘，旧时对商店在春节后第一天开张的称谓。

赚钱，实际亏本。商店的呆帐又多，欠银行的资金亦太大。

第六，各分行、贸易局对政府的金融政策宣传解释得不够，对于一部分群众对边币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的主张，没有给以纠正和反驳，使谬论流传，为害甚大。

第七，我们多数干部对银行和贸易局的基本任务还不太了解，如有的干部觉得没有事做；有的分行只知道赚钱做买卖；有的干部认为银行是一个财政出纳机关；有的干部认为自己是建设的会计科。

这些不正确的观点致使银行工作仅限于局部，陷入片面性，失掉了自己工作的中心。

以上这些弱点阻碍了我们对金融的调剂工作，是延安物价波动的主观原因。

二

银行和贸易局今后总的业务方针是八个大字，即“调剂金融，稳定物价”。凡属银行和贸易局、商店的一切活动，均需依照这个总的方针，不得有违。在这个总的方针下，有以下具体的工作任务：

第一，调剂边币的发行及流通数量。

边币的发行数量绝对不能超过银行委员会^①的规定，如有增发，必须取得政府和银行委员会的允许。各机关、部队、团体必须遵守金库制度，不得擅自提款。对机关放款要一概停止。去年，银行放款给各机关千余万元之多，估计今年各机关的资金已有1万万元以上，基本上已可自给自足。

^①银行委员会，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设厅长、财政厅长、银行行长、八路军后勤部长等组成，于1940年11月成立，次年10月停止工作。

今后，要大量发行农贷。边区银行实质上是农民银行，其工作必须适应这个基本性质。农贷的办法，目前以采取实物贷款为宜。例如，放给农民一斗小米，将来亦收回一斗小米，不要利息，或者要的很少，以一分为限。

工业放款可采取定货的办法，例如，毛纺工厂要求贷款5万元，此时，该厂产出的毛毯每条值500元，银行即可向该厂定购100条毯子，先给款，后取货。这样既可以帮助该厂周转，亦可防止其投机。

对商业的放款，原则上要停止。必要时，除少量救济性贷款外，亦可采取定货的办法。以后，商店绝对不许赊欠，贸易局要迅速通知各欠款商人还款。去年的公家贷金要及时收回。

银行和贸易局要确定总行、分行和总局、分局的投资额数，明确规定各分行的库存额，以便应急。如需动用库存，必须取得总行允许，各地银行不得任意提取拨付。

在边币流通量多、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各地银行应将商店存货及法币有计划地抛出；边币流通量少、物价陡跌，外汇上涨时，银行应用买货和汇兑等方法，将边币抛到市场上去，以达直接平抑物价的目的。

今后，银行要成立总的稽核处，其任务是随时清算各分行、商店的帐目，以及审查各分行、商店的营业方针。

第二，调整汇兑。

为了把大批外汇及法币掌握在银行手里，以资调剂，应当改进对外贸易，实行专卖制度，如食盐专卖等。

还可向各机关收买法币，收买价格可按黑市作价，亏本也在所不惜。另外，要加强对私人公司的团结工作，以争取它们供给法币。

货币交换所的挂牌要采取公议的办法，以补救过去和实价脱节的现象。各地交换所由该地分行直接管理，并反对只买进不卖

出的自私自利的态度。在挂牌时，应将边币对法币的价格和法币对边币的价格同时标明，一分手续费应即取消。黑市猖獗时，亦可采取以黑市打击黑市的方式，但要灵活机警。

为着稳定物价，外汇交易可采取期买期卖的方式。例如，商人急需法币，银行可以借给，但需交给足数的边币，并约定在1个月后交法币，在此期间，银行可向别处调动法币。

要充分利用邮局关系，在无外汇时，银行可介绍到邮局汇兑出去。还要实行商业汇票制，积极吸收商人汇票，卖出调剂外汇。本行与晋西北农民银行亦应当立刻通汇，以便调剂金融。

第三，调整物资。

各地分行、贸易局和商店都要实行本地每日行情调查制，各分行长及各负责同志必须熟悉本地每日行情，每5天做一总的行情表报告总行。因为，只有了解和研究各地行情才能做到在货多价廉的地方买进，在货少价贵的地区卖出。另外，务须把握货物的季节性（每宗货物都有其一定的畅销时期），尤其要掌握盐货、棉布等的季节性，以便在货多时买进，货少时卖出。

各分行应以农货为中心业务，调剂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生产。当前要集中力量，组织绥德10万个家庭的纺织业，以达到衣服的自给。

各地商店要特别注意团结脚夫^①，组织盐运，利用过载栈^②，帮助脚夫有“来回货”运。各地商店务须学习和掌握商业技术，以免亏蚀。分行和贸易局都要注意团结商人，建立广泛的商业网。

第四，推行边币。

加紧进行拥护边币的宣传和解释工作，如召开群众大会，请

①脚夫，指以肩挑或牲口驮运为业的人。

②过载栈，可堆存货物的客栈。

各地首长发表演说；组织各种座谈会，解释边区政府金融政策，纠正各种不正确的主张。必要时，也要开展斗争。

要促进政府严格实行金融法令，对黑市投机买卖者给以合法制裁。请求政府命令各地税局，收公盐款及税款时，绝对不得收法币。

银行商业处要团结各个金融细胞，如合作社、商店、小贩，使他们收买土产，贩卖成品，这是把边币推向边境的一个顶好的办法。

银行还应将各债户团结起来，使他们帮助推行边币。

第五，健全机构。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加强个人负责制，实行领导一元制。今后，各地贸易局局长均由分行长兼任，调剂金融，稳定物价概由分行长全权负责。各地农货、金库、货币交换所、商店资金亦概由各分行长统一调剂。

贸易局和商店即合为一体，贸易局的行政工作今后要尽量推到当地政府四科，贸易局应将业务工作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

要依据新的编制表，重新配备干部，以紧缩机构，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各地分行、贸易局和商店必须加紧学习 22 个文件^①，以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建立正确的行风。

① 22 个文件，指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指定学习的党内文件和列宁、斯大林的专题论述。

战时金融贸易问题基本上 是抢购物资的问题^①

(1942年7月25日)

(一) 顽固派对我经济进攻日益加剧，其主要方法是，一面倾销法币，抢购物资；一面加紧封锁，不许友区货物运入。最近，友区货物进运，均被扣于洛川、西峰等地，但大批法币正涌进边区，抢购土产及粮食出口。

(二) 由于各机关对政府金融法令未能彻底执行，致使法币充斥市面，侵占边币市场。如若长期下去，不谋对策，不只边区货物可能被顽固派抢购净尽，且友区货物亦将一点买不到。同时，边币即使收缩，亦不能抬高对法币的比价，相反的可能更加下跌。这是因为法币侵夺边币市场，边币流通地区要缩小之故。

(三)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对策，是坚决不使法币在市面流通，并随时收集境内法币，抢购友区物资。

(四) 具体办法：(1) 重申禁止法币流通的法令。对破坏金融人犯，必须给予逮捕，视其情节轻重，必要时得枪毙一、二人示儆。党、政、军首长，首先是军队中首长，务须保证在所辖境内，不许法币公开行使。(2) 抢友区货物。现在法币比边币还跌得快，务须动员民众将所有法币向银行或货币交换所兑换，或向友区抢购，利用时机，相对提高边币。第一步先普遍提到三比一，以后，看各方情况再行决定。提高边币对法币的比价，是引

^①这是朱理治以高岗、贺龙、林伯渠的名义起草的一份发给陕甘宁边区县团级以上干部的密电。标题为编者所加。

诱友区商人运货进边区的办法之一。(3) 任何公私商人将食盐及土产运出边区，必须换进半数货物。任何友区商人进边区购买食盐及土产，必须带进半数货物。否则，食盐、土产不许出口。

(五) 望得电后，切实布置实行，并随时报告为要。

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①

（1942年10月26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陕甘宁边区银行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置经营之银行。

第二条 陕甘宁边区银行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之枢纽，担负如下任务：

- （一）维护法币，巩固边钞，与敌、伪作货币斗争。
- （二）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以支持抗日战争。
- （三）稳定社会金融，平抑战时物价。

第三条 边区银行由边区政府授予下列特权：

（一）发行边钞；（二）代理金库；（三）经理公债；（四）管理边区向外汇兑；（五）买卖生金银硬币及外币。

第四条 边区银行资本为边钞2000万元，由金库一次拨足。

第二章 业 务

第五条 银行业务如下：

- （一）经收各种存款及储蓄。
- （二）办理下列各种贷款。甲、农货，如耕牛、农具、植

^①这是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起草的，在他离职后未能颁布实施。

棉、青苗等货款。乙、合作事业，尤其是生产合作。丙、公私工业，如长期投资放款，短期借款。丁、公私商业，如小本商人货款，出入口抵押放款。

(三) 办理边区及其他有通汇条约之各种汇兑。

(四) 办理期票汇票等买卖及贴现。

(五) 办理票据交换及划汇。

第六条 放款及贴现利率依物价金融状况及借贷性质与对象不同，由银行参酌，随时公布之。

第七条 各种存放款汇兑章程由银行拟定公布之。

第八条 边区银行在巩固边币稳定汇价上应执行以下工作：

(一) 以银行网为基础，经过各地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合作社及货币交换所，沟通边、法币交换及物资交流，配合政府法令，使边币在边区境内可到处买到东西，并随时能换到必要的法币。

(二) 根据出入口情况，在法币进口多的时候，吸收法币，在法币进口少的时候，卖出法币；在法币进口多的地方，买进法币，在法币进口少的地方，卖出法币，以使汇价稳定。为此目的，边区银行必须保有一定数量的汇兑平准基金，其数额由银行委员会决定之。

(三) 根据物价变化来伸缩发行额。在物价涨时，银行应紧缩发行，紧缩信用，并经物资局、光华商店抛出货，使市场货物增多，货币减少。在物价不正常下跌，妨害边区经济时，银行可扩张信用，并以物资局、光华商店购取物资。

第三章 组 织

第九条 边区政府银行委员会为边区银行最高立法和监督机

关，由政府指派五人组织之，任期一年，期满续派连任。在日前，银行委员会可由财经办事处兼任之。

第十条 下列事项，应由银行委员会决定并审查：

(一) 业务方针及监督，(二) 发行数量及检查，(三) 准备数量及检查，(四) 审定决算及各种报告表，(五) 资本之增减，(六) 分支行之废立，(七) 处以上行员之进退，(八) 50万元以上之放款及投资，(九) 规定各种存、放款利率，(十) 纯利之处置及分配，(十一) 重要业务事务之监督。

第十一条 边区银行设正副行长各一人，由政府选派专人任之。

第十二条 边区银行设两处一室。

(一) 总管理处，设处长一人，下设：

甲、货币管理科——管理边币推行及调剂汇价。

乙、发行科——发行及收回边钞，防止假钞，印刷及保管边钞。

丙、业务指导科——管理农货、合作贷款、工业贷款及其它各种业务。

丁、金库科——管理各地金库。

戊、稽核科——管理会计，检查帐目。

(二) 业务处，主要是作延安业务，设处长一人，下设：

甲、营业科——负责存款放款、汇兑、贴现。

乙、会计科——执掌会计。

丙、出纳科——负责金钱出纳，管理库房。

(三) 秘书室设主任一人，下设：

甲、人事教育科。

乙、文书科。

丙、总务科。

第四章 发行与准备及纯利

第十三条 边区银行得发行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各种主币，并发行各种辅币。

第十四条 准备金之种类及比例如下：

(一) 总的准备金为 100%。

(二) 其中 40% 为生金银、硬币、法币及银行经过物资局及光华商店所储存之商品。

(三) 其他 60% 为保证准备，如生产事业投资及放款合同，各种有抵押之借据。

第十五条 银行最高发行额由银行委员会决定之（如欲超过最高发行额，须得银行委员会及财经常委会^①批准）

第十六条 在目前物价不断上涨情况下，营业所得，名义上纯益 99% 作公积金，以便保持银行实际营业规模，其他 1% 作为职员奖金。

第五章 银行与政府之关系

第十七条 边区银行在边区政府财经委员会管理监督之下。

第十八条 银行应于每半年编制营业状况报告表、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明细表、损益计算书、开支明细表及盈余分配表，各抄写两份，一份送财经委员会，一份送审计委员会审核之。

第十九条 财政厅因抗日需要，得于某种限度下，向银行借款或透支，其透支额须得银行委员会及财经常委会之批准。

^①财经常委会，即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

第六章 附 则

本条例自公布实施之。

法币跌价及其对策¹

(1942年12月20日)

最近三个月，边区内部法币又有变化，谨将见到的情形及处理办法报告于后，敬请裁察。

一、法币入多出少，供过于求，自己必然跌价

· 第一，法币出路减少。

到河东买货原为法币的最大去路，至10月以后，因需兑换白银而渐告断绝。至9月10日，陇东、关中、富县等地外货较大批进口，法币去路尚见畅旺。至10月以后，迭接延长、富县、关中、陇东工作同志报告，外货进口减少，交易清淡。即以延安兑换法币而言，8月兑出120余万元，9月兑出310余万元，10月兑出420余万元，数量逐月均在增加，但至11月则减至270余万元。目前只三边货物进口较旺，法币需要较多，本行得悉该地法币供不应求，即已运百万元前去。

第二，法币输入激增。

按7月估计，边区存留法币约2000万元，自8月外销加多之后，当增加法币5000万元以上。与以前数目综合估计，边区存留法币约在7000万元以上。

由于法币入多出少，所以11月以来，本行库存增至空前未

¹这是朱理治写给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财经办事处负责人的信，收入本书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有之大数，仅计延安已有 700 万元。此事显然说明法币供过于求，自身要求跌价。

二、为推行边币，发展生产，法币跌价有利

第一，边币法币经常以稳定不稳定与“腿长”“腿短”两个条件互决胜负。8月初至9月中，法币不断跌价，公私人员视法币为劣币，均不乐于接受使用，而边币则步步推广，深入农村。至9月中旬，法币牌价稳定以后，公私人员对法币不稳之顾虑渐次消失，而法币之“长腿”作用，则又得寸进尺，威胁边币，逐渐由分区向内地排挤边币。比如，11月20日，关中分行报告：“关中党、政、军向民间借款要法币，不收边币，影响边币流通，违反金融法令。百姓售粮要法币不要边币，言说政府要借法币，……这次借款影响不良，怨言百出，《解放日报》通讯处记者们都不满意这件事，使人敢怒而不敢言”。再如，关中、陇东征收公粮代金亦征收大批法币带回延安。12月4日，陇东分行报告：“陇东分区征收公粮代金时期即集中人力于交换所工作，当时即在分行及办事处人员中抽调刘金才、赵克固、张全智、吴志先、李温章、赵太品 6 同志，专作交换工作，区平同志亦兼顾环县交换所工作布置，计建立乡村交换所 10 处……。唯以代金改收公粮，仍有收受法币者。故在此时期内吸收得之法币，不过 10 万元左右。现乡村交换所亦告结束”。又陇东分行 12 月 7 日报告：“关于目前陇东的金融问题非常危险。这次分区各机关要集中 300—400 万元法币去晋西北买货，在各地交换所兑换出 50—60 万元；在部队中还要集中法币；他们卖盐还全部收法币；在延安留守处，由陇东分区拨给他们粮食 1150 石，派了粮秣科王同志来卖粮，每斗 60 元法币。他们不要边币，影响了边币的推行。现在老百姓纷纷议论，边币是公家出的，同时公家的人又不要边

币，还是要法币。……这个问题请上级必须紧速解决。”由此足证法币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仍然坚持 2 元以上之牌价，已使边币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公私商人不营正当商业，多盲目换取大量法币进边区。11 月 20 日，关中分行报告：“现在关中党、政、军将款集中起来到晋西北，哪个机关也不买货。商人运来货，只愿够本就卖，还无人问津。……由于找不到买主，现在大批货少进而至于不进。棉花无大批货，纱无价无货，布大批货少，只有零星东西进来。”绥德 11 月 23 日情报指明：“商人到晋西北完全用实物和白洋作支付手段，法币买不到货。”由此足证，商人以货物运往河东换货，再转往关中、陇东卖成法币带回，使法币充斥边区市场，一则造成通货膨胀，再则排挤边币，使之退缩。

第三，明年生产为边区第一要务，估计在一、二、三、四月份，须向民间增加农工业投资 300 万元。财政方面，这四个月亦为税收中之淡月，难免稍需周转。依此判断，大量发行时期将届，如不及早设法开辟边币市场，则增发之边币将无处容纳。

第四，以西安法币购买力与延安法币购买力对比，估计西安法币一元值边币一元九角余。而边区法币一元在各地均值边币二元以上。此即说明，法币在边区之购买力仍然高于友区，至今仍在鼓励友区法币向边区倾流。法币既已供过于求，则此种现象极须改变。以边区已有 8000 万元法币计算，即使此刻降低其购买力，使之有出无进，亦足供数月应用。且降低法币购买力，反可鼓励货物进口。所以，为推行边币，发展生产，再次降低法币价格，阻挡法币大量入口，并于目前开始排挤已有法币外流，实为最上之良策。

三、法币跌价，应请准予采取的办法

第一，交换所牌价徐徐下降，时时紧逼法币退出市场。上次法币跌价，为造成人民心里恐慌，曾采取迅速下降办法，及至牌价稳定之后，法币又见抬头。依据前次经验及法币跌价每一时期有一定程度的规律，再依据人民对法币跌价已有相当认识的情况，今后如三分五分徐徐下降，长期保持法币跌价空气，以其不稳压倒其“腿长”之优越条件，则对于边币信用之提高，流通范围之推广，将必胜于前。

第二，限制法币兑入，令商人自尝法币跌价之苦。在物价上涨过程，商人为求超额利润，经常乐用法币，自由活动于边区和友区。上次法币跌价，一般眼明手快者均将法币抛入交换所，逃脱跌价损失。今次本行集存大量法币，兑出可无限制，兑入则采取灵活限制方式。一般大数不予兑换，藉以教训商人，而对于农民持来之小数，则应尽量收纳，以使边币进占农村市场。不如是，现存于边区之数千万元法币，实无力无限制兑入。

第三，各地牌价尽量缩小距离，令边界地区与延安大体趋于同一水平。过去为向边界推广边币，延安牌价经常高于边界。时至今日，情况有了变化。一方面，法币内流过多，超过了需要；另一方面，商人脚户顺道取巧投机，占取公家便宜，亦宜禁绝。至于扩大边币流通范围一节，施行法币跌价办法即可。故继续采取内地高价办法，一则不利，二则已无必要。

第四，令绥德法币牌价低于任何地区，藉以阻挡关中、陇东无限量吸收法币运入边区。11月15日，绥德分行报告：“由于法币流向警区买货，便形成了警区法币过剩，别地法币过少的现象。又由于法币携带较易于货物，而使南面货物多于警区，因此使得金融和物资发生失调现象”。如今，绥德法币牌价低于其他地区，则此种金融与物资失调现象必可纠正，法币无限量向内侵

流的现象亦可相对阻止，关中、陇东机关征收法币的行为亦可禁绝。

以上四点如果逐一实现，预料边币市场，将有重大发展。

四、法币跌价之前，本行请求上级进行的三项准备工作

1.照目前法币供过于求与法币在友区购买力之估计，我以人为方法尽力使法币跌价，大致牌价可降至 1.5 左右。依此推断，本行积存法币及将来兑进兑出法币所受亏损，可能达到 500 万至 700 万元。在法币跌价过程中，犹须有多余边币周转各地交换所进行的兑换和与农村法币互换的市场。今以两项合计，恳请允许本行增发边币 1000 万元，以为准备。

2.如果实行限制法币兑入办法，即请通令各地，严格禁用法币。

3.通知公家各生产部门，如有法币，应逐渐变为边币，以免受损失。

发行与推行边币的体会

(1943年1月)

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经济发生巨大变动的两年。

这一时期，正值“皖南事变”之后，我们的军饷被停发了，经济被封锁了，边区经济处在不能自给的状态，而财政的困难更是达到了极点。因此，根据党与政府的指示，银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发行边钞，以便投到公私经济上去，促进边区经济走向自给，同时帮助财政上周转。

在这个时期，正是我们刚停止法币行使，建立边区本位币的时期，边、法币的斗争非常激烈。同时，因为出入口不平衡及大量发行的结果，更加使得金融不稳。因此，根据党与政府的指示，摆在银行前面的第二个任务，便是推行边币，稳定金融。

在这个时期，物资是非常缺乏的，物价的增长及波动是相当厉害的。因此，摆在银行及其所经营的光华商店面前的第三个任务，便是平定物价，管理物资。

在这个时期，银行的一般业务，如放款、存款、汇兑、代理金库等等工作，都需要健全起来，这是摆在银行面前的第四个任务。

同时，银行自身的组织需要更加充实与健全起来，这是它的第五个任务。

两年来，我们的工作方针，虽常因情况及认识的更改而在各

^①这是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起草的1941年至1942年年度报告的金融工作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个阶段上有所变动，但基本上是为着完成以上这五个任务。

(一) 边币的发行

1938年6月间，因市面辅币减少，商民深感不便，边行用光华商店代价券名目，发行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代价券五种。到1940年7月底止，发行了72万余元。8月以后，边区外面的接济渐渐的发生困难，故将发行的速度增加了，并且印行了七角五分代价券。此时，代价券即代替了一部分主币流通于市面。到1940年底，共发行了311.1540万元。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外部接济完全停止。为着不致被困死，我们不得不发行边区的本位币。所以，在初春印行了五元、十元的本位币。1942年又印行了五十元、一百元的边币。

这两年来，边币发行是相当快的，到1942年底，一共发行了11100万元，比之1940年底的311万元，足足增加了35倍多。这1.1亿元边币对于我们渡过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的困难，无疑起了相当作用的；对于这两年边区的经济建设，也是有很大的推动的。而且，边币虽增加了35倍，但其非但没有垮台，信用反而一天天好了起来。这一点可从1942年后期，边币对法币的比价提高了三分之一，边币日趋稳定，边区物价比之友区还要稳定上表明出来。

由此可以证明，党及政府在经济上所采取的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由此也可证明，那些不敢发行边币来发展生产，认为发行了边币，边区金融即要垮台的保守观点是错误的。

两年来，边币发行量是每月增加的，从来没有停止过，差不多每月发行平均增加率总在16.86%，即假定上一月发行总量是100元，下一月要多发16元多。可是，发行的实际增加速度，这两年来是不平衡的。

1941年，发行量比1940年底增加了8.798倍，平均每月发行速率是21.1%。物价涨了518.89%，即5倍多，每月物价增加率是14.93%。边、法币的比价跌到1元法币值2.52元边币，平均每月边币跌价速率是8.44%。

1942年发行增加率慢了一些，全年只增发了4.055倍，平均每月发行速率12.62%。物价也没有去年增得多与涨得快了，全年只涨了3.115倍，平均每月只涨了10.62%。而边、法币比价非但没的跌落，反而提高了，1942年1月是1:2.59，到12月是1:2.17，边币平均要提高0.9%，即差不多提高1%。

由此可以证明，边币的发行速度对物价及汇价是有影响的。边币发行快，物价涨得快，边、法币比价跟着跌落；边币发行慢，物价涨得慢，边、法币比价跟着也要涨些，自然，物价及边、法币比价之涨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原因，不可完全归于发行量及速度，但发行数量及速度与这二者是有重大关系的。所以，发行边币时，一面要照顾到当时的革命需要，一面又要照顾到物价与汇价，因为，物价与汇价不只是关系到边区整个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且也关系到发行本身。物价汇价在不稳时，边币的推行亦是很困难的。边币推不出去，发行也就困难了。相反，假使物价和汇价相对稳定，边币的推行也就容易，发行量就可增多了（这点我到第二节再去说明）。

这两年边币的发行史亦证明了这一点。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我们急需大批资本投到公营事业，以便建立机关部队自给基础。同时，财政上亦需要周转。尤其困难的是，1940年公粮收得太少，到这时不够吃了，政府决定发200万元购粮。所以，1941年上半年的发行非常之快，每月发行平均增加率竟到31.8%，其中3月份的增发率达到71.44%。这时物价随着涨了两倍多，边、法币比价跌落了一半，人心惶惶，投机盛行，边币到处被拒用，渐渐挤回到延安周

围来了。为此，我们不得不在7—8月的发行上采取紧缩政策，将发行率降低。9—10月，因要投资盐业，又稍微增发了些，到11月才大大降低。这时，由于配合了公盐的出口，边、法币的比价稳定了下来，9、10、11这三个月里边币没有什么大跌；加之政府发表了12月1日公告，严禁法币流通，并允许组织货币交换所进行公开兑换，使边币重新推行开来。所以，在12月和1942年的1、2、3月里，我们得以将发行速率又加提高起来，发行了千余万元用以抢购物资，进行农贷及财政周转。可是，到了3、4、5月，物价和比价又震动起来，边币又被拒用，并被挤回来，故不得不迟缓发行速率。8月以后，边区各地币价平均都提高了三分之一，并且一直稳定下去，边币又向外大大的推开了。此后，发行率又开始加快，到了11、12两月，因为要布置1943年财经工作，发放农贷，向公营事业及物资投资，更是发得快了。

上述情况证明，在目前革命与战争时期，不发行是不可能的，滥发、随意发也是有害的。发行速率究竟多少为好？这两年的历史证明，以保持和法币跌价率大体平衡为好。这样，再配合出入口的平衡，可使边、法币的比价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比例上。比价一固定，边币就容易推开了。

过去，我们没有能够明确把握这个规律，并将这个规律普遍化，所以处在被动的地位，有时被迫多发，有时被迫少发，这都是不好的。

根据这两年的经验，我们在每年的12月和来年的1月、2月，总要大量发行。这是因为要布置全年工作，要投资到生产，财政在此时亦要周转。加之，此时正值旧历岁尾，市场上需要更多筹码。此时需要大量发些票子，也可能多发些。可是一到3、4月里，岁尾储存的边币便都涌到市场上来，或买货物，或买法币，筹码又嫌多了。所以，每到4、5月，物价和汇价总是不稳

得厉害。为着避免此弊，今后每年的公盐代金可在3、4月前多收些；工商业投资尽可能改到下半年放出，同时3、4月份要准备些法币以资应付兑换。这样，或可避免过去那种现象了。

另外，边币的票额对物价和边币推行也是有关系的。物价上涨，边币的票额应随之上涨。例如，现在物价比之1936年已涨到140倍，100元的边币只等于过去的七毛钱；50元只等于过去三毛五，10元只等于过去的七毛钱，1元还不及过去一分钱。由于100元、50元的票子印迟了些，边界民众嫌边币票额小，点票既觉麻烦，携带尤其不便，故不采用边币，只把边币当作辅币用。所以，票额太小是不对的。但是票额亦不可太大，太大会找不开，也妨害流通的。

货币的纸张花纹也是重要的。在印刷上，边钞这两年有进步，但纸张太坏了，易破且不好数点，加之是外来的，一到外面封锁时就只得停印。如去年7、8月间就闹纸荒，妨害了金融上的周转。今后要用边区自造的纸，且要经常保存一些已印好的边币，放在边行库里，以便应付突然需要。

敌人对边币必然要用各种方法破坏的。边币一开始发行，就有敌人在米脂制造伪票，幸而随即破获了。现在边币信用已经提高，敌人阴谋会更凶的，故要督促各地分行和办事处随时警觉。

(二) 边币的推行

过去两年来的发行，主要的是为着向生产投资及替财政周转。为着完成上述任务，必须把边币推行到全边区，使之作为作价及交换的工具，作为储蓄及支付的手段。推广范围的大小，亦决定边币价格之高下。边币流通范围大，则边币值钱，从而可多发；流通范围缩小，边币就跌价，从而不能大量发行。

推行边币工作，曾花费很长时间。这两年边币的推行，更是

经过了严重的斗争。

在 1940 年以前，边区辅币缺少，发行量又小，同时，有充分的法币作为基金，随时保证兑换，所以，光华代价券的推行是很顺利的。那时，西安与洛阳间的汇兑可以说是完全经过边区银行。为着推广辅币流通范围，边行将辅币及一元纸币有计划的运送到边区之外，这很帮助了光华代价券的推行。

可是，到了 1941 年 1 月 30 日，政府布告停止法币行使，确定边币为边区的本位币之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了。此时，边区发行的是 5 元、10 元，以后发行了 50 元、100 元的票币，边币的发行量大增。特别是因为出入口不平衡，银行没有法币保证无限制兑换，所以在 2 月下旬即宣布兑换法币允许制度，限制兑换。大批商人因得不到法币，便在黑市中进行货币买卖。边币在延安市首先跌价了。

延安边币跌落之后，公私商人，首先是公营商店携带了大批边币到绥德换取法币，套取边、法币的差价，然后再到山西碛口购取敌区资财。于是，绥德边币猛烈跌价，到 1941 年 4 月跌到了 1: 15，5 月跌到 1: 20。绥德的边币推行不开了，大批边币象狂风暴雨般的转往陇东，接着又挤到关中，使得边币猛跌，关中边币完全垮台。接着，边币挤回到三边，加之盐务处曾一度停收边币，更影响到定庆路一带，边币被完全拒用。于是，边币又挤回到延安。凡是大批边币所到之处，边币猛跌，法币飞涨，黑市盛行，物价飞腾，囤积投机等现象屡见叠出，边币公开的或变相的被人拒用。

去年 8 月，英美封存中国资金，边区三大货物来源（南路由西安经富县或关中人边区，东路由太原经碛口入边区，北路由包头经三边入边区）中的太原一路，完全断绝；包头一路，只能以皮毛等原料换取少量必需品。因之，三大来路，只剩一条。来货减少，法币去路亦少。加之 8 月以后，绥德分区货物向山西倒

流，山西法币也源源侵入边区。另一方面，中央及西北局¹的运盐政策得到相当成功，又换回不少法币。10月以后，银行在延安经裕顺通公司实行黑市打击黑市的办法，操纵汇价，不使之盲目的随涨随跌，受奸商的左右。12月，政府发出布告，允许设立货币交换所。所以，去年10月到今年2月，边币跌势稍杀，各地汇价差额亦逐渐减少。边币在这一期间又稍微向前推广。

可是，由于去年运公盐计划改为征收代金，法币集中不到银行；旧历年底，友区运进货物较多；元宵之后，商人争相换取法币到友区换货，使边币又在今年4、5月间发生大的波动。再加今年5月政治局势紧张，法币汇价在延安曾涨至4.2元，绥德涨至4.5元。这对边币推行又是一个大的打击。

到了今年6月，敌人停止了华中的法币流通，大批法币流向我区。友区对我们亦采取倾销法币办法，严禁物资运进边区，抢购边区物资运出。于是，边区内法币充斥，侵夺了边币的流通市场，外货不能运进边区，边区货物则大批外流。这种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建议上级于7月25日发了万万火急的密电。银行当即集中力量，发动了提高边币与推广边币的运动。延安7月开始执行，其他各地于8月20日前后相继行动。自此，法币涨势急转直下，边币对外价格普遍提高了三分之一。8月以后，全边区边、法币牌价均能稳定在1:2.1左右，边币到处受到欢迎，流通范围向外扩大。

以上是边币推行的历史。考察过去几年的历史，方知边币推行问题，实际上是边、法币斗争的问题。谁的力量大，谁的流通区域就扩大；谁的力量小，谁的流通区域就缩小。

在边币开始推行时，边币有三点不及法币。

¹西北局，即中共中央西北局。

第一，因推行边币，禁用法币的法令没有被严格执行，因此，法币能够在边区行使，而边币反遭拒用。

第二，边币在 1941 年因发行速度快，出入口不平衡及流通范围小，表现很不稳定，比法币跌价快，因此，人们便采用法币。这个情势直到去年 8 月之后才改变过来。

第三，法币供不应求。首先是边区总的供不应求，这是因为出入口不平衡之故，人们便认为法币是宝货了。其次是地域的供求不适应，例如陇东、关中是出超区，那里法币多；延安、绥德是入超区，那里法币少。供求失去平衡，比价就不稳定了。再其次是时间上的供求不适应。外货的输入与土产之输出都有季节性，如三边来货，以春冬两季为最多，食盐出口以八九两月为最旺。加之顽固派的封锁，使外货入口忽而断绝，忽而大量涌入，结果法币多时需求少，法币少时需求反增多。这就形成法币供求的冷热症，即时间上的不适应。

因为边币有以上这三个弱点，法币有以上这几个优点，所以，在过去的斗争中我们总是处在劣势，法币反占了优势。那么，我们采用了一些什么具体办法来和法币斗争呢？

1. 严申禁令，加紧宣传。

边币和法币一样是纸币性质，它的信用的维持及流通范围之推广，需要靠法令的强制。所以，我们请求政府一再重申禁令，并制定破坏金融法令的惩办条例。为着广泛解释政府的金融政策，提高人民对边币的信用，我们曾在各主要市镇配合党政军发动过推行边币的宣传运动，反对边、法币并行流通的理论。这种理论如果让其实现，在当时条件下，边币会完全失败，法币会独占边区流通市场的。

为着配合政府法令，我们曾在边币最不稳定、到处被拒用的时候（1941 年 6、7 月间），发动廉价运动，一面平定物价，一面向民众宣传：拿了边币，不只可以买到货，而且可以买到低于

市价的货物，而法币则买不到。

我们在前年边区开参议会的时候，配合工业展览，展出了银行的金银宝物，并招待了参议员，这在边币信用低落时，多少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我们还处罚了一些使用法币的案件，也收到一些效果。

在执行政府金融法令时，亦曾发生过一些“左”的现象，例如，在米脂曾发生过检查与没收人民家藏法币及携带法币的现象。我们当即制止了这种做法，指出：我们只是不许法币流通，并不阻止人民私藏法币及携带法币。

2. 促使经济自给及统制进出口贸易，使进出口得到平衡。

推行边币一方面靠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还是要靠经济力量，即要能随时换到法币，并使边币对法币的比价能够稳定。这就要依靠边区经济做到自给，并将边区主要出口货物统制起来，以保证绝大部分法币能够掌握在银行手里。还要实行外汇允许制度，管理人口贸易，保证人口货能得到充分外汇，使进出口得到平衡。这样，边、法币的比价就能够得到相对平衡了。为此目的，政府积极促进边区生产，尤其是加紧促进人口货物的生产，如棉花、布匹。根据政府这一方针，银行在这些方面投下了一批资本。为了促进对外输出物品的生产及运输，如对食盐的生产及运输，银行亦投了不少的资本。同时，在贸易局建议下，政府禁止了非必需品的进口，如纸烟；限制了边区可产品的进口，如洋布；提高了人口税到 15%。由于出口增多，人口减少，得以打下了边币稳定的基础。

3. 建立货币交换所，实行挂牌政策，调济边法币的供求。

为着要推行边币，必须便利人民边法币的兑换。边区和友区的贸易是频繁的，因此有设立货币交换所的必要。否则，民众无法交换法币，只有在黑市中买卖。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黑市操纵行情。

为着要稳定边币，必须由银行从中调济边、法币的供求，消灭地区上及时间上供求不适应的现象。但要使银行能从中调济边、法币的供求，其前提条件便是要打破不合实际的平价交换政策，而以合乎当时客观金融状况的挂牌政策代替它。

边币在开始发行时，是平价兑换的。可是在2月以后，边币已经跌价了，甚至两元只能换到一元法币。此时，许多人仍不肯放弃平价兑换政策，结果，银行所存法币，只有换出，没有换入。因为谁将法币平价换给银行，即等于亏蚀一半；银行平价换一元法币给人，也等于送了半元法币给人。所以，银行的法币自然有出无进了。于是，法币明市交换便成为不可能，只能在黑市里进行。而黑市是犯罪的，银行自然不能参加从中调剂，自己破坏法令。所以，这时银行的手足是被束缚了的，只得听任黑市的横行。前年4月到8月，绥德、关中、陇东、三边边币市场被黑市破坏了，就是因为各地比价差额太大，而我们没有调剂，放纵了黑市的结果。

所以，我们积极主张放弃不合实际情况的平价交换政策，主张挂牌公开交换，并先在延安委托裕顺通公司试办。它挂牌公开交换，结果是有换进的，亦有换出的，银行从中帮助调剂，得以相对的左右了黑市。政府遂于12月1日通令全边区均设立货币交换所，允许人民依照公平价格自由交换。这对于稳定边、法币的比价，在全边区推行边币，也是起了大作用的。

对晋西北金融问题的几点意见^①

(1943年)

由于晋西北最近贸易财政材料的缺乏，不能提出精密的计划，仅就甘主任所作的晋西北最近金融情况的报告，提出如下意见。

我对晋西北金融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一) 最近晋西北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出超，是提高农钞，禁用白洋、法币的有利条件。然而，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势必影响健全币制的建立。

(二) “三年不能打垮白银论”是不对的，因为现在对外贸易没有使用白洋的必要了。过去，晋西北对于敌区是人超，需白洋买特货。现在，对敌区贸易大大减少，不需白洋；对友区贸易，也不必使用白洋。这是一。第二，在对内方面，充作流通手段的，也不必限于白洋，纸币也是可以的。因此，对内对外现在都不必使用白洋了。但要马上禁用白洋，而没有一些准备工作，也是危险的。

(三) 滥发纸币固然是不好，但在财政困难，白洋有限的条件下，如想基金十分充足，发行十足兑现，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在战争时可以发行不兑现的纸币，但必须有节有度，发行宜逐渐增多，而不可急剧猛烈。

(四) 农钞与白洋是两种不同的货币关系，而非主币与辅币

^①1942年11月，朱理治被任命为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计划委员会主任。这是他写给办事处主任贺龙的一个报告。

的关系。主币与辅币在法定的比率上是不变的，因此不会发生比价内题。农钞与白洋或法币，显然不是这样的关系。

（五）白洋是有价值的货币，农钞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纸币。纸币之所以能够充作流通手段，是由于国家法令。因此，白洋准许流通一天，农钞总是恶币，它是不能提高的。我们的政策，应该是稳定农钞。过去规定收白洋，结果降低了农钞的政策是错误的，是拜金主义的。

因此，我认为解决晋西北金融问题，总的目标是使农钞在晋西北成为唯一的流通手段，绝对禁止白洋、法币、伪钞的流通。具体的办法有二种：

第一种办法是提高农钞的办法。可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先行禁止法币与伪钞而默许白银流通，这是准备阶段或蓄积力量阶段。这一步要做以下几点：

- 1、严禁法币在晋西北区内流通。因为晋西北现在是出超的，这是可以办到的。只在神府、榆林边界地带与兴县等中心地点设兑换所，法币只准作外汇，不准内部行使，违者没收并处罚。

- 2、伪币根本不用也不兑换，在现在的条件下这也是可能的。因为过去由敌占区输入的特货、布疋、火柴、纸张以及煤油、电池等军用品，现在或能自产，不需外来，或因敌人统制，不能再来。今后在对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敌占区的贸易关系应采用物物交易政策。

- 3、用一定量的特货到榆林和边区换回必须品，出卖只要农钞，以提高农钞的信用，推广它的用途，扩大它的流通范围。

- 4、实行两面政策：一方面默许白洋的流通，并可在财政上（税收）收进白洋，发行白洋公债；另一方面，公营商店、合作社不要白洋，只要农钞，在商业上压迫白洋。财政机关收白洋，但不下令只收白洋。

5、严禁白洋自由出境及商人投机，我们设法尽量吸收白洋，将外边换来的白洋与由民间税收进来的白洋集中到银行，以充实农钞的基金。

6、公营商店及各部队都不许使用白洋，一律遵守政府法令，改用农钞。

7、保证这一期间不增发农钞，一方面尽力紧缩发行，另一方面努力推广它的用途，使农钞下乡，成为民间的交换手段，使到处感到农钞有用而又感到缺乏。

8、这一过渡阶段越短越好，最好在两三个月内，乘此对外贸易对我有利，财政尚可想办法的时候，完成这一阶段。要动员党政军民为这一细密的准备工作而努力。

第二步是严禁白洋流通。这一步要做以下几点：

1、在农钞的流通范围相当推广、白银相当集中于银行以后，以法令严禁白洋流通，违者仿晋东南的办法治罪或枪决。

2、为了防止过“左”行为，不许搜查白洋，人民不使用白洋时，不准没收。

3、为了防止敌人的夺取，遵照国民政府法令，宣布白洋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定价收买，并奖励人民献金。

第二种办法是发行白洋兑换券，收回农钞。实行这种办法，兑换券必须保证不为财政上的支出，随时能够兑现；当人民称便，信用确立、流通范围逐渐扩大后，准备金的比例可以减少；此减少之准备金，即可以辅助财政；以一定的比价逐渐收回农钞；利用时机，下令禁止白洋流通，以兑换券为唯一的法定货币，这时可以不要准备的发行。

前面两种办法各有利弊。第一种办法，在时间上可以早一些完成，弊制不致变更。第二种办法的组织工作可以省劲。

不论实现以上哪一种办法，都必须在财政上统一，并在短期间内不拖累银行，银行不滥发钞票；党政军民一致动员，支持新

货币或农钞；对外贸易保持平衡，严格管理外汇；加强财政工作的干部。

关于晋西北与边区的贸易金融关系，应当注意以下两点：

（一）晋西北与边区现在在财政上是统筹了，因此两地区的币制至少现在应密切联系。

（二）边币与农钞，应互相挂牌，直接兑换通汇。贸易来往应一律以农钞或边币作价，不应使用白洋或法币，这样可以减少法币的用途，减轻外汇的压力。

给李富春、黄克诚的信^①

(1946年2月29日)

到洮南 20 天了，现在地委只我一人，余均在下面工作。洮南干部少，情况又复杂，所有干部及我自己均缺经验。我大部时间忙于应付洮南城的工作。

当我随八旅^②旅部进入到洮南城时的情况是：土匪虽已退出洮南，但其主力并无损伤，大部仍是散处四乡。城内潜在的土匪据云有四五百之多，老百姓一夕数惊，不是说胡匪即要攻城，即是说我军又要他移。因为胡匪两次攻城，人民饱尝苦痛。这时城内的基本群众不敢出来，深恐出头露面之后，敌人再来，又受报复。城内资产阶级过去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说我们来了之后，即要共产，所以在胡匪两次攻城之中，资产阶级多采取赞助同情的态度；但及至土匪进城之后，又遭受了城外封建地主所领导之土匪的摧残，转而觉得我们军队无论如何，总要比胡匪好。尤其是八旅的模范纪律，更给全体人民以良好印象，所以愿帮助我们来摧毁胡匪力量；但又怕我们来“共产”和清算敌伪资产，因大部分上层资产阶级均吞没、隐藏有大批敌伪物资。城外胡匪首领，因受国民党挑唆，进攻县城；退出之后，深恐我军报复，故负隅顽抗，企图永与我军为敌。

在这样的时候，如以清算敌伪物资为发动群众的中心，似乎

^①1945年10月，朱理治奉命由延安赴东北工作，次年2月初就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这是他到任后不久给中共西满分局领导人写的信。

^②八旅，属新四军第三师建制。

是不甚妥当的，因为这并不能动员基本群众。有个别同志到下面做了这种动员，群众则淡淡地回答：现在性命均不能保，还谈得上清算敌伪资财。同时，如这样做，则城内的资产阶级将和城外的封建势力更加团结起来，虽不一定能再演第三次的攻城，但至少会使我孤立，使我们动员基本群众更加遭到阻碍。

所以，我们当时决定了以下的政策：暂以清匪为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在清匪中建立各阶级反匪的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建立人民群众的团体及自卫队，强调没有人民的发动，即没有有效的清匪；在这个运动中，准备自己的力量。同时，在清匪中，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发了一个号召自新的布告。因为，对胡匪单是靠打，是打不完的。

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得到的收获：

第一，组织了 3000 人的自卫队，每个中队长均经各个小队长选举，并提出不许曾当过警察、胡匪的充当队长。故在选举中亦发生斗争，人们见到坏人即提出反对。现在各个区的自卫队，已接收了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10 个中队长中，有 7 个是店员及平民。有 1 个分队长是坏人，现准备撤换之。因为军力薄弱，八门洞开（本城共有八个门），无人守卫，故土匪仍有潜来城中的。现在自卫队已在城门口放哨，在城内每一个区成立了一个基干班，正准备成立基干排。自卫队已经成为我们在洮南城内所依靠的一个重要力量了，检举坏人依靠他们，即使防疫工作，现亦开始依靠他们，可使防疫做得彻底有效。所以，控制一个城市可以采取苏区的赤卫军和抗日根据地的自卫军及民兵的办法。

第二，在城外和城内已经开展一个坦白自新的运动，洮南城外共有 16 个村，南部 4 个村所有大粮户，几乎全部是胡匪首领。布告发出之后，经过各方面的联络，他们纷纷向司令部缴枪、缴马，已经收到的有百余人枪。城北另有 12 个村，原受了朱继先同志的委任，但洮南失守后，他们又打出光复军的旗，唯

没有参加打白城子，同时亦未抢老百姓。隔了两天，见到白城子红军打死了胡匪 500 名，他们又动摇起来。尤其洮南一收复，他们更加恐慌，怕我报复，情愿交出 200 人枪马，交给我组织队伍。城内胡匪经过抽查户口和民众告发，逮捕了 60 人左右，自动坦白的有 30 人。昨天三区有 4 个胡匪坦白，向 300 人的群众大会上悔过自新，3 个坦白的很彻底，1 个不肯承认。民众对前者没意见，对后者极为愤怒，纷纷责问，将他捆送公安局。两次土匪进城，均是里应外合，不把内应肃清，城防是不易巩固的。

第三，基本群众开始有了组织有了斗争。我们强调，要根本消灭匪患，必须将全体民众组织起来，故即着手组织妇女，特别是工人。群众一组织即有斗争，特别是工人斗争的情绪极为高涨。全城计 5000 多工人，连他们家属在一起计算，将占全部人口之半数。首先爆发的是木匠工人。他们因为木业组劳工队长克扣他们的工资 7 万元，80 多木工将劳工队长的兄弟二人监视起来，拥赴县政府，请县长评判。当时县长即判定 7 万元退回工人，并要在两天之内交出 2 万元。现在钱已交出，分给了工人，木业工会的会员大大发展。总工会的威信经领导者斗争后，已在群众中树立起来，每天川流不息的群众要求总工会领导他们组织工会。瓦匠 300 多人见到木匠胜利了，亦酝酿斗争。可惜的是总工会刚只工作十一二天。城内“百死鴛”^①流行，什么会都禁止开，城内各街全部封锁起来，鸦雀无声，街上断绝行人，工人斗争自然只有暂时停顿一下。最可惜的是鉴于许多地方的清算，因首要分子逃走，只能斗些小头目，斗争不出劲儿来。所以，我们一到这里，便将两次阴谋勾引起土匪攻城的粮食组合长、日本的和土匪的顾问宋殿阁扣留了，准备在上月 15 日召开群众大会。计划可到二三万人，一面庆祝胜利，公审匪首，一面提出清算宋

^①“百死鴛”，即霍乱。

殿阁，将防匪阶段告一结束。将清算斗争全面的开展起来，但亦因防疫关系，只能停止开会。

第四，开始组织了部队。分区司令部原是个“空军”司令部。去年10月左右，朱继先同志来了，组织了好几千武装。[后发生]洮南白城子事变，结果只落得200多人，与夏尚志部队合编为一个团。我来之后，因北面需要发展，故将白城子及所有武装开到北面分区，要他们以白城子为基地向北发展。所以到洮南后，分区司令部没有一个兵，门哨也没人放，更说不上派兵到乡间掩护群众工作了。经过清匪工作，由土匪送来了近百枪马，我们在洮南编了两个骑兵连架子，约90人枪，同时编了三个排的基干自卫队。公安局和护路队各有七八十人，多系旧人，亦无一支枪，现决定成为两个训练队。经过政治教训，反省大会以及考试，将其坏分子开除，好的保留。现在基干自卫队在城内担负警戒，骑兵已下乡开始活动，做掩护群众工作。同时，在洮南北部的12个村子，我们原有40人（一说80人）的武装，现因当地地主愿意交出200人枪马给我们，任我编队，用以表示他们对过去挂了“光复军”旗子的悔悟。现我们派了几十个干部，会同原有的40人枪，编为一个团，亦开始行动出发打匪。现在开通及瞻榆二地亦已有了一些基础。估计6月底前，成立一个旅的骑兵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武装的创建，一面是为着替党创立一个骑兵旅，一面也是为着解除地主的武装，以便利我之工作。

清匪阶段原定半月，事实上到了上月20日左右即可基本上告一个段落，正式的开展清算斗争。清匪阶段中未完成任务，在清算运动中去完成，我们组织了清算动员会，发布了布告。

关于防疫情形。去年红胡子攻城时，由王爷庙^①一带，带来了“百斯笃”。我们进城时，有四五处发生“百斯笃”。当时由公

^① 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

安局担负隔离工作，防疫委员会要求我们武装担负隔离。惟公安队没有一支枪，同时队员质量又很坏，当时分区无兵，八旅行动频繁，也抽不出枪来。因故拖延，“百斯笃”即蔓延了十多处，死亡人数已达 140 人。当时感到对这样的问题如不立即用全力来防疫，则再过几天，全城均可蔓延到。土匪虽不能赶我出城，“百斯笃”将驱逐我出城。到了那时，全城将有几千甚至几万人的死亡，整个西满将传染到，这将不只是洮南一县的问题，而关系到整个西满根据地存亡的问题。所以，最后下了决心，由部队来担负隔离，由自卫队来配合，全城实行防疫戒严，所有道路除有防疫会肩章者外，一概不许通行。开始还是时松时紧，结果效力不大。这十天来，一天紧似一天，才生了效力。在七天前，每天均要死 10 人左右。这三四天，一天只死一二人，区域没有发展。相信再这样搞十几天，就可告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城外仍有“百斯笃”，如城内结束，城外不结束，城里仍会传染的，因人和猪狗均可隔绝，老鼠则不能隔绝。城内戒严之后，老百姓的柴火及贫民的生活均感困难，特别是老百姓对“百斯笃”的知识少，有病不报，死了自埋，增加了传染的危险性。这些问题都是极端复杂的组织工作，现在县委区委均分散在下面进行布置。

在洮南干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

(1946年3月)

(一) 我们的总任务及总方针

我们的总任务是创立洮南根据地。创立根据地是全东北党的任务，因为没有根据地我们就不能取得可能到来的战争胜利，也就无法争取和平。没有根据地一切均将无法谈起。

为着要创立一块巩固的根据地，需要有三年的时间，但目前时局迫得我们要在1946年的上半年完成初步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可能站不住脚。现在已到3月1日了，只有加倍努力，才能完成光荣的使命。洮南是西满的最大城市，是西满的主要后方，所以担负的责任就要比其它任何县都大。

为要创立一个根据地，就必须要有：一、肃清土匪及敌伪残余；二、创立民兵及地方兵团；三、改造政权；四、组织生产及建设后方；五、正确处理蒙古民族问题；六、消灭“百斯笃”；七、组织群众及建立党。把以上这七项工作做好，才能使根据地初具规模。但是所有这一切工作，均要靠发动群众。没有群众工作的发动，则任何一个工作都做不好。但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则一切自能迎刃而解。

大胆放手地发动工、农、城市贫民，打倒敌伪残余及土匪，为创立洮南根据地而斗争，这便是我们的路线。

(二) 过去一个半月工作之总结

三种地区三种工作。一切应从本地环境出发，加以分析。洮南有它的特点，在一县之中亦分为三种不同地区，亦各有其特点。因此，在这三个地区的工作中心即有不同。在洮南，第一步

是清匪。第二步是防疫，在这两者之间做了几天清算。但整个清算要在防疫结束之后才能开展。在洮北 12 个村，清算是个中心，防匪只是在开始时的口号。在洮南南部 4 个村，今天尚未走出清匪的阶段。

关于北朝鲜对东北解放战争 支援情况的报告（节录）¹

（1947年6月27日）

自从去年7月底奉命与劲光²同志南下以后，快到一年了。第一个时期，从开始[去北朝鲜]到肖回东北局，我留平壤，已由劲光同志报告过。第二个时期，从去年9月到现在，这10个月时间的工作，以及朝鲜一般的环境，需要向你们作详细报告，但因你们时间有限，所以只择要的提出以下几个问题。现在，朱瑞同志回东北局，他在此住了将近两月，对此间情况了解甚深。我不久亦可能回去，再作详细报告。

一、北朝鲜对我有些什么帮助

有些人总是埋怨北朝鲜对我帮助少，这些话使北朝鲜干部听了不能心服，使曾在北朝鲜居住过的中国同志，尤其是伤兵及财经干部听了，更增加了他们的不满和报复的心理。其实，平心而论，这种估计并不恰当，我略举数端以资说明：

（一）通化、安东失守后，辽东有1.5万多伤兵家属、人员退到北朝鲜，中间虽经几次精简，但直到此次通化、安东收复前，仍有5000多人，就是现在仍有2000多人。在一个异民族的国度里，长久的将这样多的伤兵分住在老百姓家里，[而]他们[虽]是忍受着外交上的困难和本国人民的反感，[却]自始至终给我们照顾和帮助。雅鲁一度提出将轻伤送回，重伤交医院，但后来了解

¹：1946年7月，朱理治由哈尔滨经大连赴平壤，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北朝鲜全权代表。这是他写给李富春转东北局的工作报告。

²：劲光，即肖劲光。

到有实际困难，即作罢论。

(二) 原料供给。第一批是我托金^①要的 12 个车皮，第二批是亚楼来要的 24 个车皮，第三批是朱瑞要的 110 个车皮，这些都是金亲自组织，无代价的帮助我装运的。这次又是 600 到 800 个车皮。金并主动替我要东西，例如这次“礼品”^②便是他告我，要我向辰兄^③去要的。今年春，山东黄永年经私人关系买到 120 吨水泥，亦是经他们帮助运回山东。此次山东等地购之 300 吨水泥、120 万米铜丝、300 万个铁钉及锡铅 100 吨、硝酸 200 吨、胶皮鞋 15 万双，交换比例一般说来仍是便宜的，例如水泥一吨用 13 吨大豆交换。此次金还亲自召集技师为我研究生产土豆。

(三) 人员过境。辽东地区来往干部不算在内，去年 8 月过境 3000 人，今年由大连去临江新兵 3000 人，春初由新义州沿江去辑安 2000 人，今年由大连去北满干部 2000 余人，总计起来，这 9 个月来在北朝鲜过往者不下 2 万人。

(四) 物资保存。安东、通化退出后，几乎全部物资保存在朝鲜境内，重量有 2 万多吨。为了避免暴露，沿江边清水区劳动党员曾[被]动员出来替我们背运离开江边。[现在]，这些物资几乎完整的又运了回来。

(五) 物资转移。去年 9 月与人民委员会签订了联运协定，规定过境关税 50 元折粮，实际不足百分之一的税率。运价依运费配给折粮，故较贵，但与关税平均计算仍是便宜的。依这个协定运输的，在去年有 7500 吨，尚有万余吨未依这个协定，有的用人民委员会[名义]要了车皮，未出运费的，有的只交了现款

①金：即金日成。

②礼品：指苏军缴获的日本关东军在朝鲜的军事物资。

③辰兄：指苏联方面。

(每吨每公里二毛的运费)即运出。中间虽有一度停运,给了我们不少困难,但即使在停运中,我们的物资采用各种形式仍是在运转。平时,[他们]为了我们的紧急运输,甚至停止了自己的客运。

为了帮助我们上述工作,平安北道劳动党的副委员长花了全部时间,北朝鲜人民委员会的保安局长平均起来要占四分之一的时
间,做我们的工作。金日成给林总¹的信亦说过,双方关系并没有多大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我们请他做的事,他总是尽力帮助的。

虽然形式上是需要隐蔽的,但在实际上,北朝鲜对南满来说是起了大后方的作用。而对于各根据地来说是起了桥梁作用。假使没有这些帮助,南满的情况将是很困难的。

自然,我们也给了北朝鲜一些帮助。第一,粮食帮助。经刘亚楼同志送了一万吨粮,因租车争执由东北局送了2000吨,连同物资交换等等合计当在三万吨左右。其他如北朝鲜工业缺少之器材等,亦给了不少帮助。这次又送了他们两个新火车头。

第二,帮助做华侨工作。派了一些干部做华侨工作,在新义州、平壤、镇南浦三个华侨集中地,分配了土地,组织了工农,使群众中由国民党的绝对优势,变为我们的优势,[还]帮助恢复及维持了16处华侨小学,帮助各道劳动党成立了侨务委员会,委员会秘书长大部由中国同志担任。

第三,我解放区的朝鲜干部[被]陆续派回国来,前后将及500人,这些干部现在大部是北朝鲜各机关里的主要领导干部。

但是比较起来,仍应说他们帮助我们的大,我们麻烦他们的地方多。

¹林总,即林彪。

两年来对朝鲜外交工作 总结及今后任务^①

(1948年8月24日)

一、两年来完成的任务

(1) 基本上实现了东北局“以北朝鲜为变相的、隐蔽的后方来支援南满作战”的意图(安东、通化失守后,南满之伤员、后方物资多退回到北朝鲜,并以此为后方,来转移人员和物资以接济南满)。

(2) 借道北朝鲜运输来交流南北满和大连的物资(今年7个月运了21万吨物资)。

(3) 配合总部及南满的同志向北朝鲜索取和购买作战物资(先后从北朝鲜获得了2000多车皮武器弹药)。

(4) 发展了中朝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签订了鸭绿江共同航行协定、使用北朝鲜电力协定,以及通邮通电等协定。

缺点是:(1)交通不顺畅,中间发生两次停运;(2)两国贸易尚不正常;(3)双方感情尚有隔阂。但总的看来,我们两年来所要求北朝鲜支援的是得到了的,两国关系基本上仍是好的。

二、几点经验

由于两年来两国外交关系频繁,故经验是很丰富的。根据东

^①1948年10月,朱理治完成在北朝鲜的使命,奉调回国,这是他在临行前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工作报告。

北局经林彪、高岗、陈云、富春等同志书面和口头的正确指示，我们在工作中体会到有以下几点经验：

1、对朝鲜关系是外交关系，但是，兄弟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有原则区别。对朝鲜外交的总方针应当根据中央确定的总原则，力求两大民族的亲密、团结、合作、互助，来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切与此总方针、总原则相违背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

2、两国间的问题必须采取商谈或会议方式求得解决。北朝鲜是新兴国家，干部缺少管理国家的经验；双方只有反帝经验，没有兄弟国家的相处经验；加之我在打仗，他在和平建设，双方要求常常相距甚远，故商谈时必须诚恳耐心，力求寻找妥善解决方法。在这里，骄傲、急躁、轻言破裂，只能使事情搞坏。

3、当对方坚持错误观点，谈判说服无效时，则应而且必须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对其错误给以适当批评，否则问题不能解决，团结亦不可能。但自己有错误时，亦必须先作自我批评，并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启发对方之自我批评。两年来的经验证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兄弟国家争执的正当武器，那种主张采用报复、封锁、绝交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

4、当双方争执不能解决但又必须立即解决时，可请辰兄从中调解与斡旋（但需避免造成我们用辰兄压制他们的印象）。

5、必须照顾人家的困难，并尽可能给人家以帮助，才能取得人家的帮助。北朝鲜经济非常困难，我们决不可在经济上讨他人之小便宜，只片面地要求人家帮助，而拒绝给人力所能及的帮助（过去发展两国之间的合作互助做得不够）。

6、既要学会坚持，又要学会让步。对于国际主义和本民族的正当利益，必须坚持。但为了两国长远的和更大的利益着想，小的让步是必要的。过于坚持，拒绝让步，必然导致因小失大。但让步必力求主动，并让在明处。

7、为了避免扯皮，有关两国问题，应通过条约形式作出规定，以利遵守。过去图门、罗津两次停运，均由于事先未订约所引起。在订约时，必须反复斟酌，绝不要因订约时不审慎，致使事后不能履约而影响国家信誉（过去签订 20 余种协定，尚未发生此事）。

8、外交必须与国内密切配合，而外交又必须是统一的。在外机构，必须了解党的政策及意图。商谈订约之前，必须事先取得东北局的同意。订约后，必须同国内协调一致，保证贯彻执行。过去此间外交得到了东北局的充分支持，故尚未出现失信于国外之事。但与安东省方面因配合不够密切，步调每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朝关系。今后希望安东省委有一人统管对朝外交工作（因与北朝鲜毗连 500 余里，关系最多）。

9、对驻在国情况必须作很好的调查研究，同时对本国情况亦必须清楚，然后谈判方有根据，才能提出适当妥善方案来解决两国之争执（这一点过去做得不够）。对于国际法、国际外交史，亦应加以研究，以作解决问题时之参考。

10、注意公开与秘密之关系，必须照顾北朝鲜之国际困难。交通、商业是可以公开的，但在今天情况下，亦不可对外宣扬。建立隐蔽的后方，借道运送人员物资等，只能采取隐蔽方式。其他问题，如争取武器弹药等，必须绝对秘密，尤其要避免书面文件。应将防谍警惕性，提到最高限度。

11、在外机构必须有一套班子（包括翻译、电台、有关谈判专门人员和几个秘书）。开始因无翻译[问题]吃亏甚大。干部质量要高（经整编、整党学习及各地驻朝机关统一后，干部质量已有相当提高），所有在朝机关必须统一，这一点已经作到。现在仅有情报处负责同志与我们意见不一致并不受领导，故步调不够一致。

三、今后任务

1、继续图门—罗津直达列车运输，并使之畅通。必要时开辟辑安到镇南浦和安东的直达列车。开发海上运输，去香港、大连和山东等地。

2、尽量利用北朝鲜之工业技术，以支援东北战争与建设。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尽量把明年的贸易关系搞好。

3、采取各种方法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和相互支援，藉以增进两国邦交。

4、研究北朝鲜情况和经验，介绍给国内。

5、训练干部，使他们在政治上、业务上、党性上以及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均提高一步。

东北银行的业务方针^①

(1949年6月)

金融是社会经济机构中最先进的组织。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金融是各种经济综合的表现。”金融工作是一个复杂的工作，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学得好，把握得住的。因此，我的发言只是意见，而不是结论。

一、对过去工作的估计

银行过去的业务方针是对的，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银行的工作虽然有些偏差，但成绩是主要的。现在的问题是情况变了，东北已经由战争走到和平经济建设，票子由落价变为涨价，东北币的威信和价值比过去也提高了。因此，根据目前情况的变化来检讨我们的工作，重新决定我们的方针，是很有必要的。

目前，我们银行工作在整个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起来，不仅对私人工商业联系不够，对国营企业、合作社的联系也不够。过去，我们将吸收的存款交给总会计局支配，在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还不是直接的作用。东北银行是综合性的，是国家银行，国家银行的任务不能限于目前我们作的这些工作。存款交总会计局，总会计局投到公营企业，因为没有监督，公营企业中浪费现象很大。另外，除长期投资外，还需

^①这是朱理治在东北银行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标题为编者所加。当时，他担任东北银行总经理兼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

要短期周转，工业没有银行的短期周转是不行的。长期投资归银行负责还是设专业银行，目前尚不能决定，但短期周转必须靠银行。过去，银行对国营企业的周转不够是个体制问题，不完全是银行的问题。

对合作社的扶助也很不够，合作社的工作虽然交给了商业部，但商业部只能在商品上、物资上予以帮助，资金的周转还需要银行来作。

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我们过去帮助不够，联系不够。我们的经济政策太死了，许多事情都统制在国家手里，如安市吸收存款千余亿元，但对私营工商业的放款只有40余亿元。叫资本主义暗自消灭，很快消灭是不对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它还要长期存在，东北也不能例外。虽然东北工业经济只占东北国民经济的38%，但公营经济所占的比例很大，私人经济所占比例很少。这是我们的弱点，如果不改变这一弱点，银行工作就会脱离生产，落后于形势。

二、今后的方针

我们的方针应由两个方面组成，即推动生产与巩固金融。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并且在每个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生产是一切的前提，生产是历史上任何社会的基础，我们银行工作的重心是用一切力量来为生产服务，推动生产前进。如果生产搞好了，则金融也易巩固，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了。

推动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经济政策（如海关税收，工商业政策）。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形成金融寡头呢？因为资本主义银行将社会的经济活动都吸收到自己的手里，掌握整个信用，并且通过信用的力量，控制着各种生产，把整个社会经济垄断起来。他们不是从生产出发的，因此，他们发展的结果是造成生产的停滞，

进入经济危机。我们如果限制得太死，也会同金融寡头一样了。所以，银行的工作主要是从发展生产出发，利用生产的发展，将金融巩固起来。

生产发展了，物资充足了，物价才会稳定下来。物价涨落对巩固金融都是不利的。巩固金融，不完全是商业部的事情。物价涨了，商业部拿物资来稳定，银行则依货币与信用来紧缩；物价落了，银行则要增发货币。两个部门是相互配合的，要起双簧作用。作经济工作的，应关心物价，懂得物价。我们有许多同志好走极端，一说要投资生产、发展生产，就认为要多发票子，不懂得票子多了，相反会搞得物价波动，对公私均不利；另一极端是为了平稳物价，过量收缩贷款，弄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都是错误的。

推动生产与巩固金融，两方面都要，特别是要照顾生产，金融要为生产服务，拿金融的力量来推动生产。把生产推动起来，是银行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作用。我们不提倡赔本主义，但当前主要不是盈亏问题，而是对生产的作用问题。

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与东北局的决定，银行将在以下几方面推动生产。

第一，大力支持国营经济。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成分，东北经济的发展如何，主要是看国营经济发展的如何，特别是看鞍山、抚顺的重工业发展如何。现在这种工业部门生产的东西交给总会计局，银行吸收的存款经总会计局再投到工业去的办法是要改变的。将来，长期投资或是直接由银行搞，或是另设工业银行，暂时还定不下来，但是短期的借贷，必须经过东北银行，这是肯定的。今天要使工厂资金恰如其份，我们尚无经验，但将来可以一步一步的搞，慢慢的创造经验。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向苏联学习。总之，我们必须学习，必须要支持国营经济发展，因为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成分。国营企业搞不好，其他的工

业就不容易发展，就不能领导资本主义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过渡。

第二，帮助省营企业。省营企业也要搞，银行要和当地党政部门联系，根据当地的情况，帮助他们临时周转。我们作银行工作的同志，如果放款成了呆帐，要受批评，但应该扶助与发展的工厂，因银行未扶助，或扶助的不够而关门了，或者停工了，也要受批评，这才是公平合理的，不能为了避免呆帐而忽视了对正当工业的扶助。

第三，对合作社经济也要给予很大的帮助。在这方面，不能专靠商业部，也不能专靠银行。不能认为合作社还未组织好，不便于扶助，想等合作社组织好了，有了经验了，再贷款扶助。银行应该积极的帮助，一面帮助，一面改造，在帮助中改造，在改造中帮助。当然，帮助也不是一般的铺开，而是要有重点。

第四，有选择的扶持私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有生产的（工业）商业的两种，必须分开。在生产方面，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如哈市之制造新式农具的工厂、改良大车的工厂等，很可以扶助。但生产迷信品的工厂，是不需要扶助的。也有的工厂，私人自己可以搞，不需要多大帮助的，当然也不一定帮助。资本主义是无政府的，无计划的，但我们要起到领导作用与计划作用。我们要很好的了解他们，有计划的引导他们，推动他们生产。将资本主义的私人经济结合国营经济的发展，向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要靠银行。对商业性质的私人资本主义，也不能放任自流，也要统一起来。过去用私人存款帮助私人的方针，大致没有错，但我们不能限制太死了。现在我们公家一放几千亿元，对私人即是放个五亿十亿的，也不应在乎。如果与他们一点联系也没有，对我们并不好。

第五，要注意扶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拿原料给私人加工，国家的工厂租给私人经营，国家的资金与私人的资金结合

起来经营各种生产事业，这些都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第六，继续扩大对小商品经济的帮助。在这方面，我们过去作得很好。两年来，我们发放了大批的农贷，基本上是对的。对这一成绩，要巩固起来，扩大起来。现在，我们对农业生产放款仅占整个存款的3%，还需要积极扩大资金，或与政府的农贷资金结合起来，或搞几年合作社。总之，要使农村经济活跃一下，特别是对农村副业，如养鸡、养猪、畜牧及柞蚕、植棉、渔业等特产，要大力发展。去年鸡蛋生产60万吨，这是个很可观的数字。

要作好以上几点，了解经济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如每年秋收后商业部要拿大批票子买粮食，次年2月物价必然上涨。如果银行工作搞好，是能克服的。因此，银行工作人员应了解各地经济情况，了解整个的经济动态，并了解每一个企业的情况。对公营企业要起到一面帮助，一面监督的作用。这不是金融寡头，不是为资本家服务。我们要帮助那一个企业，就要看他的资产负债表，这样才能了解企业的情况，发挥银行的计划作用，避免企业的浪费，帮助它克服困难。

银行要推动生产，也要巩固金融。那么，如何巩固金融呢？

巩固金融之目的要使物价稳定，不使它一涨一落。过去一年的物价，涨得很厉害。4月份以来，物价稳住了。为什么物价会稳定呢？这与银行的发行与信用有80%的关系。银行吸收存款，推销公债，商业部抛售物资，物价才会稳下来。

物价下跌，也不是每种东西同样的跌。最近布匹、硫酸氨跌的厉害，钢铁、粮米，电料反而涨价。这是好现象。过去由于战争环境的关系，工业品与农业品的剪刀差很厉害，现在内外流通了，物价趋于平稳了。从物价指数来看，康德6年¹东北物价

¹康德6年，即1939年。

最稳，从那时到今年5月，平均物价指数上涨了13万倍（以50种商品平均计算）。其中，高粱涨6.3万倍，苞米涨6.1万倍，小麦涨19万倍，大豆涨6.6万倍，大米涨8.7万倍，面粉涨1.7万倍，小米涨5.7万倍，白糖涨26万倍，一般工业品比平均指数高一倍，农业品则低一倍，相差两倍。6月以后有些变化，外来品跌价而粮价未落，这对农民是有利的。我们的方针是使总的指数平均起来，减小剪刀差。现在自由市场的发展，与我们的方针是符合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作市场的尾巴，还要从中调剂。各省分支行都要研究一下物价，不合理的要改一下。以前哈市^①每斤糖比沈市^②贵几倍，对这种不平衡现象，我们可以利用汇兑与信用的力量，把它改变过来。如沈市物价低，可以扩展信用放一些款，哈市物价高些，则以信用力量紧缩一些，否则，会为商人所投机。不过，要搞到100%的稳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是自由市场。

物价不稳定不平衡，工厂很难经济核算。今后，国家市场要定出标准价格来，把物价固定化，各局各部均按此标准，提交国家，这样工厂才能搞的好。苏联、朝鲜都这样作了，这样才不会作市场的尾巴。对这一问题，大家还须研究。

要使物价涨很容易，发票子即可，要使物价跌则不容易。现在物价是基本稳了，再跌就不容易了。但如果再发票子，或稍微应付不好，物价又要涨。所以，我们要吸收存款，扶助生产，保证政府的支付计划不受到影响，这是应当认真注意的。管理现金、吸收存款的工作还是要做。我们现在做了一部分，国营单位的款已经交到银行了，转帐单位也多了。但我们还要进一步使五

^①哈市，即哈尔滨。

^②沈市，即沈阳。

个大单位¹及各小单位完全用支票来往，减少现金支付。大连的经验是买东西不用现金，一律用支票。如此搞，必须要都到银行存款。先搞公家，再搞私营。现在公家未到银行存款的还有，今后可以在报纸上公布一下。银行进一步可以不付现金，付给支票，或汇票，或转帐。

以后，银行吸收的存款要统一调剂。现在存总会计局 19000 亿元，无必要。将来，国营企业需款周转，银行资金不足，可将这 19000 亿元再交银行。各个地方要作出计划，统一调剂资金，这样才能活动开。

银行存款的利息也要调剂一下。今后，物价不需要再落了，只要稳在一定的程度上即可。等将来全国物价稳定，货币改变了，我们一换就可以了。所以，定期存款，还要大量吸收。

汇兑要活跃起来。最近，大连、山东、华北的汇兑也要搞起来，给工人、学生以方便。对付商人投机是次要的，主要是为解决工人的问题。过去，山海关牌价搞死了（人民币与东北币兑换比价），商人从中投机。牌价挂死了，只能跟黑市尾巴走，不能与黑市作斗争。这是不对的。汇价应根据出入口情形与双方物价的基本指数来决定。

金库制度，大家也要注意。现在尚有许多单位，如专卖局等的现金不交金库，随便运用。这是现金管理的一部分，必须交给银行。

三、关于组织与干部问题

第一，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银行不能脱离党和政府的领导，不能单独搞一套。银行应是党和政府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最好助

¹五个大单位，指当时东北五个主要的经济工作系统，如工业部、商业部等。

手，应与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当然，也不是党和政府决定怎么做就怎么做，应当了解和结合当地的情况，要主动提意见，想办法，研究情况。

第二，要提倡学习。学习十二本书¹，是为了帮助我们分析问题，理解问题，有些问题靠自己摸是摸不清的。但是也不能脱离实际，变成教条。总之，东北经济是可以研究清楚的，但必须靠大家结合实际，认真学习。

第三，人员应重新配备。工业地区要多派懂政策的、能独立工作的、能帮助那里生产的干部去。总行的机构要搞得强一些，对国营、私人工商业，对汇兑、金银，要各有政策，要有专门人员去研究。可以搞个计划处或研究处、合作处，专门来搞研究。参与制定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是银行的任务，应积极研究，提出意见。

第四，干部工作。对一些社会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如何更好地利用他们，使他们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工资政策也应改一下。我们的工资不如缝衣工，有些大学生待遇很低，并且是平均主义，累进差额太小，对刺激工作人员前进的作用很小。

以上几点，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正确，大家可以讨论研究。

¹十二本书，指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县以上党员干部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关于总会计局结束后各财经部门 相互间经济关系的意见¹

(1949年8月23日)

现在东北已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国营经济（工厂、矿山、铁路、银行、对外对内贸易公司）在东北的规模相当大，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各个国营经济相互间千丝万缕联系着，管理这种经济必须有严格的精密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否则，必定要发生矛盾，互相牵制，使工作无法进行。假如国营经济组织得不严密，便无法领导私营和合作经济。

去年底，东北财委会²即酝酿设立总会计局。到今年3月见诸实行，并公布了现金管理和清算资产两个法令。这两个法令是正确的。但依照苏联经验，现金管理可经由银行来做，管理国家资金可经由国家长期投资银行来做，原不必另设一总会计局来代替进行这两个工作的。当时设立总会计局另有重要目的，即希望利用此组织来解决与调整各部之间的经济矛盾。因为，那时各部之间互不信任，非用现金调拨不到物资。而这样必然浪费现金，并使国营经济活动陷于停滞。故设立总会计局，并决定各单位只和总会计局发生经济关系。工业部只将产品交总会计局，由总会计局给它现金及物资；商业部每月缴给总会计局以现金，由总会计局给它以商品出售；财政部将税收及工薪粮等交总会计局，由总会计局给他以现金及物资。而对外贸易，因为没有一个统一机构，事实上必须由总会计局来代替，将属于财委会之物资

¹这是朱理治在东北总会计局结束工作时金融系统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²东北财委会，东北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

处，属于商业部的东兴公司和对外贸易处三方面的会计统一起来，并由总会计局供给物资处经费，由总会计局调动其资财。

五个月来，总会计局工作的结果，使现金支付有了计划，有了管理，使物价走向了稳定，工业投资有了保证，各部相互间物资的调动也灵活了。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即这种制度非但不能够促进经济核算制，相反严重的妨害了经济核算制。其主要毛病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工业部和商业部及其他各单位，不是根据财委会的计划订立合同，相互约定货物品种、规格、交货日期、地点、价格、交款日期，互相督促实行，而是采用到总会计局转帐的制度。这样便失掉了相互监督之作用，到约定日期，有不交货的，有不接收货的，品种规格亦无人严格检查。

二、长期投资虽由总会计局拨出，但总会计局不是银行，下面没有一套机构，无法检查其使用情况。故有许多地方造成浪费，工厂的利润和折旧费亦无一机关代为管理。

三、工厂自己的流动资金和银行短期借贷金混而为一，即统由总会计局每月供给，第一月是供给，第二月仍是供给。这样流动资金必然浪费，资金的周转率必然降低。

四、财委会没有确定国营企业的产品成本价格，各单位可自订成本价格。过去因为用现金购买，购买人尚能讲价，督促成本降低。现在改用转帐制度，大多听从生产者规定，价格高的惊人，有比市价高五六倍者。这样当然不能促进降低成本。

五、对外贸易无统一机构，由三个不同的单位，分别管理出口入口，各单位均无法核算其盈亏，故必然要造成很大的混乱及浪费现象。

六、现金虽有管理机关，但物资没有严密的分配计划，没有一个负责机关来专管，结果大家重现金而轻物资，造成物资的相当浪费。

所以说，总会计局的设立，有好处，也有坏处。但它的好处，如现金管理、国家资产清理、机关相互来往采用转帐不用现金等等，是银行的工作，可经由银行去执行；而它的坏处是妨害了各单位的经济核算制度，这却是违反了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所以，必须加以改变。改变的办法，我认为应当是这样：

第一，加强财委会的活动。财委会必须详细研究与了解全国及东北、公家及民间物资的需要量和生产力，随时注意其变化，了解其是否相互适应，以订立东北全年的和季度的物资生产及需要计划。逐日，至少每三日将生产情况反映上来，并逐月发表生产指数。加强物资管理，订立物资分配计划，检查分配情况。对进口物资、工厂生产物资和库存物资，要全部了解并逐月逐日记录其变化情况。同时，对工厂所需原料、材料，商业部所需出售商品及财政部所需供给物品加以通盘筹划。订立现金收入及支配计划，在订立计划时，必须研究市场变化和物价情况。规定各种主要物品，如粮食、煤炭、木柴、棉花、纱、布、钢铁及其他，在公营企业和机关之间往来拨调的公定价格。规定工厂生产的成本价格，并在成本价格和公定价格的差额中，规定适当的流通税（或曰“公营工厂产销税”）。计划订立后一切均依计划执行，如有所变更，必须经财委会正式决定，并规定与此变更相关连的物资及现金等问题之处理办法。

财委会如能将这些工作做好，并加强对各部之领导与督促，各经济部门间的关系自能正常。假使没有上述这些工作，则不管组织怎样变动，财经部门相互间仍会发生矛盾，对不到头。因为，上述这些工作，不是哪一个部门自己所能做到的，它是关系到所有的财经部门的。

第二，加强银行的活动，使银行和生产结合起来，使银行变成真正的社会的会计。各单位的流动资金，一概存在银行的特设出纳账内。各企业间进行核算的方法，乃是将这一企业的帐簿过

人别一企业之帐簿，完全不用现金支付。各企业间的核算，一概以财委会规定之公定价格为基础。各单位间不允许有借贷关系，各国营企业，无权发期票，一切信用概集中到银行。所有企业购货之货款，应在卸货之后偿付。如因季节性关系，资金一时不足，可向银行要求短期信贷，但到期必须归还，否则银行不只有权停止它的信用，而且可诉之法律。以此促进资金的迅速周转，并由银行来监督其经营。所有长期投资，概由长期投资银行来进行，这个银行目前可由财政部、工业部、总会计局三处抽有关人员来组织，并可将该银行附设在东北银行之内，以便利用东北银行在鞍山、本溪等地的下属机构。这个银行的任务，是管理各企业之固定资金，保管折旧费、利润，并接收政府给工厂之投资，执行政府之投资计划，并监督各企业之使用。所有现金要一概存入银行，各单位只许保持极少的必要的现金。每月要由银行提出并由财委会决定现金的出纳计划，然后交由银行执行。这现金，只用作付工资，出差费，向农民购买原料及去市场购买经财委会证明公家内部无法拨付的材料。

第三，工业、商业、财政各部的经济往来，一概采取合同制。当全年经济计划订立之后，工业部及其所属各经济单位即应根据国家分配计划，和商业部、财政部及对外贸易部等有关部门订立合同，约定何时交货，货物品种及质量，并根据计划决定之价格来计算。工业部到期不能交货或交货而不合质量，由工业部负责赔偿。商业等部如到期不能接收，或接收不能付款，由商业等部负责赔偿。这样，责任分明，始能相互督促，又不致相互扯皮。

第四，成立对外贸易部，统一进出口贸易工作。财政部交外贸部的粮食等，一概作价卖给该部，外贸部门向商业部订购各种出口货亦当时作价转帐，工业、商业、财政等部向外贸部购买之商品亦一概作价转帐。买方及卖方均到银行转帐，但如买方在银

行并无足够存款，应即向银行短期借贷，并保证到期归还。外贸部向财政部缴纳之关税及利润，双方亦应相互订立契约，规定如何付给，并经由银行转拨。为了进行对外贸易的清算工作，可考虑专设一出入口贸易银行，或在银行内设立一个出入口贸易部。

第五，过去由总会计局代替财政部做的两件事，即向企业进行长期投资和代收企业之利润，现改由财政部领导下或监督下的长期投资银行来执行。对于国营企业之关税，货物税等的征收，财政部可根据财委会之计划与决定和各部商讨执行的手续及办法，由银行转帐。这样，财政部的权力便可完全集中。唯银行发行权及现金收支计划仍应掌握在财委会手里，因为这关系到物价及全部财经问题。

总会计局设立之初即决定它是过渡性的，现在已到结束的时候。但这个结束，必须使工作更前进一步，这就是保持总会计局好的一面，而去掉不好的一面。我认为，依照上述方针来做，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过，我在这方面摸索的时间很短，而它牵涉的范围亦太大，这些意见定有不妥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论银行工作的转变¹

(1949年12月)

(一)

根据现在东北的经济情况，银行的中心任务一方面是巩固金融，一方面是促进生产。生产不能发展，金融难以稳定，因为物资生产不够，物价就要涨。反过来说，如金融波动得厉害，对生产的发展亦是个阻碍。故两者需同时注意，相互结合，以推动生产为主。

银行如何才能推动生产发展呢？我认为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方法。

直接的方法是帮助企业进行帐目结算，短期资金周转，以及帮助他们必要的现金开支。资金周转不灵，工资不能开出，原料买不到手，一旦停工，即会浪费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于几千亿元。企业间和各部门间往来帐目，银行不替他们结算，他们相互之间是很难搞清的。银行如能正确地替他们做这些工作，对生产的帮助与推动将是很大的。

间接的方法是在信贷和结算的基础上，检查企业生产是否完成计划，产品分配是否合乎国家计划，收支是否完成任务。如发现该企业违反国家计划，或因管理不善而发生亏欠，银行即可停止贷款及转帐，并提出劝告，必要时还应向企业的上级管理部门报告，要他们及时加以纠正。这样便可促进该企业经济核算，并

¹这是朱理治在东北银行第六届经理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可帮助政府监督资金的利用情况，这样，银行也就间接地推动了生产。因为银行与企业间有信贷关系，并替他们结算，故企业的一切收支情况与生产情况，银行都较了解。据说，苏联计划委员会要了解企业情况，只要打电话问银行，即可清楚。这说明，银行在国家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与地位。

不过，银行推动生产的发展，不能只限于以上办法，还需要积极设法把金融稳固起来。目前东北已走上全面建设时期，如果金融不稳，物价继续上涨，产品成本便很难计算，经济核算便难于进行；而工厂的商品出厂后，其所得因物价上涨而买不回原料，也不能保证工业的资金积累，不能保证工业扩大生产，计划经济亦无法进行。所以说，物价平稳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去年东北物价涨了六倍，生产无法计划，今年涨了80%，虽然比过去好多了，但对经济计划仍有不少阻碍。为了保证明年经济计划的完成，银行应该把党的号召切实担负起来，尽力使物价做到不涨。当然，这不只是银行的任务，也是各个部门共同的责任。如商业要回笼货币，税务局要收税，财政上要加紧节约。但是银行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它对稳定金融应当而且可以起重大作用，它可以利用现金管理，利用非现金的清算，利用信用的扩大与收缩，来节约现金的开支，保证物价的平衡。

举例说吧。今年4月以前，现金未管理，公家现金均不存在银行，相互间来往必须要现款，故4、5月前物价即涨了半倍左右。但4月后，实行了现金管理，国家六大部门¹相互间买卖，一概经总会计局转帐。据总会计局统计，八个月中用非现金转帐的钱数，比之同时期公家的现金全部开支要大到5倍；而银行存款到今年底亦增加了4倍多，这就大大有助于东北今年5月以后物价的相对稳定和生产建设的发展。假如没有这个措施，现

¹六大部门：指当时东北六个主要的经济工作系统，如工业部、商业部等。

金支出将比现在要大好几倍，今年物价将不是涨 80%，而是要涨好几倍。

现在，过渡性的总会计局即将结束，转账及现金管理工作将全部交给银行。假使银行能在现有基础上加强现金管理，大力吸收存款，将非现金的转账结算范围扩大到一切国营企业机关，并端正信贷政策，做到非现金与现金支出的比例，由今年之 1 比 5 增加到 1 比 10，存款亦比今年增加一倍，则明年国家可比今年多拿出二三百万亿元的资金来替生产周转，而且物价仍可保持平衡。这对巩固金融和促进生产将起巨大的作用。

因此，明年我们检查银行工作主要是看现金支出与非现金结算之比例，看吸收存款及其合理之应用，这是当前起推动生产、稳定金融的两个重要环节。

(二)

我说过，由银行做为结算中心、信贷中心、现金中心，是我们达到推动生产，巩固金融的三个主要手段，三个法宝。有些同志被“中心”二字搞得非常糊涂。其实，所谓中心，即是一切收支、结算、信贷和现金管理，都须经过银行，这三个工作是三位一体，有机相联的，不能把它们看成是孤立的分离的东西。

只搞信贷工作，不和现金管理与结算工作配合起来，则信贷工作是搞不好的。因为你了解企业的生产情况，也就难以判断对他们的信贷是否合理。即使确定信贷后，你也不能根据其用途，采用转账方法，少付或不付现金，而只有照数发现金。而现金发多了，必然影响到物价。

现金管理工作和结算及信贷工作亦不能分离。有了结算工作，存款户取款时，才可能查明其用途，给以转账，使现金不拿走或不全部拿走，使现金不致浪费。有了信贷工作，才能使现金

管理有往有来。只存不贷，不能解决存款户周转上的需要，影响了生产，现金管理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结算工作和信贷及现金管理亦分不开。结算必有差额，银行如不能替他短期周转，他只有自己清算，只有搞商业信用，一切不用经过银行了。这样，银行便不能作到使一切机关、企业的收支经过银行。

总之，三个中心是不可分开的，分开哪一样也做不好。有些同志被这三个名词吓倒，认为这完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新花样。其实，这些工作我们过去已经做过，总会计局便是做这个工作的。总会计局事实上即是政府六个部门的现金中心，结算中心，信贷中心，它每月作各部的现金计划，替各部清算账目，解决各部的资金需要。但总会计局制度本身上有个基本毛病，即会计局不是银行，不好办信贷手续，而只能是供给式的，供给各部以现金及物资，再给各部调动物资及现金。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各部及各企业不能确立自己独立的会计制度，也就不能促进其经济核算。另外，总会计局没有直属下级机关，不象银行下边有银行网，因此不能监督资金之使用情况。现已决定在年底结束总会计局，改由银行来做这些工作。银行本身是信贷机关，不是供给机关，且下面有银行网，便于结算，便于管理，银行做这些工作是比较便利的。

各省、市分支行的同志也可能怕做这一工作，以为这些工作过去根本没有做过。其实，他们过去也做过一些，只是过去的形式是低级的，片面的，被动的。如现金管理工作，只是搞了一半，只是要求把钱存在银行，但没有要现金计划，存款户将钱支出去作投机倒把，银行也不知道；他们要提取多少即拿多少，没有限制；人家不存，也无法检查其库存，并给以限制；存款户可以拿支票满天飞，代替现金流通。再如信贷工作，或是根本不贷，或是你要就贷，或是依凭政治信用，靠政治解决，但不了解

生产情况，不能与生产结合在一起，不能发挥监督生产计划执行的作用。又如结算工作，虽然有一些，但只是人家开出支票，我们照样转帐，至于人家开的支票做什么用，是否合乎计划，银行无权过问。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工作改进一下，提高一步，以适应目前东北经济建设之需要。

(三)

银行如何开始担负三个中心的工作呢？在这方面，鞍山支行已经摸到一些头绪了。不久前，鞍钢和鞍山支行订立了合同，所有现金收支一概经过银行，取消了鞍钢自己的金库，一切收支都利用支票，银行帮助鞍钢发薪金，鞍钢觉得很方便。过去，会计曾有集体贪污的，现在因为根本见不到钱，这类问题没有了。由于现金收支和结算都经过银行，银行对鞍钢的收支情况逐步了解了，以后的信贷工作就好作了。银行通过替工厂用支票发工薪，或转账，或汇款，以及吸收工薪存款等方法，吸收其中百分之几十的现金，加上发工资时按工厂逐日轮流发，避免将货币在月初一次发出，减少了对物价的影响。同时，银行通过发工资，帮助国家了解了工厂的工人数目，工薪基金和工薪政策执行的情况。自然，鞍山支行这样做还只是初步的，今后还要深入做许多工作，如将结算范围扩大，使鞍钢和鞍钢以外的一切往来都经过银行结算，更进一步地审核它的现金计划等等。

别的地方支行也要逐步起三个中心的作用。明年1月1日，总会计局制度结束，现金管理，结算和短期周转势必完全集中到银行。过去，每月由财委批给工业部各局之现金，从明年1月份起将改由政府批准现金计划，交银行执行。银行支付时，将以信贷方式出现，即该局在银行有存款时，可在存款中支付如数之现金，如没有存款，可向银行办理暂借手续。开始一、两个月，银

行可依上级批示支付，以后，各企业的现金计划应向当地银行提出，由当地银行加以审查。因为，当地银行代理企业的收支，对其现金需要之确实数字了解很清楚。但银行没有决定权，银行只能汇总审查并提出意见，交政府批准后，由银行执行。对现金存款，一开始就要抓紧检查，应依据政府法令检查各单位之库存金额，如超过应即报告政府处理。只要由浅入深，一步步来做，我们是肯定可以做好这项工作的。

至于短期贷款如何进行，王经理已报告，我只补充一点，即这个工作大家必须很负责地去进行。应贷而不贷，会使企业周转不灵，影响生产之进行。但如不应贷而贷出，应少贷而多贷，贷出而又不能按期收回本息，势必导致信用膨胀。这是我们极应注意的事。为了保证信贷之正确执行，银行必须对企业之资产负债、收支情况、生产过程逐步了解，银行还必须按月作出信贷计划，交由政府批准执行。

各地支行只搞短期周转，不搞长期投资。长期投资由财政部负责从预算中拨出，交由长期投资银行或东北银行长期投资处依政府批准之计划执行，并监督其使用。

结算工作如何做好？首先，各个单位订购物资，应先订合同，将副本交银行备查。其次，各单位交款应依据银行之存款发出转帐通知书，并注明用途；然后写成三联，交银行审核，银行如发现其支款不超过其存款时，即可盖印，以一联缴银行作为正式凭证，一联交卖主作收款证明，一联自己留下存查；银行则将货款从买方之存款帐中拨到卖方的存款帐内。这样做，不只是可以节省现金，了解价款支拨是否合乎国家计划，而且可以将帐搞清，把过去几年来相互间帐目始终纠缠不清的毛病彻底改变过来。因为，任何一种买卖，其债权债务关系，在当时当地银行的帐中即可弄清。

三个工作，从那一项先做起，开始做到怎样程度，完全根据

具体情况来决定，绝对不能勉强，以免妨害生产，影响金融。

(四)

有的同志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实行这个办法，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实行这个办法是否早了些？其实，新民主主义经济本来就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说：“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北的国营经济在全东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了一半左右，在东北全部工业中的比重占了80%左右。这些国营经济，即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如不严格管理与组织，便无法领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亦无法领导合作经济。例如，3月份以前东北的现金未加管理，投机倒把者甚多，但管理后，就很少了。同时，我们实行现金管理并决定清算要经过银行，亦只是在国营企业和一部分合作经济中进行，并不是强迫私人资本也一律到银行结算，也来做现金计划。如果那样做，当然是错误的。

为了达到银行工作的彻底转变，我认为还必须纠正以下两种思想。

一种思想认为，过去的银行业务是那样，今天的银行业务仍是那样，主张不改变的是对的，而主张改变的是不对的。他们不了解，现在情况改变了，银行的方针亦应当加以改变。我们的银行是在战争情况下搞起来的。我们开始建立根据地时，因为没有革命经费，故发票子，发本币，和敌伪货币作斗争，以后又搞农贷，为的是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改善民生。总之，那时主要是搞发行，作货币斗争和进行农贷这三大工作。到东北后的三年中，我们基本上仍是处在战争和农村的环境中，银行仍是这三大工作。这当然是对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进行。但现在，东北已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经济建设成为压倒

一切的中心工作。而且，在东北有着全国所没有的巨大规模的工业基础，合作经济亦已经相当发达，银行的方针必须适应这种情况而有所改变。上次分行经理会议上，有些同志提出我们工作要转变，要和生产结合起来，由于认识上有不同，阻碍了及时转变。这一次，大家思想认识上基本上一致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要能够得到彻底转变，还必须做很多思想工作。

另外，还有一种思想是怕沾包，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旧银行带给一些同志的影响。比如，我们说银行要把稳定金融的工作担负起来，有的同志就说，这是商业部的事，不是银行的事。我们说银行要扶持合作社，有的同志就说，那是政府的事，不是银行的事。我们说银行应扶助生产，推动生产，他们就说那是财委的事，不是银行的事。这种思想把银行孤立了，搞死了，使银行的业务基本上陷在单纯的出纳。这说明，我们银行在过去也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就是按步就班，墨守成规，缺少对新鲜事物的感觉。我们必须根据党的号召，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业务水平，养成钻研新问题，创造新经验的积极作风。只有这样，大家思想与行动才能一致，银行工作才能得到彻底转变。

过去，由于我们思想上的认识不一致，故对组织上改变的认识亦不一样。现在，银行的担子大了，工作比之过去繁重了十倍，如果我们的组织不很好改变，这些任务就不易担负起来。过去的工作任务一个部门就可以一揽子包下来，现在则要有会计处、现金管理处、计划处、短期信贷处等部门分工，另外还要有长期投资处或长期投资银行。同时，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到工业中心去，组织上就必须要加强鞍山、本溪、抚顺等工业城市的支行。农贷工作亦是不能削弱而仍需要加强的，但要使扶助农业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相配合。我们必须将原来的老干部加以提高，并要放手提拔一批能力强的新干部，因为单靠老干部是不够的。

银行是经济的枢纽，各方面的联系很多并很复杂，政治上技术上都要有一批强的干部才能搞好。银行也应搞个新纪录运动¹，并推行奖惩制度。总之，我们不要怕新的东西，要很好地建立新的东西，只有这样，银行才能担负起转变的任务。

¹新纪录运动，当时东北旨在提高生产定额的群众运动。

东北经济恢复与建设计划 的方针和方法

(1950年7月17日)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使明年的计划订的更好一点，即在今年和去年制订计划已有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关系到全东北整个工业、农业、商业等各方面经济部门的发展方向。我今天的报告只是提出一个初步意见，更具体的内容还希望大家来讨论。

第一部分 制定东北明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方针

第一，东北明年经济计划的方针，依然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同时适当注意轻工业的比重及农业。

党中央决定，东北为全国工业化的基础。所谓工业化基础，基本上就是重工业。这也是轻工业的基础。如果东北没有钢、铁、铜、铝，不发展重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以及运输等，就不可能使得全国和东北工业化。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东北重工业基础打好，这样，我们才能制造轻工业的机器，才可能使农业机械化，才能建设我们的国防。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轻工业比重的增加。东北轻工业原来就比较弱，按1943年东北经济发展的最高的水平计算，轻工业之比重是25%，重工业是75%；去年，轻工业只占22%，今年，

①这是朱理治在东北各省市经济计划会议上所作报告的摘要。这时他担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轻工业占 30%，重工业占 70%。因此，明年轻工业比重应该增加一些。轻工业发展迟缓，使城乡交流发生困难。因为，农业的恢复、发展很快，重工业的恢复也比较快，但是轻工业比较慢，国家手里交换的东西少，所以直到现在农民还有一些粮食卖不掉，猪、鸡也卖不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去年因此而多发了一些票子，结果 3 月到 9 月国家后备就没有了，9 月以后才积存。今年，国家决定物价要稳，不能春天涨 30%，再发票子，那会影响我们整个计划。所以说，我们不发展轻工业，不能城乡交流，不能积蓄资金，对重工业的投资也有妨碍。

随着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农业也还要发展。不能因为大家反映说今年农业产品卖不掉，就不发展了。其实，农产品也不是多的很，现在我们要买 56 万吨粮食就买不到。就是粮食多一点，国家还要有一点后备力量。所以，明年农业还要发展，特别是工业原料，比如棉花、麻、糖等要大大发展。尤其是明年要从苏联大规模的进来机器，我们给什么东西？主要是农产品，大豆、苞米，商品粮，大米还要增加，以改善人民生活，麦子也要发展一部分。

第二，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发展数量。东北工业是搞起来了，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质量差。我们农业方面质量也有问题。由于质量不好，造成我们许多东西推销不出去，造成积压，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明年的方针是提高质量，这也是中心问题。新的成品，质量搞好了，再大量发展。

工业要发展就要研究怎样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一切都要围绕这一点。看你工作成绩的好坏，就是看你成本是高是低，质量是好是差。因此，必须在工业上采用新的技术，订立操作规程、提合理化建议，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缩小行政开支，组织检查机器，增加仪器。这问题还关系到怎样改善劳动生产力，怎样加强劳动纪律。我们在基本建设方面不要搞的很多，抓住几个重

点，搞主要工程，不要平分力量。修建上要特别注意质量和成本。现在，我们进行大规模的修建，投资很多，稍一忽视，就会使国家遭受巨大浪费。因此，要注意算成本，算质量。在质量搞好的条件下，求得数量的发展。

第三，必须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是三中全会¹上毛主席讲的话，在东北同样应如此。国营经济主要是国营和省、市、县营经济。我们省营经济不太发展，现在要注意使它很好发展。同时，我们对私人经济也不可忽视，国营经济，省营经济应该很好帮助私人经济。毛主席曾说：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要发展国营经济，因为不发展它就不能保证我们稳步走向社会主义经济，但不是马上挤掉私人经济。发展省营工业也要注意，不要挤垮私人工业，对私人商业也要很好组织，不能采取挤垮的政策。

第四，要注意产销结合。定货要保证有销路，要和推销密切结合起来，不要脱离。这是很复杂的工作，因为每个省都是为消费而生产，所以生产必须和东北市场，全国市场、国外市场结合起来。产销结合的问题，实际是城乡交流、内外交流，和帝国主义、外国贸易结合的问题。

集中力量和关内搞好配合。有的东西关内生产很多，价钱便宜，东北就少生产一点。有一些东西关内不够，我们就多生产一点。明年的计划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搞起来也困难，因此，东北只准备搞一百种。明年产销平衡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能用一点生产一点；国家必须有后备物资。说今年粮食多，谁知道明年是不是灾荒。我们钢铁生产多了就把它停下来，这不行。所以，国家计划一定要保证平衡，但这平衡不是近视平衡，要看到今

¹三中全会，这里指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年，也要看到明后年。财政方面要用100万资金搞一些定货，储备一些物资。不只是国家储备，而且各省市也要储备。

第五，明年购销机构（组织制度）要改变一下。这是个新问题。过去是工业部生产出东西来，各省市生产出东西来，你商业部就要收购，否则你就是没负起责任。这样，贸易部担子很大，商业部工作有它的困难，所以明年要多少改变一下。凡是国家分配的物资，经过分配指标，各部和各省可以定货，上面有总合同，下面有具体合同。能生产多少东西，经商业部定合同，也和合作社定合同。另外，国家分配物资以外的物资，各省市、各部自己来分配。例如，各部超过生产计划，那可以向合作社向国家商业定合同，推销或批发。采购问题也很大，特别是农产品、副产品，你叫农民生产后又不买他的，这不行。所以，明年要采取定合同的办法。私人收购要允许，不准私商到下面去卖东西，这一条要取消。

第六，价格政策。首先，联系到调拨价的问题，今年东北局的方针是要稳，越稳越好，下半年和明年必须更稳一些。其次，东北经济按性质分基本有两种：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一部分不能跟市场走，作市场的尾巴；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一部分有自由市场，不能幻想国家决定价格。市场就是这样子，市场价格不能主观地来决定。我提出市场价格不能脱离市场，但要掌握市场，引导市场。对这个问题，同志们还可研究，提出意见，由东北局确定。

第七，明年财政金融要贯彻“建设财政，企业财政”的方针。省市财政怎样积极帮助省市经济的发展，财政方面怎样积蓄资金投到工业方面去，这是主要问题。省市银行要真正成为地方现金、结算、信贷的中心。各省市企业也应该到银行去结算，现金开支要用转帐办法解决。

第八，明年计划要注意各种经济，不要单打一，各方面都要

照顾到……

第二部分，明年各省市经济建设的指标，即计划的轮廓。(略)

第三部分，计划方法及程序

第一，方法问题：计划是一门高深的科学。根据东北的计划经验，计划方法上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意图做计划。（二）计划必须是具体的，有具体的数字，不仅有三年五年的计划数字，而且要具体规定年度季度数字。（三）计划一定是统一的综合的。否则，一定发生矛盾，一定不协调，一定产生盲目性。（四）综合是解决不平衡问题，不是数目字相加。综合靠平衡表。一切平衡最基本的东西是物资平衡，即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其他的平衡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五）计划要切合实际，不能主观。数字谁都可以写，但是必须合乎实际，估计可能性。过高过低浪费都很大。（六）计划怎样才能合乎实际呢？主要靠经常检查工作，检查原来计划执行的程度。（七）计划有很大相对性，在执行过程中，总会有修改的地方，因此不能认为计划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的生产要根据市场，市场的情况变化很大，我们组织的程度还很差，推销与采购等各方面组织的力量还很差，大家经验也不够，特别是统计工作不够，因此订的计划也不可能完善，就是说，某些问题还需要有些修改。但我们的计划订出以后，一定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间发现了特殊情况，需修改计划，要经过上级批准，要有一定的手续。（八）计划一定要依靠精确的统计，脱离统计的计划是不可靠的。

第二，程序问题：（一）做计划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没有准备就做不好计划。制订计划至少要有一个方针与轮廓，此外要

有初步的指标，有一个大的数目字。要有表格，表格是个很科学的东西，没有它就不好作计划，填上许多数字，这是大事。另外，还有许多准备工作，如计算生产总值、调拨价格。各省要搞统计搞报表。（二）正式做计划。我们决定7月15日到9月15日由各省各部各厂矿做计划。9月15日到10月15日是我们搞初步平衡的阶段，把大家的计划拿来搞平衡。10月15日至11月15日，由计划委员会根据各地方的计划平衡发出正式的指标，各单位再根据它做正式计划。11月15日到12月15日，由计委会最后搞一下平衡。12月15日以后，将计划送交政府批准。程序大致如此。大家一定照这样做，一个单位拖延了，大家都得等着，因为计划是综合的是统一的。一个省的材料报不上来，东北的生产总值就算不出来。财政上有个财政纪律，做计划也必须要有个计划纪律。计划表格不能瞎改。

第四部分 计划机构

关于计划机构，条例上已讲的很清楚了。昨天，东北局讨论基本上同意，已送到政务院去批准。大的问题条例都讲了，我只讲这样几个问题：

（一）计划委员会与财经委员会性质有何不同？东北过去有财经委员会，现在将它改成计划委员会，目的是为了政府更好地来注意财政经济工作，使计委会更能集中力量搞经济计划工作。过去，财委会是在战争情况下工作，主要力量搞战争，供给前线，它在东北历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今天，东北已开展全面的经济建设，党政都注意着财政经济，财经机关也需要很精密的计划。因此，结束了财委会，改成计划委员会。计委会只是搞经济计划工作，不再去整天批条子，去代替各部工作。这一决定是很正确的。根据我们的经验，代替各部工作会使各部积极性不能

发挥出来，而且，计委会也不能集中力量搞计划。计委会现在的担子比过去财委会更重了。计委会的性质，是党与政府的总参谋部。

(二) 计划委员会的任务，条例讲了很多，我不重复。这里只强调一点，计委会不是站在那一个角度上看问题，而是站在整体上、全局上看问题，是从整体出发，从全国出发看问题。看计委会的工作任务与它的成绩，要看它能不能及早发现经济上的问题，并且能不能有远见，看到将来能发生什么问题。要对材料经常反复研究，方法也要搞的很正确。

(三) 东北局确定各省市计委会设 30 到 50 人，具体组织按条例搞；每省市统计人员设 15 人到 30 人。决定建立县计划科，设 5 人至 10 人，分统计与计划两个股。

(四) 关于干部问题，东北局发了一个通知，要求抽调比较懂得经济，有些实际经验，工作能力较强的干部到计委会工作。

(五) 计委会工作担子很重，但只要我们兢兢业业去搞，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摸一段就懂了。我们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国际经济》上介绍这方面情况的文章很多，大家要看，同时，还有专家在这里，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与指示，我们就会一天一天进步。1950 年计划比 1949 年多少进步些，相信 1951 年还会进步。我们要逐步减少盲目性，加强计划性，将东北经济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东北行政区进行 22 个月财经准备的 计划纲要（草案）¹

（1951 年 2 月）

东北经过二年建设，财政经济有了相当的恢复与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是：（1）重工业尚缺乏若干必要的设备，不能充分应付今后国家建设的需要；（2）土改后农民购买力提高，农产的工业原料增加，使轻工业生产与设备已经或将要显出不足；（3）交通运输能力已经不能满足生产与贸易的要求；（4）企业管理的经验尚未成为系统，尤其缺少基本建设、技术设计、资金与成本管理等方面的经验；（5）缺乏专业干部与技术人员。

22 个月准备工作的总的要求是：（1）适应全国和东北长期建设的需要，继续努力增加生产与基本建设，籍以充裕物资，开辟财源，巩固国防力量，并逐步提高人民生活，鼓励群众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2）搞好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提高效率，发挥各企业中的潜在力量，并从中取得经验与总结经验；（3）大量培养各种专业干部、技术人员、技术工人；（4）组织北满的资源勘察工作。

一、工业方面

为打下东北与全国长期建设的基础，仍应以重工业为重点，努力增产，并有步骤的勘察新资源。但是，第一为了保证农民增

¹1951 年 2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三年准备，指的是 1950 年至 1952 年，从当时算起，还有 22 个月。本文就是东北计划委员会为贯彻党中央的这一精神而在朱理治主持下起草的。收入本书时有节略。

产的工业原料有出路；第二，为了使农民能买到必需的工业品，以推动农村经济的继续发展；第三为了进一步积累重工业的资金，因此，也应适当的注意发展轻工业与地方工业。

(1) 重工业生产，应着重钢、铁、煤、电、车辆、机械与化工产品等七项。

(2) 轻工业生产，根据原料与市场的情况，大致可分四类：
(甲) 东北原料丰富（或可大量种植），全国供不应求的，如燃料油、纱布、纸张、麻袋与亚麻制品、轧花工业等，这类应大量增产，扩充设备。
(乙) 东北原料丰富，全国市场尚未完全展开的，如火柴、烧酒、葡萄酒、纸烟、玻璃、水泥等，这类暂时应就原有设备适当增产，将来再扩充。
(丙) 原料虽有发展前途，但将来可能受外地影响，宜降价多销的，如砂糖、肥皂、皮革等，这类应该少量的扩充设备。
(丁) 原料多、基础差，但又富有经济价值的，如木材干溜与大豆化学工业、棉籽油、大小麻子油、兽骨等类加工业，这类应该分别情况，有的根据需要开始兴办，有的积极进行试验工作。

(3) 国家的投资只能集中在几个重点，而地方国营工业已有一定的基础，因此，必须有计划的按照以下原则办，即：甲、为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服务；乙、为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服务；丙、为农村的生产资料服务；丁、为军需加工服务（上述轻工业产品已包括在地方工业主要产品在内）。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之下因地制宜，继续发挥地方国营工业的力量，使地方与国家相结合，共同实现上述轻、重工业的增产方案。同时，发挥私营工业的积极性，特别在为国家加工订货及供应农村一般生产工具方面，其绝对数量亦能有所发展（相对数可能减少）。

(4) 不论轻、重工业，一切厂矿必须大大提高产品的质量，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器、玻璃、灯泡以及油料等。要加强生产与技术指导，严格成品检查，不合格品不得出厂，务使产品的

质量与数量同时增进，能在关内外市场迅速行销，便于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在地方公私营工业中，应该着重取缔各种农具的粗制滥造行为。

二、勘察设计及基本建设方面（略）。

三、农业方面

着重增产大豆，棉花及其他工业原料和商品粮，采木造林，兴修水利与发展牲畜。

四、贸易方面

(1) 进一步扩大城乡间、关内外与国内外之间的物资交流，把多余的工农产品推销出去，换回必需的机械、器材、原料与生活必需品。

(2) 加强工业器材、建筑器材及工业原料的供应工作，改善农具、肥料与农民需用木材的供应情况。积极设法从国外及关内购进材料，保证区内的基本建设的需要，并使关内能买到东北出产的大量工业器材。必须致力于这个薄弱的环节。

(3) 把供销合作社与劳动互助组进一步联系起来，通过合作社的供销工作，使劳动互助组取得农具、肥料和车马，并能畅销产品，使其日益巩固，并有重点的逐步扩大。

(4) 更好的了解日益增长的人民需要，着重掌握工农群众不仅要求增加商品数量，而且急切要求改进商品质量的特点，积极的确切的向工业部门提出关于扩大生产与改进质量的具体意见，以便制订合宜的工业生产计划，改善人民生活。

五、交通运输方面

不能满足生产与物资交流要求的运输是最大问题。必须把铁路的年运输量，从今年的 5500 万吨（去年 4900 万吨）提高到明年的 7000 万吨。明年要求每天装车 7000 辆（今年 5200 辆）。

为此，除了加紧造新车之外，还应该：

(1) 加强调度运转的计划性，减少相向运输和排空现象，组

织直达列车，减少非运用车，更大程度的提高车辆的运输效能。

(2) 于今明两年恢复五条铁路线：哈长复线，营口与沟帮子间，锦承线，本溪与田师傅间，本溪与凤凰城间的复线（两头均为复线，有战略性）。五线全长 917 公里，都是有路基、部份有铁轨的复旧工程，其中哈长线与锦承线（或田师傅线）全长 666 公里，应于今年内完成。

(3) 充分发展航运与公路运输，以补铁路之不足。

六、财政方面

(1) 要求以工农业生产与贸易、运输的发展为基础，扩大收入、增加经济与文化事业的投资。

(2) 要求各企业部门积极提高资金周转的速度，降低成本，以节约资金增加积累。在步骤上，首先着重从减少产品积压、清理呆滞材料、加速结算工作等方面，提高投资的运用效率；同时，研究定额核算成本；然后，在科学的定额的基础上，制订成本计划，进行规格的成本管理工作，并进一步缩短生产过程。

(3) 必须储备国防及经济建设需用的器材。

七、劳动文教方面

(1) 要求各财经部门与文教部门结合，采取专科学校、中级技术学校、轮训班、带徒弟、开专业会议、总结经验等形式，进行专业人材与技术工人的培养工作。训练对象除招收一小部份外，着重抽调优秀的工人、工人子弟与在职干部。

(2) 必须根据各经济部门缺乏专业干部与大学缺学生、小学缺教员的情况，采取以中学、中级技术专科为重点的发展方针。要求文教部门不要过多过急的增设大学和小学，应该多办中学，以便造成三、五年后发展大学及增加小学师资的来源。

八、制定东北区三年或五年的长期建设计划方面

(1) 工业发展速度，工农业比重，轻重工业比重问题。

(2) 钢铁、有色金属、轻金属、化学工业、机械制造、车辆

制造之扩大与发展。

(3) 国民收入之计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国家积累水平问题。

(4) 东北内部工业分布及与关内各区结合的问题。

(5) 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更好结合的问题。

东北行政区的计划工作¹

(1951年3月)

一、东北计划工作发展阶段与工作要求

去年，东北区开始建立全面的经济计划工作，在编制了年度计划之后，又采取了若干措施以保证计划之实现，并为今后的计划工作准备了若干条件。

今年，我们在年度计划之下，要着重搞好季度计划，以便计划更能切合实际。要注意分析研究与解决计划中的关键问题如研究如何使生产与分配互相结合，国民经济各部门互相结合。同时，注意研究如何使各种经济成份互相结合，并应开始有重点地深入研究几种经济技术定额，建立计划与统计工作的若干制度。

明年，我们应该搞好各种主要的经济技术定额，根据平均先进定额，规定计划要求，把计划工作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要解决计划与统计工作中的基本程序与基本制度问题，使计划与统计工作开始走上正轨。要研究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与长远计划中的关键问题，并在中财委与毛主席的指导之下，编制东北区的长远计划。

二、长期计划的准备方向

为了准备制订长远计划，计划委员会应该做以下几件工作：

1、有步骤有重点地搜集与系统的整理材料，注意研究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三、五年或十年）东北经济的发展速度，提高东北人民生活的适当水平，与关内各区的分工与结合，东北工农业

¹这是朱理治写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区政府的报告。

的比重，轻重工业的比重，特别是金属锻铸、机械制造的扩大发展，东北各种经济成份的结合，东北工农业的区域分布，长期建设的具体步骤，各阶段中的重点等问题，作为上级决定长期计划方针的依据。

2、在今后 21 个月的工作中，研究与计划提高工农生产，降低产品成本与建筑成本，提倡节约，促进资金周转，增加利润积累，推动资源勘察工作，布置必要的基本建设，储备必要的建设器材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物力、财力的准备。

3、选择典型，总结计划统计工作、企业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研究、各种经济与国民经济部门互相结合的经验，并注意研究大量的有步骤的培养各种专门干部与技术工人的长远计划。

4、分别轻重先后，把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与长远计划准备工作相结合。我们学做计划统计工作，应该具有长远的眼光，又必须实事求是。长期计划的准备工作必须进行，同时，又必须搞好现在统计计划工作，实现当前的国民经济计划，这即是最好的准备工作。

三、今后 21 个月的主要工作，主要拟订下列六项

(一) 进一步掌握经济状况与财经工作情况，主要是分析研究现有的统计与报告，系统的逐次研究各种主要商品，作典型调查，开专业会议，召集下面工作人员座谈，增加若干必须的统计项目，如人口、工种、资源等。

(二) 掌握生产与分配的平衡，选择若干主要工农业产品，结合社会公私各方面的需要，国防、生产与消费的需要，东北与全国的需要，进行供需平衡。通过社会物资供需平衡的工作，促进生产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提高，并联系解决有关的贸易、运输、财务、信贷、价格、工资、基本建设等方面的关键问题。

(三) 研究审查与规定各种主要企业部门的平均先进技术经济定额，通过工业生产设备运用定额、原材料消耗定额及产量质

量定额以及铁路车辆周转率、农作物单位产量等的定额管理，提高计划的准备性并发挥国家计划之指导与动员作用，发挥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潜在力量。通过定额管理，促进企业经济核算制度之贯彻。因此，要逐步地深入地研究，务使各种主要定额合理化。

（四）继续研究增加何种适合需要又有可能举办的轻工业，以扩大企业利润；如何调整税收，以促进产销，培养税源；逐步重估固定资产，调整流动资金，提高经济投资的使用效率，以节约资金。要使金融信贷事业在发展生产与促进物资流转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开始计算国民收入，得出每年的生产净值，然后确定消费与积累的适当比例，改进工资、利润、价格等规定。

（五）研究如何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更好地结合各种经济成份，并逐渐使其直接与间接的纳入国家计划。除对合作经济与农业经济继续加强领导外，应该注意研究采用加工及订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恰当地解决其中存在的质量、利润、工资、劳动效率、原料供应等问题，使其巩固、发展。要推广与充实经过行业会议发动私营工商业计划产销的经验，分析研究私营工业普查材料，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在步骤上，首先解决 10 个大中城市，其次是外县市镇。各省市计划委员会应更多的注意研究与掌握在这一方面的问题。

（六）培养统计、计划工作人员，适当的充实统计、计划工作机构，主要的培养方法是办专科学校、训练班，在实际工作中带徒弟，使全东北计划统计工作干部发展到 5000 人以上，并积蓄一部分后备力量。为提高思想与业务水平，要出版计划统计工作指导刊物，请苏联专家向在职干部讲课，开各种专门问题的座谈会，深入下层检查工作及调人上来参加工作，定期进行专题的工作总结。

要搞好上述准备工作，建议采取下列几个措施：

第一，要向中央请示并取得其他各大行政区财委的协助，经常了解有关东北的经济建设如何与关内相结合，东北如何为全国服务，东北应该供给全国一些什么物资，全国可能供给东北一些什么东西等问题。请中央各部与其他大行政区各部多给我们一些有关财经情况与财经计划的资料，使我们能从全国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与布置工作。要求中财委指示我们应该供给中央一些什么资料，作为中央全面筹划的参考。

第二，要解决财经行政工作与计划工作的分工问题。为了使我们得以集中全力学习计划工作，今后的财经行政工作，希望仍由政府办公厅处理。如果东北局与行政区政府决定仍由计委会兼办财经行政工作，提议由政府增调人员，在计委会内成立财经行政处，结合其他各处，专管财经行政工作。

第三，请东北局及行政区政府批准，提请中央增聘三至四位苏联计划专家。过去计委会有四位苏联计划专家，现在只有一位。

第四，请东北局批准、政府人事部帮助，增调一些必要的干部，适当地充实各级计划统计机构。

第五，请东北各部门各级政府更多的供给我们有关财经情况与编制计划，执行计划的情况和经验等方面的材料。

第六，计委会内部要按专题分组，结合有关各处的业务，分工负责。

关于经济核算制的发言大纲

(1951年3月)

一、什么是经济核算制

(一) 新民主主义国家管理其国家企业即管理带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需要有许多制度和办法。例如：实行管理民主化制度（如民主改革、竞赛运动、合理化建议），制订定额，编制统一的综合的计划，建立各种责任制度，建立技术管理制度，实行合理化的工资制度，而经济核算制也是其中的一个制度，并且是最基本的制度。

(二) 这些制度是相互联系的，例如：不发动群众则什么制度都不能建立，不编制计划则经济核算制会变成盲目的，而没有经济核算则计划亦不能保证完成。

(三) 经济核算制的特征是在国家计划之下，给予企业以一定的独立经营的权利与义务。所谓一定的独立经营的权利与义务，大体上是以下几点：（1）给予企业生产及推销的独立资金；（2）国家依计划征收折旧及利润、税收；（3）企业可以相互订立合同，购销货物并向银行结算及借贷；（4）完成及超过计划时，给予物质奖励。

因为这个制度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能启发企业的责任心、积极性及创造性，因此，它成为改善管理、厉行节约、克服浪费、降低成本、加速资产周转的主要工具，成为国家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主要制度。

二、经济核算制的建立在东北经过的几个阶段

总会计制（即金库制）是经济核算制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

不宜实行太久)。1949年初，因物价不稳定，资产未清理，刚接收的南满工业尚未经过初步改造，所以当时未实行经济核算制，而采用了总会计制度。这种制度是一切生产出的物资均逐级交给总会计局，一切生产中所要的原料、现金均向总会计局领取，各部没有独立资金，相互没有合同。这种制度在当时是有一定收获的，因为国家掌握现金、物资并有计划的调剂市场，保证了物价平稳，使经济核算制的推行得到很好的条件；同时，给予企业整顿改造的时间，以便准备推行经济核算制。在这个时期，东北工业部做了许多工作，如清理资产，制定定额，试作计划，为实行经济核算制准备条件。

但因总会计制度本质是一种供给制度，妨碍着经济核算制的推行，所以在1950年1月初即实行了独立会计制，亦即是实行了经济核算制。东北的总会计制和今天关内许多部门实行的金库制度是类似的。在刚解放时，为了集中国家的力量来战胜物价不稳，给新接收的大企业以恢复改造的时间，这是必要的，必须的。但时间不可太久，理由是，它使企业不能实行经济核算制。

资金必须清理，尤其是流动资金，但固定资金清理只能做到近似。在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后，如发现不行，可以改变估价或折旧率，但不可因此而长久拖延经济核算制之推行。

三、东北由总会计制改为经济核算制的步骤及办法

经济核算制的改革不是一个部门所能做到的，必须联系到许多部门，如银行、财政、贸易、计划等部门的改革。当时，采取的步骤与主要方法如下：

(一) 1950年1月10日命令规定了四条，其中有：

(1) 结束总会计制，各企业概需实行独立会计制度，在总的经济计划下进行独立活动。

(2) 机关企业相互间往来，买卖按计划订立合同，不许用现金，亦不许相互借贷，必须到银行结算，如有不足，由银行短期

信贷，但必须按数归还。

(3) 长期投资与短期周转分开，不许将长期投资资金用作生产建设，反之亦然。

(二) 1950年编制了一套完整的综合的计划，其中规定：

(1) 生产及修建计划。

(2) 财务计划中规定了流动资金、折旧率及利润上缴数，并规定超计划成本的为超额利润，均归工业部用作局长、厂长基金。

(3) 编制与审定了成本计划，并为了使计划成本不受物价波动影响，政府及工业部订了调拨价，工业部订立了两套成本计算方法。

(三) 由计划委员会审定国营企业的各种卖价，并编制主要物资分配计划，防止盲目抬价及生产。

(四) 由计划委员会规定地方企业生产指标，其利润半数留作各省扩大工业生产之用。长期投资由银行给予一年到三年的贷款。

四、经济核算制的深入实行

在东北，经济核算制首先是各部和工业部各局先实行。1950年6月到厂，商业部年底深入到县。每到哪一级，即确定了资金，即可依计划独立的相互订立合同，并向银行结算。哪一级实行了这个制度，便能显著的启发积极性及创造性，来节约材料及现金，计算并降低成本。同时易于相互间结算。

现在，经济核算制应当巩固，并普遍与深入地向下推行。为此，还要：

1、要使所有企业部门均采用此制度，特别注意深入到基本建设中去；

2、有重点地深入到车间去；

3、改变供销制，由工业系统建立推销机构；

4. 彻底取消商业信用，加强银行监督。

核定流动资金及降低成本，吕部长¹已详细说了，故不赘述。总之，要使经济核算制逐步地推广和深入，以达到克服浪费，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及质量的目的。

¹ 吕部长，即吕东。

在第一次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 核定资金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957年9月5日)

这次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会议，在12天中详细讨论了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方针、任务、条例，并组织了估价、会计、表报三个小组专门研究上述三个问题。这就使得各地区及各部有一批干部，能从方针政策一直到技术上把握住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工作。希望大家回去亦同样组织这样的会议，以便训练一批干部领导这一工作，使全国清核工作能较准确的进行。

清产估价，尤其是核定资金，本身包含并牵连了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根据中财委的指示和会议上的讨论，仅就能做出结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这次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为了建立经济核算制。准备在此次清理资产后，即根据定额及计划确定企业资金，使企业有独立活动之资金，以便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进行独立活动，独立计算盈亏，使企业经营之好坏，和它们的财政收入之间发生直接关系，以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及创造性，为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克服浪费、加速资金周转而斗争。同时，在核定企业资金时，要做到既不过多，因为过多会促成浪费；又不过少，因过少会妨碍生产。第二是为了促进企业计划管理之建立与提高。要使企业在此次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中，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用现金表现的设备能力，未用的多少，如何

①朱理治这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兼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委员会副主任。

充分发挥这些设备力量，如何决定基本折旧率及大修理折旧率，流动资金究竟有多少，在储备、生产及流通过程中各占多少，现在的资金周转率多大，如何使资金加速周转等等。以上这些均是企业计划中的重要部分。要做到这些，必须推动企业，将企业整个的统一的生产和财务计划建立起来，并提高一步。没有生产财务计划，要依据定额来确定资金是不可能的。

二、从9月起到12月底止，各企业部门一般的应将编制计划与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工作作为中心任务，其他工作如民主改革、劳动竞赛、制订定额、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均可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这四个月诚能做好这两个工作，则在明年之内，全国国营企业即可开始实行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度，使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走上正轨。而编制计划和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实际上亦可配合来做，作为一个工作，因为核定资金不只本身是财务计划的一部分，而且要做成这个工作必须和整个计划工作配合起来才能做好。至于清资估价工作，则是核定资金及编制明年计划的准备工作。

三、这次核定资金原定根据今年计划或今年下半年计划进行，现经会议检查结果，发现各地下半年计划大多没有确定，即使有，亦是个别的计划，而非统一计划，难以作为核定资金之根据；同时，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之决定及准备较晚，核定汇总完结已到明年，失去了现实指导意义，故决定根据1952年计划来核定明年的企业资金，资金情况则根据今年9月底的实有数及12月底的估计数。至于有个别地区已经依6月底实有数清点估价者，只需依此为基础，再根据6月底至9月底资金变化情况，作出9月底资产价表即可。

四、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范围，这次主要是国营企业系统。公私合营企业为数甚多，情况亦甚复杂，原则上可根据私人企业清估办法进行清估，其产权管理，由私人企业管理者另拟办法。

但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有些企业，国家股份占了绝大部分，私人股份有的逃亡在外，有的完全不参加实际管理。对这一部分企业，原则上可采用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办法进行清理核定，但事前必须取得中财委或当地财委之同意及批准，对私人股份必须予以清理并照顾。地方公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亦是需要的，亦可参照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办法来进行。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结果，向全国核资委员会备案即可。何时进行这个工作，可根据具体情况，由各大行政区财委决定之。

五、今后，后备物资概由国家按计划储存，核定企业部门资金时，应将这一部分资金除外。企业本身因特殊情况需要超额储存原料及积存产品时，得经国家批准后，由银行信贷或财政增拨流动资金。部、局如需统一购销者，可在部、局下设供销机构，确定其资金，作为经济核算单位，独立计算盈亏。

六、为了划分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决定凡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金额在100万元以上者做为固定资产。但各部可根据上述标准，结合各部具体情况拟定划分标准，报全国核资委员会批准。至于今后在国家基本建设项目以外，划分固定与流动资金标准限额以上的零星基本建设，可由各企业部门在编制年度财务计划时编入。暂未使用之固定资产，所需之维护费用，亦可在财务计划中做出，经审核批准后，从利润中扣去。

七、经核定后多余之流动资金，概需上缴。上缴的概缴金额不能是呆滞材料，但各部门可订立分期上缴计划，以便处理呆滞材料。核定资金时，资金如有不足，呆滞材料应计入企业流动资金之内。在未处理前，可由银行信贷支持。企业部门处理呆滞材料如有困难时，上级应设法帮助。去年清仓时决定上缴之物资，依财政部物资会议决定的办法处理。

八、估价标准由全国订立，原则上统一使用，但各地可根据该标准，予以充实；如发现有不合适者，亦可提出修正意见，报

全国核资委员会修正。至于流动资产的估价标准，由各部、局及企业自订，国家不作统一价格标准。

九、银行是促进经济核算制的建立与巩固的重要工具，核定资金之后，各企业均实行独立会计制度，将企业金库制度逐步改为企业直接到银行实行结算的制度。同时，核定资金时，对非定额资金如季节性储存等，一概归银行信贷解决。定额资金，亦需由银行信贷一部分（工业部门暂定由国家供给 90%，银行信贷解决 10%，将来视物价及银行利息之高低，再改变其比例，但至多不超过向银行借贷 30%。至于贸易部门及其他部门定额流动资金由银行信贷解决之比例，需根据各部门的特殊性另定）。企业相互间取消商业信用，信用一概集中在银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促进企业去发掘后备力量，加速资金周转，可以使国家经由货币，对企业加以管理。但要做到这些，银行对国营企业的结算及信贷必须尽可能简便手续，降低利息，特别对国营工业的结算户的利息要予减低，具体办法已请由银行另行拟定。

十、资金情况每天都会变动，为了避免混乱，各企业部门必须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时，随即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如：仓库管理制度、领料退料制度、财务表报制度、资金管理制度。至于会计表报，全国国营企业必须有统一的格式及统一的会计科目（主要的），以便国家能加以汇总。现在，各个工业部门的表报相互间是不一致的，国家直营和地方代管的表格亦不一致，因此，国家无法汇总，加以分析与研究，但因改变会计表格和科目必须要有准备时间，故今年各企业部门可仍采用原来的会计表报，争取明年用新的表报和统一会计科目。这次全国核资委员会所拟之统一表报，只作为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汇总之用。同时，现在会计、统计、计划三种表格亦不一致与配合，这样就妨害国家的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统计监督，亦需有所改变。此事已请中财委计划局与财政部予以解决。

十一、为了保证工作胜利完成：(A) 要首长亲自动手，至少各级财委有一副主任，各业务部有一副部长亲自主持其事。清估可由财务和材料两部门多做具体工作，核资可由计划和财务两部门多做具体工作，但首长必须领导各部门，使之能配合工作。(B) 充分动员和信赖群众。重工业部在此次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中便有这样经验：工人群众不仅能够帮助进行清点和估价，而且能够“举一反三”，很快懂得如何计算流动资金定额。(C) 抓住典型，利用典型经验来推动工作。此次会议决定每部及每地区，均抓住一、二个企业为重点，先行清理核定，创造经验及训练干部。(D) 党的保证与领导，工会的号召与动员，报纸的宣传与组织，对工作的胜利完成都起巨大作用。这次铁道部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党支部在事前作了动员，并要求党员保证不低估、不隐瞒、不本位，对工作进行了保证作用。大行政区代表很羡慕《人民日报》对此次核定资金工作所进行的宣传动员，希望各大区的报纸将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作为中心报导之一。

关于第一次全国物资分配 会议情况的报告¹

(1952年8月5日)

第一次全国物资分配会议，于7月2日召开，7月24日结束。会议确定了1952年17种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的分配计划，根据积极平衡原则，提出了解决某些产、供、销不协调的措施，使之达到基本平衡。会上总结了两三年来物资分配的经验，研究了工作方针与方法，对组织机构和供销分配制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因而思想上取得了一致，达到了会议的预期目的。兹将会议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

会议把国家统一分配的主要物资，特别是生产资料，作了详细核算与分析。总的看来，经过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经过中财委去年12月会议决定对全国主要物资的统一分配以及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物资的情况是有进步的。具体表现在：（1）以往几年都感到木材不足，经过“三反”“五反”动之后，木材“老虎”打倒了，各单位囤积的木材交出来了，申请木材时比较实际，不敢漫天要价了，使用木材注意节约了。经过国家统一分配详细核算的结果，不仅可保证今年的供应，而且到年终可积累木材211万立方米。我们准备以80万立

¹这是朱理治写给中财委并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报告。这时他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物资分配局局长。

方米充作国家储备，以 45 万立方米预拨各单位作明年之用，其余 86 万立方米充作生产部门的年终结存。这样，各使用加工部门就能够有计划的进行干燥，搭配品种，合理调拨使用；生产部门就能够有充裕时间进行生产整顿。我们应该珍视这种现象，特别希望林业部和中南财委及时抓紧整顿中南木材的生产组织。(2) 铜也是我国所缺乏的战略物资，但是由于统一收购、统一分配，特别是统一加工订货的结果（铜材生产华东占 80%，现已全部组织在加工中），不但足以保证需要，而且年底尚可结存新铜 4 万吨。除此而外，许多生产资料的资源与分配大多亦接近平衡。

(二)

但是，在物资分配中也暴露了下述四点产销不平衡现象。这些现象只要我们正视它，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是能够克服的。

(1) 生铁的生产速度慢于炼钢及机器的生产速度，因而生铁不够，供应发生困难。1952 年生铁的产量比 1951 年增加了 37%，而钢的预计产量却增加了 56%。机器生产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仅东北下半年增产机器及其他各种制造品即需增加生铁 5 万吨。因为铁和钢及机器的发展速度不平衡，全年计约缺少生铁 14 万吨。我们认为只有开展全国性的搜集废铁废钢 20 万吨运动，降低炼钢用铁定额到 80% 以下，才能获得解决。因此，规定东北负责搜集 11 万吨、华北 2 万吨、中南 3 万吨、华东 4 万吨，搜集办法由各大地区财委自订，但主要应在国营企业里搜集。橡胶与生铁情况类似，亦应大力组织回收利用。现在，东北已能利用再生胶，结果已把胶鞋用生胶量从 38% 降为 25%。其他地区，首先是上海亦应急起直追，在利用废胶的基础上，来扩大橡胶制品的产量。如此，既增加了国家财富又可解决上海的橡

胶工人的失业问题。

(2) 基本建设的发展速度应源于建筑材料的生产速度，但基本建设工作量大多未依计划进度完成。例如：水泥产量比原控制数字增加了 31 万吨，但重工业部上半年只完成了全年的 13.14%，东北工业部只完成了全年的 16.3%，许多建设单位尚未开工，材料尚未准备，因而造成建筑材料，首先是水泥（年终可结存 80 万吨）的积压，并增大了失业工人的数目。这就应该督促各个基本建设单位迅速施工，保证质量，积极准备与推行冬季施工，以便按期完成，免使所有工程用料都挤在明年。目前，某些地方对基本建设存在着消极怕事思想，必须及时纠正。关于水泥的生产，应适当的改变品种，暂时少生产混合水泥，以利储存。销售方面必须简化手续，便利推销，凡市场需要，只需由贸易部作出推销计划经批准后即可销售。

(3) 某些物资供产销发展不平衡，有些积压。今年全国煤炭产量较去年增加了 42%，华北比去年增加了 74%，但是全国需要量只增加了 23%。某些单位单纯追求产量，忽视了质量，例如：井陘的煤去年灰份为 19%，今年则为 24%，上海煤业建筑公司存煤中有 9000 吨黑石。因此，除责成贸易部和合作社向民间增加推销 300 万吨，各工矿交通增加储存 200 万吨外，燃料部门应将增产节约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除完成国家已订数字外，不再增产。

(4) 产品规格不合乎需要的产品，就要设法改变品种。例如：中南华中钢铁公司生产的 6 寸钢锭太大，上半年就积压了 1.4 万吨，改变生产 4 寸钢锭，华东即可使用。今年机器的生产与分配有了相当进步，全国生产 1.6 万台机器，经过以前和这次会议分配了 1.2 万台。但是，因为品种规格不合需要，一方面存在积压，如多 6 尺车床 645 台，皮带式车床 140 台，台钻 700 台，牛头刨 440 台；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不能满足需要，如少 14

至 24 尺车床 79 台，铣床 61 台，刨床 71 台，摇臂钻床 52 台，磨床 24 台。因此，应该采取适当步骤改变品种，以适应需要。

(三)

造成上述不协调的原因，经分析有以下几点：

第一，主要是由于我们的计划工作还存在着某些缺陷。首先是过去对物资平衡计划不重视，物资平衡表未被广泛采用，而已有的平衡表在资源方面，未将一切国内生产，国外进口及各单位年初结存包括在一起；在分配方面，没有将生产、维修、基本建设、军用、市场、出口、国家储备，当年准备及计划结存包括在内，因而在计划执行中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现象。其次是计划不及时，不确定。1952 年的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到现在还没全面定下来，供应计划直到这次开会才确定。故生产计划同时有几个不同的数字，中央一个数字，各部一个数字，大区一个数字，企业又是一个数字。有些单位做生产计划和供应计划不肯精打满算，常常存在着本位主义和局部观念，留一手甚至于留几手。所以计划不确实，带了很大盲目性。为了做好物资分配工作，保证生产供应，必须首先克服计划工作上这些弱点。

第二，组织机构不健全。中央和各大区物资分配的计划机构都不健全，中央各生产部门的推销总局和供应总局亦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提议：（1）建立与健全物资分配计划机构，除中央已决定设立物资分配局并需增加干部外，在各大区财委、计委下亦应设立物资分配局或处，人数为 20 到 50 人，内蒙只要 8 人。在物资分配计划机关里的工作干部，须政治可靠，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并适当配备必要的技术干部。（2）在中央各工业部、林业部内设立推销总局，今后所有国内生产及国外进口的统一分配物资，统由该局组织订货及组织推销。各需用部门设供应局、处或

科，执行供应工作。目前各部应以经理司为基础，充实推销供应内容，迅速、积极地准备建立机构的条件。凡做好了准备工作、条件成熟者，可分别呈报中财委审核批准之。

第三，各种储备制度应建立起来。过去物资多一点即成积压，少一点又很困难。其基本原因是物资没有储备，没有蓄水池。今后除企业自身储备外，国家应建立日常储备及国家储备制度。日常储备是准备当年的临时需要，其性质类似财政预算上的总预备费，此种储备应由生产部门负责保管，资金不足周转时，可向银行短期信贷解决。国家储备须根据批准之计划进行，其目的是防止发生重大灾荒、战争和封锁，或计划上的重大脱节现象（详见所附《1952年国家储备计划》）。此项计划经中财委或政务院批准后，由财政部拨款交物资储备局执行。

为了今年的国家储备及为今后储备打下初步基础，拟修建水泥散灰罐23万吨，口岸接运库10万吨，内地储备库5万吨，并修复东北锦州油库。过去财政部所辖物资管理局拟改为物资储备局，暂归中财委物资分配局管辖，负责国家储备工作。为使物资管理局能真正转变为国家储备机关，我们拟于最近再召集一次物资管理局会议。

第四，进口计划与国内生产计划不结合。例如：今年全国生产汽油10万吨，加上进口，减去耗用，结果积压了9万吨。这就是说，军事需要，市场供应，国外进口，国内生产等计划没统一起来，所以进口计划带了很大盲目性。1953年的进口工作已由物资分配局组织各部力量，分组审核，拟尽力纠正这个缺陷。

第五，关于物资分配计划工作中的若干配合条件，也很重要。例如：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必须统一编订。现在同一货物有国外价及国内价，而国外价又分为苏联价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价及资本主义价，国内价又分为东北价，华北价，上海价，而同一上海价又分为贸易部供应价和直接订货价。没有统一价格，不但是

经济计划上的重大困难，而且分配计划亦很难贯彻。因价格上的争执，常使合同不能签订。我们已在着手制订钢铁统一价，取得了一些经验，现又着手研究几种主要产品价格，以供制订明年计划及调配物资之用。

其他如标准规格及工业度量衡、定金制度、送货制度等等，与物资分配关系亦甚大。例如：木材检尺计量办法有汉码，江码，大钱码，小钱码，两码，七钱码等等，不下数十种。已责成林业部根据苏联经验把检尺计量办法统一订下来。各种主要原料设备的标准亦需由各工业部门先择其主要者加以规定，送中财委批准。定金制度，我们已拟了一草案，准备在国营企业间取消定金。送货制度，责成东北首先试行。

这次会议将今年物资分配计划订立了，并规定出克服供销不平衡的措施；在思想上、物资上、制度上为以后经济建设的物资供应工作作了若干准备。但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到来，物资供应是建设的基本保证之一，任务极为复杂紧要，故请中央多予指示，并望各大区省市党委党组多多提供意见，督促各种措施之执行。

关于物资分配工作中的几个问题^①

(1953年4月4日)

(一) 一年来物资分配工作的总结

1951年12月，中财委财经会议决定1952年国家统一分配17类物资（按1953年产品目录分列应为28类）。1952年7月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物资分配会议，针对当时物资积压和不足的现象，分析了产生矛盾的原因，拟定了解决方案，并决定应建立的若干制度，曾经中财委转报主席，并蒙中央批令执行。执行结果，当时物资上四大矛盾中的三个，已基本上获得解决。

一年来的物资分配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体验：

(1) 由于对社会主义性质经济内部的主要生产资料实行了统一分配，而不采用在市场上盲目购销的办法，再加今年制定了国营经济内部用的调拨价格，使我国各种建设上所需的主要物资走向了有计划的供应，从而保证了有计划的生产，并使全国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结合得更加密切，从而加强了对其他经济的领导作用。

(2) 国家直接分配的物资，只能限于国营及地方国营企业的产品，国家进口的商品，及根据国家的需要经过工业部门推销总局或委托合作社向农民或私营企业收购、订货和组织加工的物资，非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相互之间，及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之

^①这是朱理治写给陈云、薄一波、曾山转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收入本书时有节略，标题为编者所加。

间，只能采用商品交换的方法，而不能采用直接分配的办法。

(3) 国家必须利用物资分配的利器，来加强对其他经济的领导。就是说，国家根据全社会的平衡计划和物资分配计划，有计划地经过商业部和各部推销总局向私人资本主义加工、订货、收购，并分配一定数量的物资给商业部和合作社，以供应农民及市场的需要。

去年物资分配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在分配之前，没有从思想上、组织上、方法上做充分准备，故工作上陷于忙乱被动，确定分配目录亦欠审慎，例如麻袋、新闻纸是可以不必分配的，对于为什么要分配，分配的范围是什么，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有些人认为连私人的产品亦要分配，如中南曾发生老百姓要买一根桅杆都要到当地财委申请登记的事情。1952年7月，第一次全国物资分配会议把这些问题作了初步规定，但仍不明确。直到10月学习了斯大林同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才把界限划分清楚，并发出指示予以说明，把许多混乱思想给予了澄清。

(二) 1953年物资供应上的主要矛盾及采取的措施

1953年第一季度所需物资，已于去年12月预拨了。第二季度所需物资，亦于此次会议上分配了。全年平衡分配计划，从去年9月编制起，不断修正，在此次会议上又根据各部计划分别进行了讨论，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措施，已报中财委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兹将其中主要的问题报告如下：

(1) 金属原材料生产的增长速度慢于机器生产与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

(2) 生产与需要在品种规格上、季度平衡上、地区平衡上存

¹ 此次会议，指于1953年3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物资分配会议。

在着矛盾。这个矛盾主要依靠将生产与需要相互间更好的组织与配合来解决。

(3) 生产力与购买力及国内生产与国外进口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烧碱、纯碱、新闻纸、化学木浆等产品上。根据核算，多余烧碱 5.3 万吨，纯碱 5.6 万吨，化学木浆 3.2 万吨（包括库存为 5.2 万吨）。麻袋由于生产过多，今年国营企业（包括地方国营企业）将剩除 2800 万条，现中央已决定减低售价，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调整了生产计划数字，但仍有多余，须商业部、合作社增加推销计划或由生产部门积存，具体处理办法各部尚在继续研究，并待决定。

(三) 关于物资分配各种制度的建立

为了使生产和需要免除脱节现象，去年 7 月物资分配会议后虽初步建立了若干制度，但还不健全。如国家分配的物资，供应上虽已较有计划，但非分配的物资仍有盲目生产盲目供应的现象，故经此次会议研究将平衡与分配的物资分为三类。

为了执行分配计划，保证供应工作，去年第一次全国物资分配会议决定中央各生产部建立推销总局，中央各需用部建立供应总局，现已先后建立起来。故此次会议分配了第二季度物资之后，各生产部的推销总局即与各需用部的供应总局订立了总体合同，然后再经他们组织直接用户向直接生产工厂订立具体合同。这样，国家的分配计划就有了负责机关来执行。而各部的产品，也有机关负责推销，原材料有专门机构负责供应。目前问题是有些部门对物资供应工作尚不够重视，许多供应总局及推销总局尚不健全，影响到材料供应的正确组织。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推销总局和供应总局如何工作，对职权范围亦作了规定，拟修正后送中央批准。

为了加强物资分配工作，去年5月，中财委决定成立物资分配局，进行五金、建筑材料、燃料、机器、轻化工等产品的分配与平衡工作，以及审核进口计划、国家储备计划、军事供应计划等，并担负对各部的推销供应总局的指导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后，物资分配工作尚在中财委，物资分配与其他计划是息息相关的，任何一个数字的变动都互相影响，而物资分配中的问题又需要随时迅速解决，否则定能发生产销脱节，影响国家生产与建设。因此，物资分配计划与全面计划如何保持经常的密切的结合尚须进一步考虑。

交通部门要加强财务管理， 推行经济核算制

(1954年6月)

今年4月，交通部召开了全国交通会议，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即推行计划管理，加强财务管理和成本管理，积极准备推行经济核算制。因此，这次财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具体实行经济核算制及降低成本的问题，并提出今后财务工作的任务，这是很必要和适时的。会议听取了中央交通部财务司《关于财务工作基本情况 and 今后任务的报告》，并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讨了过去财务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一些建议，充实了这一报告的内容。会议讨论了财务工作的职权和任务，讨论了月度财务作业计划的建立，讨论了如何保证完成今年的财务任务；并着重地讨论了中长铁路推行经济核算制的经验和苏联专家莫依谢耶夫同志对大会作的关于推行经济核算制的报告。会议使我们对于什么是经济核算及其实行的步骤和方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亦明确了我们今后财务工作的方针。应该说，这次会议是成功的。会后，我们将根据大会所提出意见，修改和补充财务司提交会议的报告和《交通部所属国营企业财务会计工作暂行规定》以及与实行经济核算制有关的规章制度，编制月度财务作业计划、财务收支计划等，由中央交通部修订后颁发，以便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由于准备得还不够充分，文件较多，对若干财务会计工作上的技术问题未能全部讨论，只能在会后由财务司召集座谈会予以解决。

1. 此文是朱理治在1954年6月交通部召开的财务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一、降低成本、增加积累，保证今年上缴财务任务的完成

交通部门大力降低成本在目前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快要进入第三年了，这是五年计划能否完成的最关紧要的一年。因此，国家建设的投资必须加以保证。但今年长江流域有水灾，国家税收要相对减少。这部分减少的收入，要有个来源来弥补。这个来源主要靠增加国营企业积累，而要增加积累，首先必须降低成本。

降低成本对改进我们的企业管理亦有很大的意义。成本是企业经营成果的综合表现，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面镜子。要使成本降低，就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工作。那一方面的工作落后了，都会反映到成本上来，使成本提高。抓住降低成本的指标并加以分析，就能帮助我们大力地改进工作。

降低水运成本，是降低运价的基础。现在水运成本高，故运价亦高。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水路运价虽较铁路为高，但第二个五年计划比铁路则低了25%。目前苏联水运成本（包括装卸费等全部费用在内）与铁路成本比较：拖驳较铁路低2.5倍，自航货船低1倍，木排低8至10倍。而目前我们的运价除上海至大连、上海至秦皇岛等航线稍低于铁路外，全国平均还是比铁路高，特别是装卸费更高。这样就增加了商品流转费用，使我们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部在批准今年水运生产财务计划之后，又在7月份降低了运价，因此将少收××××亿元。中财委要求我们：“原定之1954年上缴任务，应努力完成，不要因调整航运运费而减少，同时也不要影响航运部门固定资产的维修和养护”。要实现这个光荣任务，就必须比今年原定利润再多增加27%。但今年的长江又闹水灾，影响正常运输，收入减少，因此，必须在第四季度

内努力设法弥补，以保证今年运输计划和上缴任务的完成。

降低公路及水运基本建设成本，同样有极大意义。基本建设成本如能降低 10%，交通部门就可为国家节省×××的资金，或可以使我们交通建设的规模扩大 10%以上。

为了保证明年上缴控制数字的完成，为了创造继续降低运价的条件，两月以来，本部和海、河运总局经过计算，初步决定将明年运输成本再降低 16.5%，其中海运降低 16.75%，河运降低 16.34%，特别要大力降低装卸费用；并建议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国家价格政策和运输成本，相应地降低运费。这样，就可以保证水运运价低于铁路，从而可以减轻铁路的负担，更多地发挥水运的作用。

公路建筑成本初步决定明年降低 10%。

必须着重指出，完成以上光荣任务是很艰巨的，因为我们现有成本管理工作远远落后于客观需要。水运量最大的长江航运局，就没有完成 1954 年上半年降低成本的任务，高出计划 1.49%。东北内河局完成得最差，高出计划 25.75%。海运系统的航运成本特别是港湾成本仍然很高，没有充分发挥潜在力量，以致某些航线上的运价加上港湾装卸费还是比铁路高。基本建设方面的成本管理工作大多数单位尚未引起重视。

为了保证降低成本，完成积累任务（明年上缴的利润和折旧约比今年增加 34%），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必须充分发挥船舶效率，多运物资，这是今年和明年保证完成降低成本增加积累任务的首要工作。因为多运了东西，成本就跟着低了，而积累就会增加了。而要做好这个工作，就必须加强企业的商务工作，掌握物资流向，很好地组织货源；加强并改进调度工作，减少船舶非生产停泊时间，减少中转次数，提高吨天生产量及工班效率。

（二）必须注意技术改造，注意码头上各种小型机械的设备

和运用，以减少装卸成本。注意各种先进方法的推广，如：近海拖驳、海上拖排、内河顶推法、港湾快速装卸法等。注意造船、港湾建设及公路修建等基本建设工作，因为基本建设的设计和施工的好坏及其是否及时完工，对于将来运输效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都有很大的关系。

(三) 必须根据成本的分析，逐项精打细算，加以审核，尽量减少支出特别是去掉其最不合理的部分。今后每月必须检查财务计划，按季进行成本分析工作。

(1) 现在成本中的工资，占运输成本 19%，占装卸成本 75%。如能根据人员定额加以精简（据初步核算，水运可精简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人），则成本就会降低。望各单位学习秦皇岛港精简编制人员的经验，坚决采取分、转、训的方针加以处理，并积极进行港口的工资改革和调整，以消除目前工资不合理的现象。今后增加人员必须经部批准，人员编制定额，应由劳动工资部门统一掌握起来。

(2) 材料费影响成本很大，运输上约占 30%，基建上占 60%，工厂占 40% 左右。如能降低材料消耗定额，实行定期领料、退料制度，积极处理呆滞材料，有计划地申请调拨，就可以降低成本。

(3) 修理费用，在成本中亦占很大比重。现在我国水运成本修理费用约占 17%，因为修理成本和单价高了，影响到运输成本增加。迄今存在的修理单价高，特别是修理质量不好的现象，必须加以纠正。

(4) 港口维持费用和代理费用也影响了成本，例如 1954 年长江各港的这些费用就占了成本的 16%，如加以降低，可大大的降低运输成本。

(5) 管理费必须严格控制，大力节约。现在管理费用，尤其是公路基本建设方面的管理费用很大，必须依据定额，严格控

制。

(四) 必须发动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中央交通部和海员工会已发出指示，请各地切实组织。只有发挥群众积极性，才能完成生产财务计划和降低成本，才能保证完成今年的任务。

二、推行、巩固和深入经济核算制

经济核算制是国家管理国营企业的基本方法之一。

经济核算制和计划管理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

计划管理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原则，规定每个部门和企业的计划任务。“计划就是法律”，这是每个企业均必须严格执行的。

经济核算制，则是国家在企业 and 部门严格执行计划和法令之下，给予企业独立经营的权力，使他们主动的积极的更好的来完成国家的计划，保证用最少的资金消耗来完成生产任务，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积累的目的。所以说，经济核算制是有计划的管理企业的基本方法。

只有计划管理没有经济核算，企业便不能主动的、积极的、精打细算的来完成国家规定的计划；而只有经济核算，没有计划管理，则会造成盲目生产，追求超额利润，堕落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可以说，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管理国营企业的基本方法，把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

给予企业一些什么权力，才能使它能在国家计划管理之下，主动的积极的独立经营呢？主要的是以下几点：一、根据生产财务计划给予企业以必要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二、允许它以法人的资格和别的企业订立合同；三、允许它在银行建立户头和建

立信贷关系；四、企业经营如有盈余时，可以得到厂长基金，用以增进职工福利。

这样，每个实行经济核算的企业便能有自己的独立的资产负债表，便能独立计算盈亏；它的工作好坏，便能用货币表现出来；它的工作好坏，就能从盈亏中表现出来。这种盈亏，对于每个职工都发生了直接的物质利害关系。这样，就能促使广大职工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完成及超额完成生产财务计划。

由于实行了经济核算，企业领导者便要盈亏负责任。因此，国家便可以通过货币，通过财务成本计划，通过流动资金管理，通过银行信贷来管理企业，促使企业用最少的资金消耗来完成生产任务，促使企业发掘潜在力量，降低成本，增加积累。

中央交通部关于实行经济核算制的要求，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今年4月间召开的全国交通会议就已经作了决定。事实上交通运输企业中已有不少单位初步推行了经济核算制，并且在若干单位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海运系统的经济核算基本上已推行到基层单位，推行到主要的港口以及上海、广州两个海运局。东北公路工程总队等也已推行了经济核算制。这些单位已有了上级批准的生产财务和成本计划；有了自己的流动资金；有了自己的独立资产负债表并能独立计算盈亏；能够通过货币尺度，初步的反映经营状况的好坏；港口之间相互订立了联系合同，同时已实行企业奖励基金制度。这些，都已起了许多良好作用。这在他们完成和超额完成降低成本的计划中即可反映出来。

但是，由于我们各级企业对于经济核算制的目的、方法和步骤缺少认识，以致这些企业在形式上虽已实行了经济核算制，但内容上还保留了不少供给制和资本主义经营的因素。主要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财务成本计划不够重视，普遍的存在保守现象。因此，减低了经济核算制的作用。

几年来，各企业主管人一般的只重视生产计划，忽视财务成本计划，财务成本计划订立的保守，因而造成一种错误认识，认为只要完成生产任务，便保险能完成与超额完成财务计划，企业首长对财务成本并不要经过什么紧张的工作，便保险获得厂长基金。这样，就更造成了“只重生产不问成本”的供给制思想的发展，失掉了经济核算的作用。

(二) 资金掌握不严，核资太松，失去了资金管理生产的作用。

流动资金核定过松，这样就不能促使企业主管精打细算节约国家资金，就使经济核算的作用丧失掉。因为，反正资金有富裕，经营亏损，材料积压，他仍然能够周转裕如。如上海修造船厂 1953 年度，角铁库存原已有了储备，但又继续购进，致使储备量超过全年耗用量的六倍，但它的资金周转并未发生什么困难。其次，固定资产清理，也缺乏为经济核算创造条件的思想。因此，1952 年清理后，仍然处于混乱状态，心中无数。如海运总局 1953 年财产清查时共查出账外固定资产 700 多亿，其中大连港务局查出有煤栈桥等 526 亿元账上漏列。

(三) 定额保守，机构臃肿。

定额是进行经济核算，制订计划和推行计件工资的前提，没有定额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计划与经济核算。目前各企业的定额一般较为保守，如大连港 1954 年上半年装卸计件工资定额，普遍超过 30-40%。其次，机构臃肿的现象还是存在，如大连港 1954 年间接生产人员 $\times \times \times$ 人，占直接生产人员 $\times \times \times \times$ 人的 55% 以上，造成管理费占直接成本的 27%。在基本建设单位，机构臃肿现象更为严重，间接费内行政管理费普遍超支，最高超过原定额二倍多。

(四) 工资制、奖励制不合理。

奖励制度尚不全面，而且有的不合理，旧企业遗留下来不合

理的奖励制度（如考勤考绩奖金）尚未彻底取消，现行的制度也不统一，又缺乏对刺激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作用。如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奖励，节约燃物料的奖励等制度，尚需制订与修订。

工资制度方面，一般工资偏高；累进计件工资制度在青岛、天津、广州内港等尚未实行；工资标准不合理，如大连港装卸工人工资高于装卸司机工资；公路基本建设单位工资等级和标准尚很混乱。

（五）统计与决算报告质量不高而且不及时。

统计是为了反映企业的生产活动情况，但目前统计工作基础很差。统计报表报送不及时，缺乏分析，不能从统计数字中看出问题，据以改进工作。决算报送时间更长，有的竟拖延一个季度至半年以上。如天津港第一季度决算到7月15日才报送，西南公路工程一、二局8月底才送到，使决算失去时效，而且质量不高，缺乏分析。

至于没有实行基层单位经济核算的如长江局的各港、康藏公路等，情况自然比这些严重的多，浪费也就要特别重，例如长江航运系统今年地面人员就盲目增加了402人；康藏路工人工资有多至100万元¹以上的；华东烟潍路间接费超计划二倍半，新港工程队间接费用占到44%等等。这些地方由于供给制思想所造成的浪费，其数字之大更为惊人。

所以，在我部推行、巩固、深入经济核算制，是非常迫切的。不如此，便不能保证今明年财务计划的完成，不能保证降低成本和消灭浪费。

但是，实行经济核算制，必须有步骤有准备。没有步骤，企图在同一时间把所有企业及其各个单位经济核算制全面实行起

¹ 这里的100万元指的是旧币制，按1955年新币制换算，应为100元。

来，结果只会把工作搞坏。

所谓步骤大致是这样的：

(一) 由上而下，即先上级局实行经济核算后才能实行到基层单位（港务局、船舶管理处、修船厂）。

(二) 由外而内，即先由各基层企业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并加以巩固之后，再深入到各作业区、各车间、各船舶，实行内部的（或叫作部分的）经济核算制。

(三) 凡原来实行供给制（或叫作报销制）单位，在改变为经济核算制之前，先要经过实行独立会计制的阶段，然后再实行经济核算制。独立会计制是经济核算制的前身，是为实行经济核算打基础。如不经过这个过程，直接从报销制转为经济核算制是行不通的。

报销制、独立会计制及经济核算制三者的区别何在呢？

报销制（即供给制）的特点是报销单位的支出均由上级供给。

独立会计制的条件是：1. 有最终的资产负债表；2. 有生产财务计划；3. 有自有流动资金；4. 向银行建立往来户；5. 按计划拨付经费。

经济核算制与独立会计制的区别是：1. 经济核算单位要编成本计算表，独立会计单位不编成本计算表；2. 经济核算单位根据完成工作量的收入来支出，而独立会计单位则按支出计划拨款；3. 经济核算单位有首长基金，独立会计单位没有首长基金。

交通部门各企业单位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必须根据今年全国交通会议计划区分企业类型的办法，按照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的企业分别布置。具体的说：

海运系统，要求首先巩固现有的基层经济核算，然后有准备地逐步深入。为此，各港务局、海运局应积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计划质量和决算分析，逐步制订各种先进的技术经济定额和消

耗定额，在不能普遍制订前，亦应细致地搜集和研究历年的统计资料，适当地把它肯定下来，作为目前执行的根据，逐步地消除经验定额和估计定额，以巩固企业经济核算的质量。同时，选择基础较好的装卸区和船舶，进行内部经济核算的试验工作，取得经验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加以逐步推广。

内河系统，长江区管理局要抓紧汉口港的试点工作，先巩固独立会计，而后实行经济核算；在今冬改变各大港为独立会计单位，结合港湾固定工人工资改革，编制计划等等，逐步实行经济核算；东北内河局同样应加强和提高本身的经济核算，主要整顿各港，建立必要的财务会计制度，积极创造经济核算的条件；珠江航运局应建立规章制度，做好资金核定和财产清查工作，编好计划。

公路系统，凡已基本走上了经济核算道路的单位，应该加以巩固，逐步提高和深入。例如：东北工程总队、西南第三施工局、成阿公路指挥部即应加强查定，订好计划，尤其要有财务成本计划并核算流动资金，以加强本身的经济核算，逐步深入到基层施工单位。此外，如华南公路指挥部、西北工程局、福建指挥部、西南第二第一施工局、云南指挥部等单位，除军事紧急抢修工程要着重加强财务管理，建立财务制度，提高预决算准确性，防止资金积压，认真调整机构，坚决克服浪费现象外，均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推行经济核算制。

航务工程系统，筑港、疏浚、打捞等单位，应在现有基础上，积极改善经营，凡已经初步推行经济核算的单位，应力求提高，主要是提高计划特别是财务成本计划的质量，反对保守的和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修正主要定额，在巩固的基础上逐步的审慎的深入。打捞公司主要是提高本身核算工作，各地打捞队（流动不固定）暂不实行。

各系统所属工厂，以加强本身核算为主，为此，必须树立为

生产服务的观点，改善经营管理，坚决贯彻修船条例，确立修理标准，加强合同和开帐制度，减少浪费，纠正抬高修船单价，确定平均先进定额和计量单位。然后可以以个别车间为试点，进行内部经济核算制。

各级设计部门，国家已明确规定为事业机构，不实行经济核算，主要是加强设计的质量和及时性，在财务上加强预算管理，并应将勘察设计的完成与开支费用进行统计分析，逐步得出费用定额的经验，以便提高财务管理工作。

公私合作企业，应根据国营企业的经验，推行经济核算，或为此创造条件。

实行经济核算必须要有准备。没有充分的认真的准备工作，也不可能实行经济核算制。

这些准备工作大体如下：

(一) 清理资金核定资金。固定资产必须在今年底以前清点和估价清楚，并予以核定。已清估过的要进一步修订确实，以便拨交各经济核算单位使用保管和进行折旧。同时，必须根据流动资金需要定额加以核算和确定，使这些资金下放到实行经济核算的单位或实行独立会计的各个单位，使他们既能独立经营，又感到不是很宽裕。这样来促进各企业领导人兢兢业业的改善经营管理工作，为国家节约资金。

(二) 编制好生产财务计划。鉴于过去编制计划时大多只注意生产数量，不大重视财务成本计划；而财务计划又多偏重保守，不必经过什么努力，总可保证完成，这样就不能推动企业管理人去精打细算，发挥潜在力量。为了纠正这个缺点，今年编制生产财务计划，应由首长亲自领导，特别要重视财务成本计划的审编，并负责向上级报告。同时，立即建立月度财务作业计划的编制和审核制度。

(三) 进行查定工作。这是编制计划的依据，各单位必须立

即进行人员定额、主要材料消耗定额及主要技术经济定额的查定工作，将现有的经验统计定额加以审核与提高，逐步订出平均先进定额。

(四) 制定条例。条例规定实行经济核算单位的权利义务；规定各项主要指标，规定清算办法，订立港、航、厂各方面相互合同，规定奖励制度。

(五) 健全统计工作。统计数字是反映生产、技术情况的工具，不但一切工作的改善提高都需要，而且对经济核算制是必不可少的依据。但这项工作是各级最薄弱的环节，应及早充实人员，健全原始纪录等制度，并建立成本统计。

(六) 与劳动竞赛相结合。要依靠工会开好职工代表会议，运用各种方式，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必须使干部和职工群众明确认识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意义和做法，通过以技术革新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找出平均先进定额，树立经济核算制和节约制度的思想。

(七) 积极培养干部，并做好干部管理工作。大力组织干部学习，适当抽调在职干部，组织短期的小型的经济核算训练班。对于现有财务会计干部，必须使其专业化，不随便转业和轻易调动。今后各级财务会计主管人员的调动，必须征求高一级财务会计部门的同意。

从上述这些准备工作来看，要实行经济核算，单靠财务部门单干是不行的，必须首长亲自领导，由计划、财务、劳动、统计、商务、材料供应等单位共同进行才能做好。但财务部门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推动这个工作。这就说明了今年各级财务机构的任务，将会更加重要，而其工作方法，也必须大大改变。

三、加强财务管理和财务监督

过去五年来，交通系统的财务工作，由于全体财务工作人员积极努力以及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取得了一定成绩。首先是通过调整组织、清产核资和生产改革等工作，基本上改变了旧企业和旧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初步摸清了家底，逐渐走向了正轨，为实行经济核算制做了若干准备工作。其次是保证了资金供应和完成了上缴任务。在会计计算、帐务改革等方面，已逐步改变了旧观点、旧制度，并局部建立了新制度和推行了新方法。

但不可否认，财务系统的工作尚存在下列缺点：

(一) 在供给制思想的支配下，对财务收支计算不实、监督不严，心中无数，宽打窄用，造成资金和材料的严重积压现象；没有注意和想办法如何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积累和节约国家资金。在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支配下，表现了在计划上的保守，不按时上缴利润，以及互相拖欠等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的倾向和做法；甚至于单纯的追求高额利润，虚开帐单，高估工料；有些单位还有违犯财政纪律，打埋伏等严重的恶劣现象。

(二) 会计工作只有决算，缺乏分析，在生产管理上未起到指导作用，因而流于形式。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财务监督等方面也松弛不严，甚至放弃了财务部门应有的职责。加之财务会计人员缺乏近代企业的管理知识，在生产业务上的知识也不够丰富，存在着事务主义和“帐房先生”的工作作风，抓不住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的中心环节。

当然，这些缺点是与企业领导人不抓财务工作和不善于抓财务工作等原因分不开的，特别是与中央交通部以及各专业总局的领导分不开的。过去我们各级领导人，普遍都犯了“只管生产，不问成本”的毛病，因而也就放松了对财务部的领导。今后如不

改变，经营管理的水平将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

关于今后财务工作的任务，胡副司长报告已提到了，总的说来，我认为有以下三条：

（一）正确地编制财务收支计划，按照计划进行控制掌握，动员内部资源，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资金供应和完成预算缴款。

（二）加强财务监督，严格财务纪律，保证国家财产和合理使用国家资金。

（三）正确地组织会计计算，及时编送决算报告，并加以分析，提出改进措施。

根据以上三项任务和今后加强财务管理的需要，必须明确财务会计部门的权限和责任。对于企业内不合法令或与会计核算及决算程序有抵触的命令或批示，财务会计部门可以提出书面意见请企业领导人重新考虑；如果企业领导人坚持己见，财务会计部门应一方面执行命令或批示，一方面将自己的意见向上级机关和本企业的监察部门提出书面报告听候裁决；对于不正确、不及时组织会计计算和决算报告，不严格遵守财务纪律，不认真进行财务监督，致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业务发生障碍或引起不良后果，财务会计主管人员应负一定的责任。

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不是说财务会计部门可以脱离本企业的领导，企业首长今后可以不管财务。恰恰相反，企业领导人要紧紧地像抓生产作业计划一样地加强财务工作的领导，按月、按季地掌握财务作业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及时研究决算分析和定期检查成本核算；同时，财务部门必须更好地、经常地分析企业收支状况，提供领导参考，并应主动地、积极地争取企业领导人对财务工作的领导。

会议着重讨论了建立月度财务作业计划问题，一致认为，掌握月度财务作业计划是平衡货币收支和保证完成年度财务指标的中心环节，各单位应立即布置执行。条件较差的单位，亦应于

1955年1月份起开始施行。

四、克服几种不正确的思想

通过这次会议，反映了我们企业经营管理上几种不正确的思想，这些思想如不加克服，会议的决议是不会落实的。

(一) 供给制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只管生产，不问成本，宽打窄用，宽打宽用，浪费材料，盲目增人，缺乏制度，开支随便，这是供给制思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尤其是实行经济核算之后，又滋长着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即高抬单价，定额保守，计划落后，以求容易超过计划，骗取超额奖励，为了达此目的，甚至假造统计，隐瞒成本。

(二) 狭隘经验主义。把在山沟里一套陈旧工作方法，用来管理近代企业。把工作抓中心，了解为“单打一”，认为既以计划管理为中心，就不能同时搞安全生产，就不能同时搞经济核算。习惯于供给制的财务管理，不好好学习经济核算制的管理，甚至于管了几年企业，连经济核算制的初步知识也不知道。有些人虽学了一点皮毛，却不研究实行经济核算的步骤和方法，贸然实行；发生了弊端，又不好好吸取教训，把经济核算制看作是非常神秘，高不可攀，因此裹足不前，不敢尝试。

(三) 自满思想和急躁情绪。总感到自己工作不错，经营管理水平非常落后，却不肯承认，只说成绩，不报缺点，别人说了就不满意。这和中央四中全会^①精神是违背的。另一方面又有急躁情绪，企图好事一天做完，说要实行经济核算，便要在明天把所有企业及其单位经济核算制都建立起来。

(四) 官僚主义作风。规章制度订的不少，而且也订的不

^①四中全会，即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坏，但好多却没有执行；会议不少，决议很多，但贯彻很差，重要的是没有检查。这次会议，既决定了实行经济核算的方法步骤，建立月度财务作业计划，就要象实行月度运输计划一样，每月要检查，否则亦必然流为空谈。

很明显的，只有克服上述四个思想作风上的毛病，才能把经济核算制建立起来，才能转变经营管理的落后状态，才能降低成本，才能完成国家所给予交通运输部门的任务。

为消灭海损事故，提高运输 质量而奋斗^①

(1956年1月28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满怀信心的响应毛主席关于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号召，决心全面地提早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并为航运长远建设计划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所谓全面完成五年计划是什么意思呢？这即是不只在数量上提前完成与超额完成，而且在质量方面也要保证完成。完成运输质量和完成运输数量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运输数量，我们必须在工作中加紧努力，而要保证完成运输质量就必须更加努力。因为，过去我们运输质量差，工作基础薄弱，因此，必须更注重这方面工作，才能改变这种情况。过去，各方面对我们批评的“运价高、手续繁、周转慢、事故多”的缺点，即是运输质量低的具体表现。其中，最突出的缺点是事故多及货损大，无论在中央直属的或地方管理的企业中，这几年均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成为交通运输工作中的严重障碍。

由于海损事故和货损事故已经给国家财产人民生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严重地危害着航运事业的发展，辜负了国家人民给我们的委托，所以现在必须提出这一问题，要求航运全体工作人员立即着手全力消灭海损事故及货损货差，努力作到今后不再沉船、死人，保证货物完整到达目的地，并把它作为1956年的主要任务之一。

关于消灭货损货差的问题，交通部作了一个专题总结，提出

^①这是朱理治在全国航运会议上的报告。

了一些措施，已作为大会文件的附件发出，各单位可参照执行，我就不再重复了。现在我只就海损事故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大家参考。

几年来，海损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十分惊人的。从1953年到1955年全国海河根据不完整的统计，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的轮驳船、木帆船共发生海事20563件，平均每天发生海事20件，共损失2170万元，平均每天损失2万元。特别严重的是全国内河，三年来发生海事19853件，死2434人（其中长江、黑龙江、珠江国营、公私合营、私营船舶共死274人），造成了极其不好的政治影响。经过分析，海事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对水上运输的特点认识不足。水上航行经常会遇到风暴、浪潮、大雾、流水、泡水、急流、浅滩、暗礁等，威胁着航行安全，稍一疏忽，出了事故就能使全船沉没，几百人甚至千余人生命死亡，这是航运企业和一般企业不同的特点。因此，保证安全，对水上运输有其特殊的意义。过去经验证明，安全是保证完成运输任务的先决条件，也是最大的节约。但我们过去对此特点认识不足，只片面地重视了生产任务，忽视了保证安全，对违反航行安全制度的现象不加纠正。如“民主”三号轮事故发生以前，已发现船员违反雾中航行注意事项，不但未加纠正反而表扬，这样，就促成了事故的发生。又如长江709驳不适宜川江航行，民铎轮船长不同意拖带，而重庆调度段进行说服动员，使其拖带航行，为该轮船遇泡水操纵失灵触岩沉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政治工作薄弱，队伍不纯。如民众客货轮被敌人纵火，“人民”6号轮大副、反革命分子××故意触礁，珠江桂河轮被反革命分子××驶向礁石触沉。船员政治责任心不强，劳动纪律松弛，也造成了很多海损事故。如镗源轮发生事故后，正副驾驶非但不组织抢救，反而上岸喝酒，致使旅客死亡人数达28

人。又如西河号挖泥船由于拖船没凌号船长×××擅将漏水的西河号抛弃在海上风浪中，以后又施救不力，造成西河号沉没。船上政工干部配备不足，质量不高，政治工作究竟如何做，尚没有研究出一套办法。总之，安全工作还未能得到政治上的保证。

第三，忽视技术管理。1、对危险品的管理不严，制度不全。如南海 177 轮汽油爆炸沉没，江岳轮汽油桶引起爆炸死 25 人。2、对季节性安全防范工作不够，因台风、大雾而造成毁灭性事故最多。如南海 176 轮在海口与台风触礁损失严重，迄今尚未修复，“临城”、“民三”、“峨嵋”均因雾中航行措施不当触礁沉没，“人民”15 号在长江遇雾触礁沉没，死 10 人。3、机损事故严重，修船质量差。如江发轮由汉口驶到宜昌，地轴即折断；“人民”3 号刚修好出厂，由上海至汉口折断地轴两次。海上 1955 年因机损而造成的海损事故 18 件，由修船质量差而造成的海损事故 9 件。上海海运局船仪铁板裂缝 7 件事故造成的吨天损失占该局全部损失的 52%。

第四，航道航标整治不够，管理不好。如镗源轮即因沉船无标而被撞沉；珠江航道迟迟未能测量疏浚，造成很多搁浅事故。流放的木排没规定规格，严重的破坏航道航标的情况未得到解决。海上和内河航标设置不全，已设的标志有些区段密度不够，光度不强，标志失常又未能及时恢复，不能发挥应有的助航作用。对风讯雾号的管理以及单向航道的控制等也存在很多缺点。

第五，对船员技术教育差，对提高船员技术水平注意不够。各航运部门普遍缺乏船员，特别是高级船员更感不足。直到现在，船舶的技术在提高，但船员技术水平低，不熟悉规章制度，不能适应运输任务日益发展的需要。甚至有些船员还不会游泳，不会抓桅杆，并且不是个别现象。

第六，对木帆船、渡船放松管理，对广大职工、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教育。如湖南祁阳扒江乡渡船超载翻沉死 47 人，江西乐

平杨家乡渡船超载翻沉死 46 人，四川南充雍世璧木船在嘉陵江违章搭客碰桥沉没死 25 人，常阴沙木划翻沉死 32 人。沿海木帆船的翻船死人也很严重，如川沙县横沙区木船翻沉死区乡干部等 50 余人。

第七，各级领导没有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不了解航运的特点，对如何管好航运企业缺少具体的研究。各级航运机构已建立六年多了，但我们的领导同志许多还是航运业的门外汉，乱发命令，乱发表格，许多调度员不虚心地老船长学习，常常误事。此外，对已有的安全航行经验，没有做好系统的总结和推广，对有碍航行安全的各种问题也未能认真地及时解决。

同志们，是到了消灭海损的时候了，绝不能容许海事再继续发生了。过去我们遭受的损失是巨大的，教训是惨痛的，要求全体航运工作人员，在 1956 年必须全力消灭海事，作到“不沉船、不死人”。这一要求是否能够做到呢？答复是肯定的。“和平”2 号轮安全航行 14 万里，“和平”14 号轮安全航行 13 万里，1955 年上海海运局有 14 艘、广州海运局有 4 艘轮船全年安全航行，长江大众轮、“人民”一号轮航行已 10 多万公里安全无事故，珠江 302 轮二年零七个月从未发生海损和机损事故，辽宁省有条船安全航行 6 年，黑龙江北安轮安全航行 3 年。这一切都证明了水上运输事故不可避免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但是，必须指出，要保证航行安全亦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安全是各方面工作良好配合的成果，是企业管理的综合表现，任何微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惨祸。因此，必须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不使任何一处发生漏洞，必须明确安全工作人人有责，绝不是任何一个部门或少数人的责任。

为此，要做好下列工作：

一、加强政治工作，加强船员工作责任心，发挥船员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开展船舶全年安全航行运动。各航运局应制定船

船安全航行的指标，推广与交流安全航行的先进经验，加强船员政治思想与安全航行教育，保持船员内部团结，遵守劳动纪律，巩固一长制，组织全体工作人员经常不懈地与海损事故作斗争。

研究与改进船上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航运的灵魂，也是安全的可靠保证，除政治部门专门从事这一工作外，行政领导必须大力支持与协助。

颁布安全航行奖励制度，凡达到安全航行指标者就给予奖励。即使过去在海损事故中受到处分的船员，只要以后加以警惕，保证安全者，亦可获得奖励，并可相应撤销或减轻其处分。

二、加强组织领导。首先加强安全监督机构，决定在 1956 年内将各港航监督机构改为独立建制，直属海、河总局领导，调整和充实各级监督机构的干部。监督部门必须坚持原则，进行严格监督，不合规定者不准航行。任何人均须执行港航监督部门的规定，不得擅自改变。各航运局局长应当加强对港航监督工作的指导与支持，充实船队监督员和船队工程师，经常监督检查各项安全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及时指导和帮助船员解决航行上的困难问题，积极采取预防措施。

各管理局每月应讨论一次安全问题，总结海损事故，吸取经验教训。交通部亦拟每季度召集一次安全工作会议。

三、加强木帆船和渡船的管理。对于海河运输船舶、轮船、木帆船、渡口船要进行全面管理，克服无人管理分工不明的落后混乱状态。今后，必须明确上述各类船舶的管理，保证安全，统一归口。中央及各省所属港航管理机构管辖地区从事运输的轮船、驳船、木帆船、渡船由航运部门负责。渔船的安全管理由所属部门负责。公路渡口由公路局负责。在未设有港航管理机构的地区，由当地区（乡）人民委员会负责，县人民委员会交通科或交通委员会领导。此点将由交通部会同公安部、内务部在今后拟定办法公布。所有船舶的技术检查丈量、船员技术考试，统由航

运部门负责加以检查管理。

加强木帆船和渡船的管理，首先应消灭河港支流、沿海小港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在设置航运管理部门的地区，由各省（市）地方交通科负责，依靠当地群众做好木帆船和渡船的安全监督工作，并依据各地具体情况制订统一管理规章和监督检查制度。木船的管理今后应主要依靠船民合作社，合作社应设技术安全委员，建立赔偿奖惩制度。推行安全宣传月，严禁超额搭客。湖南耒阳的作法是在船上明显处写上耀目的“实载×××人”几个大字，我们认为很好。其次，对失修的木帆船和渡船应限期修复，不能修复者立即停航，对驾长、船工应普遍进行考核，凡技术不合格的及老弱残疾不宜于担任驾驶工作者，应予适当调整。经常教育他们在大风、大雾、暴风雨等不良气候中的安全航行知识，要求他们如发生事故，必须积极抢救，不得临危逃跑。凡遇节日或当地群众活动，旅客拥挤时间，应特别严加管理，事先作好准备，必要时请政府派民警或民兵维持秩序以保安全。木船夜间航行者必须点灯，以免发生碰撞；货船禁止载客，载客木船应设置救生设备，在航行时编组编队；航前开好安全生产会议，航行中选择技术最好的驾长在前导航，终航时开好总结检查会议。对此应加强领导，并尽可能组织技术交流会。四川省内河局已有些经验，各地可以学习。

四、加强航道疏浚，改善助航设备。沿海各港及内河各省水系应按照水运发展需要规定航道深度和宽度，大力疏浚和清除障碍物。不能清除的障碍，应当设置标志。今年第一季度长江应成立航道管理局及所属分支机构，积极整理长江航道，特别是川江航道，进行炸滩设标等工作。其他水系及沿海各港亦应加强或调整航道管理机构，训练水工建设和水道测量人员，先摸清航道情况，逐步加以整理。加强航标管理，对航标移位，灯光熄灭等事故应及时加以修复。船员在航行中应注意航标情况，遇有变化，

及时通知附近船只和航标管理部门。海上航标由上海、福州、广州三地港务局大力协助海道测量部完成 1956 年 19 项航标建设工程（其中上海 6 项、青岛 5 项、广州 8 项），上海海运局应即联系海道测量部供给浙江、福建沿海现有航标资料。此外，长江上游绞滩工作、水上救护工作以及港内秩序和引水工作等，目前存在着设备不足和经验不够等问题，亦必须努力克服，力求解决。

五、加强季节性安全防范措施和危险品管理工作，严格贯彻安全航行规章制度。几年来，造成重大恶性事故的原因之一是对雾中航行注意不够，飓风防范措施不当，危险品管理不善等所致。冬季、洪水期间亦造成过重大恶性事故，一般事故也很频繁。今后必须做到：

（1）各港航主管部门在不同季节，根据船舶营运情况及地区特点及时发布措施命令，并组织船员及有关航运职工学习。应贯彻《雾中航行注意事项》、《避碰章程》及有关航行规章，航运部门应建立与健全船岸间互报雾情，建立信号指挥台和雾号站。

（2）海上轮船船员应学习防台风知识，各地港航企业应加强防台风指挥工作，制定防台风注意事项，勘定防台风锚地，和检查水密设备及观测气象仪器。内河沿海小港应建立和健全气象预报收听网，及时传播大风预报，规定各种船舶禁止航行的风力等级，严禁冒险航行。轮船高级船员应充分利用现有航行仪器，沿海机动小型船舶要迅速学会使用海图以及罗经等一般仪器。

（3）加强和改善目前危险品的管理工作。对存储危险品的仓库、堆场、专用码头或停泊区的照明设备、电路安全、漏雨、潮湿、通风、漏洞等情况，每年应进行两次定期检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加强现场监督指导工作。载运时，对船舶的消防、防毒、防腐等设备要进行检查，航运企业应在本年内制定易爆炸、易燃烧、毒害性大的三类危险品技术安全操作规程和装卸、储运运装等注意事项以及各个工序的责任制，必须充实危险品管

理人员并加强领导，对船员、管理人员、装卸工人进行教育。

六、提高船员技术水平，切实贯彻船舶技术操作规程与航行规则。各航运局对现有船舶技术操作规程与航行规则应进行审查、修正或补充，编制安全航行的通俗教材，组织全体人员进行学习，定期举行测验，及格者发给证书。建立指导船长、指导轮机长制度，合理安排船员作息时间，减少不必要的会议报表，适当改善劳动强度，为船员学习业务、钻研技术提供有利条件。

七、加强技术管理。各航运局应组织船员加强船舶的预防检查保养自修工作，对每艘船舶每年进行二次监督检查，船厂则应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修船质量。

迅速成立和健全船舶登记局及其分支机构，首先颁布一些主要规范，为船舶载重线、吊杆负荷量、载客定量等与安全有重大关系的技术定额，监督执行。

海上轮船还应逐步添置雷达、回声测深仪、无线电测向仪等新式航行仪器，内河也应增加测深仪、风速仪、无线电话、电话、救生艇等等，并教育船员学会运用航行仪器。

认真执行救生消防演习制度，规定客船每月一至二次，货船每月一次，拖驳船每二月一次，各项演习所需时间可以订入航次计划。

此外，还应建立水上救护网，配备专用船舶，以便及时救援海难，减少损失。

八、加强木排运输的管理。根据河流具体情况，规定扎排规格。在通航轮船的航道，木排应由轮船拖带，并适当的减低轮船拖带费用，争取木排货主乐于雇用轮船拖带行驶。尽一切可能，减少放流，以免碰坏航道航标，必须放流者也须严加控制。

九、肃清一切暗藏在航运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此点政治部已有具体布置。

十、内河总局提出保证川江航行安全的措施。各区局在拟定

年度季度月度技术组织措施时，必须包括安全措施。各船在讨论保证完成航次计划的同时，必须提出保证航行安全的措施。

同志们：1954年和1955年，我们曾进行了安全生产大检查和货损货差大检查，分析了海损事故和货损货差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也建立了一些制度。但海损事故还未消灭，这主要是由于重生产轻安全的错误思想尚未完全纠正，规定的安全措施还没有很好执行。因此，这次会议后，各级领导应该亲自负责，把以上措施根据当地情况加以具体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改变领导作风，面向基层、面向船舶，经常进行监督和检查，切实作到不沉船死人，保证货物完整地运达目的地，把航运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大大提高一步，保证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对全国航运工作人员的讲话^①

(1956年2月4日)

全国各地航运工作同志们：

交通部召开的全国航运会议已于1月28日胜利闭幕了。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我今天就把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向大家谈谈。

这次会议，总结了去年的工作，一致认为去年航运工作是有进步和有成绩的。河运方面，货运量超额完成计划9.7%，货物周转量已比1954年提高17.2%；海运方面，货运量超额完成计划1.04%，货物周转量比1954年提高16.97%，沿海大连、天津、秦皇岛、青岛、上海、广州六个港的装卸效率提高30.7%。国营航运企业的成本已降低了12%。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国家已批准了自今年1月1日起继续降低航运运价，现在各航运企业已经实行，这说明我们已逐步克服了过去航运事业中的“运价高，手续繁”的毛病，为今后航运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省内河航运企业一般的也都完成了国家计划，有的还超额完成任务。据六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去年共开辟了3000多公里的航道。

以上这些成就，是全体职工辛勤劳动取得来的。去年许多航运企业都开展了劳动竞赛，像上海海运管理局的船舶，全年创造了230个先进航次，共为国家增加了生产能力88万吨天。有的航运企业推广先进经验很有成效，像长江航运管理局和公私合营

^①这是朱理治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讲话稿，曾载《人民交通》杂志1956年第2期。

民生公司的船舶，由于推行了分段烧火法等先进经验，仅仅去年7月至10月统计，就为国家节约燃煤6100多吨，节约油料390多吨。各省内河节约用煤也取得了成绩。还有，像广州海运局的南海163号海轮的英勇海员们，在船长谷源松的领导下，勇敢、沉着地抵抗和反击了蒋贼飞机连续5小时的轮番轰炸，保证了海轮的安全，并且打落了敌机。这些事例，说明了我们航运工作人员从各个方面表现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十分可贵的。

但是，我们不可因此自满，还应该看到去年航运工作中的许多缺点，这就是：

第一、海损事故和工伤事故还很多，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损坏和差错现象仍然严重。像长江航线上的镒源轮，由于正副驾驶员丁玉和、夏忠云放弃职守，遇险不救，造成了死人沉船的事件；又如渤海湾的西河号挖泥船，由于拖带这条挖泥船的拖轮船长王宝福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也造成了死人沉船的事件；长江航运局的有些港口和船舶，把承运的粮食和桐油损坏了；广州港务局装卸精密仪器也损坏了。这些事故都造成了国家财产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航运事业的潜在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对船舶的组织和利用不够好，去年仅仅沿海和长江的国营货轮和驳船因非生产性停泊所造成的损失，相当于5.6万吨船舶没有参加营运。沿海六大港的装卸劳动力使用也有浪费，去年工人待时占出勤总工时的29.49%。

第三、对小河支流以及沿海小港注意不够，地方内河与支流的船舶没有向广大农村及偏僻地区发展运输，许多农产品和土特产运不出来。

第四、对木帆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缺乏具体领导，以致木帆船运输合作社长期停留在试点阶段。对私营轮船业的改造工作，

进度不快。没有积极发展浅水拖轮和推广轮船拖带木帆船的先进运输方法。

以上这些缺点，说明了航运事业仍然落后于客观的需要，领导思想落后于形势发展，今后必须坚决改正。

现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增产的高潮已经到来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也在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对航运事业的要求也在加大。为了使全国航运事业适应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快我们的工作，提前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要求运输数量提前完成，而且要特别注意保证货物完整运到，旅客平安到达。因此，要求全体航运工作人员贯彻以下的任务：

第一、提前半年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使更多的船舶纳入正规的运行图表。做好货源组织工作，提高港口装卸效率，缩短非生产性停泊时间。

第二、全力消灭海损事故。我们要总结和推广“和平”2号轮船长夏家箴安全航行14万海里的先进经验，长江大众轮船船长徐光世安全航行10万公里的经验和辽宁省安江2号轮船船长杜乐三安全航行6年的经验。全体航运工作人员，要加强劳动纪律，提高责任心，经常不懈地与海损事故作斗争。加强航道工作，改进航道和航标，改善和增添助航设备以及仪器，并应充分发挥航务港务监督机关的作用，严格执行监督制度。

第三、大力消灭货损货差，提高运输质量。各港口均应加强现场管理，贯彻责任制度，船舶与港口均应严格做到按积载图装货。同时应简化票据手续，加强港口对货物中途转运工作的领导，注意货物标志和货物包装状态，及时进行清理和整理。

第四、各航运企业均应不断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力降低成本。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大大地降低运价。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的生活，在可能范围内，尽力为职工增

建宿舍和增加其他集体福利事业。

第五、开辟2万公里的轮船航道，建造400艘浅水拖轮，广泛地推行轮船和木帆船结合拖运的运输方法，把阻塞在小河支流内的大批农产品运出来。

第六、加强技术管理，做好船员自修工作。提高修船工厂的船舶修理质量。推广船舶装制导流管以及防火预热等先进经验。开展航运部门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第七、为了适应今后航运事业大发展的需要，必须立即动手培养干部。在今后两个和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全国船舶将增加到好几百万吨，内河通航里程比现在将增加好几倍，要开辟好几条运河，这就迫切需要大批有文化、有技术的船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企业管理人员。因此，在今明两年内，要立即培养科级领导干部、轮机驾驶干部、航道技术干部以及其他工程技术人员和船员约共1万人。我们全体在职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加紧业务学习，使自己成为精通业务技术的干部和专家。

第八、在今年内，所有私营轮船业、轮船修理业、打捞业、码头仓库业等，均应完成行业合营，沿海及内河专营运输的木帆船均应完成合作化，并在船民自愿的条件下，积极组织高级形式的运输合作社。对于适合轮船拖带的私营木帆船，应通过定息合营的方式，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

第九、为了保证航运事业的顺利发展，必须纯洁我们的航运队伍。团结好人，清除坏人，把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任务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的。各级航运企业必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贯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和骄傲情绪；依靠广大群众，深入地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交通部已经决定在今年第二季度召开全国航运先进工作者会议，希望你们对这一重

要会议积极做好准备。

同志们：我相信有革命传统的海员工人和航运工作者一定能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胜利地提前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改进川江工作的几点意见^①

(1956年7月11日)

这次我和河运总局靖任秋同志、海员工会张子夫同志、长航局陶琦同志、部业务司阎庸同志及政治部陈耕国同志等在重庆停留了九天，先后参观了工厂、港湾，和船长、轮机长、协理员座谈了两次，和分局及党委同志进行了几天的座谈，和市委市府亦交换了意见，对于川江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川江工作中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因时间仓促，有些问题尚了解得不够深入，所以提得不一定完全恰当。现在就谈谈以下几个问题，希同志们研究。

一、川江航运的重要意义及分局的任务

(1) 四川和西南地区是我国经济上极为重要的部份，是我国工业建设的重要地区，随着今后工业的发展，这个地区将更加重要。川江是联系四川、西南和全国的主要纽带，过去和现在一直担负着极其繁重的运输任务，宝成路通车后虽可分担一部份，但今后运输主要还是靠川江，川江运输任务仍将会逐年增长。

(2) 目前川江运输工作与客观要求已不相适应，“新蜀道难”，“宜昌——旅客的愁城”已登上《人民日报》，工业器材的积压也相当严重。这种情况，现在如不引起严重注意，采取措施，设法逐步解决，将来就会更加被动。因此，川江的工作，一方面

^①这是朱理治在重庆中央直属航运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必须改善经营管理，发掘潜在能力，另一方面还必须根据实际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增加船舶，改造港湾，扩大船厂，修整航道。

(3) 川江航道复杂，船型特别，对船舶的技术条件要求亦较高。因此，必须有一个相当坚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来统一川江船舶、港湾、航道、工厂之间的矛盾，使得航运工作各个环节能有机地配合起来，共同为完成运输任务而努力。按照目前情况来看，这个工作由重庆分局担负起来较为适宜。川江航区内港口（包括重庆、宜昌两港在内）以仍归重庆分局管辖为宜，重庆航道工程区受重庆分局及区局航道处双重领导，川江整治处及民生船厂除受其直接上级领导，应同时受重庆分局监督指导。另一方面，重庆分局也有帮助以上这些单位解决困难的责任。

(4) 为了使重庆分局充分发挥其主动性，以适应川江情况，必须使它享有完整的内部的经济核算权利及义务。这即是规定它一定的运输任务，拨一定的船舶，一定的资金，使之能独立计算盈亏，享受对外订立合同权利，对国家计划完全负责。重庆分局从今年起在形式上虽已实行了经济核算，但实质上仍未改变过去供给制的情况，船舶划分尚不合理，船舶交接及租借制度未订立。区局和分局的经济责任还未划分清楚，港航之间尚未订立奖罚合同，这就妨碍了经济核算的实行，而计划的完成也就失去可靠的保证。因此我们建议：

(一) 重新按照实际需要和技术条件划分船舶，将重庆分局管理的船舶名单固定下来，作为分局的固定资产。区局应将属于重庆分局管辖的船舶调给使用，分局亦应将多余的船舶调出。

(二) 明确船舶交接关系。目前川江船舶运输有三种形式即：川江内航行；采取换拖不换驳方法在宜昌港中转；直达汉口、上海等其他航区港口。第1种形式不与别的分局发生经济关系。第2种形式可采用出租办法，并将租费订得略高于成本，以

督促船舶周转。第3种形式仍为自营，船舶航出川江后其业务由停靠的港口代理，分局向港口支付各种费用。

(三) 川江月度运输计划由重庆分局编制，报区局审核，平衡并批准，计划订立以后，必须保证完成或超过。

(四) 月度运输计划编制前，物资部门的托运计划和重庆分局的运力计划统交由四川省六办（或由其委托代管单位）加以平衡。月度运输计划确定后，承托运具体合同由重庆分局和各托运单位直接订立，其责任亦由分局全部负担。

二、川江航行安全问题

川江航行条件困难，对航行安全威胁很大，我们过去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尚不完全，拟增加以下几条：

(1) 拖轮及其他机动船拖顶驳船数目及驳船载重量，应根据拖轮马力、水位高低、船舶质量及驾驶人员的技术水平等条件，实事求是来确定。为确保安全计，特给予分局一定的机动权力，对经区局批准的拖驳船定额得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水位特枯）作适当的调整，分局在决定增加或减少拖顶驳船数量前，应征求船长、轮机长及政治协理员的意见并加以研究。

(2) 船舶在航行中遇雾，应即抛锚停泊，如因此而损失锚及锚链，不予责备。船舶顺流航行，在滩险地段遇雾调头，因而稍微触损船身，但能保住旅客，货物安全，使船舶能继续航行者，亦不予处分。在单行航道无法调头的地段，两端应建立和加强雾号站，并用电话或旗号等进行联系。

(3) 今年枯水季内，争取将几个对航行妨碍最大的滩险，如青滩、观音滩、冰盘碛等整治好。

(4) 客货船增加救生筏、救生浮等轻便的救生设备，使老幼妇女旅客在遇险时也能得救。所有船舶应坚决贯彻定期举行防火

救生演习的制度。

(5) 有计划地、成套地培养高级船员。应规定各船帮助培养船员的数量与期限，以免在配备新船船员时采取乱抽乱调的办法。旧船船员应尽量固定，不得任意调动。

如果长江航运局和重庆分局能将过去的安全措施及以上5条措施贯彻执行，川江航行安全完全可以得到保证。

三、航道工作

川江航道工作极关重要，过去工作有不少成绩，建设了航标，整治滩险，设立了绞滩站、信号台等，对航行安全及运输效率的提高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必须指出，航道工作还远不能适应航运工作日益发展的需要，仍然必须力求改进。

(1) 川江航道很长，滩险整治任务艰巨，我们技术力量有限，因此必须抓住中心，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目前整治工作应以重庆到宜昌段为重点，集中力量进行，因这一地段运输任务紧张，同时航道条件亦较差。至于川江重庆到宜宾段，目前的主要工作应是摸清情况，准备资料并在可能范围内炸除几个主要滩险。

(2) 川江整治的程度必须与长江流域规划结合起来考虑。今后水库建成，水位提高后，滩险将大大减少，因此，在国家支出大量投资整治航道前，就应具体计算其经济效果。整治川江航道既需照顾到航运上的需要和缓急程度，又要考虑国家投资的多少，运输成本的降低是否能与航道建设费用相适应，故应由航道部门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技术经济计算，然后重新研究提出方案。按目前情况来说，要求不宜过高，水深尺度以3公尺以下为宜。个别险要的地方安全系数可以放大一些。曲度半径要求720公尺，也值得重新研究。

(3) 航标设备应保证不走，不灭，并有足够的亮度。今年枯水季节应将全部夜航标志设好，明年洪水季节要做到全部航标保持正常状态。

(4) 信号台应设在可抛锚的地方，重要的信号台之间应架直通电话。

(5) 在整治滩险工作中，川江整治处与重庆航道工程区应密切配合，其分工原则应该是：整治滩险的基本建设工作交由川整治处负责，日常的维护工作由航道区负责。

(6) 改进绞滩工作，增加机械设备，缩短绞滩时间，保证绞滩安全。

四、修船工作

修船工作是航运工作中重要一环，运输任务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修船厂能否保证修船的期限和质量。这个问题在长江航运局执行上半年运输计划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川江也是如此。川江航行条件特殊，对船舶技术条件要求较高，过去有很大一部份船舶交汉口及上海船厂修理，由于重庆分局难于掌握，因此修船质量和期限很难得到保证。而重庆民生船厂自 1928 年成立迄今已有 28 年历史，多年来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工厂的机械设备也已有一定基础，修船质量一般说来是比较好的，如能将现有厂址稍加扩大，再增加一些必要设备，即能担负除“大众”、“民众”及“人民”一号轮以外全部川江船舶的修理任务，并能缩短修理期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必须适当地扩建民生厂，以适应川江修船需要，确定川江船舶基本上应在重庆修理的原则，增加民生厂修船比重。

目前修船工作中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 适当扩展民生船厂厂址。现该厂铜线坝工地作业面积

不敷应用，而后面有两所军队后勤医院，一所已搬走，另一所亦准备迁移，如能接收即能解决修船厂厂址问题。此事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亦表示支持，现军队方面已同意移交一所，民生厂应派人迅速与市政府和军方接洽办理接交手续。

(二) 建造浮船坞一座。由民生厂通过基建程序，呈请批准建设，但设计工作应即着手进行。此浮坞民生公司过去已有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可考虑交由河总负责，施工设计及建造工程由民生厂自行担负。

(三) 由民生厂根据从1958年起川江绝大部份船舶就地修理的原则，规划所需增加的机械设备，劳动力（包括培养训练后备人员在内）的具体数字列入1957年计划。

(四) 民生厂技术人员不足，须增加造船专业的技术人员一名，请长航局及民生公司协助解决。长航局、民生公司今后分配大专学生及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时，要分配几名给民生厂。

(五) 重庆分局船舶修理所应着手筹备起来，所需技术工人由民生厂代重庆分局训练，必要时应抽调一些熟练的工人作为骨干。重庆分局在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对民生厂的要求应提出具体任务，并及时派人去学习。分局除成立修理所负责航次临时修理外，还应积极鼓励船员自修，提高修船工作中船员自修的比重。

(六) 民生船厂应将重庆分局计划外的海损、机务事故修理承包下来。

五、重庆港问题

目前重庆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港湾基本上处于自然状态，技术设备落后，基本建设工作落后，港口设备、劳动力等一系列问题不能与港口吞吐任务相适应。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港口管理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如工班效率不断降低，驳船大量积压

等。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故两方面均应同时解决。

(一) 基本建设和规划工作

重庆港的吞吐量中有 80% 左右是水上转口货物，根本用不到上岸，采用水上“船过船”的方法最经济、最迅速、亦最安全。其余 20% 左右的货物是以重庆为目的港，或由陆上运出的，这些物资才需要真正的港口作业。这大约 20% 的货物主要是进出口的钢材和机器，出口粮食，市内需要的日用百货等。故重庆港的建设应根据以上特点，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订立一个大而无当，不切实际，要花几千万才能建成的大港；而另一种是根本不去建港，认为目前自然状况即可以适应工业化建设的要求了，或者认为三峡水库建成后，重庆水位提高，我们港区建设有被吞没的可能，所以目前不要进行建设。其实，水位提高是 10 年以后的事情，而这 10 年内，我们的任务将愈来愈紧张，港口如不增加必要设备，单靠人力是很难完成的。因此，必须有一个为期 10 年的规划。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建议：

(1) 九龙坡作业区码头、货场，技术设备较完备，与铁路相连接，又有发展的空地，因此今后应着重建设九龙坡作业区，逐步提高其在整个港口装卸量中所占的比重，进出口的各种重件，陆地上出口的粮食及进口的肥田粉等都可在此装卸。在枯水季节，九龙坡下面航道内有九龙滩、猪儿碛阻碍航行，应将其整治，使川江船舶全年能直通该地。

(2) 重庆市区马路坡度很大，不论在枯水或洪水季节，船上卸货运到市区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坡道，因此用缆车代替人力搬运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过去民生公司在朝天门建设的缆车工程，应尽快将其修复使用。市内所进口的百货等可在此装卸。

(3) 今年三、四季度由于任务大，驳船和仓库不够使用，可考虑建设一些临时货蓬，以应急需，旅客候船室已经批准建造，亦应抓紧时间进行。

(二) 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在能力, 进一步研究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如改进作业计划, 加强现场管理, 及劳动组织等, 拟出具体措施切实执行, 保证工班效率提高, 并按时完成装卸船舶任务。同时, 还应当对延期不提货的货主拟出措施, 力求能做到督促货主及时提货, 加速囤驳船周转。

关于这个问题, 因时间仓促, 我们研究不透, 请重庆分局专门作一次检查, 研究解决。

(三) 劳动力不足问题, 须再加详细计算后确定数字, 先报请区局内部调剂 (如万县港目前尚有多余劳动力 100 名), 不足之数可请当地党政机关协助解决。如城市内招不到, 可请求省市委到农村抽调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多余的劳动力。

(四) 注意职工生活福利工作。领导上要经常关心职工的生活, 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支持他们合理的要求, 以提高职工生活工作的积极性, 如装卸工人的食堂、浴室, 这些公共福利是很需要而有时也有可能解决的, 必须尽速解决。

六、政治工作

(一) 政治工作重点应放在船上, 而船上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政治工作应当用教育说服方法使工人提高觉悟, 增强团结, 特别是高级船员之间的团结更为重要。

(二) 川江船舶政治工作已摸出一些经验, 但不够完整, 并且各船发展也不平衡, 今后还应当不断总结和交流经验, 使之提高。政治工作中须注意纠正一些偏向, 如将高级船员视作资产阶级, 不敢接近, 为的是“怕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还有个别的政治人员, 甚至对他们采取粗暴的态度。

(三) 港口政治工作很重要, 特别目前港口是航运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政治工作更应该加强。港口并不流动, 故港口党委可

和政治部合起来工作，受地方领导更为适宜。

(四) 政治工作和行政的关系，一是搞行政工作和搞政治工作的同志要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提高自觉，维护团结。二是行政方面应帮助解决政治干部量少质弱的问题。干部来源有三个方
面，即：海军复员人员中选拔培养；要求市委帮助；从船员中提拔抽调。

(三) 政工人员工资级别应求得合理解决，高级船员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应得到照顾，宿舍、交通船、交通车应逐步设法解决，行政上应为政治工作建立必要的物质基础。

七、党委领导问题

川江工作的好坏，取决于党委的领导，党是最高领导机关。集体领导是党委的最高原则，独断专行，个人决定问题，不愿倾听别人的意见，不重视集体智慧，工作中一定要碰钉子，革命事业一定要受到损害。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习惯于集体领导，这是应当克服的。行政负责同志应把重大的问题提交到党委去讨论，虚心听取别的同志的意见，严格执行党委的决定，所有同志都要养成民主作风，集体领导作风。

党委集体领导，决不是代替行政工作，相反，党和行政必须有明确的分工。重庆分局党委规定的七条领导办法，基本是正确的，大意如下：(1) 保证和监督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计划的实现。(2) 定期研究讨论生产计划（季度计划）；(3) 管理科级以上干部；(4) 讨论对合营公司的方针和统战工作；(5) 讨论政治工作年度计划；(6) 讨论工会和青年团的年度计划；(7) 坚持党内民主，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每月末，党委委员集体过一次组织生活，今后应坚决贯彻执行。

党委的工作重心，应当抓思想工作，而思想工作是细致的工

作，要有原则性，也要注意方法。做好思想工作要通过谈心，相互了解性情，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绝不要互不通气，察言观色，揣摸推测，互相猜疑。要学习《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书中党委书记的工作作风，既帮助同志纠正了缺点又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党委领导，应特别抓紧反对目前脱离业务，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这种思想作风，往往不注意检查自己的缺点，认为自己一切工作都对，假使有不对的地方，那都是群众不好，上级不好，自己毫无责任，因此妨害了自己改进工作。

川江的船舶、航道、工厂、港湾工人在党的教育下，觉悟大大提高了，涌现出不少先进积极分子。但我们过去对先进的表扬不够，例如最近看到的瞿塘峡拖驳船上的船员，在激流中跳下水去抢救驳船，应即查明实况，加以表扬，我们应当对先进的多鼓励，少来点惩办主义，这才能发扬正气，鼓励大家向这个方向前进，才能兴旺我们的事业。

现在群众是动起来了，问题是我们的领导赶不上。因此应把我们的着重点，放在改进领导工作上。领导和管理现代化企业是非常复杂的工作，工作中新的问题不断产生，必须面向作业区、面向船舶、面向业务，不要事务主义，只是埋头在办公室的公文堆里或是成天忙于开会，更不要停留在无止境的抽象的空谈争论之中。这样，下面的问题不能解决，自己的领导必然要主观落空。领导应将主要力量放在业务上，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对下面作具体帮助，不要空洞不切实际的领导。

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根据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来办事，必须采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反复告诉我们的，是整顿三风的中心内容。我们稍为离开这条方法，即会发生毛病，工作中一切的毛病亦都是由此而来的。

以上仅系个人意见，供参考，如有不妥当的地方，望来信告知，以便修改后报部决定。

改进长航工作，保证完成国家计划^①

(1956年8月2日)

中央检查组来长江工作了三个多月，暴露了长江航运工作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对我们今后工作的改进，帮助很大。这次我们来长江，主要是在中央检查组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协助长航局解决这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交通部和长航局能解决，已经研究出措施逐步解决，有些问题交通部和长航局不能解决或者解决的意见尚不够成熟，我们将带回北京去进一步研究以求解决。长航局运输会议已开了5天，我们听了区局负责同志的报告，各分局、港的发言，并和分局、港的调度室主任座谈了一次，研究了长航局如何保证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的问题。现在就来谈谈我们的意见。

(一)

1956年上半年，长江航运局工作有一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

1、运输质量有了改进，货损货差显著减少，从赔偿金额来看：去年上半年为72690元，今年上半减少到4635元（数字可能不够完全，没将应赔而尚未赔的计入），为去年同期的6%。特别是近两月来货损货差事故，减少更加显著。这是由于改进了理货工作，建立了船港货物交接办法，改革了商务票据，加强了

^①这是朱理治在长江航运局运输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

现场管理，实行了奖惩制度等一系列工作所得到的结果。更主要的是，通过工作检查，从领导到群众都重视了货运质量，又推广了不少先进经验，组织了观摩等，所以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

2、今年实行了分局、港的内部完全经济核算，船舶和作业区的经济核算已进行了试点工作。港航合同和奖罚制度已经在汉口港开始订立了，并已得到初步效果。由于实行了经济核算，上海分局领导同志从第一季度决算中发现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对各部门提出改进工作的要求。汉口、芜湖等港亦进行了季度经济活动分析，研究了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各分局、港口追加预算的事情大大减少了，长期积压的呆滞材料也积极地进行了处理。汉口港自6月1日起订立港航合同后，工作有改进，6月中旬减少了滞期罚款，并得到了速遣奖金。

3、客运工作虽是由于船舶过少，没有能满足旅客运输的需要，但长航局经过了重大努力，客运还是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客运量完成计划106%，客运周转量完成计划111%。

4、航道工作有改进，洪水期间航标维护工作已试验成功，渣波、孤滩等主要滩险得到了整治。全线继续进行的航标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5、推行了港口技术操作程序。有些单位，如黄石港由于领导深入群众，与装卸工人共同研究制订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技术操作标准图，推动了生产工作，提高了装卸效率，水泥装船由原来每工班48人，减少到27人，工班效率由15.5吨，升到29.6吨，提高91%；钢材、煤炭等工班效率也提高45%左右。

6、总结了先进经验，组织了推广先进工作，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在群众中掀起了生产高潮。

7、肃反工作亦有收获，清出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内部，使航运队伍更加清楚了。

上述成绩说明，有些同志对长航局工作信心不高，是完全没

有根据的。只要我们订立的方针、步骤合乎实际，并经一定的努力，总可以见到成绩。特别是中央检查组来长江检查工作以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加明显，使领导心中有数，能有计划有重点地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地方党委也重视了长江航运工作，加强了领导和监督，并帮助解决问题。因此，长江工作的不断改进，逐步追上先进的企业是可以指望的。

我们对上半年工作成绩，毫无疑问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全面看来，今年上半年计划完成情况是不好的，我们对工作失掉信心不对，而盲目乐观亦不应当。

从今年上半年工作看，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经验教训：

一、企业的中心工作是生产，企业中的中心任务是完成生产计划。这半年多来，我们放松了对生产的领导，首长不亲自抓生产，解决生产中不断发生的问题，使许多问题积压起来。有些企业，企图脱离生产，例如：汉口港企图将港口分为二个大作业区，将调度和作业计划放到作业区，港长、副港长不亲自主持调度会议（现已改进），这是不妥当的，脱离了生产，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领导就会空洞不切实际，不能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生产计划的实现就得不到保证，任务也就不能完成。

二、领导企业必须有管理企业的一套办法。管理企业的主要方法是计划管理、经济核算和技术管理。计划管理是企业的基本方法，放松了计划管理必然要使企业走向混乱，没有经济核算就不能发挥企业和职工在国家计划统一领导下的积极性，就不能不断降低成本，为国家积累更多资金。技术管理是使有计划地管理企业得到技术上的保证。今年上半年放松了对计划和技术的管理，结果整个生产秩序都搞乱了。现在长江航运的局面是群众已经动起来了，但企业管理赶不上去，因此，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了阻拦。

三、必须根据客观规律来办事，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例

如：长航船舶的生产过程是统一的不间断的，因此不能主观的切作几段来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进一步改造，必须根据党的政策和步骤来规定，不能主观的来决定；川江拖驳定额亦必须依照川江航道的情况及各时期的水位来订，不能主观来决定。重庆港的建设亦有本身的规律，来一个庞大无比的建设计划，或不主张进行建设，都带有主观片面性，不能解决问题。

四、企业中肃反、上级开会、工资改革、干部轮流学习等等工作和任务很多，干部不够分配，只有用培养提拔、团结党与非党干部的办法来解决。

从以上教训来看，只要克服了我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片面性和脱离生产、脱离客观的倾向，工作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二)

长航局下半年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完成 1956 年的生产、财务和基建计划。从目前情况来看，争取四年半完成五年计划的口号是合乎国家的要求、群众的要求的，亦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假使不能完成今年的计划，不仅拖了工农业建设的后腿，而且是对广大职工积极性的严重打击。

所谓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就是不仅在数量上要保证完成或超额，还要保证质量，即在今年下半年不仅要完成客运量 306.3 万人，客运周转量 5.1 亿人公里，货运量 539.5 万吨，货运周转量 53.6 亿吨公里的运输任务，而且必须保证安全，消灭货损货差，成本降低达到计划的要求。

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是有困难的，但是，只要我们抓住生产中的关键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经过大家的努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

为完成今年计划任务，应采取下列措施：

- (1) 迅速调整港口设备和劳动力。
- (2) 加强计划管理和调度工作。
- (3) 加强船舶维护修理工作。
- (4) 推广港航合同到所有港口。
- (5) 保证航行安全。

(6) 巩固和提高上半年消灭货损货差方面的已有成绩，继续将货损货差减少到最低限度。

此外，还应注意劳动保护工作。管理局劳动保护部门应会同工会，彻底检查一下上半年工伤事故情况，分析其发生原因，采取措施，逐步杜绝工伤事故的发生。

假使能将上述措施一一实现，则不仅今年计划可以完成，而且长航局的经营管理水平亦可大大提高，再加半年到一年的努力，可以基本上克服落后状态。当然，要根本改变长航的面貌，必须从长远规划、基本建设、训练干部入手，这是一个长时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和区局研究，不在此处报告了。

(三)

为了完成今年计划，实现上面所提出的措施，必须改进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加强团结，贯彻群众路线。

第一、必须克服非生产倾向，克服脱离生产，脱离船舶，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在企业里必须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党、政、工、团在企业中的中心任务是实现生产计划，而不是其他，对此，我们的同志在表面上从未反对过，但在实际执行时却往往不是这样做。例如，这半年内有些企业领导同志放松了生产工作，脱离了对基层

生产单位的领导，不深入了解情况，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因而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为此规定：（1）管理局长、港长必须亲自抓计划、财务工作，计划、财务部门是企业综合部门，经常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全面情况，对这二个部门，局长、港长必须亲自掌握。（2）管理局长必须亲自主持每月的运输计划会议，发现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及时予以解决。（3）区局一级领导，每年必须有7至9星期时间到下面去；分局、港的领导必须经常到船舶、作业区去指导工作，帮助解决问题。

第二、必须纠正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由于思想上的片面性，我们在工作中常常不是右倾保守，就是急躁冒进，左右摇摆不定。因此，在学习哲学的时候，要联系实际，最好多读读中央整风文件。在决定问题，尤其决定重大问题时，先做调查研究，召开小型座谈会，征集各方面意见，酝酿成熟后交党委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如意见尚不够成熟时，不要仓促提交讨论决定。这样做，会议次数可以减少，会议质量可以提高，重大错误有可能避免。一级组织，一个人要一点错误也不犯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求长航局今后在重大问题上不犯错误，不走大弯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随时检查改正。

第三、贯彻毛主席的号召，动员一切力量，完成当前的任务。要做到这点，必须加强党内的团结。（1）长航局干部和来自合营企业的干部之间的团结。“民生”等合营公司定值定息业务机构并入国营后，长航局将增加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可观的。假如大家能自觉地注意团结，我们干部力量的增长就决不只是简单的数目字相加，而将在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力量。假如不是这样，力量不但不能增加，相反会相互抵消。因此，必须提倡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不要只看人家的毛病，不看自己的毛病。凡是不利团结的话一概不讲，凡是不利于团结的事一概不做。（2）党内外干部的

团结，特别是党员干部和资方人员的团结。资方人员应合理安排，量才录用，对资方人员如能很好的教育、使用、团结、改造，亦会大大增加我们的力量。（3）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搞好航运工作的关键，很大程度决定于高级技术人员，所以对这些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应很好的照顾，使他们能发挥出全部力量投入航运事业。长航局应遵照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精神，改进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4）政治工作人员和业务工作人员之间的团结。

第四、必须执行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搞好企业。（1）继续深入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推广先进经验。（2）奖励和宣传模范事迹，使群众有所表率。（3）经常召开船长、引水、协理员等座谈会，倾听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的意见。（4）关心群众的生活动。（5）做好工资改革工作。

第五、必须提倡钻研业务的风气，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业务。航运工作是复杂的，如研究不透，各种问题就得不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思想不一致，言语不一致，必然会陷于空谈争论、一般化领导、文牍主义和无穷尽的会议等等，工作越搞越乱。有些人认为钻研业务就是单纯业务观点，这是不对的。政治工作既要推动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又要推动大家学习业务。在长江航运局要掀起一个学习业务的热潮，要求目前尚不熟悉业务的同志在半年到一年内成为本部门工作的内行，二、三年内大家都成为专家。这样，政治工作就能更加与业务工作密切结合，工作就能做出更大的成绩，完成任务也能有可靠的基础。

关于长江航运工作的报告[†]

(1956年9月10日)

今年3月至5月间，中央监察部等有关部门奉国务院的指示，组织联合检查组，检查了长江航运工作，揭发了长江航运局工作中存在的很多问题。6月初，我受部的委派，和河运总局靖任秋局长及海员工会张子夫副主席等到长江现场帮助进一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二个半月的时间中，我们除了和长江航运局及各分局领导同志研究工作外，还和各主要港口、船厂、学校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在汉口、重庆，和船长、轮机长、政治协理员等座谈了几次，并与湖北、汉口、重庆、南京及上海等省市委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对长江航运局的工作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研究。现将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及改进工作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

一、几年来，长江航运局的工作有不少的进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长江历年客货运量不断增长，以1952年为100，1955年的客运量为147.05%，客运周转量为124.27%，货运量为218.66%，货运周转量为260.13%。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也有所提高，客运量增长8.04%，客运周转量增长10.76%，货运量增长21.15%，货运周转量增长31.55%。

[†]这是朱理治在交通部机关科长、工程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曾载《人民交通》1956年第10期。

二、船舶和港口效率，几年来也均有提高。国营拖轮单位生产量，1955年为1952年的390.14%，其中驳船为174.85%。全线港口工班装卸效率1955年比1953年增长89.91%，其中重庆港增长49.39%，汉口港增长102.37%。

三、运输成本和运价降低。国营1955年单位运输成本平均每换算千吨公里9.05元，比1952年降低43%。在成本降低的基础上，长江运价四次降低，1956年实行的新运价与1952年的比较平均降低32%。

四、在改善货运质量、消除货差货损方面，今年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1955年初全国商务会议之后，全线实行票据改革，推行港航交接制度，贯彻装卸技术操作程序，改进理货，实行奖罚等制度，加之今年中央检查组的督促与帮助，上半年的货运事故已有很大减少。从货损货差已经赔偿的金额来看，较去年大大减少了。

五、航道建设也有进步。中下游完成了航标改革，川江洪水期已可在部分区段设标，今年枯水期预计可全段设置昼夜航标，进一步改善了船舶航行条件。

六、肃反工作和推广先进经验，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等工作亦有收获。

从上述这些指标来看，长江航运工作是在逐年进步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已有所提高，说明有些同志对长航局工作信心不高，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只要我们订立的方针、步骤合乎实际，并经一定的努力，总可以见到成绩。特别是中央检查组到长江检查工作以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加明显，使领导上心中有数，能有计划、有重点地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地方党委也重视了长江航运工作，加强了领导和监督，并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因此，长江工作的不断改进，逐步追上先进企业是可以指望的。

但是，长江航运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还不能适应国家

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是客货运工作不能适应客观需要，汉口、重庆、宜昌等港口经常滞留旅客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客货轮开了大仓运送，亦不能解决问题，影响很坏。其次是货运能力亦不能满足要求，上海每月积压 2-3 万吨货不能上运，汉口、宜昌、重庆也经常积压。这一方面是由于设备不足和落后所造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

(一) 今年上半年运输计划没有完成，货运周转量只完成 90%，占年计划的 42%，一些效率测标，如营运率、航行率、单位生产量、工班效率等都没有完成计划。主要原因在于：

(1) 港口工作落后，不能适应计划要求，工作中缺乏预见性，有了问题又未能及时解决。如 1-5 月全线港口装卸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19%，渝汉等港工人比去年减少了 14%，一些必要而可行的基本建设如重庆港的缆车等进行得迟缓，更重要的是港口计划管理放松了，各港领导人没有亲自抓生产，装卸工作组织不能保证按时发船，大大地延长了船舶泊港时间。

(2) 船舶运输的计划管理，过去两年来建立了一套制度，如调度作业计划、运行图等，但今年都没有很好贯彻。机构改组，相继成立了三个分局，但由于事先酝酿研究和准备工作做得不够，新的一套制度没有相应建立起来，因此一度造成了混乱。

(3) 技术管理工作也有松弛现象。预防检修制度有些自流，船员自修没有积极推广，船员对船舶技术状况掌握得不够，修理单开的不准确，加帐多，增加了修船厂的困难。另一方面，修船厂工作组织得不好，修理质量差，常常造成返工浪费，延误了修理期限。此外，负担航次修理和临时修理的修理所迟迟未能建立，也影响了修船工作。

(4) 港、航、厂是航运部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今年上半年不能相互适应，造成运输秩序紊乱，效率降低，影响了国家计划的完成。

(二) 海损事故仍然很多。长江近二年在加强安全生产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努力，但是今年上半年还是出了许多事故，沉船死人事件仍然发生，仅因海损事故修理船舶所损失的运力即达 125 万吨天，17.6 万马力天，约相当于一艘 7000 吨的船舶和一艘 1000 匹马力的拖轮半年未参加营运。这些海损事故中，有许多是可以避免的，例如，拖载过多，今年第一季度有三个拖驳船队先后在川江漕口狭窄处发生事故；川江内发生拖驳船碰撞多至三四十起。我们同志主观上是想完成任务，但没有根据客观可能，结果反而损失了运力。所以，我们既要克服保守思想，同时又要反对冒进，实事求是的进行工作，如果谨慎周密地研究制定在川江不同水位航行的拖载定额或采取分拖等方法，则上半年许多次海损是可以避免的。

(三) 长江航运工作缺少全面规划，基本建设和干部培养等工作也落后了一步。目前长江船舶不能与客货运量相适应，造成旅客和货物的大量积压。港口和修船厂建设也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长期计划，在干部培养上亦存在一些自流现象，高级技术员严重缺乏，技术力量增长赶不上需要。

(四) 在贯彻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方面也有缺点。近年来，长航局对公私合营轮船公司的领导比较薄弱，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之间的团结尚不够好，今春在合并机构的步骤上有些急躁情绪，影响不好。

从以上的工作检查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经验教训：

(一) 领导企业必须有管理企业的一套办法。管理企业的主要方法是计划管理、经济核算和技术管理。计划管理是企业的基本方法，放松了计划管理必然要使企业走向混乱。没有经济核算，就不能发挥企业和职工在国家计划统一领导下的积极性。没有技术管理，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今年上半年放松了计划和技术管理，结果整个生产秩序都搞乱了；经济核算搞

晚了，因此企业管理就不易走上轨道，造成了长江航运工作目前的局面——群众已经动起来了，但企业管理工作赶不上去，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了阻碍。

(二) 企业的中心工作是生产，我们在企业中的中心任务是完成生产计划。半年多来，局首长不亲自抓生产，放松了对生产的领导，生产中不断发生的问题积压起来，得不到解决。例如：汉口港领导将港口分为二个大作业区，将调度和作业计划放到作业区，港长、副港长不亲自主持调度会议（现已改进）。由于领导脱离了生产，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领导工作必然空洞不切实际，不能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因而生产计划的实现得不到保证，任务也就不能完成。

(三) 必须重视远景规划和基本建设工作。我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地发展而船舶运输能力不能相应地增加，必然要使航运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狭窄地带，影响工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目前长江各地出现的物资积压、旅客拥挤，清楚地反映出这一情况。长航局本身没有注意这一工作当然要负一部分责任，但是，交通部过去在这方面对长航局帮助不够，是造成目前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

(四) 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提倡根据客观规律来办事。一切事情都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例如：长途运输的船舶的生产过程是统一的，不间断的，不能主观的切作几段来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进一步改造，必须根据党的政策和步骤来进行，不能主观的决定；川江拖驳定额亦必须依照川江航道的情况及各时期的水位来订，不能主观的决定。又如港埠建设问题，亦有其本身的规律，对重庆港的建设，编造一个庞大无比的计划，或主张不必进行扩建，都带有主观片面性，不能解决问题。

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不仅是存在于个别同志之间，而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毛病，长航局有，交通部亦

有。所以，我们大家都必须纠正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工作方法上脱离实际的倾向，一齐来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毛病，搞好我们的工作。

(二)

改进长江航运工作首先必须改善经营管理。

长航局下半年的中心任务是全面的完成 1956 年的生产、财务和基建计划。改善经营管理就是为了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为改善经营管理和保证完成今年计划任务，应采取下列措施：

一、采取迅速紧急的方法调整港口设备和劳动力。下游一些港口（如南京港）有多余的囤船，应即下令抽调，解决重庆、宜昌、汉口港囤船不够使用的问题。适当规定各港周转驳船，以便减少捣载，增加换拖不换驳的比重。重庆、宜昌、汉口等港装卸工人不够，应适当增加，但也必须先通过内部调剂解决的办法，然后再向外招雇。各地应广泛推行先进船次的运动，并以此推动港口技术操作程序的巩固和效率的提高。同时，港口还要采取一些措施，如提高前方仓库的费率，建立累进的费率制度，督促货主及时提货，加速仓库和囤驳船的周转。此外还要强调港长必须亲自主持调度会议，及时解决生产中发生的问题。

二、加强计划管理和调度工作。管理局要开好月度运输计划会议，除三个分局和各主要港都要参加外，上海港亦要派人参加。每次会议应当针对下月计划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几条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规定执行人和完成期限，下次开会时逐条进行检查，对没有执行措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的批评。部的月度运输会议要恢复，海运局仍照以往规定按时参加，长江局亦须派业务上负责干部参加。运输会议只着重研究完成任务中存在

的问题，而不应着重于争执计划数字。

在船舶的调度工作上，区局、分局、港口应很好的分工。短航和区间运输一律由分局或港口管理，只要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在具体调度工作上，区局不必进行过多的干涉（当然，必要的监督还是应该有的）。长航跨区船舶，区局必须统一掌握起来。保证长航跨区船舶运输任务的完成，其主要责任应由区局担负起来，区局应加强对这些船舶的调度领导，及时解决船港之间的矛盾。

三、加强船舶维修工作。1.为减轻本局所属船厂造船工作负担，今年各厂造船任务尽量转移给一机部或其他工厂，以便增加修船能力，修船的分工在部内也应作适当调整。2.重庆和武汉二个修理所应即成立起来。3.深入推行预防检修制度，鼓励船员自修，并给以适当奖励。4.按计划安装好导流管，增加拖轮马力。

四、推广港航合同，巩固和推行经济核算制。由各分局代表船方与各港口订立合同，实行奖罚制度，这种制度普遍严格执行起来，对保证今年计划的完成，有重大作用。

五、为保证航行安全，必须整修青滩、观音滩、冰磬碛等主要滩险；保证灯标不移位不熄灭，信号台应设在船舶可以调头的地方，特别险要地段二个信号台之间应增设联络电话；有计划的培养高级船员，不许乱抽、乱调；根据川江航道实际情况，提高航行安全系数，重新规定川江拖驳标准，严禁超拖、超载；增加船上救生筏等安全设备，经常进行防火救生演习；下游应研究吴淞口的防风问题；推广莫家瑞等先进船长的安全生产经验。

六、巩固和提高上半年消灭货损货差方面已有成绩，继续推广提高运输质量方面的先进工作经验，将货损货差减少到最低限度。

此外，还应当注意劳动保护工作，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杜绝工伤事故的发生。

假使能将上述措施一一实现，不只今年计划可以完成，经营管理水平亦可大大提高。但是，要根本改变长航的面貌，必须从长远规划、基本建设和训练干部入手。

(三)

几年来长江局在基本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中央亦有相当数量的投资，但因缺乏预见性和远景规划，加之投资所限，故目前造成船舶不够，港口落后，船厂不足，干部培养不及。这种状况，已经造成了目前航运落后的状态，如不急起直追，今后将更加严重。

对此问题，我们做了一些研究，有以下几点初步意见：

一、船舶建造。为满足客运的需要应增建一定数量的客货轮，除今年建造的渝汉直达客船 2 艘外，明年应建造 600 客位的客船 4—6 艘，并建造汉中班轮 2 艘。为满足货运任务的需要，增建货运船舶数量必须与 1957 年的运输任务相适应，并保持一定的后备力量。增建的货船以可以直达运输减少转口为原则，因此，明年增建的驳船应以 500—700 吨级为主。为了完成特殊物资的运输任务，在可能范围内，应增建部分货轮和特种驳船，在上述特种船舶没有试制成功以前，不要大量建造，以免财物受到损失。

二、港口建设。港口扩建必须与装卸任务的增加相适应，确定港口增加设备以前，应考虑到原有设备所能发挥的潜力。

重庆港，吞吐量有 80% 左右是转口物资，根本用不着上岸，采用水上“船过船”的方法最经济，最迅速，也最安全，其余 20% 左右的货物是以重庆港为目的港或由陆上运出的。因此，重庆港的建设，既要反对不切实际的花钱很多的计划，又要反对目前不去扩建或等三峡水库建成后再建港的计划。三峡水库建

成，水位提高是十年以后事情，必须有一个十年内的建港计划。我们的意见：今后应重点建设九龙坡作业区，并将在九龙坡下面的九龙滩、猪儿碛的航道进行整治。船上卸货到市区须经过一段很长的坡道，因此，必须充分利用缆车设备，朝天门的缆车工程应迅速进行。

宜昌港，提高了换拖不换驳的直达运输比重以后，除增加水上装卸设备外，不宜进行大规模的扩建。

汉口港，我们和武汉市的意见应做出扩建江岸码头的规划，集中主要力量建设江岸为机械化的装卸作业区，其他作业区作局部的扩建或改建，现在即应作整体规划。

其他下游各港，应逐步的扩大机械比重（目前应以增加小型的皮带运输机等为主）；划定港区，做出全面的逐年扩建的计划。长江船舶在上海港装卸工作目前仍以统一于上海港务局领导为宜。长航分局应派干部参加港务局的调度室及该二个作业区工作，派一个局长或副局长担任港务局副局长，以密切双方联系。

三、船舶修理。修理厂的扩建应以分段定厂包修为原则进行规划，即行驶川江的船舶在重庆、宜昌修理，行驶中下游的船舶在汉口、上海修理。因此，重庆厂应适当扩充厂址，建造一艘1200吨的浮船坞，增加一部分必需的机械设备，宜昌新建的小厂应很快开始生产。新建汉口修船厂应从速建设。南京上海厂的扩建应即着手研究规划，全长江修船厂的扩建安排由船厂局召集专门会议进行研究，并定出全面规划。

四、航道整治。川江航道的滩险整治任务艰巨，我们技术力量有限，必须与长江流域整治规划结合起来考虑。今后水库建成，水位提高，滩险将大大减少，因此，在国家支出大量投资整治航道前，就应具体计算其经济效果。我的意见，航道整治标准不应太高，在个别险要地方安全系数可以放大一些。

五、干部培养。干部不足，特别是技术干部赶不上任务增长

的需要，必须大量的培养干部。目前的办法是，指定船上包干培养；抽调专门船只训练船员；开设训练班训练船员和干部；建立指导船长制度，训练新提拔的水平较低的高级船员。这样的办法可以解决目前船员、干部不足，但是技术水平和理论水平的提高确受到一定的限制。从事业的长远发展着想，必须办好中初级技术学校及河运学院，才能解决干部和船员不足的问题，这是我部目前的重大工作。

要使上述问题能彻底解决，就要做好船舶、港口、修船厂、航道、干部培养的全面规划。长航局应成立长远规划组织机构，组织力量做好长远规划工作，在年内提出初步方案。部内有关局应协助长航局将这一工作搞好，并联系计委、建委等有关部门审查确定。同时，长航局应将基本建设工作，视作和生产任务同等重要的工作，由局长或主要副局长专门领导。

(四)

为了改进长江工作，保证完成计划，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加强团结，贯彻群众路线。

第一，必须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现场的官僚主义作风。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这个指标很明确，因为我们党、政、工、团在企业中的中心任务是实现生产计划，而不是其他。我们的同志在表面上从未反对过，但在实际执行时却往往不是这样做。有些企业领导同志放松了生产工作，脱离了对基层生产单位的领导，不深入了解情况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因而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因此应规定：

(1) 局长、港长必须亲自抓计划、财务工作，计划、财务部门是企业的综合部门，经常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全面情况，这二

个部门，局长、港长必须亲自掌握。(2) 管理局长必须亲自主持每月的运输计划会议，及时发现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予以解决。(3) 区局一级领导，每年必须有七至十个星期的时间到下面去；分局、港的领导必须经常到船舶、作业区指导工作，帮助解决问题。

第二，必须纠正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由于思想上的片面性，我们常常在工作中不是右倾保守，即是急躁冒进，左右摇摆不定。建议每个同志在学习哲学的时候，要联系实际，最好多读读中央整风文件和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决定问题时候，尤其决定重大问题时，先做调查研究，召开小型座谈会，征求各方面意见，酝酿成熟，然后交党委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如意见尚不够成熟时，不要仓促提交讨论决定。这样作法，会议次数可以减少，会议质量可以提高，重大错误才有可能避免。

第三，贯彻毛主席的号召，动员一切力量来搞好工作，完成当前的任务。要做到这点，必须加强党内的团结。

(1) 长航局干部和来自合营企业的干部之间的团结，这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民生”等合营公司定值定息业务机构并入国营后，长航局将增加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可观的，假如大家能自觉地注意团结，那么我们干部力量的增长决不只是简单的数目字的相加，而将在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力量。假如不是这样，力量不但不能增加，反会相互抵消，搞坏工作。因此，必须提倡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不要只看人家的毛病不看自己的毛病，应当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凡是不利于团结的话一概不讲，凡是不利于团结的事一概不做。

此外，海军复员军人与原有船员之间的团结工作，亦应本互助合作精神，把关系搞好，政治部门应做好这项工作。

(2) 党内外干部的团结，特别是党员干部和资方人员的团

结。对资方人员在合理安排，量才录用后，应做好资方人员的教育，改造，搞好共事关系。

(3) 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搞好航运工作的关键，很大程度决定于高级技术人员，所以对这些人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应很好的照顾，使他们能发挥出全部力量投入航运事业。长航局应遵照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精神，改进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

(4) 政治工作人员和业务工作人员之间的团结。业务部门和政治部门的工作人员之间在工作中应该更多地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5) 港航关系问题。首先是上海港方面与长航分局的关系，除掉在组织上制度上改进外，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搞好双方的团结。上海港应系统的做好政治工作，克服盲目的本位主义和重大船、轻小船的情况。长航分局亦应主动的做政治工作，帮助港务局克服困难，双方互相通气，互相商议，共同搞好运输工作。

总之，上下、左右、内外都要提倡互助合作精神，各方面的干部都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欢迎合作专家，不要“扯皮专家”。长航局系统，凡是有以上关系的单位，应特别注意做好团结工作，发动大家来自觉地搞好团结。

第四，必须执行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搞好企业。

(1) 继续深入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推广先进经验。特别是推广保证航行安全，提高货运质量，发挥船舶效率，加速港湾装卸，调度作业等先进经验。推广先进经验时应考虑到经济效果，并与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密切结合起来。

(2) 奖励和宣传模范事迹，使群众有所表率。现在许多先进事迹常常被埋没了，处罚责备落后的多，鼓励表扬先进的少，结果正气不伸，缺乏蓬勃前进的活力，这是必须纠正的。

(3) 经常召开船长、引水、协理员等座谈会，倾听技术人员

和基层干部的意见。

(4) 关心群众的生活，学习万县港长访问职工家庭，深入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的精神，用各种办法来解决职工的住宿问题，如盖宿舍，贷款给职工修理自有房屋，建设船员旅馆，“船员之家”等等。

(5) 做好工资改革工作。工资问题关系到每个职工切身利益，做好这一工作能刺激职工生产热情，鼓励职工钻研业务，提高技术，否则将起到相反作用，影响生产。

第五，必须提倡钻研业务的风气，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同志都要学习业务。航运工作是复杂的，不熟悉业务，各种问题就得不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思想不一致，语言不一致，结果就必然陷于空谈争论和一般化领导，工作越搞越乱。有些人认为钻研业务就是单纯业务观点，这是不对的，因为钻研业务搞好生产恰恰是党对企业的政治要求。自然，单纯管业务而不问政治是错误的，但是，单纯管政治脱离企业中当前的业务问题或是只做一般的政治思想工作，而不能结合本企业具体的政治思想问题，这样的政治工作亦是空洞的，抽象的，不能推动企业前进的。政治工作既要推动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又要推动大家学习业务。在长江航运局要掀起一个学习业务的热潮，要求目前尚不熟悉业务的同志在半年到一二年内成为本部门工作的内行。我们已向长江航运工作的同志提出了这样要求，我们在交通部工作的同志们，更应当首先成为内行和专家，否则，我们必然无法正确领导长江航运和各部门的工作。

这次我们去长江共有二个半月，虽然所有去的同志都尽到很大的努力，但长江的业务复杂、庞大，我们在工作中感觉到了解的情况尚不深不透，因而有些问题提得还不一定恰当，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以便由部领导进行研究。

积极发展我国的远洋航运事业¹

(1956年10月31日)

我国不只是一个大陆国家，而且是一个海洋国家，海岸线长达1.1万余公里。现在年吞吐量200万吨以上的港口有6个，50万吨以上的有10个，3万吨以上的有60个；绝大部份的港口终年不冻。正如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上所说的：我国“有很长的海洋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远洋航运虽然一直是处在美帝国主义封锁禁运和台湾蒋匪骚扰截劫的威胁之下，遭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我国对外贸易物资中，通过海上运输的数量，仍占很大的比重。1954年，全国进出口物资总计938万吨，其中通过海上运输的数量即达434万吨，占全部进出口物资总数的46%。1956年，据对外贸易部初步计划，全国进出口物资将增至1506万吨，其中通过海上运输的数量将达809万吨，占全部进出口物资总数的54%。

1954年到1956年三年内的出口物资，海运部份增加了375万吨，即将近增加一倍；海运占整个进出口货物运量的比重，由46%提升到54%。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的进展，对亚非国家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量必然要增加，对新民主主义各国的进出口量亦将增加，而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只能经过海运，或以海运为合算。仅以保守

¹这是朱理治为中共交通部党组起草的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标题为编者所加。

的估计，每年递增8%，则1962年的远洋运量约1200万吨（其中进口300万吨，出口900万吨）。假定每种货物的平均运距为5000里，则进出口的海运周转量为600亿吨里。如以进口物资全部自运，出口物资运送一部份计算，则需自运600万吨、300亿吨哩。每万吨海轮的年生产量以7.5万吨、3.7亿万吨哩计，则需要80万吨海轮，才能担负起这项运输任务。

我国海运发展的广阔前途，不只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亦看到了这种趋势。除了已有197家资本主义国家的航运公司的船舶委托我国外轮代理公司代理一般进出口业务外，其中尚有班轮公司21家，由我们长期代理并配载。包括英商太古、蓝烟囱等班轮公司，最近又纷纷表示要和我国进一步联系，芬兰、瑞典的航业界提出要与我国组织合营的轮船公司，比利时一家轮船公司曾再三要求我国派实习生去实习。苏新国家^①除苏联、波兰、捷克和我建有航运合作关系外，最近越南又要求和我订立航运协定，南斯拉夫亦表示愿意租船给我。

目前，我国海运进出口物资中，通过苏新国家船舶运输的只占了一小部分。根据1954年海运总局的统计，通过海运进出口数量的434万吨物资中，利用兄弟国家及本国船舶运输的只120余万吨，其中苏联船运了48万吨，挂波兰旗的船运了78万吨，其余300余万吨都是由资本主义国家船舶运输的。我国现有远洋轮船在中波公司合营的有6艘，委托捷克经营的有2艘，合计仅有8艘，约7.5万载重吨，全年最高运量仅40万吨，而每100万吨进出口物资，如委托资本主义国家船舶承运，所需运费即达3000万美元，以其价值可在国际市场购买万吨级五成新货轮20艘，每年即可担负140万吨进出口物资的运输。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船舶由于受美帝直接操纵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限制，

^①苏新国家，指原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

不为我国运输战略物资，如我不积极发展远洋海运，必受制于帝国主义。

因此，积极地发展我国的远洋航运事业，就成为交通部门今后的主要任务之一。

由于美蒋反动派盘踞台湾，对我航运进行破坏，由于美帝对我实行禁运政策，由于我国海军力量尚较薄弱，加之我国远洋航运没有基础，故远洋运输目前基本上不能采用公开挂本国旗帜独立经营的方式，而必须采用和兄弟国家合营为主的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

目前最适合并能起作用的方法是采用和兄弟国家合营的方法。1951年，经过毛主席的批准成立了中波轮船公司。由于中波两国特别是波兰政府和职工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1951年起至1955年上半年止，已经运了170万吨货物。我国对外贸易中，凡换到的各种禁运物资，资本主义船只都拒绝承运，因有了中波公司，均集中到波兰港口，由中波公司承运到中国。这对中国经济建设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由于公司水平不断提高，成本日益降低，在这个基础上四次降低了运价，现在运价已经降低到国际市价水平。五年的盈余共计5000多万卢布，再加上今后八年的利润，估计可购到新旧远洋船28艘。到1962年，该公司可有船40万吨。由于采用了合营形式，中国方面从中训练了一批远洋船员和管理干部，现在合计约200人，到1962年可为我国训练1300人。美蒋反动派虽采用各种方法恫吓破坏，甚至于采用海盗方式劫夺船只，但由于两国政府和职工英勇顽强的斗争，故中波公司的业务仍然在日益前进着。

从中波公司五年来经营的结果看，采用这种方式，在目前国际环境下是恰当的，并且是很有利的。所以我们应当更密切地和波兰合作，搞好和扩大这个公司。

但是，和别国合营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首先，合营的对象

应当是一个兄弟国家至少是一个友好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航业公司，如瑞典垄断商别伏林公司（航运部），因并不代表政府，他们国家亦未出面经外交途径提出，仅由私人资本家公司提出和我合营，合营以后其政府不受约束，将来扯皮之事难于解决。故拟再进一步了解情况，审慎处理之。

除了上述的条件之外，合营对象的国家必须要有港口，自己经营船舶，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

适合上面这些条件的，除波兰外，最好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现有远洋船舶 21 万吨，有港口可为东欧民主国家转运物资，并已有定期班轮航行到香港。假如能建立中南合营公司，对地中海航线和黑海航线的开辟将大有帮助，对我国做南斯拉夫工作亦会有帮助。今后捷克、匈牙利等国货物可以改由南斯拉夫港口出口，比之从波兰港口出口可节省 10 天航程，亦可繁荣南国港口，发展南国航运。我们拟经由对外贸易途径征询南国意见，如他们愿意这样做，我们认为建立一个中波公司形式的中南公司，于我国、于南斯拉夫、于整个苏新国家均有很多好处。在合营时亦拟采用中波合作方式，在目前环境下，暂先只挂南国旗帜，保守严格秘密，并在华南港口装卸。这样，于南国国际处境亦不至发生多少困难。

第二种经营形式是挂中国旗帜，自己经营。这种形式，目前只能在中越航线上采用。从今年 3 月起，我国已有 5 艘船悬挂我国国旗，航行于广州越南间，运送了 3 万余吨货物。另外我国已从华南海运局发给越南拖轮一艘、驳船两艘，并再拟拨给越南沿海货轮一艘，并派出干部帮助越南建立航运机构。如越南认为单独经营有困难，提出要与我合营时，亦拟采用合营方式。这样可能更易于帮助他们训练干部。

只要海面情况搞清，航行安全有了保证，这种挂本国旗帜独立经营的方式可推广到东南亚及印度航线。目前，中国现有船舶

及今后增加的沿海航船中，适合于这些航线的为数不少。

第三种经营形式，即挂新民主主义国家旗帜，而实质由我国来经营。如采用挂捷克旗帜，并由捷克外贸部运输司下的运输部根据我们的意图进行营运。现在，我国有两艘远洋轮船是采用这种形式经营的，从1954年2月到目前共运了5万多吨货物。这种经营的优点，较之合营更便于我国的调动。但其弱点是，捷克非海洋国，既无港口又无船员，不得不借用波兰港口和波兰船员，同时，捷克也没有经营管理之机构进行管理。为着保密起见，我们一切指示必须通过捷克，故经营管理亦甚困难。但中捷这种合作形式，目前对我是有用的，故应设法加以巩固及改进；因合作中存在着如上所述许多困难，故目前尚不宜作大的发展。如将来波兰和南斯拉夫愿意代营，将比委托捷克代营要便利的多。因他们有港口，有船员，有管理机构及经验。故拟于适当时机征询波、南意见。

第四种经营形式，即挂英国旗帜，而实际上一切为我国经营管理。根据外贸部在香港华夏公司经营的结果，困难亦多，故已准备结束。

第五种经营形式，是租用资本主义国家船舶。1954年即租用了外轮85万载重吨。这种形式现在可用，将来亦可应用。但因，一、不能运我战略物资，二、要付出很多外汇，故仍以尽可能少用为好。

根据上述分析，目前国外航运经营形式以合营为主，委托经营为辅，在条件具备情况下进行自营。

为了做好目前的国外航运工作并为将来远洋航运发展打下基础，必须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一、积极扩大远洋运输船舶吨位。

前面报告中已说到1962年我国对外贸易需要有80万吨远洋船才能满足需要。但因为台湾到时尚未解放，我航行仍有困难、

同时，国家投资有限，故拟暂定到1962年底止建设50万吨的远洋船舶。如将来台湾解放，则再扩大计划。

中波公司自1951年成立以来，由国家投资及公司盈余款项所赚卖的船舶，至1954年底已有12艘，共12万载重吨。根据最近举行的股东会议初步计算，1954年底公司尚结存4300万卢布；自1955年至1962年8年间，预计每年平均利润及折旧1000万卢布，可得8000万卢布；再加上两国政府投资余额2800万卢布，三项合计1.5亿卢布，可以购新旧万吨级远洋船舶28艘，约载重吨28万吨。所以至1962年底中波航运协定期满之日，亦即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期，预计中波公司将拥有远洋船舶40万吨，我国占半数，可有20万吨。

除投资中波公司的船舶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批准我部向国外购买和订造远洋船舶4.2万吨。现已购得货轮二艘计1.5万吨，交捷克代营。另在东德订购万吨新船二只，不久即将建成。其余也预计能按计划完成。最近国家为了增加航运力量，平衡与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贸易外汇，又批准我部增加计划外投资1.8亿万元订购船舶和机械设备，其中有远洋货船一艘，载重1万吨。故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除中波公司合营船舶以外，我尚可有5万吨远洋船。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在草拟中，据初步核算，拟由国家投资增购远洋船舶25万吨。故1962年底，我国将有远洋船舶50万吨。其中20万吨合营于中波公司，其他拟分别和南斯拉夫合营，或托捷、波、南代营，或采用完全自营形式。

另外，我国沿海船舶在两个五年计划内亦将大量增加。目前，连公私合营在内共有18万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将增到24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将增到40万吨。如远洋船舶不够，估计其中至少有10万吨可以附带担任东南亚、日本、朝鲜和中国国际间的航运任务。

为了集中力量制造海军用船及沿海、内河用船，第二个五年计划前，国内机械工业部门将不制造远洋船舶。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增添的 25 万吨远洋船舶，拟订购新船 20 万吨，买旧船 5 万吨。新订购之 20 万吨船，拟全部向东欧波、德、南三国订购。这些国家造船能力有余，我国外汇又有多余，故向他们订造 20 万吨远洋船舶，不只可能，而且有必要。

二、培养和训练远洋航运干部。

建立 50 万吨船舶的远洋航运事业，约需 400 名高级船员，500 名机关职员，2400 百名普通船员。这批船员的数量虽不大，但正如周总理所正确指示的：“远洋航运是国际间政治、经济斗争的一部分，中国过去对此没有经验。”故这批人员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质量，有丰富的国际知识，有熟练的远洋航海技术。培养这批干部拟采用如下方法：

1、利用中波、中捷航运合作方法，积极派职工去工作，从工作中学习。派出的职工应选调最优秀的干部和工人。

2、整顿和加强本部唯一培养高级船员和管理干部的高等学校（大连海运学院），根据沿海和远洋船舶迅速增加对技术和业务干部需要的情况，重新研究和制定发展大连海运学院的计划；严格入学学生的审查，保证学生政治质量和身体条件符合于海上运输工作的需要；继续改进教学质量，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毕业生的政治和业务水平。

3、由海运管理总局和海运各区管理局举办各种专业的技术学校和训练班，训练普通船员和港湾技术工人。现已经有 600 人在学习。学员的来源除由本部系统的编余工人中选调政治上纯洁可靠者外，还准备尽量吸收愿意上船工作的复员和转业军人，首先是海军的复员军人，加以训练，以期改变今后船员的成份。

4、在各地党委直接领导下，通过此次肃反运动，将现有船员作一次审查和清理，将其中不可靠的分子调离海船和远洋航运

机关。

5. 加强对在职干部、船员业余学习的领导，不断的提高他们政治和业务技术水平，有计划地进行培养和提拔工作。

干部问题是当前最困难的问题，干部培养是发展远洋运输中一项复杂和繁重的任务，同时对今后发展远洋航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将这项工作做好。

三、建立和健全有关远洋航运的组织机构。

1. 加强远洋处，配备领导干部，充实政治、业务较强的骨干。该处目前应受海运总局并同时直接受交通部领导，负责管理我国远洋船舶，指导中波公司业务和领导全国外轮代理机构。

2. 成立船舶登记局，加强我国船舶技术状况的监督和检查，以保证船舶航行安全。远洋船舶必须备有国际上承认的船舶登记证件，才能进出各国港口，因此船舶登记局的成立并建立正常的工作，是开展我国远洋航运的先决条件。

3. 加强外轮代理公司及海港监督的组织机构，适当调整干部，逐步改变目前这二个部门内领导力量薄弱和成员政治上复杂的情况，以加强对远洋运输船舶业务管理和行政监督的工作。

四、改善与远洋运输有关的技术设备。

1. 根据对外贸易发展，物资进出口的需要，除按国家计划修建江海港外，尚须有计划地整顿其他沿海港湾，扩建码头、仓库，增加港湾机械设备，加速装卸效能，提高港口的通过能力。

2. 经常疏浚和维护航道，保持航道水域一定的深度，这是交通部的责任。同时要在沿海主要航道附近的滩险、礁石处，增加必要的灯塔、航标和雾炮、雾号等设备，根据业务分工，这应当是海军司令部的责任。

3. 在我国沿海建立船舶失事的救护网，划分一定区域，配置专门的救护船只，以及时救援遇难船舶。最近苏联提议召开中、苏、朝三国海上救护会议，我国已表示赞同，并拟从中学习。

五、加强航线安全。

自工作号油轮和哥德瓦尔德号货轮先后在台湾海峡被美蒋匪帮劫夺后，我国政府即正确的决定了，凡我兄弟国家在欧洲至中国航线上的船舶，均改在黄埔港装卸；自榆林到黄埔一段，由我国海军护航。一年来，由于海军的努力，确保了航行安全。波兰航运部长曾为此在中波公司第二次股东会上，代表波政府向我政府及海军表示感谢。最近海军决定改变办法，由舰艇伴随护航和派出护航组随船，用加强海面巡逻和岸边警戒的方法来保护远洋船舶，现正试行中。目前，海军司令部正积极建设琼西航线，不久即将通航，这条航线开辟后，航行将更加安全。但因美蒋反动派正极力设法破坏我国远洋航运，故仍需提高警惕，严防敌人各种破坏的可能。今后不论船只走琼东航线或琼西航线，以及海军护航采取何种方式，我部加强与海军联系，争取海军对海上船舶的保护，都应建立经常的制度，这将是开展远洋航运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此外，为了开展远洋航运工作，还必须大量搜集国际航运资料，通过各国航运报刊、杂志、书籍等了解有关国家的港湾、码头、仓库、船舶、经营管理、海损事故等情况，以及国际市场的船价运价，加以分析研究，并配合我国外事上的政治、经济活动，制订一定时期内远洋运输的经营方针，使远洋航运真正成为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

交通部 1956 年直属航运工作总结 与 1957 年的工作部署^①

(1957 年 3 月 23 日)

第一部分 1956 年工作总结

1956 年由于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胜利，各项经济建设规模有了巨大的增长，国民经济发展空前高涨，全国物资交流相应地扩大，对直属航运企业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运物资大大增加，货物品种、流向发生很大变化。因此，1956 年各直属航运企业的计划任务是很紧张的。

一年来，计划执行的结果如下：

中央直属内河货运量完成年计划 106.76%，较上年增长 28.32%，货运周转量完成年计划 92.8%，较上年增长 23.19%；直属沿海货运量完成年计划 102.7%，较上年增长 26.60%，货运周转量完成年计划 101.2%，较上年增长 22.26%。客运方面，内河客运量完成年计划 110.77%，较上年增长 18.75%，客运周转量完成年计划 115.81%，较上年增长 22.82%；沿海客运量完成年计划 98.30%，较上年增长 12.79%，客运周转量完成年计划 100.59%，较上年增长 16.33%。1956 年直属河、海客货运量增长速度很快，基本上完成了国家所交给的运输任务，除内河货运周转量、沿海客运量未达到计划指标外，均超额完成了计

^①这是朱理治在交通部直属航运企业局长会议上的报告。1957 年 4 月 29 日交通部正式下发贯彻执行。

划。长江客运已提前一年达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1957 年的水平。沿海六大港完成年计划 100.4%，较 1955 年增长 21.9%，其中大连、秦皇岛、青岛、天津四港已提前一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吞吐任务。

一年来，在经营管理方面亦有一定的改进。沿海海损事故大为减少，恶性事故没有发生，华南沿海有五个月没有发生海损事故；江运货损货差也有改进，运输质量有所提高；内河推广了顶推运输，安装了导流管，长江每马力拖载量超过计划 26.37%；长江换拖不换驳的比重较上年（1955 年）提高 1.8 倍；同时还开辟了江海连汉直达运输。沿海六大港劳动生产率较上年提高 16.7%，长江运输劳动生产率也较上年提高 9.8%，河海运输单位成本较上年降低 8.3%。

1956 年国家对于航运事业增加了投资。新增船舶 141 艘（620 客位，101970 吨，20516 马力）；新建湛江港第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并开始利用，恢复了青岛、烟台、上海等港六处码头，对其他港口也增添了部分小型机械设备；川江整治了主要滩险，增设了夜航灯标，对船舶航行安全和任务的完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还继续进行了肃反工作，基本上纯洁了航运职工的队伍；对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经济改组，进一步发挥了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积极性和船舶等生产设备的效能；进行了工资改革，建筑了职工宿舍 13 万余平方公尺，相当地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鼓舞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去年在全体职工中掀起了以安全生产、提高质量为中心的先进生产者运动，总结和推广了各项先进经验，出现了大批先进生产单位和先进生产者，对去年生产任务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上述成绩的取得是由于广大职工在中央领导下，开展了反右倾保守主义，并在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号召下，辛勤劳动、积极工作所获得的结果。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必须给以足

够的估计。

但 1956 年的工作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

一、货物积压，主要港口发生几次严重堵塞，引起运输秩序混乱，运力损失很大，对运输任务的完成有很大影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造成一些损失。上海、汉口、宜昌等港有几万吨物资长期积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矿生产、基本建设的进行和人民生活需要。

二、运输生产计划没有全面完成。内河货运周转量只完成计划的 92.8%，川江运输任务也没有全部完成；沿海客运量只完成计划 98.3%，货运周转量如扣除租用外轮所完成的运输任务，亦没有完成计划。船舶工作效率测标，除个别的超过计划外，其余均未完成计划，上海海运局每吨船年产量只完成计划 93.1%，广州海运局完成计划 93.9%，长江驳船每吨船年产量低于 1955 年水平（为 1955 年的 94.01%）。

三、海损事故在长江方面仍然严重，货损货差事故在沿海方面有增加的趋势，工作伤亡事故增加。长江去年死人、沉船事件仍然不断发生，在上半年尤为严重，全年直接损失 291 万元，较 1955 年增加 25.12%；沿海去年货损货差共发生 4146 件，较 1955 年增加 782 件，增长率 23.2%，赔偿金额 135764 元，较 1955 年增加 52287 元，增长率 62.6%；工伤故事的件数和负伤频率较 1955 年增加，特别是工人落水死亡事故不断发生，应引起充分注意。

四、成本财务和劳动生产率指标没有完成计划。海河运输 1956 年度成本降低率未完成计划，其中河运方面单位成本为计划的 103%，海运方面单位成本为计划的 104.4%，沿海六大港装卸单位成本为计划的 112.1%（只有秦皇岛和青岛港较计划降低 12.3% 和 4.1%）。职工人数大大超过计划，机构臃肿庞大，

人浮于事，管理费用增加，在成本中所占比重大为提高，上海海运局管理人员为航行人员的 23.7%，长江管理费用占成本的比重由 1955 年的 5.8% 提高到 6.8%。海河运输企业财务上缴任务只完成计划的 96%。

五、客运不能适应客观需要，服务态度不好，船期不准，旅客时有积压，各方责难很多。

六、基本建设仅完成计划的 83.1%，动用的固定资产计划仅完成 59.3%，投资效果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这些缺点，虽然在客观上是由于主要航线、特种船舶和客轮不足，港口设备较差，对工作有所影响，但主要还是水运企业的经营管理在 1956 年改进不大，问题很多，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分析其原因在于：

一、对客货运量的巨大增长，货物品种流量流向的变化情况估计不足，计划管理水平没有相应的提高，运输组织管理没有相应的改进，造成港口堵塞，使运力损失很大。

1. 年度计划对运输生产任务与港口通过能力之间没有进行细致的计算平衡，工班效率订的偏高，因此第一季度有些港口减少了工人，随后又不得不增加。季度、月度计划也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货、船、港之间进行平衡与调整，和铁路、外贸计划衔接得不好。月、季计划机械地强调月保季、季保年的原则，而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给以必要的调整。特别是在制订计划时没有着重规定实现计划的具体有效措施，致月计划长期不能完成。

2. 运输组织管理混乱。长江长航船舶下放分局，打乱了原有的制度，使调度指挥不灵，互相牵扯，影响船舶效率降低。调度质量不高，对计划执行发生的新问题，出现新的不平衡情况，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调度会议流于形式，对当前生产问题解决的差。调度部门对港口的能力考虑得不够，到发船忽多忽少，给港口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

3.港口工作与任务的巨大增长不适应。对港口通过能力心中无数，对生产情况未能及时掌握，作业计划质量低，现场管理薄弱，配工不当，窝工待时，加班加点多，仓库堆场周转慢，费率不合理，机械利用率低，装卸工人缺勤情况严重。此外，对港口建设重视不够，缺少全面规划，港口投资使用不恰当，对原有港口投资较少，设备未得到应有的改善，使港口通过能力的提高受到一定的影响。与铁路、货主码头、市内搬运、外贸等方面的关系长期未得到解决，对港口工作也造成一定的困难。

二、技术管理薄弱

1、对船舶技术性能缺乏科学的查定，不适当的强调多拖多载，是海损机损事故增多的重要原因。

2、修船工作为运输服务的方针贯彻不够，任务安排不妥善，造船比重过大，有单纯追求总产值的偏向，对修船质量与时间注意不够，维修保养、预防检查制度未能认真贯彻。修理单不准确，加帐多，不按时进厂，也使船厂的工作安排发生一定的困难。

3、港口机械损坏多，主要是维修保养差，工人操作技术不熟练，配件未及时解决，对机械的增添使用缺少通盘规划，机型杂乱，使用效率不高。此外，港口机械技术人员缺乏也必须加以解决。

4、对船员的技术教育培养注意不够，调配混乱，使用不当，指导船长、轮机长制度尚未普遍建立，船员技术水平的提高不能适应航运发展的需要。

5、先进生产经验和合理化建议的研究与推广等，都缺乏专人负责与具体领导，船舶的技术改造和船型研究也抓的晚了一步，对顶推运输中的技术问题及有关设备未及时解决。

三、经济核算制度没有认真贯彻，特别是没有建立起正确的经济核算思想。经济核算应在国家统一的计划下进行，我们既要

反对只从本单位的利益出发，不顾及国家整体利益的作法，同时也要反对只顾完成生产任务而不进行经济核算的作法。这两种偏向，各单位都曾发生过。1956年年初盲目地减少装卸工人，以后又盲目扩大编制，不少单位机构重迭庞大，管理费用增加很多，对人员增加控制不严。原材料管理制度不健全，只发放、不检查、不收回，大材不用，优材劣用，物资积压和浪费现象严重，对旧料废料利用也很不够。财务收支监督不严，错收、漏收的情况不断发生，非生产性开支过大，铺张浪费现象渐趋抬头，有些会议过分的注意形式，化钱过多，印刷费、办公费、电报、电话费等都有浪费。固定资产管理不善，生产工具设备未及时进行合理调配，效能未能充分发挥。这些问题的产生，说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只顾完成生产计划，而忽视了降低成本，为国家积累资金。我们还没有把推行经济核算，当作争取全面地完成计划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方法，例如，已经实行的决算审查办法，很多单位都没有继续进行。去年沿海和内河许多企业在经济核算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得到领导上的重视和支持，经济核算实行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没有解决，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个别的领导同志不知道自己企业的家底，不知道上季度或上年度的盈亏，甚至还弄不清楚自己的企业有没有实行经济核算制。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进。

四、各级领导对基本建设工作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是基本建设计划完成不好的主要原因。

1、计划的制定从需要考虑的多，对可能考虑不够，特别是对物资材料设备缺乏的情况估计不足，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以致有些工程项目不得不中途改变或是形成停工待料。500马力拖轮，设计有若干问题尚未解决，即企图大批制造，结果只试制了一艘，使计划落空。

2、缺乏全面规划与局部技术改造相结合的思想与具体实施

方案，影响设计任务书的提出与设计的进行，有些设计任务书根据不足，影响设计的质量与进度，如上半年计划开工 285 项单位工程，因无设计不能开工者即有 61 项，延期开工则更多。

3、好大喜新，标准偏高，如有些客货轮的改建，化钱过多，仓容使用率很低，床位少，但其他生活附属设备占的面积过多；住宅的造价有的偏高。

4、对港口的建设方针缺乏研究，对原有港口尤其是内河港口（如重庆等）的改建扩建重视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今年生产任务的完成。四年来，内河港口投资只完成计划 76%，基建投资未完成的有 1000 余万元，这批投资如能很好利用，也可解决不少问题。此外，在港口建设中，对花钱不多收效较大的设备增添和工具的改良注意不够，或者是要求不够现实，使投资计划不能完成。

5、对基建的技术领导及施工质量的技术监督注意不够，返工浪费现象不断发生。

6、对基建计划与设计文件的审批手续的规定有过死过严的缺点，设计文件报的迟批的慢，今后需要加以适当改变。

五、在体制及组织机构方面的变动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考虑不周，如长江航运局设置武汉分局，长航船舶分三段交分局管理，在运输组织调度方面曾造成了一些混乱；成立上海区局，亦未达到在一个航区内港航统一管理的目的；船厂统上又交下，航道亦曾准备统一直接管理；以及部内机构变动后，由于分工过细解决问题不及时等，对工作的安排与任务的完成都有一定的影响。

所有以上这些问题、缺点和错误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交通部领导上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我们对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性的问题，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全面地仔细分析客观实际情况进行处理不够，因而有些决定带有很大的主

观片面性。去年在编制计划和安排工作上，对有利因素估计过多，对不利因素估计较少，反对了右倾保守，却又滋长了盲目冒进情绪。在1956年全国航运会议上，有些指标订得偏高，规定得过死，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可能性。另一方面，对客观情况的发展认识不足，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新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思想落后于实际。在运价政策上，也缺乏全面的研究，对航运运价的降低，要求过急。公私合营的经济改组，对政策性、复杂性认识不够，有急躁情绪。体制机构和分工关系的改变，未经充分研究，决定不够慎重，使工作受了影响。

我们航运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在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方面也做得很差。首先，领导干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很好开展，有的单位领导干部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对重大问题相互协商的精神差，集体领导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次，依靠群众办好企业的思想还不够明确，若干重大的措施决定，没有认真征求群众意见，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虚心考虑不够，问题决定以后又很少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说服教育工作。过去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强调要求保证完成任务是对的，但倾听群众意见很差。对职工的全理化建议、劳动竞赛、先进经验的推广，领导和支持也很不够。此外，我们领导上不深入下层，不深入现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情况也相当严重。领导干部经常忙于开会、签批公文，处理事务性的工作多，研究和解决关键性问题少，工作抓不住中心，任务布置多、检查少，缺乏深入、细致、踏实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

一年来，对职工群众的文化、业务教育较注意，这是好的，但忽视了思想工作，对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动所引起的职工群众思想变化注意不够。在改善职工生活福利的宣传方面，有片面性，对勤俭建国，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宣传的不够，因而在一部分干部和工人群众中又产生了一定的贪图享受，对物质生活要求过

高的思想，闹名誉，闹地位的个人主义思想又有滋长。有些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不够，有些应该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群众生活福利问题，长期拖延，未能解决；对有些目前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又没有进行很好的解释说服，因而个别地方发生工人闹事事件。

这些都说明我们各级领导，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指示体会不深，理论学习抓得不紧，因而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不高，必须改进。

第二部分 1957年的工作部署

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出发点，必须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正确贯彻八大和二中全会的精神以及中央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航运部门各直属企业1957年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广泛开展全面、深入、持久的增产节约运动，扩大运输能力，提高运输质量，确保安全，力争超额完成1957年计划任务，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较好的基础。

交通部直属航运1957年的计划任务如下：

运输方面

项 目	运量(万吨、万人)	为 1956 年预计%	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1957 年计划的%	周转量 亿吨、人公里	为 1956 年预计%	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1957 年计划的%	
货 运	3343.3	108.9	110.4	261.81	111.7	103.9	
其 中	河 运	2285.2	110.8	111.1	112.13	112.1	93.1
	海运	1029.2	105.2	110.4	48.15	104.5	102.0
	远 洋	28.9	96.0	75.3	32.63	123.6	137.0
客 运	1683.2	102.2	100.9	23.2	98.9	100.8	
其 中	河 运	1566.4	102.3	103.0	19.8	97.6	106.4
	海 运	116.8	101.1	79.5	1.8	107.0	77.2

沿海六大港吞吐量

项 目	1957 年计划(万吨)	为 1956 年预计%
吞吐量总计	3343	106.4
大 连	590	113.8
泰 皇 岛	285	100
天 津	285	103.5
青 岛	238	97.7
上 海	1578.5	109.4
广 州	366.5	97.5

服务方面

项 目	利 润 (万元)	为 1956 年 实际的%	折 旧 (万元)	为 1956 年 实际的%	
基本业务	10221	102.79	2877	106.41	
其中	河 运 (不包括珠江)	4914	123.60	1527	105.92
	海 运	2370	107.32	446	115.98
	海 港	2937	78.13	904	103.04
附属工业	624	63.78	295	112.14	
航务工业 包工企业	98	85.10	70	140.93	
附属企业 及其他	-70		115		
合 计	10874	97.90	3357	107.65	

1957 年利润折旧合计为 14231 万元，减除企业奖励基金和支体私股股息，实际上缴数为 13579 万元。

基本建设方面

航务总投资 21712.9 万元，为 1956 年的 107.5%。五年合计

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109.0%。内河 7298 万元，其中长江 6116.8 万元；新增船舶 54 艘，1500 客位，32600 吨，24500 马力；港口投资 1489.6 万元，如包括裕溪口则为 2129.6 万元，占长江投资的 30.4%，重点是重庆、汉口等港口的技术改造，增添设备。海运投资 9966 万元；新增船舶 24 艘，222 人，76966 吨；海港投资占海运投资 16%，如包括湛江则为 30.8%。新建宿舍约 28 万平方公尺。

劳动工资

河海运输职工总数计划 150695 人，为 1956 年的 121.8%，到年末比 1956 年底增加 12656 人，主要是增加航行人员 4061 人，装卸工人 8968 人。平均工资 914.4 元，为 1956 年 101%；劳动生产率，海运每一航行人员提高 3.6%，内河降低 5.2%（主要是由于增加公休天数，使人员增加较多，如不增公休，长江劳动生产率可提高 2.6%）。沿海六大港每一装卸工人年产量，比 1956 年降低 2.7%（主要是根据不平衡系数增加后备力量）。

修 船

修船企业总产值 7180.4 万元（不变价格），为 1956 年的 99.2%，其中造船占 26.96%，修船占 62.1%；1957 年共修船 886 艘，其中基修 18 艘，大修 112 艘，中修 182 艘，小修 574 艘。商品价值 9749.4 万元，为 1956 年的 151.6%。

运输成本

交通部水运企业的运输成本较 1956 年降低 2.5% (不包括珠江在内)。河运单位成本 10.82 元, 降低率 3.5%, 其中长江单位成本 10.7 元, 降低率 3.3%; 海运单位成本 12.03%, 降低率 0.4%, 其中上海海运局单位成本 10.38 元, 降低率 2%。沿海六大港装卸单位成本 772.50 元, 提高 0.5%。

为了坚决贯彻以上方针, 争取超额完成 1957 年的计划, 提出如下主要措施:

一、全面加强计划平衡工作, 整顿运输的组织管理与改进船舶调度, 统筹合理安排运力, 发掘潜在力量, 减少运力损失, 最大限度的满足客货运输的要求。

(1) 加强川江的运输, 力争多运川粮、矿砂、钢材及其他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需的重要物资。

(2) 长江应将长航船舶由区局统一调度, 尽可能的组织直达运输, 继续扩大换拖不换驳的数量, 以减少转口, 减少汉口、宜昌等港的压力。

(3) 克服运输秩序的混乱现象, 逐步推行定船、定线和定货、定港的措施。扩大运行图的执行范围, 尽量提高船舶到港的均衡性与准确性, 大力缩短船舶在港非生产停泊时间。

(4) 加强客运的组织管理, 改进服务态度, 实行客船的定线定班定时运行, 增添必须的安全设备, 改进售票工作, 作好清洁卫生工作, 尽一切努力改变旅客积压情况。客运工作特别要注意保证旅客的安全。准备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解决有关问题。

(5) 在运输计划的安排上, 应与地方密切联系配合, 注意充分利用地方运力。

(6) 改进目前航运局船舶没有专职部门进行管理的情况, 研究与确定船舶管理体制与办法。

实现以上措施的关键是全面改进与提高我们计划管理的水平。各种计划的制定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和既积极又可靠的原则，将船、港、厂、货进行全面平衡，并及时深入的进行检查，随时发现薄弱环节与发生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的不平衡情况，即时加以调整解决。因此，必须加强调度工作，每日的调度会议必须由业务副局长、副港长亲自主持，认真开好；旬度月度的计划会议必须由局长、港长亲自主持，不仅检查任务的完成情况，还必须检查研究运输生产的秩序，调整航行密度，使各方面的工作协调配合，进一步的提高计划运输、合理运输。

二、努力改进港口工作，是完成今年任务的关键，必须提高港口通过能力，预防堵塞，大力缩短船舶在港停泊时间，尤应注意缩短非生产性停泊，加速船舶周转。

(1) 加强月度计划与作业计划，掌握到港的船数、货物数量及品种，如发现超过该港的装卸吞吐能力时，必须预先采取预防措施。各港应事先与各拥有搬运能力的机关取得联系与协议，以便发现堵塞时，迅速的及时的取得他们的支持，防止及解除堵塞。

(2) 加强现场管理，开展劳动竞赛，推广先进操作经验，提高装卸效率，扩大昼夜装卸计划范围，减少工人待时，提高工时利用率，注意驳船在港调度组织工作，缩短船舶在港总停泊时间及非生产停泊时间。

(3) 加强港作船舶与装卸机械设备的修理养护工作，减少机械故障，缩短修理时间，合理进行调度，提高使用效率。

(4) 加速码头、仓库、堆场周转，缩短堆存天数，应对堆存费率进行适当的调整。加强码头仓库道路的维修保养，并设法进行改造，以便于进行装卸作业。

(5) 与铁道部共同制定水陆联运办法，试办和逐步扩大水陆

联运范围，各港必须与各物资部门配合协作，共同做好这一工作。

(6) 大力解决可能解决的外部关系：1、首先要解决与铁路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密切车船的配合，作到在主要港口大宗物资的调运计划上下统一，互相衔接。2、对货主码头，应签订船舶停泊时间定额合同，以加速船舶周转。3、贯彻执行前政务院1954年1月公布的海港管理暂行条例，逐步收回出租的仓库货场。4、逐步改进与物资部门的关系，贯彻托运计划的规定。5、加强与外贸部的联系，掌握国际船舶到港情况，合理的调剂各港到船密度。

为了改进港口工作，适应运输的要求，决定于第二季度召开一次港口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的加以解决。

三、加强技术管理，确保安全生产。

海损与机损事故是最大浪费，保证船舶性能良好，消灭重大的海损事故是最大的增产与节约，因此，各级领导必须重视与加强技术管理工作。

(1) 总结安全驾驶操作的经验，建立和健全指导船长、轮机长制度，提高船员技术水平，尤其对新船员应注意培养。制订防台（风）防雾安全航行的规则。有重点的审定船舶技术定额，特别着重制定川江各类船舶在各种水位拖驳载量和数量的定额，严禁盲目超载。

(2) 加强水上秩序特别是滩险和港湾航行秩序的管理，是减少海损事故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今年应制定和试行川江滩险航行规则草案。对木帆船必须依靠地方，通过合作社进行管理，要求装载有定额，驾驶懂航章，船上有灯号。

(3) 加强船员的管理，修改船员考试办法及船员职务规则。各航运局应加强对船员的管理和教育，解决他们的问题，并尽量

减少船员的调动，如必须调到新船新线时应该经过一个熟悉新船新线的准备阶段。要推行船舶安全航行和机器安全运转的竞赛，及时总结经验，掌握环节，采取预防措施，积极防止海损与机务事故的发生。

(4) 在船舶技术管理方面应明确贯彻以预防为主方针，切实加强预防检查制度和维修保养工作。切实掌握船舶的技术状况，机务部门应协助船员提高修理单的质量，及时作好其他技术工作。调度部门应保证船舶按时入厂，船厂应保证按时出厂，提高修船质量，并推行定厂保修，预制配件等办法，尽量缩短修船期限。

(5) 继续研究与确定上次技术座谈会提出的方案，并制定1957年技术改造计划，贯彻执行。

(6) 改进现有船舶的技术性能，继续安装导流管和各种顶推设备，进一步解决和改善顶推技术方面的问题，扩大顶推运输方法。对已购到的雷达应当有计划的安装，在安装过程中培养安装检修人员。

(7) 加强对港湾机械的技术管理，推行三级保养制，逐步解决配件的制造，储备一定数量的备件，修订技术操作规程，培养训练司机，提高其技术水平，充实港口机械技术人员，分期测定机械的负荷能力，有条件的逐步统一机型，合理的进行调剂调配，发挥使用效率。

四、按照合理运输的原则组织货源，消灭货损货差，提高运输质量。

(1) 在1956年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建立各种物资流向动态卡片，加强对货源分析研究工作，与物资部门主动联系，建立托运制度，组织月度间货物的平衡交运，作好货物的及时集中工作，策划合理的运输路线。与铁路公路要适当的分工配合，减少不合理的运输。大力组织回程货载，充分利用回程船舶空余仓

位。

(2) 保证货物的运达期限，特别是对紧急物资的运输必须设法加速周转时间。

(3) 总结提高货运质量的经验，并根据增产节约的精神，向全体职工进行爱护国家物资财产的教育，严格贯彻交通部颁布的处理“水运货物运送事故”三个规定，充实理货人员，总结理货制度的经验，改善现行的理货制度，健全理货交接责任制，加强现场装卸管理，整顿商务票据，消灭货损货差，最大限度的减少违约被罚等现象。

(4) 加强合理配载工作，根据货物的特性与船舶条件周密考虑制订配载计划，在内河尽可能的推行一驳一点的配载方法，对专线运输更应加以保证。

(5) 对客货运价及各项费率进行全面的的研究，作必要的调整，改进运价费率的结算制度。

五、必须重视基本建设工作，1957年要进行的建设任务必须保证完成，并预作今后的安排。

(1) 认真接受以往完不成计划的经验教训，切实加强重点建设，保证生产急需的项目（如重庆、汉口、八所等主要港口的扩建与设备的增添，客货轮、特种船及长江中下游拖轮等）及时投入生产，及时检查设计与施工的进度，解决存在的问题。物资材料和技术力量必须首先满足重点工程的需要，但也要防止盲目的追求进度，忽视质量的错误发生。

(2) 组织力量进行港口与船厂的全面规划，同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抓紧目前局部改造的工作。目前局部改造的工作要和远景规划相结合，但也不能只想实现远大的规划，而把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拖再拖。对今后需要投资建设的项目应及早提出设计任务书，以便提前设计，一俟国家批准进行建设，即可施工兴建。对1958年需要施工的项目必须在今年提出设计任务书，以

便安排设计进度。今后要逐步作到有设计文件的项目才能列入投资计划，以免工作忙乱被动，造成浪费与损失。

(3) 在设计与施工方面，必须贯彻增产节约的精神，降低工程造价。纠正好大喜新，盲目追求高标准，脱离实际的想法与作法。应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国家物力财力与技术的可能，以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果，少花钱多办事，解决当前生产上迫切需要的问题。在住宅建设方面，必须适当降低标准，降低造价，不能和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离开太远，应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投资控制数内尽量多盖些房子，多解决一些职工住宿问题。

(4) 在基建计划的执行方面，对投资项目之间的必要调整，今后要给基层单位以较大的机动权；对设计文件的审批手续也要按新的规定适当的下放。但要求各企业单位必须充实与加强基建部门的工作，切实负责。

(5) 为了加强基本建设工作，今年准备召开一次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有重点的总结基本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港湾的规划要作具体安排和讨论，并研究如何保证计划的完成。

六、改进航道工作。

(1) 为了配合运输的需要，对滩险整治、航标建设必须保证按计划完成，特别是对长江的疏浚与川江的整治和猪儿碛、九龙滩的整治应大力进行。

(2) 必须加强对现有航标的管理，保证标志正常。对川江绞滩的施绞效率必须改善与提高，对港湾航道的水深要切实保证。

(3) 为了逐步实行技术改造，必须开展水文观测及浅滩规律和船舶性能的技术研究工作。

七、1957年的材料供应情况十分紧张，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品种规格与时间上都有问题，必须从开源、节流和改进供应工作三方面多想办法，才能克服困难。

(1) 清查库存及分散在船舶、工地等处的物资，加以充分利用，互调有无；利用废料和代用品，打捞沉船，清理旧船，不能修复者即拆用旧钢材；尽可能设法在当地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材料。

(2) 燃物料的分配数量不足与运输计划的超额完成矛盾很大，必须推广炉水处理、分段烧火法等先进经验，改进燃物料保存、供应、收回等制度，杜绝浪费，厉行节约。

(3) 修船工作所用的钢材、木材较多，节约的潜力也较大，应充分利用旧废料代用品，合理节约原材料。工厂产值的计算，利用旧料应按计划价格折合。为解决目前钢材不足的情况，技术检查部门与业主方面，应在保证航行安全的原则下，适当放宽尺度，采取临时变通办法节约原材料，防止要求过高标准和过于机械严格的情况。

(4) 节约材料也是基本建设降低造价重要环节之一，从设计到施工都应注意材料设备供应的可能与节约；对船舶的新建、恢复，要克服过于铺张浪费的现象。

(5) 机电设备的供应也很紧张，除争取订货外，在可能条件下，修船厂可以进行试造简单的设备。

八、继续推行经济核算制，杜绝一切铺张浪费现象。各级领导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和切实掌握这一工作。长江航运局应大力巩固港、分局、船厂的经济核算，逐步推行船舶和作业区的内部核算。海上应进一步的巩固与提高企业内部经济核算，各企业均应继续贯彻决算审查制度。各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费必须大加缩减，争取超额完成成本降低计划。财务部门要严格控制各项费用的开支，克服目前财务管理上漏收错支的混乱现象。在企业机关中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为国家更多的积累资金，创造财富。各单位应根据中央指示，拟订切实可行的增产节约方案。

九、确定体制，精简机构，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逐步改变

某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以及改进劳动保护工作

(1) 根据新体制方案关于权力适当下放的精神，应认真执行精简上层，加强下层，充实现场的方针，合理的调整现有的机构与人员，重新审定组织定员，尽早确定长江的管理体制与组织机构，有效的减少各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的比重，以便更适应于生产的需要。

(2) 对多余的人员要积极的妥善的安排。对原从生产岗位提拔起来的干部，作好思想工作，可以动员回到生产中去，将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和文化业务水平较低的科长以上干部，尽可能的调出学习提高。

(3) 坚决贯彻国务院《关于有效的控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增加，盲目招收工人职员的通知》中的各项规定，凡缺少的人员应首先由内部调配，如需外招，则必须上报批准。

(4) 应大力提倡勤俭建国，同群众共甘苦的作风。我们应当根据国家批准的劳动工资计划，对工资基金合理的进行调整使用，对现行的奖励、津贴、福利等制度，应总结经验加以整理，对不合理的部分，应采取适当的步骤加以修改。

(5) 改进劳动保护工作，注意职工的安全卫生。切实贯彻各项技术操作规程，大力推行安全生产方面的先进经验，逐步降低工人劳动强度，限制加班加点，避免工伤事故；扩大船员公休时间，将大礼拜制改为小礼拜制；逐步解决船舶降温问题；在材料许可的条件下，可以动用医药费节余和福利基金等多盖些住宅，解决迫切急需解决的住房问题，同时在住宅分配上应适当的加以合理调整。

除采取上述措施力争超额完成 1957 年计划外，还必须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工作，认真的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进行全面规划，编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使航运事业提高计划性，减少盲目性。根据科学研究的规划，开始进行科

学研究工作。加强现有学校的领导，按照国家的规定，根据需要与可能，继续招收新生，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合理的进行调配、使用，对现职干部应进行有计划的轮训及加强业余学习，以提高业务、技术水平。

为了全面超额完成 1957 年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必须加强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首先要克服各级领导干部的片面业务观点和不问政治的偏向。今后不仅要研究如何领导生产，同时必须十分重视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目前职工对政治学习重视不够，特别是领导干部对理论学习抓得不紧，这种偏向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引起注意，加以纠正。在职工中必须深入普遍的进行增产节约、艰苦朴素、勤俭办好交通事业的思想教育，明确树立个人生活的改善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的思想，克服片面地强调个人利益的倾向。同时，领导上必须关心群众生活，尽可能的解决职工的困难。在干部中应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闹名誉、闹享受的思想，根据中央关于干部管理工作“稳定提高”的方针，反复向职工进行宣传教育，鼓励干部努力钻研业务技术，提高工作能力。加强对职工群众的团结教育，提倡新老工人的团结，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的团结，加强对资方人员的团结与改造。

广泛动员全体职工贯彻增产节约精神，继续深入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各级行政领导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依靠工会、青年团共同发动与组织职工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有重点推广具有增产节约价值的先进经验，切实解决推广先进经验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从当前增产节约的关键问题出发，提出课题，动员群众提合理化建议，并组织力量进行研究鉴定，凡是可以采用的要迅速采用，可以推广的要迅速予以推广。对合理化建议领导上要热情支持，给予适当奖励。在增产节约运动过程中，要防止各种不正常做法，如只注意增产不注意节约，只讲本单位的利益不顾整

体利益，只看眼前不管将来，只顾生产不顾安全，只计数量不计质量，以及放松设备检修等。坚决避免任何名义上是增产节约，实际上反而造成巨大浪费的现象。

改进领导作风，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树立依靠群众办好企业的思想，贯彻走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的原则。一切重大问题，必须进行调查研究，经过集体讨论，酝酿成熟后再作决定。企业的计划与重大措施要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领导干部要深入现场，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接受工人群众的批评，了解群众的要求与呼声。

今年准备在个别单位进行扩大企业民主管理的试点工作。各企业都必须认真贯彻以党委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贯彻群众路线。目前存在的某些不团结的现象，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解决。对原则性的分歧意见，必须充分讨论，分清是非，统一认识；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必须相互让步，相互谅解，不许闹无原则纠纷。总之，一切思想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在新的基础上团结的目的。

最后，希望各级领导干部，戒骄戒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领导思想水平，紧紧依靠地方党委和当地政府的领导，积极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为响应中央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争取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关于工业视察情况给陈云、李富春、 薄一波的报告^①

(1959年5月1日)

从3月下旬开始，我们用了三个星期，沿着陇海路参观了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四个城市的工业，目的是看看沿途国家重点工厂的建设、钢铁的小洋群和地方工业。现把看到的情况和感到的问题报告如下：

一、钢铁小洋群

河南过去是少铁无钢的，去年大搞钢铁运动，改变了这种面貌，并把其他工业和交通运输都带动了起来，成绩是巨大的。他们曾动员300万人上山建设了58万个炉子，但多是土炉子，生产的生铁，质量好的不多。根据中央指示，自去年12月进行了“五定两化”，初步形成了基地76个，钢铁基点104个，钢铁厂418个。现有各种炼铁炉8150个（不包括小土炉），总的生产能力可日产铁7460吨。但因为焦炭和矿石供应不足，只有2883个在生产，其他都停产了。全省7000辆汽车，调了4000多辆汽车为钢铁运输，另外还有10万人为钢铁战线做运输工作，仍然不能解决矿石、焦炭的供应。目前，为钢铁服务的工人有81万人，日产铁2000吨左右，质量比去年有进步，都是流水铁，但灰生铁只占40%左右，硫的比重高，成本平均[每吨]在400元左右。

^①1958年6月，朱理治调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后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他在率调查组视察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的工业情况后写给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并中央财经小组、国家计委党组的报告。

现在，社会主义各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炼铁炉都是很大的，100米以下的炼铁炉苏联只有一个（80米），但英、法等国在资本主义初期亦是用1米、5米的小高炉炼铁，后来才不断搞大的。我国一面搞大型高炉，以此为主，同时搞些小洋群、小土群作为辅助，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无论从各国和我国的经验来看，小洋群必须设立在有矿石和煤炭的地方，并且矿石品位要高，煤能炼焦，矿石和煤炭[产地]距离要很近，具备这些条件，才能建立小高炉的基地。[毛]主席一再指示，没有矿石、煤炭的地方不要搞小高炉炼铁。而真正具备这些条件的，在一个省不会太多，亦不是所有省都具备的。所以中央财经小组在讨论定点时提出，点不宜定得太多。现在看来，河南等省有的小洋群基地还是定多了一些。

中央2月6日关于正确组织炼铁生产的几项规定提出，矿石平均含铁量不应低于40%，焦炭灰份不超过20%，半年内小高炉生产的每吨铁的成本，要降低到200元左右。要达到这个指标，必须坚决的将那些没有矿石或矿石品位太低的，没有炼焦煤的或是矿石和煤炭[产地]距离过远的小高炉基地放弃掉，或减少其生产，将设备和技术力量集中到几个主要基地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铁的质量，保证铁的成本达到200元以下，保证铁的正常生产。

二、国家重点工厂的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工厂，布置在河南、陕西的计有28项，其中河南8项，陕西20项。大跃进以后，由于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把苏联的先进科学与我们的冲天干劲结合起来，一般地都节省了投资，增加了生产能力，提前了建设进度，同时也基本上保证了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上的要求。例如，三门峡水电站预计1960年可以基本上建成，比原计划约提前了两年。原定投资16.7亿元，现在估计只要9亿元，可以节省7亿

多元。建成以后，装机容量是110万千瓦，同时还可以防洪和灌溉田地4000万亩，并有利于将来黄河航运事业的发展。洛阳轴承厂已建成投入生产，原设计年产1000万套，226个品种，现稍加投资，能力可达到2400万套和250个以上品种。（现因缺少原料，已有生产能力只发挥了六分之一）。

但是，由于目前全国建设的摊子铺得过大，因此，许多重点项目反而得不到材料，不能早日投入生产。例如，洛阳拖拉机厂按照设计能力每年可生产54马力的拖拉机1.5万台，由1953年开始建设，原来今年可以建成。因为今年分配到的材料、设备与需要量相差太多（一季度需钢材2000吨，分配到600吨；缺机床1300台，只解决了180台，铸工车间9条运输线，现只有一条能运转）。如果照此情况继续下去，今年之内还不能正式投入生产。而全国目前已建立起大大小小29个拖拉机制造厂，去年生产了100多种拖拉机，这些拖拉机除天津、南昌等厂生产的反映较好外，其余工厂所生产的质量较差，不能成批制造使用。再例如，我们在河南荥阳参观的郑州铝业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制铝厂，当国家迫切地需要它早些投入生产以解决铝的不足时，这个厂却在停工待料，工程进度很慢。与此同时，全国又布置了48个（后减为23个）年产2000吨铝的小型铝厂，占用了不少原材料。这些小铝厂除北京、兰州等少数几个已投入生产外，其他一些在材料设备供应上也有困难。因此，我们考虑到，我国的工业建设是应该像现在这样大大小小一起上马，互相争夺原材料，结果使大家都完不成计划呢？还是应该首先保证重点，让现代化的大企业尽快建好投入生产呢？显然后者是比较正确的。

参观了这些工厂以后，我们深深地感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以“156项”为中心，从而打下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个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的地区分布也曾作过专门研究，在城市建设中也注意了工厂厂

址的安排，所以，一般看来摆布得比较合理；每个厂的建设都经过了勘察设计，提出设计任务书，经济论证等手续，而且在任务一经确定之后，即集中大批人力、物力、财力，使之早日投入生产。这些都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好经验。但是，在我们这次参观中，发觉[有的地方]对这些方面的经验注意不够。如郑州铝业公司的厂房设计就有毛病，有的已被风吹倒了，有的厂房吊车支柱过于单薄，只是用砖头和细的钢筋筑成，看来也很危险。又如西安某工厂厂内机器未安装，厂房已倒塌了。没有按照一定的规律办事，单纯地追求节约和缩短时间，结果既造成浪费，又耽误了时间。

三、地方办工业的问题

我们沿途也看到了一些地方办的中小型工厂，并详细地看了洛阳的地方工业。洛阳市在大跃进以前，全市大小工厂只有40个左右，地方工业产值也不过几百万元，但在1958年大办工业以后，仅地方工厂就飞跃地发展到1500个，现合并为627个。在这些工厂中，有汽车修配厂、车辆厂、车床厂、风动工具厂、变压器厂、轴承厂、水泥厂、化工厂、电灯泡厂等等。预计今年地方工业产值可达2亿元，较1957年增加二倍左右。他们在克服原材料困难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如建立了500多个废品回收站，收了不少废钢铁、橡胶、油脂和棉织品等加以应用，或加工后供应市场需要。食品工厂用糖困难，就以红萝卜代替。洛阳市场上日用产品是很充裕的，这与当地地方工业搞得很好有很大关系。

洛阳市的情况和全国各地一样，证明党的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证明根据当地具体条件积极发展地方中小型工业，能加速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亦看到了其缺点，这即是地方工业的建设尚缺乏计划性。三门峡市的例子就很典型。他们的干劲很大，在1958年一年内搞了100多个工厂，招了1.5万工人（三门峡水电站工程人员除外），既有钢铁、铝厂、煤矿、机械、化工等重工业工厂，也有印刷、制鞋、食品、针织等轻工业工厂，几乎要想建立一个小的工业体系。可是摊子铺开了，工人招来了，住房等等无法解决，工业原料没有，建好的工厂有许多因没有原材料不能开工，没有建好的工厂，又没有资金，更谈不上材料，因此，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大有进退两难之势。

象三门峡市这样的情况，估计河南及全国均不在少数。因此，地方工业很有必要加以调整一番。首先是根据全国的统一计划，重新进行一次安排：对于那些原来担负本地和外地协作配套产品或主要担任修理任务的工厂，应该立即归队或“降级”；对于那些新发展的工厂，应当根据原材料供应和国家对这些厂产品的需要情况，分别给以维持原有生产、减产或停产的处理；对于那些没有列入国家建设的项目，暂时都应停止建设。在处理工厂停产、减产、基建项目停建中，应当对工人和现有材料设备作妥善的安排，以免引起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所有保留下来的地方工厂，都应该实行经济核算，降低成本，除掉土铁的生产在一定时期允许亏本由国家补贴外，其余工厂都应当有不同程度的盈余，有些工厂如果不能做到这点，也要另作安排。

四、关于工业管理体制问题

自去年中央将大部分直属工矿企业下放给地方领导以后，促进了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同时，由于这些企业大都有机械修理和设备制造[能力]，帮助地方制造了不少机器，装备了地方工业，大大地推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

但是，我们这次看了郑州和西安几个下放工厂后，发现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例如，郑州纺织机械厂是一个大型的纺织机械制造厂，专门生产纺织工业用的清花、印染和浆纱机器。这个厂和榆次、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等几个地方一共9个大厂和公司配合起来，就能生产出我国纺织工业建设新工厂所需要的整套机器。而这几个地方的厂或公司，每个单位都只生产其中的一部分。去年郑州纺织机械厂所生产的清花机，可供120万锭纺纱机械配套之用，由于其他协作厂未完成任务，特别是青岛纺织机械厂只完成70万锭梳棉机，因此全国有好多地方生产出来的纺织机械配不成套，使去年实际投入生产的新增纺纱能力只有21万锭，这样，一方面我国纺织工业极需新增机械设备，另一方面却有不少纺织机械因配不成套，闲置起来不能使用，造成对国家资产的积压和浪费。据该厂负责人谈，过去各专业纺织机械厂由中央领导时，纺织部每季召开一次会议，平衡各厂生产任务，组织配套；体制下放后，由于缺乏全国范围的统一平衡，发生了互相脱节的情况。

西安的几个电机厂也有类似情况。这里的高压开关、高压电瓷、变压器、电缆、绝缘材料、电力电容器等6个电器工业工厂，互相之间关系密切，过去都是一机部的直属工厂；去年下放后，电缆厂、变压器厂改由陕西省领导，绝缘材料厂、电力电容器厂改由西安市领导，这样，一整套的电机制造工厂，就分别由中央、省、市三级管理，它们之间有许多问题不好处理，相互协作配合也遇到不少困难。

我们的意见是，像郑州纺织机械厂那样产品供应全国需要而又需要全国各地兄弟厂协作才能配套的工厂，仍以中央领导为宜；像西安六个电机厂那样同在一个城市内，生产同样性质的产品，协作关系极为密切的工厂，应由一个上级机关统一领导，不论统一在中央，还是省或市，都比现在三级分管要好。

总之，去年体制下放后，还有些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调整
和解决，建议中央指定专人做系统的研究，因为这是非常复杂的
问题。

关于改进物资工作和建立 物资供应部的几点意见^①

(1959年11月6日)

根据富春同志的指示,我们研究了改进物资分配和管理工作的
问题。我们认为,过去物资分配和管理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
仍然不能和目前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相适应。主要的原因有以
下两方面:第一,物资计划和综合平衡工作还有缺陷;第二,物
资的管理工作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加强计
划的综合平衡工作,少奇同志最近又提出要建立物资供应部来加
强对物资的管理工作,我们认为是十分必要的。物资供应部的建
立,将是对物资管理工作的重大改革。现在把我对于物资分配和
管理工作的改进意见,物资供应部同计委、经委、各工业部门的
分工,以及对物资供应部工作的几点设想,报告如下:

(一) 关于加强物资分配计划工作。

生产计划、基本建设计划和物资供应计划必须相互适应。过
去几年基本上也是适应的,但是由于经验不够,某些时候也出现
了不完全适应的情况。例如,有时低估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物
资的生产能力,因而使得基本建设计划偏低,结果造成物资积压
的现象,阻碍了生产力的充分发挥;有时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偏
高,物资供应能力不足,则又造成了基本建设摊子过大,有些项
目不得不被迫“下马”,工厂开工不足,采购人员满天飞和“以物

^①这是朱理治主持起草的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存的报告。李富存批示印发全国
计划会议,并送周恩来、薄一波、李先念、杨尚昆、陈伯达、陆定一、康生、林
彪、罗荣桓、林伯渠、董必武、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人。

易物”、“红票兰票”等不良现象。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管好物资工作的基本环节，是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首先是物资的平衡。在编制 1960 年计划时，中央反复交代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主义，又要做实事求是的左派，号召我们要根据原料、材料和设备的可能来编制生产和基本建设计划。我们感到，只有坚决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今后的物资管理工作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所以，物资供应部的建立，决不意味着国家计委物资分配、物资平衡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任务的减轻。相反的，要搞好物资供应部的工作，还必须加强国家计委的综合平衡工作。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物资供应部也应当参加这项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

但是，生产资料有 1 万种左右，国家计委只能分配战略性的关键性的少数物资，如钢、铁、钢材、木材、煤炭等主要原料、材料和重型设备等主要设备。各工业部分配的物资也只有 200 多种。以上两部分合计，1960 年只有 400 种。其余的几千种物资，现在仍然处在无专业部管理的状态。结果，使得许多设备配不成套，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材料常常不能齐全，无法正常生产和施工。我们认为，成立物资供应部以后，所有生产资料，凡属国家计委和各工业部门没有分配的，都应当由这个部门在国家经委的协助下，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安排。

（二）关于物资分配计划的调整问题。

物资分配计划确定之后，在年度之中，常常需要根据情况加以调整。特别是在大跃进的情况下，每个季度的生产发展速度都很高，更需要逐季来进行安排和调整。这是一件很繁重的工作。目前，国家计委既要管理年度计划，又要管长远计划，显然是很难管这项工作的。现在，经委已经把季度的生产计划、季度的物资分配和组织订货工作管了起来。这样，就使得目前和明年第一

季度的物资分配、生产和基建等工作能够及时地安排。

我们认为，物资分配计划的调整工作非常重要，必须由强有力的机关来领导。因为物资计划的调整，往往牵涉到生产、运输、财务、信贷……等方面，特别是牵涉到生产的安排，而且这种调整和安排常常要不失时机地做出决定。因此，这项工作由国家经委来领导最为合适。物资分配和生产的联系最为密切，为了搞好生产，国家经委也必须领导这项工作。所以，物资供应部成立之后，也决不意味着国家经委任务的减少。相反的，它必须更加有力地来管理物资工作，包括对物资供应部的指导和帮助。国家经委的某些领导干部和某些局可兼物资供应部的工作。物资分配计划中的当年机动数储备应当由经委掌握。至于国家储备计划，仍然应当由计委掌握。

（三）物资供应部的职权范围和开展工作的步骤。

过去，物资管理工作比较分散。各工业部门产品的推销工作是由各部的销售总局负责的。大宗物资是由各销售总局组织签订供货合同，企业之间直接送货；不足一个车皮的小额供货是由各销售总局在几个大城市建立的推销办事处负责的。各部的供应工作，是由各部的供应总局负责的。许多供应总局，也在各大城市设立供应办事处，负责小额供货。各个省的供应工作，大多是由各省市的物资局负责的。由于物资管理工作没有统一的领导，各省物资局的工作也就没有上级主管部来领导；各部的供应局和销售局的办事处，机关林立，工作重复，仓库分散，许多物资不能互通有无，调剂品种，结果使有限的资料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为了寻找资源或交涉订货，各个供销单位的人员，满天乱飞，既浪费了人力，又容易引起违法乱纪的现象。所以，少奇同志建议设立物资供应部统一物资的管理，这是很必要的。

物资供应部的任务，应当是统一管理所有的生产资料，就象商业部统一管理生活资料一样。但是，因为对生产资料的这种管

理方法，在社会主义各国和中国历史上都没有前例可循，所以，这个工作需要步骤地开展。初步意见是：

(1) 首先建立物资供应部。地方物资局受物资供应部和省市的双重领导。物资供应部帮助各省市物资局健全自己工作，使它统一管理地方的物资供应工作。

(2) 逐步由地方的物资局接管中央各部门在各城市某一品种或全部品种的供应工作。这就是由地方物资局根据国家对各部的分配计划，统一组织当地企业的订货和供应工作，并逐步接管中央各部在当地的供应办事处和仓库。

(3) 各级物资供应部门应当组织各企业固定协作关系，由固定的单位负责直接送货，减少中间环节。至于不足一车皮的小额供货，可以逐步由当地物资机关接管各工业部门的推销办事处及其仓库，统一负责供应，以免物资分散。

(4) 负责统筹管理中央和各部管理以外的物资。

(5) 建立对各工业部门的销售总局和各部供应总局的指导关系。

(6) 逐步接管商业部经管的某些生产资料。

上述意见，仅是我们的初步设想，还不成熟，仅供参考。

经济建设要注意质量， 尊重经济规律¹

(1960年1月)

一、多快与好省要结合。

偏重多快，忽视好省，只鼓足干劲搞多快，认为好省不必鼓足干劲，这种认识的存在是由于对总路线体会不深，了解片面。

1、没有多快即没有好省，但没有好省亦不会有多快。例如，钢铁现在还只有600万吨，自然是不多不快的。但是如果炼钢炼铁不计成本，煤耗、铁耗、劳动力、运输力消耗高，结果必然要挤农业及其它，最后也不能不使速度放慢些。同样，如果铁的质量不好，煤的质量不好，也不能不影响多快。忽视企业管理，经常发生事故，亦必然要影响多快。

总路线是总结了中外的经验，是照顾矛盾两方面的，是互相制约的。我们在执行时，常常有点片面。

今后定指标必须要定质量指标、成本指标、技术经济指标和安全措施，并作为检查工作的标杆。凡不完成的，不能得到超额奖励，没有厂长基金。要将好省有意识的偏重一下。

2、社会主义的威力，不是只在数量，而是在多快好省的结合。只有数量，人家并不怕你；数量、品种、质量都好，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威力。

3、多快要鼓干劲，好省更要鼓干劲。为了质量、品种、安全、成本，要靠很好的企业管理。人海战术不行，只会坏事。要

¹这是朱理治在全国计划会议华北组会上发言提纲的第一、二两个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靠真本事，靠我们动员群众来埋头苦干。

4、多快好省结合，就容易做到高速度、按比例，不挤农村劳动力。真是从好省中求多快，要花更多精力，有更多本领。

所以，对多快好省这条总路线必须要全面理解。既要从多快中求好省，亦要从好省中求多快，两条腿走路。过去偏重多快，这有一定必要，今后三年要偏重从好省中求多快。

5、在数量上要大跃进，在质量上亦要大跃进。明年数量上的跃进可放低一些，质量上的大跃进应放高一些。好省二者，即要重质，更要重省。

二、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完整的经济管理制度。

经济管理必须有一套新的制度。党应加强政治领导，还应当利用各种工具来管好生产，单靠政治是不行的。经济有其本身规律，党应根据这种规律来掌握各种工具，管好经济。

计划管理制度，是社会主义管理经济的最重要的工具。但计划必须合乎实际，必须衔接，不能常变，不能加码。财务管理制度，经济核算制度，是主要方法之一。人员要有定额，有了定额要有工资基金，和银行现金制度配合，不能只靠运动来经常增加，经常减少。要用价值法则来教育经济干部。企业要独立经营，发挥其积极性。检查制度，合同制度要恢复。要先规定责任制度，有了事故，要追查责任。要恢复和新建必要的制度，使其为党为社会主义服务。

河北、山东工业支援农业的情况和需要注意的问题¹

(1960年8月)

(一)

7月3日到22日，我们去河北和山东，着重视察了工业支援农业的情况。其间，我们分别找省委、省计委以及有关厅局的负责同志谈了话，视察了天津、济南两市近郊的人民公社和肥城、曲阜农村人民公社，十多个支援农业的工厂以及一些大中小型的水利工程。

通过这次视察，我们深深地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的方针的正确。

河北、山东两省工业发展速度很快，钢铁生产特别是铁的产量增长得非常迅速。例如，山东省1958年8月20日以前只生产了生铁3000吨，全民大办铁钢后，共生产了50万吨；1959年生产150万吨；1960年计划是238万吨，预计可以完成280万吨。河北省1958年铁产量为73.8万吨，1959年增加到178万吨，1960年计划是287万吨，预计可以完成。

在农业生产方面，两省干劲很足，成绩也很大，但是农业都没有过关。山东省1959年粮食总产量原来统计是420亿斤，最近落实后，只有370亿斤，其中还包括大豆36亿斤（山东习惯，大豆参和在高粱和苞米中吃，这36亿斤，有半数当粮食

¹这是朱理治给中共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的报告，标题为编者所加。

用，这样，粮食大概共有 350 多亿斤），平均每人占有量只有 660 斤左右。棉花产量原来统计 660 万担，而实际也只有 480 万担。由于粮食不足，今年青黄不接时供应就仍显得有些紧张，播种时，农民都愿意多种些粮食作物，特别是对高产作物如地瓜的积极性很高，而对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较差。山东全省计划种春地瓜 1000 万亩，实际种上了 1400 万亩。棉花的播种面积计划为 1100 万亩，已种 1000 万亩，据省计委农业处估计，其中大约还有 20% 的虚数。花生播种面积计划 1000 万亩，已种上 400 万亩，预计不会超过 500 万亩，只能完成计划的 50%。河北、山东两省生猪和大家畜，今年 5 月底的存栏数比去年年底减少了。河北省生猪减少 390 万头；山东省生猪减少 220 万头，大家畜减少 20 万头。这与粮食问题也有联系。

但是，粮食情况各县亦不是一样的，有的好些，有的差些。例如，我们在山东了解了一下肥城县的情况，这个县的情况就好得多，粮食亩产 410 斤，每人平均 800 斤左右，再加上工作安排得好，因此主动得多。人们吃饱吃好，心情舒畅；役畜肥壮，拖带双轮双铧犁等改良农具都很有力；国家征购任务和经济作物播种任务也都超额完成。

(二)

自从 1959 年 8 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提出了“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和“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的方针，特别是今年春天中央指示各行各业都要把支援农业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后，工业和其他部门支援农业已形成了一个广泛深入的群众性运动，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河北、山东也是如此，情况大致为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教育工作。

山东从省到专区、市以至大部分县都先后建立了工业支援农

业小组，不少部门和企业也建立了支援农业的专门机构，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对广大职工进行了深入的工业必须支援农业的教育。通过放手发动群众，订计划，提措施，迅速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农业的群众运动。为了支援农业，河北省也先后成立了抗旱办公室和合成氨办公室及机井领导小组等组织。

二、领导上大抓农业机械的生产和供应工作。

山东省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部分季节性较强的农业机械的生产要在上半年大部分完成全年计划的要求。全省提出了六种重点产品（太谷号小麦收割机、小麦脱粒机、中耕除草机、水车、畜力大车、轴承）提前半年完成全年计划，排灌机械与手推胶轮要求比原计划大大增产。截止6月10日止，这些产品的完成情况如下：（略）

河北省领导上也非常重视农业机械的生产。为了全力抗旱，保证小麦丰收，除国家安排的生产计划外，省委在计划外拨出1000吨钢材，制造10万马力的排灌机械，并准备在农村大力推广低压蒸汽小车，今年内准备推广30万部。河北省农用动力机械全年计划为28.1万马力，至5月已完成22.7万马力，预计全年计划可提前在上半年完成。

三、组织工厂和人民公社直接挂钩，帮助农村进行技术改造。

山东省组织厂社挂钩形式各种各样，一厂挂多社，一社挂多厂，有的支援物资，有的帮助培训人才。截止5月10日的统计，全省已有1820个工厂分别与1398个公社挂上了钩。通过挂钩，已建成农具厂、食品加工厂、榨油厂、化肥厂、农药厂、酒精厂、炼焦厂、煤井等1765处；支援各种机床1169台，各种工具11.5万件，各种配件15.2万件，动力机械2.2万马力，废钢材2300吨，手摇车轮1.5万个，轮胎1600条；此外，还帮助公

社培训各种人才 1.7 万人。

河北省厂社挂钩，一般都体现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有实行三包的，也有实行四包的（如包机具制造、包修配、包技术力量培养等），公社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单农机系统，248 个县营以上工厂，就同 600 个公社建立了挂钩关系。今年实行厂社挂钩后，全省各地改制、创制成功的主要机具有 100 多种，600 多万件，突出的象磁县创造的低压蒸汽小车比畜力小车提高工效 3 倍，而且制造简单，操作易学，可代替更多的人力畜力，对支援农业和抗旱将起很大作用。河北省天津市连小学生也开展“为农业做一件好事”的运动，少年先锋队捐了三台拖拉机，支援农业建设。

四、组织技术队伍下乡，帮助公社修理机器和农具。

山东省各工矿企业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组织了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修配大军（全省约 13 万人），自带工具、零件、材料，深入各人民公社、生产队，包修农具和排灌机械。据不完全统计已修排灌机械 1.2 万台次，各种农具、水利工具等 221.6 万件（台），使全省所有农机具普遍进行了一次检修，基本上保证了灌溉、春耕、春播的需要。

— 河北省也组织“物资技术下乡支援农业抗旱”，省委大力动员了城市的人力、物力支援农村。仅天津农业机械采购供应站一个单位，就帮助农村培训排灌机械技术人员 704 人，还帮助公社修配已损坏的煤气机 350 台，添配维修的零件 623 件。

总之，两省广大群众正在各级党委的动员与组织之下，热烈地响应中央号召，投身于工业支援农业的运动之中。“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已开始为人们所掌握，正在发挥出越来越大的物质力量。

因为有上述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上 10 年来，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来水利建设工作和人民公社的威力，在两省遇到特大旱

灾的情况下（两省从去年以来 200 余天未下过雨，河北受灾面积达 6000 万亩，山东达 7000 万亩），今春小麦的收成比之去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加了。

但是，我们也感到当前这个运动发展得不够平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各行各业都必须支援农业’的思想在有些地方还没有很好的贯彻。例如：有些厂矿的基本建设占用农村土地面积较多；有些工厂生产的农业机械卖价过高；有些地方布置工业的小土群、小洋群时，并没有将劳动力和运输力作全面安排，因此过多的使用农村劳动力和运输力；有些工厂生产因为追求总产值，只愿意生产整套设备，不愿替农业机械制造零件。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更进一步的开展支援农业的运动中加以解决。

根据 20 多天参观的结果，我们感到今后工业支援农业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思想教育问题。

工业支援农业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为了把支援农业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峰，必须进一步加强国民经济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必须支援农业的宣传教育工作，纠正各种各样的错误认识。山东省准备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要求各单位制订或修订进一步支援农业的规划，使广大职工树立起牢固的工业支援农业的思想，掀起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全面化、制度化和经常化的支援农业的运动。

二、水利问题。

从以往的经验 and 这次两省所发生的旱灾情况来看，水利工作确实是克服自然灾害，保证农业增产的基础。当前的水利工作必须遵照中央的指示，只搞续建和配套工程，以便充分发挥现有水利工程的效益。应当说，这些续建和配套工程的工作量仍然是不小的。据农业部估计，全国今冬明春水利工程只搞续建和成龙

配套工程，就要有 200 亿土石方，而去年仅只有 190 亿土石方。我们参观了曲阜县的尼山水库，这个水库的建设确是全县人民的迫切要求，所以群众干劲很大。但是，这个水库工地上，除了手推车以外，几乎全部是手工操作的，每个劳动力的工效平均只有 0.7 土石方，花费劳动力很多，库容 1.2 亿方，花了 380 万个工日。为了提高水利工程的劳动生产率，除了改进设计工作，改进劳动组织，利用农闲时的排灌机械和拖拉机作动力，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进行技术革命，搞机械化外，还应当尽可能多供应一些水泥、木材、钢材、钢丝绳等原材料和一些施工的机械设备，并以此作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在前一年的第三季度要预拨一部分钢材，以适应水利工程的季节性要求。河北省因为地上水源不足，而南水北调工程又很大，一时难于见效，所以大搞地下水，今后五年（1960—1964）准备打井 5 万眼，其中今年打机井 1000 眼。这也是确保丰收的一项重要措施。所需钻机一方面从各部门抽调，一方面安排工厂生产。目前的问题是生产钻机的钢材没有得到解决。

在水利方面，工业支援农业还应当大力发展各种动力的排灌机械的生产和供应。山东柴油机厂在生产柴油机时生产了柴油、煤气两用的装置，以便得不到柴油供应时，可以使用煤炭作燃料，这是很值得推广的。此外，河北省正大力推广低压蒸汽水车，今年准备推广 30 万台。这种水车的动力设备制造简便，只用很少钢材。山东有些地方正在推广内燃水泵，这种设备也比较简单，减少了一套传动机械。同时，我们所到之处，发现利用风力的地方很少，今后也应推广，这些措施，都是解决目前农村人力和畜力不足的很好办法。

三、农业机械化问题。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办法在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的方针应当以拖拉机为纲。根据我们在北京郊区、河北、

山东等地参观人民公社的情况，在农村里拖拉机的威信很高，特别是象洛阳拖拉机厂出产的东方红牌（54马力和25马力）和天津拖拉机厂生产的铁牛牌（45马力）拖拉机，因为产品质量好，适合于华北地区的耕作条件，所以普遍受到农民的欢迎。轮胎式拖拉机不但是耕作机器，同样也可用于农村运输和作为排灌机具、农产品加工的动力。一台拖拉机大概可以顶100个劳动力。为了促进拖拉机的生产，必须保证重点，使主要的拖拉机厂能尽快地投入生产，这样就能更快地生产出质量好、效率高的拖拉机供给农村使用。天津拖拉机厂明年年底可以扩建完成，扩建后每年可生产拖拉机3万台。河北省同时还准备在各地区利用已有机械制造力量搞拖拉机厂，但比较更有把握更能解决问题的，还是天津拖拉机厂，所以应集中力量来建设。目前该厂缺2000名工人，已请河北大力支援，帮助解决劳动力及其他困难。

由于材料和制造能力的限制，拖拉机到1962年全国大概只有30万台。所以1962年前，农村的机械化只能达到小解决，农村生产率提高主要还要先靠实现半机械化和农具改良。据我们看过的不少县、市，甚至一些人民公社，例如，兖州和肥城县的县办工业和天津新立村以及曲阜陈庄公社，都具备了一定的农业机械制造能力，可以制造太谷号收割机、机动脱粒机、小钢磨、水车和其他农业机具和改良农具，只要解决材料问题，半机械化农具和改良农具就可以大量发展。

四、关于肥料问题。

在农村中大搞养猪事业，这是增加农村肥源的很好办法，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牲畜的厩肥仍然是农村肥料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我国粮食还不富裕，牲畜饲料粮还不能留很多，养猪数量还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除了大力发展饲料基地，以养猪为纲，大搞牲畜饲养以外，还应当积极发展化学肥料的生产。多生产一些化学肥料，不仅可以保证农作物增产，同时也可

以大大节约农村劳动力。在化肥生产中要坚决执行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并且应当把重点放在中小企业和土法生产方面。化工部设计了一种年产800吨合成氨的化肥厂，从我们参观过的正在建设中的历城县化肥厂看，这种定型设计仍然要求不少钢材和很多洋设备，由于这些东西比较难于解决，致使这个工厂在土建工程基本完成以后就停顿下来。因此，应当设法采用技术改造新、改进小型化肥厂的设计，可少用一些钢材和洋设备，多采用一些土办法，以适应县以下地区工业基础较差的特点。此外，还应当大力推广土化肥，以解决肥源的不足。山东肥城县一个土化肥厂，每年能生产七、八千吨钾肥，这是很好的，很能解决问题。过去各地生产的土化肥，需要加以鉴定，有的肥效高，成本小，而有的不太有用。鉴定好后，有选择的大力推广。

五、原材料供应问题。

中央决定今年以102万吨钢材支援农业，由农业机械部统一掌握。除农机部直属厂需要的钢材外，其他大部份都分配到省，由各省农机厅在省委统一领导下加以运用。山东农机厅分配到钢材7.3万吨，因为品种规格不合用，实际订到货的为5.9万吨，1-5月实际到货只有1.4万吨。在品种规格方面，为水车用的镀锌薄板至今一吨也未订到，水车因缺管子而不能配套。订货到货的情况都不很好，究竟是生产的问题，还是分配的问题，还是使用上的问题，还是三者都有，需要进一步检查。他们还靠自力更生，每个专署布置一个钢铁小洋群，小土群，共20万吨，由地方自产自用。除此而外，山东省正在提议各厅局合作建设钢铁企业90万吨，中央七个部也提议和山东合营钢铁企业，例如农机部具体和山东农机厅合营25万吨铁，15万吨钢，四、六分成，中央得六，地方得四，这也是充分利用山东丰富的煤铁资源的一个办法。这些钢铁企业无疑地对解决钢材不足会有很大的帮助。

目前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办这些钢铁企业，不要过多地挤用

农村的劳动力、运输力和设备力量，以免影响农业生产，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需要统一规划，以照顾到工业和农业、长运和目前等各方面的利益。

我们感到，以钢为纲的工业，和以粮为纲的农业，相互之间，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它们之间是对立的统一。首先，它们互起着促进的作用。以钢为纲的工业发展了，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来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布匹、日用工业品等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现在各省同志都了解这一点，于是千方百计地把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搞上去，都想办法在计划以外多搞些钢铁。同时，大家也知道农业的重要，因为农业搞上去了，轻工业就有了更多的原料，重工业才有广阔的市场，城市才可以得到更多的粮食和劳动力的支援。但是，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还有矛盾一面，因为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的劳动力、运输力、设备能力总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安排不当，分配给工业的劳动力、运输力、设备过多，分配给农业过少，就会影响农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反之亦然。处理好这个矛盾，正是我们计划工作的基本任务。大跃进以来，工农业和其他各方面事业飞跃发展，对劳动力、运输力、设备等要求都很迫切，工农业之间的矛盾突出来了，更需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六、运输问题。

目前农村的短途运输是很紧张的，据白如冰同志说，一吨钢从矿石开采运输起要14吨运量，主要是短途运输。据山东省农业厅的典型调查，种一亩地的短途运量是65吨公里。山东省交通厅系统共有2700辆汽车，有1300辆用于钢铁生产，所以目前短途运输是相当紧张的。

现在，山东省采用了以下的办法，首先是修土铁路，准备今年修3000公里，因为缺少火车头，准备修成2000公里；其次是减少自行车的生产，多生产手推车，一个手推车能载运400斤。

等于两个人，一个牲口。

此外，还可以多搞些动力综合利用，如利用拖拉机搞运输，利用排灌机械搞土汽车土拖拉机，排灌和运输两用船；利用康拜因改装成农用汽车（现在北京农具厂正在试制）。

另外，工业的规模和布局也要作全面的安排。例如，我在上面所说的肥城县，原有4个小高炉，现在上面布置再增加6个，假使不另增加运输能力，全县的250辆大车都作炼铁运输之用，可能还不够用。这样，农村运输及城乡交流就会发生困难。济宁有很好品位的铁矿和煤炭，但成本平均在400—500元之间，虽与经营管理有些问题有关系，但是地点亦有可以研究之处。因为矿山、煤炭离小高炉远了一些，靠汽车、手推车运输，成本就会高，短途运输就会紧张。应当尽可能将小高炉建立在靠煤铁资源近的地方，并尽可能用土铁路联接起来，或用水运连接起来。这样成本就可以低些，短途运输也更容易解决一些。

七、农业机械的修配问题。

这个问题很突出。去年因为配件不足和修理能力不足，有25%的农用动力机械没有能发挥作用。由于工业支援农业的群众运动的开展，工厂直接和公社挂钩，加以各级领导帮助解决了一部分钢材，所以农业机械闲置情况已有所改善。但是据我们最近从河北、山东两省所了解到的情况看，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河北省现有排灌机械62万马力，能够经常使用的为43万马力，利用率不到70%。山东省现有拖拉机1354混合台，其中因缺配件不能使用的有419台，利用率也不到70%。我在通县西集人民公社参观时，该社6台康拜因由于缺链条，有5台不能使用。

目前，很多农业机械待修的原因，一是缺配件，一是修理技术水平低，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不足。配件缺少的原因，主要是工厂减少了配件的生产，有的厂反映是缺少原材料，特别是合金

钢和有色金属，有的厂是因为追求产值，只顾生产整机，不愿生产配件。例如，洛阳拖拉机厂在1959年接受的配件任务完成的很差，齿轮、链轨板、喷油头等均未交货。今年洛阳和天津拖拉机厂均有生产配件任务，但上半年均未安排生产。我在兖州中甸友谊农场参观修配厂，即看到一台东方红因缺汽缸圈，无法出厂，据说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要也没有要到。因此，今后必须增加配件的生产。国家在安排生产计划的同时，要安排机械设备的维修，拨给一定数量的钢材和其他材料专材专用，对国内成批生产的农业机械，应当规定生产厂在制造整套机器时，同时按一定比例生产配件；对国外进口，或国内零星制造，型号比较复杂的农业机械，应当指定专门工厂生产配件。在一定时期内，应当强调先维修、后生产，以便使现有的机械，充分发挥作用。另外，要建立和健全农业修配网的系统，承担农业机械的修配任务。

由于我国拖拉机许多是外国进口的，型号复杂，更增加了修理的困难。今后几年，我国将还会从外国进口拖拉机，为了便于农业机械的管理和维修工作，对从国外进口的农业机械要按种类、型号集中分配使用。例如，匈牙利的拖拉机和机引农具，可以集中分配到山东济宁专区使用，因为那里有一个中甸友谊拖拉机站，有修理匈牙利机器的整套设备和熟练的技术人员。据我们在北京市通县西集人民公社了解，这个社的15台拖拉机分别由波、捷、罗、匈、法、英等6个国家制造，型号各不相同，增加了管理和维修的困难。所以，对今后进口的拖拉机，加强管理，集中分配，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八、其他问题。

1. 目前有些农业机械价格太高，应作适当调整。现在，各县和人民公社都有了一定的积累，迫切要求购买机器，问题在于工业方面生产农业机器数量太少，供不应求，而主要不是价格的高低问题。但是，有些农业机械价格过高，也影响了农民使用机

器的积极性。如山东省各地制造的太谷号收割机每部要卖四五百元，高的甚至要 1000 多元（这种机器的构造是比较简单的，国家规定每部价格为 180 元）。这就使得有些地方不愿意买，宁可用刀割麦。山东省今年生产了 3 万台这种收割机，通过商业部卖出的只有 1.7 万多台。又如济南柴油机厂生产的柴油机每台售价 1.7 万元，而它的成本只要 6000 元，利润达 180%。

农业机械售价过高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初次制造，工厂将试制费摊入成本，这是不合理的。对于新产品的试制，应当由各级政府，作适当补贴。

对农业机械的价格可以研究一下，如果订价过高会影响农民使用机械的积极性。国家可把这些产品价格降低一些，另一方面从财政上少给人民公社补贴一些，这对国家财政预算收支是一样的，但影响却不同。

2、关于工矿交通事业占用农村土地的问题。我们在参观天津拖拉机厂时发现该厂新建厂房占地 180 公顷，这种情况，就全国范围来说也是比较严重的，1958 年、1959 年两年来，全国耕地面积减少了 8000 万亩。工矿交通事业占用农村土地，有些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也有浪费现象，据粗略估计，占用不当的约 20% 左右。今后应提倡少占用农村土地和不占用农村好地，并把它列作工业支援农业的内容之一。

3、人民公社是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单位，因此，工业支援农业，也必须是全面地支援农、林、牧、付、渔各种行业。目前沿海各省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缺少渔轮，不能到深水中去和日本渔业进行竞争，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损失。因此，今后多建一些渔轮，充实和加强我国水产工作的队伍是十分必要的。同时，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水库、沟渠养鱼大量增加，解决一些捕捞工具，对食品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是有好处的。

华北区 1961 年国民经济 计划中的几个问题¹

(1960 年 10 月 30 日)

华北局计委刚筹建，工作还不到半个月，情况了解很少，同时，省、市、自治区 1961 年计划草案还正在编制中，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只是省、市、自治区计委讨论国家计委控制数字时所提出的初步意见（还没有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查），因此，今天只能提出几个问题，供华北局参考。

一、关于 1961 年经济建设的方针问题

我们认为，中央批转国家计委提出的 1961 年国民经济建设采取在发展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对于华北地区来说，是完全适合的。大跃进三年来，华北地区各个经济建设战线上都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以钢、铁、煤的生产来说，1958 年至 1960 年的三年中，钢产量由 75 万吨增加到 330 多万吨，增长 3.4 倍；生铁产量由 94 万吨增加到 600 多万吨；增长 5 倍以上；煤产量由 4300 多万吨增加到 1.03 亿吨左右，增长 1.2 倍。作为华北发展农业关键的水利建设，三年来的成绩也特别显著。1958 年至 1960 年增加的灌溉工程控制面积 9000 万亩，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的总数还多 3 倍多。目前，河北境内海河流域，山西境内汾河流域已基本得到治理；内蒙境内的黄河也

¹这是朱理治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当时他担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兼计划委员会主任。

初步得到开发利用。这些都为今后华北建立经济体系和争取农业过关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是，目前国民经济中也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一) 农业灾情严重，今年全区大部分地区遭受了灾害，特别是河北、山西遭遇到70年来所未有的严重灾荒。虽然经过全党全民艰苦奋斗，减轻了灾情，但全区成灾的面积仍占到全部耕地面积的将近一半。1960年粮食预计产量为332亿斤，每人平均拥有量只有417斤，较全国平均每人拥有量590斤低29%。

农业灾荒不仅影响到粮食及副食品的生产；而且影响到轻工业原料的供应。例如，棉花比去年减少30%，油料减少20%。这是在制定明年计划时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二) 工业交通各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内部的发展还不平衡。例如，在钢铁工业中，采矿、选矿、烧结能力还很落后。小洋群、小土群企业中，大部分还是手工操作，生产还不稳定，质量很低。生产钢和钢材的品种少，规格不全，八大品种的钢材生产数量在全国只占40%左右，已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华北仅占17%左右。

(三) 基本建设虽然经过压缩，但战线还是太长，超过材料设备的可能，力量分散，投资效果不能充分发挥。

所以，明年经济建设采取在发展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是非常需要的。

根据华北地区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明年计划的方针应当是：

1、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加强工业和其他方面对农业的支援，使农业获得较快的发展。

2、在工业生产中，着重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注意设备维修，确保安全，充分发挥现有设备能力。

3. 基本建设必须以中、小为主，填平补齐，加紧对小洋群、小土群企业的技术改造；分别缓急轻重，进行排队，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非生产性的建设，除必要的职工宿舍、学校和营房外，一概停止。

4. 在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同时，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适当照顾人民生活。

5. 注意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关于钢、铁、煤的生产指标问题

这个问题关系很大，订低了影响我国工业化的速度，订高了又有挤占农业劳动力和运输力、影响农业发展的危险性，需要很好地加以研究。

按照国家计委提出的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华北区钢产量为 465 万吨，生铁为 740 万吨，原煤为 12050 万吨。

根据省、市、自治区计委这次提出的 1961 年初步计划数（都还没有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查），全区的钢产量是 385 万吨至 387 万吨，铁是 675 万吨，煤是 10810 万吨。这些数字，同 1960 年的预计完成数比较，除个别省市、个别产品外，都有所增加。例如，钢增长 16.5%，铁增长 12.1%，煤增长 4.8%。

但是，根据省、市、自治区计委这次提出的数字汇总，全区明年钢、铁、煤计划指标都较国家计委的控制数降低不少，钢减少 78 至 80 万吨，铁减少 65 万吨，煤减少 1240 万吨。我们感觉，这个情况是值得加以注意和研究的。

为什么省、市、自治区计委提出初步计划数都比控制数为低呢？据省、市、自治区计委的汇报，其原因主要有：

（一）钢铁工业的发展同农业的发展在劳动力和运输力的使用上有矛盾。华北钢铁工业在采矿、选矿、烧结、洗煤和炼焦等

一流生产环节中，手工劳动所占比重很大。例如，河北省土法炼焦的比重，占全部焦炭产量的70%，山西省生产的矿石全部由小型矿山开采，这些小洋群、小土群企业生产，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今后要使钢铁产量继续增长，又必须相应地增加大量劳动力。这在目前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山西农业灾情严重，劳动力又很紧张的情况下，是很困难的。既然不能增加劳动力，就必须对小洋群和小土群企业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这需要一定的资金、材料和设备，而且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

(二) 煤炭供应不足。华北区是我国生产煤炭的主要基地之一，并负有支援外区的任务。按照国家计委控制数字，煤的增长比钢铁的增长少得多，钢增长40%左右，铁增长17%，而煤只增长10%。至于省、市、自治区计委提出的煤炭产量还低于1960年预计数的1%。

(三) 交通运输不能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有些铁路干线的运量已担负不了，有些厂矿缺乏支线和专用线，装卸力量薄弱，短途运力不够。目前，一方面煤炭供应紧张，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煤炭运不出来。例如，河北省仅邯郸、承德二个地区，即有250万吨煤运不出，山西各地存煤大约有四五百万吨。

(四) 煤、铁的原有产量，还没有落实。据河北省计委估计，1960年生铁的产量中约有10%至12%的虚数，煤约有5%到10%的亏吨；山西省1960年煤的产量估计约有10%的亏吨。

省、市、自治区计委提出上述一些理由，根据中央关于计划落实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考虑的，准备提供国家计委参考。

但是，省、市、自治区计委提出的计划数字，是否可能再提高一些，这也是值得考虑的。明年计划如果再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例如，通过抓紧对小洋群的技术改造，深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提高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程度，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煤、铁的质量，在炼焦、炼铁、炼钢的过程中，降低原煤、焦炭和生铁的消耗；改进企业管理，注意安全生产等办法，是有可能提高钢、铁、煤的产量的。

请省、市、自治区特别是小洋群比较多、困难较大的河北和山西省负责同志再进一步抓一下钢、铁、煤的产量问题，务使明年代表整个工业水平的钢、铁、煤的生产计划指标，订得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既是积极跃进，又是留有余地，经过努力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三、关于基本建设规模和钢铁小洋群的技术改造问题

国家计委 1961 年基本建设投资控制数，分配给华北地区的为 31.8 亿元。据我们了解，有些省、市感到投资不足。按目前实际情况看，国家计委的 1961 年基本建设投资控制数字，不但不能再有增加，而且可能减少。因此，对明年基本建设的安排，是否可以考虑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妥善安排建设项目，把 1961 年基本建设投资约束在国家控制数字之内。据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反映，该区现在已经上马的基本建设项目有 600 个，明年准备安排 160 个，缩短战线以后，明年预计可以完成 134 个，其中 70 个可以提前在上半年建成。他们对以下项目给予优先安排：1、能够在上半年投产的项目；2、属于填平补齐的配套项目；3、稍加投资，即能增加生产能力，很快能发挥投资效果的项目；4、与广大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项目。我们觉得这种安排基建投资的方法比较好。

根据华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明年基本建设方面有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小洋群钢铁企业改造的投资还没有得到安排。

华北地区钢铁工业中小洋群、小土群企业所占比重很大。例

如，河北省今年头三个季度内所生产的生铁有60%是依靠小洋群企业生产出来的。为了保证今后钢铁产量的持续跃进，节约大量劳动力和短途运输力，必须有选择地，有步骤的进行对它们的技术改造；改造的重点应当是：矿山、选矿、烧结、炼焦及厂矿内外运输。

河北省计委对小洋群、小土群企业的技术改造，提出了初步意见，准备明年搞二十孔焦炉7组，十八平方米烧结机6台，简易选矿设备10套，以及增加一些小矿山的设备和运输工具。这些设备投入生产以后，就能使机械化炼焦在全部焦炭产量中所占的比重，由现在的30%上升到70%；现有粉矿（占全省矿石产量的40%）的45%进行烧结，不致浪费；含铁在40%以下的贫矿，品位提高到55%到60%。同时，还可以节约劳动力5万人，大车7000至8000辆，回收化肥3.6万吨。但是，这样安排需要投资7500万元，以及相应的钢材。而这方面的投资，在国家控制数字内没有安排，要完全依靠自筹也有困难。

我们感觉河北省计委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华北其它省、市、自治区也存在这种问题，值得予以重视。拟请国家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计委进一步研究解决。

四、关于工业支援农业的几个问题

据省、市、自治区计委提出的初步意见，全区1961年计划生产粮食380亿到407亿斤（大豆在外），比今年的预计产量增长14.4%至22.7%；棉花758万至808万担，增长19.3%至27%，增长速度是比较高的。目前，中央、华北局和省、市、自治区都已经或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争取明年农业有较大的发展。我们只在这里对工业支援农业方面，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关于农业机械

华北区现有耕畜 570 万头，用于农业耕作的大约有 500 万头；全区现有的拖拉机 1.4 万标准台，到今年年底可以达到将近 1.5 万标准台。两者能负担耕地面积共计约 1.3 亿亩左右。全区现有耕地 2.7 亿亩，因此还有大约 1.4 亿亩，即 52% 左右的耕地要靠人力耕作。这是目前华北地区发展农业生产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为了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和逐步解决工农业在劳动力上的矛盾，需要大量增加拖拉机。中央已经把河北、山西列入了分配农业机械的重点地区。明年具体分配给华北多少台，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但估计将超过现有的数量，即明年华北拥有拖拉机数目将比现有数增加一倍以上。使用和管理这样大量的拖拉机，必须很好地加以组织。如果组织得好，一台拖拉机可顶两台用，如果组织得不好，两台能顶一台用。因此，必须大力培训司机和保修人员，建立和健全拖拉机修理站和修理厂，做好拖拉机的保养和修理工作。拖拉机配件的生产和供应要各地切实安排和组织，需要在区内省、市、自治区之间分工协作的，拟请经委在全国统一安排下，加以组织。此外，目前拖拉机和其它农业机械损坏的情况很严重，需要各地抓一下，务须在明年春耕以前修好。

为了支援农业，还必须抓紧农业机械工业的基本建设，尽快地增加农业机械的生产。对天津拖拉机厂的扩建和运城拖拉机厂的新建工作，应当抓紧进行。特别是天津拖拉机厂关系重大，这个厂早建成一个月即可多生产 2000 台拖拉机，更应重视。

由于拖拉机及其它农业机械目前还不能满足需要，所以明年还是应当贯彻执行以半机械化农具和改良农具为主的方针。这些农具主要由各地自行生产供应。同时，各地对小农具的生产和供应也要注意安排。

（二）关于化肥

国家计委 1961 年计划控制数字中，华北地区化肥产量为

44.8 万吨。各地应当督促化肥工厂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能力，做好设备的保养维修工作，保证安全生产，特别要优先供应其所需原材料（如焦炭、硫酸），使明年计划指标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

在化肥厂的基本建设方面，综合省、市、自治区计委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1、加快大型厂的建设，使它提早投入生产。据河北省计委反映，石家庄化肥厂原定建设规模为年产合成氨 5 万吨，现土建已经完工，原来分配的一套 2.5 万吨设备大部已经装完，如果明年再分配给一套年产 2.5 万吨的设备，即可按全部设计规模完成。这样建设快，投资效果又可以很快发挥，更早些生产化肥。但国家计委分配方案中没有安排，拟报请国家计委考虑。2、积极建设小化肥厂（800 吨和 2000 吨），解决技术过关问题，以便尽快地大量推广。3、进一步组织炼焦回收工作，增加化肥的生产。

（三）关于水利

华北区的水利建设，应当是在充分利用地上水的同时，积极利用地下水。关于水库工程的成龙配套，充分发挥其效益，这方面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已有安排。

对地下水的利用究竟要打多少机井和打在什么地方，请省、市、自治区根据设备、材料的可能和当地的地理条件进行仔细研究和统盘规划。河北和北京提出先易后难，先浅后深，先恢复旧井后打新井，先配套后新建等原则，我们认为是很好的。

对排灌机械，在今年冬天就应抓紧安排生产和原材料的供应，以便在明春不误农时地供应使用。

总之，明年在工业和其他方面都必须把支援农业作为首要任务，力争农业丰收。

* * * * *

以上这些，只是我们初步的意见。我们准备在 11 月 15 日前

同省、市、自治区计委再仔细研究一次，待向华北局汇报和请示以后，同省、市、自治区计委的同志一起向国家计委提出。

至于在华北区建立经济体系的问题，我们准备在建立起机构和搞好明年计划以后，再集中力量加以研究。

关于华北局计委的工作方法^①

(1964年1月)

事物有矛盾的两方面（一分为二），但这两方面不是平列的，都有一个重点，即主要的方面。我们抓工作，要狠狠地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初步设想，在我们的工作中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

1、工业和农业如何抓？我认为都要抓，但重点是抓农业。以农业为基础，在第三个五年内首先要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而且农业归地方管，便于我们抓。工业主要由中央管，我们发言权比较少。

2、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如何抓？我们都要抓，但主要抓地方工业。

3、我们单独搞工作，还是配合国家计委、中央部和帮助省、市搞好工作？我认为主要是配合，帮助和组织各方面一起来搞计划工作。因为我们不是一级计划机构，只有几十个人，自己要单独搞某一项工作而不运用上、下级计划部门的力量，是比较困难的。但如果我们能很好配合，帮助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一起搞工作，是能做出许多有益的工作的，是能够当好书记处^②在计划工作方面的参谋的。

4、机关工作和下去调查研究哪个为主？我认为应当主要是

^①这是朱理治在中共中央华北局计划委员会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书记处，指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

下去搞调查研究。我们搞计划工作，每年至少要有八、九个月在下面。不下去调查研究，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群众中的新鲜事物你不知道，无论如何是搞不好计划工作的。在机关综合分析和算账是需要的，但重点应该是下去调查研究。

如何把华北地区的农业搞上去¹

(1964年5月25日)

去冬今春以来，华北地区雨雪较多，墒情好，肥料足，麦田管理也好，夏季丰收在望。只要不遇特大灾害，今年华北地区的粮食总产量预计可以达到350亿斤左右，超过了1957年。棉花总产量可以达到560至568万担，虽然超过了国家计划，但只相当于1957年总产量的66.7%至68%。

华北地区目前农业生产总的说来是灾害频繁，产量低，不稳定。解放以来，华北平均每年不同程度的成灾面积为5500万亩，丰收年也在3000万亩左右，灾年则在6000万亩以上；1963年的成灾面积达到了9670万亩。粮食产量高年和低年相差100亿斤上下。

由于粮食困难，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影响各种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和华北工业的发展及国防基地的建设是很不适应的。

华北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有很多有利条件：

1、在贯彻了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开展了以“双十条”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后，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有很大变化，阶级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正在形成一个新的高潮。即使是河北省灾区，情况亦是为此。只要我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当冷静的促进

¹这是朱理治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华北小组会上的部分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派，不滥用群众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会持续发展下去的。

2、建国以来，我们在发展农业方面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农业战线上出现了一大批稳产高产的典型社、队和地区，如能很好地总结并推广这些成功的典型经验，将对搞好农业生产起重重要作用。

3、近几年来，农业“四化”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大跃进以来进行的水利建设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57年，全部水库容量只有27亿立方米，现在已有217.8亿立方米（小型水库不在内），增加了7倍。农用拖拉机1963年为2.1万台，比1957年增加了10倍。耕畜虽比1957年还少114万头，但已扭转了从1956年起逐年下降的局面。

4、华北地区工业基础好，可以更好地支援农业；科学技术专家较多，能够随时得到他们的帮助；加之又是首都所在地，可以得到中央的及时领导和中央各部门的帮助。

只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把工作做好，我相信，肯定可以完成“三五”规划的420亿至450亿斤的粮食指标。

关于如何把华北地区农业搞上去，考虑采取以下一些办法：

第一，要发扬大寨精神，种好2.67亿亩耕地。

现在各地都开展了学大寨赶大寨的运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许多事实证明，中央提出的学习大寨，走大寨道路的号召，是符合广大群众愿望的，现在已经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在全国农业规划会议以后，我们派人参加了山西、河北的规划会议，他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山西省在会上举了38个对比例子，一种是靠自力更生，结果增加了生产；一种是依赖国家，结果反而减产，很有教育意义。他们一致认为要好好规划，反对向国家伸手。

看来，要把中央的精神贯彻到规划中去，并落实到生产队，还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山西要求把农业规划与“四

、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起来，凡在“四清”快结束的地方，要在结束时搞出一个规划，使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并帮助生产队搞好生产规划。山西这个办法很好。中央原规定8月底要上报落实规划，现在看，这个时间仓促了一些，恐怕要到9、10月，省一级才能搞出来。

第二，建立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

全区现有保浇地4600万亩（不完全是稳产高产），按最近省、市、自治区意见，1970年建设有水利投资的稳产高产田达到6250万至6500万亩，6年内新增1650万至1900万亩（比农业规划会议汇总数少了950万亩），每年平均增250万至350万亩。各省、市、自治区还提出第二类即大寨式农田，1970年达到3550万亩，其中亩产400斤以上的1300万亩，这是第一梯队，其他作为第二梯队。看来，这些设想是比较合适的。但究竟搞多少，还要看按片规划后的结果。

在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基本田方面，北京可以作一个样板。他们把地下水源都摸清了，搞了比较切实可行的规划，集中力量一片一片地搞。北京的土地面积现在较1952年减少了200多万亩好地，但他们除保证了首都副食品供应之外，粮食产量逐年增长，这主要是因为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从目前情况看，北京市到1970年平均亩产提高到550斤，将来一亩地养活一口人的想法是可能实现的。

华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例如河北省京汉、京山铁路两侧，地形大体与北京一样。北京的经验对这些地方可能会有帮助的。山西省太谷县的“四化”，采取土洋结合、从土到洋的方针搞，可以节约国家投资，是一种好办法。总之，对华北十多片稳产高产田都应当一片一片地摸，很好地进行勘察、设计，搞出规划。

第三，搞好山区建设。

从华北来说，山区耕地占总耕地的40%；从山西省来说，

山区耕地占总耕地的70%以上。从治水来看，如不把山区水土流失治好，水灾就无法根治。如果山区一个山，一条沟都治好，也就把华北水灾治理了一半。这主要靠发扬大寨精神，根据不同情况，由生产大队、公社来搞。在山区建设中，国家对山区交通、植树造林、吃水等方面，应适当地给予支持与帮助。

第四，治理海河。

这的确是件大事，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中央的其他同志都很关心，这次国家计委提出的方案，已将开辟滏阳河入海河道和治理华北平原内涝项目列入规划。现在的问题是要快些搞出有科学根据的规划和初步设计。要求水电部和中央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以下问题：（1）早日成立海河设计院；（2）支援一些钻探和测绘力量。这件事是百年大计，规划方案要发动科学家、群众及各级有关领导同志充分讨论。目前除在上游山区进行植树造林、控制水土流失外，要采取措施，加固现有水库，以保安全。

第五，充分利用华北工业潜力支援农业。

华北工业潜力很大，天津市的机械工业仅次于上海，北京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如果这两个地方，加上华北区其他一些工业城市很好合作起来，可为农业做很多事情。这个问题，我们准备配合这次机械工业调整和搞五年计划进一步摸一下。初步考虑，想学上海的办法，搞好专业协作。首先组织好30个工厂和天津拖拉机厂进行协作，帮助把拖拉机厂很快建成，并准备采取协作方法试制手扶拖拉机。天津向高精尖发展，可将一些轻工业和一般工厂搬到山西和内蒙古。提高与扩大北京、天津农药生产，发展一批水氮肥厂、小立窑水泥和小煤窑。专区和市管的企业应肯定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因地制宜地生产一些半机械化农具，改良农具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计划工作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¹

(1964年6月)

这次会议一开始，首先传达了毛主席和中央的有关指示，使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毛主席在这次搞长远规划之前，根据富春²同志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指出这些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斯大林总结了苏联30年的经济建设，写了一本《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条也是说社会主义建设有其客观规律，必须遵照这种规律，才能做好长期和年度计划。对此，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计划要尊重客观规律。计划有两种方法，一种认为，计划很容易，可以主观地规定指标，引伸出一个计划；另一种是做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出一个能够反映客观上存在着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案。只有后一种方法，才能搞好计划。

第二，计划要留有余地。编制年度尤其是长期计划，必须要留有余地，这是客观规律。因为搞年度和五年计划，要把一年以及五年期内政治、经济、技术的变化完全预计清楚，是困难的。所以，基本建设项目不能规定的太多，国家财政上必须留相当的预备费，国家储备亦必须留够。只要有设计好了的项目预备着，在年度计划以及每年6、7月间再增加上去，也很容易。留有余地不能解释为在生产指标上层层打折扣，在基本建设上层层加码。

¹ 这是朱理治在华北区计划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

² 富春，即李富春。

第三，计划要综合平衡，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这次计划的方法就是“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先搞农业，国防这两个拳头，再使基础工业来适应他们，同时相应地发展文教卫生和交通运输等等。除了按行业综合平衡以外，还要如山西的同志讲的，进行地区平衡。如劳动力和粮食的平衡，砖瓦砂石等地方材料的生产供应，轻、重工业的安排等等。全国必须一盘棋是肯定的，但同时要避免相向运输和远距离运输，特别是还要考虑到战略布局问题。

第四，计划要有重点。毛主席指示要打歼灭战，要少而精。只有打歼灭战，才能充分发挥投资效益，才能使投资效果很快地发挥出来。战线长，主观上是要建设快，实际上进度慢，效益差。

第五，计划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扬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做到两个钱当十个钱用。上面说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是说我们不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经济建设和作战是一样，人总是起主导作用的。山西省委印了27个对比例子。一种是采用自力更生的态度，结果改变了落后面貌；另一种是依靠上级给投资，给设备，结果反而减产，很可说明这点。当然，国家投资和设备是必要的，但要看你如何用。这就和打仗一样，大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广阔场所。

以上这些问题，毛主席和中央很早就提出来了，我们过去体会不深。这次搞规划综合了起来，科学地总结了以前计划工作的经验，使得计划这门科学能够在更完备、更高水平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我想，我们按这个精神搞计划，一定会搞得更好。

关于包钢^①建设的几个意见^②

(1964年7月26日)

我们参观了包钢并研究了“三五”计划期间的包钢建设，感到包钢建设存在着外部问题，但更主要的是内部问题。

过去包钢建设存在严重的质量事故，要改建或推倒重来还需要4500万元，现有国外设备还缺少一些重要零件，安排国内制造的设备有的还需要试制，有的如烧结冷却及团矿技术还没有完全过关。包钢生产、基建、设计和科研等各个方面鼎足而立，各归冶金部的有关领导，不相隶属，工作上不协调；人员机构一方面臃肿（全公司非生产人员8800人），一方面又缺人很多；工作中浪费情况严重。对这些问题如不采取重大措施，“三五”期间要建成150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仍会有很大困难。因此，我们的意见是：

一、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建议，学习大庆的办法，成立包钢会战总指挥部，由冶金部派副部长前来主持，包头市委派主管同志参加，系统总结以往经验，统一由冶金部领导，挖掘内部潜力，以节约劳动力和国家投资。

二、为了保证包钢设备的供应，建议一机部派一工作组到包钢负责主持研究和处理有关包钢基本设备供应中的问题。

三、关于包钢的用水问题，因黄河经常变动，原建两个取水

① 包钢，包头钢铁公司简称。

② 这是朱理治以他和罗日运的名义写给李富春、李雪峰、乌兰夫和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国家计委党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并冶金部、一机部党组的报告。

口，有一个已经堵塞，尤其在枯水季节，包钢用水无法保证。如依靠“三盛公”¹引水来包头，费用更大，损害农田更多。同意结合内蒙西部地区粮食基地的建设，兴建黄河“二管制”工程。建议由水电部负责及早提出报告和设计任务书。

¹三盛公，内蒙古境内的黄河水利枢纽。

华北区 1965 年国民经济 计划的方针任务¹

(1964 年 8 月)

根据今年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华北地区的具体情况，我们考虑 1965 年华北区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三年过渡阶段的最后一年把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做好，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华北区的战略布局创造有利条件。具体说，在 1965 年要抓以下几个方针性的问题：

(一) 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精神，努力发展农业，为华北区粮食自给逐步创造条件。

1. 发扬大寨精神，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进行农业建设。在山区和丘陵区着重抓土地建设和植树造林；在平原地区有水利条件的地方，努力进行土地平整和小型农用水利建设；在低洼易涝地区，着重进行排涝治碱；在风沙为害地区要大搞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良土壤；同时，大力发展养猪（山区发展养羊），增加肥料。总之，明年要使农业增产的三项基本措施（水、土、肥）做出比今年更大的成绩。

2. 贯彻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农林牧副全面安排的方针，增加积累，增加社员收入，逐步改变一部分社队“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情况。

3. 抓紧黄辽两个粮食基地以及京津唐粮食产区的建设工作。

4. 加强工业支援农业工作。地方机械厂主要服务于农业，应

¹ 这是朱理治在华北区计委主任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做具体规划。发展小型氮肥厂，明年争取安排三套。

5. 积极进行海河治理的设计和 research，争取上半年做出结论，下半年开始施工的筹备工作。

(二) 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1. 明年是调整的最后一年，必须对调整中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使之获得花钱少、收益大的显著成效。

2. 重点安排水利工程的配套受益工程。

3. 对农村输电线路进行改造。

4. 工业上要注意安排技术改造和必要的设备更新，改造落后的工艺，加强技术后方。

5. 继续强调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并在这个基础上增加生产。有些产品现在供过于求，可以适当压缩产量，以便调整企业内部关系。

(三) 积极支援全国三线，建设华北战略后方。

1. 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加强对全国和华北的后方建设的支援。

2. 加强山区建设。山区不仅是过去的根据地，而且也是今后华北的战略后方。现在山区人民已有所反映，说我们到了大城市，忘了他们。山区建设基本上抓以下三条：(1) 搞土地建设，增产粮食。(2) 大搞植树造林，水土保持。(3) 建设山区交通。(4) 解决山区人畜饮水问题。

3. 有重点地进行交通建设。

4. 做好地方的军工规划和建设工作。

5. 做好“小上海”、“小天津”的规划，按照规划，建立起小协作区的组织（初步考虑三个：北京、大同、张家口、包头；保定、石家庄、阳泉、太原；邢台、邯郸、长治、天津、唐山、承

德)，进行建设的准备工作。

6.加强山西、内蒙轻工业建设的安排，从天津、北京搬一些工厂到山西、内蒙（包括轻工业和当地重工业中的缺门）。可以考虑迁厂，也可以考虑一分为二的方法，支援技术力量或部分设备。

（四）试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不断研究和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此外，省、市、自治区同志在汇报中还提到1965年安排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

1.地方建筑材料明年缺口很大，要建设一些矿渣、烟灰砖厂和普通砖厂；2.几个城市的防洪、污水处理、职工宿舍建设问题；3.内蒙的边境建设问题；4.中小学校舍建设问题；5.计划管理体制问题等等。准备由华北局计委的同志会同省委同志，再把材料整理一下，向华北局和国家计委反映，请国家计委在安排1965年计划时，考虑解决。

计划工作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¹

(1964年10月)

我们计划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计划工作没有贯彻调查研究的方法。国家计委、中央各部以及省市计委，包括我们华北局计委在内，对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没有摸透，没有抓住关键，只是盲目地叫喊。这种风气相当普遍。

计划方法到底是什么？苏联教科书说计划方法就是平衡法。我们也照搬了这种方法，单纯从平衡表上发现矛盾，追求平衡，实际这是表面上的平衡。无论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都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真正认识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必须使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即一分为二的方法。更通俗地说，就是好好调查研究，把问题摸透，摸出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经济工作也是一样。现在，我们的经济工作相当繁杂，如果不掌握它的客观规律，就会越忙越乱。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计委的工作，都有客观规律。我们应该遵循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方法，探索这个规律，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每反复一次，就要提高一步。但是，过去一个阶段，我们在深入调查研究，以两点论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总结经验，掌握客观规律，学习理论，学习业务知识等等方面都不够。例如“托拉斯”实质是什么？有的人根本没有理解，只是搬了个名字来。对资本主义管理中的一些好的东西，很多人没有认真研究过。方法不改变，事物规律不摸清

¹这是朱理治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楚，工作永远搞不好。

二、过去一个阶段，我们没有吃透两头。吃透两头，就是既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又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我们在过去一个时间内，对党的总路线理解不够，着重抓了多快，对好省抓的不够。这两年虽然搞了品种质量，但对省字还抓的不够。省，就是利用价值法则，经济核算办法办企业。斯大林说要把价值法则做为学校训练经济工作人员，毛主席很早以前也提出了经济核算问题。可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有一个时期把中央各部的财务局也取消了。企业管理中的成本问题是个综合指标，核心问题。生产的各个环节中的问题，最终要反映到成本上去。可是有些领导同志却不注意成本工作，不了解成本情况。如农业机械昂贵，一台磨面机就需400—500元，等于一个生产队一年的积累。因而农业上不敢用工业品，长期处于一双手和一头牛的耕作情况。工业上表面的利润很大，成本却逐年提高，生铁由过去每吨80—90元提高到150元。如何体现党提出来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把工业转人为农业服务的轨道，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成本高，实际上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力的增加，劳动生产率降低。这是对总路线的“省”注意不够的表现。另外，是对下面的情况也搞不清楚。计划工作是一年计划、计划一年。整天开会，非常辛苦，却没有时间深入实际，检查了解情况。我曾设想计委的人数可适当增加，轮班下去。

计划工作，应先理解党的方针政策，不应只是争项目、争投资。

三、计划工作没走好群众路线。近几年来，搞计划没法控制数字，因为不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上相结合。

四、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但计划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却很薄弱，存在着不讲真话，报假数字，怕当老实人吃亏，看领导意图办事的风气，也存在着官僚主义和没有整体观念的分散

主义。应该整风。

五、我们现有的规章制度，有许多妨碍积极性的地方。但是，由于我们对整套制度没有很好地分析，因此在破了坏的同时，也可能破了好好的，或者是这里合理了，那里又不合理了。计划制度、劳动制度、财务制度、物资制度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否定、扬弃也。应当丢掉坏的，发扬好的。过去，我们有消极否定现象。条块之间的矛盾，一万年都会存在，问题是如何调整，发挥积极的一方面。例如，地方党委就可以把中央的厂子也管起来。天津市如果将中央和地方的有关修理机械厂结合起来，生产能力就可以提高一倍。北京、其它地方都可以这样做。总之，要想办法。

六、计委与各部的关系上存在一定问题。计委是国有经济建设的参谋部，应该配备最好的干部。现在的计委与各部是平等的，中央各部上面还有各办，计委上面却没有财经小组或是中财委的组织形式。因此，计委说话有时不起作用，计委的综合平衡工作也就变成了调合矛盾的工作。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华北地区 农业发展的设想¹

(1965年6月14日)

1970年的粮食总产量，计划450亿—530亿斤，比1964年364亿斤增产86亿—166亿斤，平均每年递增3.7%—6.4%。可能超过，遇到特大灾荒也许还不足，要依靠国家和集体事先的储备。

华北区现有人口8469万人，到1970年估计要达到9537万人，每年递增2%多。要压到递增2%，还需要在计划生育方面做许多工作。1970年粮食总产量按450亿—530亿斤计算，全区每人平均社会占有量473—556斤。如扣除北京非农业人口，占有量则为501—556斤。

全区除草原、沙漠和林区以外，农业地区大体分为五类：

(一) 平原和盆地。包括京广、京西路两侧，山西盆地，内蒙黄辽灌区，土默川及北京郊区平原，共124个县(旗、市)，耕地9885万亩，3265万农业人口。1970年计划建成粮食稳产高产田6711万亩，耕地亩产401斤，总产量达到269亿斤。

这类地区的特点是，地势平坦，水电条件好，耕作比较细致，适宜发展园田化，建设稳产高产田。

(二) 土石山区和丘陵区。包括太行、太岳、中条、五台、恒山、燕山等山区，82个县(市)，耕地3977万亩，1443万农

¹这是朱理治起草的《华北区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汇报提纲》中关于农业发展的部分内容。标题为编者所加。

业人口。1970年计划建成粮食稳产高产田1845万亩，耕地亩产402斤，总产量达到74.2亿斤。

这类地区的特点是，多为沟地，大搞林、梯、坝，搞好水土保持，再加上认真推广大寨创造出来的一整套耕作技术的措施，就可稳产高产。

(三) 低洼易涝和盐碱地区。主要是津浦线两侧、滨海地带及山西、内蒙一些地区，48个县(市)。耕地4028万亩，1253万农业人口。1970年计划建成粮食基本农田2105万亩，耕地亩产260斤，总产量达到54.7亿斤。

这类地区主要采取“排、台、改、灌、林”等措施。

(四) 黄土高原丘陵地区。包括吕梁山、晋西北和阴山前等地区，38个县(旗)。耕地亩产257斤，总产量达10.8亿斤。

这类地区水土流失严重，风砂灾害很大，土质瘠薄，产量很低。主要措施是狠抓造林固砂，水土保持，梯田林网，草田轮作，深耕多肥，技术改革。

(五) 高寒山地和丘陵地区。包括内蒙阴山后、哲、昭盟南北丘陵，岭东岭南和河北坝上等地区，33个县(旗)。耕地5552万亩，519万农业人口。1970年计划建成粮食基本农田557万亩，耕地亩产346斤，总产量达到19.3亿斤。

这类地区无霜期短，耕作粗放，宜于实行农牧林结合，草田轮作，种植耐寒高产作物。

在五类地区当中，稳产高产田和基本农田总计11638万亩，占粮食耕地面积的53.7%；粮食总产量428亿斤，占粮食总产量530亿斤的80.7%（这些数字是据省、市、自治区规划汇总起来的，可能偏多一些）。

现在全区已经出现了一批达纲要上的先进县(市)社队。

1 纲要，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六十条》。

去年粮食亩产超过 400 斤的县（市）7 个，公社 418 个，大队 7171 个，其中 800 斤以上的大队 144 个。也出现了许多棉花高产先进单位，山西省曲沃县去年全县平均亩产皮棉 80 斤。看来只要加强领导，认真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抓紧过硬的关键措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采取分类指导，阶梯前进的方式，就可以分批地实现纲要。

第三个五年，我们要求重点把黄河、辽河灌区，京广、京山线两侧，山西盆地，土石山区等建设成为粮食基地，同张家口、太行、燕山、吕梁、内蒙西部等战略经济区的建设结合起来，为备战准备好粮食。

自去年中央提出学大寨以后，华北农业战线上进一步开展了学大寨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为了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动群众进行生产革命。

（一）大搞土地建设。

大寨的经验，土地变，技术变，然后才能高产。土地建设是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各类地区都有土地建设的任务。在山区建设大寨式的水平梯田，在平原和盆地建设园田，在低洼易涝和盐碱地区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台田、条田，在风砂大的地区建设林网畦田。到 1970 年，全区计划建设梯田、园田、台田等基本农田 10880 万亩。

（二）除水害，兴水利。

根据华北地区的情况，在治水方面，我们总的想法是：治山、治水、整库、排涝、治碱、发展灌溉。

华北山区雨量集中，水土流失严重，山洪形成毁灭性灾害。从长远看，治山是治水之本。主要办法是封山、造林、植树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综合治理。

根治海河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治理黑龙港河系、子牙河系，开辟献县减河，滏阳河分洪道。

疏浚、开阔大清河下游入海河道。内蒙黄河灌区的建设，集中力量在二年内完成三盛公枢纽和灌河区配套，疏通乌加河，开挖排水渠系，尽快发挥效益。黄河灌河区二首制建设问题，要在尽快解决技术问题的基础上，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期安排。西辽河灌区修建苏家堡及塔拉干分洪枢纽工程。山西集中治理涑水河流域、汾河中游等防洪排涝及灌溉重点工程。北京提高防洪除涝能力，继续发展电灌，重点治理温榆河。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新建大中型水库，对现有水库分类排队，分别治类。盐碱化地区，要有排有灌，渠系配套，因地制宜地兴修台田，种植抗碱作物和改进耕作技术。

发展灌溉，要地上水和地下水并用，以利用地下水为主。要积极改造现有灌渠，凡有地下水源的地区，都要大力发展井灌，既要发展机井，也要发展砖石井。1970年全区有效灌溉面积，由现在6067万亩达到8803万亩。

（三）大搞肥料。

动、植、矿肥兼施并用，以农家肥为主，狠抓绿肥作物，积极发展化肥。大搞农家肥料，首先是发展养猪积肥，认真改变人无厕所猪无圈的习惯。河北遵化县平均一户两头猪，是该县增产的一项重要因素。全区1970年计划养猪2650万头，达到十亩一猪。实行煤炭下乡，楷杆还田。缺煤地区，多造薪炭林。发展绿肥作物。

（四）实现良种化。

优良种子对于增产作用很大，也比较容易办到。要狠抓这项工作，积极培育和引进抗病、抗风、耐寒高产等适合各类地区的各种优良品种，改变品种单一化。要发动群众选种育种，队队经营种籽田，有计划地更新良种。建立种籽管理制度，争取三年或五年的时间实现主要作物良种化。

（五）消灭病虫害。

力争经过几年的努力，把小麦、棉花、玉米、谷子、水稻等主要作物的主要病虫害消灭掉。消灭了病虫害，也等于增产。办法是积极制造和施用高效低毒的化学农药，同时大量采取土法治虫，依靠群众，掌握规律，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及时彻底地消灭病虫害。

（六）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之路。

以半机械化为主，以小型机械为主。拖拉机到1970年需要新增26900标准台，达到43000标准台，尽先装备后方粮食基地。在发展农业机械的同时，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耕作质量。健全农业机械修配网。积极发展农业用电，计划1970年由现在的7.1亿度发展到17.2亿度。

（七）狠抓植树造林。

去年华北局在太原召开了林业会议，对全区造林运动有很大推动，造林速度大大提高。全区除现有林2.1亿亩外，还有宜林面积约5.3亿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9.7%。到1970年，造林5300万亩，封山育林3700万亩，林地面积扩大到3亿亩，森林复被率达到11%。其中：木本粮油林833万亩。育苗面积229万亩。实现绿化，必须实行封山育林同植树造林并举，以造林为主；各种树都种，以速生林为主；认真推广五级育苗，建立种苗基地；落实林权，加强森林防火，消灭虫害等管理工作。人人造林，年年造林。全区造林紧密地同建设后方粮食基地和小战略区连系起来，同时加强平原地区四旁绿化。重点放在黄河中游水土流失区，太行山、燕山及内蒙西部地区，要大干五年，力争十年左右基本上改变面貌。

（八）发展畜牧业。

内蒙牧区是全国重要基地之一，建国以来畜牧业有很大发展，1964年牲畜发展到5502万头，比解放初期增加1.96倍。今后主要要加强建设草原，发展牧区水利，改进放牧制度；改良

品种，提高牧畜质量；大力发展军马、军骡、耕牛和改良羊；同时健全兽医机构，防治和消灭牲畜病疫；逐步实现牧业机械化、半机械化。农区耕畜现在还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比1956年690.8万头少145.2万头，特别是河北耕畜奇缺是一件大事。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除了靠牧区支援外，主要应当贯彻自繁自养方针，改进经营管理。内蒙可每年有计划支援河北解决耕畜、种畜。

（九）以粮为纲，多种经营。

农业生产必须突出以粮为纲，同时还要注意发展多种经营，以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发展多种经营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当地条件和物质资源，组织上山下海，发展饲养业、采集业、水产及农村产品加工。山西汾阳县贾家庄大队创造出的“以粮为纲，以农带副，以副养牧，以牧促农，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向半机械化要劳力”的一整套经验，很值得推广。河北省邯、邢、石、保集中产棉区，粮食每年靠国家调入十几亿斤，口粮水平很低，猪和耕畜都养不起来，肥少、地薄，产量不高。因此，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把这些集中产棉区的植棉面积适当减少，逐步调整到津、唐等地，这样，可以达到粮棉双丰收，南部粮食自给，北部也能增加收入。

（十）各行各业支援农业。

要搞农业生产革命，解决粮食基本自给问题，需要各行各业都来大力支援。工业方面，特别是地方工业，应当把支援农业作为首要任务，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着重解决小化肥、小型动力机械、小煤窑、小水泥等问题。财贸方面，要深入农村，做好供应和收购工作，促进“四坊下放”。科学研究方面，坚持实行领导干部、专家同群众三结合的原则，使加强科学实验同开展学大寨比学赶帮运动结合起来。认真总结与推广先进经验。办好样板田、试验田，积极培养农业技术人员，健全先进技术推广网。在

加强农牧业科学技术的同地，还必须加强治山，治沙的科学实验工作，充实与加强水保持站、治沙站，建立科学远征队。

关于压缩河北棉田面积的建议^①

(1965年7月10日)

为了促成河北粮食自给，除整治海河等措施外，华北局书记处认为有必要从明年起，将河北棉田面积由目前1000万亩压缩到700万亩，主要从京汉沿线减少300万亩棉田。理由有三：

一、为了备战，河北及其所属各专署必须力争早日做到粮食自给并有余。

二、各地经验证明，只有粮食自给有余，多种经营才能上去。河北连续五年遭灾，京汉沿线好地中的棉地比例过大，结果粮食靠外调，猪及大牲畜也就不能发展。大牲畜减少了百万头，地越种越薄，人拉犁、人拉车现象相当普遍，而棉花单产也跟着下降，去年亩产只有30斤。减少棉花种植面积，可促使各专署，特别是京汉沿线四个专署做到粮食自给有余，棉花单产反可逐步提高。准备在三年内将棉花亩产提高到45斤，这样，棉花的总量也可比目前更多。等粮食问题解决后，如中央需要时，棉地面积再行扩大。

三、过去全国棉花没有上去，中央指示河北棉田不能少于1000万亩，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已变，许多地方已做到粮食自给有余，而种棉花又比种粮食合算，各地要求多种棉花，棉花亩产也比河北高，因此，河北减少300万亩面积对全国棉花供应不会有太大影响。

以上意见，曾在国家计委座谈会上谈过，华北局书记处亦谈

^①这是朱理治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起草的给党中央的报告。

过，河北省委最近亦讨论过，大家均表同意。现向你们报告，希望能得到中央指示，以便早日订立计划，并在政治上物质上做好准备工作。

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华北地区的几个问题^①

(1965年9月21日)

从华北的情况看，我们认为国家“三五”计划的安排是恰当的，基本上适合华北的经济发展情况。华北第三个五年任务很重，我们必须做好工作。

首先，华北是首都所在地，备战任务很重，必须把华北的小三线，军工建设搞起来。按照国家“三五”计划，我们可以把常规武器搞起来，即使大打，一些城市丢了，这些小三线的常规武器也可以支持人民战争。

第二，从工业布局看，按照国家“三五”计划，华北区目前工业集中在京津一线的情况将逐步改变，二、三线的工业将逐步建设起来。

重工业，以钢铁工业为代表，包钢将建成年产150万吨，太钢将建成年产80万吨规模。长治、承德、邯郸、呼市几个小钢铁厂也将建设起来。这样，二、三线钢的生产能力将由现在的58.27万吨增加到247.7万吨，所占全区钢产量的比重将由现在的42.5%提高到68%。

轻工业，到1970年，二、三线纺锭将占到全部纺锭的45%；造纸、自行车、缝纫机等现在主要集中在京津沿海一带，而“三五”期间，新增的造纸能力4.45万吨、自行车20万

^①这是朱理治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标题为编者所加。

辆、缝纫机 10 万架、糖 1.2 万吨、盐 100 万吨等，将全部建在山西和内蒙古自治区。

这样，不仅工业布局趋于合理，而且打起仗来，二、三线也有了相当的工业力量来支援战争。

第三，从建设的规模来看，按照国家“三五”计划建设起来以后，华北地区工业生产将有很大发展。

钢 353.7 万吨，占全国的 22.1%，比今年计划增长 158.9%；

原煤 8530—8800 万吨，占全国的 30.4%，比今年增长 23.7—27.6%；

发电量 187 亿度，占全国的 17%，比今年增长 66.3%；

水泥 382 万吨，占全国的 19.1%，比今年增长 72.5%；

拖拉机 6000 台，占全国的 25.4%，比今年增长 59 倍；

化肥 206.7 万吨，占全国的 11.5%，比今年增长 265.3%。

棉纱 168.1 万件，占全国的 18.7%，比今年计划增长 34.8%；

棉布 13.85 亿米，占全国的 18.5%，比今年增长 33.7%；

纸及纸板 30.1 万吨，占全国的 13.1%，比今年增长 41.9%；

盐 446 万吨，占全国的 38.8%，比今年增长 44.8%。

这样，经过第三个五年计划，华北地区将基本上建成一个以钢铁、煤炭、军工、机械为主的重工业基地。

第四，从基本建设任务看，按照国家“三五”计划的安排，“三五”期间华北区的投资总额大约在 130 亿元，这个任务相当大。

所以，对华北来说，中心问题不是希望国家再给多少投资，而是如何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计划，把建设任务完成得好，如何发挥一、二线工业的潜力，支援农业，支援三线，支援国家建设的问题。

二

华北“三五”期间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农业问题。从备战、备荒、人民生活的角度看，华北区农业落后、粮食不能自给都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华北区历史上粮食都是不能自给的，建国以来虽然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仍然不能自给。客观上的原因是华北自然条件既容易闹旱灾，又容易闹水灾。闹水灾不仅影响当年生产，而且有些水灾是带毁灭性的，如1936年的水灾就是这样。建国16年来，华北区较大的旱灾6次，水灾5次，每次受灾面积都在3000万亩以上，按16年平均，每年受灾面积4000多万亩，其中旱涝各2000多万亩。

为了解决粮食自给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希望水利投资的安排，特别是对海河治理的安排，定下来不要再变了。我们必须好好利用这批物资打歼灭战，初步解决海河灾难。

（二）必须利用小型农田建设资金、水利投资等，同时将现有水库适当加固和配套，使之发挥效益。要对水库有个规矩。

（三）抓农田基本建设。计划在平原地建立9万亩水浇田。根据各地的经验：第一，必须有统一规划，把治山、治水、抗旱、抗涝和利用地上水、地下水结合起来；第二，因地制宜，土洋结合；第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四，纠正恩赐观点、命令主义、任务观点，必须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五，要注意质量，打井也好，梯田也好，都要做好高质量才能真正见效。

解决旱涝等灾害问题，可以使华北农业生产获得比较稳定的生产条件。但是经验证明，这还解决不了高产问题。要解决增产、高产问题还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综合动用八字宪法。

只有综合措施才能增产高产。根据这几年各地摸到的经验，山区大搞林、梯、坎，低洼地区大搞排、台、改、灌、林，平原稳产区大搞固田化（灌、排、整），风沙地区大搞林网畦田，都是行之有效的增产措施。

（四）除农家肥料之外，化肥需要国家支持。肥料厂建设和分配上需要适当照顾。华北各种工业发展都大，但化肥厂较少。华北区化肥生产国家“三五”计划安排比较少我们拟搞40套小合成氨厂，这次国家只安排18个，还差26个。原来华北化肥厂很少，这样仍然较少，希望照顾华北区的情况，仍按40套安排计划。内蒙新建5万吨合成氨大化肥厂，国家“三五”计划安排在最后二年动工，希望提前一些。

（五）在政策上，第一要稳定征购，“藏富于民”，不搞反瞒产，不征过头税，国家征赋指标在这二三年内要适当减少，给灾区以照顾。第二，河北省的粮棉比例需要作适当的调整，这对于促进河北粮棉增产都有很大作用，也是解决华北区粮食自给的一项重要措施。

（六）搞好四清，开展比学赶帮运动。

（七）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华北区以搞半机械化农具为主，机械化为辅。希望国家对半机械化农具所需的材料问题在计划上予以安排，并对专县小型机械厂在装备上给予适当支持，使它们能更有力地为支援农业服务。

总之，华北农业发展采取符合客观规律的指导和切实有效的综合措施，才能逐步改变不利条件，达到稳产、高产，做到粮食自给。

三

华北工业潜力很大，如何组织好，涉及到部门与部门的矛

后、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地方与地方的矛盾、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矛盾。使工业组织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是华北“三五”期间需要很好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毛主席在“论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仍然有矛盾，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就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最近，我们对此体会越来越深刻。要在“三五”期间把工业生产搞好，发挥现有工业的潜力，更好地支援三线、支援农业，必须注意改变某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

从华北区的情况看，大而全，小而全的工厂还不少，影响工业潜力的发挥。以华北组织汽车生产为例，筹备了好几年，只是到今年底才计划生产180台。由于国家急需军用吉普车，我们组织天津工业采取专业协作的办法，从北京汽车厂分一个型号给天津市。只用了四、五个月时间，现在天津已生产出了样车，国庆节可以生产10辆，年底可以生产50辆。国家并没有花投资，只要明年适当给天津协作生产汽车的工厂一些设备和投资，就可以小批生产。后方汽车厂建设也许能采取这种方法。

其次，关于小型工业项目，还需要给予足够的注意。现在国家“三五”计划对大中型项目都安排了，骨干有了，小型项目还没有安排。根据华北区的情况以及河北省的调查，每年小型项目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在50%左右。华北区1960年小型项目投资占47%，1963年占53%，1964年占55%；河北省1959年—1964年平均每年小型项目投资占44.6%。这些小型项目大体上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为大工业服务的，主要是生产建筑材料、非标准设备以及为大工业生产配套的小厂。第二类是为农业服务的，如小化肥、小农药、小煤窑、专县营机械厂等。第三类是为轻工市场、出口援外服务的。第四类是其它，如文教卫生商业交通邮电等。这些小型项目大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每年在

国家计划安排中容易忽略。

再次，为了充分发挥现有工业的潜力，一二线工业要出产品，出技术，出设备，出人支援三线，这就需要对一二线工业在“三五”期间安排必要的技术改造计划，使这些现有的企业能够不断地采用新技术、进行设备更新。天津市去年搞技术改造后效益很好。北京市 800 多个全民所有制工厂中，地方厂近 600 个，其中除 80 个厂像样外，有 500 个厂是破破烂烂的；另外还有 800 多个集体所有制企业，许多也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其他中等城市的工厂也有类似情况。希望国家计划能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加以适当安排。

最后，关于需要向小三线迁的地方企业的投资设备问题，现在未解决，建议在国家制定迁厂计划时统一安排。

关于华北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¹

(1965年9月)

秋里²同志的报告很好，体现了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计划总的盘子，规模定得比较恰当，1600万吨钢，850亿投资，这两个最主要的指标一定，就基本上决定了基本建设的规模。计划中可能还有些矛盾，将来执行中也会发生新的矛盾，但因为总的方面是留有余地的，所以这些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计划可以基本确定下来，以便及时安排下去。

从华北来看，毛主席提出的三条方针更为切合实际。一为备战，华北是一、二线，是敌人进攻的一个主要突击方向，所以，必须加紧作好备战工作。二为备荒，华北地区旱涝灾害频繁，备荒问题十分突出。三为人民，华北粮食是最严重的问题，有些生产队虽有储备粮，但是今年遇到大旱灾，要吃掉一些，能保留多少很成问题。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华北的工业布局将有很大的改变。钢铁生产，二线占68%，一线占32%。除了包钢、太钢、石钢外，在后方还有几个小型钢铁厂。纺织工业，二线占43%，一线占57%。盐、自行车、缝纫机等，二线也能生产。京津二市今年底准备迁出27个工厂到小三线，明后年准备再迁几十个（不包括中央的）。这样，小三线建设就基本上打好了。即使不打

¹这是朱理治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两次发言的汇总，标题为编者所加。

²秋里，即余秋里。

仗，对工业布局也很有利。

华北工业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 42 亿，第二个五年计划 134 亿，第三个五年计划 66 亿。“三五”计划的建设任务仍是很大的，我们一定要保证搞好。到 1970 年的规模是：年产钢占全国的 22%，煤占全国的 30%，电占 17%，水泥占 19%，棉纱占 18%，纸占 13%，盐占 38%。这样，华北以钢、铁、煤、机械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就基本建成了。

目前，京津等市已经形成的工业力量是很大的，但还未组织好，还有不小的潜力。首先要加强专业化协作，这就需要打破原来的框框，搞好地方与地方，中央与地方，中央工业与中央工业，军用与民用，军工与军之间的协作，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要求。这方面需要做很多思想和组织工作才能搞好。其次，要重视进行技术改造。另外，支持地方有计划搞点小型原材料工业，对于支援国家建设和支援农业也很有必要。

当前，华北地区最突出、最根本的是粮食问题。华北不是水灾就是旱灾，粮食的产量很不稳定。1963 年，河北眼看丰收在望，几天暴雨不只把当年庄稼，而且把许多农田基本建设冲掉了。今年又遇大旱，受灾面积达 1 亿亩。能不能战胜水旱灾害，使粮食过关？从大寨、曲沃、遵化、北京郊区、太谷县等地方的经验看是可以的。

现在需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首先要根治海河。毛主席、少奇和许多同志对此都很关心，中央已经立为专案，现在已经动工，准备集中力量分期打三个大歼灭战，今年治黑龙港，明年治子牙河，后年治大清河。但是“三五”计划中对此没有列入，河北省的同志有点担心。最好不要再变了。

第二个方针是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计划搞 1 亿亩基本农田，包括 7000 万亩保浇地，3000 万亩山区水平梯田，加上植树造林，1000 万亩台条田。在五年计划期间，计划保浇地亩产

400斤，水平梯田亩产300斤，台田亩产200斤，这样1亿亩基本农田水旱不怕，即可保收360亿斤。现有的水利投资，要很好利用。有些地方，如北京、太谷、石家庄已经有了很好的水利建设经验。一是要有个全面规划，如何利用地上水和地下水，在地质部门的帮助下，积累水文资料，有计划地进行水利建设；二是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按地区一口口吃；三是要依靠群众自愿，不能恩赐，也不能强迫；四是要土洋结合，因地制宜，打砖井；五是要有水利机具，要成套供应，加强管理。

第三个方针是抓肥料，包括农家肥、绿肥、化肥。有机肥各地都可以自己搞，这方面已有许多好的经验，需要好好学习推广。化肥确可保证增产，与其从南方调来粮食，从国外进口粮食，不如千方百计多搞些化肥厂经济合算。如果国家拿出2亿元，建立5个五万吨合成氨厂，可以年产25万吨合成氨，100万吨氮肥。1斤化肥，按增产3斤粮食计算，就是60亿斤粮食；华北区每年亦不过缺50亿—60亿斤粮食。

此外，在京广沿线要减少一些棉田，改种粮食，以便河北粮食自给，适应备战需要。但要分两步走，一下子不要减得太多。还有一个征购政策问题，也需研究解决。

关于生猪收购价和猪肉销售价问题。有的同志说，目前猪肉收购和销售价格高，粮猪比价不合理，造成猪肉大量积压，国家赔钱。抗日战争前，100小麦，山西可换45斤猪肉，内蒙古可换31斤猪肉；现在山西只能换27斤，内蒙古只换26斤。农民养一口猪，相当于半个劳动力的收入。因此，生猪的收购价应由四角五分降到四角二分，猪肉的销售价由现在的八角多降到六七角，以扭转国家亏损和猪肉积压。还有些同志认为，降低猪肉的收购和销售价格，应特别慎重，可以适当降一点，但不宜降的过多。我们现在提倡农民多养猪，但究竟养多少？市场需要多少？应该好好摸一摸。价格降的不适当会打击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可

能造成市场供不应求，对农业生产也很不利。我们认为，养猪同农业的关系非常密切，总的精神还是应当鼓励多养猪，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解决华北区粮食自给问题的措施¹

(1965年10月9日)

无论从备战、备荒、为人民哪一个方面来看，在华北最迫切的问题都是解决粮食问题。这几年华北每年都缺60亿斤左右粮食，这是个极大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有许多客观原因，如河北前年大洪灾，去年大涝灾，今年全华北又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但重要的原因是过去人的积极因素尚未完全调动起来，以及我们的主观领导尚不尽合于客观规律。因此，必须把全区8000多万人民动员起来，和自然作战，打一场争夺粮食自给的伟大的战役。我们设想是这样的：

一、根治海河。

今年动员50万人治黑龙港水系，明年动员60万人治子牙河水系，后三年如国家有钱，想再把大清河、漳河治理好。

二、大搞基本田。

在平原搞7000万亩保浇水田（现有4000万亩）；在山区搞2000万亩大寨式梯田（经过今年大旱考验，只要真正合格的水平梯田是可以旱涝保丰收的，例如大寨今年仍是亩产600斤以上）；在低洼盐碱地区搞1000万亩台田和条田。水浇田以亩产400斤计算，梯田以300斤计算，1亿亩基本田即可旱涝保收360亿斤，其他1亿亩地即使亩产100斤，总合起来也可收到460亿斤。这样，即可基本上解决华北粮食不稳定的情况。这是

¹这是朱理治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起草的给毛泽东与中央的报告，收入本书时有节略。标题为编者所加。

个最基本的工作，需要苦干实干。去冬今春，我们共搞了42万亩水平梯田，59万亩台田、条田，413万亩水浇地。今年秋天，我们利用了大旱，变坏事为好事，动员了20万干部、120万群众，大抓打井，大抓渠系配套，增加了水浇地300多万亩。准备今冬明春继续搞下去，现在各方面正在积极准备。

三、大抓肥料。

抓养猪积肥，抓绿肥，同时抓化肥。华北化肥基础比较小，“三五”期间国家投资建设也少。河北、山西拟自筹建设一个5万吨合成氨厂，希望纳入“三五”计划。国家在内蒙古的化肥厂安排的时间过晚，建议能提前建设。此外，我们准备搞40个小化肥厂（国家安排了18个）。原设想利用华北多煤的有利条件，增加几百吨煤代替秸秆，把秆沤肥还田，这样即可增加几十亿斤粮食。现在国家煤炭紧张，这个计划我们打消了。希望国家安排化肥厂时能给点照顾，免得从外国和国外调购粮食。

四、改变粮棉比例。

华北粮食不能自给，主要是河北，而河北主要是京广沿线四个区。那四个区，条件很好，但因棉花种的过多，每年国家要调给16亿斤粮食。准备减少三四百万亩棉田改种粮食，粮食自给了，猪和大牲畜可繁殖起来，棉花也就可增产了。

五、搞好征购工作。

这三年，河北连年遭灾，由于想减少国家负担，实行了以丰补歉办法，结果丰产区也只吃八两粮食。有些地方甚至征了过头粮，影响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为了尽快恢复河北粮食生产，希望国家在三年内有意识降低河北征购指标。

努力搞好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¹

(1965年10月15日、29日)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把今冬明春小型农田水利搞好，把农田基本建设搞好，把群众运动组织好，领导好。这对华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把会议开好。毛主席指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有三条：一是备战，二是备荒，三是为人民，要使群众的生活一年好似一年。这是毛主席提出的具有政治经济意义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对华北尤为重要。一旦爆发战争，华北首当其冲，华北自然灾害多，粮食生产不稳定，粮食不能自给，每年要从其他地区调入五六十亿斤粮食，农民生活还是不宽裕。打起战来，从外面调不进粮食怎么办？就是有粮食，运力也来不及。这种被动的情况，必须改变。回忆在1940年时，国民党背信弃义，断绝了对我们的供应，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时，陕甘宁边区只用两年时间就做到了自给。华北8000多万人民今天为什么不能自给？我看只要搞好，搞对头，很快可以改变面貌，最迟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解决粮食自给的问题。

当前，华北的形势是好的。近几年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水、肥、土、种各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虽然大旱，

¹这是朱理治在华北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议开始的讲话和闭幕时的总结报告，收入本书时有节略。标题为编者所加。

仍有 25 个县、区的粮食产量“过黄河”（1964 年“过黄河”的是 7 个县），农田基本建设见了效。目前，群众已经起来了，迫切要求解决粮食问题。如何组织、领导两千多万劳动力，在三、五年内基本解决粮食问题，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使粮食上去办法很多，进行“四清”，增施肥料，搞机械化，推广良种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小型水利，搞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这是发展农业的基础。今年，经过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帮助，国家决定投资根治海河的工程。今年搞黑龙岗（可以使 1800 万亩解除涝灾），明年搞子牙河（可以使 1200 万亩解除涝灾），后年，有条件的话，可以搞大清河。不然，洪水一来，好多农田基本建设都要被冲垮。因此，有人把根治海河的工程叫做“第三条黄河工程”。

当前，我们要搞的农田水利的中心是搞小型农田基本建设。华北准备搞 1 亿亩基本农田，其中，水浇地 7000 万亩，达到园田化的标准（灌、排、平整）。这 7000 万亩是华北粮食过关的关键，亩产 400 斤，每年可拿到 280 亿斤粮食；建设 2000 万亩大寨式的水平阶田，亩产 300 斤，（合格的水平阶田，每亩粮食产量可达五六百斤），每年可拿到 60 亿斤粮食；改造低洼盐碱地，建设台田、条田 1000 万亩，亩产 200 斤，每年可拿到 20 亿斤粮食（唐山佟家花园 190 多亩台田，亩产 900 多斤；盐山县 5.8 万亩台田、条田，今年一般亩产为 200 斤）。其他 1 亿多亩粮田，至少可拿到 100 亿斤粮食，一共 460 亿斤，日子就比较好过了。

风沙地区，搞林网畦田，也可以增产。去年大搞植树造林，成绩很大，今年还要继续搞，不要松劲。如果不下雨，可以先挖鱼鳞坑，搞苗圃。还要把林木管理好。治水必须造林，不造林，海河就治理不好。种地治水，都须要造林。去冬今春搞植树造林，修建台田、条田，扩大水浇地，都取得很大的成绩。今年大旱，群众性的抗旱运动已开展起来，投入劳力 1200 多万人，下

去抗旱的干部十几万人，大战9月份，扩大浇地面积340万亩，打机井7400多眼，砖井3.6万多眼，土井33万眼，修扬水站1300多处。当前的问题是趁热打铁，把群众运动推向更大的高潮。据气象局预报，今冬明春可能持续干旱，非大干不可。

搞农田建设，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不能单纯依靠国家。中心问题是把2000多万个劳动力组织好，把国家投资用好，把原有设备管理好，使用好。要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有些地方出现瞎指挥的苗头，有浪费群众积极性的现象，应该引起注意。

请大家研究几个问题：

一是规划怎么搞。各专、盟都要搞规划。地上水、地下水、深层水、浅层水，机井、电井、砖石井，怎么搞，在哪里搞，都要搜集水文地质资料、历史资料，都要有个规划。特别是各省、市、区的重点，例如河北省的邯郸、邢台两专区，山西省的五大盆地，都要落实。北京搞地下水、打井，有一套经验，请他们谈一谈。

二是怎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先搞哪一块，先吃哪一个县，要研究。北京市集中力量，一个县一个县地搞，效果好。

三是交流哪些经验。会议上准备交流关于打井技术方面的经验。

四是材料、设备如何安排。材料、设备问题，华北局经委要帮助落实。真正没有条件的地区，先土法上马，以土为主，逐步升级。

五是物资、设备如何清理。中央给了多少，用了多少，还有多少，都要清理。以后怎样管？北京的办法好，小型农田水利贷款由银行来管，小型水利贷款，采取自愿申请的办法，使群众树立贷款必须归还的概念。过去全国农贷80亿元，国家不准备收回了。是不是不要一风吹，可以清理一部分做为小型农田水利基

金，放在县银行里周转使用。

六是材料如何供应。北京每个县搞统一供应站的办法可以提倡。

七是劳力如何安排。打井、开河、造林、积肥，都要落实，合理安排。

八是如何领导好群众运动。根据现有的经验，既要防旱，也要防涝。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克服形而上学观点，反对瞎指挥，也反对不指挥。要真正走群众路线，正面的话，反面的话都要听。反对主观主义。

二

华北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议从10月15日开始，开了14天。会议分析了当前抗旱形势，统一了思想，讨论了如何坚持抗旱，开展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群众运动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意见，我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从备战、备荒、为人民出发，华北区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粮食问题。今年华北大旱。据气象预报，今冬明春雨雪仍少。现在地上水源显著减少，地下水位降低，明年很可能还是大旱，当然也有可能发生洪涝。今冬明春，华北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坚持抗旱，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群众运动。今冬明春搞好抗旱工作，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为明年夺取丰收打下了基础。否则，丧失时机，明年肯定要歉收。我们要在“三五”期间，解决华北粮食问题，明年是关键性的一年，而今冬明春的农田水利建设是第一战役，必须打好。

（二）华北各地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有成绩的。去冬今春除了大搞宣惠河等排涝工程之外，发展灌溉面积413万亩，建设大寨田423万亩，台（条）田59万亩，共建设稳产高产田859

万亩。从今年抗旱以来，尤其是经过大战9月份，又扩浇地400多万亩，完成抗旱种麦4000多万亩，成绩很大。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显著的效果。北京、石家庄、唐山、天津、沧州、巴盟、哲盟等地区都增了产；有25个县（市）粮食亩产达到400斤以上，比去年增加了18个。

在旱灾严重的市县，也都有一些丰收高产的典型社队。这些增产典型单位的经验说明，凡是狠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都增强了抗旱能力，取得了丰收。应当把这些典型的先进经验，好好地加以总结，多树立标兵，广泛宣传，坚定人定胜天的信心。

我们的工作仍然是有缺点的。近几年来，我们偏重于防治水患，对于可能出现的旱灾威胁，精神准备不够。不少地方对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抓得不紧，对现有的设施也没有抓好配套和管理工作。去冬今春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努力不够，不敢发动群众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因此在干旱情况下遭到了歉收。

我们有困难，也有缺点，但是，还必须看到有很多有利条件。第一、中央对华北很关怀，对各地的困难很照顾。第二、经过一年来的抗旱斗争，群众的积极性很高。第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潜力很大。第四、各级领导和群众都有了比较丰富的抗灾斗争的经验。只要我们工作深入，善于总结经验，抓住成功和失败的典型事例，进行对比，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进一步把工作做好，完全可能战胜灾害，取得丰收。

（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今冬明春除搞黑龙港工程之外，各地在搞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应当注意以下七点：

第一、要全面规划。省、专、县、社、队五级都要采取领导、技术人员、群众三结合的方法，摸清水源情况，合理布局，搞出切实可行的规划。

第二、必须把已有的机井、灌区、扬水站等水利设施都配套

起来，充分利用，特别是注意平整土地，合理用水，使已有的水源都配套起来，发挥最大的效益。

第三、积极打井，开发地下水源。打井的方法，要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土洋结合。大量的打土井；有计划有重点地打机井；有的地方可以采取挖泉、截潜流等多种办法，开发水源。必须组织一支水文地质队伍，弄清水文地质情况。对深井、中井和浅井要合理布局，具体安排。有条件的地方要尽量多打一些深井、中井，以便持久抗旱。不管采取哪一种办法，都必须保证质量，打一眼成一眼，做到井成地平，当年见效。

第四、对现有的水库，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规定蓄水、放水的合理界限，兼顾防洪和灌溉，制订管理办法。

第五、从备战、备荒和粮食平衡观点出发，选择重点地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河北省应当把重点放在南部地区，解决北粮南调问题；山西省应当把重点放在南部地区，解决南粮北调问题；内蒙古除了积极完成黄河、辽河灌区配套外，小型水利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在西部地区，解决东粮西调问题。由于材料、设备电力等条件的限制，重点地区也必须采取分期打歼灭战的办法。

第六、加强水利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要大量培训不脱产的水利技术队伍。在这方面，石家庄区的先进经验可以学习。

第七、今冬明春要大力解决缺水山区人、畜吃水问题。

第八、加强牧区水利建设。采取积极措施，装备牧区打井队伍，有计划地打深筒井和机井，开发无水草场。

（四）华北地区的抗旱，只抓水利建设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抓农田建设。农田建设好，可以增加抗旱的能力。今冬明春必须大搞农田建设，建设“四田”，即大寨式的水平梯田、园田、台（条）田、林网畦田。这是战胜水旱灾害，达到稳产高产的基础。

在山区、丘陵区，以建设大寨式水平梯田为主，搞林、梯

坝、滩（地）、水，大寨、南滚龙沟、羊井底大队、孟县等，都是标兵。在平原地区，要搞园田化，实行灌、排、整、深（深翻、厚）、林，做到灌排结合，土地平整，深耕多肥，优种高产，四旁绿化。北京市、石家庄地区，太谷县都是标兵。

在低洼涝盐地区，要学习沧州佟家花园大队和盐山县的经验，搞排、台、改、灌、林，建设台（条）田。

在风砂地区，搞林网畦田，内蒙古赤峰的当铺地大队、雁北地区的金沙滩、晋西北的曲峪大队都有成功经验。

会议上，各地提出今冬明春建设“四田”1700万亩，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建议各省、市、自治区会后进一步落实。

（五）植树造林，对抗旱、防洪、防涝、水土保持都有重要作用。去年太原林业会议以后，全区造林1100万亩，育苗70万亩，木本粮油树12.8万亩，成绩很大。目前大旱，增加了造林的困难。但是，河旁、渠边、山地阴坡、下湿的沟谷等地方仍然可以造林。在干旱的地方可以事先挖坑，大量育苗，准备下雨播种。雁北的五级育苗法，各地仍须继续推广。对现有的幼林，特别要加强抚育管理，巩固造林成果。同时，必须抓好封山育林。管好羊群，贯彻太原会议提出的“羊为林让路，林为羊开源”的方针。

（六）要求一切有水利灌溉的地区，特别是大面积灌区和城市郊区，明年实现大幅度增产，准备从生产上以丰补歉。为此，必须加强灌区的管理，实行管理革命化，学习河北省房、涞、涿灌区的管理经验。要利用城市的物质、技术、劳力等有利条件，支援郊区农田水利建设，促进郊区粮食增产。同时，在不能灌溉的地区，要采取各种抗旱保墒的措施，多种抗灾耐旱保收作物。今年抗旱播种的小麦墒情不好，缺苗断垄，麦苗枯黄现象比较严重，麦田保苗任务十分艰巨。必须狠抓浇水保苗工作，过好越冬关，力争夏季丰收。

(七) 全面安排，合理分配劳动力。今冬明春，黑龙江、乌加河治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抗旱保苗，打井，配套，积肥，造林，副业，救灾等等，任务很重。劳动力调配不好，必然发生顾此失彼，浪费劳力等现象，以致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特别是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和巴盟等几个地区任务重，更要注意这个问题。对正在开展和已经完成“四清”运动的县份，抽调劳动力时，要加以适当照顾。所有今冬明春的各项工，一概由工作团统一布置，保证完成。要积极进行工具改革，推广半机械化工具，苦干实干巧干，以节省劳动力。

安排好群众生活，做好救灾工作，注意劳逸结合，灾区可以搞些以工代赈。

(八) 搞农业必须依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苦干实干。无数的例子证明：凡是依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的，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凡是躺在国家身上，依赖国家支援，国家救济的，反而搞得不好。把国家支援的财力、物力管好用好，把这些钱用在刀刃上，一个钱当几个钱用，这也叫大寨精神。因此，第一，国家帮助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费，可以依照北京的办法，改为贷款形式，交银行管理。银行这部分款项，做为每个县的小型农田基本建设周转基金。第二，过去国家贷款买的机器、设备，必须严格清理，逐级上报。各省、市、自治区清理的结果，应在12月底以前报国务院和华北局。对于闲置的设备，凡是生产队需要的，要帮助修好用起来，不用的由专、县负责收回，统一调配，做到物尽其用。第三，水利机械、农业机具、配件的供应，可以提倡推广北京市房山县的办法，由每个县指定一个单位统一供应；上边对口不统一问题，建议省、市、自治区和专、盟指定一位负责人，组织各省的有关部门，加以解决。第四，农机农具、水利设施的管理，要总结经验，建立制度，指定专门机构负责。

(九) 各行各业都要积极支援农业，加强以农业为基础的思

想，积极支援今冬明春的抗旱斗争。第一，工业系统，尤其是地方机械工业和手工业，必须抓好支援农业的机器、设备以及配件生产和修理工作。第二，工厂、矿山的废水，应当积极设法支援农业灌溉。厂、矿闲置的机具，可以采取或租或借的办法，支援抗旱。第三，财贸部门必须做好支援抗旱的供应工作。第四，交通、文教、科学等部门，都要为帮助农业抗旱出把力。

总之，华北全党全民，要万众一心，与天斗争。

往事回忆

按：朱理治同志的这篇回忆录是以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历史交待”为基础，吸收他在延安整风时写的自述和解放后应党史、军史部门要求写的回忆文章整理而成的。标题为整理者所加。——肖迅

一、参加革命以前

我原名朱铭勋，1930年从监狱里出来，才改叫朱理治的。原籍是江苏南通县余西镇，住在镇郊。曾祖、祖父、父亲都是行医的，家中有田八亩，包括祖坟一亩二分五，但主要收入还是靠行医。我幼时，母亲和姐姐做些家庭手工业补贴家用。田有时出租，有时雇工帮种，全家成员也参加些轻劳动。家中有房六间，四间出租，另典借四间居住。我离家前，外欠高利贷150元左右。在阶级成分上，我家应是自由职业者。土改时，我嫂子在家，评定我家是个中农。

我有个哥哥名叫朱乃嘉，原是个店员，解放后在上海花纱布公司当职员，现已退休。有个姐姐，家庭妇女，现已去世。

我10岁前在私塾王老师家学习。王老师和我家族叔朱溥泉相好。朱溥泉是个大商业资本家兼地主。经王老师极力推荐，由他供我到南通城里读了高小和中学。因为族叔的祖母极力反对，

所以每次去领学膳费都要费很大的周折和困难。进了大学以后，他们索性一个钱也不帮助了。

我到城里高小读书时，爆发了五四运动。我曾跟着游行队伍摇旗呐喊一番，但也是“五分钟热度”，很快就冷下来了。那时学习成绩也不好，记得高小毕业考试作文题是《各述尔志》，我答的是将来想当个隐士，表现出当时对社会虽感到某些不满，但既找不到原因，也不想去斗争，所以想学陶渊明，逃避现实，过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

15岁时，我考入南通第七中学，学了4年。这段时间，学习很努力，当了4年班长，8个学期考试的分数都是第一。虽然也参加了五卅运动，和班里同学到农村宣传过，但是，根本不了解农村，也基本上不了解阶级斗争这一套道理。当时只知道爱国，羡慕民族英雄岳飞，所以取号叫慕飞。那时我受孔丘“君子群而不党”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认为要救国，便不应分党派；有了党派，便会分散力量。记得为了说明这种幼稚而又错误的主张，我还在作文里运用力学原理，论证过没有党派对救国的好处。

二、清华园入党和北京地下工作

1926年，我高中二年级结束后，由于成绩好，以高中毕业同等学历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选择的是经济系。那时，清华收费少，名声大，报考的人很多。我这一届报考的有4000多人，只录取80个，其中多数是贫苦人家子弟。因此，清华园内左派势力很大。我在这种环境中，看到全国各个党派主张纷纭，斗争激烈，为了追求真理，大部分时间蹲在清华图书馆里，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派的主张，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曾国藩文集和家书……乱看一气，几乎

翻遍了各党派的学说。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像物理、化学、数学那样有根有据，越看越感到茫无头绪。就在这一年冬天，与我同班又同宿舍的同学余冠英（他那时是个中共党员）看到我这种情况，对我说，他可以介绍两本社会科学的书给我看。还说，这个学说科学是科学，但实行起来却有危险，就怕我不敢干。我对他说，只要是科学，是真理，我就会为之奋斗到底的。他给我看的两本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一本是蔡和森同志写的《社会发展史》。接着他又介绍我读了《共产主义ABC》。这些书尤其是《共产党宣言》，把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解剖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使我确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于是，我下定决心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奉献我的一生。1927年3、4月间，我经余冠英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补期为两个月。在此后的47年中，尽管我遭受过不少艰难、困苦，工作中也犯过错误，但我自信，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我入党后不久，北方区书记李大钊就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当时，北京和天津各报对他的死都有详细的报导，就连反动报刊的记者们，虽然对他信仰的共产主义表示反对，但也不能不佩服他的伟大人格。据说，李大钊被捕后，北京党组织准备暴动把他抢出来，和他商议时，他坚决反对，因为他认为我党力量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他就这样英勇地走上了绞架。新闻记者访问他的家属时，他夫人拿出了4块钱，这就是他家唯一的积蓄。

李大钊同志对北方党的影响特别大，这不仅因为他是党的创始人，而且因为他和陈独秀不一样。陈独秀的文章看起来没有什么科学根据，而李大钊同志的文章，虽然不像毛泽东的文章那样精确，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很大功绩的。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亲自培养下的党内团结、活泼、严肃的正派作风。那时，党内不只是没有社会上那种资产阶

级尔虞我诈的风气，就连后来几次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形成的宗派主义、浮夸铺张的风气也没有。新党员入党后，即受到党章的教育，以及民主集中制、铁的纪律、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群众的教育。每个党员每星期都要向5个群众作宣传，每星期党小组会上都要检查执行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议程虽有五六项，但时间不超过两小时。理论学习也抓得很紧，我们支部曾发动大家从图书馆借出《资本论》、《价格和利润》等书学习。记得毛主席曾说过，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内生活比较活泼，有朝气。我在北方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由于我在北方，毛主席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时都没有能读到，这是十分可惜的事。北方党学习虽然抓得紧，但对如何把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却研究得不够。这与北方党的领导人没有毛主席那样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关，也与北方党缺少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实践有关。

“四一二”以后，我曾写过一张小字报，斥骂蒋介石投入到帝国主义怀抱，贴在饭堂前。6月底7月初，余冠英介绍了一位“上级”同志和我谈话，这个人就是现在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王达成。他是代表支部的，还是代表区委的说不清，我过去总是认为他是燕京大学的，大概是代表区委的。当时谈话内容今天尚能记得清楚，是说经过几个月考察，组织上认为我是纯洁的、诚恳的，但是太老实了。这个批评是针对我曾找过一个工人谈话，谈话不技巧，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目，而这个谈话对象是国民党右派。大概也是在6月份，共产国际中央决定让所有的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击右派，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使之成为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市委将这个新的政策布置下来，清华支部也积极执行了。接着，清华园内召开了一二百人参加的国民党党员大会，左右两派开展了激烈的辩论。右派出

马的是袁瀚青（也是南通人）、刘信芬，左派出马的有李景清、余冠英、冯仲云和我。还有一个人叫李兆瑞，也参加进去，他当时不是党员，抗战胜利后死去了。双方争夺左派和中间派很厉害。

经过“四一二”大屠杀和李大钊等十几个同志的牺牲，接着发生了马日事变和武汉政府的叛变，大革命走向失败，北方的白色恐怖也日逐加深。清华党支部书记朱莽（他可能是清华大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被捕自首叛变，接替他的留美部的雷仲名也消极了。8月份，支部书记的职务落在我的身上。当时，支部中除了消极退党的，回家的，还剩下八九个党员。其中有崔宗培、冯仲云（冯是我发展入党的）、邢必信（邢是冯发展入党的）、魏明华、李乐光和图书馆的两位工友。支部外围有四个最接近的群众，即徐学易、徐志培、赵葵、李兆瑞。

不久，蔡和森同志来北方，在燕京大学（即现在北京大学校舍）宿舍楼三层顶蓬上召开了北京市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做了4小时的报告，传达“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清算。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因为当时还是个新党员，理论水平不高，革命实践也很少，所以对报告理解得不太深刻。

9、10月间，我被提拔到西郊区委做组织部长，由冯仲云接替我的清华支部书记。不久，区委书记许锡仁调到市委，我又做了西郊区委书记。当时西郊区委下面有清华、燕京、农大、慈幼院、平民学校、海淀农民等几个支部。燕京大学的唐天石同志做区委组织部长，农大的汤应时做区委宣传部长。

因王荷波10月被捕，这时，瞿秋白“左”倾路线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在这条错误路线下，北方局命令北京举行毫无胜利把握的暴动，并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亲自组织，任命我当西郊区委暴动大队长。当时北方根本没有革命形势，西郊区党的力量虽然大些，有400多党员，但大多数是学生，不知道拿什

么去暴动。我曾问过领导，领导告诉我，这次暴动的主力军是四大铁路的工人。我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临时抱佛脚，积极组织党员做郊区农民的思想工作。但由于时间太短，我们经验也少，所以成效不大。当时我想，假使暴动真的发动起来，只有把西郊区的党团员和可发展的国民党左派组成 300 多人队伍参加。不久，即听到传达说，城里暴动指挥部因来往人多，被发现了，北方局和市委相继被破坏，北京的暴动也就这样流产了。

市委破坏之后，城里的几个区委也破坏了，只有西郊区委没有遭到破坏。大约在 1928 年 1 月间，市委职工部长和城里几个区委的书记、委员等 8 个人来到清华找我。因校部有党员，我就把他们安排在校部的客房。大家经过研究，一致认为首先要建立临时的市委领导机关，取名为“北京临时工作委员会”，并推举我当工委书记。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一年党龄的党员，怎能担负得起这么大的任务呢？所以急于找上级领导。城里区委一个同志说，他在天津有个关系，可以经过那个关系找到顺直省委。刚巧，那时我接到家里寄来的 80 元钱，除了应付工委开销外，拿了 20 元作路费，派汤应时去天津找到了顺直省委。省委遂派秘书长张明远来到北京组织新市委。

由于我在燕京大学参加西郊区委会议时发现有人在路上注视我，引起了我的警觉，加上市职工部长告诉我，热河有一支土匪队伍里有我们的关系，因此当张明远召集会议，宣布成立新市委并进行选举时，有人提我做候选人，我即提出打算去热河做土匪工作。选举结果，我为市委候补委员。随后，我在清华等待关系去热河，没有参予新市委的组织工作。

隔了半个月，接替我担任西郊区委书记的唐天石来清华传达新市委决定，说我已被补为市委正式委员，不再去热河了，要我代表市委参加当天上午的西郊区委会议。根据市委的命令，我随唐天石到海淀区委机关参加会议。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后结束，

临走，区委委托我带了些宣传品和文件给清华支部。当我离开区委机关只五、六步的时候，听到后面有人叫喊“朱先生”。我回头看到两个工人模样的人和唐天石向我走来。我稍停一会，发现唐天石面色发青，两个穿灰色衣服的“工人”态度也异常。等他们接近时，我对他们说：“你们叫唤什么，我不姓朱。”工人模样的人说：“平民学校校长请你，你一定要去”。这时我完全清楚了。原来，海淀有个平民学校，校长夫妇、子女都是党员，以前由叛徒许锡仁领导，我估计，这时学校已被许锡仁所破坏，大概他正在那里坐镇要找区委和我。我看那两个侦缉队员身材短小，像是抽鸦片的，而我在学校是个较好的运动员并会摔跤，深信我和唐天石两人共同对付他们是有余力的，便说：“我不姓朱，你们要干什么？”说完，将手插在衣袋里装作有手枪的样子。侦缉队员感到突然，说：“你拿什么？”我面对唐天石说：“他们是土匪，我们一齐揍。”可唐天石呆若木鸡，一动不动。我无法，只有跳上田埂向清华方向奔跑。这时，前面路上有些农民走来，侦缉队员叫“抓共产党”，我也叫“后面是土匪”，这些农民感到莫明其妙。我在学校练过长跑，拿过名次，他们追不上我。我一口气跑回了清华，体育老师马约翰见到我问：“你从哪里来呀？”我说：“练长跑去了。”那时，清华有独立的保卫系统，当局不能随便抓人，所以我回到清华，他们一时拿我也没有办法。第二天，北京报纸上登了段消息，说昨天海淀捉拿两个共产党员，其中一名逃跑。隔一两天，报上又登出了新北京市委和西郊区委都被破坏的消息。

回清华后，我和冯仲云等同志商议，暂时在其他同志处隐蔽几天。因我没有参加新市委工作，不知道城里的关系，希望能有没被捕的人来找我们，结果没有一个人来。隔了几天，党支部通知我，校部传出话来，要抓一个姓朱的。清华再也不能呆了，顺直省委和我又没有关系，因此想到上海经过崔宗培的关系去找党。崔宗培原是和我在清华一个支部的，调到市委做秘书，1927

年12月和市委其他人一起被捕，由于他的哥哥在东北做事，托人请张学良保了出来，转到上海复旦大学继续学习。我们当时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他到上海，一定会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的。于是，支部同志替我化了装，由冯伸云送我，从学校旁门离开了清华，到塘沽搭海轮去上海。

三、在南京、苏州监狱始末

1928年5月初，我到达上海，在同济大学找到了崔宗培，但他和党及革命团体都没有关系，无法经过他找到党。我当时在上海没有其他关系，而我老家离上海只有一江之隔，不用一天路程，所以决定先回家乡，一面找党，一面工作。当时澎湃同志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运动，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在上海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日本人写的马克思主义论土地问题，打算回家乡后，学澎湃同志，搞农民运动。

回家后，我搬到余西市公立小学住。那里有十多名教员和几百名小学生，经过一个月的宣传工作，发展了徐纪慎、方宝琛等几名党员，并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支部。这时教员中有个叫马绍奇的人报告说，市南乡的农民反对我族叔朱溥泉在那里建筑水坝。我们决定支持领导这个斗争，由马绍奇出面，我在他家中指挥，发动万余农民到镇上示威。当时，最要紧的是立即设法找到县委，听徐纪慎说，小同乡马尔聪在南通师范，是个党员，县委就设在师范里，我决定立即去城里找他。正在这时，徐纪慎、方宝琛告诉我，国民党党部派了个干事，来余西考试登记国民党员，据说还是个左派，考试的题目他们已经得到，并有一份答案。我看了这份答案，觉得是站在左派立场上的。徐、方二同志说，县党部现在还掌握在左派手里，他们原来都是国民党员，问我应该采取什么对策。我考虑，假使拒绝登记，区分部势必为右派所掌

握，这对我们搞农民运动和发动游击战争（那时听说南通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武装斗争）都很不利。因此，我根据原先在北京的经验，决定发动党员和左派群众一起参加登记，夺取区分部的领导权。但是，因为布置不周密，所有党员和左派群众的考试答卷基本上都抄了事先得到的那一份答案，结果引起了那位干事的怀疑。而这份答案的底稿和考试题又凑巧被他在我住的公立小学的床褥下发现了。他回到城里向县党部作了报告，而这时的县党部已在一个月前被改组，右派掌握了领导。

与此同时，我为了与南通县委接上关系，也从余西到了县城，并在一家旅馆以朱铭勋之名开了房间。晚上8点，我从外面回旅馆，快到旅馆时，见清华大学右派同学袁瀚青和那个党部干事正进旅馆，我躲在暗处，见他们没五分钟就出来了，因此产生怀疑。当晚我未回原旅馆，在别的旅馆里住了一夜。因为想摸清情况，我便一早到袁瀚青家，见面后，两人争执激烈。我急忙离开他家，赶到先开的旅馆，想取出行李就走。但这时，县党部已派人在门外等候我。把我带到县党部后，他们问为什么在我床下发现考试题目，为什么好多答案都相同。我说，我是在学校教室里安置的床，那里谁都可以去，不知道是谁把试题放在那里的，考试答案，我答的是我的，其他人如何答我不知道。

当时的南通县县长名叫施述之，此人解放后在上海文史馆工作，和我堂叔朱溥泉很要好，沾亲带故。县财政科长季如蔚也是我的亲戚。朱溥泉不在城里，知道我被捕后，即通过当局向县党部要人。县党部把我交给县模范监狱看押后，告诉县政府，有人指我是共产党员，不能放。不到三天，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来电，控告我是“北方共产党有力分子”，南通和上海的报纸都把这件事当作一条重要消息发表出来。经过各方营救，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来电报说：“该生在校安心读书，毫不聳外，望即释放”。袁瀚青也否认是他报告的，表示不能出来作证。由于有县长那层

关系，县政府把我从监狱移到了看守所，单独一个房间，家属可以来看；县政府并专电北平特别市党部，要具体证据。

我被捕后，徐纪慎赶到城里找到了县委。县委派了顾民元和一个青年团负责人到看守所来看我。顾说他们正在消灭叛徒，不久前已经消灭了一个，问是否也把袁瀚青消灭掉。我劝他们不要这样做，一来，袁不是党员，算不上叛徒，他在南通也不知道其他党员；二来，这样做，很费事；三来，于案件没有补助。

当我知道了县委关系后，曾发过信给清华的崔宗培，要他来我家，想替他也接上组织关系，将来好由他或我回北平恢复组织。他接信后，来到我家，而这时我已被捕，他于是折回到上海。后来，我哥哥叫他来南通商量如何营救我，他到看守所看了我，我怕再把他牵累进去，叫他立即离开了南通。

隔了两个月，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来电报，列举了我4条罪状，县政府开了一庭，只问了我几句话，就把我解送到南京最高法院特殊法庭。我的一个和我父亲感情很好的堂叔叫朱伯辉，亲自送我到了南京。朱溥泉这时得知我在幕后发动农民反对他，气愤地说：我给他钱念书，他倒反起我来了。从此，我们断绝了关系。

大约在9月初，我被押解到南京最高法庭，寄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到江宁不久，特种法庭即开庭，由检察官提出起诉书，根据是北平特别市党部提出的所谓4点证据。我当即否认，并立即写了一份上诉书予以申辩。不久，特种法庭作出判决，说“虽该被告人坚不承认有上述情事，实不容任其狡辩”。因此，根据北平特别市党部提出的证据，判处了我四年有期徒刑。

所谓四点证据，是清华右派刘信芳（蒋介石派部队占领了北平后，他参加了北平特别市党部的领导机关工作）编造出来的。其中第一条倒是有点根据，就是说我“去夏曾在共党组织之北京西郊第十七区负责活动”。这是指1927年夏，我们和国民党右派

争夺国民党西郊十七区分部领导权说的。第二条“该犯同学共产党朱定山在本会自首时报告有朱系共产党员的供词”。我记忆里，清华支部没有朱定山这个人，是否是捏造的，搞不清。第三条说“本党忠实同志刘信芳、李泰华报告谓朱系共产党员，并谓共产党秘密开会时，有人见伊到席”。第四条说“去年俄国使馆抄出之共党文件有朱为第十七区候补执行委员之记载”。这一条露出了破绽，因为，俄国大使馆被抄时，我还没有根据党的命令加入国民党，更不会第十七区候补执行委员。所以，我立即写信给清华支部冯仲云，托他们替我查对俄国大使馆文件。不久，冯仲云把俄国大使馆抄出的文件汇编铅印本寄了来，查出其中真没有我的名字。我于是亲笔写了一个上诉状，集中力量攻击北平特别市党部凭空捏造的“证据”，说他们陷害好人，四条证据中连俄国使馆的文件都可以捏造，其他三条更可想而知了；还批判最高法院特种法庭竟不加调查，根据这些捏造的证据，乱判人罪。

我被判四年徒刑之后，堂叔朱伯辉资助我父亲400元钱，通过南京中大法律系一个学生，聘请该校教授、律师章世炎做我的辩护律师。我托他将我起草的上诉状，提交司法行政府院。后因国民党决定撤销特种法庭，所有上诉司法行政府院案件一律转交南京高等法院复审，加上北京原法院帮助调查的复文未到，这个案件就拖下去了。

那时，大革命刚失败不久，南京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里关押的三四百个犯人成份很杂，有被捕的共产党员，有秋收暴动时江苏省境内长江两岸好多县的暴动农民，有国民党左派，有大革命时代被逮捕的部分土豪劣绅，还有一部分普通刑事犯。我刚去时，生活很坏，成天被关在“号子”里，每一个号子不到一方丈，挤着14个犯人，臭气冲人。我便联络了同号子的南通县委组织部长袁锡龄，其他号子的党员韩铁心、江阴臣、王九滋等几个同志，成立了个临时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袁锡龄担任组织部

长。并以此为核心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同难会”，把比较好的难友组织了起来。我们首先发动争取改善待遇的斗争，由争取每天放风 10 分钟，使难友们能够在衙堂里散步，到争取每半天放风，直至争取到全天放风。后来监狱当局发动反攻，取消了放风待遇，并打了我们一个难友，我们即发动难友们开展绝食斗争。看守所里还有两位左派律师，我们遂扬言已经抓住了监狱当局贪污受贿的证据，要告发监狱当局。当时，南京各报发布了我们绝食的消息，新闻记者也来采访，监狱当时害怕他们的丑事暴露，于是屈服了，答应我们的要求。以后，我们竟能成天到天井里晒太阳，甚至可以到女看守所里托她们帮助缝补衣服。我和丁竹华、芦兢如（解放后，丁在中南海幼儿园当园长，芦在东北专家局当局长）就是这样认识的。

我们的支部绝对秘密，在南京时只有六、七个党员。袁锡龄、韩铁心二同志释放后，前者又一次被捕，在苏州反省院被枪杀；后者到如皋县参加了红 14 军的队伍，在战场上牺牲了。

取得了放风自由后，我们又集合难友中的同志学唱革命歌曲，并领导贫苦难友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逼土豪劣绅倒马桶，如不愿意，就要他们拿出许多钱来帮助贫苦的难友。

当时，看守所里有三个俄国人。一个是“赤俄”，据他私下和我讲，他是第三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他和列宁家还有点亲戚关系。这个人表现很好，国际歌就是他用俄文教给我们的。另外两个是白俄，一个是工程师，懂些英文，一个是流氓。我在监狱里跟那位俄国同志学了一些俄文、看了些杂志，此外时间，就忙于“同难会”的工作和领导狱中的斗争。

特种法庭结束是在 1929 年春夏之交，我们一批难友由南京转到苏州最高法院看守所。这里更是黑暗，号子里还是“龙头”统治着，每个犯人都得向他孝敬。我们去后，也是先争取放风的自由，难友们都熟悉了南京看守所那套斗争方法，不久也就争取到

了放风，并可到天井晒太阳。同时，我们把“龙头”也给打倒了。为了帮助难友们解决打官司写状子的困难，还由“同难会”发起组织了一个法律研究会，把律师和有些文化能写状子的同难十多人组织起来，由我任会长，有个刑事犯叫王治平的主要负责。通过募捐，我们买了近百份状纸，用来替同难写状子，不仅分文不取，连状子纸也不要钱。过去请人写状子至少要20元现大洋，单一张状纸就要六毛钱，农民根本无力支付。因此，这件事很受难友的欢迎。我们在这些斗争中还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因为苏州看守所很大，有“工字监”，有“十字监”，距离很远，所以成立了一个特别支委会，由我和江阴臣负责；十字监另成立一个分支，由沈廷桢负责。沈在文化大革命前据说任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校长，江阴臣则下落不明。

1929年12月，苏州高等法院开庭，因为没有找到我是共产党员的确实证据，改用“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的条款，以我“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为名，改判徒刑一年两个月，判决前坐牢的日期可以两天折为一天。根据这个办法计算，我只要再坐一个月牢即可出狱。

就在这之后不久，上海有80多个难友被押到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其中有上海市区委书记陈明和留苏学生周光亚等。陈明介绍赤色扶济会和江苏省委的代表来狱中接待室找我谈话，说新来的80个同难中有14个是党员，要求参加监狱党组织。我否认狱中有党组织，他们说，拒绝上级的决定是错误的。最后我说，我们和陈明、周光亚谈，你们有什么事也找陈明、周光亚。根据了解，这14个人确是党员，我们把他们接收了。不久，开了活动分子会，他们参加的有周光亚、陈明，还有个湖南青年；我们参加的有我和江阴臣、王治平（王是由我和江发展入党的）。陈、周发动突然袭击，说我们过去没有把斗争领导到更高阶段，提出要领导政治斗争，准备将来以苏州监狱为中心发动苏州的地

方暴动。我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江阴臣也反对，但王治平同意了他们的意见，结果他们反成了多数。特支改了组，由陈明担任书记，湖南青年担任组织部长，周光亚负责宣传。第二天，他们即发动同难把看守赶到两道铁门之外，宣布“占领了监狱”，由周光亚发表演讲，并带领同难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敌人以为我们真的要暴动，调动太湖水上警察架了手提机枪，包围了看守所，并爬上屋顶予以监视，用铁锤砸反锁铁门的铁锁。我因不同意他们这种行动，同时又有些病，没有积极参加。但看到如不立即谈判，实行妥协，可能会有不少同志被敌人加上“暴动”的罪名枪决。就在铁锁快被打断，群众见不好阻挡正往后退时，我冲上前去，提出双方举行谈判。我的话音未落，铁锁被打断了。反动派一个一个点名，抓去62人，我也被抓了去，沿途遭毒打，拉到办公室前钉了铁镣，绑在柱子上，以后被分别关押起来。过去争取到的狱中自由完全失掉，新的特支也没再见有什么活动。只是由于当时“十字监”流行伤寒症，我们成立了一个卫生委员会，在同难中募捐，为患病的人请医生。那位任特支组织部长的湖南青年因病死去；陈明出狱后在上海区委或江苏省委里工作，以后因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受到处罚。周光亚出狱后做什么不知道，只是记得1932年见到党内通知上说，原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光亚被捕叛变了。

闹监事件后，加判了我6个月刑期，按当时的法律，可以两罪合并执行，故实际多坐了3个月牢。1930年4月底或5月初，我终于出了苏州看守所，结束了狱中生活。

四、在上海找党及“社研”、团中央与团江苏省委

出狱后，我经过狱中一位扬州籍的同志介绍，到上海法租界艺术专科学校找他的同乡同志（名字记不清了），托他转信给江

苏省委。隔了七八天，江苏省委组织部一位姓徐的干事（徐州一带人，高个子）找我谈话，问我有何困难和要求。那时，我已经过狱中同难王滋九介绍，在吴淞镇吴淞书店帮助工作（王滋九出狱后消极了，在上海编写小学教科书，这个书店是他的苏州老乡合资开办的，专卖社会科学书籍），解决了吃饭住宿问题，所以只向他提出，要点党内路线政策的文件看看。隔了几天，他给了我两期党内刊物，并约定一星期后，有人到吴淞书店找我。

这时，我哥哥来上海找我，说我母亲快疯了。因为这年1月间在我刑期满时，他曾来苏州看守所接我回家，因我刑期延长，没有接成。4月初，他又来苏州看守所接我，我们一起到了上海，但我因要找组织，就让我哥哥先回去了。因此，母亲认为我必定是死了，家里人在骗她。哥哥无奈，只得又来上海，定要我回家看一下母亲。这时距离和组织接头的时间，还有几天，我即回家看了一下母亲，在家住了三天。父亲要我去南京上大学，我没有听，第四天回到上海。

我到上海后，搭了小火车回吴淞镇。在火车经过吴淞镇时，经车窗口看到吴淞书店9点钟尚未开门，引起了我的怀疑，随即到附近的同济大学找中学时的两个同学刘定中和程毓淮（他们散步时常到书店来找我）。他们告我，我走之后，书店被查封。我又到王滋九家，他把书店被抄经过告诉了我，说书店被抄时，在我床底下搜出了秘密刊物，店员供是我的。于是，公安局领着店员和认识我的老板在马路上到处找我。我怕在他家碰到老板，当即离去，到艺专找那位扬州同志。因未碰上，并听有同学说已好几天不见他了，疑他也出了事。为了避风，我只好逃到了南京中山大学。中山大学中南通第七中学的老同学很多，我想经过他们中的党员同志找组织，同时想在中山大学看点理论书籍。我先找到窦昌熙，经过了解，知道他刚出狱，意志消沉，和组织没有关系。后来打听到小同乡曹玉麟是个党员，经过他的关系，找了一

个如皋籍的同志，由他给组织转了信。后得到通知，约我在6月底7月初的某日晚9点在中山大学宿舍二楼找中山大学姓王的学生接头。我按时去找他，见他的房间没开电灯，便没进去。事后打听，知道这人已被捕。我随即离开南京，又回到上海继续找党。

到了上海，经过南京的一个在电台工作的中学同学介绍，认识了无线电台报务员季焕麟，又碰到在米店工作的狱中同难顾福生，由他们帮助解决住宿。后来，在马路上碰到了我在北京西郊区委见过，在苏州监狱也见过的一位原北平农科大学的同志，托他捎了一封信给省委。很快，省委派来个干事和我谈话，我向他说了出狱后的情况，提出想搞点文字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理论和党的路线。隔了10天，组织通知我编入法租界街道支部过组织生活。记得我的小组中有几个台湾学生同志。就在这时，我认识了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负责人王学文，并经他托张庆孚介绍我在闸北区安庆中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化名王志，每周教6个课时英文，月薪20元。8月底，我的组织关系由法南区委把关系转到闸北区委，同原在安庆中学的两个同志合编一个支部。11月，安庆中学发生反对校长的斗争，闸北区委召开会议讨论这次学潮。我在会上发了言，提出安庆中学当时分三派，一派是校长即国民党，一派是改组派，一派是我们，如我们联合改组派斗国民党校长，则可胜利。区委没有同意这个意见，结果国民党和改组派联合起来，我们被孤立。国民党派人将安徽会馆（安庆中学所在地）的前后门封闭起来，准备后半夜抓我们。左派学生事先向我们报了信，我和另一个教员同志当晚越墙逃走了。以后，我又化名达祖（从狱中出来后，我改名朱理治，化名大朱），在沪西区的正风中学教了一段数学，党的组织关系也转到了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

早在这一年的8、9月份，我为了多读些书，搞清楚一些理

论、路线、政策方面的问题，在王学文及“社联”同志的帮助下，同蔡德甫、王伯达、刘芝明及邓初民的女儿发起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当时的研究会会员还有郑思群、汪道涵。研究会的会长、党组书记开始是蔡德甫，后来是我，我于1931年6、7月离开后是曹荻秋。“社研”受中央文委领导，冯乃超、林伯修等人代表中央文委出席过我们的党组会。1931年初，我参加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书记是朱竟我，组员有柯伯年、柳岛生、林伯修、彭康和我，我即代表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领导“社研”党组。那时，代表中央宣传部参加中央文委的是华岗。“社研”在上海各大学及无线电台等处还建立了分会，规定每星期各分会开一次会，讨论社会科学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曾先后下发近十个提纲，如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等。至1931年6月底之前，“社研”会员达到400多人。

1931年7月间，团中央调我去担任宣传部秘书。当时的团中央书记是何凯丰，宣传部长为一广东人，他在8、9月间被捕后，由袁炳辉代理宣传部长。我除了做宣传部本身的工作，如起草传单，还兼做团中央训练班教员，并代表团中央宣传部参加“社研”党组会议和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青年会召开了上海各团体会议，讨论支援东北军等事宜。我们连夜动员几十名“社研”会员，每两人代表一民众团体参加这次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简称“民反”），选举结果我们取得了领导权。江苏省委派了孔原（也可能是杨尚昆）去领导其核心组织，我代表团中央参加。

当时党团在福建都没有省委组织，只有厦门中心市委和福建中心市委。厦门中心市委是一个台湾青年，名字记不清，方毅大概是委员，我去过他家。曾志也是委员，担任妇女部长。我通过她和市委书记王海萍布置反日工作，很快行动起来。以后，我去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团市委书记是叶飞。1932年2月底3月

初，我回到上海，那时“民反”已被租界当局查封，上海沪西纱厂罢工陷入僵局，派我去帮助做了一些工作；同时，参与整顿了奄奄一息的中大“学联”。4、5月间又派我去过一次厦门，一面送一些干部去中央苏区，一面巡视。

我在1931年7月调到团中央工作后，在上海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里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分会会员中，发展了季焕麟、陈国栋、阿陆等人入团，并建立了一个团的支部。团中央指示，这个支部是带战略性的，决定由我单线领导。以后，这个支部的团员发展到37人，其中有发报员、信差、事务员。中央苏区要报务员，我们送去岳夏等两人（岳夏在中央军委通讯部工作）。支部书记原为季焕麟，以后由陈国栋接替。我到团省委时，仍由我单线领导。这个支部是有战斗力的堡垒，曾利用无线电通讯的便利条件，胜利地发动了一场全国邮电系统的加薪斗争。

1932年7月，我调任江苏团省委组织部长。当时团省委书记是孙际明，宣传部长是小朱（即赵克让），秘书长是王履冰。孙际明和王履冰1932年底先后在上海被捕，由我担任书记，宣传部长仍是小朱。以后小朱调到团中央去了，由郑思群做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是胡南生，1933年春夏间被捕。秘书长先是乔魁贤，不久被捕，后是李一萍，直到我1934年3月离开，仍是他的秘书长。

那时，中央提出开展征收党团员运动，我热烈执行。第一次号召时，党员由700人发展到3000人，团员由400人发展到2000人。不久，党团组织均遭受到破坏。但事后又进行第二次号召（“一二八”号召），党团员人数又有发展，不久又遭破坏。1932年底，团中央遭大破坏，胡君鹤、胡大海、袁炳辉先后被捕叛变。当时幸有中央特科在租界工部局和巡捕房有情报人员，才使上海一些党的机关免遭破坏。因为，国民党怕帝国主义，他们如果要在租界破坏我们的机关或捕人，都要事先报告租界当局

并经租界当局批准，故使我们的情报人员大都可事先得到情报，如送的及时，即可使有关的同志得以逃避。就在那些叛徒被捕叛变的几天，团中央书记何凯丰和他的爱人廖世光接连几夜到我住处送警报。那时在上海负责特科工作的，我知道的有王世英同志。

经过这两次破坏以后，我感到这种靠运动发展党团员的办法是错误的，便集中力量巩固团的组织。上海美亚钢厂的罢工和国际无线电台的罢工，可以说都是在个基础上发动起来的。1934年2月，团中央认为我工作中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撤销了我团省委书记之职，由小陈（即陈伯伟）接替我的工作。听说此人后来被捕叛变了。

同年3月，上海中央局决定调我去河北省委工作，一位姓李的同志（估计是李竹声）和我谈的话。他说河北发生了李铁夫路线，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是坚决反对的，但河北省委中有人赞成，因此要我去帮助孔原。不久，中央局一位姓李的交通带我去了天津。

五、河北省委期间

我随上海中央局的交通于1934年4月乘海轮到天津。那时，河北省委机关因在1933年遭受大破坏，已经搬到了天津。我到天津后，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省委代理书记孟用潜先后和我谈话，决定我做省委组织部长。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张立森（又名张大个子），省委秘书长是他的爱人梁明。

在我来河北之前，上海中央局就已作出了反对李铁夫路线的决议。我来后得知，李铁夫是个朝鲜人，过去在河北省委当过宣传部长，1933年河北党遭受破坏时被捕，很快又被释放出来。出狱后，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反对当时的路线。孟用潜恢复

了他办的一个工人刊物《实话报》，并赞成他的文章。但孔原对他的出狱表示怀疑，并认为他的文章宣传取消主义观点，所以也写了3万字的文章，登在省委刊物《火线》上，批驳他。上海中央局得到孔原的报告后，作出“反对李铁夫路线的决定”，号召河北党起来反对“李铁夫路线”。我当时并没有看过李铁夫写的文章，也不知道他到底写的是什么，只是盲目地相信中央的路线是“国际路线”，认为反对中央的路线就是错误的，因此积极帮助孔原开展了这场斗争。现在看，李铁夫路线是对的，倒是我执行了中央的错误路线。那时，由于中央总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党内斗争方式也有错误，往往把可疑的问题和思想问题搅在一起，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反面意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

当时，省委作出了拥护上海中央局反对李铁夫路线的决定的决议，并批评了孟用潜，分配他到冀南做地委书记。孟用潜没有去冀南，而是给省委留了个条子就不知去向了。后来，张立森、梁明拿了省委的经费也不辞而别。于是，省委决定开除他们三个人的党籍。孟走后，组织上决定我代理省委书记，调林楠做秘书长。林于1934年7月间到上海工作（解放后林在山西一个工厂里当厂长），我们又从华北工会办事处调来王林作秘书长，他一直工作到1936年才离开（解放后，王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那时工会办事处主任是罗根，军委书记是柯庆施，宣传部长先是李华生，以后李葆华做过很短一段就调到冀东去了。省委办的刊物除了《火线》外，还有一个外围的统战刊物，是吉鸿昌出的钱，由陈伯达当主编。记得孔原曾对我说过，陈在莫斯科有托派嫌疑。当时省委有个文件，提到他是机会主义，可能与此有关。

1934年10月间，高文华由上海调到河北任省委书记；我改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个期间，省委机关比较稳定，除了一个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在1935年1月被捕外（此人是上海中央局派来的一个哈尔滨的工人，名字记不清了），没有遭到什么破

坏。由于我和高文华都经历过上海的惨酷环境，在斗争中摸索出了一些保护组织免遭破坏的经验，孔原经过河北党的大破坏后，也得到了很多教训。所以，我们三个想了一些防止敌人破坏的办法。比如，不开三人以上的会议，领导和领导机关不与下面组织发生直接联系，巩固支部等等。那时，都是孔原、高文华和我三人在一起开会，然后再分头找人开会；与各地联系，也是由省委派出巡视员。有一次，孔原住的机关出了事，一时找不到住处，便和他爱人张月霞带孩子搬到了我住的机关。那时，为了安全，经常要搬家，可由于张月霞送孩子回老家，我们等了她半个月才搬。有一天，孔原接到张的来信后突然对我说：张出事了。于是，急忙分头找房子搬家。由于我们警惕性比较高，采取了一些办法，所以在我离开河北之前，组织不仅没有受到什么大的破坏，相反还有所恢复和发展。记得我去时，天津市有几个党员，北京市没有党员，到我走时，北平已恢复了9个党员，冀南、冀中、保属、津南、京东的关系也逐渐接上了，大约总共有党员4000余人。

我从1935年2月之后，用了三个月时间为省委起草了一个名为《华北形势与革命任务的决议》（我在河北的化名是王刚和黄岗）。这个决议虽然从总体上没有跳出王明“左”的路线的框框，但也有两点与当时中央的提法不同。一是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汉奸、王爷侵略中国，民族矛盾很尖锐，分析华北可能发生巨大事变，提出华北民族资产阶级已部分转向革命方面，我们不只要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而且在冀东可以和地方开明士绅建立统一战线。二是鉴于过去华北各地暴动很多，搞起来后目标很大，又原地不动，结果被动挨打，都丢失了，所以提出不要再搞暴动了，可搞游击战争。这个决议被省委通过后，我就离开河北去陕北了。

我在江苏团省委时，与省委的秘密交通季瑶琴结婚，她是季

焕麟的侄女。我调到河北时，她也一起来了。我离开河北时，她正怀孕，留在河北。后来，听说她生完孩子不久就病死了。她去世前，把刚生的女儿托给省委的一个交通员带回老家。解放后，听那位交通员说，孩子在路上丢了，再没有找到。

六、陕北工作经过

我在陕北的工作分两个阶段：前一段是中央未到之前，在那里主持陕北和陕甘苏区工作，只有3个月；后一段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长征到达之后，主持陕甘省委和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10个月。前后加在一起一年多时间。

1934年底，陕甘特委写信给陕北特委，批评陕北执行的是立三路线。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简称“中代”）根据陕北郭洪涛、鲁笨等同志的报告，认为陕北工作在1934年有了很大发展，而陕甘边甚为落后；陕甘特委那封信的起草人蔡子伟同志在河北参加过北方紧急筹备会，是右派；又得知有几个右派已经混入陕甘边，因此断定写那封信是右派的阴谋，目的在于阻碍中央路线在陕甘边的执行，并企图推翻陕北已经开始执行的中央路线。于是，他要我去陕北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解决右派问题。

“中代”通知我去陕北是1935年3月，因那时我正在写《华北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尚未完成，故拖到5月初才起身，至7月才到陕北延川县的永坪镇。

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原来是平行的特委，前者归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后者由上海中央局领导的陕西省委领导。1935年2月，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统一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但没有明确领导人。

我去陕北前，“中代”交代，叫我先用“中代”和河北省委代表

的名义工作，待到北方局成立后，我将参加北方局，即用北方局代表名义工作，并说将来上海中央局还要派两个同志去，加我共3人成立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的代表团。我到陕北后，先用“中代”和河北省代表名义，以后接到北方局来信，叫我参加北方局，即用了北方局代表名义。不久，上海中央局派聂鸿钧、陈刚二同志来陕北，聂鸿钧同志经北方局的交通带到，介绍信上写明要我们3人成立中央局和北方局共同的代表团，但因陈刚同志没有来，而红25军来了，所以我们决定叫程子华同志参加代表团。从此，我又用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团书记的名义活动。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在聂鸿钧同志到来之前，上海中央局曾派张庆孚同志来。原先“中代”告我说上海将派人来搞军事，没有告诉我是派谁，而张又自称是中央代表，我以为上海来的即是他，所以叫张参加代表团。聂来以后，说上海中央局并未派张来作代表，只是叫他搞文化工作。张后来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捕，与这件事有一定关系。1937年，王世英同志和我谈起过张庆孚同志被派到陕北的原因，并说他的工作任务已写在秘密介绍信上了。那封密信，由于当时苏区内没有药水，所以没有能洗出来。

我到永坪镇后，即在西北工委执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上级交给我的1935年1月至5月份的五封指示信，以后又在前文安驿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过。因为有些同志要求讲得详细些，所以作了三个半天的报告。这些指示信是：“中代”给陕甘红26军的两封指示信（曾登在《西北斗争》及《火线》上），后一封信，主要是批评右倾取消主义；“中代”给陕北、陕甘边特委的4月指示信，长约35000字；北方军事特派员(?)给陕北特委的军事指示信，全文约8000字；“中代”给陕北特委写的5月指示信。

以上五份指示，合起来有5万多字，指示得很具体。由于“中代”并无苏区工作经验，所以指示内容大多抄袭当时中央文件

和各根据地的经验，是一种大杂烩。其中有许多是合乎“六大”和毛主席的正确思想的，如在1935年4月指示中说：“陕北革命运动与游击战争，开始了新的阶段——苏维埃阶段”；强调要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强调土地改革，提出“如果我们不能巩固同中农联合，则苏维埃革命胜利会变成空谈”；强调苏维埃民主，说：“必须特别注意毛泽东同志报告关于民主制度一节中所提出的经验方法……”；强调大力搞群众运动；强调党的建设等等。但是，由于当时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特别是到了“五中全会”，“左”倾路线已发展到最高峰，所以，这些指示信对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规定，从总体上仍然是“左”的路线。例如，对形势的估计，指示说：“两个道路——苏维埃与殖民地——的决斗同样在西北尖锐的表现出来”；批评陕北“政治与军事的保守、退却和等待，主张坚壁清野，允许国民党组织清乡会，与敌人和平共居”；认为“陕甘党内存在右倾取消主义，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对于右倾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便是对帝国主义富农路线的仁慈，对革命的残酷”；号召“反对国民党走狗并与之斗争”，“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及一切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斗争”。对任务的规定，指示说：“如果巩固发展了陕北，陕甘边区，与陕南红军游击队联系起来，建立陕甘宁广大苏区，更将陕南与川陕边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这就造成一个更伟大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不仅一方面……使川陕边苏区有广大雄厚的根据地，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伟大战斗，而且另一方面可以打通新疆和内蒙古的国际路线，西北的党要共同努力奋斗来迅速完成这一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事业，首先你们要负特殊重要的责任”。在军事上，指示提出“运用红军基本运动战的策略，配合阵地战坚决进攻敌人”。在土地改革方面，指示提出富农“无权与贫农、中农同样分地，只能分坏地”。

上述五份指示中的前四份指示，在我未到陕北之前，就已经

由交通带到了陕北。据郭洪涛同志告我，西北工委讨论过，高岗表示同意，并将这些指示登在《西北斗争》刊物上。在我传达后，也未听到高岗有任何反对意见。

由于我的水平限制，加之新到陕北，思想方法上又有片面性，没有做系统调查研究，所以对于上级的指示，基本是照本宣科，对它的正确部分没有发展，错误部分也没有多少纠正。当时由西北工委通过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行扩大会议决议”，“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以后我写的“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确实是错误路线的产物。但是，这几个文件也并不象高岗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发展了‘左’倾路线”。对形势的估计，虽然把有利的方面说过了头，但对三次“围剿”敌我力量对比，也只是说“优势是属于我们的”，“对于我们更加有利”，并没有说过三次“围剿”中我们占“绝对优势”。在军事发展方向的规定上虽有毛病，但也只是说“与25军北上抗日部队取得呼应”，并没有叫部队立即去打青海、新疆的意思。

我去文安驿时，二次“围剿”已结束了。那时，敌人看到陕北苏区的力量逐渐壮大，红25军已到了陕南，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又会合了，有可能北来，所以成立了“剿匪”总指挥部，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张学良任副职，准备对陕北和陕甘边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敌人“围剿”的主力放在南面，有东北军7个师的兵力，一路王以哲从洛川、鹿县北上，另一路董英斌和杨虎城的部队从庆阳、合水入侵；北面有地方军阀高桂滋、井岳秀两个师；西面是马鸿逵部；东面有阎锡山两个师。敌人意图是从南面主攻，北面牵制，南北“围剿”。

在文安驿会议上我做传达之后，和郭洪涛到刘志丹、高岗住处，商谈了一下部队今后行动方针。那时，上级为了配合一、四

方面军及 25 军的行动，曾提出要陕北苏维埃红军主要向南发展，以便相互呼应配合。上级几次指示也都是向南发展的，证明总的方向并非错误，但在当时没能展开讨论。商谈时，我同意了刘、高打靖边、安寨的建议。后来他们又去打横山，没有打下来。

因为传达“中代”指示时，大家都同意，并无争论，同时，观察蔡子伟同志在工委中的表现（这时蔡已从陕甘特委调到西北工委工作），感到此人不象是坏人，所以我决定先抓实际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对“中代”所说的右派进行考察。

我抓的第一个工作，便是扩大红军，并想在扩红运动中来推动地方的土改、游击战争、群众运动、建党建政等工作。中央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扩大百万红军”，给陕北的任务是 10 万。我们写了一个“扩大红军月决议”（这个材料在中央办公厅编的《六大以来》中有），提出 1935 年 9 月作好准备，10 月扩大 3000 人，第二年即 1936 年 1 月 28 日扩大到两个军，即 9000 人。决议下去后，陕北 9 月份就开始动起来，搞得轰轰烈烈，到 10 月半统计，已完成了 2700 人的任务，补充了 25、26、27 军，估计到 10 月底，肯定会超过 3000 人。

陕北在扩红运动的同时还深入进行了土地改革。当时，陕北土地改革进行得很热烈，他们是根据中央苏维埃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和指示搞的，有一套方法。我在扩红运动发展起来以后，曾和马明方、郭洪涛、崔田民等同志研究了几次查田运动条例。这个条例是否发出，记不清楚了。我认为陕北的土地革命运动，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把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问题主要是除了参加革命的地主、富农一样分地以外，其余的富农分坏地，地主不分地。这些都是“左”的政策。至于陕北党与群众工作，在我去前就做得比较好，我去后在原有基础上亦有些发展，党、团员约有 2 万人，工会、赤卫队、少先队组织都很

普遍，工作也极活跃。

为了了解陕甘边扩红运动推不动的原因，我们派李景林、惠碧海、鲁笨等同志带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帮助工作。李景林等同志去后，发现那个地区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军事上是很有成绩的，不仅恢复了 26 军，还给 27 军很大帮助，但地方工作确实有些问题。鲁笨等同志来信说，担负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黄子文，见到敌人一个团兵力在几百里的战线上添筑了 3 个碉堡，便吓昏头脑，认为敌人的碉堡已完成了，南区已经被包围了，主张立即退却，放弃现有根据地，因此，敌人很顺利地破坏了南区几万平方公里的游击区，甚至十几个白匪可以在我们的游击区畅行无阻。李景林、鲁笨、慕生桂还报告说，陕甘边特委根本没有做党、团、工会等党群工作的干部；在几万平方公里的苏区内，只有 300 个党员；有六个县的苏维埃与革命委员会内，根本没有一个党员；非党员实际领导了南区十几个县的分区委，国民党的公安局长甚至做了苏维埃主席；陕甘特委所在地的保卫队内不知有党，是哥老会的把子团占据领导权，最重要的是，群众基本没有发动起来，土地基本没有分，地主很猖狂。高岗对此还有一套理论，说陕甘边情况特殊，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群众不要土地。后来，又接到李景林同志报告说，他们派了惠碧海同志带领土改工作团到下寺湾附近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刚开了一两次斗争会，地富即到处告状。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在群众大会上公开骂群众是土匪，惠碧海同志被撤销了工作团长职务。

这个报告传来后，陕北党、政、团、工会的同志极为震动，他们说：“公开骂群众是土匪，反对土改的李西萍不撤销工作，而领导群众斗争地主的惠碧海反被撤销工作，这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保护哪个阶级的利益呢？”这时，我相信了“中代”的断言，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也确有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他们帮忙，假使不开展思想斗争，会犯大的错误。所以，我写了一篇《打倒右

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中央路线而斗争》的文章（我在陕北时用的名字有黄岗和煌岗），同时派了马明方、鲁笨等同志前去陕甘边反右倾取消主义，并要他们告诉陕甘特委，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是党的基本路线，绝对不能动摇。现在看来，我那篇文章，是受了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有许多错误，例如，把中央路线说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线”（那时遵义会议决议尚未见到，也不知有遵义会议）；又如，为了反对攻击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散布失败主义观点，说“江西红军与工农群众仍然保持了江西绝大部分苏维埃土地”，并根据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报告，说“苏维埃城市占全国四分之一，苏维埃人口占六分之一”等等，这都是不合事实的。另外，还有些问题也说得含混不清。但是，批判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在敌人进攻面前恐慌逃跑，借口陕甘边特殊而打击群众斗争情绪，阻碍分配土地等错误，还是正确的。

中央来陕北后，我和李富春、萧劲光、蔡畅等同志组成了陕甘省委。根据中央命令，省委立刻分配陕甘边土地，并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我亲自领导了一个工作队分了王家坪（距原陕甘边特委所在地20里）的土地，发现那里土地以前是没有分配过的，群众要求土地很迫切。群众分地后欢欣鼓舞的情况，至今还历历在目。分配了土地以后，群众有了积极性，陕甘边的红29军和党的建设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扩大起来的。这证明，陕甘边特殊，群众落后，不要分地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1942年西北高干会时，高岗说我派李景林、惠碧海等同志去陕甘边，是叫他们专门“分配中农土地”。我在《打倒反党的右倾取消主义》一文中曾明确地说过：“在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反对‘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表现在反对中农的极错误的策略上。”把它看成为“极错误的”，怎能又叫人去专门分中农的土地呢？

1935年9月中旬，红25军长征到了陕北，与我们在永坪镇

胜利会师。红 25 军和代表团、陕北、陕甘特委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开会，决定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我、郭洪涛、徐海东、程子华、聂鸿钧、刘志丹、高岗、郭述申、马明方等 9 人组成，我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省委成立后，立即成立十五军团，由聂鸿钧任军委主席，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这种任命是有毛病的，当时应当叫刘志丹同志担任军委主席。但工作分配后，刘志丹表现得很坦然，而高岗则对担任政治部工作表示不满意，和我大闹起来。其实，让他担任政治部主任，并没有小用了他，25 军的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只当了他的副主任，他作主任，也就差不多了。即使分配得有不妥之处，以后在工作中还可以改变，亦不应当在军团成立并要立即行动去打仗之时和组织大闹。为了怕十五军团成立后对他不易领导，我在第二次永坪扩大会议上狠狠地批判了他。起先，军委主席一职我意叫刘志丹同志担负，因他是本地人，有名望，但当我征求聂的意见，他是不是负责政府工作时，聂表示自己愿意搞军事，上级派他来也是搞军事方面（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的介绍信上确实指定要聂负责军事方面）。后来，我说我来搞政府工作，他们又不同意，一定要我任省委书记。

军委和省委成立后，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会议开始，首先由聂鸿钧作报告。他在原则上谈了十五军团今后的任务，作了一般的指示，具体军事行动没有提出什么来。那时候情况迫切，已经判明敌人一个师由洛川出发，第一天到了鹿县，第二天到了甘泉，第三天到了延安，如何打法，应该回答这个问题。随后，第一个是高岗发言，他主张向北发展，向南取守势，建议首先再打横山。理由有两条：一条是井岳秀和高桂滋部队好打，一打就散了；另一条是向北发展有好处。他说，首先看能不能打下绥德、米脂来，这两个地方是陕北最富裕的地方。

又能够与神府苏区打成一片，往后，再向西南一扫，可以出三边打马鸿逵。第二个发言的是徐海东同志，他认为我军当前主要任务不是发展苏区，而是怎样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既然敌人“围剿”的主力是东北军，要粉碎“围剿”，首先必须打东北军，否则，就是打垮了高桂滋部队，也不能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把敌人的主力东北军打垮了，才可以保卫陕北根据地。东北军可不可以打垮呢？徐海东同志认为是有把握的。他说，东北军被消灭了不少，25军在鄂豫皖和东北军打过几仗，东北军被消灭了不少，25军的武器全部是缴获东北军的（徐海东同志在1963年3月21日给我的信中重述了他那次会上的发言）。接着发言的是郭述申、程子华同志，他们同意徐海东的主张。由于两方面都坚持各自的意见，逼得我这个外行做结论。我表示同意徐海东同志的意见，但我认为东北军长驱直入，深入苏区，一天进驻一个城市，在这样的情势下，必须解决我军如何去打东北军的问题。我提议将甘泉包围起来，佯攻甘泉，敌人发现交通线被切断，上不得上，下不得下，一定会命令延安之敌回过头来增援甘泉，这样，我们便可以打其增援的队伍。我这个意见是看了毛主席在江西苏区几次反“围剿”中打仗的一些材料，得到了启发提出的。我发言后，反映最快的是刘志丹同志，他同意我的意见，并补充了一条好意见，说延安南30里处有一片森林，可以隐蔽部队。其他的同志也都同意了，于是部队马上行动起来。隔了几天，十五军团在劳山打了埋伏，消灭了敌人110师共3000人，将师长何立中击毙，初步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从上述粉碎三次“围剿”的经过来看，徐海东、程子华和我在战略方针上和具体的战役部署上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如果依照高岗的主张，红军北上再打横山，正当第一次打横山失利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敌人有了准备，等于攻坚了；即使加上25军，也不一定能打得开，即使打得开，也不能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但

高岗在 1942 年西北高干会上，却说他主张的向北发展如何正确，硬说我在 25 军到达后，把左“倾”错误路线贯彻到了军事中去。这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

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是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等工作，想在工作中看右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派去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土改等工作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25 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民同志的供词中（张当时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警卫旅旅长，红 25 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25 军因不知他地下党员身份，将其俘后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很多人到 26 军。因此，又怀疑 26 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 25 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之必要。于是，省委决定肃反。因 25 军的参谋长戴季英曾是鄂豫皖的保卫局审讯部长，并带有一套原保卫部门工作的干部，而我又受当时中央推荐的《肃反》一书的影响，误信鄂豫皖的肃反经验，准备叫戴做保卫部长。由于徐海东同志说戴意识不好，便让他做了副部长，代理部长职务。同时，我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同志领导，告戴季英审讯必须叫郭参加，因他是本地人，了解情况。又因为聂鸿钧同志曾在赣东北搞过肃反，所以叫他主持前方肃反，我以为这样布置，绝无搞错之理，没想到，结果还是出了大错。

戴季英先审讯了黄子文等人，第二天即来信说：“未经用刑，他们即供了刘、高等 13 人。”接着，戴又审问了一个同志，也报告说：“未经拷打，是他自动交待出刘、高的。”我问戴，审讯时为何不叫郭洪涛参加，他说：“按照鄂豫皖保卫局的规定，只能军

委主席一个人参加，书记是不能参加的。”我因无经验，只能听他讲。以后，他又审了张文华等人，口供也是一样。我觉得问题严重，叫郭洪涛从瓦窑堡星夜赶回。我问郭，刘、高等是不是右派？郭很肯定地说：“刘、高不是右派”，并说，“杀了我的头也不信。”但后来，当他看到了大批口供，虽是仍有些怀疑，也不敢多说什么了。

接着，我约程子华同志一起参加了一次审讯。被审的同志在用刑后都讲刘志丹等是反革命，戴季英主张立即逮捕刘、高等。我说：“刘志丹是创造苏区、创造红军的有功之人，说他是反革命不好解释”。他说：“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为的是消灭苏区，消灭红军，象过去纪振同、旷继勋、许继慎等都是这样的做法。”我说：“此事太大，材料尚不充实，需再搜集，慎重处理”，坚持不能抓（见程子华1942年电）。程问我：“如前方发生了问题谁负责？”我说：“可叫刘志丹回到军委来，代理军委主席。”

以后，口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越是搞不清楚口供究竟是真是假。所以，我一面与郭洪涛商议，打算在刘志丹回来后，在省委机关软禁起来，公开告诉刘：“你的问题一时搞不清楚，暂不要出去”；一面叫戴起草一封信给前方，叫前方注意防备。但戴写好信后未给我看，直接发出去了。我不知他是怎样写的，只知刘回瓦窑堡后并未来省委，而是直接去了军委，并被戴引到保卫部扣了起来。同时，前方又逮捕了許多人，这样就把事情闹大了。

为了把问题搞清，我在保卫部找了一位被捕的同志，告诉他：“现在有六、七个右派供了刘、高和你们，我们一时搞不清楚，只得暂时委屈你们一下，但是我保证党一定会实事求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并送了被子给他。又命令戴季英：“前方押回的人一概不许审”。同时我亲自连续几天审讯已有口供的7个人，以便搞清口供是否真实。开始，他们因被打怕了，不说真话，三

四天以后，我发现他们完全看鞭子和脸色说话，证明口供是靠不住的，但也无法证明谁是反革命，谁不是反革命。于是，我用省委名义，拟了一个自首条例（是油印的，还盖上了省委的印），内容大意是：要说老实话，诬害了一个人要枪毙，隐瞒了一个人也要枪毙，供的真实，可以允许自首，自首后可以分配工作，但是不能保留党籍。这个条例发给了所有在押同志，当时许多同志都看到过。自首条例发下去后，他们开始讲老实话了，都说刘、高等人不是右派，并在口供上签了字。于是，我约了郭洪涛一起又审讯了一次，一致肯定了刘、高等 26 军同志不是右派。我要郭到前方，告诉前方说：“口供不可靠，叫前方停止捕人、杀人。后方没有发现刘、高等任何证据，如前方也没有发现证据，后方准备释放。”郭在第二天即去了前方。行前，我曾对郭说：“将来释放之后，高岗会要扯皮的，但我们还是要释放他们，决不能昧着良心做事。”我并告郭，子华同志讲理，只要说服了子华同志（这时，程子华已去前方），就可以顺利解决。郭到前方后即将后方的意见告诉了程子华，程当时即找了保卫科长朱印新，命令不许再捕人，前方即停止了捕人（见程子华 1942 年电）。子华同志下命令，崔田民同志也在座。据郭洪涛同志后来对我说，他和程谈话后，将结果写信告诉了我，并告我中央已到陕北，但我未收到此信，估计是被戴季英扣了起来。

当时，我还用省委名义写了一个肃反指示信，主要内容是：不要用刑逼供，不准指名问供，不要杀人，要采取自首政策，刘、高不是右派。此信经郭洪涛同志看后即发出。这封肃反指示信在 1942 年高干会上曾拿出来过，还可以找到。1945 年 7 月陕北历史座谈会上，李景林同志发言说他在陕甘边看到这封指示信后，知道省委要纠正肃反的错误了。

那时，戴季英一再说反革命气焰高涨，要杀些人来镇压。我说：“杀哪一个都不行，因为如杀了右派，刘、高等人都是他们供

的，将来这个案子将无法搞清；如杀了其他的人，则更不应当。”所以，后方未杀任何一人，并且前方押回来的人，一个也未审。至于前方杀人，事先并未请示过后方。因前后方相距几百里，前方杀人的事情，我事先也不知道。有一次，我在保卫部审讯，见到聂鸿钧同志派回给戴季英送信的交还，听交通谈话，才知道前方已杀了一些人，但杀了些什么人，我仍不知道。这时，程子华尚未去前方，刘、高等尚未被扣留。据子华同志说，他去前方后，前方没有再杀过人。当然，我当时是省委书记，前方发生的事，我也是要负责的。

我曾批评戴季英同志：“为什么口供明明是打出来的，但你写信却说是没有用刑，是他们自己说的？”“为什么背着我和前方通信？”（那时我尚不知道，在程子华同志到前方后，他又背着我用我的名义和程通过好几封信）他说，鄂豫皖军委主席是代表团书记，聂鸿钧是这里的军委主席，他以为聂是书记，所以直接写信给聂。接着，他又违反我的规定，私自用刑逼两个同志口供。我发觉此人意识确实不好，作风极端恶劣，不将此人调离保卫部，无法正确处理这个案件，所以写信到前方，要将郭述申同志调来代替他的工作。

因为郭洪涛同志去前方后，我一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不知他和程子华同志谈话的结果，又不知中央已到陕北的消息，加之戴季英的蛮横，所以当时尽管已知道肃反搞糟了，并准备释放被错捕的同志，但终于未能释放。11月得到中央通知，叫我去下寺湾开会，我考虑这件事还是索性报告中央后再解决。行前，我怕戴季英同志再胡搞，当着马明方的面交代戴不许再审人，如一定要审，必须叫马明方参加。

赶到下寺湾，中央会议已经结束了。我见到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等同志，向他们说：“这次肃反有错误，刘、高不是反革命。”那时中央正在分配干部，我提出戴季英肃反盲目，

作风蛮横，不宜做保卫干部，中央同意了。当天晚上，我又找到博古，只谈了肃反问题。我说：“这次张慕陶反革命右派案件，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大体搞清了，除了李西萍等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外，刘、高及 26 军的一批干部肯定都是冤枉的。”博古问：“怎么办？”我说：“放！我们原先即准备取得前方一致意见后放。”他说：“放了，扯皮不扯皮？”我说：“扯皮是要扯的，希望能够回去当面解释并道歉一下。”博古说：“你不要回去了，现在情况紧张，马上要打仗了，部队无粮食，你留下吧。”我就把肃反的有关材料交给了他。和博古谈话时，炕上睡有张闻天、李维汉等同志。后来，中央到瓦窑堡后，经过亲自审问，确定了李西萍、黄子文、江旭、张文华等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举行公审，枪决了李西萍；1935 年 11 月 26 日，又通过了“审查肃反工作决议”。

从上述情节可以看出，当时肃反确实搞错了，原因虽是复杂的，但主要是王明“左”倾路线的肃反政策所造成。由于我积极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和上级对肃反的错误指示，思想方法存在主观片面性，对陕北的情况没有做系统的调查和具体的分析，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盲目采用当时中央推荐的鄂豫皖等根据地的肃反经验，加之用人不当，导致肃反扩大化，使许多同志受了冤屈。虽然搞了七八天后即发现有错，并极力予以纠正，但已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幸中央和毛主席及时赶到才予以正确解决。我当时是书记，应在政治上负主要责任。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对此，我一直是十分内疚的。我决不能因为高岗以后搞反党阴谋而减轻自己的错误。但高岗在 1942 年西北高干会上硬说我进行肃反是“借题发挥”，是“阴谋陷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是自觉的犯错误，则是不合乎实际的，也是我不能同意的。对此，中央批准的 1959 年 11 月 23 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已经做了结论。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公正的、客观的，我完全拥护。

高岗在1942年高干会上给我强加的罪名中还有一条，就是说我“反对迎接中央红军”，“不许陕甘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是“帮助敌人”。这个罪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也已得到了纠正。《审查意见》说：“朱理治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终于使我卸下了压在身上多年的包袱。

这件事的真实经过是这样的。那时，陕北苏区和中央没有任何电报联系，十五军团在劳山战斗之后，从缴获的敌人文件中，找到了一份电报，上面说：“有一小股朱毛匪军，已到会宁（静宁？），有窜陕北模样。”前方派人送到后方。随后，又送来一封信，谈到上述电报，提意部队开到三水、长武一带迎接中央红军。我因不懂军事，问了程子华同志。程的意见是：这个电报是在五六天以前发现的，消息已经过时，上面又只有一句话，亦不能断定是否中央来；而且，等我们再回信给前方，送信往返，时间更长了，情况变化更大了；另一方面，红军离开根据地远了不行，开到三水、长武一带，来往需一月时间；同时，在西北的敌人主要是东北军，我们只要拖住了它，中央红军来陕北就比较方便，不来陕北，我们也牵制了敌人，帮助了中央红军。因此，他主张部队南下打东北军。我与郭洪涛都表示同意。接着，程子华同志到前方，前方亦一致同意程的意见。后来，十五军团打了榆林桥，歼敌4个营。

打下榆林桥之后，仍无中央消息。我因发现肃反有错误，同时在翻阅25军带来的中央及各根据地文件及陕北保管的文件中，发现这种情况是全国性的，几乎各根据地都有，估计纠正这个错误有一定困难，很盼望中央能来帮助我们解决。所以，我从后方给前方去了一信，叫前方“派出一支武装交通队去找中央”。前方接到信后，派出武装交通拿了聂鸿钧写的信去找中央，终于在吴起镇找到了中央。据毛主席说，他看到过这封信。

我给前方写信之后的10天，接到前方送来的一份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杨尚昆签名的布告。那时，我还以为只是来了一个支队，中央未来。隔了一天，接到张闻天同志的信，叫我去下寺湾开会，这才确信中央真的到了，立即去了前方。行前我召集了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布置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要各单位向中央写报告，第二件事是准备迎接中央。见了中央后，中央留我在陕甘边工作，准备打仗，搞粮食，所以，后方是如何欢迎中央的，我就不清楚了。

以上的过程说明，我不仅不存在什么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相反是盼着中央来，希望中央来的。

中央一到陕北，即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并要我担任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肖劲光同志任军事部长，蔡畅大姐任妇女部长。中央的这一安排是为了照顾原有干部，如从资格、能力说，富春同志要比我强得多，但他不仅没有不满之色，相反与我同心协力，使我很受感动。我曾提出我和富春同志的职务对调一下，但中央没有同意。

省委首先抓的工作是为部队筹粮和进行土改，给陕甘边贫苦农民分配土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党组织和扩大红军。用了没多久时间，党员发展了3000人，还组建了红29军。

中央到陕北之初，我在陕甘边的套洞塬见到了毛主席，向他要看遵义会议的决议看了。我对他说：我拥护遵义会议决议，我认为当时中央不只军事路线错了，整个政治路线都是错的。接着，我举了在白区的经历加以说明。毛主席说：此事中央没有作过结论，不能谈。他这种严格的纪律性、组织性，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

12月，我又参加了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亲自听了毛主席所作的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批评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

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的报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1936年2月，毛主席率主力红军东征，富春同志调赴前方，29军也随主力走，陕甘边只留下两个连的部队。当时，整个边区人口只有6万，而包围边区的东北军也有6万，我便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与省委其他同志一道，集中力量开展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我们首先作省委所在地当面的东北军107师的上层工作，与他们的师长联络。我还给他们的师参谋长与了一封信，那人也姓朱，我说：我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不能同室操戈，让外族灭亡中国。其次，我们动员两个连的士兵与他们的士兵进行联欢，替他们购买给养，使双方和平相处，感情日益加深。蒋介石逼东北军向红军进攻，我们就约好唱双簧，假打一下，应付蒋介石。毛主席在东征前曾找我去汇报工作，听了我的汇报，他表示放心。在东征中，他在党的刊物上看到我写的与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文章，又给我写信，给以鼓励。东征结束后，中央组织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总理、叶剑英、李克农、边章五、伍修权和我参加，周任书记，我任秘书长，专作东北军工作。8月，中央决定派我去西安，任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至此，结束了在陕北的工作。

七、在西安作东北军工作

1936年8月上旬，恩来同志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叶剑英、彭雪枫和我去西安，作东北军工作，叶、彭搞上层统战，我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西安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告我，东北军中有个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刘澜波。我原先不知道西安还有个东工委，这个关系好象是由北方局新给中央的。

我和刘向三、王林等六、七人到东北军驻防的延安城里的交通站，准备通过那里去西安，到后发现交通站有被敌人破坏的危

险性，我便出城回到中央东工委所在地，打电报给周总理。恩来同志回电说，交通站安全没问题，要我仍去交通站，我即和刘向三、王林等一起搭车通过延安到了西安。

到西安后，刘鼎领我到张学良卫队营长孙铭九的家中住下。此时，叶剑英和彭雪枫已先住在那里了。我住下后，刘鼎即告我，刘澜波和宋黎已被国民党宪兵第3团逮捕了。但过了不久，听说张学良派部队硬把他们要了出来。又隔了七八天，我经过党内交通介绍见了刘澜波。

当时因为环境很坏，去后一个多月我只能每星期和刘澜波单独联系一次。听刘澜波说，东工委除他外，委员还有孙达生、苗勃然、宋黎。刘澜波在东北军里没有公开职务，他的生活经费和活动名义是利用他的堂兄刘多荃师长，我和他接头谈话的地点也多在刘多荃的家里。宋黎原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到西安后住在张公馆，张学良利用他和青年救亡界联系。

从10月20日到11月20日，我和东工委刘澜波、宋黎、苗勃然在郊外开过几次会（孙达生这时好象已派到苏区去了）。会议内容主要是由我根据中央的文件作时事政策的报告，同时，讨论东工委的工作。

这时，张学良等人酝酿组织同志会，作为东北军团结其内部抗日防蒋的核心组织。当时，我同意刘澜波、宋黎参加同志会以便推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迫蒋抗日政策，决定这事时，曾和叶剑英等同志商议过，也写过报告给总理。

张学良为了改造东北军，在北平招了一批青年学生，办起了一个学兵队，共有400人，孙铭九是队长，刘鼎帮助筹划并讲课。刘提出要我到学兵队教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发展史。我去讲了3小时。以后因为备课花时间，没有再去教。

11月，蒋介石下令将其嫡系7个师开进潼关，逼张学良打

红军。叶剑英、彭雪枫和张学良谈判后回到延安，我托他带了封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如不能发生突然事变，看来要停止内战是不可能的；并说我想留在西安，再做些工作。我仍住在孙铭九家，直到“双十二”事变后总理来西安，我才搬走。

当时正值绥远抗战，刘澜波去河北黄显声部队了，我在西安几乎每天和宋黎在公园里接头，布置西安的救亡运动。因为他是西安救亡总会和学生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有些活动能力，能在运动中起一定作用。

11月下旬到“双十二”事变的20天，西安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游行示威。我们还发动了学兵队去张公馆向张学良请愿，说他们来是为了抗日，现在绥远已打起来了，可东北军仍在打内战，他们要到绥抗战去了。张学良诅咒发誓地说，我如不抗战，你们可以枪毙我。不久，蒋介石到了陕西临潼，大批游行学生在1936年12月9日向临潼进发，向蒋介石请愿。走到灞桥，张学良赶到，向学生们发誓说，我一个星期内一定答复你们抗日的要求，要学生不要去临潼。隔了3天即发生“双十二”事变，蒋介石被扣。

“双十二”事变后，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来西安。到后3天，周恩来同志到孙铭九家和我谈话。我向他汇报了这段工作情况，他指示我仍做中央特派员，领导东工委，东工委书记仍叫刘澜波担任，并要我参加陕西省委，还指示我搬出孙铭九家，在外面另设立机关。代表团里分工博古与我联系。

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系统受到打击，特务头子宪兵第3团团长蒋孝先被打死，城里完全由张学良、杨虎城的武装控制着，因此，环境比较好，东工委也设立了机关。我在机关里开过几次会，讨论代表团交下的任务。这时，陕西省委机关也设立了，书记是贾拓夫，委员有欧阳钦、张德生，我参加了几次省委会议。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时介绍北方特科邹大鹏和我谈话。

邹将他系统下的工作人员袁晓轩介绍给我，要我分配工作，我叫他参加了东工委。后见他没有政治头脑，介绍给红军总部另行分配了工作。

1937年1月底，我患肺炎发高烧，住西安省立医院。隔了几天发生了“双二事变”，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内部混乱，中央代表团回延安。他们回延安前，博古来医院看我，给了我一些经费，说他们已告诉东工委，负责在我高烧退后护送我出城。

2月10日左右，东工委搞了一辆大汽车，由袁晓轩陪同我去乾县，东北军团长（地下党员）贾陶带了几辆摩托车护送我出的西安城，高锦明搭了我的汽车也到了乾县。到后一两天，又转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总部所在地养病，以后又搬到了耀县。3月底，刘澜波、宋黎、高锦明、项乃光到我处商议东北军东调安徽后的工作。鉴于刘澜波、宋黎的身份都是公开的，所以决定由项乃光、高锦明负责东工委并随军东下。刘、宋提出要去北平组织东北救亡团体，我同意了。

4月中，我由三原县去西安，在西安七贤庄办事处见了恩来同志，把东工委的改组及对今后的工作布置向他作了详细汇报。4月底，我回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我写了一个《东北军工作经验总结》，由中央秘书处印成了小册子。

八、河南省委、中原局和豫鄂挺进纵队

1937年5月初，我在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中央通知我，要我负责组建河南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随后，我又参加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会上争论很激烈，我没有发言。会议快结束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会议结论，毛主席、张闻天、朱德到会，刘少奇、彭真、高文华和我列席。张闻天谈了他

准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的结论，对过去白区工作路线基本上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接着是我发言，我主要谈了河北党在1933年大破坏，以后的省委对过去的做法有若干修改，组织有些恢复和发展，工作也有点进展。我发言后，朱老总发言，他认为全国白区几乎全部破坏完了，但河北尚保存几千党员，因此不能说河北犯了路线错误。毛主席在会上未发言。会后两天，少奇同志到我住处，说他不回华北了，要我回去。我对他说，我已接受了组织河南省委的工作，不能去华北。

当时长江局尚未成立，中央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4个组织交给了我。

第一是皖北特委，十年内战时，他们坚持下来了，保存有60个党员。书记是刘文，另有曹云露、张如萍、孙仲德，他们4人那时都到了延安。这个组织是比较清楚的，我们将刘文带走参加河南省委，将曹云露、张如萍留在延安学习，1938年1月，中央派他们回皖北，到开封见过我。那时长江局已建立，我叫他们回皖北准备与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以后到武汉找长江局，并把他们的关系介绍给长江局了。

第二是苏鲁边特委。他们在内战时期也坚持了下来，保存有200党员。书记是郭子化，那时也来延安参加白区代表会。为了审查这个组织并帮助他们工作，我们派刘文同志为省委代表到苏鲁边特委工作，他有肺病，坚持工作了3个多月就病倒了，以后到延安疗养无效，牺牲了。在台儿庄会战以后和徐州会战以前，因为山东省委已建立，陇海路又很快要被切断，所以把这个特委划山东省委去领导了。

第三是豫鄂边省委。保存有60个党员，并建立了一支60人的游击队，其领导人有关星江、王国华、仝中玉、周骏鸣。1937年春，他们派了游击队长周骏鸣到北方局请示。因当时我党正和国民党谈判统一战线，有同志曾提出为了促进统一战线的形成，

这支武装应当解散。他们不同意，又派周骏鸣找到中央，中央遂将这个关系交给了我。

我在延安研究了周骏鸣关于鄂豫边的报告，认为这是在中原实行毛主席战略思想的最好的依托。由于它红旗打出不久，国民党根本不承认它是统战对象，而且那地方土匪很多，是确山、泌阳、桐柏三县三不管的地方，只要斗争方式正确，它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可以大大发展；不但不会影响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而且可以成为在中原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种。所以，我代中央拟了一个指示，要他们根据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从消灭和争取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大力扩大游击队武装，并和当地开明上绅与政府建立统战关系，以便争取合法存在，作为将来抗日武装。这个指示信经中央和毛主席批准后，由周骏鸣同志带回执行（信上还要他们把豫鄂边省委改为豫南特委，受河南省委领导）。后来，这支部队很快发展到 1000 人，并由恩来同志与蒋介石谈判，编为新四军第 8 团队，周骏鸣任团长，林凯任政委，开到大别山区，时间大概在 1938 年初。这支武装后来成为新四军二师一个旅的基础。

第四是河南工作委员会。内战时，河南党遭到多次破坏，组织已完全搞垮，在中央交给我时，还有党员 70 人，刘子久是书记。工委会的主力在洛阳，是吴芝圃利用中学教师在教育界发展的，大多数是洛阳偃师一带的教员和学生。其次，是沈东平、郭晓棠以许昌的县立师范和瀋陵中学为中心发展的教员和学生。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在西华县和地方势力胡晓初等人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因此，我想在那里建立一个准备抗日的据点。

我是在 7 月中旬离开延安的。行前一天晚上，我去见毛主席。主席对我说：“关于形势和任务，你都听了报告了，你工作的区域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望抓紧时机，在各方面作好准备”。这简单的几句话，包含着极有远见的战略思想，给了我

大的启发，并逐步形成了我在河南工作整个时期的指导思想。

为摸清河南工委组织情况，我离开延安后先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办了个训练班，召河南的一些同志来受训。记得来过的有栗在山、杜青等同志。我一面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方针政策，一面向他们了解河南党的一些情况。由于训练班只我一人负责，所以只能作些初步的了解。在那里，我和抗大的东北籍女学员苏菲结了婚，并与她一起前往河南。

1937年9月初，我经洛阳到开封，不久即召开会议，成立了省委。委员有刘子久、吴芝圃、沈东平、刘文、郭子化、林凯（刘文、郭子化、林凯不久离开河南），以后加了彭雪枫、陈少敏、危拱之、王国华。省委的分工是彭雪枫做军事部长，林凯（后是陈少敏）做组织部长，刘文做苏鲁边省委代表，刘子久做省委宣传部长，吴芝圃做豫西特委书记，郭一青做豫西南特委书记，王国华做豫南特委书记，张维楨做豫中地委书记，沈东平负责西华豫东特委。豫北特委书记原为张海峰（后改名张萃中，解放后是辽宁大学副校长），1938年2、3月间划归北方局领导。豫东南地委书记原为苗勃然，后来是一个名叫小舟的同志，姓记不清了。

省委成立后，首先抓群众性的救亡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我们先在开封等城市开展学生抗日活动。抗战前，复兴社强迫高中学生参加军训，集体参加复兴社，三青团，因此，开始时在男学生中发展工作比较困难。我们便派省委妇女部长吴平以扶轮学校校长名义在女学生中活动，结果颇有成绩。北仓、女师等校的女学生都很活跃，是开展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接着，男学生也参加了。以后，平津流亡学生和留日归国学生相继来到开封，并建立了党组织。我们把两个党员学生头头吴祖贻和谢邦治吸收进省委，做青年部的正副部长，还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在河南各城市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然后，我们有计划地把这些青年派到

各县，发动与组织青年，搞统一战线，做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中，从中发展党的组织。省委刚成立时，河南党员只有70人，到1938年底发展为1万人，并在绝大部分县里建立了党的组织，靠的主要就是这个办法。

那时，范文澜、王阑西、嵇文甫等同志和民主人士在开封合办了一个《风雨》周刊，每期发行3000至5000份，颇有一些影响。我们便让王阑西代理省委宣传部长，把《风雨》作为省委机关刊物，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范文澜等人还在河南大学发起了一个游击战争训练班，我们派了刘子久同志去做教官。省委妇女部利用扶轮学校组织了一个孩子剧团，我们派了危拱之去领导，哪里工作打不开，就派孩子剧团去。党的组织还成立了战时教育工作团和光明剧团，到各县去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总之，用一切办法发动群众，为游击战争做准备。

其次，省委抓了建立武装和根据地的工作。省委筹备成立时，我们就反对取消内战时创立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并充分利用了它，发展了它。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就驻在确山竹沟，办教导队，扩大武装，队伍发展到1000人，后被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队，挺进皖东敌后抗日。同时在竹沟设立了8团队的留守处，使竹沟成为中原地区抗日根据地一个重要的支点。河南省委迁到竹沟后，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彭雪枫等从竹沟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西华县，与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武装会师，挺进豫皖苏敌后，发展为新四军第四师。

太原、济南失守后，朱瑞同志从华北来，带给我一份刘少奇同志写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这篇文章论证了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更坚定了省委准备游击战争的信念。省委发出了准备10万武装的号召，把统一战线、群众工作、准备武装，都围绕在准备游击战争这一中心任务的周围。徐州会战后，恩来同志转来中

央指示，要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去，组织与领导群众运动，准备去发动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我亲自沿平汉、陇海路到开封、郑州、许昌、信阳作了布置。在省委准备游击战争的号召下，各地党组织都做了准备，但因国民党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口，敌人被阻黄河以东，河南绝大部分地区没有沦陷，仅豫东几个县和信阳二个区被敌人占领。在豫东，吴芝圃同志利用他个人和睢、杞、太党员的活动，再加上从开封撤出的党员群众，发动了千人左右的武装。信阳两个区则发动了2000人的武装。经过是这样的：省委在开封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内的同志反映，河南省各县县长中最年轻有为的是李德纯，所以，我派了危拱之同志率领孩子剧团到信阳，名义是演戏，实际是做统战工作。危拱之去后就和李德纯建立了统战关系，李在我党的建议下，组织了2000人的自卫队，做了许多游击战的准备工作。后来，我们又派了刘子厚同志前去组织县委，帮助领导这方面工作并准备建立根据地。两区沦陷后，这两千武装即发动起来打游击。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少奇和省委又先后派了李先念、陈少敏从竹沟带了一些武装前去，帮助训练和领导这支队伍，使它成为豫鄂挺进纵队一部分的基础。后来，国民党命令李德纯部队撤回，遭到李的拒绝，国民党即通缉李德纯并准备进攻。我们分析这支武装如仍打李德纯旗号，国民党可以利用违抗“国府命令”的罪名加以打击，因此，我找李商议，要他暂时到新四军总部回避一下，利用机会学习些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他同意了，并要求加入共产党。我因他表现很好，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替他起了个化名叫朱毅，派武装护送他去总部。以后，他便一直用这个名字，解放后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

当时，各县准备游击战争最早并最好的要算西华县。省委一成立，省委委员沈东平同志即利用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的统

战关系，派王其梅同志去组织武装，准备打游击。后来，发现西华县长楚博是开封市委书记张漫萍同志的姐夫，所以派了张做统战工作。从此，西华全县的武装都组织了起来，基干部队有3000人，枪枝齐全。彭雪枫同志由竹沟去敌后时，也在该县得了一些补充。后因黄河决口，西华陷在黄河以西，该县先派了两个营，后来全部3000人马都过了河，参加了彭雪枫的部队。这支部队中党员相当多，西华县委还办过多批训练班。后来，楚博被国民党逮捕，临难表现很好。胡晓初到敌后被彭雪枫撤销了工作，旋被国民党逮捕，临难亦表现很好。沈东平同志则在敌后和日寇作战阵亡，他的死，对豫东党特别是对西华县工作是很大的损失。

第三，省委抓了扩大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在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河南省委原先是受中央直接领导，1937年底长江局成立以后，划归长江局领导，但长江局没有找我去汇报过。我曾让林凯将省委的工作布置及想法报告了长江局，王明不同意省委根据中央所决定的方针，派了林凯来省委，说这个报告“政治思想上有问题”。1938年5月，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到后，恩来同志召我和彭雪枫去武汉，传达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因恩来同志发言支持了中央的方针，所以我们没有理会王明那一套，仍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布置我们的工作。王明路线的特点，是在统一战线中放弃党的独立自主，迁就国民党，给国民党涂脂抹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正面抗战，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不搞游击战争，不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而河南省委在认识上和做法上都和这条路线不同，对这条路线是进行了抵制的。我们在敌人未占领之前，便事先做好了游击战争的准备。在豫东沦陷的几个县和豫南沦陷的两个区发动了几千人的武装；在没有被敌人占领的竹沟留守处，先后派了五批武装去敌后，输送了几千个党员和干部到周骏鸣、彭雪

枫、李先念部队，共同创立了这几个地区的根据地；在大城市发动万余青年、工人回乡参加与准备游击战争。在河南省委党校，我担任统一战线教员，把抗战力量分为左、中、右，强调必须壮大左派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右派力量，打击日寇和投降派，完全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来讲的，根本没有讲“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因见长江局的《新华日报》很少谈组织与准备游击战争，我在该报上写了一篇《论准备与开展江淮河汉间的游击战争》（我那时用的名字除朱理治外，还有李迅和煌岗），号召党员和爱国志士起来准备与开展游击战争。此文发表1938年8月间。在六中全会上，我紧接着王明的发言，根据中原的情况，驳斥了他的意见。这些都说明，当时河南省委是拥护中央路线的，并没有执行王明路线。但在六中全会以前，省委没有向长江局提出反对意见，这是个缺点。

1938年5月，我和彭雪枫去武汉长江局开会后，即将省委搬到了确山竹沟。我兼竹沟留守处政委，在那里办教导队和训练班（即党校）。蒋介石曾有命令要撤销竹沟留守处，我们派彭雪枫同志见了卫立煌，卫立煌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月，中央指示要将河南省委划为两个省委，一个到豫东、皖北、苏北，一个留在竹沟。于是，决定由彭雪枫从竹沟带了几百名武装和干部到西华，和吴芝圃领导的武装汇合起来，又补充了些武装，过新黄河，到敌占区成立新四军第四支队，并由彭雪枫、吴芝圃等同志组织了豫皖苏区党委。

9月，我去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上，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委员有郭述申、郑位三、彭雪枫和我。同时决定将河南省委分为豫西区党委和豫鄂边区党委，前者由刘子久负责，后者由我兼书记；湖北省的鄂西北成立区党委，由王瀚负责；鄂中区党委先由钱瑛，后来改由杨学诚负责；鄂豫皖区党委先由郭述申，后由郑位三负责。再加

上已成立的豫皖苏区党委，总共为6个区党委，统归中原局领导。

我于1938年底回到竹沟，成立了豫鄂边区党委（委员有李先念、陈少敏、危拱之、王国华、陶铸等），并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随后，先念同志带了竹沟的两个中队和几十名干部，前往四望山开辟敌后根据地。

1939年1月底，少奇同志去洛阳布置豫西工作之后，经南阳到竹沟。当时中原局委员在竹沟仅有少奇同志和我，少奇总管全部工作，由我协助，其下未成立任何工作部门，有些必要工作，由豫鄂边区党委工作部门帮助来做。这时敌后需要干部极为迫切，为了节省干部，所以中原局机关精简到不能再精简的程度，少奇只有两个秘书，我主要兼豫鄂边区党委工作。少奇同志在竹沟先研究了豫皖苏边区工作，写了长达4000多字的指示信，后来又研究了鄂豫皖边区工作，也写了很长的指示。他还找钱瑛同志来，作了详细的指示，由钱瑛带回去向鄂中及鄂西北传达（传达后，钱因南方局要她，故去了重庆）；又找豫鄂边一些干部谈了话，作了指示。少奇同志的指示，对鄂豫皖边及鄂中如何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扩大部队，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建党；对河南及鄂西北如何准备游击战争，如何支援敌后，以及如何做党与群众工作，都十分具体明确。少奇同志在赴竹沟的途中及在竹沟期间，抽时间准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材料，回到延安后，在马列学院做了报告。在竹沟，少奇同志还做了“论党内斗争”的报告。3月，少奇同志离竹沟回延安，行前要我代理中原局书记。鄂豫边及豫皖边因有电台，有事直接用电报请示少奇。我则主要领导河南、鄂中、鄂西北三个地区工作，但重大问题，也转报中央向少奇同志请示。

4月，为了加强敌后武装的领导，我派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从竹沟带了一、二个中队去敌后，和李先念部汇合。区党委组

织部长由危拱之兼。8月，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巩固党的组织，选举出席七大的代表。9月，我被流行感冒疟疾合并症传染，在病中看到鄂豫皖新四军给中央和中原局的电报，知道鄂中五、六大队被敌人袭击，遭到损失，估计敌人反共高潮即将来临。考虑到鄂中、鄂东、信阳、确山四个区域的我党武装，分别归三个区党委领导，互不统一，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严重危险，因此拟了电报给中央，建议将李先念、陈少敏部，陶铸、钱瑛部，张体学、罗厚福部合编起来，统一指挥，创立鄂豫边的敌后根据地。这时，少奇回到竹沟，我病尚未好，他来告我，中央同意我的建议，决定我去鄂豫边敌后，做中原局代表及新四军纵队政委，李先念任司令员。我领导鄂中、鄂西北两个区党委和河南省委（豫西区党委及鄂豫边区党委合并，恢复河南省委，由刘子久、危拱之、王国华负责），中原局搬到新黄河以东，由他负责。我们还商议，认为竹沟四周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在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再坚持已不可能，竹沟历史使命已完成，决定逐步撤退。

1939年10月，少奇同志先带一部分机关干部和部队离开竹沟，赴苏皖敌后。随后，我带300个干部和300武装也离开竹沟，前往四望山与李先念会合。行前，王国华、危拱之和我分析了竹沟的形势，认为当地的国民党驻军68军和我有统战关系，不会对我进攻；敌人如使用地方武装进攻，因其中有不少党员，会事先报告我们；留守处又有电台，可打电报给四望山，四望山离竹沟只有90里，我和李先念都在那边，一夜即可赶到。因此，给竹沟留有一、二个中队武装和省委机关少数干部共200余人，准备第二批撤退。我们走后10天，确山政府的地方部队果然来进攻竹沟。民团里的党员在敌人进攻前一天曾向留守处报告了，但因布置不够周密，被敌人摸进了竹沟城。后被我们发现，由王国华和危拱之组织抵抗，将敌人赶出竹沟城外。但因电台发

生故障，没能发出电报，前后两次派人到四望山告急，又被敌人扣了。第三次派去的人找到了李先念和我，我们急派了周志坚同志率领一个旅整装出发。但不久即见到从竹沟突围出来的人，说我们部队和干部已突围到了龙窝。也考虑到叫周志坚到确山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但又考虑这样做，对我利少害多，所以即停止进军。当时也不知我方死伤多少人，为了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由我拟发了个电报，说国民党进攻新四军8团队留守处，惨杀我因抗日受伤的干部、战士和家属200余人。事后了解，实际没有那么多。

11月中旬，我在四望山召集豫南、鄂东、鄂中领导同志开会，根据少奇和中央决定，统一三方面的军政领导。首先是解决统一军事领导问题，决定将三方面的武装力量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在四望山会议后，我即和先念同志南下，沿途编制部队，先后编了三个旅和司令部的直属部队，大概有1万人的武装。以后到了大山头及八字门，又将鄂中、豫鄂边及鄂东三方面的党统一起來，成立了鄂豫边省委。记得我写了一篇《怎样做》的文章，曾印成小册子。开头是这样说的：“我们的路线是订立了，这就是开展群众抗日斗争，扩大游击战争，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抗日政权。在壮大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到来的事变。”我在那里除研究财经政策，准备组织边区行政公署以统一领导各县抗日政府以外，曾想着重研究在游击区周围如何开展工作。鄂豫边敌后根据地建立在武汉外围，公路铁路很密，日寇武装力量和国民党武装都很强，当时仅国民党即有40个师包围着新四军，我们处在两大力量之间。那时，先念和我认识到，在两大力量对峙下，只要善于运用策略，我们不但能存在，而且可以大大的发展；假如国民党投降，或日本失败，他们间的矛盾没有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情况便会困难了，所以必须事先有所准备。我曾研究了蒋占区汉南和武当山的工作，但因

不久我被调回延安，未能见到成绩。

我在河南的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项乃光叛变问题。项乃光在东北军东调后，是东北军内党组织的负责人，由长江局领导。1939年5月，51军的一个团拉了出来，长江局指示其中的党员干部要撤退。这样，项乃光、王西萍、贾陶等7个人来到竹沟。我因了解到他们在友军中有不少关系，故留项乃光和王西萍在中原局做友军工作。由于项知道的友军关系太多，所以他几次提出要出去工作，我都没有同意。但由于措施不力，他还是被派了出去，而且很快叛变，使友军中一些组织被破坏，给党造成了损失。这件事给我的教训也是很多的。

九、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两年

1940年3月，我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在此之前，我听到有两个人说我被捕后自首叛变过，其中一人是我前妻的哥哥季楚书。此人原为上海“文总”的秘书长，以后被捕，抗战后出狱。我因他妹妹病故，给他写信报丧，他却回信骂我是叛徒。因此，我到延安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中央责成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组成审查小组，经过一年审查，证明纯属误传，不足为凭。那时，正赶上皖南事变刚发生，国民党政府停止了给陕甘宁边区的经费，并在军事上、经济上进行封锁，使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很大困难。在此之前，边区的经费80%靠外面给。因此，边区银行只好靠发行来接济，造成边币贬值，物价飞涨，群情大哗，追究责任。中央撤了曹菊如同志的行长职务，决定由我接任行长。我本打算今后搞哲学研究，正准备写《唯生论批判》，同时因高岗负责西北局工作，怕人事问题搞不好，不愿意接受。后经中央作我的工作，我觉得在党困难时应担负责任，于是向弼时同志表示，搞半年再调工作，弼时同志说至少要搞一年。到银行后，我

曾写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切照真理办事”的格言，做好了被撤职查办的精神准备。

我在银行工作两年，可分四个阶段。

1941年3月，从我接手银行工作起，至6月份是第一阶段。

开始一个月时间主要是看书，作些笔记，与吴亮平、王思华同志交换意见。《资本论》上说，决定的问题是生产。因此想到先投资生产，使各机关的生产有了基础后，下半年金融可以稳定，即“稳—不稳—再稳”。

那时，关于发行问题就存在争论。边区政府希望不发，中央和西北局希望发，最后决定发1000万，用于财政250万。4月份，银行开始发放贷款，主要贷给各部队、机关、学校，使之能有资金，实行生产自给，减轻财政压力。借钱的机关很多，天天和他们谈办什么样的工厂。给工厂的投资除100万活动资金外，又挤出了80多万，共投资180多万元。到了8、9月，投资八九百万元。这些贷款事先没有很好的计划，实际带有财政性质，但却给边区生产打下了基础。以后工业上的发展，这批资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最初发行速度很快，3月份增加78%，4月份增加37%，5月增加27%，上半年每月平均增加37%。发行快的原因，主观上是想赶快投到生产上去，客观上是为形势所迫。

对财政，一面是帮助，一面是挤。1941年上半年，财政上大部分靠银行支持。当时，我讲到下半年不再支持，并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财政上不要拖累。对于买粮食的300万元，我本不赞成给，后来，又买进又借出。今天检讨起来，过去粮食是买错了。

在业务方针上，银行和商业都有改变。银行的方针是发展生产，商店的方针是平抑物价，这种观点来自：一、过去人家都骂

光华商店赚钱；二，列宁的《论国家银行》上说，国家银行以发展国家经济为目标。

5月初，关于银行发行问题，又开始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涨了，不应再发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继续发。我当时写了《关于边区物价金融与银行基本政策》一文，因为3、4、5月物价波动很快，5月份高达22%，我想分析物价涨的原因。我认为，原因第一是受法币的影响，当时虽然已停止了使用法币，但边区物价仍以法币为标准，友区物价涨，边区的物价也要涨。第二是受顽固派的封锁。这是一时的，只要经济战线搞好，外货是可以进来的。以上是外部原因，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内部原因，生产太少，物资不够；出入口不平衡，财政收支不平衡；边区经济缺少组织性，私营经济没有组织，合作经济不能起作用，公营经济不统一，各自为政。因此，提出了4个办法，即加紧运输，使出入口平衡；加紧生产，使财政走向收支平衡；假如财政能平衡，资本可以投向生产；经济要有组织。文章最后谈到银行的基本政策，一方面要投资工、农、运输事业，发展生产；另一方面，又要使金融不波动。这两者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其次，也谈到银行是国家银行，不以赚钱为目的，后经黄松龄看过，又把这段删掉了。这篇东西5月13日印出后，发给了各行及银行顾问。

第二阶段是1941年7月至11月。

5月时，绥德物价大波动，边币跌到1元5毛顶法币1元，金融紊乱，拒用边币。关中在6月前边币1元可顶1元法币，以后绥德和延安的票子流向关中。陇东继起波动，一部分边币到三边，一部分回到延安。6月时，延安边币跌落，盐务处拒用边币收法币，因此，三边沿路都不用边币了，延安去驮盐的也买不出盐，老百姓有把边币撕掉的。以后，边币渐渐集中延安，到7月，延安边币跌到2元顶法币1元了。延安物价飞涨，虽然不拒

用边币，但大家买卖非用法币不可。投向各机关的生产资本，也有转向商业（如各种商店的建立）作投机买卖的。

当时有各种意见。第一种认为，发行票子，物价就涨，过去发行的不对。谢老曾批评我过去发行180万，多了。我当时说，不发行没有办法。谢老说发票子只能当苦药吃，不能当甜药吃。第二种主张，物价涨了，筹码不够，票子发的少，以后要继续发。第三种意见是冀察晋来的同志，他们说边币发的太快了，事先缺少宣传准备。我认为他们的办法在冀察晋的条件下是可以的，但在陕甘宁是不可能的，因为需要太急。当时，银行委员会经常开会，争论很多，每次都没有结论。我开始感到了工作难做。

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定下基本原则，坚持不超过现在的发行额，并且尽一切可能多运盐，使出入口平衡，稳定票子。下半年金融比较稳定，运盐起了作用。当时，又决定另发票子300万，全部给军委。我感到银行工作很难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大家争论，并把5月13日的文章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主张由上面解决。9月份，中央曾开过一次财经会议，争论很厉害。毛主席曾指出，基本问题不是金融问题，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同时，也批评银行过去偏重于国营经济，今后应向农业和私人经济贷款。

这一阶段，我想把票子大体维持住，再发不必要，可能性也不大。但票子还可以发，因为绥德还没有用边币，想集中力量搞推行工作。这时我还搞了平价运动，以稳定人心。7、8月份，物价跌了一些，光华商店的东西低价出售。平价运动后，人心较稳了，用边币能买到东西了。公营商店不收法币，把法币打到黑市里去了。组织公营商店联合会，统一公营商店购买货物的价格。搞有奖储蓄，吸收存款，以作生产投资。

在6、7、8月三个月里，我研究边法币兑换可否挂牌，首先

由裕顺通公司试办。9、10月试办有效，于是想到公开搞交易所。12月，用政府名义出一布告，规定所有买卖以边币作价，有拒用边币者要抓；到交易所买卖法币，平价交换；私自做货币买卖者也要抓；同时规定了处罚条例。

通过前一段工作，感到放款多了不好，少了也不好，因此订出了一个放款章程。章程的主要内容是：为发展经济，银行必须投资生产，少到不妨碍生产，多到不通货膨胀；外面票子多时要少放，少时要多放；生产奖金少时要多放，多时则少放或不放；财政厅收支务求平衡，少拖累银行，以便多投向生产；银行发行最高额不得超过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决定，超过最高发行额时，拒绝放款，财政借款在10万元以下者边区政府批准，10万元以上须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这个条例被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了。

因当时没有财经办事处这个机关，哪个款应放，哪个款不应放，不易知道，因此，拼命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三边商会代表团来时，座谈过一次，想到卖特货的办法，并到金盆湾去实地考察了一次，与717团^①商量，由银行投资。

第三阶段是1941年底至1942年6月。

专家们的意见，边币最好不再发了。财政厅提出1942年财政预算5000万，我们说至少要8000万，毛主席决定8000万。同时，西北局也有把物价搞好，稳定金融的决定。中央财经委员会拟出计划，经中央讨论批准，其中有1942年原则上不发票子一条。我当时为了财政不拖累银行，发行只是准备金，急需时再发，因此决定了1000万的投资放款，其中农业550万，工、商业各100万，合作经济100万。我这时在银行的中心任务是推行边币（平衡物价，稳定金融是下半年的决定）。为着与敌顽斗争，边币必要时可以发行一点，但不能使物价超过50%，也就

^①717团，359旅的一个团。

是不得已才能发行，尽可能不发行。

另外，关于贸易问题，我想到要使边区走向计划经济。那时打算，盐出口每年收入 2500 万法币，其中贸易局可收 2000 万法币。各根据地给中央外汇，可以取得 700 万。粮食出口，贸易局可以拿到 300 万。三边毛皮出口可以收入 20 万，毛口袋可以拿到 20 万，毛线、毛毯、毛衣可以拿到 60 万。整个边区有 6900 万的法币买卖，贸易局可以拿到 5100 万。而边区需要外面人口的用品共计 8100 万法币。与出口的 1000 多万法币的差数，我想用禁止香烟入口和鼓励出口的办法来解决。

因为特货和盐在我们手里，财政上又不拖累，我想 1942 年金融可以稳定，当时是抱着乐观态度的。到 1942 年 2 月，特货统一了，对外面来的大批货，我们可以用特货低法币。政府重申了禁用法币的法令，各地又设立了 30 几个货币交换所，两相配合，边币流通范围扩大了。这时，友区紧缩通货，开始限价，大批东西来边区卖，使边币稳了几个月。为配合特货统一，又搞有奖储蓄，并发行了 1000 万元，买了 880 万元货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家感到物价要涨，要抢一批货，以备将来稳定物价。估计日伪要抢购物资，法币有被降为辅币的可能，因此决定驱逐法币出境，推行边币。为准备物资，各地大量买洋纱布疋。这 1000 万元货物也对供给起了很大的作用。

3 月时，延安主要物价飞涨一倍。特货与盐 1、2 月时还能相当统一，到了 3 月，由于霍维德公司把特货包出去了，共计 150 万元，影响销路，1942 年的金融计划马上被打破了。边币与法币的比价又低下来，2 月份是 2 元 5 角，3 月份是 2 元 9 角。边币流通范围缩小了，法币又不得进入交换所，老百姓公开用法币。到 5 月，因 359 旅调动，绥德边币被打下来，有人造谣，黑市达到 4 元 5 角。到 6 月份，境外有 1 万捆洋纱进来，需要 300 万法币，因此边币又下跌，延安黑市到了 3 元 5 角 5 分。

绥德也跌了一些。有奖储蓄失败了。

当时有人质问，金融为什么波动？我的答复是经济力量不足，发了1000万票子。谢老¹问，为什么发这些票子？我说这些票子一部份是中央允许发的。在5、6月时，财政厅向西北局打报告，说物价涨了，金融不稳，预算不能维持，要求发票子。贺龙师长找我谈话，说由晋西北给银行5万特货，财政厅再给5万，我想，以这10万特货，可以把边币提高到1元顶1元了。

这时，我开始研究物价上涨到底什么是主要原因，边法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为此找了许多书，并到外面巡视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边币有它自己的规律。基本问题是边区物价不一定跟法币走，物价大涨与发行有关系。1、2月时不涨，是因为当时外货来的很多，又是年关，大家用筹码少。可是年关过后，商人开始活动，边币流通到市场，所以物价大涨。

边币的规律都取决于那些因素呢？第一，决定于商品量与货币量的矛盾，货物多货币少，物价即跌，反之即涨，商品量又决定于自己的生产与外货的进口。边区商品可以由边币决定价格，外货是由法币决定的，如汇价提高，外货价涨，我们的物价不一定跟着涨。第二，决定于进出口的多少。出口多汇价会提高，反之则低。汇价不完全根据进出口，假如票子发的多，出口多了，汇价也不会提高的。第三，决定于流通范围的大小。范围小，要少发；范围大，可以多发。如何使边币范围大？首先要边币稳定，稳就可以推行，不稳就会流回来。其次，是保证边币能兑法币。再次，是要用法令推行边币。另外，盐和特货未统一起来，法币到不了自己手里，金融发生波动，是无力来维持的。所以，调剂物价金融，统一盐和特货起着主导作用。在盐和特货未统一起来之前，发行起着决定的、主要的作用，发行的多，物价就要

¹谢老，即谢觉哉。

涨。

那时，我还研究如何以更少的票子，做更多的工作。与贺龙师长谈话后，我认为边币提高的条件已够了。以前我把力量用在研究财政经济上，至此，则集中力量搞金融。我曾作过一个报告，说本位主义不好，但忘本主义也不好。总之我的做法是先把思想搞清楚，即研究出边币有其规律，不一定完全跟法币走。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说秋收后边币可以提高，还做了一次业务方针的报告，中心内容是：2月后物价涨的基本原因是，我发了票子；特货与盐不能统一；法令执行不力，边币往回走；银行本身调剂的不好。并提出，以后的业务方针是调剂金融，稳定物价。

根据新的业务方针，边币发行额执行财经委员会的决定。机关放款停止，对农业还继续放，各商店收回公盐代金；确定各分行投资的透支标准；按当时当地物价与汇价高低，卖货或买货，物价涨、汇价低时，卖货买法币。对生产仍然放款，如纬华、难民工厂、化学工厂的工业放款，给火柴厂35万元贷款。但对其他大工厂的周转是采用实物贷款的办法，因为调查发现，工厂借钱存货不生产，结果在帐面上还赚，事实是赚银行的钱。农贷的基本问题是款子少，不是利息高或实物贷放的问题。农贷以实物贷款是对的，这样贷款，农贷可以继续放，而且可以多放，即使政府没有款也可以继续放。对财政厅的1000万借款，我当时决定让他们抵押实物。财政厅即要发票子，又不要物价涨，这是办不到的。我认为发行后，物价一定涨，因此决定由财政厅交2万特货。其次，为革命需要，票子也要发一点，但没有人敢负责任。因此我主张要把发行权归政府，一切发行归政府管理，借款由政府批准。

6月，我决定收缩通货，不使边区物价比区外高。6月30日，提交财经委员会讨论，南汉宸厅长说紧缩通货是对的，不必

要的投资可以停止，特货可以卖出一部分，财政尽量不拖累银行。林老^①作结论，可以收回1/4的边币，由银行做出计划。根据这个决定，银行在7月4日有一紧缩通货、提高边币的决定，提出边币有提高的可能性，政府收公盐代金需要边币，光华商店可以卖出一些货物，边币也可以收回一些。因此，争取在7月里边币提高到与法币3比1，在未提到前，一切东西暂时不买；除工、农业贷款外其他贷款暂停；党政军配合，严禁行使法币。这里并没有让各地方都收缩，只是说其他贷款可以停止。

第四阶段是1942年7月到12月。

7月4日的决定发出后，20日就推翻了。当时苏子仁^②同志到看到物价涨得太急，棉花北上，南路的货不来。详细研究了一下，原来6月日伪在华北禁止使用法币，驱法币到国民党地区，国民党地区的物价要涨，所以要大量买盐，使边区的货倒流。国民党采取抢货的办法，进来的货有800驮被他们扣在洛川，出去的货他们保护，同时大量买我们的东西。于是，我的思想改变了，认识到战争时期，金融贸易问题基本上是抢物资的问题。因此，在7月25日写了贺、林、高^③的快邮代电，指出友区在抢我们的东西，并不许我们进口东西；同时又指出过去法令没有贯彻，法币仍在边区内行使，假如不严申法令，我们买不到外面东西，比价不但不能提高，反而可能下跌。具体对策基本上是，不允许法币在市场上行使，用法币到外面买货。主要想法是，边币比价提高，有利于外货进口。这以后，边币每天都有一二分提高。

8月3日，我又开了一次行务会，确定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抢

①林老，即林伯渠。

②苏子仁，即乔培新。

③贺、林、高，即贺龙、林伯渠、高岗。

货。两个办法，一是提高汇价，一是发票子。8月6日，边区召开财政会议，李鼎铭、高岗、林伯渠、陈正人、肖劲光、徐向前、贺龙、何杰、方仲如和我参加。一是谈财经办事处的成立，一是谈金融问题。当时，我把行务会的两种办法提出来，即发行一些票子到外面买货，以货换货，使物价稍微提高。会上，王震同志说边币可以提到1元顶1元，高岗说边币可以提到2元顶1元，或1元顶1元。林老指出主要是抢物资。贺龙同志提出边币要稳，各部队要努力推行边币，但大家都不愿提高物价。

老百姓的心理，对边币的影响很大。在边币比价猛烈提高时，大家都拿法币来兑换。在9月整财会议前，银行曾商量把边币提高到1元顶8角，不要提到1元顶1元。假如提到一元，外面大批东西要来，我们一定要买，还要发票子，同时法币也不够用，结果物价要上涨。在整财会议上，我对提高边币的利弊问题有一个分析。我的分析是，边币提高有利于推行边币，抢购物资。提高后这两点是达到了，基本上是好的。另外，物价虽然没有低，但也没有涨。其次，票子购买力好了，将来紧急时，可再发，对口岸也有好处。坏处是财政上的特货和食盐吃些亏。金融问题就是这样，有利必有弊。

延安在提高边币时没有把物价压低，是我们主观上没有想把它压低，目的在于抢货，使外货入口。1942年上半年物价每月平均上涨16%，7、8月后上涨较慢，没有超过10%的。假如当时有票子，汇价提到2元5角，可以多收些法币，但物价可能涨的更快些。

关于物价与发行的关系，我的意见是，物价涨的基本原因是生产不足，但直接影响物价的是发行。如皖南事变后，物价涨了15倍，但当时物资比以前多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票子发得比增加的物资还多。去年发行增加30倍，物价上涨15倍，假如生产也发展30倍，物价就不会涨。发行快而物价涨的慢的原

因在于，生产发展了，流通量大了一些。有一部分人，一方面要求发行，一方面又要求物价不涨，我认为很难做到。南汉辰厅长说发行要根据流通量，说物价上涨，流通量不够，就要发行。我提出原则上不发，遇困难再发的观点，是为了挤财政，不要财政拖累。当时，各部门要求发的票子太多了，因此我打了一个埋伏，说每月发行至多不能超过7%，即400万。其实至多能发1200万，1000万各机关用，200万由银行周转。结果，1200万都由财政厅用了。假如当时发400万，也就够用了。我过去不是没有发行，是发行了30倍，我的错误是处在被动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发行的。我的困难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

1942年冬，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陕甘宁及晋西北财经工作，贺龙同志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用全部精力搞了1943年计划。正在此时，西北局召开高干会，高岗突然提出来要清算陕北历史，以后便撤销了我的行长工作。高岗说我的银行政策是错误的，甚至是可疑的。当时，他的哥哥在市场上做黑市买卖，被银行工作人员樊一萍扣了起来，因此又说我对西北局闹独立性。在延安审干时，高把樊一萍等抓起来，说成特务。但是历史证明，高岗的做法是不行的。从1942年7月起到1943年3月我离开银行之前，在给各机关生产自给打下一定的基础上，边币和法币维持在1.8比1达8个月之久，边币威信提高，流通范围扩大。而我离开银行以后不到一年，边币和法币的黑市价变为20至30比1，边区金融市场混乱，影响整个经济生活不能正常进行。后经中央纠正，才又改了过来。樊一萍等一批同志亦经中央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情况》的通报

(1984年2月24日)

朱理治同志的爱人苏菲同志致信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对朱理治同志1935年在陕北工作期间所犯错误中的两个问题予以澄清。

朱理治同志在陕北工作期间的错误，中央监察委员会1959年作过审查，纠正了在过去结论里关于陕北错误肃反事件中逮捕刘志丹、高岗是出于他个人的阴谋陷害和他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这两个不合乎事实的说法，指出他的错误性质是积极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1983年4月，中央指定解决西北历史问题的五人小组又进行了研究。中央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陕北历史问题的正确的分析中，对朱理治同志在陕北的问题，有了明确结论，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一、关于朱理治同志在1935年陕北肃反事件中所犯错误的性质问题。1935年九、十月间，陕北发生了错误的肃反，错捕了刘志丹等同志和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一批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杀害了200多人，使苏区陷入严重危机，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当时朱理治同志是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又是陕甘晋省委书记，因此，他在这一事件中应负主要责任。他的错误性质，主要在于积极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和上级对肃反的错误指示，盲目搬用鄂豫皖等苏区错误的肃反经验，偏听个别人的反映，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而对陕北的情况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但是他的错误不是出于个人对刘志丹等同志的阴谋陷害。

二、关于朱理治同志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1935年秋，陕北红军从缴获敌人的电文中了解到中央红军正向陕甘挺进。当时，前方的指挥同志拟调十五军团前往迎接，写信征求朱理治同志的意见。有同志认为，当时中央红军距离敌人电文中所说的时间已过，尚未见到中央到来，部队开出去不一定能迎接得到，而且主力离开苏区，有被敌人乘虚侵入的危险，因此，建议部队向南出击，打击富县、洛川之敌，调敌北移，牵制敌人，以保卫苏区和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朱理治同志同意了这一意见，即派人去前方，并征得前方同志同意，调主力部队南下攻打榆林桥。以上情况说明，朱理治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

三、朱理治同志对他在陕北一段所犯错误一直表示沉痛，作过多次检查，态度是诚恳的，也接受了教训。他自1927年入党后，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把一生献给了革命。

四、关于西北历史上的争论问题，经过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的认真工作，获得正确的解决，也为各方面同志一致赞同。中央指出，今后对西北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应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来统一认识。过去文件中有同这个文件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应以中央[1983]28号文件为准。遇到和党中央[1983]28号文件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应经中央或中央授权机关审查后发表，不允许轻率地公开争论。

（引自中共中央组织部《案情通报》第四号）

朱理治年表

肖 迅

1907年

7月25日 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余西镇一个三代行医之家，取名朱铭勋。父亲朱作舟是当地著名的中医，全家主要靠他行医维持生活。

1919年 12岁

在通州师范第一附小读书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活动。

1922年 15岁

考入南通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勤奋读书，成绩优异。

1925年 18岁

“五卅”运动掀起后，和进步同学一起走向街头，走向农村，揭露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向群众宣传爱国道

①此文原名《朱理治年谱》，载《朱理治金融论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部分修改。

理。

1926年 19岁

读完高中二年级，以高中毕业的同等学历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为了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几乎翻遍了图书馆里古今中外各派学说的书籍，开始接触共产主义。

1927年 20岁

4月 经余冠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

8月 参加北京中共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听蔡和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

10月 先后任中共北京西郊区委组织部长、区委书记。

1928年 21岁

1月 中共北京市委和城区的几个区委均遭破坏，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共北京市委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后市委恢复，被选为市委候补委员。

4月 中共北京新市委和西郊区委遭破坏，身份暴露，在清华同学、中共党员冯仲云的掩护下，离北京赴上海找组织。

5月 在上海找组织未成，回到家乡南通，一边做教员，一边从事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党员。

7月 由于清华同学中的国民党右派告密，被国民党南通县党部逮捕。后押往南京，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符合之主义”的罪名，判处四年徒刑，先后被关在江宁地

方法院和苏州最高法院看守所。在狱中，坚持斗争，组织中共临时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后因反对“左”倾盲动主义，被排挤出支部领导班子。

1930年 23岁

4月 刑满出狱。

7月 在上海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组织关系。以闸北区安徽中学和沪西区正风中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后在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协助下，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并担任会长和中共党团书记。通过社科研究会，在上海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发展陈国栋等37名青年团员。

1931年 24岁

7月 调共青团中央，任宣传部秘书兼团中央训练班教员。

9月 代表共青团中央参加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领导工作。

1932年 25岁

2月和4、5月 作为中共中央巡视员，两次去厦门、福州巡视党、团工作。

7月 调共青团江苏省委，任组织部部长。

年底 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

1934年 27岁

3月 调中共河北省委，任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

10月 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1935年 28岁

7月 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到陕北，任北方代表的代表，后改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团书记。

9月 红25军长征到陕北，他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任省委书记。

11月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后兼任新组建的红29军政委。

1936年 29岁

2月 在中央红军东征前夕，向毛泽东汇报了省委工作的打算。东征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开展东北军工作。曾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介绍省委开展东北军统战工作的文章，毛泽东看到后写信表示赞扬。

3月10日 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来电，来电告之已同意东北军王以哲部派兵去甘泉换防，要求不对王部攻击。

3月18日 收到周恩来的来电，来电指示不要组织或同意东北军中的兵变。

4月12日 收到毛泽东、彭德怀的来电，来电同意集中红29军及地方部队，袭击不事先通知而冒然前进之敌人部队。

4月13日 收到周恩来的来电，命令陕甘苏区红军破坏敌人的交通工事，开展游击战争，以钳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北进”。

4月27日 收到周恩来给陕甘省委的来电，来电指示以武力劝阻东北军离开公路抢粮、收租，并严惩其政训人员。

5月23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汇报东北军问题及陕甘工作。会前撤销陕甘省委，成立陕甘工委，任工委书记。会后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任委员兼秘书长。

8月 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前往西安，由张学良安排住其卫队营营长家，负责领导中共在东北军中的地下组织——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行前，周恩来当面交待了任务。

10月11日 致信周恩来并转中共中央，提出用西北的统一战线推动全国的统一战线，用西北与华北的抗战推动全国性的总抗战。

11月4日 致信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指出“目前时局若无其它变化与重大压力加于蒋氏，则出兵援绥很大可能成为一种姿势与手段，表面上领导抗日，而实质上是拆散西北联合战线的情势，进攻红军与解决东北军”。

12月3日 致信周恩来并转中共中央，指出为了对付西安城内蒋介石的力量，准备实行四个策略：即利用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和省党部、宪兵团、政训处的矛盾；和国民党省政府直接谈判；扩大统一战线的阵容，多争取上层人物；尽力纠正左派在宣传及行动中的“左”的倾向。

12月11日 致信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西安“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游行群众向临潼蒋介石住地进发，张学良予以劝阻，答应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大家的情况；表示待张答复后，再看情况，“准备更大的向蒋之请愿活动”，“设法动员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将官，士兵请纓，请愿签名”，“一直走到士兵的骚动”。

12月20日 在住地向前来西安处理“双十二”事变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汇报东北军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并接受指示。

1937年 30岁

1月底 患肺炎，住进医院。不久转至红军总部所在地陕西三原县云阳镇休养。

3月23日 就东北军工作近况及东北军移防后的工作布置问题，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出报告，并附关于《“双二”事变中东北军党的活动的教训》一文。

3月底 在云阳镇召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员开会，部署党组织在东北军移防后的工作。

5月 参加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并于会后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开始筹建省委的工作。

7月中旬 前往云阳镇，为河南的部分党员干部举办训练班。离开延安前，毛泽东同他谈话，说：“你工作的区域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望抓紧时机在各方面作好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

8月17日 就河南、安徽党的组织、统战与东北军工作情况及初步安排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出报告。

9月初 经西安、洛阳到达开封，组建中共河南省委。

11月25日 为中共河南省委起草关于发展与恢复党组织问题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1月28日 在中共河南省委机关刊物《风雨》周刊上发表《回乡工作的基本任务》，号召青年学生去农村宣传抗日，组织民众参加抗战。

以省委名义提出“为准备10万武装而斗争”的口号。派吴芝圃、刘子久、刘子厚等分赴豫东、豫西、豫南领导工作，发动游击战争。

12月17日 为中共河南省委起草关于救亡工作与党组织问题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938年 31岁

1月3日 就河南政治形势、党的工作及组织问题向中共中央长江局写出报告。

1月25日 为中共河南省委起草的《保卫河南宣言》在《风雨》周刊上发表。

2月18日 就中共苏鲁边特委工作情况致信长江局。

△ 就西华县的抗日武装准备情况致向中共中央长江局。

3月6日 在《风雨》周刊上发表《论保卫河南的武装群众工作》。

3月11日 就党在河南的军事工作情况致信中共中央长江局。

3月21日 就开辟豫东抗日新局面的问题致向中共中央书记处。

3月31日 就河南中共组织及其与其他党派关系、军事斗争、工人运动情况致信中央长江局。

4月17日 在《风雨》周刊上发表《普遍组织全河南的农会》。

4月26日 就河南抗日武装斗争、地方党及统战工作情况向中共中央长江局写出报告。

5月下旬 奉命与彭雪枫赴武汉，当面听取周恩来、叶剑英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事后写出《河南省委致长江局综合报告》，表示要立刻创立1500到2000人的新四军，开展山地和平原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

6月19日 为中共河南省委起草就统一战线和群众工作问题给苏鲁边特委的指示信。

6月20日 为中共河南省委起草关于豫东南要加紧游击战争准备工作的决定。

6月 沿平汉线布置工作后到达确山县竹沟镇，并把此地做为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所在地。创办抗战报纸《小消息报》及干部训练班。

6月至7月 两次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汇报河南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情况。

7月7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肖望东率先遣大队开赴豫东。

7月9日 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组成，与彭雪枫、陈少敏同任常委。

7月21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河南游击战争发展形势及当前任务》一文。

8月 主持召开中共河南省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建党、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工作。

9月 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任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 向中共中央写出题为《一年来的河南工作》的报告。

11月14日 在延安《解放》周刊上发表《论目前华中抗战形势及今后任务》。

12月23日 与李先念等一起离开延安，经过一个月的跋涉，回到竹沟。

12月底 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撤销河南省委，成立豫鄂边区党委，仍任书记。

△ 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豫鄂边形势及对信阳工作的意见，指出：“豫鄂边处在敌人第一次进攻已经过去，新的进攻将要到来的过渡阶段。党的工作方针，一面是向敌占区积极发展；一面加紧以竹沟为中心的敌未占区的准备工作，以便在

豫鄂边区建立一个局面”。

1939年 32岁

1月7日 成立中共豫鄂边军事委员会，任主任。决定组织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由竹沟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月底 刘少奇抵达竹沟。协助刘少奇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3月18日 刘少奇离开竹沟，返回延安。由此至9月下旬刘少奇第二次到竹沟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

4月9日 致电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为了回击顽固派对中共同情者的打击，拟由被国民党当局撤职的进步县长、专员发一宣言；同时，积极创立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4月30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陈少敏、栗在山率竹沟与信阳武装400多人南下鄂中。

5月1日 收到刘少奇来电，来电指示要抓住时机，大大发展游击战争，确立党在中原长期抗战的巩固地位与基础。

5月17日 收到刘少奇来电，来电指示竹沟附近部队一律称新四军，其他较远地区以组织独立部队为好。

6月19日 起草刘少奇同他给李先念、陈少敏的电报，指出“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并要求统一新四军的指挥与编制。根据这一电示，豫南、鄂中党的武装统一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从此，豫鄂边区有了人民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

8月 主持召开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应付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的决定。会上，当选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

9月中旬 患流感与疟疾合并症。病中得知鄂东党的武装被

顽固派袭击，为防顽固派对党的武装各个击破，致电中共中央，提议将豫鄂边四个区域的武装进一步合编，统一由李先念指挥。

10月18日 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中原局和豫鄂边区党委机关分批撤离竹沟的决定，率领留守处机关及教导大队600余人南下四望山，与李先念部会合。

11月16日至19日 主持召开中共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将三个地区党领导下的武装改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并成立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党委。

12月 发表《论目前鄂豫边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

1940年 33岁

1月3日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正式建立，任纵队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来电称：“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几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1月13日 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所在地湖北京山八字门为访问边区抗日根据地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及著名女作家安娜举行欢迎大会并讲了话，称赞史沫特莱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伟大精神。

2月 写出《怎样做》一文，印成小册子。

3月 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奉调回延安。

4月 发表《创造华中武装部队的经验》一文。

5月 向中共中央汇报河南工作和鄂中情况。陈云听取汇报后指出：“河南党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了党员8800个，使竹沟成为华中武装斗争与抗日根据地的出发点，组织了部队骨干，训练了3000名干部。”

1941年 34岁

3月5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以发展生产的方针解决陕甘宁边区财政困难。会上，他被内定接任边区银行行长。

3月14日 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4月7日 增补为陕甘宁边区贸易委员会委员。

4月9日 被聘为陕甘宁边区救国公债发行委员会委员。

5月10日 被聘为陕甘宁边区食盐督运委员会委员。

5月13日 写出《关于边区物价上涨原因及解决办法的几点意见》一文。

5月17日 兼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局长。

8月6日 收到毛泽东来信，来信询问有关金融和贸易方面的问题。

8月中旬 给毛泽东回信，就所询问题一一答复，并提出相应建议。

8月19日 毛泽东致信陈正人，信中说他“要朱理治写了一个报告书，很有些价值”，建议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

8月21日 为陕甘宁边区银行《经济简报》创刊号写发刊词，指出“进行社会调查是决定金融政策的基础”。

8月 写出《关于边区经济与金融贸易报告》一文。

10月23日 在陕甘宁边区行署专员、县长联席会上作题为《目前边区金融贸易政策》的报告。

10月 在陕甘宁边区银行和贸易局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谈边区金融等重大问题的症结所在和克服的办法。提出一方面要向工农业放款，刺激生产发展，另一方面要推行有奖储蓄，吸收存款，健全金库制度；一方面要运用政府权力，严禁法币流通，另一方面要由银行创办货币交换所，并按市场行情兑换边法币。

11月7日 主持陕甘宁边区银行大楼的落成典礼并致词。

12月15日 陕甘宁边区农货委员会组成，任副主任委员。

1942年 35岁

2月27日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边区新的金融政策之意义与目的》。

4月1日 向《解放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为了争取贸易上的主动，必须以统制对付统制，纠正过去公私运盐漫无组织的现象。

5月28日 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银行行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作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报告。事后，又就此问题致信各分行行长和各地办事处主任。

5月29日 在《解放日报》发表《边币的根本问题》。

6月6日 在陕甘宁边区银行为晋西北来延安士绅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指出边区银行不仅投资公营生产事业，而且扶植发展私人企业。

6月11日 在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业务工作报告，指出边区今后停止对机关放款，公商放款采取实物办法，货币交换所改挂牌为公议。

6月15日 写出《银行、贸易局今后业务方针》一文。

7月25日 为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负责人高岗、贺龙、林伯渠起草致县团级以上干部万万火急电，指出战时金融贸易问题基本上是抢购物资的问题，要求各机关严禁法币流通，不使货物外流，并收集境内法币，抢购区外物资。

8月6日 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财经会议。会议研究了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等问题。

9月4日至10月上旬 参加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整

财会议。会议讨论了金融等重大问题。发言指出，银行并未夸大货币交换所的作用；法币的涨落不决定于主观，而决定于法币与边币的供求关系；不许法币黑市活动而又没有边法币兑换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10月7日至20日 参加陕甘宁边区银行召开的农贷问题讨论会并讲话，指出应与合作社、商店加强联系，发展民办合作事业，不使农贷亏蚀。

10月19日 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就1935年9、10月间在陕北发生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进行检讨，接受批判。会议开至次年1月14日结束。会议结论中关于当年错捕刘志丹、高岗系朱理治出于有意陷害，以及朱理治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这两个不符合事实的说法，直到1959年经中央复查后才予以纠正，并于1984年通报党内。

10月26日 拟定《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

11月25日 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委任为新组成的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会议成员，兼计划委员会主任。

12月20日 致信高岗、贺龙、林伯渠，汇报金融变动情况及银行处理办法。

1943年 36岁

1月15日 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免去银行行长职务。

1月 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起草1941年至1942年年度报告中的金融部分。

3月 调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4年 37岁

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 38岁

4月 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七大。

10月 离延安赴东北解放区工作。

1946年 39岁

2月1日 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兼洮南军分区政委。

2月20日 致信李富春、黄克诚，汇报到洮南后发动群众、清匪、组织部队等工作情况。

3月下旬 在洮南地区党政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要大胆放手发动工农群众和城市贫民，组织民兵和地方兵团，改造政权，肃清敌伪残余和土匪，为建立巩固的洮南民主根据地而斗争。

5月上旬 离洮南赴哈尔滨，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秘书长。

5月14日 列席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会议。

5月15日至23日 参加中共中央北满分局召开的北满地区各省党政负责人联席会议。

7月底 与萧劲光离哈尔滨赴大连了解和布置军工生产。

8月 离华赴平壤，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朝鲜全权代表，负责领导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的工作。

9月2日 收到陈云来电，来电就与北朝鲜进出口贸易、合作办厂及交通运输问题给予具体指示。

1947年 40岁

6月27日 致电高岗、李富春并转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驻北朝鲜办事处一年来的工作，指出国内一些在朝工作、过境、办事、养病的同志，没有把朝鲜看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尊重人家的制度，不体谅人家的困难，建议东北局向有关单位发一指示，进行批评教育。

1948年 41岁

8月上旬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办事处各分办事处主任联席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认为基本实现了东北局“以北朝鲜为变相的隐蔽的后方来支援南满作战”的意图。

8月24日 致信东北局并中共中央，汇报驻北朝鲜办事处成立两年来的工作情况。

10月 离平壤回哈尔滨，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任副部长。

11月 随陈云等赴沈阳，兼任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后勤处处长。

12月 任东北银行总经理。

1949年 42岁

4月13日至18日 参加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南满问题的高级干部会议。

5月 兼任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

6月 在东北银行干部会议上就业务方针问题作报告，指出银行的方针应是推动生产与巩固金融，特别是用金融的力量来推动生产。

7月 在东北总会计局干部会议上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作报告，指出总会计局是过渡性机构，应尽快完成这个过渡，改经济工作的供给制为经济核算制。

8月23日 写出《对总会计局结束后各财经部门相互关系的意见》一文。

10月 兼任东北人民政府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任主任）。

12月 在东北银行第六届经理联席会议上作题为《论银行工作的转变》的报告，指出东北已由战争走上全面建设时期，银行应及时由过去主要发行票子，搞货币斗争，进行农贷，转为起结算、信贷、现金管理三个中心的作用。

1950年 43岁

2月 在东北人民政府第二次委员会议上就1950年东北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问题进行说明。

5月 写出《关于东北经济计划工作的若干总结》一文。

6月 在东北工薪会议上就实行八级工资制问题作说明。

7月17日 在东北各省市经济计划会议上作题为《东北经济恢复与建设计划的方针和方法》的报告。

8月 在东北计划委员会干部会议上作整风总结报告。

9月下旬 在北京参加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计划会议。会议期间与陈云、薄一波、李富春商谈东北财经与全国统一等问题。

1951年 44岁

2月 主持制定《东北行政区 22个月财经准备计划纲要(草案)》。

3月 写出《关于经济核算制的发言大纲》一文，指出经济核算制是一种制度，它的特征是在国家计划之下，给予企业一定的经营权利与义务；它能启发企业的责任心、积极性及创造性，成为改善质量、厉行节约、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的主要工具。

△ 写出《东北行政区的计划工作》一文。

6月 离沈阳赴北京，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和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委员会（简称核资委员会）副主任。

9月5日 在第一次全国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会议上作总结报告。

1952年 45岁

1月 任中央财政委员会物质分配局局长。

8月5日 起草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关于第一次全国物资分配会议情况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及中央的报告。

10月 致信陈云、薄一波，对中央财政委员会内部工作问题提出建议。

1953年 46岁

4月4日 致信陈云、薄一波并转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报告物资分配局一年来的工作及第二次全国物资分配会议情况。

1954年 47岁

3月 任政务院交通部副部长兼中共交通部党组副书记。

4月28日至5月9日 参加交通部党组扩大会议（共6次），学习讨论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检查党组的集体领导制度和党的团结问题。会议结论指出：朱理治等同志的发言，都是正确的，有很好的批评与建议，对部党组集体领导和今后工作有很大帮助。

6月 在全国交通系统财务工作会议上作题为《为加强财务管理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而斗争》的总结报告。

1955年 48岁

4月 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并发言，表示拥护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再次检讨1935年陕北肃反扩大化中的错误，同时澄清1942年延安西北高干会上高岗的一些诬陷不实之词。

1956年 49岁

1月28日 主持召开全国航运会议，并作题为《为消灭海损事故提高运输质量而奋斗》的报告。

2月4日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对全国航运工作人员的讲话，号召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3月20日 主持讨论修改交通部1955年工作总结和1956年工作部署。

7月11日 在重庆中央直属航运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上作题

为《改进川江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

8月2日 在长江航运局运输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改进长航工作，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报告。

9月10日 在交通部机关科长、工程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作题为《关于长江航运工作的报告》。

9月15日至27日 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中共“八大”。

10月31日 就发展远洋航运事业问题为中共交通部党组起草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10月 为中共交通部党组起草给周恩来并中共中央的《检查长江航运工作的报告》。

1957年 50岁

3月23日 在交通部直属航运局长会议上作关于1956年直属航运工作总结与1957年工作部署的报告。

1958年 51岁

6月11日 完成《写给竹沟革命纪念馆的回忆》一文。

6月中旬 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成员。

6月25日至7月27日 陪同陈云赴兰州、武汉、上海、无锡等地，参加西北、华中、华东协作区会议，并深入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7月25日 受陈云委托就在西北、华中、华东三个协作区调查的情况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出报告，提出“鉴于我们的发展速度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高速度，因此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分为前三年后两年两个阶段为好。1962年的指标暂定一个粗线条的，带幅度的，但指标相互间必须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不能每

个省都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强求一律，必须根据资源、人力和原有基础发展各省经济。”

本年 根据王首道转达的邓小平的意见，就 1942 年西北高干会结论中的不正确内容向中监委提出申诉。

1959 年 52 岁

3 月下旬至 4 月中旬 赴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等地，调查了解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钢铁小洋群、地方工业情况。

5 月 1 日 致信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并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汇报在河南、陕西调查的情况，指出“无论从各国和我国的经验来看，小洋群必须设立在有矿石和大煤炭的地方，并且矿石品位要高，煤能炼焦，矿石和煤炭的距离又要很近。要具备这些条件，才能建立小高炉的基地。”“现在看来，河南等省有的小洋群基地还是定多了些。”“目前全国建设的摊子铺得过大，因此，许多重点项目反而得不到材料，不能早日投入生产。”“我国的工业建设应该象现在这样大大小小一起上马互相争夺原材料，结果使大家都完不成计划呢？还是应该首先保证重点，让现代化的大企业尽快建好投入生产呢？显然后者是比较正确的。”

8 月 25 日 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1 月 6 日 主持起草国家计委《关于改进物资工作和建立物资供应部的几点意见》稿，并征求经济学家的意见。孙冶方回函说：“我已读过，对草稿提不出修改意见。”李富春指示印发计划会议，并送周恩来、彭真、薄一波、李先念、董必武、罗荣桓、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中央领导。

11 月 23 日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指出 1942 年西北高干会结论中关于 1935 年陕北肃反事件中逮捕刘志丹、高岗是出于朱的有意陷

害，朱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应予纠正。这一审查意见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得到批准。

1960年 53岁

1月 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在华北组会上发言，谈多快好省问题，指出没有多快即没有好省，但没有好省亦不会有多快，今后订指标，必须订质量、成本、技术指标和安全措施；社会主义威力不只在数量，而在多快好省的结合，数量、质量、品种都好，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威力；多快要鼓干劲，好省更要鼓干劲；对多快好省这条总路线必须有全面了解，要从多快中求好省，亦要从好省中求多快；“大跃进”在数量上要大跃进，在质量上亦要大跃进。

2月 应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编辑委员会请求，写出1927年到1928年在北京，1934年至1935年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的回忆。

7月1日 在国家计委干部会议上作题为《计划工作人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的报告。

7月3日至22日 率队赴河北、山东两省视察工业支援农业情况。回京后向国家计委党组写出视察报告。

8月 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兼计划委员会主任。

10月30日 向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写出《关于华北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1961年计划的方针应当是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加强工业和其他方面对农业的支援，在工业生产中着重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充分发挥现有设备能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非生产性的建设，除必要的职工宿舍、学校、营房外，一概停止；

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适当照顾人民生活；注意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

1961年 54岁

2月 应清华大学校史编委会请求，与他们谈关于大革命前后清华大学中共组织的一些情况。

1962年 55岁

患肝炎休养。

1963年 56岁

1月 应新四军五师战史编委会请求，写出《有关河南省委、中原局及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的一些情况》一文。

3月21日 收到徐海东回信，信中谈1935年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的一些情况。

9月12日、24日及11月14日 应西北红军战史编委会请求，与他们谈1935年在陕北工作的一些历史情况。后据谈话记录整理成《陕北工作经过》一文，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1964年 57岁

1月 在中共中央华北局计划委员会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谈对当年工作安排的意見。

5月25日 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华北组会上发言，谈华北地区农业规划问题。

6月初 主持华北地区计划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搞计划工作不能主观地规定指标，而要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找出能反映客观存在的多快好省的建设方案；编制年度计划，尤其是长远计划，必须要留有余地，搞好综合平衡，坚持打歼灭战，少而精的原则。

6月15日、16日 参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对人民解放军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的检阅。

7月 赴包头钢铁公司视察，与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共同研究扩建包钢的有关问题。回京后致函国家计委、华北局、冶金部、一机部，建议成立包钢会战总指挥部，并兴建黄河“二首制”工程，以解决包钢用水问题。

8月 在北戴河主持华北各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座谈会，并在结束时就当前经济形势、1965年计划主要指标和安排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针性问题发言。

10月4日 同刘少奇谈话，刘在谈话中指出，田家英正在修改《毛选》的注释，《毛选》注释中有错要改，西北高干会决议有很多地方不对，基本上是错误的，应废除。

10月中旬 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在发言中指出：“对资本主义管理中一些好的东西，很多人没有认真研究过。”“在过去一个时期，着重抓了多快，对好省抓的不够。省，就是利用价值法则、经济核算办法办企业”，“企业管理中的成本问题是个综合指标，核心问题”。“计划、劳动、财务、物资等制度都是相互联系的；否定者，扬弃也，即丢掉坏的，发扬好的。要避免消极否定，把好的也破了”。

11月20日至12月15日 赴天津、沧州、河间、邯郸、巨

鹿、邢台、石家庄、冀县等地，了解灾情和农田基本建设及水利情况。回京后向华北局书记处并中共中央写出河北省面上工作一些情况的报告。

1965年 58岁

2月19日 在保定听取中共保定地委领导同志汇报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除了阶级斗争之外，还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需要解决。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靠比学赶帮。保定要争取在1965年粮食做到自给，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但也要防止浮夸，不搞高指标，不搞瞎指挥。

6月中旬 主持起草《华北地区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的汇报提纲》。

6月29日 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会议，就华北地区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作说明性发言。

7月10日 为中共中央华北局起草给周恩来并中共中央的报告，建议将河北棉田由1000万亩减为700万亩，以增加粮食种植面积，争取河北早日做到粮食自给。

9月21日 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并发言，主张在粮食政策上稳定征购指标，“藏富于民”，不搞反瞒产，不征过头粮。

9月下旬 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发言，谈华北地区粮食自给问题，建议再建5个年产5万吨的合成氨厂，以增产60亿斤粮食。

10月9日 为中共中央华北局起草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汇报解决华北地区粮食问题的措施。

10月15日 在华北地区农田水利会议开幕会上作报告，指出使粮食上去的办法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心是搞小型农田基本建设。

10月29日 在华北地区农田水利会议结束时作总结报告。
本年 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至1974年 59—67岁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扣上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经济路线等罪名，由医院（因患肝炎住院治疗）揪到机关接受批斗和“群众专政”，家被反复抄过八次，居室被查封。后又以审查历史问题为名，被关到机关“牛棚”，强迫劳动，并被宣布为变节分子、叛徒。林彪反革命集团粉碎后，被机关军管会宣布“解放”，随后下放汉沽农场“五七”干校劳动。

1975年 68岁

年初 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河北省工作，未安排任何职务，只列席省革命委员会有关经济问题的一些会议。因家仍在北京，省委又未安排宿舍，故住办公室，吃食堂。只要省里没有会议，便到下面搞调查研究，提建议。据粗略统计，在这一年及此后的两年里，共到下面370多天，考察了260多个工矿企业和50多个生产队，10多个水库、洼淀，与近60个地、市、县的领导进行过座谈。

1976年 69岁

江青反革命集团粉碎后，仍未安排任何职务。

1977年 70岁

5月 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年底 参加国务院组织的参观团，赴山东烟台、潍坊、泰安等地参观学习农业机械化工作。

1978年 71岁

1月初 在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会议中间感身体不适，经北京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被留院治疗。住院期间，陈云、王震、余秋里、程子华、康克清、陈慕华、季方等前往探望。

2月24日 被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名单。

2月27日 新华社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名列河北省代表团。

3月8日 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4月9日 上午9点45分于北京医院逝世。

4月14日 下午3点在北京医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李先念、耿飏、余秋里、谷牧、康克清、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程子华、周子健、郭述申、李维汉、高士其、齐燕铭等前往告别。

4月15日 下午4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陈云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计委等个人和单位送了花圈。李先念、王震、谷牧、康克清、季方、粟裕、胡耀邦、胡乔木、肖劲光、李葆华、陈国栋、肖克、袁任远、曾

志、郭述申、曹菊如、郭洪涛、孔原、陈琼英、刘澜波、贺诚、贺彪、童小鹏、郭影秋等 700 余人参加。由中共中央常委批准的悼词说：“朱理治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朱理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他努力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动群众，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致力于东北的经济工作和政权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坚持继续革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追悼会前，邓颖超托人向朱理治夫人苏菲表示慰问。

4月16日 人民日报以及北京、河北等各省党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朱理治逝世和追悼会的消息，并配发遗象。

1983年

5月21日 邓小平在朱理治夫人苏菲的申诉信上批示：“请中组部办理。”苏菲在信中说：在 1942 年西北高干会上，高岗为了抬高自己，对朱理治罗织罪名，无限上纲。1959 年，中监委经过认真调查，推翻了伪造的罪名，作出了正确结论。但是由于中监委的结论未能在党内转发，大多数人不了解这一情况。最近，一些报刊文章和文艺作品在提到陕北肃反问题时，仍说那是“有意陷害”。因此，希望中组部能将中监委的结论印发给党史研究和文艺宣传部门。

1984年

2月24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案件复查通报》第 4 号

“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情况”。通报指出：“朱理治同志在陕北工作期间的错误，中央监察委员会 1959 年作过审查，纠正了在过去结论里关于陕北错误肃反中逮捕刘志丹、高岗是出于他个人的阴谋陷害和他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这两个不合乎事实的说法，指出他的错误性质是积极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1983 年 4 月，中央指定解决西北历史问题的五人小组又进行了研究。中央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陕北历史问题的正确的分析中，对朱理治在陕北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结论。”“朱理治同志对他在陕北一段所犯错误一直表示沉痛，作过多次检查，态度是诚恳的，也接受了教训。他自 1927 年入党后，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把一生献给了革命。”

1985 年

12 月 20 日 《人民日报》发表刘子久、任质斌、方正平、粟在山、刘放等人的文章《朱理治同志在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业绩》。

1991 年

5 月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48 卷发表《朱理治传》。

8 月 18 日 《人民日报》发表刘培植的文章《回忆朱理治同志对东北军的工作》。

1993 年

7 月 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编辑的《朱理治金融论稿》一

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陈慕华题写书名，袁宝华作序。书中收入朱理治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和东北银行总经理时写的文稿 17 篇，还收入了有关同志回忆朱理治及论述朱理治金融实践与理论的文章多篇。

11 月 9 日 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延安地区分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联合举办的《朱理治金融论稿》出版座谈会，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举行。朱镕基副总理，陈慕华副委员长分别打电话表示支持、祝贺。邓力群、郭述申、刘英、袁宝华、宋一平、顾大椿、乔培新、梅行、余建亭、张佑才等老同志和有关方面的领导及金融学、经济学的专家学者 50 多人出席了座谈会。与会者认为，朱理治不仅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我党较早从事金融工作，熟悉金融业务，成效卓著的金融专家和领导干部；他关于金融问题的著述，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对研究中国现代金融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不少观点在今天仍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